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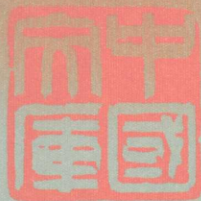
中国文库

· 史学类 ·

中国回回民族史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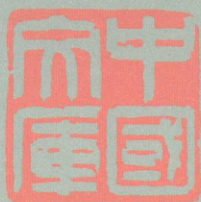
白寿彝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中华书局

中
国
文
库



ISBN 978-7-101-05909-0



9 787101 059090 >

定价：78.00 元（全二册）

中国文库
史学类

中国回回民族史

(下)

主 编 白寿彝

副主编 马寿千 李松茂

中国出版集团

中华书局

目 录

题记	(1)
----	-----

甲编 序说

第一章 回族史系统研究的开端	(3)
第二章 回族史系统研究的发展	(9)
一、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	(9)
二、傅统先《中国回教史》	(14)
三、马以愚《中国回教史鉴》	(17)
四、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史纲要》	(20)
第三章 回族史料的收集和整理	(25)
一、白寿彝《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	(25)
二、白寿彝《咸同滇变见闻录》	(27)
三、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	(31)
第四章 回族史研究的新阶段	(36)
一、《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	(36)
二、《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的出版	(39)
三、《回回民族问题》的作者	(42)
第五章 新中国初期的回族史研究	(45)
一、《回回民族的新生》、《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	(45)
二、回族史料的继续收集和整理	(52)

三、回族社会历史调查	(55)
第六章 最近的二十年(1978—1998)	(62)
一、全国回族史讨论会	(62)
二、回族人物志的编写	(75)
三、回民起义史料的扩大收集和研究	(79)
四、地区回族史研究的成绩	(88)
结语:回族史研究是一门艰苦的学问	(95)

乙编 综述

第一章 “回回”这个名称	(103)
第二章 回回民族和回回教	(105)
第三章 回回民族的形成(上)	(110)
第四章 回回民族的形成(下)	(118)
第五章 元明时期的反压迫斗争	(124)
第六章 清前期的反压迫斗争	(130)
第七章 云南回民起义	(137)
第八章 西北回民起义	(144)
第九章 兄弟民族的人民友谊	(152)
第十章 学术文化上的贡献	(157)

丙编 专论

一 中国回教的历史	(165)
题记	(165)
第一章 中国大食间的交通	(166)
第二章 大食商人的东来	(170)
第三章 大食法之记载	(174)

第四章 礼堂和公共墓地的创建·····	(177)
第五章 回回之始盛·····	(181)
第六章 歧视与厄害之发生·····	(184)
第七章 寺院教育的提倡·····	(190)
第八章 汉文译述的发表·····	(192)
第九章 最近的三十二年·····	(197)
二 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传统·····	(201)
三 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	(210)
(一)怛逻斯·····	(210)
(二)怛逻斯的战事·····	(219)
(三)怛逻斯战役对于唐在西域地位上的影响·····	(228)
(四)怛逻斯战役对于唐大食国际关系上的影响·····	(235)
(五)怛逻斯战役与伊斯兰教之最早的中文纪录·····	(242)
四 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	(248)
(一)宋以前南海上的香料贸易与大食商人·····	(248)
(二)宋时大食商人在蕃商中的地位·····	(258)
(三)宋时大食商人与朝贡·····	(263)
(四)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生活的情形·····	(270)
(五)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贩卖的商品·····	(272)
(六)宋时大食商品在中国的影响·····	(292)
五 元代的吉普赛人——啰哩回回·····	(302)
(一)啰哩释义·····	(302)
(二)啰哩是最早的名称·····	(304)
(三)元代的啰哩回回·····	(306)
(四)元代以后的啰哩人·····	(309)
六 明代哈密地方的哈刺灰人·····	(314)

七 回教清真教名称源流考释·····	(319)
八 明清回族进士考略·····	(324)
(一)顺天府·····	(325)
(二)直隶·····	(331)
(三)江苏·····	(338)
(四)山东·····	(348)
(五)安徽·····	(363)
(六)河南·····	(370)
(七)浙江·····	(390)
九 中国伊斯兰教教派与门宦·····	(394)
第一章 教派、门宦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条件·····	(394)
第二章 教派的类别与门宦的特征·····	(411)
第三章 三大教派·····	(415)
第四章 四大苏菲主义学派及其门宦·····	(424)
十 中国伊斯兰教碑文选注·····	(461)
(一)西安化觉寺创建清真寺碑·····	(461)
(二)西安重修礼拜寺无相记·····	(465)
(三)泉州重立清净寺碑·····	(469)
(四)广州重建怀圣寺记·····	(480)
(五)广州尔卜道拉喜墓碑·····	(484)
(六)杭州真教寺碑记·····	(487)
(七)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	(492)
(八)南京敕建净觉、礼拜二寺碑记·····	(497)
(九)刘介廉公墓志·····	(500)
(十)青州赵氏先茔碑记·····	(505)
(十一)青州圣裔赵氏重建碑·····	(506)

(十二)大名县城镇南关小东街礼拜寺碑记	(509)
(十三)定州元至正八年重建礼拜寺记	(514)
(十四)定州明正德十六年重修清真礼拜寺记	(524)
(十五)昆阳故马公墓志铭	(530)
十一 《古兰经》的汉译	(534)
(一)国际译坛掠影	(534)
(二)国内译本综览	(540)
(三)汉文全译本巡礼	(544)
铁铮从日文转译的《可兰经》	(544)
姬觉弥总纂的《汉译古兰经》	(548)
王静斋的三种《古兰经译解》	(551)
刘锦标的《可兰汉译附传》	(558)
杨敬修译《古兰经大义》	(561)
时子周的《古兰经国语译解》	(568)
马坚通译《古兰经》及前八卷注释本	(573)
林松的《古兰经韵译》	(581)
全道章的《〈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详释本》	(587)
周仲羲译《古兰经》(新加坡印本)	(593)
马振武的经堂语《古兰经》译本	(596)
沈遐淮的《清真溪流——古兰经新译》	(605)
十二 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	(607)
(一)杜文秀与英法侵略者的接触	(607)
(二)腾越的通商	(612)
(三)“回教国”的问题	(615)
(四)刘道衡使英问题	(617)
(五)有待研究的问题	(619)

十三 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自卫抗清斗争述略·····	(624)
(一)关中发难·····	(625)
(二)金积堡之役·····	(629)
(三)河州之役·····	(635)
(四)西宁之役·····	(638)
(五)肃州之役·····	(639)
(六)乌鲁木齐之役·····	(642)
十四 近代史上回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	(651)
十五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回回民族的新觉醒·····	(667)
十六 对中国回族经济的审视与沉思·····	(683)
十七 全面研究回民抗日的历史·····	(693)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回民抗日·····	(693)
(二)国统区、大后方的回民救亡运动·····	(696)
(三)沦陷区回民的反抗斗争·····	(699)
(四)全面研究这段历史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701)
附录	
回回教入中国史略(陈垣)·····	(704)
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庞士谦)·····	(720)
清真教育会记事·····	(728)
《中国回教俱进会本部通告》序(王宽)·····	(734)
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赵振武)·····	(736)
五十年求学自述(王静斋)·····	(755)

丁编 传记

元代

一 赛典赤赡思丁·····	(769)
---------------	-------

一	赛典赤纳速刺丁	(781)
二	赛典赤忽辛	(783)
三	赛典赤乌马儿	(786)
四	赛典赤家族	(788)
二	阿合马	(791)
三	扎马刺丁	(801)
四	也黑迭儿丁	(813)
四	萨都刺	(819)
五	高克恭	(834)
明代		
一	常遇春	(843)
二	冯胜 冯国用	(850)
三	沐英	(858)
二	郑和	(862)
三	马文升	(867)
四	海瑞	(876)
四	李贽	(883)
五	丁鹤年	(889)
六	梁檀	(896)
六	麻贵	(909)
七	马守应	(916)
清代		
一	米喇印 丁国栋	(925)
二	马进良	(932)
三	马宁	(936)
四	哈国兴	(940)

苏尔相	(944)
三 王岱舆	(948)
马注	(951)
刘智	(956)
四 祁静一	(963)
马来迟	(965)
马明心	(968)
五 改琦	(971)
蒋湘南	(972)
近代	
一 伍长华	(976)
马辰	(979)
郑国鸿	(983)
沙春元	(987)
二 徐天尧 安玉贤	(990)
马维骥	(993)
马秀廷	(995)
白金柱	(997)
左宝贵	(998)
马福祿	(1005)
三 杜文秀	(1008)
李国纶	(1030)
苏天福	(1032)
马如龙	(1035)
四 白彦虎	(1039)
马化龙	(1044)

马占鳌	(1048)
马海晏	(1051)
马桂源	(1054)
马文禄	(1060)
五 马新貽	(1063)
郑魁士	(1067)
六 马德新	(1071)
马联元	(1076)
王宽	(1081)
马启西	(1084)
七 丁拱辰	(1087)
杨枢	(1089)
王子斌	(1092)
李元庆	(1097)
现代(上)	
一 马骥云	(1101)
丹鹏晏	(1104)
马玉贵	(1108)
赵钟奇	(1113)
二 丁竹园	(1117)
丁宝臣	(1121)
蔡大愚	(1125)
刘庆恩	(1130)
三 马骏	(1134)
郭隆真	(1139)
刘清扬	(1146)

吴祯	(1154)
四 马本斋	(1157)
刘震寰	(1162)
安德馨	(1168)
马君图	(1173)
五 韩幽桐	(1180)
马宗融	(1185)
马坚	(1189)
纳训	(1194)
六 金尔珍	(1196)
金颂清	(1199)
金祖同	(1202)
马骥	(1205)
七 马安良	(1210)
马福祥	(1213)
马麒	(1219)
马麟	(1226)
八 白崇禧	(1230)
马鸿逵	(1237)
马步芳	(1241)
九 马鸿宾	(1246)
马佐	(1251)
端木杰	(1252)
十 吴鸿宾	(1256)
刘屹夫	(1258)
刘格平	(1263)

马青年	(1268)
现代(下)	
一 蒋翰臣及其家族	(1271)
魏子青	(1275)
杜秀升	(1280)
安树德	(1284)
二 铁宝廷	(1287)
马伯声	(1296)
陈经畲	(1300)
温少鹤	(1305)
丁德山	(1309)
三 白瑞启 白泽民	(1315)
赵炳南	(1321)
四 童琮	(1429)
马六舟	(1331)
马邻翼	(1333)
唐柯三	(1338)
时子周	(1341)
五 哈少夫	(1348)
伍特公	(1351)
沙彦楷	(1355)
傅统先	(1358)
六 马观政	(1362)
马聪	(1367)
白耀明	(1372)
沙国珍	(1377)

七	马连良	(1380)
	侯喜瑞	(1384)
	雪艳琴	(1387)
	薛恩厚	(1390)
八	王莘	(1393)
	张平	(1397)
	丁峤	(1399)
	李超	(1403)
九	王子平	(1406)
	马凤图	(1409)
	穆成宽	(1415)
十	达浦生	(1420)
	哈德成	(1427)
	王静斋	(1433)
	马松亭	(1441)
十一	杨敬修	(1448)
	庞士谦	(1452)
	虎嵩山	(1457)
	马良骏	(1459)

元 代

一 赛典赤赡思丁^①

政治经历

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年)是元代回族中富有声誉的政治家,特别是对云南地方的政治、经济和回族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他的全名是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赛典赤,意为荣耀的圣裔,赡思丁意为宗教的太阳,乌马儿意为长寿,原来都是阿拉伯语。

赡思丁早年充任成吉思汗的帐前侍卫,随从征伐。窝阔台汗即位后,他任丰、靖、云内三州(今大同市西北、呼和浩特市一带)的都达鲁花赤,主管三州民政。后改任太原、平阳二路达鲁花赤。人为燕京路断事官。断事官是秩三品掌刑政的官,元朝初年尝以相臣兼任,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② 他任断事官的时候,“轻财爱民”,很有威望。^③ 1251年蒙哥汗即位,赡思丁奉命同塔剌浑行六

① 本文依据的材料,除另行注出的以外,都见于《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传》。

②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③ 王恽《秋涧大全集》卷八一《中堂纪事》下庚申(中统元年)六月条。

部事，“抚谕燕京军民”。后被任燕京路总管，也多惠政。继升任采访使，在蒙哥汗伐蜀的时候，主持粮饷供应，没有缺乏过。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赡思丁被命为燕京路宣抚使，掌管本路军民事务。中统二年（1261年），赡思丁拜中书省平章政事。这是一个等于副丞相的官职，“军国重事，无不由之”。他任以上各职的时候，都受到朝廷的奖谕。

至元元年（1264年），赡思丁出任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后并节制陕西五路四川行枢密院所有大小官属；七年（1270年），率军出征，在嘉定跟宋督万寿军对垒。八年（1271年），有旨：“大军现围襄阳，各道宜进兵以牵制之。”赡思丁偕郑鼎率兵水陆并进，再一次到了嘉定，俘获宋将二人，战舰二十八艘。遂奉命在兴元主持行省政务，主办大军的粮饷。

至元十一年（1274年）世祖对赡思丁说：“云南是我曾经亲自到过的地方。近来因委任的人不得力，以致地方上不能安定下来。我想派一个谨厚的人去治理，没有比你合适的了。”他遂被任为云南平章政事，这时他已六十三岁了。他在云南执政六年，得到人们的拥戴。至元十六年（1279年）他在鄯阐府（昆明）因病逝世，年六十九岁。

干练的理财家

当窝阔台在位的时候，蒙古对金的战争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金朝的统治中心向南迁移到汴京（开封）。丰、靖、云内三州，原来是金朝防御蒙古的军事重镇，也是金朝和西北各民族的互市地区，商业相当繁盛。这些地方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年轻的赡思丁担任三州地区的达鲁花赤，使生产得到恢复。

燕京是权贵集中的地方，治理不易。赡思丁在先后任燕京路

断事官、燕京路总管和燕京路宣抚使的时候,敢于打击不法的权贵。他清查田产,没收权贵霸占的民田,并释放被权贵强迫为奴的人。对于一些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猖狂活动,包括其中“造伪钞,结党杀人”的人,都一律依法判罪。在建设方面,赡思丁兴办水利,招抚流民,开垦荒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赡思丁在以中书省平章政事兼管全国财政的时候,奉命主持交钞事。他控制了交钞发行量,三年内共发中统钞二十四万锭。他去职后,一年中发行额竟十倍于他在三年中发行的总额,致使交钞大为贬值。

赡思丁是一个干练的理财家,在他掌管财政的时候,国库充裕,战时的粮饷供应没有匮乏。

出色的政治家

赡思丁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至元年间出任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和云南平章政事的时候,都有政绩,而以在云南尤为显著。赡思丁到陕西三年内,民户增加了 9565 户,军户增加了 12255 户,税收增加了钞 6225 锭,屯田粮增加了 9721 石,节省和买钞 331 锭。他的政绩被上报到朝廷,得到了朝廷赏银五千两。

赡思丁初到云南的时候,云南的政权机构还没有明确的建制。这时,云南最高长官是都元帅,其下设有万户、千户等官职,一切民政事务由武官管理。同时又有亲王、有大理等处行六部,算是行政机关。亲王、军人和行政部门之间,职权不明,矛盾尖锐,而少数民族地区又有土司统治,社会秩序紊乱,人民生活困苦,曾激起各族人民的暴力反抗。赡思丁认为,军政不分,军人代政的局面必须改变,要提高民政机关的权力,做到以行政领导军事,使政令统一。至元十二年(1275 年),赡思丁向朝廷陈奏:“云南诸夷未附者尚

多,今拟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经世祖允准后,就开始改变了军、政不分的状况,把宣慰司和元帅府纳入行中书省的管辖;加强了行省权力,使武官不再管理民政。

统治机构的职权明确了,赡思丁便着手于行政区划的建制,使其跟内地的建制一体化。赡思丁奏:“州县皆以万户、千户主之,宜改置令长。”至元十三年(1276年),他把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改为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县令或县尹。共“为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①王府和行省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明确的权限,王府只是对省府进行监督的机构。他把行省的治所从大理迁到鄯阐府。从此,云南的行政体制得到了更新,使云南开始成为我国的一个行省,加强了全国的统一。云南有郡县,虽始于汉武帝时期,但只限于部分地区,而历代又有所变革,五代及两宋更与内地隔绝,旧日之郡县渐形荒废。赡思丁建置的郡县,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开始。他还特别注意在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地带设置郡县。明清两代基本上都还保持这样的建置。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云南全省的一百零八个县中,还有五十七个是赡思丁旧日的建置,或据他所设的路、府、州而改称的。行政体制的改革和郡县设置,是赡思丁在云南政治史上的重大贡献。

对云南生产、交通和文教方面的建设

赡思丁在到云南之前,曾把云南的山川城郭、驿舍军屯、夷险远近,访求了解,绘制详图。到达云南之后,他又注意考察民情,了解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听取对发展生产的意见,询问“利国

^① 《元史》卷六一《地理志》四。

便民之要”。相传贍思丁和当地农民有一次谈话。贍思丁说：“我想帮助你们解决一些种田的困难，贷给你们牛、种子、耒耜、蓑笠。你们看，一亩田能收多少？”农民说：“可亩产稻子二石。”贍思丁问：“能给官府缴纳多少？”农民说：“可缴纳一石。”贍思丁说：“太重了，你以后的日子没法过。若以后不再贷牛、种子、耒耜等农具给你们，牛死了要拿钱买牛，农具坏了也要钱修理，还有一家人的吃饭穿衣等不少的消费，你们只剩一半粮食，哪能够呢？”农民说：“这么说，我给官府缴纳三分之一吧！”贍思丁说：“你虽然咬着牙缴纳三分之一，就怕你的子孙受不了。以后接替我的官员来了，又要按三分之一催要。这不成了官府与老百姓为仇吗？我说，你们亩产二石，给官府缴纳二斗就行了。”农民听了很高兴，但又提出一个困难问题。他们说：“租子轻了，可路太远，没法上缴。”贍思丁提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因地制宜，“宜马则入马，宜牛则入牛，并与粮值相当。不产牛马，入以银”。这就是后来的“粮折牛马、粮折银”的租税征收办法。^①

贍思丁在云南施政方针，总的说来，是“省徭役、招散亡、恤鰥寡、兴儒教、备水旱灾，礼接贤士、削去冗官、建屯田、制楮币、设路食以待劳民，薄征税以广行旅”。^②这主要是关于生产、交通和文教方面的建设。

贍思丁重视军民屯田的建设。他建立军民屯田十二处：

- 一、威楚提举司屯田；
- 二、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府军民屯田；
- 三、鹤庆路军民屯田；

^① 张洪《南夷书》，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

^② 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见李元阳《云南通志》卷一五《艺文志》。

- 四、武定路总管府军屯；
- 五、威楚路军民屯田；
- 六、中庆路军民屯田；
- 七、曲靖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民屯田；
- 八、乌撒宣慰司军民屯田；
- 九、临安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民屯田；
- 十、梁千户翼军屯；
- 十一、罗罗斯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军民屯田；
- 十二、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军屯。

赡思丁在云南的军民屯田分布在云南各地，以滇中、滇东一带最为集中。其中，滇中有中庆（今昆明）、威楚（今楚雄）、武定、潞江、新兴（今玉溪）等处；滇西有大理、永昌（今保山）、腾冲等处；滇东北有乌蒙（今昭通）、乌撒（今贵州威宁）、东川等处；滇西北有鹤庆、罗罗斯（今四川西昌地区）等处。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元代军民屯户共 28149 户，屯田 98707 双。^① 其中赡思丁当政时期，有屯户 16277 户，屯田 49658 双，都是在至元十二年至十五年的成果。在屯田区中，除屯户自备“己业田”外，而“官给田”、“官给无主荒田”，大都是新开垦的荒田。因此，当时云南的农业人口和耕田面积，都有显著的增加。元初，云南“无梗稻桑麻”，只种植一些低级的粮食作物，赡思丁把内地的稻子、桑麻输入，必然也相应地将有关的先进技术引进，从而改善了人们吃饭、穿衣的状况。

跟屯垦事业的发展密切相联系，赡思丁也重视水利的兴修。他兴建了鄯阐地区水利灌溉系统工程。当时，鄯阐郊区的田亩，依靠滇池灌溉。滇池承受了过多的水源，而宣泄的地方只有一个海

^① 一双约等于四亩。

口。由海口到安宁鸡心滩一段,河床经常被泥沙淤塞。一到雨季,因宣泄不畅,滇池的水倒流,往往酿成严重水灾。瞻思丁委任张立道修治滇池。首先在鄯阐城东北地区,清理水源,以疏浚盘龙江为重点,使盘龙江年久失修、泥沙淤积的河床得到浚修,把来自东北部群山的“邵甸九十九泉”引入盘龙江,从而消除了滇池上游的水患。接着,在金马山下建造了松花坝水闸,这是一个大型的分水坝,用以截流分洪。同时开凿了一条长达百里的金汁河。河堤宽一丈二尺至一丈六尺,沿堤建造小闸十座,涵洞水渠三百六十,自上而下,轮序放水,灌溉东部地区的高亢田。此外,在滇池下游开凿了宝象、马料等六条人工河,设闸分水,既利宣泄,又供灌溉。在瞻思丁主持下,各种调节水利的设施相当完备,遗制保留下来的,时至今日,还是粲然可观。

瞻思丁奖励生产,兴修水利,促进了云南农业生产的发展。他在云南六年,史称滇池地区,“其俗殷富,墟落之间,牛马成群”。元朝官吏郭松年记述他从鄯阐到大理的路上,看到白岩县(弥渡)“居民凑集,禾麻蔽野”,赵州(凤仪)“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

瞻思丁在四川的时候,曾修造山路、桥梁和栈道,颇有成绩。入滇后,他看到云南水陆驿传很不健全,连皇帝的诏书也传递迟滞,便大力修治驿道,建筑驿馆。特别在山路险远,荒野无人的地方,相地置镇,每镇设吏一人,百夫长一人,以保证行旅的安全。至元十三年到十五年(1276—1278年)间,瞻思丁命乌蒙总管爱鲁,负责重新修整从鄯阐经乌蒙(今昭通)到叙州的水陆驿站道路。至元十五年,中书平章政事哈伯等奏:“中庆路至乌蒙赛典赤所管之地,立讷九站。乌蒙北五站不得立。乌蒙土官称:‘使我属赛典赤,则可立站。’臣等议差人谕塔里木罕,能主张立站则立之,不能则委赛典赤领其地以立站。又乌蒙北至叙州,若造船立讷水站,则陆路七

八日程,顺水一日可到。俟立訖,来由水路,去者使由陆路为便。”朝廷同意了这个奏议。^① 这条干线筑成后,成为云南和四川、贵州的交通要道,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自经赡思丁大力倡导,云南在元代修筑了许多驿道和相应的驿站。元代云南行省所辖驿站七十八处,其中马站七十四处,水站四处。道路和驿站的修筑,大大改善了云南交通闭塞的状况,也加强了云南和燕京及中原各省的联系。

在文化教育方面,云南因地处边疆,长期得不到发展。元初,还没有学校。至元十三年(1276年),赡思丁在鄯阐的五华山上修了一所学校,拨田五顷,以为学田,又在官渡购买田地三十三亩,也作为学田。他劝导各族子弟入学,并从内地选聘学者、文士前来任教。他还修建了孔子庙、明伦堂,宣扬儒学,传播内地汉民族的婚丧礼俗,以移风易俗。在赡思丁的提倡下,鄯阐、大理、楚雄、曲靖等地也先后兴办了学校。

赡思丁还在云南设立测景所,观测日月蚀和推算四时节令;设立惠民药局,治疗疾病,供给药物。这样,就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医学等传播到了云南。云南的文化教育事业从赡思丁的时候起,可说是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对云南回族和伊斯兰教发展的影响

赡思丁对云南的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发展,也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

赡思丁号称赛典赤,甚至元世祖也以赛典赤称之,这就足以表明他是出身于伊斯兰教的宗教世家。他家原来是布哈拉人,布哈

^① 《站赤》上册,37页,文殿阁书庄,1936年据东洋文库影印《永乐大典》本重印。

拉是当时以伊斯兰文化而有盛名的地方。他的父亲名苦鲁马丁。^①史称,成吉思汗西征时,他们一家率领千骑,带着文豹、白鹞之类的珍禽异兽前去迎接,后来随成吉思汗东迁。在赡思丁以前,虽有回回人来云南经商或游宦,并未在这里立足扎根。赡思丁到云南后,回回人才陆续到来,安家立业。他们有的参加了屯田,有的任行省的各级官职,有的从事商业活动。回回人在云南参加屯田活动,为回族在云南的发展创造了经济基础。在云南回民所聚居的村落多叫“回回屯”、“回回村”、“回回营”,或某家营、某家甸,这可以说还是当年军屯生活的遗留。现在云南的回民村子和回汉杂居的村子,回民的田地,往往是在水源旺盛的地方,这大概因为他们是最初开发这些地方的人,因而得以选择了最便于耕种的田地。随着时代的推移,云南逐渐成为回民的一个大的居住区域。追根溯源,这跟赡思丁开发云南是分不开的。

伊斯兰教对回族来说,是一个全民族性的宗教,民族和宗教的发展在历史上是互相联系的。回回人随赡思丁进入云南,伊斯兰教自然同时传入云南了。赡思丁以他宗教世家的身份和政治地位,在云南传播伊斯兰教,是很有条件的。相传赡思丁曾在鄯阐创建清真寺十二所,保存至今的尚有正义路的南城寺和金碧路的永宁寺。马可波罗看到当时鄯阐城内,“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思脱利派之基督教徒”。^②当时波斯历史学家刺失德丁的《史集》中也记载了押赤(昆明)“居民尽回教徒”。^③刺失德丁的话未

① 苦鲁马丁之名见于《济渎重建灵异碑记》。记文称:“始祖赛天知苦鲁马丁,追封世王。”赛天知即赛典赤之别译。原碑未见,此据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卷二〇引。

② 《马可波罗行纪》卷二,冯承钧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③ 《多桑蒙古史》第三卷引,冯承钧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免夸大,但可见当时云南省城内穆斯林人口之盛。

赡思丁逝世后,他的子孙相继掌握云南政权,经历三代。他们已成了云南人,又是当地的望族,这也跟云南的回族和伊斯兰教之发展有关。因为史料所限,我们在这方面所知还不多。

政治家的风范

赡思丁作为一个政治家在不断取得卓有成效的建设性政绩的同时,在待人接物以及处理一些特殊性的具体问题上,也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范,从而取得了优良的成果。早在至元七年(1270年)赡思丁镇守四川跟宋将咎万寿对垒时,他以诚意相待,不去侵掠宋军的辖区,使万寿心服。后来赡思丁要离开了,万寿设宴邀请,赡思丁的左右很有顾虑。席上进酒,左右又劝说:“不可以吃。”赡思丁笑着说:“你们的眼光太狭小了,咎将军能毒我,难道能毒尽我朝的人吗?”万寿感叹,非常佩服。

赡思丁要到云南了,镇守云南的宗王脱忽鲁恐怕要夺他的权,征兵备戒,企图阻止赡思丁的到来。赡思丁派人 against 脱忽鲁说:“天子命我来治理云南,请王派人来共同商议大事。”宗王派了两名亲信来回拜,交谈十分欢洽。赡思丁还授给来人官衔。宗王高兴了,消释了原来的敌意,并且心悦诚服地说:“观赛典赤之言,皆忠君泽民之道,才德兼全,吾几为左右误矣。”于是,欢迎赡思丁来主持政务,“由是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

赡思丁在云南时,红河地带的罗槃甸土司抗命,他带兵出征,面带愁容。随从人员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并不怕打仗,只是担心你们在战争中不幸而死,又担心你们欺侮老百姓,使他们不得安宁,一旦把老百姓再逼反了,你们却又去征伐他们。”军队到达了罗槃城,已经三天了,还不见罗槃人有降顺的意思。部将请攻城,赡

思丁不许，派人前去劝说。萝槃人表示愿意服从，但过了三天仍然不降。诸将奋勇请战，贍思丁还是不答应。将卒中有人擅自攻城，贍思丁大怒，急令鸣金收兵，斥责带头的人说：“天子是命我来安抚云南的，不是来杀人的。没有主帅命令，擅自出兵，军法当诛！”他当场下令要严惩肇事的军官。这件事很快就被萝槃酋首领听到了，十分感动，说：“赛平章是这样宽厚，我若再抗命，是不吉祥的。”于是出城请降。贍思丁这次出征，没有杀一个人而取得很大的胜利。贍思丁的这种风范，在云南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中传开了，他们的首领纷纷前来，表示愿意接受行省的领导。按照旧例，这些首领来进见；都要有所献纳。赛典赤把这些东西分赐给从官或贫民，自己一点也不要。他并设宴慰劳这些首领，送给他们衣服鞋袜。在贍思丁主政期间，云南的民族关系是融洽的。

云南有几个土吏，因贍思丁没有重用他们，怀恨在心，到朝廷控告贍思丁专权。元世祖看了看侍臣说：“赛典赤忧国爱民，我是很知道的，这些人怎敢诬告！”便下令把这些人械送云南，交贍思丁处置。贍思丁没有采取报复手段，反而卸去他们的刑具，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知道大汗给了我便宜行事的权力，因而控告我专权。我不认为你们有罪，我还要给你们官做。”这些人喜出望外，连连拜谢说：“我们犯有死罪，平章给了我们活命，又给我们官做，我们要誓死相报。”

贍思丁经营云南，无论是对军政大事或某些措施的细节上，表现为既要有严整的要求，又有从容不迫的度量，他既有威，又有惠。他进行了不少重要的改革，而又能因势利导。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感人的风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贍思丁去世了，史称：“百姓巷哭”，“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齐经，为文致祭，其辞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语。使者号泣震

野”。世祖诏云南守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朝廷追赠守仁佐运安远济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雍国公，谥忠懿。后进封咸阳王，改谥忠惠。

元末至正年间，云南普定府官罗文节拒绝了土官的贿赂，激怒了这位土官，土官说：“你难道是赛典赤吗？竟不接受我的金钱。”^①可见赡思丁在云南兄弟民族中建立的威信是很深厚的。一直到现在，云南各族人民对赛典赤在云南的功绩仍是追念不已的。

赡思丁有五个儿子。长子，纳速剌丁。次子，哈散，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次，忽辛。次，苦速丁兀默里，建昌路总管。次，马速忽，^②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马思惠〕

① 王礼《麟原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〇《罗泸州父子志节状》载：“事有不便于土官者，土官辄以多贿动文节，文节怒斥之。其人曰：‘君萨达克齐耶，乃不纳我金也。’盖国初时有平章萨达克奇至廉，故其言如此。”宋濂《奎坡后集》卷一〇《元故文林郎同知重庆路泸州事罗君(文节)墓志铭》亦称：“豪酋侵人疆畝，持黄金数镒为君寿，乞君勿右愆者。君麾之去。酋怒云：‘君赛天赤耶，乃不纳吾金也。’赛天赤镇云南之名相云。”

②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二〇《济溪重建灵异碑记》引碑文说，马速忽是赡思丁的“犹子”，跟《元史》所记不同。

赛典赤纳速刺丁^①

赛典赤赡思丁的儿子纳速刺丁也是回回中很有政治地位的。赡思丁的另一儿子忽辛和孙子乌马儿,也都有政绩。

纳速刺丁是赡思丁的长子,也称赛典赤。自赡思丁以后,他的子孙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似都享有赛典赤的称号。^②

纳速刺丁到云南,比赡思丁要早十几年。他在随兀良哈台进入云南后,即在中统元年(1260年)任安南达鲁花赤,后官至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至元十六年(1279年),^③纳速刺丁招抚少数民族寨子三百多处,得民户十二万二百。他在这里定租赋,设驿站,立卫兵。回朝时,以驯象十二头入贡。元世祖赐金五十两、衣二袭,并对所部将士也分别赏银。

赡思丁去世了,云南的民族关系出现了波动。元世祖担心云南的局势,近臣推荐了纳速刺丁。至元十七年(1280年),纳速刺丁进阶资德大夫,受命为云南行中书左丞,不久就升为右丞。他向朝廷建议三件事。一件事是说“云南省规措所造金薄贸易病民,宜罢”。这是要去掉一项对老百姓不利的事情,“薄”或作“簿”。“造金薄”的内容不知是指什么,尚待考查。又一件事是说“云南有省,

① 由本文到《赛典赤家族》,除别有注文外,见于《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传》和《新元史》卷一五五《赛典赤赡思丁传》。

② 《任松卿先生文集》卷一有《平章政事赛典赤荣禄公世美之碑》,系颂扬纳速刺丁之子乌马儿的功德。此所谓“赛典赤”,是指“荣禄公”,即乌马儿。碑文说到赡思丁时,皇帝“赐姓赛典赤”,则赛典赤的称号在当时即用以表示赡思丁的家族,是世代传袭下去的。

③ “至元十六年”,系据《元史》本传。《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缅”条下的本注和《元史》卷二一〇《缅甸传》,都作至元十四年。

有宣慰司,又有都元帅府。近宣慰司已奏罢,而元帅府尚存。臣谓行省既兼领军民,则元帅府亦在所当罢”。这是他继承他父亲赡思丁的遗志,把军政、民政进一步统一在行省的领导之下。这对于提高行省的威权,明确有关行政单位的职权,稳定社会的秩序,都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件事是说“云南官员子弟入质,臣谓达官子弟当遣,余宜罢”。这是要缩小质子的范围,只要高级官员子弟入质,其他各级官员可以不这样办。这就减轻了很多官员们的精神负担。这三件事都得到了朝廷的同意。

至元二十一年,纳速刺丁进荣禄大夫、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奏减哈刺章冗官,每年节省俸金九百多两。屯田课程,派专人管理,每年可得银五千两。

云南的风俗,对鬼的迷信很深。人们相信筑土一尺,立刻就可以死人。纳速刺丁对他们讲道理,要筑土的人每天汇报情况。一天一天过去了,一个人也没有死。他们解除了思想顾虑,于是就放胆胆子,把堤防和高房大舍建了起来。破除了这条迷信,对经济建设很有利。^①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纳速刺丁调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云南人舍不得他走,按照当地的习俗,用金属给他铸了像以纪念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他死于陕西任所。朝廷赠他推诚佐理协德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中书左丞相,追封岐国公、谥忠简。后进封延安王,改谥宣靖。

^① 《任松卿先生文集》卷一《平章政事赛典赤荣禄公世美之碑》。

赛典赤忽辛

赛典赤忽辛是纳速刺丁的第三个弟弟。至元初年,他因系功臣世家,充当元世祖的宿卫,至元十四年(1277年),任兵部郎中。第二年,调任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当时,河南的社会秩序不大安定,有的老百姓对政府采取了暴力对抗的活动。其中有的人,聚集山林;有的人,劫杀行旅。官方派军队镇压,总是失败。忽辛到任后,采取劝说的办法,派人带着官方文书劝他们归顺。不久,就有两个人来了。忽辛赐给他们衣帽,说:过去你们对抗官府,现在回来了,就是安分良民。忽辛让他们在身边活动,出入不禁。后来把他们都放回去,让他们劝说同伙。几天以后,又有十几个人来了,每人都七尺多高,神气很不正常。忽辛的部下都很担心,不知怎么办才好。忽辛叫把他们的姓名记下来,让他们在自己的身边干活。夜间,还让他们睡在自己的寝室的外边。有时候,还喊他们进来吃吃喝喝。忽辛对他们表示的信任,使他们都很高兴。原来持对抗态度的人听说了,都陆续放下武器,到忽辛这里来。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忽辛任云南诸路转运使。第二年转山西道转运使。又一年,任燕南河北道宣慰司同知。不久,任南京总管。至元三十年(1293年),任两浙盐运使。

大德元年(1297年),忽辛任江东道宣慰使,改陕西行台御史中丞,再改云南行省右丞。他见到云南有些事情是不好的,跟宗王商量,要求改革。宗王不答应。忽辛偕同行省左丞刘正,回到京师奏请。得旨,命宗王“协力施行”。因而,云南的一些弊政得以革除。

云南的一些豪民,因逃避徭役,往往投充王府,担任宿卫。地

方上不仅不能责成他们提供封建义务,还要给他们提供费用。忽辛根据朝廷原定王府宿卫名额,对于超额的人都编入民户的户籍。王府的宿卫因此减去了三分之二,节省了行省在这方面的开支。

王府养的马很多,任意在郊外放牧,田地多受到践踏、损害。王府的牧马人又随便闯入民居,住在那里,要吃要喝。人们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干扰,不能过安宁的日子。忽辛选择了适当的地方设置草场,并盖了几十间房子,解决王府牧马的问题,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得以安定下来。

云南辖境辽阔,山路又多崎岖。经管军粮支給的人往往借口道路远近等交通条件问题舞弊。忽辛登记了军户姓名和仓廩所在地址,分批地支給军粮。舞弊的情况因此得到了改变。

赡思丁任云南平章政事的时候,曾拨田五顷作鄯阐的孔子庙学经费。赡思丁死后,田为佛教庙大德寺所有。忽辛查核庙学旧籍,把田地夺回,仍归庙学。并下令云南各州府县,普遍设立庙学,聘选有学问的人当教官。在忽辛的推动之下,云南的教育工作有所发展。

云南境内的民族关系以及云南跟缅甸的关系,不断有些大大小小的波动。忽辛在云南的时候,马龙州土官勾结外援,策划动乱,并把朝廷给他的宣敕,私自交于他所勾结的外援以为凭证。宗王听了左右的话,主张不加查问。忽辛和刘正还是认真追究,查明了情况,把这个土官斩了。广南土官沙奴一向强悍,曾受有南宋颁赐的金印。元既已平定云南各地,沙奴一直不肯归顺。忽辛派人邀请他来,好好地招待他,但经过数月之久,还不让他回去。沙奴请求回去,终于把金印交出来。忽辛置酒宴慰劳,并劝说他到京人觐。至此,广南才在实际上归云南行省管辖。缅甸在大德五年(1301年),跟云南的关系一度紧张。忽辛派人对缅王说:“我是老

赛典赤平章的儿子,一切都按他老人家的章程办事。只要对于你们有什么不方便的事,我们都可一一为你们变更。”缅王听了,就同使者一起到了云南,还献了一头白象,说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特来进献。他带了这头白象,进京觐见,受到成宗的优待。

忽辛治理云南,在一些具体政务上,多因袭赡思丁的成规,而他的权力不及他父亲之大,他的胸襟气度也不及他父亲的宽宏。他的果断会使某些人感到不安,而他跟宗王的关系似也不大融洽。于是就有人在宗王跟前制造谣言和符谶来陷害忽辛。忽辛和刘正把这事向朝廷奏报。朝廷派使臣案问,造谣的一些人受到惩处。忽辛于结案后,也就离开云南,同使臣回到京师。

大德八年(1304年),忽辛出任四川行省左丞,改江浙行省。至大元年(1308年),拜荣禄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第二年,以母老,谢职归养。又一年(1310年)正月,去世。天历三年(1328年),赠守德宣惠敏政功臣、上柱国、雍国公,谥忠简。

赛典赤乌马儿

赛典赤纳速刺丁有十二个儿子。长子伯颜，累官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元三十年(1293年)，入拜中书平章政事。大德七年(1303年)，因接受贿赂，为御史所劾罢官。第二年，以原官起复。大德十年(1306年)，再罢官。大德十一年(1307年)，同左丞相阿忽台商议，打算拥戴安西王阿难答继承帝位，为八达汗所杀。^①次子，乌马儿。次，剌法儿，荆湖宣慰使。次，忽先，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次，沙的，云南行省右丞。次，阿容，太常礼仪院使。次，伯颜察儿，泰定间，太保中书平章政事，佩金虎符。后赠守诚佐治安惠世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中书左丞相、奉元王，谥忠宪。忽辛有两个儿子。长子伯杭，中庆路达鲁花赤。次子曲列，湖南道宣慰使。在这十四个人中，只有乌马儿的事迹记载下来的较多。^②

乌马儿累官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他在这里兴建泉州、兴化两处学校，各为设置学田。在泉州修建金鸡、南台、相额、营头、下辇、金溪六座桥梁。又将兴化、莆田、国清等县的海塘拨给贫民，改造为田。他这些措施都继承了祖父赡思丁的遗风，为福建人民所称道。

至治元年(1321年)，乌马儿改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领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事。这一年，粮食收成不好，乌马儿把财赋府的

^① 伯颜事，据《蒙兀儿史记》卷六二《赛典赤赡思丁列传》。

^② 乌马儿事，参见《任松卿先生文集》卷一《平章政事荣禄公世美之碑》，又卷二《江浙行省春运海粮记》。

存米十万石减价出售，自己又买了五百石米散发给群众。这年的冬天，京师也缺粮，朝廷要江浙行省每年海运米二百三十万石，还要在春天开始运出五十八万石，在四月间到达京师。总管府的官吏都感到意外，他们认为海运只能在夏至实行，春季东北风很多，这是办不到的。乌马儿说：“我们接到了天子之命，可不敢怠慢。”他及时组织运输，四月间向京师米仓交纳米五十五万石，京师的官民都很高兴。江淮财赋府这时开始成立，在半年以内，财赋所入比往年增加三十三万锭。他到京朝觐，太皇太后亲加慰劳，并赐以织金锦袄，后死于任所。

子也列失，孟州达鲁花赤。^①

^①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二〇《济溪重建灵异碑记》。

赛典赤家族

赡思丁的后裔,终元之世,累代簪缨。父子祖孙游宦所及,多有后裔留居下来。年深日久,赛典赤氏遂成为回回人中最昌大的家族。今所传抄赛氏家谱,种类繁多,所述事迹,不完全可信,但也有可以补充史书缺漏的地方。其它的有关抄件也有类似的情况。有一个抄件说到赛典赤的孙子、曾孙和玄孙。它说:“伯颜、乌马儿、阿立普舍、割法儿、忽先、哈辛、砂的查尔丁、阿容、伯颜察儿、母步帖儿、月鲁帖睦儿、帖威失列、赛啰伯杭、曲列、马哈只、以速甫、八木儿砂、砂不丁、舍黑伍苏满、教化的、怯烈、木儿威失列、法虎鲁丁,此王之二十三孙也。米的纳、赛曲列、散尔班丁、赛木马儿、脱脱、赛黑黑、赛生故、赛拜杭、赛咬住、赛密里威失、赛木八喇、赛马哈谋、赛列失、赛和上、赛哈八失、赛驴驴、赛啰里迷,此王之曾孙也。米里金、砂的奴、蜜鲁丁、佉黎,此王之玄孙也。”从命名之不求雅驯来说,当是当时的真实名称,不会是后世子孙所伪造。抄件所说,^① 当有所根据。

赡思丁死在昆明,《元史》说他葬在鄯阐北门,现在昆明的咸阳王陵是在城的东南。昆明东北的松花坝附近有一古墓,四周有断墙围绕,当地人说,这才是咸阳王的墓。有人说,这是咸阳王某一后裔的墓。清初康熙年间,穆斯林著作家马注的文章说:赡思丁死后“葬衣冠于云南古鄯阐北门,以系滇人之望。子孙扶柩归秦,葬于长安东十里铺浐河之岸,东界灞河,南界长老铺,西界晤儿头,北界光泰门”。马注还说他“偕妻法土墨,率子世麒、世雄,道过西安,

^① 见马注《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公莹碑总序》,旧抄本。

谒王陵寝，见其衰烟凄草，古木孤茔。俯仰之间，悲噎长叹。游子途中，不觉其泪之珠落也。独恸陵仆藐法，窃土侵茔。前此之墓，仅余数丈。日复一日，渐近逼窞。而茔前三冢，莫测为谁氏之考妣。目系神摇，恸心发指”。^① 这是关于瞻思丁陵墓之最详细的记载。按照马注的说法，墓是在陕西而不在云南，西安应是瞻思丁家宅所在，是他的家族的聚居点之一。但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很缺乏。而且当马注谒陵时，赛氏家族似已很衰落，连对守墓人盗窃陵土也无人过问了。

赛典赤家族散在各地，而以在云南者为胜。马注记康熙年间的情况说：“咸阳家谱与予亲历燕、鲁、吴、越、秦、楚、中山、滇、黔、西蜀之会，谱献可凭，聊纪十一。有居于昆明、陆凉、呈贡、嵩明者，是为忽辛公之后。有居于直隶、松江、利州者，是为伯颜察儿之后。有居于建昌者，是为月鲁帖木儿之后。有居于南直隶而锦衣者，是为马哈只之后。有居于大理、蒙化、永昌、腾越、楚雄者，是为马速忽之后。”^② 一直到今天，云南回民可认为赛典赤家族者，人数还是不少。

大约在元末明初，赛典赤家族开始采用单一词的汉姓形式。如纳速刺丁之后，或以纳为姓，或以喇为姓，或以丁为姓；马速忽之后，或以马为姓，或以忽为姓。这大概是由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回汉杂居日久，采用汉姓形式，有一定的方便。又一个原因是由于禁令，明初是禁止“胡姓”的。在此以前，回回人名多用阿拉伯文，族别易于辨识。此后，回人汉姓，从姓名上就多不能看出族别了。

① 《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公茔碑总序》，旧抄本。

② 同上。

云南民间相传,赛典赤家族有十三姓,而说法不一。玉溪马际昌老人藏有同治年间马钧所写《玉溪龙门马氏宗谱》,序文中说:“纳、哈、马、忽、速、撒、赛、保、闪、木、沙、苏、郝十三姓,皆咸阳王赛典赤后裔也。”这是关于十三姓之较完备的纪载。须注意的是:赛典赤后裔有这十三姓,但有相同的姓者不一定就是赛典赤之后。如马姓有多种不同的来源,木姓有自称为沐英之后者,苏、郝则是汉人常用的姓。

明清两代,赛典赤家族中,尚未见有显著地位的政治家,而赛哈智、马注、马德新、马联元,则是宗教学者中的著名大师,马继龙、沙琛等,则为著名的文人。

〔马恩惠〕

二 阿合马^①

由胥臣到宰相

阿合马是元世祖时期的理财家,曾受到世祖的赞许。世祖称赞他:回回人当中,阿合马的才干堪任宰相。阿合马出身于中亚花刺子模细浑河(今锡尔河)畔的费纳客忒城一个回回人家庭,生年不详。他以世祖的妻子察必可敦胥臣的身份来到世祖的藩邸,起初干些宫廷洒扫之役,很快就受到世祖的赏识,“试以行事,颇有成绩。”世祖即帝位后,既要继续进兵江南,完成统一大业,又要跟皇室内部的敌对势力进行斗争。同时在朝廷内部订立制度、采取措施,以恢复因长期战乱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因此,他亟需挑选一批精干的理财家,掌管财政,适应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精于理财的阿合马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得到赏识和重用。

中统三年(1262年),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诸路都转运使掌管钱谷的征收、转运和仓库出纳。左右部主要是“承命宣制,奉行文书,铨叙流品,编齐户口,均赋役,平狱讼。”^②这就是说,阿合马对承上谕下,包括吏治、民户、赋役、狱讼等项,都可以管,不过主要的还是掌管财政。中统五年(1264年),开平府升为上都,阿合马兼任同知。同年,左右部并入中书省,阿合马升任中书平章政事,进阶为荣禄大夫,已经位列于丞相,官愈大而权也愈重了。

^① 本文所据材料,除另有注解外,均见于《元史》卷二〇五《阿合马传》。

^② 陈佑《三本书》,见《元文类》卷一四。

至元三年(1266年),建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以中书平章又兼制国用使的职务。制国用使司的职责是:“通漕运,谨出纳,充府库,实仓廩,百姓富饶,国用丰备。”阿合马更明确更具体地承担全国财赋重任。至元七年(1270年),制国用使司撤销,成立尚书省,阿合马被任命为平章尚书省事。两年后,尚书省又并入中书省,阿合马仍任中书平章政事。就这样,阿合马受到元世祖的信任,不断提高他在政治上的权势。

理财二十年

阿合马为元世祖理财二十年,为充实国库收入,做了不少事情。元世祖信任他、夸奖他,同僚们起初也多称赞他的才干。但二十年中阿合马究竟在理财方面干了哪些事情,因史料的缺乏,我们不可能知道得具体。现在只能就元代史籍中关于元世祖统治时期,特别是前期,也就是阿合马掌权时期,财政和社会经济状况的记载,包括农业、矿冶、课税、经理以及钞法等项,加以综合考察。这些,可能直接或者间接与阿合马有关,但也还不能一一断定阿合马在这些活动中所起的具体作用。

元世祖比较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至元六年(1269年),下诏各地劝课农桑,并命中书省采辑农桑事宜,列为条目,由提刑按察司跟州县官吏一起,“相风土所宜,讲究可否,别颁行之”。^①第二年,立司农司,颁农桑之制十四条。由于内地跟西域地区的交往频繁,西域的植棉业在内地广大农村迅速推广,棉纺织技术也随之而兴起,这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起了很大作用。《元史》说:“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大体上讲还

^① 《元史》卷六《世祖本纪》三。

是比较公允的。发展农桑的措施,是在阿合马任职期内,不知是否跟他有直接关系。

比较重视鼓铸之利,这是阿合马亲自过问的。阿合马在中统四年(1263年),就在河南钧、徐等州兴办铁冶,一年输铁一百零三万七千斤,又用这批铁铸造了二十万件农器,跟农户交换粮食四万石。据说这批农器是以高价配给农户的,但兴冶铁铸农器本身并不能算作坏事。至元三年(1266年),阿合马还建议采冶石绒(即石棉),“织为布,火不能燃”。^①同年朝命成立诸路洞冶所。第二年改为诸路洞冶总管府,负责各地矿产采冶事宜。这种机构的设置,可能跟阿合马有关。

元代,盐、茶、酒、醋以及金、银、铁冶等项,由国家官卖,征收课税,此外还有商税和三十二种额外税。这些都成为朝廷的重大财政收入。这是阿合马所直接参与规划,而且遭到议论颇多的事。中统、至元初期课税额数字比较小,后来愈来愈高,实际上税率并未提高。商税税率一直是三十分取一。对外市舶贸易,一般是十分取一,粗货是十五分取一。所以《元史》也说:“世祖立法,一本于宽”,“可谓知理财之本”。税率不变,税额增高,说明平宋以后税源扩大,也说明财政上欺隐冒漏诸弊端在不断得到治理。就阿合马本人来讲,他理财有法,确实是一个敛臣。至元十六年(1279年)九月,阿合马向元世祖反映安西王相府官赵炳的话,说陕西课税每年只办一万九千锭,如果尽力措办,可以得四万锭。元世祖派赵炳办理陕西课税。两年后,陕西每年的课税增到五万四千锭,几乎是原额的三倍。阿合马还以为未实,仍要检核。连元世祖都看不过去了,没有答应他。

^① 《元史》卷六《世祖本纪》三。

阿合马当政时,还实行过一种“经理”的办法,也叫“钩考”,由朝廷派员到各地理算钱谷等项,以防止豪强欺隐和官吏贪侵等等弊端。比如,地方上有把熟田冒为荒地以逃避赋税的,有因避免差徭而析居户口的,也有富民买贫民田而仍旧由贫民输税的,以致造成“岁入不增,小民告病”。至元七年立尚书省时的一项任务,就是阅实天下户口,颁布条例,目的也是为了杜绝欺隐,增加赋税。朝廷派员到各地经理考算钱谷,以惩治贪污,防止欺隐。这原是正常的理财措施。但往往由于期限紧迫,任用非人,造成贪刻用事,富民黠吏勾结为奸,结果贪污没有得到有效的制止,受害者还是广大百姓。

一直到元世祖初期,朝廷官吏还没有规定俸禄,这等于公开地让他们去勒索百姓,贪污中饱。这对于需要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急待解决的问题。至元元年,阿合马任中书平章政事的时候,就曾订立条例,要减并州县和规定官吏员数,分别品级官职以给俸禄和颁发公田,并且要计算月日以考核优劣。又拖了两年,至元三年,阿合马以中书平章兼任制国用使的时候,才正式规定给京、府、州、县、司官吏的俸禄和职田。至元七年又规定给军官的俸禄。虽然后来又曾有暂时停俸和减官俸的事,而官吏之有俸禄,作为一项重要制度从此确定了下来。当然有俸禄也还会有贪污,但这毕竟是违法的事了。如至元四年,大名路达鲁花赤爱鲁,总管张弘范等盗用官钱,就受到罢官的处分。

钞法也是阿合马当政时所掌管的重要财政项目。阿合马管理财政的第三年,至元元年,在各路设平准库,给钞一万二千锭,作为钞本。并且买卖金银,以维持物价平衡和保证交钞的信用。所以

《元史》说,元世祖的前期,“钞法疏通,民受其利”。^①据专家们考证,^②元代钞法比历代钞法都要严密,而且在世界币制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纯纸币流通制度,在当时各国还没有先例。元代盐、茶等课税也全都收纸钞,无形中纸钞有了雄厚的物质保证。由于连年用兵,费用浩繁,纸钞增发不已,从至元十七年(1280年)以后,开始通货膨胀,物重钞轻。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世祖不得不召开中书省臣、集贤大学士会议,讨论钞法问题。会上认为制国用使司改尚书省时的钞法“颇有成效”,于是复置尚书省,更造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并行。可是,正如《元史》所说,“不能量入为出”,这一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到了成宗大德初期,“岁入之数,不支半岁,自余皆借及钞本”,以致“理财失宜,钞法亦坏”。

理财家的苦恼

阿合马作为理财家,也有他的苦恼。在理财工作上,量入为出本是一条根本的原则。但阿合马虽然受到元世祖的重用却只被作为一个搜刮财富的亲信,并不能掌握全部财务大权。阿合马理财活动中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他只有敛财的义务,而没有用财的权利;只管收入,无权干预支出。在这种情况下,阿合马就不可能对财政管理作出有效的计划。

元世祖时,平宋、征日本和对诸王的战争,军需浩繁。对有功将士的赏赐动辄白银数千两。对于拥戴自己的诸王的赏赐,也极为频繁。为了表示宽仁,对各地灾荒的蠲免、赈恤以及对鳏寡、废、

^①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

^② 见千家驹、郭彦岗合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

疾之人的恩赐,再加上祭祀、佛事和宫廷挥霍,开销极为可观。以功利自负的阿合马当然也注意到收支平衡问题,也曾经试图影响朝廷的开支。早在至元三年,阿合马担任中书平章兼制国用使的时候,就曾经提醒元世祖,“国家费用浩繁”,担心“度支不足”,建议朝廷应该“量节经用”。^①对元世祖来说,不少浩繁的开支是不会“量节经用”的,只有对于一般的开支才可能做一些“量节经用”的表示。至元三年,元世祖诏:宫烛不要彩绘。至元六年诏:“鞍、靴、箭镞等物,自今不得以黄金为饰。”^②至元七年诏:明年太庙的祭祀,用御园里的果品而不要花钱去购买市上的鲜果。这些节约措施,只是一些比较微小的事情,而且也不一定认真去做。

一定时期政绩上的得失,往往要等到后来,通过对比,才能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元世祖死后,中书省臣对元成宗说:世祖时“国赋岁有常数”,“岁务节约,常有赢余”。^③武宗至大年间,有大臣指出:“世祖朝量入为出,恒务撙节,故仓库充牣。”这些话是想以祖宗成法规勉当时天子,未免夸张,但元世祖时期的财政尚未大坏,应是事实。

对于封建国家的财政收支来讲,诸王、宗亲的无厌索求,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甚至是灾难。作为理财家的阿合马注意到这一点,也曾打算予以限制,或设法摆脱这个包袱。当时诸王、宗亲、勋臣贵族们,占有大量封地和得到朝廷优厚的赏赐,拥有种种特权,还要经常对各地官府无厌地索求和对百姓放肆地骚扰。阿合马权力再大,对此也没有多少办法。至元七年,尚书省建议,今后凡是诸

① 《元史》卷二〇五《阿合马传》。

② 《元史》卷六《世祖本纪》三。

③ 《元史》卷一八《成宗本纪》一。

王取索、供应等事,必须凭诸王的文书为证。很明显,这是企图多少限制一下诸王的特权,以维护朝廷正常的财政开支。阿合马甚至曾经向元世祖建议,应该设立大宗正府。元世祖的答复是:这不是你们做臣子的所应该说的,这是我的事情。阿合马的意图也非常明显,由大宗正府去负责处理皇室及诸王宗亲的事务,其中必然包括供应事项,这样就等于替国库堵塞或缩小了一个大的漏洞。当然,即使成立了大宗正府,诸王宗亲的跋扈和需索骚扰也仍然是难以避免的。

腐化·积怨·被杀

随着阿合马权势的增大,同僚们对他的攻讦也愈来愈多。蒙古丞相责备他,汉族理学家反对他。“专横”、“擅权”,是常见的罪名。阿合马敢于为自己的职责辩护,敢于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当着皇帝的面进行对质,有时把对方驳得哑口无言。有一次,丞相安童指责阿合马“擢用私人”,而且不经过吏部提名,也不呈报中书省备案。阿合马在元世祖面前答辩说:既然事无大小都委派给我去办理,那么我就应该有自己选择用人的权力。在至高无上的封建皇权面前,阿合马理直气壮毫不含糊的答辩,等于说,就是要“擅”自己用人之“权”,这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史上恐怕还不多见。事实上,当时精于理财的人,多被阿合马所信用,尽管有很多贪婪之徒,其中也不乏干才。与阿合马关系密切的张惠,就是一个为政宽简、谨慎而有经济才能的理财家。

又一次安童揭发阿合马“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①阿合马气愤地说,谁说此话,我可以当皇上的面跟他辩论。

^① 《元史》卷二〇五《阿合马传》。

其实,这一次安童的揭发,确是击中了阿合马的要害。阿合马位列宰相,掌握财权,却仍然是一个利欲熏心的人。平时,阿合马也并不讳言这一点。元世祖有一次接见理学家许衡。许衡说阿合马权重,这是反叛之道。元世祖把这话转告阿合马,阿合马便来质问许衡:“你为什么说我会反叛呢?”许衡说:“历代反叛者都由于权重。你不想反叛,为什么要走这条会导致反叛之路呢?”阿合马却直截了当地反击说:“你才是真正的反叛!人们所嗜好的是势、利、爵、禄、声、色。这一切,你都不爱好,还想得到人心,不是反叛是什么?!”^①在这场剑拔弩张、声色俱厉的辩论中,理学大师许衡同理财能手阿合马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现在看来,双方的理由都不充分,而阿合马却是赤裸裸地宣扬势利人欲和声色享乐,表现出他强烈的剥削欲望。

阿合马有时也做一些貌似公正无私的事情,以缓和人们对他的指摘。有一个用旧钞偷换官库新钞的贪污者,数目不过一百四十锭。人们都说“罪不该死”,阿合马却认为这个贪污者的父亲在他家里执役,如果不加惩治,他会感到不安。结果这个贪污者被处死了。

阿合马曾向元世祖请求,免去他子弟们担任的职务。这可以说只是一种姿态,是表示给人看的。实际上,阿合马一门子弟多为要官。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忽辛在至元十年就担任了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这样权势很重的职务。枢密院还要任用忽辛为同金枢密院事,元世祖不允。世祖说,忽辛不过是个回回商人,并不懂事,怎么能“责以机务”呢?至元十六年,忽辛任潭州行省左丞,后来又调任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次子抹速忽,在江南平定后曾任杭州路

^① 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七《左丞许文正公传》。

达鲁花赤。三子阿散,四子忻都,以及侄子宰奴丁、别都鲁丁、苦思丁等,有的任行省参政,有的任礼部尚书,有的任将作院达鲁花赤、领会同馆等职务。阿合马的家奴忽都答儿等人竟掌握大都留守司的兵权。

阿合马的理财活动,加上他依仗权势,不知收敛,都足以招怨。他当权二十年,又干了些不干不净的事,积怨已深。在他的势位煊赫的宦途中已经危机四伏,一场暗杀阿合马的预谋在加紧策划了。

枢密副使张易是预谋杀害阿合马的一个主要同谋者。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张易向元世祖推荐一个有秘术的妖僧高和尚,说他能役鬼为兵,遥制敌人。元世祖命蒙古勋臣和礼霍孙带兵,与高和尚一起到北边防地。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的一个夜里,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合谋,趁元世祖和太子真金都去上都的机会,就诈称皇太子还大都作佛事。枢密副使张易发兵策应,把阿合马骗来,用铜锤砸死。这时,元世祖正在察罕脑儿,听到报告,非常震怒,诏令把王著、张易、高和尚处死。

经过朝内蒙汉臣僚们集议,又听取了枢密副使孛罗的揭发,元世祖追查阿合马的罪行,戮尸于大都通玄门外,并穷治阿合马之党。当时,由于连年用兵,特别是在平宋之后又继之以远征日本诸役,“掬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民间骚动”,农民起义相继而起。在这时候,把这种社会矛盾跟阿合马联系起来,是有政治意义的,也就是在这时候,元世祖下诏“以阿合马罪恶颁告中外,凡民间利病即与兴除之”。又下诏“慰谕军民”,“以兴兵问罪海外,天下供给繁重”,“应有逋欠钱粮及官吏侵盗并权停罢”。^①

由于要穷治阿合马之党,阿合马的家奴忽都答儿等人首先罢

^① 《元史》卷一二《世祖本纪》九。

官。阿合马的四个儿子和侄子宰奴丁等,也分别被处死。中书省所属阿合马党人竟有七百一十四人,其中一百三十三人已被革职,剩下五百八十一人,原来也要罢官,因查无过错,姑且留任。另外,凡是以妻女姐妹献给阿合马而得官的,一概罢免。

阿合马的家产全部抄没。从抄没家产中,可见他拥有巨量的财富,其中包括阿合马妻子亲属经营的资产,占有的奴婢,占据的民田,以至绵绵丝线等项资财。仅是抄没的牧畜就有马、驼、牛、羊、驴等共三千七百五十八头。此外,阿合马还庇护富户向他输赋,而逃避国赋。安童所揭发阿合马“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这在阿合马死后得到了证实。

综观阿合马的一生,在元世祖统一全国和稳定局势的过程中,他在财政方面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当然,他经管的赋税收入都是来自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但这是封建社会和封建政权统治下的必然现象,不当以此单独责备阿合马。至于他利用职权,任用私人,谋取私利,仗势欺人,这在封建官吏中也是数得着的坏人。他被谋杀,这跟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派系斗争的关系如何,还有待于更为深入的探索。

〔马寿千〕

三 扎马刺丁^①

西域天文仪器

扎马刺丁,是元代回回科学家。

扎马刺丁在元世祖即位前,就受到世祖的任用。公元1260年世祖即位,元因金人旧制,设司天台,扎马刺丁可能就在司天台任职。^②至元四年(1267年),扎马刺丁进《万年历》并造西域天文仪器。至元八年(1271年),回回司天台创立,扎马刺丁可能就在这年任司天台提点。至元十年(1273年),他以司天台提点充秘书监。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官集贤院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③集贤院“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悉隶焉”。^④是一个掌管全国学校,征用人材,还管理一部分宗教活动的单位。后在民间传经。

扎马刺丁在至元四年所进天文仪器,据《元史·天文志》,共七种,都是以阿拉伯语命名的。^⑤

一、咱秃·哈刺吉 Dhatu halag,^⑥可汉译为多环仪,《元史·天文

① 扎马刺丁,《元史》卷四八《天文志》记西域仪象,作“扎马鲁丁”,系同名异译。今依《元秘书监志》、《元史·百官志》及许有壬《至正集》卷三五的有关记载。

② 《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回回司天监》下,“世祖在潜邸时,在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扎马刺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

③ 王士点、商企翁《元秘书监志》卷四,《广仓学窘丛书》甲类第一集。

④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集贤院条》下。

⑤ 参看马坚《回历纲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

⑥ 阿文名称省去,读者如需要参考,请参阅《回族人物志》(元代)。下同。——编者

志》译作浑天仪，“其制以铜为之，平设单环，刻周天度，画十二辰位，以准地面。侧立双环，而结于平环之子午，半入地下，以分天度。内第二双环，亦刻周天度，而参差相交，以结于侧。双环去地平三十六度，以为南北极，可以旋转，以象天运，为日行之道。内第三第四环，皆结于第二环，又去南北极二十四度，亦可以运转。凡可运三环，各对缀铜方钉，皆有窍，以代衡箫之仰窥焉”。这主要是用以观测太阳运行轨道的仪器。

二、咱秃·朔八台 Dhatu Sumut，可汉译为方位仪。“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外圆周墙，而东面启门。中有小台，立铜表，高七尺五寸。上设机轴，悬铜尺，长五尺五寸。复加窥测之箫二，其长如之。下置横尺，刻度数其上，以准挂尺，下本开图之远近，可以左右转，而周窥，可以高低举，而遍测。”这是观测星球方位的仪器。

三、鲁哈麻·亦·渺凹只 Luhma-i-mu' wajj，汉译斜纬仪。“春秋分晷影堂。为屋二间。脊开东西横罅，以斜通日晷，中有台，随晷影南高北下。上仰置铜半环，刻天度一百八十，以准地上之半天。斜倚锐首铜尺，长六尺，阔一寸六分，上结半环之中，下加半环之上，可以往来窥运，侧望漏屋晷影，验度数，以定春秋二分。”这是用以观测日影，以定春分、秋分的仪器。

四、鲁哈麻·亦·木思塔余 Luhma-i-mustayi，汉译平纬仪。“冬至晷影堂也。为屋五间。屋下为坎，深二丈二尺，脊开南北一罅，以直通日晷。随罅立壁，附壁悬铜尺，长一丈六寸。壁仰画天度半规，其尺亦可往来规运，直望漏屋晷影，以定冬、夏二至。”这是用以观测日影，以定冬至、夏至的仪器。

五、苦来亦撒麻 Kura-i-Semā，汉译天球仪。《元史·天文志》译作浑天图。“其制以铜为丸，斜刻日道交环度数于其腹，刻二十八宿形于其上。外平置铜单环，刻周天度数列于十二辰位，以准地。而侧

立单环二,一结于平环之子午,以铜丁象南北极;一结于平环之卯西。皆刻天度。”《天文志》说,这即浑天仪而不可运转窥测者也。

六、苦来·亦·阿儿子 Kura-i-ard,汉译地球仪。《元史·天文志》译作地理志。“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穿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七、兀速都儿刺不定 Usturlab,汉言昼夜时刻之器也。^①“其制以铜,如圆镜而可挂。面刻十二辰位,昼夜时刻。上加铜条,缀其中,可以圆转,铜条两端各屈其首,为二窍以对望,昼则视日影,夜则窥星辰,以定时刻,以测休咎,背嵌镜片三面,刻其图凡七,以辨东西南北、日影长短之不同,星辰相背之有异。故各异其图,以画天地之变焉。”这七种仪器,《元史》称作“西域仪象”,而且都使用阿拉伯语的名称,这是第一次从阿拉伯输入的天文仪器,是没有疑问的。在天文学的中外交流上,扎马刺丁是有贡献的。

关于这七种仪器的实际运用,史无明文。但元代的回回司天监掌观象衍历,设有天文、算历、测绘、漏刻等科,各有官属,而扎马刺丁本人于进天文仪器的第六年即主持回回司天监的工作,以常情而论,是不会不使用这些仪器的。至于这些仪器的构造、功能等,跟中国的传统仪器有什么不同,它们在中国天文学史上起了什么作用,有待于专门的研究。英国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对扎马刺丁的地球仪颇感兴趣。他说扎马刺丁的地球仪“却似乎是个新东西。除公元前二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Crates of Mollos)古

^① “兀速都儿刺不定,汉言昼夜时刻之器也”。阿拉伯语,这个仪器名称的语尾无“定”音。“定”字衍。

地球仪(已失传)以外,没有比马廷·贝海姆(Martin Bhaim)1492年的记录更早的了”。而扎马刺丁进上述仪器之年是比马廷·贝海姆的记录早了二百二十五年。这个地球仪以小方井表示地区上的空间,在中国传统的办法中早已有了。但在地理学上,地球仪体现一个寰球的思想,这可以说是元代中外交通大开,在科学工艺上的反映,这是有历史意义的。

《元秘书监志》卷七记有可马刺丁,至元十五年(1278年)任司天少监。同书卷一记苦思丁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以秘书少监提调回回司天台。同书卷二记苦思丁于皇庆元年(1312年)为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秘书监卿提调回回司天台事。同书卷九记:“瞻思丁,大德五年(1297年)九月十三日以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提调回回司天台事。大德十年(1290年)三月十五日加通议大夫。延祐□年□月加守司徒。六年七月,加大司徒。”这几个人都有主持司天台的经历,有的还由此而得高官。但他们之中是否也有天文学者,他们的政绩如何,都不可考。

《万年历》和《至元大一统志》

扎马刺丁在至元四年进献依回回历法编制的《万年历》,又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纂修地志,这就是后来的《至元大一统志》。修历要修万年之历,修志要修大一统的志,这都是元世祖进行空前统一过程中新的政治形势在科学上的反映,也表现了扎马刺丁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见识和气魄。

元初承用宋金旧历,多与天象不合。窝阔台时,制《西征庚午元历》,没有颁布施行。扎马刺丁的《万年历》,是元代第一次正式颁布的历书。《元史·历志》记载说:“至元四年,西域扎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所谓“稍”,有“略为”、“逐渐”的意思,也

有“颇”的意思。“稍颁行之”，可理解为“不断地颁行了一些”。但不管颁行的数量如何，《万年历》毕竟是颁行了，不过似还不能代替旧历。至元十三年（1276年），世祖诏许衡、郭守敬等修新历。十七年（1280年）冬至，新历修成，赐名《授时历》。十八年，颁行全国。二十年，诏孛谦为《历议》，发明新历，顺天求合之微，考证前人附会之失。^①从《万年历》的颁行，到《授时历》的颁行，中间经过十四五年。时间虽短，但《万年历》曾经是全国通用的历法。后来的《授时历》和《历议》，按照科学发展的一般情况而言，也不能不吸收《万年历》之合理的内容。

在《授时历》颁行以后，官府印有《回回历》出售。据仅见的记载来说，天历元年（1328年）售出《回回历》五千二百五十七本，每本售价是中统钞一两，较《授时历》售价为廉。^②这所谓“回回历”，跟《万年历》的关系如何，无明文可考。

按回回历法系指阿拉伯的历法，有太阳历（宫分年）和太阴历（月分年）两种。前者主要供农牧之用，后者主要用于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太阳历法以太阳运行十二宫一周为十二个月，叫做不动的月；平均以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岁，逢闰之年，置一闰日于第十二宫之末。太阴历法，以月球圆缺十二次为十二月，叫做动的月，平均以三百五十四日为一岁，有闰日，每三十年有闰十一日。太阳年和太阴年参照，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宫月日辰再会。回回历法的太阳年与回归年相比，积八万年才差一日。而回回历纪年则是按太阴年计算的，每年比太阳年差十日多。积三十二个太阳年，大约就多出回回历一个太阴年来。扎马刺丁的《万年历》，不知是否用的太阳历

^① 《元史》卷五二《历志》。

^②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

法。如用的是太阳历法,恐怕这就是它不能通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这跟中国历法的传统形式太不相同了。至于官府发售的回回历,很可能是太阴历,是当时穆斯林所需用的。《元秘书监志》卷七记:“至元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司天少监可马刺丁照得在先敬奉皇子安西王令旨,交可马刺丁每岁推算写造回回历日两本送将来者。敬此。今已推算至元十六年历日毕工。依年历,合用写造上等回回纸扎。合行申复秘监应付。”这时,《授时历》尚未动手,而《万年历》在“稍颁行”的过程中,安西王不必要另写两本《万年历》,这当是属于宗教上需用的历本。

扎马刺丁的《万年历》虽然没有长期颁行下去,但关于回回天文学的机构却不断升级。至元八年(1271年)始置回回司天台,秩从五品。十七年,置回回司天行监,秩正四品。延祐元年(1314年),升正三品,置司天监。二年,命秘书卿提调监事。四年,复正四品。^①从官阶上看,回回司天监跟司天监相等。从元到清,在官府的观象制历工作上,回回历法一直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从历史上寻本追源,不能不推重扎马刺丁的创始之功。



《元大一统志》零页 元大德刻本 嘉兴沈士藏

^① 《元史》卷九〇《百官志》。

《至元一统志》，^①后来定名为《大一统志》，在这书的编纂工作正式决定以前，官府和个别私人都作了一些实际上的准备工作。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翰林院、兵部和秘书监商量，编修地理图文字。湖广人虞应龙为“理会地理勾当，数年用工，将古今书史传记所载天下地理建置、郡县沿革、事迹、源泉、山川、人物及圣贤赋咏等分类编述，自成一书。取《汉书》王吉所云‘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名其书曰《统同书》”。这书很可能是在至元二十三年已纂修成稿。扎马刺丁在至元二十三年上奏：“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世祖命扎马刺丁和虞应龙等负责搜集为书。兵部等机构所搜集的材料和虞应龙编集成的书，它们都为《大一统志》所吸收，这是无疑的。这书从至元二十三年（1288年）起，到大德四年（1300年）成书，共有四百八十三册，计七百五十五卷。后因继续得到云南、辽阳等地的材料，又进行增补，在大德七年（1303年）完成，编写成六百册，计一千三百卷。前后共经十八年之久。扎马刺丁对这书的七百五十五卷本是负责到底的。

《大一统志》原书久已散失，佚文得以保存下来的不多。扎马刺丁在至元二十三年上奏，说：“在先汉儿田地些小有来，那地里的文字册子四五十册有来。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有的图子有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理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扎马刺丁在这里说出了《大一统志》的三个主要特点。第一，疆域辽阔，所谓“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落处都是咱每（咱们）的”。因而，第二，在原有的材料外，还要有别的方面的材料，

^① 关于《至元一统志》的材料，据《元秘书监志》，《广仓学窘丛书》本；许有壬《至正集》卷三五《大一统志·序》，河南教育总会石印本。记载上有歧异处，酌取其长，不另作说明。

所以“汉儿田地”和“回回图子”都是必要的。第三，书中要有图，并且还要“都总做一个图子”。依别处的材料所记，书中的图还是有彩色的。《大一统志》的卷帙之富，是以前的地志所没有的，它的这些特点也是以前的地志所没有的，它以“一统志”命名也是所没有的。扎马刺丁在中国地志史上也应该是很有地位的人物。

秘书监的回回书籍

扎马刺丁和其同时的一些回回学者的学术文化兴趣是广泛的，由他们传入中国的阿拉伯世界的学术文化也是广泛的，这从元秘书监收藏回回书籍的情况可以略见其鳞爪。

《元秘书监志》卷七有“回回书籍”条，列有书目。原文如下：

“至元十年(1273年)十月，北司天台申：

本台合用文书经计经书二百四十二部。

本台合用经书一百九十五部：

兀忽烈的四劈算法段数十五部，

罕里速窟台解算法段目三部，

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仪式十七部，

麦者思的造司天仪式十五部，

阿堪决断诸般灾福□部，

麻塔合正灾福正义□部，

海牙剔穷历法段数七部，

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

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

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纂四部，

撒那的阿刺忒造浑天仪香漏八部，

撒非那诸般法度纂要十二部，

亦乞昔儿烧丹炉火八部，
忒毕医经十三部，
艾竭马答论说有无源流一十二部，
帖里黑总年号国名三部，
密阿辨认风水二部，
福刺散相书一部，
者瓦杀刺别认宝贝五部，
黑牙里造香漏并诸般机巧二部，
蛇艾立诗一部，
兀速刺八个窟勒小浑天图，
阿刺的杀密刺测太阳晷影一个，
牙秃鲁小浑仪一个，
拍儿可儿潭定方圆尺一个。

若干部就是若干册，例如“《忒毕医经》十三部”，就是说这部书共计十三册，不是说同样的书有十三部。

“兀忽列的”可能是 Euclid 的最早译名。“四劈算法段数十五部”，可能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十五卷的最早译名。

“撒唯那罕答昔牙”是 Safina Handasiay 的对音，译云几何学。“诸般算法段目仪式”是译名。

“麦者思的”是 Magest 的对音，阿拉伯人称埃及亚历山大城天文学家多禄某 (Ptolemy) 的天文集为 al-Magest，也可以写成 Al-magest。“造司天仪式”是译名。

“阿堪”是 Ahkām 的对音，译云判决。清康熙时南京回族学者刘智著《天方性理》，他的参考书目里有《额合峒目克瓦乞卜》(Ahkām kawākib，译云诸星判决)，原译名是《天经情性》，可能是这部书的另一个译名。这是一部星占学的书，所以译名叫“决断诸般

灾福”。伊斯兰教是反对星占学的，刘智把书名译成“天经情性”，就是这个道理。

“蓝木立”是 Raml 的对音，译云“沙卜”，直到现在，开罗城的马路边上还有算命先生用几个贝壳投在沙上，替人占卜吉凶。“占卜法度”是这部书的译名。

“麻塔合正”可能是“麻合塔止”之讹。“麻塔合止”是 Muhtāj 的对音，译云必需。这部书的全名可能是“占卜必读”。“灾福正义”是译名。

“海牙剔”是 Hayāt 的对音，译云生活。《天方性理》参考书目中有《海亚土额噶林》(Hayātu Agālim, 译云各地区的生活)，原译名是“七洲形胜”。七洲是指东半球上的亚非欧三洲而说的，这是古代地理学家通用的区划。“穷历法段数”，可能是这部书的译名。讲七洲形势就要讲到各洲的经纬度，经纬度的测定依靠星象的观测，这部书既有七册，可能同时讲到天文和地理。两个译名各有所偏，这是可能的。

“呵些比牙”是 Hīsabiya 的对音，译云算学。“诸般算法”是译名。

“积尺”是 Zij 或 Zidj 的对音，译云天文历表。“诸家历”是译名。这部书有四十八册之多，一定是包罗宏富的。回回天文学对于中国天文学的影响，除回回仪器外，这部书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速瓦里可瓦乞必”是 Suwālī Kawākibi 的对音，译云星象答问。“星纂”是译名。

“撒那的阿剌忒”Šan‘at’ Alāt 的对音，译云仪器的制造。“造浑天仪香漏”是译名。

“撒非那”是 Safina 的对音，译云船，在书名上加船字，犹如中

国书名上加“宝筏”二字一样。上面讲过的“撒唯那”和这里讲的“撒非那”是同词异译,但“撒非那”后面的字被省略了。从“诸般法度纂要”这个译名还不能推知内容是天文历算或是医药占卜。

“亦乞昔儿”是阿拉伯字 Iksir 的对音,译云点金术。这个名词上加冠词就成 al-Iksir 或 aliksir, eliksir, 欧洲文字里的 elixir 和 elixier 就是这样变出来的。“烧丹炉火”是译名。阿拉伯的点金术在元朝时候传入中国,这是一个明证。有人说点金术是从中国传入阿拉伯的,他们的证据都是很勉强的。有人说阿拉伯字 ginni(译云精灵)是汉文“金”字的对音,有人又说阿拉伯字 Kimiya(译云化学)的前半截 Kim 是“金”字的对音。但 ginni 是阿拉伯的基本词汇,并不是外来语;而 Kimiya 则是从希腊文变来的,阿拉伯文里没有这样的词尾。

“忒毕”是 Tibb 的对音,译云医学。“医经”是译名。

“艾竭马答”是 Hikmat 的对音,译云智慧。这是一部哲学著作,内容是宇宙论,所以译做“论说有无源流”。

“帖里黑”是 Tarikh 的对音,译云年代,阿拉伯人把历史叫做年代,因为没有年代就不成历史。这部书可能是一部古代世界史,故译成“总年号国名”。

“密阿”是 Mir'āt 的对音,译云镜子。这部书是很有名的著作,全名是 Mir'ātal-ghaib,译云“幽玄宝鉴”,是一部讲占卜吉凶的书,故译成“辨认风水”,其实阿拉伯人并不信风水。

“福刺散”是 Firasah 的对音,译云相术。“相书”是译名。

“者瓦希刺”是 Jawāhir 的对音,译云宝石。“辨认宝贝”是译义。

“黑牙里”是 Hiyal 的对音,hiyal 的单数是 hilah,译云技巧,是指利用科学原理以制造机械,利用力学原理以搬运重物而说的。“造香漏并诸般技巧”是译名。

“蛇艾立”是 Shi'r 的对音,译云诗歌,“诗”是译名。

“兀速刺八个窟勒”可能是“兀速土刺八窟勒”之误。“兀速土刺八窟勒”是 'usturlāb Kura 的对音,译云球形观象仪。'usturlāb 就是 Astrolabe。这种球形观象仪跟《元史》卷四八所载的第七种回回仪器“兀速都儿刺不(定)”是不相同的,因为那种观象仪是平面的,而这种观象仪是球形的,Kura 就是球的意思,故译成“小浑天图”。

“阿刺的杀密刺”是 'ālātshāmila 的对音,译云包罗宏富的仪器或万能仪器。“测太阳晷影”是译名。

“牙秃鲁”可能是 yadūru 的对音,译云旋转,这就表明这个仪器是会旋转的。“小浑仪”是译义。

“拍儿可儿”是 Pargār 的对音,译云圆规,“潭定方圆尺”意义不明确,“定方圆尺”可能是译名。

还有,“罕里速窟允”,不知阿拉伯文的原名是什么,“解算法段目”可能是译义。^①

《元秘书监志》所记这些书,几百年来未见到关于书名原文的通解。1955年,马坚教授著文,才把这些书名通解过来。从这些书名看,这些书是包含天文、数学、化学、医药、地理、哲学等方面的。《元秘书监志》记这些书是在至元十年到“本台合用经书”之内的。所谓“本台”,当指“回回司天台”。至元十年,扎马刺丁大概就在这里供职。司天台所申请的这些书,当都是司天台工作使用的重要书籍。从此,是可以看到扎马刺丁和当时的一些回回学者在学术文化上接触是广泛的。

〔杨怀中〕

^① 马坚在《光明日报》1955年7月7日史学版发表了《〈元秘书监志〉回回书籍释义》。以上对《元秘书监志》所载各书的解释,都采用了马坚原文而略有删节。

也黑迭儿丁

也黑迭儿丁^①

也黑迭儿丁,是元代回回中著名的建筑家,元大都(今北京城)宫殿和宫城的设计者和工程组织者。

也黑迭儿丁原为阿拉伯人。当时,阿拉伯人以“户饶良匠”见称,有大批阿拉伯工匠艺人东渐来到中国。也黑迭儿丁在世祖即位前,就得到了世祖的信任。1259年,蒙哥汗死于军中,世祖从鄂州(今湖北武汉)前线北还,来到也黑迭儿丁的宅第。也黑迭儿丁以织有金线的地毯铺路,来迎接世祖,以表示对他的尊敬。随后把地毯剪开,分赠从臣。这种地毯,显然是西域的特种手工艺制品。

中统元年(1260年),也黑迭儿丁掌管茶迭儿局。凡是原世祖即位前王府中的土木工匠,统归也黑迭儿丁管辖。“茶迭儿”是蒙古语,汉译为“庐帐”。茶迭儿局即掌管土木工程及其工匠的官署。

中统四年(1263年),也黑迭儿丁奏请修琼华岛。至元元年(1264年)正式开工。琼华岛,即今北京北海公园的前身。

至元三年(1266年),琼华岛的广寒殿竣工。同年八月,也黑迭儿丁被任命为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这时的元朝,是“大业甫定,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巨丽宏深,无以雄视八表”。宏伟的宫殿对于大元皇朝的建国规模来说,已成为必要的政治要求。同年十二月,也黑迭儿丁又奉命同张柔、段天祐同

^① 本文关于也黑迭儿丁及其子孙的材料,见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元赠效忠宣力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赵国公溢忠靖马合沙碑》。

行工部尚书事,修建宫城。也黑迭儿丁为了完成这些任务,辛勤地工作着。对于这样巨大的工程,各个环节的组织是很重要的。诸如日程的安排、工匠的挑选、器材的准备、运输的组织,也黑迭儿丁都采取了措施。

设计是整个工程的关键。也黑迭儿丁对宫殿建筑群作出了整体的规划。诸如皇帝和百官理政的廷殿,祭奠用的祠堂,嫔妃起居游赏的楼阁、园林池塘,以及宿卫、掌衣食器具车马等侍臣的居舍等,都一一考虑在规划之内。而且他要求作到“役不厉民,财不靡国,慈足使众,惠足劳人”。

关于大都京城,欧阳玄详细描述了它的建筑过程,说:“乃具畚鍤,乃树桢干,伐石运甃,缩版覆簣”,“厥基阜崇,厥址矩方,其直引绳,其坚凝金”。可见,也黑迭儿丁采用的是板筑法。他在拆除桢板后,使用砖石加固,因而宫城整齐平直,坚如凝金。这种办法,比起大都城垣采用土城葺草的办法要好,因为后者会引起雨水侵蚀,以至不得不反复对城垣进行补修。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大都的主体工程宫城和宫殿都完工了,世祖“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诸王、百官朝贺”。^①

在这一宏伟的工程中,也黑迭儿丁倾注了全部的智慧 and 精力,人也就逐渐地衰老了。也黑迭儿丁受到匠人们的尊敬,在他死后,给他雕了一个“髭髯咸肖”的石像,立于墓前。但因造像在伊斯兰教义上是非法的,没有得到本族人的赞同。世祖知道了,也不让这样办。仁宗时,也黑迭儿丁被追封为效忠宣力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赵国公,谥忠敏。

也黑迭儿丁的儿子马哈马沙,袭父职。因在建造及供帐上的

^① 《元史》卷八《世祖本纪》五。

周详谨慎,多次受到朝廷嘉奖。他阶至正议大夫,任工部尚书兼领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仁宗时被追封推诚善治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赵国公,谥忠靖。

马哈马沙有四子。长子,密儿沙,早卒。次子,木八剌沙,阶正议大夫。曾掌管茶迭儿局,元贞年间为工部尚书。三子,忽都鲁沙,历官余杭、浦江县监,江南、陕西监察御史,云南行省都司,大都路达鲁花赤,户部尚书。四子阿鲁浑沙,没有做官。

阿鲁浑沙之子蔑里沙,继承其曾祖之事业,任茶迭儿局总管府达鲁花赤。

自也黑迭儿丁至蔑里沙,祖孙四代任职于工部,掌管茶迭儿局,这是元代回回官吏中的工程世家。

陈垣论也黑迭儿丁的贡献

也黑迭儿丁在建筑工程上的贡献,是近代史学家陈垣第一次发现,他对此有详细的考证和评论,可以补史书之缺。

陈垣在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说:“凡考一代之美术,必兼考其建筑遗物。顾吾国言建筑者,向无专书。而元西域人建筑之存于今者尤罕。广州之怀圣寺塔,修于至正十年,有郭嘉为之记,见道光《南海志》廿九。泉州之清净寺塔,修于至正九年,有吴鉴为之记,见《闽书》七。杭州有真教寺,延祐间建,见《西湖游览志》十八。四明有礼拜寺二,延祐以后建,见至正《四明续志》十。略可代表元时回回教建筑。镇江有也里可温寺八,杭州有也里可温寺一,至元十八年以后建,见至顺《镇江志》九及《西湖游览志》十六。甘州有十字寺,见《元史》三十八。扬州有十字寺,见《元典章》三十六。略可代表元时基督教建筑。泉州华表山有摩尼教草庵,见《闽书》七,略可代表元时摩尼教建筑。然此诸建筑,今多不存。即存,

亦只可谓为西域人建筑,不可谓为西域人之中国^①建筑。元时西域人中国建筑,有极伟大而为吾人所未经注意者,无过于今北京之宫殿及都城。虽以朱彝尊之该博,而《日下旧闻》略之。虽以孙承泽之谙熟掌故,而《春明梦余录》亦略之。非有所讳言,即从来轻视工程学者之故也。予近从欧阳玄《圭斋集》卷九《马合马沙碑》,发见元时燕京都城及宫殿,为大食国人也黑迭儿所建。也黑迭儿为马合马沙之父。父子世绾元工部事。以大食国人而为中国如许工程,实可惊也。

“也黑迭儿,《元史》无传。《世祖纪》记修筑宫城事,只称至元三年十二月丁亥,诏安肃公张柔行工部尚书,段天祐等同行工部事,修筑宫城,而不及也黑迭儿。故自昔无人知有也黑迭儿也。辽金故城,在今城西南。至元迁拓东北,分十一门。东西南三面,皆三门。北二门,至明乃大杀其北面,而稍拓其南面。东西各留二门。故至今九门,其面积已不若元时之大矣。然今人游北京者,见城郭宫阙之美,犹辄惊其巨丽,而孰知筚路蓝缕以启之者,乃出于大食国人也。也黑迭儿虽大食国人,其建筑实汉法。《元史》一二五《高智耀传》言西北藩王遣使人朝,谓:‘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尊用汉法,其故何如?’此即建筑燕京时,西北藩王所来之质问也。然何以当时宫阙必用汉人制度,则以元起朔漠,所居者特庐帐耳。也黑迭儿所典之茶迭儿局,即掌庐帐者。使以当王为贵,则庐帐实贵于宫阙。而元人自知庐帐之陋,不知汉家宫阙之美。故虽以武力征服其人,而既入主中原,则不能不改从中原制度。所谓马上得之,不能以马上治之也。此亦元人自审,除武力外,文明程度不及汉人,故不惜舍庐帐而用宫阙。也

^① 陈垣文称“中国”者,都应叫“中原”。

黑迭儿深知其意，故采中国制度，而行以威加海内之规模。夫如是，庶可慑服中国人，而不虞其窃笑矣。《辍耕录》二一有《宫阙制度》一篇，垂四千五百言，《知不足斋丛书》有《故宫遗录》一篇，垂二千六百余言，述元时宫阙规模宏伟极矣。吾人读欧阳玄文，既知为也黑迭儿所为，今日不能不以此光荣还诸劳力劳心之原主。虽当时行工部尚书者不止一人：元制，工部尚书三员，正三品，掌天下营造百工之政令。然张柔为张弘范父，《元史》一四七有传，武夫不谙工事。且翌年即卒，未睹其成，可无论矣。段天祐，《元史》亦无传，仅一七七《吴元珪传》有云至元二十六年‘缮修宫城。尚书省奏役军士万人，留守司主之。元珪亟陈其不便。乃立武卫，缮理宫城。以留守段天祐兼都指挥使。’知段天祐亦武人，至元三年与也黑迭儿修筑宫城后，二十六年复修宫城。曾任大都留守司，兼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大都留守司，秩正二品，掌守卫宫阙都城，调度本路供亿诸务。’卷八六：‘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秩正三品，掌修治城隍及京师内外工役之事。’参《兵志》，此段天祐之职掌也。而也黑迭儿则领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元史》卷八五《百官志》：‘茶迭儿局总管府，秩正三品，管领诸色人匠造作等事。诸色人匠总管府，秩正三品，掌百工之技艺。’试以二人职掌相比勘，则段天祐犹今步军统领，而也黑迭儿则土木工程施工局长也。且也黑迭儿四世领茶迭儿局，授工部尚书，倘非工程世家，曷克有此？欧阳玄碑中所论，亦专以考工为言，而深赞其建邦之能，世官之美。试登景山一望，当时之泱泱风度，恍惚犹在目前。而《元史》遗之，至创造主名竟归淹没。不有此墓前片石，则也黑迭儿之心血，不与草木同腐者几希。即云谀墓之文恐有溢美，然世领工部，何能捏造？《新元史》一三一为之补传，宜矣，惟尚嫌未能发挥也黑迭儿建筑之精神。窃以为应置诸方技传之首也。

“旧史《世祖纪》，中统四年三月，‘亦黑迭儿丁请修琼花岛。不从’。至元元年二月，修琼花岛。亦黑迭儿丁，即也黑迭儿。‘丁’为回回人名常用之尾音。^①琼花岛即今北海。当未修筑宫城之先，也黑迭儿曾请修北海。此又《圭斋集》所未言，而足证其为工程学者也。

“《元典章·刑部三》阑入禁苑条。有监修官也黑迷儿丁呈，捉获跳过太液池围子禁墙人楚添儿一事。状招：‘于六月二十四日带酒，见倒讹土墙。望潭内有船采打莲蓬。跳过墙去，被捉到官’云云。此事有月无年，当系至元间，修琼花岛时事。惟‘迭儿’作‘迷儿’，未知孰是。诚恐原作‘迷儿’，因涉茶迭儿局而误作‘迭儿’也。

“《四库总目·政书类存目》考工之属，有《永乐大典》本《元内府宫殿制作》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提要》称其记元代门廊宫殿制作甚详，而讥其词鄙冗赘，不类文士所为。疑当时营缮曹司私相传授之本。惜其书不传，或即也黑迭儿之徒所撰，未定。固不能以文士之文，绳工程学者也。”

陈垣教授的这篇文章，评述了也黑迭儿丁在中国建筑史上的贡献，同时也实际上提出了回族史上的建筑工艺的问题。文章所说到的几个礼拜寺，泉州的清净寺和广州的怀圣寺尚有遗迹，其他各寺多难以详考。但这个问题，仍是回族史上应当研究的问题。欧阳玄所撰碑文，记马合马沙供职时事，说：“大驾时巡上京，出狩近郊，入门甫植，幄帐预存。风雨收除，燥湿具宜。斋祭张次，燕享设帟。”可见，马合马沙所主持的茶迭儿局也还是要管庐帐之事的。这应当是蒙古制度的延续，不知其中是否也具有回回工艺的特色。

〔杨怀中〕

^① “丁”，意为宗教正义，不是尾音。汉译多有简略，故往往脱去此字。

四 萨都刺

萨都刺的生平

萨都刺是元代著名的回族诗人,也善于作词。

元代,在少数民族中出现了不少的著名诗人。当时的诗人戴良说到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沐浴休光,沾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异,积之既久,文轨日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至其以诗名世,则贯公云石、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其人也。论者以马公之诗似商隐,贯公、萨公之诗似长吉,而余公之诗则与阴铿、何逊齐驱而并驾。他如高公彦敬、巉公子山、达公兼善、雅公正卿、聂公古柏、韩公克庄、鲁公至道、三公廷圭辈,亦皆清醒俊拔,成一家之言”。^①在这十二位诗人中,回族诗人就有三位。这就是萨天锡、高彦敬和鲁至道。高彦敬即高克恭,鲁至道即伯笃鲁丁。天锡是萨都刺的字。萨都刺是阿拉伯语(Sa'ad Allah)的音译,其意为真主的赐福,“天锡”即其意译。萨都刺还别号直斋。

萨都刺,其先是西域人,旧籍说他是答失蛮氏。^②答失蛮是伊斯兰教对宗教学者的尊称。祖父思兰不花。有人认为,思兰不花也是阿拉伯语的音译(Salām Bukkara),意思是“布哈拉的安宁”,但还不能肯定。父阿鲁赤。祖、父以武功为元世祖所赏识。英宗时,奉命镇守晋北大同路至代州一带。萨都刺出生在代州的雁门(今

① 戴良《丁鹤年诗集序》。

② 元杨维禎辑《西湖竹枝集》。

山西省代县西北),因此他被称为雁门人。^①

萨都刺是阿鲁赤长子,有两弟一妹。二弟萨野芝,字天与,曾任江西建昌路总管。野芝子名仲礼,字守仁,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任福建行中书省检校,就在福建定居了。^②

萨都刺早年聪敏,善于文词。因家境比较困难,曾经营过商业。他在早年作品《醉歌行》里诉说,读了书,反倒“家口相煎百忧集”,诗人不能免于穷困。他在这里指出:“百年简宪曾何畏,一日礼法能杀人。”这是说:大官做得久了,什么也不怕,但对于一般人来说,礼法就是为他们而设,是可以杀人的。诗句又说:“贤愚千载同一朽,我为君歌君拍手。”诗人对那个是非善恶不分的年代,好像是表示了自己的旷达,实际上是流露了他对于时事的失望。他还有一首诗,题作《安分》,诗的全文是:

心求安乐少思钱,无辱无荣本自然。

春日赏花惟貰酒,冬天踏雪旋添绵。

频将棋局消长日,时爇香熏篆细烟。

万事皆由天理顺,何愁衣禄不周全。

这是说,一切要随遇而安,只要顺于天理,不必发愁衣食。如从宗教方面来解释,这是穆斯林“信前定”的反映,但是苦闷的申诉,总是看不到前途的抑郁的情绪。萨都刺早年的这种生活和思想情感,比较接近于社会下层,这对于他后来的政治生活和作品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泰定四年(1327年),萨都刺中进士。第二年,任镇江路京口录事司达鲁花赤。自此以后的十年内,萨都刺先后在江南行御史

① 以上见干文传《雁门集序》。

② 萨龙光本《雁门集》卷一《寄舍弟天与》注文引《家谱》。

台为掾、燕南河北肃政廉访司照磨、闽海福建肃政廉访司知事、燕南河北肃政廉访司经历。^①

萨都刺在京口，相传有不少善政。他在京口开辟了市场，规定了统一的度量衡，要求公平买卖。这为商民的贸易活动提供了方便。

京口曾遇到严重灾荒，萨都刺商请太守，打开仓库，救济灾民，使八十万居民得以渡过灾荒。有一户人家因靠近粮库，太守下令搬迁。萨都刺典当了自已的银壶，接济这户人家搬迁。他的这一行动，使太守感到惭愧，也就把搬迁的成命撤回了。太守家有豪奴，仗势欺压平民。有巫者，妖言惑众，诈骗钱财。萨都刺对豪奴和巫者都加以惩治，安定了社会秩序。有一个老妇人控诉儿子忤逆。萨都刺经过了解，开导了其儿子，劝慰了老妇人，终于改变了这个家庭内部关系，使其全家和睦。

萨都刺的这些事迹都记于他任职五百五十年后修成的《丹徒县志》上，可能有不少的传说成分，但也可见他的政绩在当地之深入人心。

至顺二年(1331年)，萨都刺离京口以后，在江南行台等处的职务，都是卑微的小官。论官秩，照磨是正九品，知事是正八品，经历是从七品。讲月俸，按中统钞计，照磨有十二贯，知事十五贯，经历二十贯。^②因此，萨都刺虽也做了官，但总是一个清苦的官。他在后至元三年(1337年)，离福建北上时，吟诗表述“宦游之乐不如奉亲之乐”，且说明宦游所及，皆奉母而行，“以禄养也”。^③另有诗

① 《雁门集》(萨龙光本)卷十《溪行中秋玩月·序》。

② 《元史》卷九六《食货志》。

③ 《雁门集》(萨龙光本)卷十《溪行中秋玩月·序》。

说：“功名富贵倘来物，政事文章奚足珍。”^① 两诗所表现萨都刺的旷达，较早年更为成熟。但他这时并不消沉，而赞叹“志士鸡鸣中夜起，秋雨粼粼剑光紫”。^②

萨都刺在任职燕南河北肃政廉访司后，还有什么仕历，无从确知。萨龙光按年编次萨都刺诗集，列出至元四年以后萨都刺的官阶，未见所据，还不宜贸然置信。

萨都刺生于至元九年（1272年），卒年说法不一。有的说他活了八十四岁以上，有的说他没有活到五十岁，这都待进一步研究。

萨都刺的诗集名《雁门集》，在元至正年间已有刊本。此后，明清都有刊本。现市上流行的标点本，系采用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刊行的萨龙光辑本。这个本子有校记，有注释，便于阅读。这个本子是按年编排的，这可供参考，但所系之年未必一一可信。

萨都刺的诗

萨都刺的诗，有多种体裁，多种风格。在元代文坛上，诗的发展远不如杂剧之盛，但就诗论诗，萨都刺是占有值得重视的地位的。

萨都刺以宫词和艳情乐府见称于时。他在这两方面的著名诗篇，如《春词》：

清夜官车出建章，紫衣小队两三行。

石阑干畔银灯过，照见芙蓉叶上霜。

这诗婉丽之中见肃穆、雍贵的气氛，跟当时一般的宫词之以堆砌典故相尚者迥不相同。又如《芙蓉曲》：

① 《雁门集》（萨龙光本）卷十《留别同年索士隐经历》。

② 《雁门集》（萨龙光本）卷十《留别同年索士隐经历》。

秋江渺渺芙蓉芳，秋江女儿将断肠。

绛袍春浅护云暖，翠袖日暮迎风凉。

鲤鱼吹浪江波白，霜落洞庭飞木叶。

荡舟何处采莲人，爱惜芙蓉好颜色。

以及《燕姬曲》、《吴姬曲》等，都能于浓艳细腻之中，时得自然生动之趣。

萨都刺的边塞诗，如《上京即事》中的两首：

祭天马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

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赐诸王。

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酣。

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

以婉丽之笔写蒙古祭天礼俗和塞外风光。萨都刺以表现手法与题材上的特点，在边塞诗中展示出新的面目。

萨都刺游踪所至，特别是在福建浙江地区，见到不少的壮丽奇特的山水，留下了一些好诗。如《过嘉兴》：

三山云海几千里，十幅蒲帆挂烟水。

吴中过客莫思家，江南画船如屋里。

芦芽短短穿碧沙，船头鲤鱼吹浪花。

吴姬荡桨入城去，细雨小寒生绿纱。

我歌水调无人续，江上月凉吹紫竹。

春风一曲鸂鶒吟，花落莺啼满城绿。

这里写出了一些乡土气息，民歌色调，在山水诗中就显得清新。^①

^① 关于《秋词》、《芙蓉曲》、《上京即事》及《过嘉兴》的录引及评论，基本上采用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册第六编第八章第二节。

又如《黯淡滩歌》：

长滩乱石如叠齿，前后行船如附蚁。
逆湍冲激若登天，性命斯须薄如纸。
篙者倒挂牵者劳，攀崖仆石如猿猱。
十步欲进九步落，后滩未上前滩遭。
上滩之难难于上绝壁，虽有孟贲难致力。
滩名况复呼黯淡，过客攒眉增叹息。
下滩之舟如箭飞，左旋右折若破围。
欢呼踏浪棹歌去，晴雪洒面风吹衣。
飞流宛转乱石隘，奔走千峰如马快。
贾客思家一夕还，传语滩神明日赛。
下滩之易易如盘走珠，瞬目何可停斯须。
长风破浪快人意，朝可走越暮可吴。
乃知顺逆有如此，逆者悲愁顺者喜。
请君听我《黯淡歌》，顺则流行逆须止。
顺者不必喜，逆者不必愁。
人间顺逆俱偶尔，且得山水从遨游。

写出了滩水的险湍，又写出在险湍水流中作者的平静的心情。末了八句表述了作者对付顺逆的态度，形象地写出了诗人的旷达。

萨都刺上述的这些类型的作品，都有相当高的艺术成就。而诗人的成就还不只于此，他的作品中还反映了一些积极的内容，这在当时的诗坛上是很难得的。

萨都刺的咏史和诗史

萨都刺的作品中，有积极内容的，是反映在咏史怀古和揭露、讽刺、谴责当时社会情况的篇章中。宋祁著《唐书·艺文传》，称杜

甫“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萨都刺有少数作品，也可说是具有诗史性质的。^①

萨都刺咏史怀古之作，以《金陵怀古》最为著名。这主要是艺术成就上的原因。如从思想内容上看，则应注意到《登歌风台》。歌风台是传说中汉高祖的遗迹。汉高祖当了皇帝后，回到故乡沛县，接见故乡父老，酒后唱《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歌风台”就是因此得名。萨都刺针对着《大风歌》的内容，结合汉高祖时候的历史情况，对汉高祖加以谴责。诗云：

歌风台下河水黄，歌风台上春草碧。
黄河之水日夜流，碧草年年自春色。
当时汉祖为帝王，龙泉三尺飞秋霜。
五年马上得天下，富贵乐在归故乡。
里中父老争拜跪，拄杖麻鞋见天子。
龙颜自喜还自伤，一半随龙半为鬼。
翻念向日亭长时，一身捧檄日夜驰。
只今宇宙极四海，一榻之外难撑持。
却思猛士卫神宇，安得长年在乡土。
可怜创业垂统君，却使乾机付诸吕。
淮阴年少韩将军，金戈铁马立战勋。
藏弓烹狗太急迫，解衣推食何殷勤。
倒使英雄遭妇手，血溅红裙急追首。
萧何下狱子房归，左右功臣皆掣肘。
还乡却赋《大风歌》，向来老将今无多。

^① 采萨龙光编《雁门集》跋语中的说法。

咸阳宫阙亲眼见，今日荆棘埋铜驼。

台前老人泪如雨，为言不独汉高祖。

古来此事无不然，稍稍升平忘险阻。

荒凉古庙依高台，前人已矣今人衰。

悲歌感慨下台去，断碑春雨生莓苔。

这首诗肯定了韩信的战功，明确地认为韩信是因功遭忌被害，指出了汉高祖“还乡却赋《大风歌》”，这时已是“向来老将今无多”。他又借着老人的口说：“不独汉高祖”，“古来此事无不然，稍稍升平忘险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历史现象的概括，这是一些庸俗的历史学者所不敢说的。显然，他在这里怀古，也是悼今，表达了他对于当时政治上的不满。他还有一首《回风坡吊孔明先生》，诗云：

大江东流日夜白，已矣英雄不堪说。

朔风挟雨过江来，犹向矶头溅腥血。

汉家神器四海摇，奸雄贼子相贪饕。

二龙雌雄尚未决，将军战骨如山高。

先生谋略满怀抱，坐视腥膻不为扫。

若非蜀主三顾贤，终只如龙卧南亩。

仰天一出摧奸锋，纶巾羽扇生清风。

许君义气肝胆裂，兵枢尽在掌握中。

赤壁楼船满江夏，伏剑登坛唯叱咤。

赤心耿耿天必从，烈火回风山亦赭。

可怜一炬功未成，将星已坠西南营。

力吹汉水灰未醒，呜呼天命何不平。

伫立矶头盼吴越，感慨今人生白发。

先生虽死遗表存，大义晶晶明日月。

又有《过居庸关》：

居庸关，山苍苍，
关南暑多关北凉。
天门晓开虎豹卧，石鼓昼击云雷张。
关门铸铁半空倚，古来几多壮士死。
草根白骨弃不收，冷雨阴风泣山鬼。
道旁老翁八十余，短衣白发扶犁锄。
路人立马问前事，犹能历历言丘墟。
夜来苡豆得戈铁，雨蚀风吹半棱折。
铁腥惟带土花青，犹是将军战时血。
前年又复铁作门，貔貅万灶如云屯。
生者有功挂玉印，死者谁复招孤魂。
居庸关，何峥嵘！
上天胡不呼六丁，驱之海外消甲兵？
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

这两首诗，一首肯定了诸葛亮的才能和他对汉家的忠贞。诗句有：“先生虽死遗表存，大义晶晶明日月。”这里，虽有儒家正统思想深刻影响，但他所称道的却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人物形象。另一首，通过居庸关的历史遭遇，谴责封建统治者集团间的不义战争，呼唤男耕女织的和平。

萨都刺作品中有诗史性质的篇章，如《记事》一篇，前人已经说过这是对元朝皇室内部权力斗争的记事。此外，如《漫兴》：

去岁干戈险，今年蝗旱忧。
关西归战马，海内卖耕牛。
元老知谁在，孤臣为尔愁。
凄风吹短发，落日倦登楼。

写出人民连续遭到战争和荒年的痛苦。又如《鬻女谣》：

扬州嫋嫋红楼女，玉笋银箏响风雨。
绣衣貂帽白面郎，七宝雕笼呼翠羽。
冷官傲兀苏与黄，提笔鼓吻趋文场。
平生睥睨纨袴习，不入歌舞春风乡。
道逢鬻女弃如土，惨淡悲风起天宇。
荒村白日逢野狐，破屋黄昏闻啸鬼。
闭门爱惜冰雪肤，春风绣出花六株。
人夸颜色重金璧，今日饥饿啼长途。
悲啼泪尽黄河干，县官县官何尔颜！
金带紫衣郡太守，醉饱不问民食艰。
传闻关陕尤可忧，旱荒不独东南州。
枯鱼吐沫泽雁叫，嗷嗷得食何时休！
汉官有女出天然，青鸟飞下神书传。
芙蓉帐暖春云晓，玉楼梳洗银鱼悬。
承恩又上紫云车，那知鬻女长歔歔。
愿逢昭代民富腴，儿童拍手歌康衢。

说到人民生活的困苦，达到泣饥号寒、卖儿卖女的悲惨经历；另一方面，贵族妇女却“芙蓉帐暖春云晓，玉楼梳洗银鱼悬”，恰好是一个对照。他责问：“悲啼泪尽黄河干，县官县官何尔颜。”他期望“愿逢昭代民富腴，儿童拍手歌康衢”。像这样的诗，都是在替贫苦的人民说话，是很有积极意义的。《雁门集》中如《江南怨》、《早发黄河即事》、《征妇怨》、《织女图》等，都属于这样的作品。

萨都刺的诗论和画论

萨都刺留下了一篇仅有的散文，是为张一村编的《武夷诗集》作的序，这实际上是一篇诗论。文章全文不到五百字，但表达了萨

都刺对诗的看法。萨都刺还能作画,又写得一手好字,他的诗集中有多篇为画卷题的诗句,这实际上也可看作他的画论。

《武夷诗集序》^①说:

肇自大化气泄,融结为名山,闽粤为翼轸之分,武夷当闽之北户。自汉以来,载诸纪事。雄深盘礴,绵亘百二十里。溪曲者九,萦折万山之间。峰峦岩谷,不一其状。奇花异草,不一其色。珍禽驯鸟,不一其声。阴晴朝暮,风烟雨雪,不一其变。使人应接不暇,幽深僻远,若与世隔。是故前贤大儒藏修于此,真人炼士蜕骨于此。今昔达公巨卿、文人骚客、名僧高道、逸人迁客之流,过兹山者,莫不发为题咏,摹写兹山之胜,以泄其胸中之所素蓄。

这一段话是说,武夷山是一个很好的吟咏对象,它的好处从整体上看,在于“盘礴、绵亘”,溪曲萦折;从局部分别地看,则有四个“不一”,其中包含峰谷形状的不一,花草、禽鸟声色之不一,朝暮、阴晴之时间上和气候上变化的不一。“不一”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使人应接不暇。因此,武夷山就吸引了各种人们发抒他们胸中的积蓄。简单地说,武夷山作为很好的吟咏对象,是由于它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变化性。萨都刺没有把景物看作静的,而是看作动的,不是在写景物的本身是什么,而是在写自己对景物的感受是什么。中国在文学方面的一个传统说法,叫作“情境交融”。萨都刺把这个境放在运动中,放在诗人的情感中,这是对吟咏的客体有了进一步的体会的。但这还只是就客体的一方面来说的。对于作为吟咏主体的诗人又是如何呢?《序》文说:

^① 本文收于宣统庚戌仿康熙庚申刻本《雁门集》的补遗中,有注:“见《武夷山志》。”标点本《雁门集》未收。

山之诗,始见于唐,历代至我朝不绝响。达公巨卿发其雄壮豪丽,文人骚客发其清新俊逸,名僧高道发其幽闲高远,逸士迁客发其冲淡感慨,龙吟虎啸,神号鬼哭,鹤唳猿哀,虫悲蚓鸣,其所发不一,其怀抱不同,其趋向显晦亦异。若山之峰峦岩谷,奇花异草,珍禽驯鸟,阴阳朝暮,风阴雨雪,莫可得而名状也。

这是说,诗人发抒自己的情感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其中包含有身份的不同,有思想情感内容上的不同,有趋向显晦上的不同,也正像所吟咏的客体一样,是“莫可得而名状”的。这就是说,诗是由主体的素蓄和客体的诱发结合而成的,而主体和客体又各有其具体的特殊性,因而形成为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诗。重视主体和客体的结合,整体性和特殊性的结合,这是萨都刺诗论的一个特点。《序》文又说:

非胸中有武夷,莫能状武夷之万一,非胸中具古今名人之才器,莫能别其吟啸之意趣。

这是提出了对诗人的要求,其中包含了对吟咏客体的理解,对主体才器的要求。才是艺术的才能,器是学力见识。萨都刺对诗人的这种要求,是高标准的,不是一般作者所可企及的。

《序》文最后说:

天地坏,此山坏;此山坏,此集坏。天地不坏,此山此集亦相与悠久而无穷也。诗乎诗乎!其天地山川之清气乎!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说《武夷诗集》与天地永存,实际上是说,有了武夷山,也就必然有对于武夷山的礼赞;推广了说,有了天地山河,就必然有关于天地山河的诗篇。这也可以理解为,诗人的创作冲动是没有休止的。不过萨都刺对于这一点没有明确地说出来,可能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第二层意思,说诗是天地山川的

清气。这是把诗位置于天地山川之上,差不多等于说,诗是经过提炼的天地山川,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诗是对于自然的概括或对客观事物的概括。

萨都刺的诗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应该占有相当的地位的,是值得专业工作者作进一步的研究的。

萨都刺题画的诗,以《题〈江乡秋晚图〉》能较清楚地表达诗人对绘画艺术的看法。这首诗是:

沙头潮下秋水枯,云山落日云模糊。

草堂远近路长驱,萧萧行李行人孤。

蹇驴渡桥归思急,村南村北天秋色。

何者相呼鸡犬声,山前山后烟树立。

江风水面吹残莎,打鱼小艇如飞梭。

何人荡桨立船尾,钓者船头腰半驼。

小李将军不可作,粉壁流传愁剥落。

石门守者犹可奇,拄杖敲门索新跋。

京口绿发参军郎,见君此画心即降。

携家便欲上船去,买鱼煮酒扬子江。

这首诗共二十句。前十二句是咏这幅图的画面。先看图的整体轮廓:有水有山,有落日时的秋色。次看图的细部:长长的山路,通往村中的房舍,孤独的行人,带着简单的行装,骑着驴子渡过水上的小桥,匆忙地往家里走,村南村北都是满天的秋色,山前山后到处是炊烟四起,不知还有何人在呼鸡唤狗。江面上呢,是另一番景色:江风吹着水面上的残莎,打鱼的小舟如飞梭般地前进,有人立在船尾荡桨,有人在船头弯着腰钓鱼。这些,是萨都刺在有层次地描写这幅图的画面,同时也反映了他在作画时构思的层次和下笔的层次。诗句中说到急于回家的行人,渡桥的蹇驴,飞梭般的行

船,在船尾的荡桨者和在船头的钓鱼者,尤其是处处浸润着的江村晚上的秋色,这是一幅不以形似胜而以意境胜的好画。萨都刺对这幅画的赞赏,也反映了他作画的倾向性,是属于意境一派的。

萨都刺的画流传到现在的,究竟有多少,尚没有具体的调查。据大家所知道的《严陵钓台图》和《梅雀》两幅画而论,也都是倾向于意境的表现。《严陵钓台图》写东汉时严子陵钓鱼的故事。严子陵是光武帝刘秀的朋友,两人平素的交情不错。后来刘秀当了皇帝,严子陵不肯做官,宁愿隐居在富春江边垂钓。这幅画的寓意是很清楚的。《梅雀》有萨都刺的题句,说:“香满疏帘月满庭,风檐鸣铁砚池水。寒夜人静皋禽语,却忆浮雪罗外登。”寒夜禽语,雪后梅香满室,作者要写的是什么意境,也是很明白的。

《题〈江乡秋晚图〉》的后八句中的前四句,是说名家难得、藏画不易及自己受人之托,为画题诗的因由。小李将军,名李昭道,是唐代金碧山水派的巨匠。在画风上,萨都刺不属于这一派。诗句说“小李将军不可作”,是说古代名家不可再现。唐代山水画,多为壁画,日久难免剥落,故说“粉壁流传愁剥落”。后四句是说这幅画的感染力量:见画的人很快就“携家便欲上船去,买鱼煮酒扬子江”。

萨都刺的另一首诗《题〈寒江钓雪图〉》,对画的感染力量说得更为清楚。诗句中说到诗人看到这幅画后的感受:“人间富贵草头露,桐江何处觅羊裘。还君此画三叹息,如此江湖归未得。洗鱼煮酒卷孤篷,江上云山好晴色。”诗篇能否感染人,以及具有多大的感染力,这当然要看画家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也要看欣赏画卷的人的思想水平、艺术水平和当时的心情。这可以看出萨都刺对于绘画的效果之重视,这也是萨都刺绘画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综观萨都刺的一生,包括他的诗和画,他的诗论和画论,都是

不满于当时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思想感情上接近于人民群众的,但他不可能看到时代的出路,他也无意于寻找时代的出路。他的作品,有现实主义的倾向,但往往为对观客景物的自然描写所遮掩。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积极意义,又往往跟消沉的情绪相纠缠。但所有这些缺点都不应当用以抵消他在诗坛和画坛上的成就。

〔林 松〕

高 克 恭

政治生活^①

高克恭的祖先是西域人。东来后,定居大同,后来又迁居燕京。父亲名亨,字嘉甫,对于《易》、《书》、《诗》、《春秋》和宋代理学,都很有兴趣。他曾受到元世宗的召见,对当时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不肯媚事权贵,也不愿意做官。晚年隐居房山,死在那里。高克恭是他的长子。克恭的相貌有显著的回回人的特点,有人曾赠诗给他说:“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②

高克恭,字彦敬,出生于蒙古贵由汗三年(1248年)。他幼承家教,勤于攻读。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补工部令史。第二年,江南归元后,选充江南行台掾,他曾从御史大夫相威(1241—1284年)入觐。世祖跟他谈话并询问过他是否高嘉甫的儿子,并赐他钞二千五百贯。后来,累迁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改山东西道。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克恭入为监察御史,以办事干练,守正不阿,为台臣所称道。他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在他离职以后,还经久不废。至元二十五年,时桑哥当权,想拉拢一些有威望有影响的臣僚依附自己,克恭被提升为右司都事。但克恭不肯依附,被改

① 关于高克恭的家世和宦历的材料,主要是根据邓文原《巴西文集·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

② 朱德润《存复斋集》卷一〇《题高彦敬房山图》;“唾洒冰纨作秋色”这七个字形容他的长髯,大概是说他的胡子又长又白的意思。

派到江浙行省，^①考核簿书。当时掌管文书、刑法的吏人，多是迎合上级的意思，务求严酷苛刻，而克恭总是实事求是，不肯随波逐流。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克恭还京，任兵部郎中。同年，桑哥伏诛。克恭为朝议所推，出任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按照定例，儒户可蠲免徭役。江浙行省因档案散失，户籍不易察考，执政者争论不休，长年累月拿不出来办法。克恭到任后，把读书人都列入儒籍，一律免除他们的徭役。原定于民不便的事情，克恭多加以改革或废除。他又物色有才干的人，分别任用和推荐。

当时，浙西的公田多隐漏失实，克恭奉命检括。他认为，这是由于宋末贾似道裨政的恶果，致使“田有虚额，而官无蠲征”，如果逼租过急，必然“负逋者众，吏民交病”。因此，他建议“讲行良法，保固邦本；不当重为烦扰，复行旧弊”。

朝命增收湖东夏税。朝臣到杭，地方官吏为了取悦上司，都表示同意。只有克恭一人持保留态度，朝臣也不敢相逼。他心平气和地对朝臣说：“我的能力远不如你。你过去曾在这里做过官，以你那么大的才干都不能增加税收，我能有多大本事呢？希望你要体察百姓的困难，不要难为他们。”对增收夏税的文件，他终于没有在上面签署。

杭州每年征派百姓管理库藏。库房常被盗窃而物资也有耗损，逼得管库的百姓卖儿卖女也偿还不清。克恭改派州县吏人担任司库的差使，满了一年就加更换。这样，公私称便，成为常例。

^① “江浙行省”，《高公行状》作“江淮行省”。按至元二十一年，江淮行省改作江浙行省，见《元史·地理志》。高克恭到南方去，已经是至元二十五年以后的事。《行状》的“江淮行省”，或由传抄之误，今改正。

有的税收机关在门口设置刑具,以对付漏税的人。克恭召集有关官吏,询问税收有多少。他们都说没有收够。克恭说:“我将要报告上司,对你们用刑,以惩治你们的失职。”第二天早晨,设置的刑具不见了,而税收却早已超过了定额。

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克恭迁山西河北道廉访副使。第二年,改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他上条陈,建议“兴学校、选真才、汰冗官、增吏俸、慎刑狱”等五事。又上言:“朝廷屡次颁发诏书,要实行贡举法。但权臣卖官行私,拔引同类,阻碍实行,以致到处人材缺乏。现在应该赶快开科取士。”他的这些话多与同僚的意见不合,有的人还讥讽他迂阔,不切实际。

大德三年(1299年),复召入,为工部侍郎,转翰林直学士。大德五年(1301年),京师遭遇严重水灾,他和直学士王约奉诏赈济京畿东道饥民,发米五十万石,所活有五十余万人。

大德六年(1302年),克恭任吏部侍郎。第二年,河东地区大震,平阳、太原更是厉害。克恭奉命到平阳,赈济活人,葬埋死者,并审理冤狱和疑狱,平反了好多件。不久,改任彰德路总管,但未曾赴任。

大德八年(1304年),克恭改任刑部侍郎。有人控告某御史审理案件枉法。跟御史有牵连的人,为了推卸罪责,说话站在控告人一边,因而御史被判了刑。这时正值大赦,而对御史的处罚仍不能免。克恭很看不上这些人的作法,坚决主张,对这些人也要定罪。因此,触犯了当权的人,以致引起在朝廷上的辩论。但也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

京师有十个月不下雨,旱情严重。这时,克恭已由刑部侍郎进升刑部尚书。他认为这是因为审理案件时严刑逼供,以及囚犯瘐死狱中,有伤阴阳的和气。他把天然的灾情跟人事联系起来,显然

是唯心的,而且立论的根据在维护封建的教化。但他是期望当局轻刑恤狱,在刑事范围内是主张持平的。

克恭任刑部尚书时,很受平章政事何荣祖的赏识。他曾对荣祖直率地“陈当世之务,及自昔大臣保全名节”的史事。平日跟刑部同官论事,他也总是坦率地发表意见,不肯随声应和。他调离刑部后,他在任时所定规程,仍为胥吏所遵守。

大德九年、十年(1305—1306年)间,克恭调任大名路总管。他治理大名,廉洁奉公,“吏戢而民舒”。至大三年(1310年)春二月,还京师。同年九月初四日,克恭逝世于燕京之南,终年六十三岁,谥文简。

克恭先娶妻曹氏,继娶刘氏。子,高柜,曾任秘书著作郎。次女嫁亦福的哈鲁丁的儿子乌伯都刺,乌伯都刺泰定年间曾任中书平章政事。

从克恭的政治经历看,他是地主阶级中一个清廉执法的官员。

诗和画

高克恭作为诗人,是一个写山水田园的诗人;作为画家,是一个山水画家。

中国的画,在最早的时候,以人物画为主,多写古圣先贤。魏晋以后,山水画逐渐多了一些,但仍旧是以人物画为主。这时的宗教画也画的是人物。到了唐代,山水画开始流行。五代及宋,山水画发展起来。到了元代,山水画大盛,可以说是画坛的盟主。高克恭的画正出现于山水画大盛的时代。

唐代的山水画开始分派,画史上称为南北二宗。北宗尚法度,南宗重意境。北宗始于李思训(651—716年)、李昭道父子,南宗始于王维(701—761年)。五代、宋的董源、巨然、米芾(1051—1107



墨竹
(元)高克恭



春山晴雨图 (元)高克恭
《石渠宝笈》御书房著录。
上端“元统癸酉夏六月克
恭”题款。长 123.4 厘米，
宽 61.3 厘米。

年)、米友仁(1074—1153年)都是南宗的巨匠。高克恭开始学二米的画法,后来又吸收了董源的画法,艺术上颇有造诣。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长期接触江南山水,因而在挥毫之际富有天趣。元人诗集里面,对于克恭的山水画题咏很多,而对于《夜山图》、《秋山暮霭图》、《青山白云图》更为常见。《元诗选》载郭麟孙《题高尚书〈秋山暮霭图〉》:

长江万里流滔滔,风平如席静不涛。
老枫疏柳淡云彩,欹岸侧岛明秋毫。
红尘一点飞不到,何人结屋江之皋。
霜清水落沙屿出,芦叶瑟瑟鸿南翔。
一峰岑巍耸峨髻,俯视培塿如儿曹。

晴岚朝爽滴空翠，树林露沐滋流膏。
心融造化意惨淡，笔挟风雨声萧骚。
淋漓元气犹带湿，收拾万象无能逃。
扶舆清淑聚胸次，固应独擅人间豪。
未容小米诧能事，千古且说文昌高。
世间神物不易得，牙签玉轴归时髦。
我来坐窗疲不遑，展卷顿觉舒郁陶。
何烦蜡屐跻攀劳，崦西小红寻野桃。

诗句吟咏了江南山区傍晚的秋色。头八句说的是山前景物。大意是说：长江的水滚滚流，静静地没有波涛。老枫，疏柳，淡淡的云；倾斜的江岸，偏在一边的岛。这是人迹难到的地方，哪来的小屋筑得那样高？水流冲积了一片片的沙洲，芦叶瑟瑟声伴着大雁向南飞翱。中间的八句是说山中的景色和它给人的感受。大意是说：在群峦叠嶂之中，主峰高耸，俯视群山，如它的儿女。山中弥漫着云岚，空中滴翠，树木流膏。画家的笔尖融造了大千世界，挟带了风和雨。那种淋漓的气势，沁润了人们的心肺。末了的十句是说画品的成就，作品的难得和画对读者的感染。郭麟孙的这首诗，不一定能说出这幅画的神髓，但至少可以让人感到，克恭画山水，不只是简单地写静态，而是写静中的动，动中的静；不只是写作为自然景物的山水，而且写出画家的感受。神韵浑厚，有动有静，境情结合，这是克恭山水画很大的特色。

《元诗选》又载张天锡的《题高尚书〈青山白云图〉》：

仙人胸有琅玕树，吐作千峰落毫素。
峰上苍苍一尺天，峰下云行亦无数。
因忆曾为天帝客，家在白云深处住。
白云随龙飞出山，我亦攀龙蹑云路。

青山笑人不早归，大笑龙为云所误。

变化无定端，飞扬为谁雄。

诗人以白云作为吟咏这幅画的主题，把自己说成是白云深处的人，用龙比喻白云的飞腾、变化。他说：白云随着龙飞出山，我也攀附着龙走着白云走的路。青山笑我不能早早地回家去，更大笑龙让白云弄糊涂了，也找不到回去的路。这就是写画中的白云富于变化，简直是不可捉摸。诗人盛赞画的艺术力量是超越画面的限度。

克恭的画，受到历代画家的称誉。明代董其昌《画旨》说：“诗至少陵（杜甫），书至鲁公（颜真卿），画至二米，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独高彦敬兼有众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古今一人而已。”清代王原祁《麓台题画稿》说：“画家自晋唐以来，代有名家。若其理、气、趣兼到，右丞始发其蕴。至宋有董、巨（董源、巨然），规矩准绳大备矣。沿习既久，传其遗法，而各见其能；发其新思，而各创其格。如南宋之刘、李、马、夏（刘松年、李唐、马远、夏珪），非不惊心炫目，有刻画精巧处；与董、巨、老米（米芾）之元气磅礴，则大小不觉径庭矣。元季赵吴兴（赵孟頫）发藻丽于浑厚之中，高房山示变化于笔墨之表，与董、巨、老米精神，为一家眷属。以后黄、王、倪、吴（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阐发其旨，各有言外意。吴兴、房山之学，方见祖述之虚；董巨二米之传，益信渊源有自矣。”这些话，表明了克恭在画史上所占有的地位。

克恭还善画墨竹，也同样为人所推重。画家倪瓒称赞他的作品说：“石室风流继老苏，黄华父子亦敷腴；吴兴笔法钟山裔，只有高髯不让渠。”^①“石室”，是文同的号；“老苏”，指苏轼；“黄华”，是

^① 《清闷阁集》卷八《高尚书画竹》。

王庭筠的号；“吴兴”指赵孟頫。这几个人都是画竹的名手，这是说克恭的墨竹是可以同他们媲美的。

克恭自题所画墨竹说：“子昂写竹，神而不似；仲宾写竹，似而不神。其神而似者，吾之两此君也。”^①形似和传神，是中国画论上的重要问题。在画的实践上，由于对这个问题看法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克恭要对二者兼而有之，这可见他以高水平要求自己，也可见他对艺术成就上的自信。从他留下的墨竹画来看，可说他的作品是寓神韵于形似之中，而又超出形似之表。

克恭不经常作画，多是公余乘兴而作，但因他的名高，仿制品不少。现在故宫博物院和台湾所藏几幅作品，据专家鉴定，尚是他的真迹。

克恭的诗，在风格上，跟他的画风一致，都是于景物描绘中抒写作者的意境。克恭诗，如：

过弋阳

雷声驱雨过山西，山腹云根似削齐。
日暮牧儿归不得，料应白水涨前溪。

过信州

二千里地佳山水，无数海棠官道傍。
风送落红搀马过，春光更比路人忙。

前诗写的是自然景色，自然情趣。后诗写的是无数春光，无数逸情。他的诗读起来给人以恬适的感受。但在元代，诗在文坛中的地位与曲和杂剧已不能相提并论。克恭的诗又多以山水为主题，诗的情调就必然显得单纯，而思想内容就更为贫乏。以克恭的诗

^① 《梧溪集》卷五《高尚书墨竹为何生性题》。子昂是赵孟頫的字，仲宾是李衍的字，是宋代画墨竹的名家。

在文坛上的地位来说,也是不能跟他的山水画在画坛上的成就相比的。克恭的画常见于后人的评论,而他的诗却很少人提及,这是有他的客观原因的。

就克恭一生的事业来说,他毕竟是一个做官的人,作画、写诗都是公余的事情。但从历史意义上看,他在政治上并没有显著的贡献,而他的画却是比较突出的。

〔林 松〕

明 代

一 常遇春^①

元明之际,回回人中有明显的政治上的分化。有地位的回回人,大多忠于元室,比如最早起义反元的红巾军领袖彭莹玉就是在皖南被回回元帅沙不丁射杀的;元顺帝逃离大都后不久,又派丞相也速率兵夺取,也速就是回回人。回回中的劳苦者也有不少人参加了反元起义,有的成为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常遇春(1330—1369年),字伯仁,濠州怀远(今安徽怀远县)人,他家世代务农,家境寒苦,自幼习武,二十岁左右已经“勇力绝人,猿臂善射”了。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爆发,各地豪杰四起,拥众自雄。常遇春在家乡,先是跟随打家劫舍者刘聚干了两年。至正十五年(1355年)春天,投奔兵有纪律、善于用人的朱元璋,这一年常遇春二十五岁,从此追随朱元璋征战十四年,与朱元璋的开拓和统一事业相始终。后来朱元璋在

^① 本文引用资料除另有注释外,主要根据《明史》卷一二五《常遇春传》、宋濂《宋文宪公集》卷四《常遇春神道碑铭》。

总结开国之功时曾说：“计其开拓之功，以十分言之，遇春居其七八。”^①所谓“开拓之功”，就是兼并群雄，推翻元室，统一中国的事业，概括起来就是：南下、西征、东取和北伐这四个大阶段。常遇春从始到终，无役不从，为朱明江山效命疆场，屡建奇功。

勇猛敢战，这是常遇春戎马生涯的最大特点，并贯穿于历次重大战役。至正十五年（1355年）六月，常遇春投奔朱元璋不久，朱元璋即率军南下渡江，在著名的采石（今安徽采石，在马鞍山市之南，长江东岸）战役中，面对着元朝水军元帅康茂才的严密防守，常遇春乘一小船在激流中冒着乱箭挥戈勇进，纵身登岸，冲入敌阵，左右冲突如入无人之境，朱元璋即挥军登岸，元军纷纷溃退，缘江堡垒纷纷归附。朱元璋乘胜率军攻占太平（今安徽当涂）。第二年三月，又攻占集庆（今南京），改为应天府。集庆和它周围地区的占领，使朱元璋获得一块财富之区，为在江南的继续开拓和壮大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战斗，常遇春锋芒初露，立了头功，开始受到朱元璋的信用，由渡江时的先锋升至元帅。

西征陈友谅，常遇春再立大功。陈友谅占据上游，精兵大舰，雄心勃勃，是朱元璋开拓事业的主要威胁。至正二十年（1360年）五月，陈友谅率水军数十万直取应天，在南京城西北的龙湾与朱元璋军展开一场恶战。朱元璋以弱御强，便设计用伏，诱敌深入，常遇春奉命与冯国胜率帐前五翼军三万人设伏，为全军主力。经过一场鏖战，在龙湾登陆的陈友谅兵，遭到常遇春、冯国胜伏兵的冲杀，死伤惨重，溃不成军。正值江水落潮，龙湾水浅，陈友谅一百多艘巨舰全部搁浅，朱元璋陆军并进，陈友谅大败而逃。龙湾大捷，朱元璋转危为安，并壮大了力量。常遇春大破敌阵，战功卓著，不

^① 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一《常遇春》。

久,升行省参知政事。

龙湾战后的第三年,1363年,陈友谅以号称六十万大军空国来攻,在鄱阳湖与朱元璋军进行了一场持续三十六天的决定生死存亡的水上大决战。朱元璋先是派兵封锁敌人的归路,交战中,陈友谅军船大、坚固,但速度慢,朱元璋军船小、速度快,操作灵活,两军相持,难解难分。一次朱元璋座船搁浅,陈友谅的大将张定边率船队来围攻,情况危急。常遇春奋勇当先,射伤张定边,又用自己的战船撞击朱元璋的座船,使其脱离浅滩。战斗中常遇春奉命积极组织火攻,发挥小船优势,乘风纵火,陈友谅的舰队被烧得烈焰冲天,兵将损失过半,湖水尽赤。陈友谅率残舰撤往湖口,又受到朱元璋诸将的追击和常遇春的迎头堵截。陈友谅在混战中被流矢射中死去。这场决战扭转了双方力量的对比,陈友谅覆灭,使朱元璋成为群雄中之强者。常遇春因功受赏,得金帛田地甚厚。不久,升为平章政事。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七月,常遇春先是随徐达率军攻占庐州。接着,又与邓愈会合征服江西的新淦、吉安、赣州、南安等郡县,岭南韶州、南雄等地望风降附。第二年五月,常遇春又奉命与邓愈率军攻取湖北的安陆、襄阳;十一月与徐达率军攻占了泰州。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万东征张士诚。按照朱元璋的部署,徐达、常遇春的军队先攻取了湖州和杭州等地,剪除了张士诚的羽翼,平江(今苏州)孤立无援,经过长达十个月的围攻,平江城破,张士诚败死。常遇春以功进封为鄂国公。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二十五万大军出师北伐。当时北方元朝军事力量经过明军多年的打击和几支握有重兵的军人彼此互攻,

已经大大削弱。所以,徐达、常遇春出师三个多月,即平定山东。1368年即洪武元年四月,明军在洛阳的塔儿湾与元军遭遇,常遇春单骑突入敌阵,麾下壮士从之,勇猛冲杀,在洛水之北击溃元军五万,俘获无算,史称塔儿湾大捷。这一仗,占领了河南和潼关,夺取了陕西的门槛,为攻夺元大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洪武元年闰七月,徐达、常遇春率马步舟师由临清沿运河北上,连下德州、通州。元顺帝携后妃、太子等逃奔上都开平(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八月二日,徐达、常遇春一举攻占大都,改为北平府。稍事休整即又挥军西进,攻取山西。与精锐的扩廓帖木儿军进行了艰苦的搏斗,平定山西。洪武二年三月,西征军进攻陕西,元将李思齐由凤翔奔临洮,力竭投降。元顺帝乘明军主力长驱秦晋之机,命丞相也速率军向北平反扑,兵锋已抵通州。常遇春又奉命与李文忠率步卒八万、骑士一万驰救北平,元军闻信即向北逃奔,常遇春率军追奔千里,大获全胜。为了覆其巢穴,最终解除元军对北平的威胁,常遇春又率军径取元上都开平,顺帝逃奔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常遇春夺取开平,全歼留守元军,缴获车万辆、马三万匹、牛五万头。

洪武二年(1369年)七月,常遇春自开平率师南归。行至柳河川(今河北龙关县西),得暴病卒于军中,年仅三十九岁。朱元璋闻表大为震悼,赐葬钟山之下,并亲自出奠。书报大将军徐达回京参加会葬。为表彰常遇春的功绩,赠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追封开平王,谥忠武。又封子常茂为郑国公,岁禄三千石。常茂隶宋国公冯胜北征纳哈出,不奉约束,削爵,安置在广西龙州;又别封次子常升为开国公,建文末,以抗靖难师安置云南临安(今云南建水),忧死。

常遇春自从1355年追随朱元璋,参加采石矶渡江战役,到

1369年夺取元上都开平,暴卒于柳河川为止,十四年戎马生涯,转战南北,可以说无役不从,战无不胜。常遇春“为人沉鸷果敢”,^①被誉为当时的天下奇男子。他曾自负地说:“我率十万人便可横行天下”,军中送他一个绰号叫“常十万”。他不仅有勇,而且也有智谋,常常以智取胜。或者设伏,使用疑兵;或者声东击西,出敌不备。在历次战役中都不乏其例。比如1359年七月,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元将宋伯颜不花悉力守备,常遇春使用各种攻城器具,仍久攻不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挖穴道进入南门瓮城,毁敌所架炮,又策动元将张斌约降,内外夹击,乃夺得衢州。再比如,1360年五月,常遇春与徐达一起攻破了陈友谅的枞阳水寨,陈友谅率大军前来报复,四处扬言要攻取安庆。常遇春经过判断,认为其中有诈,这是陈友谅要夺取安庆附近的池州(今安徽贵池),是声东击西之计。同徐达商议后,决定将计就计,设伏诱敌,陈友谅果然中计,腹背受敌之下大败而逃。这都是常遇春以智谋取胜的典型战例。所以史书上说,常遇春“虽不习书史,用兵辄与古合”,“克敌制胜之方皆中节度”。^②

常遇春“爱抚士卒”,“每与敌战,出则当先,退则殿后,未尝败北,士卒乐为之用”。^③这是自古名将几乎所共有的一个优点。与此相关联,就是兵有纪律,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不扰民,并且他很同情百姓的疾苦,这同他出身农家有关,也是朱元璋在开拓事业中一贯严格要求的。常遇春与胡大海一起曾向朱元璋建议,免收百姓给军队交纳的粮草——寨粮,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建议,注重发展屯

① 《明太祖实录》卷四六。

② 同上。

③ 同上。

田事业,以解决军队的粮饷,从而减轻了占领地区百姓的沉重负担。

在和同僚之间的关系上,常遇春处理得也比较好,在作战中能够节制诸将又能虚心与诸将研究对策,集思广益。他身为副将军,经常与大将军徐达一起征战,非常尊重徐达,谦逊地“奉节制,进止赴期不敢爽毫发,大将军雅敬爱之”,^①始终无小间。当时,徐达、常遇春两员大将并称,“一时名将称徐、常”。一个以谋略持重著称;一个以勇猛果敢闻名。朱元璋很会用将,以徐达为正,常遇春为副,用其所长,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常遇春对朱元璋一直忠心耿耿,敢于直言,效命疆场,尽瘁而终。朱元璋对常遇春也特别爱重,认为常遇春的功勋“虽古名将,未有过之”。^②常遇春也善于处理同主子的关系。1365年二月,当常遇春率军征服江西上流未附郡县班师之后,朱元璋对常遇春“颁赏赐劳”,特意表彰他“勤劳于外,南平诸郡,兵不失律,民无所扰”的功劳。常遇春对答颇为得体,他说,这是“皇上成算,所至辄克,非臣所能”。^③貌似宽厚心实险狠的朱元璋自然最爱听这样的话了。

爱之愈深,责之也愈切。朱元璋喜爱常遇春的勇猛果敢,同时担心他的轻敌冒进,并经常对他告诫、叮嘱。1360年常遇春奉命攻取杭州,出师之前朱元璋告诫他:“克敌在勇,全胜在谋。”^④并举当初关羽号称万人敌,却败在吕蒙手下,就是由于无谋,让常遇春一定要引以为戒。1367年北伐中原大军出师之前,朱元璋叮嘱

① 傅维麟《明书》卷九一。

② 《明太祖实录》卷四三。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

④ 《明太祖实录》卷八。

常遇春：“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摧锋陷阵，所向披靡，谁也不如副将军。我不怕将军不能战，就怕你轻敌。”^①轻敌冒进确是常遇春的缺点。朱元璋对常遇春说：“以前在武昌亲眼看到，敌军数骑前来挑战，你即亲自迎敌。身为大将却好与小校争能，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应当切忌。”这说的是在战术上、战役上。常遇春或者勇敢先登，或者单骑突入敌阵，或者受伤后裹创与战，都表现为轻敌。

常遇春的轻敌冒进思想也反映在战略上。1366年八月，朱元璋与诸将议论东征张士诚之役的方略，常遇春主张直捣平江，平江既破其余诸郡可以不战而下。朱元璋不同意，而是主张先取湖州、杭州，剪除羽翼然后再移兵姑苏，一定能取之。1367年商议北伐中原战略时，常遇春仍是提出直捣元大都，都城既破余者可建瓴而下。朱元璋不同意，认为元大都防守坚固，我孤军进入，不能速胜，敌军援兵四集，我军进不得战，退无依托，就很危险了。主张先取山东，再取河南，拔潼关而守之，再进兵元都不战可克。朱元璋的方案比常遇春要稳妥持重得多。

常遇春忠于朱元璋，大有功于朱元璋。三十九岁暴卒于军中，功成名就，是朱元璋开国功臣中少有的善终者。

相传常遇春的父亲是一位阿訇，但不见于史书记载。

〔马寿千 韩新光〕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

冯 胜 冯国用^①

冯胜(?—1395年),原名国胜,又名宗异。元末河南定远(今安徽定远)人,朱元璋的大将,官至总兵官、征虏大将军,封宋国公。其兄冯国用(1324—1359年),朱元璋的早期谋士,官至亲军都指挥使,追封郢国公。

冯氏兄弟出身于地主家庭,有田地几百亩,佃户数十家。自幼喜读兵书,讲论兵法,演兵习武。国用聪敏凝重,动止儒雅,以谋略见长;冯胜长躯伟面,磊落慷慨,精于骑射。二人颇有志于创业报国。

当元末江淮鼎沸、群雄并起之时,冯氏兄弟随父亲避乱于定远山中。国用被众乡里子弟推举为义长,率领数百人据山寨以自保。至正十二年(1352年),当朱元璋略地至定远的时候,冯国用兄弟二人率众归附了朱元璋,受到爱重。朱元璋见冯国用身穿儒服,便问他攻敌方向计将安出?冯国用以为建康(元集庆路,今南京)形势险要,古书上说是龙蟠虎踞,是历代帝王建都之所,应先拔取作为王业的根基。然后命将四出,扩充地盘。不要贪图子女玉帛,取得百姓支持,天下便不难平定。朱元璋听了大喜,命他居于帷幄,参与机要。冯国用初出茅庐的这一建议,对于朱元璋早期建立以金陵为中心的基业起了重要作用。

冯国用足智多谋,追随朱元璋在夺取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以及渡江克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长江东岸)、太

^① 本文引用资料除另有注文外,主要根据《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一《冯胜》、卷二《冯国用》。

平(今安徽当涂)等重要战斗中,他出谋献策,屡立功勋。而且他忠勇异常,有所攻战,披甲直前奋击,成为朱元璋文武双全的心腹。一次,义兵元帅陈瑄先率三倍于朱元璋的人马来犯,冯国用沉着镇定,辅佐朱元璋居中调度,设伏诱敌,大破陈瑄先兵,尽俘其众,陈瑄先与朱元璋歃血而盟表示归附。冯国用却看出陈瑄先心怀二志,提醒朱元璋不要轻信其归附。朱元璋为了收买人心以扩充兵马,释放了陈瑄先。当朱元璋率军攻取集庆的时候,陈瑄先暗中与元守将御史大夫福寿联络,在秦淮河上拒战,朱元璋军大失利。不久,陈瑄先被乡民武装误杀,其从子陈兆先收集旧部驻扎集庆城南郊的方山。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朱元璋率诸将水陆并进攻取集庆。破陈兆先营,收降陈兆先及其部众三万余人。为解除这部分人的疑虑,朱元璋从中选出五百名骁勇者作为亲军,让他们在自己营帐四周宿卫。屏退所有旧部,独留冯国用一人在榻前侍卫,然后解甲酣睡。冯国用旁若无人,十分坦然,降兵深受感动,从此安下心来。当月,进军集庆,冯国用率这五百名亲军先登陷阵,大败元军,直抵城下。诸军拔栅竞进,元守将福寿战死,集庆被攻占。水寨元帅康茂才和军民五十余万归降。集庆之役冯国用立了大功。接着,冯国用参加了扩展江南基业的战争,与诸将一起先后攻取了镇江、丹阳(今安徽当涂小丹阳镇)、宁国(今安徽宣城)、金华等地,均有战功。当年七月,冯国用被擢升为帐前总制亲军都指挥使。

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冯国用随朱元璋率军攻占浙江诸暨,二月,又攻绍兴。冯国用突然患病,旧历四月十五日卒于军中,时年三十五岁,朱元璋闻丧痛悼不已。冯国用作为朱元璋开拓事业的早期谋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其地位仅次于李善长。《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论及朱元璋起兵六年后即在金陵建立基

业，“虽曰神运，盖亦有人事焉”，“人事”之中即包含了冯国用的作用。“观其救民涂炭，除暴去苛，纵还妇女，不贪玉帛”，这些深得民心的仁政，归功于“纳陶安之说，^①进冯国用之谋”。评价是高的，也是公允的。

冯胜投奔朱元璋之后，同他哥哥一样受到爱重。在采石矶渡江之役以及破太平、克集庆，攻取泰兴、宜兴等战斗中，屡立战功，数任命为元帅。冯国用死后，其子冯诚年幼，朱元璋便于次年（1360年）命冯胜袭任兄职，典亲军。在消灭陈友谅主力的龙湾（在今南京市城区西北）之战中，冯胜率领精悍的亲军冲锋陷阵，直捣中坚，战功卓著。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在攻灭张士诚的湖州（今浙江吴兴）、平江（今江苏苏州）破城之战中，冯胜的战功仅次于平章常遇春。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再迁都督府右都督。

有时冯胜也由于作战中遭受挫折而被朱元璋怒责。一次，冯胜奉命夺取张士诚的地盘高邮，守将诈降，冯胜中计，令指挥康泰率数百人入城，被敌军杀光。朱元璋闻报大怒，召回冯胜，罚十大军棍，然后命令他徒步回高邮。冯胜羞愤之极，挥军拼死攻城，徐达率军来援，二人合兵一举破城。为报仇雪耻，冯胜令将敌军斩尽杀绝，又将他们的财物和妻女掠走，分给自己的将士。朱元璋闻报又不悦，令将敌军妻女全部遣返。

北伐中原之役，冯胜随徐达、常遇春出征。先取山东，再入河南，连连奏捷。徐达、常遇春率主力沿河北上夺取元大都的时候，冯胜则奉命率偏师一支拔潼关而守之。关中元军主力李思齐、张思道仓皇西逃，不敢东援大都。朱元璋十分满意，擢冯胜为征虜

^① 陶安，太平地方儒士，建议朱元璋不杀人、不掳掠，东取集庆，据其形势。

右副将军。大都既破,冯胜又率军与徐达、常遇春合兵,平定山西全境。朱元璋对冯胜的战功十分赞赏,特下诏使冯胜居常遇春之下。偏将军汤和居冯胜之下,偏将军杨璟居汤和之下。这样,在朱元璋五员最高的武将中,冯胜已经排列于第三位了。洪武二年(1369年),冯胜随徐达、常遇春进军陕西。先克凤翔,再取巩昌(今甘肃陇西),直逼临洮(今甘肃岷县),迫降元将李思齐。又与徐达围庆阳,冯胜在庆阳西南方的驿马关击败敌军援兵,庆阳守敌援绝,徐达一举破城,活捉元将张良臣。平陕期间,副将军常遇春在河北柳河川病死,冯胜成为仅居徐达一人之下的统帅,这一时期是冯胜戎马一生中最为得志的时期。

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召徐达回京,命冯胜驻守庆阳,节制诸军,实际上是代行总兵官职权。过了五十多天,冯胜擅自班师回京。朱元璋非常生气,责备他为什么不奉诏就回京。念其功大,不予治罪,论功行赏时冯胜所得金帛不及徐达的半数。

为了消除元军残部对北方的威胁,巩固明的统治,朱元璋不断派重兵与之进行长期的战争。由洪武初年开始,冯胜为朱元璋镇守边塞二十余年,包括对扩廓帖木儿和对纳哈出的多次大的远征,戎马倥偬,立下了汗马功劳。

洪武三年,任冯胜为右副将军,随大将军徐达再次出征西北,消灭元军残余。由西安直捣安定(今甘肃定西),大败扩廓帖木儿,俘获甚众。再由徽州(今甘肃徽县)抵略阳,追歼残敌,直抵吐蕃(指青藏高原)。至此元军残余势力逃到漠北或青藏高原,明朝军事形势基本稳定。凯旋后,朱元璋大封开国功臣。冯胜被授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同参军国事,封宋国公,食禄三千石。

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决意三路进兵征讨扩廓帖木

儿。征虏大将军徐达出中路,左副将军李文忠出东路,冯胜为右副将军,出西路,三路并进,以清沙漠。三月,冯胜师抵兰州,傅友德率骁骑五千为先锋,击败元将失刺罕。兵锋直抵甘肃(元甘肃行省包括兰州以西以北的西宁州、宁夏府路、甘州路、肃州路、亦集乃路、哈密力等)。六月,元将上都驴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余户迎降。冯胜抚辑其民,留兵守之。大军由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进至别驾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别竭儿),元岐王朵儿只班逃遁,追获其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马、驼、牛、羊十余万。傅友德又向西进军至瓜州、沙州,获金、银印及马、驼、牛、羊二万。这次三路出兵,大将军徐达失利,左副将军李文忠一路与敌军杀伤相当,唯独冯胜一军所向披靡,战果辉煌。有人告发冯胜私匿缴获的驼马不报,朱元璋借机不予任何赏赐,以示惩戒。

其后,冯胜又于洪武六年、七年、九年分别镇守山西、北平、西安等地,防范蒙古贵族军队的侵袭,颇有建树。洪武十年,冯胜又奉命移镇河南,并受命在开封为朱元璋第五子周王朱橐营建宫殿。洪武十二年八月,冯胜下令九月动工兴建,朱元璋闻报敕谕冯胜,九月正当播种冬麦的时候,兴役是夺农时。并说:“朕封建诸子,将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夺农时,朕恐小民之怨咨也”,让冯胜即刻放还民夫,“俟农隙之时,赴工未晚也”。^①冯胜身为朝廷重臣,却不知体恤民情,朱元璋敕谕及时,就统治术而言,确实高明。此后凡遇兴徭役,夺民时者,小民也只是怨咨于有司而已,决不会怨及于皇上的了。

洪武十八年(1385年),大将军徐达卒。七月,拜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偕颍国公傅友德、永昌侯蓝玉等率京卫将士前往北平,会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

诸道将士操练备边。当时,以纳哈出为首的一部蒙古贵族集团逐渐强盛起来,所部二十余万屯于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境西辽河南岸)一带,成为辽东和北平的一大威胁。

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冯胜率左副将军傅友德、右副将军蓝玉统兵二十万北征纳哈出。已故勋臣子弟常茂(常遇春长子、冯胜之婿)、李景隆(李文忠长子)、邓镇(邓愈长子),也随军出征。朱元璋又派先前被俘投降的纳哈出部将乃剌吾随军前往劝降。

冯胜率大军出松亭关(今河北宽城县西南),分别构筑了大宁、宽河、会州,富裕四座小城,供临时驻军之用。冯胜在大宁留兵五万驻守,率十五万大军压向金山。此时乃剌吾已到金山劝降,纳哈出派遣左丞以献马为名,到冯胜军中察看虚实。冯胜进军迅速,在女直(今吉林一带)迫降了纳哈出部将、全国公观童,乘势直捣纳哈出驻地松花河一带。纳哈出措手不及,只得委托乃剌吾请降。冯胜命蓝玉往一秃河受降,蓝玉在营地设宴款待纳哈出,气氛热烈、友好,后来因为一点小的争执,双方有些不快。常茂听说纳哈出要逃走,急起捉拿,并砍伤其臂膀,都督耿忠上前擒住,推去见冯胜。纳哈出的部下将士及眷属十余万屯于松花河,闻信四散逃亡。冯胜急遣降将观童前往招抚,并派人奏捷。以常茂激变罪名,械送京师。

撤军途中,后卫三千人陷入埋伏,全军覆没。朱元璋闻报不快。又有人告发冯胜,说他抢夺降人良马;送酒给纳哈出之妻,索取珠宝;蒙古王子刚死两天,冯胜强娶其女,大失人伦。凡此种种,使降附者心怀不满,怨声载道。朱元璋大怒,遣使赍敕痛斥冯胜说:所有这些,论以国法都不可宽宥。念将军曾有征战之功,姑且容你悔过自新云云。常茂械送到京,又向朱元璋告了岳父冯胜一状。这给朱元璋一个难得的机会,下诏收回冯胜的总兵官印,命永

昌侯蓝玉行总兵官事。令冯胜还乡，部下将士也不给任何赏赐。从此，冯胜不复掌握实际兵权。迫降纳哈出之役是明初对蒙古贵族用兵的一次重大胜利，主帅冯胜非但未能立功受赏，反而遭贬还乡。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榜列勋臣五十七人，其中功高望重的武臣八人，冯胜位居第三。这只是虚名而已，朱元璋并不信任他。

冯胜还乡后，在定远故里闲居。有时入京朝贺，有时办些练兵、屯田之类的事，并无实权。得天下之后的朱元璋，对打天下的开国功臣猜忌多疑，屡兴大狱。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即借口胡惟庸（中书左丞）谋反案，诛杀了一大批功臣。洪武二十三年，第一号功臣李善长坐“胡党”被迫自杀。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朱元璋又对总兵官蓝玉产生怀疑，便重新起用冯胜为总兵官，以颍国公傅友德为之副，命二人前往山西、河南等地训练兵马，并在大同一带立卫屯田。两个月后，蓝玉便以“谋反”罪被诛三族，坐“蓝党”被杀者一万五千余人。冯胜虽未受牵连，但在当月便被召回，由朱元璋第三子晋王朱棣总制冯胜所统山西、河南马步军士。

冯胜闲居乡间，仍然逃不脱朱元璋的严密监视，动辄得咎，不时受到训戒。纵子胡为，横行乡里，虐待家奴，甚至侵占坟地打谷。这样在封建社会里极常见的事，朱元璋全不放过。历史上萧何曾因百姓告他的状而得福，冯胜却因此而获罪，主子不同，结果也各异。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二月，冯胜与亲戚樊父因为一项珍宝纠纷，分别到朱元璋面前告御状，朱元璋终于有了下手的机会，何乔远《名山藏》说：“太祖予胜酒曰：‘我不问。’胜归遂死，诸子皆不得封。”《明史·冯胜传》说冯胜是被朱元璋“赐死”的。说明他是饮了朱元璋所赐毒酒暴卒于家中。“赐死”较之“胡党”、“蓝党”的屠戮三族和大批株连仍属较为体面的一种下场。

冯胜戎马一生,大有功于朱元璋的开拓和统一事业,对此朱元璋也是心中有数。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在赐给冯胜“世券”的诰词里说:冯胜兄弟二人与我亲同骨肉,十余年间协助我除肘腋之患,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统一大业。高度评价了冯氏兄弟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建立明王朝的功勋。同徐达、常遇春比较,冯胜在将材,特别在修养方面均不如徐、常。然而,常遇春洪武二年即暴卒,徐达洪武十八年逝去。单从时间上看,冯胜为朱元璋宣力最久,武功也甚著,洪武后期他已是武将中的班头,位高望重,踌躇满志了。他有贪欲,性又桀骜,这都不是大过。评价洪武时的功臣,朱元璋在打天下之时和得天下之后对功臣的不同态度要估计进去。他的猜忌多疑,严酷寡恩,网织罪名,必欲置功臣于死地的因素要估计进去。所以,史家评论:“冯胜功大,罪不能相掩。谪废可也,嫌死不可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这是比较公允的。回族思想家李卓吾论冯胜,则过于谴责其个人过失,认为“敢娶元妃以自肆,私夷财以自利也。吾谓不即枭首,已为大幸,乃犹以为可侯,吾不知之矣”。^① 这是偏激之言,甚不可取。

[马寿千]

^① 李贽《续藏书》卷四《开国功臣·宋国冯公》。

沐 英^①

沐英(1345—1392年),字文英,安徽定远人,明初重要将领。

沐英幼年时,父亲早死,随母避兵乱。母又死,八岁时被朱元璋收为义子,从朱姓。当时朱元璋已投郭子兴部下为兵,沐英小时是在战乱、兵营、征途中度过的。1356年(元至正十六年),朱元璋攻下集庆(今南京),改为应天府,派徐达攻占镇江,取得战略性胜利。沐英“数从上征伐,入侍帷幄,昼夜勤励”,十八岁被授帐前都尉,参与守镇江,开始担当军事要任。后擢指挥使,守江西重镇广信(今上饶)。1367年(元至正二十七年,吴元年),朱元璋派水陆军取福建,沐英将兵自西攻,破江西福建交界处分水关,下崇安,再破闽溪十八寨,俘陈友定部将冯谷保。再奉命移镇建宁,节制邵武、延平、汀州三卫(皆在福建)。

洪武三年(1370年),沐英被授镇国将军,金大都督府事;次年升本府同知。大都督府是明初军事中枢,掌天下兵马。当时府中机务繁积,沐英在府中七年,处事果断,剖决无滞,深得朱元璋器重。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派沐英前往关陕,体察民情,布上恩惠,又命他练兵准备征战。同年十一月,邓愈为征西将军,沐英为副将军,出征吐蕃。次年(1377年)四月,邓愈、沐英统兵至甘青,分三路前进,略川藏,兵威至昆仑山。回师途中邓愈死,沐英率师返回,因功封西平侯。

洪武十一年(1378年)八月,沐英为征西将军,和蓝玉等统兵

① 本文所用资料,主要引自李贽《续藏书》卷三《开国功臣·沐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二《太祖平滇》及《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

征西。初胜土门峡,再进俘洮州十八族头领。次年(1379年)二月,朱元璋命在洮州设卫,说“洮州,西番门户,今筑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置洮州卫。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命沐英率兵进击屯兵和林、由元国公脱火赤率领的一支残元势力。沐英由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渡黄河,越贺兰山,涉流沙,七日至其境。距其营五十里处,沐英分兵四路前进,一路袭其背后,两路左右夹击,沐英自率精骑正面冲击,四面合围,一举战胜,俘脱火赤及其全部。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军徐达奉命北征。沐英领兵出古北口,独当一面,再次胜利而归。

平定云南和治理云南,是沐英一生的最大功绩,时间从洪武十四年至洪武二十五年他逝世为止。

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三十万军征讨云南。朱元璋亲自安排进军路线,谕先取曲靖,出奇制胜,说:“曲靖,云南之噤喉,彼必拼力于此,以抗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制胜,正在于此。”沐英随傅友德等率主力逼曲靖。元梁王闻讯,派平章达里麻率十万众前去抵御。为了“出奇制胜”目的,沐英等率兵冲雾前进,迅速到达曲靖。明军突然出现,达里麻大惊。当时达里麻军列阵白石江一岸,明军临另一岸。傅友德欲即刻渡江,沐英不同意,说敌方已兵陈对岸,扼制水面,这样渡江于己不利。于是只摆出渡江的样子,临江而立,另派数十人从下流潜渡,到达对岸后鸣金吹角,大造声势,致使达里麻军阵势开始动乱,明大军趁机渡江。沐英以勇猛善泅者先行,登岸后破敌前锋,达军后撤。明军渡江毕,与达军展开大战。沐英纵铁骑直捣其中坚,战数合,达军大败,达里麻被俘,俘兵二万。被俘士兵悉数放还,各归其业,明军声威大振,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闻讯自

杀。沐英、蓝玉率兵直逼昆明,不攻而下。“自九月朔出师,迄下云南,仅百余日”。盘踞云南的残元势力被消灭。

云南西部大理一带,存在段氏割据势力。段氏世居大理已数百年。大理依点苍山,面洱海,号称天险。洪武十五年(1382年)闰二月,沐英随蓝玉将兵西攻大理。段氏聚众守下关(点苍山有上、下二关,又称龙首、龙尾关,守此二关大理可确保,下关尤为重要)。沐英、蓝玉遣王弼攻上关,自率兵攻下关,形成犄角之势;另派一旅攀点苍山背后而上,居高临下策应。沐英“身先士卒,策马渡河,水没马腹,将士随之,莫敢后,遂斩关而入”。段氏不知背后虚实,阵势溃乱,兵败被俘。攻占大理后,沐英、蓝玉或分兵其他地区,或下谕招降,云南西部大部归附明朝。沐英、蓝玉又取得平定云南西部的胜利。

七月,沐英率师返回滇池,和傅友德合兵镇平一些复叛地区。八月,朱元璋遣使谕傅友德、沐英下一步行动,并将全权交给他们。九月,当傅友德、沐英再次领兵征服一些地区时,土官杨苴散布明大军已回,纠众二十万攻昆明。当时守昆明的是冯诚(冯国用子)。城中缺粮,士卒多病,形势危急。沐英闻讯,率兵返回,和冯诚合力,确保昆明,稳住了局势。

洪武十六年(1382年)三月,沐英率数万众留守云南。

早在洪武十五年春,明廷就在云南设置都指挥使司、云南布政使司,建立起统理云南的军政机构。地方置卫、所,辟驿道,形成一套统辖系统。以后分云南为五十二府、六十三州、五十四县,民政系统渐趋完备。

沐英治理云南,首抓屯田,解决粮食问题。洪武十九年(1386年)九月,上疏朱元璋,说:“云南地广,宜置屯田,令军士开耕,以备储蓄。”朱元璋同意沐英建议,沐英令军士屯垦,既解决吃粮又稳固驻守,一举两得。沐英还招携省外人来滇屯田,一时云南屯田大

兴,粮食收获大有增加,沐英以屯田的增减考察官吏政绩,赏罚官员。主滇九年,屯田总数百万余亩,促进了云南农业的发展。

沐英组织民工疏浚河道,扩广滇池,兴修水利。招商人入滇,运进米谷帛盐,发展商业。开发盐井,增加财源。他还整修道路,保护粮运,使云南农商都有发展。

沐英增设府、州、县学达几十所,择选民间优秀及土官子弟入学,月赐饮膳,年赐衣服。他本人“居常读书不释卷,暇则延诸儒生讲说经史”。

在沐英治理时期,云南相当安定。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冬,沐英入朝。朱元璋赐宴奉天殿(皇帝办公的正殿),给予厚重赏赐。朱元璋高兴地说:“使我高枕无南顾之忧者,汝英也。”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六月,沐英病卒于云南,年仅四十八。朱元璋十分痛心,命归葬京师,追封黔宁王,谥昭靖,侑享太庙。

沐英去世后,子孙世镇云南。长子沐春十七岁随沐英征西,后又征云南,材武有父风,积功授后军都督府佥事。沐英死后,袭父职,镇守云南。修屯政,辟田三十余万亩;凿铁池河,灌溉宜良涸田数万亩,使五千余户民有生业。文治武功都效法其父,惜年仅三十六而卒。

沐春无子,其弟沐晟(沐英次子)继其位。沐晟喜读书,凝重寡言笑,得到朱元璋喜爱,历官后军左都督。永乐年间征南,论功封黔国公。正统四年(1439年)死于出征回师途中,赠定远王。沐晟承父兄业,久镇云南,名声远扬。沐晟子沐斌,年幼居京师,由沐昂(沐英三子)代镇云南。以后沐氏子孙相继镇守,直到明朝终,达二百多年。沐氏家族对云南发展作重大贡献。

[李松茂]

二 郑 和^①

家世和经历

郑和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航海家。

郑和(1371—1434年),云南昆阳(今晋宁)人。原姓马,人称三保太监或三宝太监。郑和的曾祖父叫拜颜,娶马氏;祖父称哈只,娶温氏;父亲称马哈只,也娶温氏。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前往麦加朝觐,故有哈只之称,受到乡里的敬重。母亲温氏,史书称其“有妇德”。郑和弟兄二人,哥哥叫文铭,或作文明,还有四个姐妹,其事迹不详。

洪武十五年(1382年),郑和十二岁,父亲病故,他投靠燕王朱棣,作了宦官。在燕王藩邸里,郑和的聪明才干受到赏识。建文元年(1399年),和二十九岁,从燕王举兵,出入阵战,多建奇功。燕王称帝后,和因功擢内官监太监,主管宫室陵墓的建造,采办宫廷婚丧礼仪所需珍宝、香料及珍奇异物等事宜。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初一,和被赐姓“郑”。

郑和历事成祖、仁宗、宣宗三朝,七次奉使远航,历南海及印度洋沿岸三十余国,行程十万余里,时近三十年。仁宗时,他曾任南京守备太监。宣宗宣德九年(1434年)郑和病逝,年六十四岁,赐

^① 本文所引用资料,除另有注文外,主要依据《明史·郑和传》;《明实录》卷一六八、一七〇、一八二;《天妃之神灵应记》、《通番事迹碑》,并参考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十章《郑和之下西洋》。

葬于南京的牛首山。^①

郑和死后,至今五百五十年有余,南洋各国人民仍旧奉他为神,立庙祭祀,香火至今不衰。

1985年,南京举行纪念郑和航海的大会。据报导,他在云南和南京的后裔,有数百人之多。

出使西洋

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声势最盛、影响最大的是永乐三年(1405年)、永乐五年(1407年)、永乐七年(1409年)和永乐十一年(1413年)。

西洋,在明代是指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洋诸地,约当于今之印度洋。^②明成祖即位后,疑惑建文帝逃到海外,又欲向海外炫耀中国的富强,决定派人出使西洋,郑和因“有智略,知兵习战、姿貌才知,内侍中无与比者”,被奉为正使。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郑和与太监王景弘开始奉命出使南洋群岛及印度洋一带。他率领一支有六十二艘船的船队,载有将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和大量金、帛、货物。据史载,郑和的宝船,船身最大者有四十四丈四尺之长,宽十八丈;中者有三十七丈之长,宽十五丈。船队从苏州刘家河出海,先到福建,再从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Champa),再历经爪哇(Java)、苏门答刺(Samudra)、南巫

^① 关于郑和墓,据明天顺元年(1457年)佚名氏所撰《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记载,认为郑和是第七次下西洋归国途中,于宣德八年四月初逝于古里;《同治上江两县志》也记载,卒于古里,赐葬牛首山。按此两说,郑和亡于古里,葬在国外。

^②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序例》中记:“今之所谓南洋,包括明代之东西洋而言,东西洋之称,似首见《岛夷志略》著录,然至明代始盛行。大致以马来半岛与苏门答刺以西,质言之,今之印度洋为西洋,以东为东洋。”

里(Lambri, 又称南渤利), 至印度古里(Calicut)返航, 于永乐五年(1407年)秋回国。此次出航, 所历之地远至印度西岸。南洋各邦国使者随郑和前来朝见者甚多, 明成祖非常高兴, 加赐爵位奉禄不等。

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 郑和复奉命出使西洋。他率领有二百四十九艘船的船队, 沿着首次开辟的航线, 先后到达了爪哇、古里、柯枝(Cochin)、暹罗(Slam, 今泰国)、锡兰(Ceylan, 今斯里兰卡)等国。郑和每到一处, 颁布天子诏书, 立碑文。服者, 赐给金帛, 不服者, 则以武力慑服之。在离开锡兰后, 郑和船队满载着各国贡献的珍奇异宝返航, 于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上旬回到南京。

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下旬, 郑和奉命第三次出航, 所率船只四十八艘, 官兵二万七千余人, 从刘家河出发。此次出航, 是要巩固明朝同南洋已通好国家的关系。船队所到之地, 在古里、满刺加(Malaka)、苏门答刺、阿鲁(Aru)、加异勒(Kayal)、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拔把丹、小柯兰、南巫里、甘巴里等国, 这些国家对明朝的态度和好如初。永乐九年(1411年)船队回京, 随同前来朝贺者有十九国, 当时的朝廷“万使云集”。

郑和回京后, 修整一年, 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 又奉命开始第四次远航。明成祖以印度沿岸以东更远一些的国家尚未臣服通好, 特命郑和等前往赍敕。据史书记载, 这次出使所历之地, 不仅远至忽鲁漠斯(Ormuz, 在今伊朗), 而且抵达了非洲东岸麻林(Melinde)、木骨都刺(Mogedoxu)、不喇哇(Brawa)等国。郑和于永乐十三年回国, 史书载: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戊子, 古里、爪哇、满刺加、占城、苏门答刺、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Pahan)、锡兰山(Ceylan)、木骨都刺、溜山(Maldives)……不喇哇、阿丹(Aden)、麻林、刺撒、忽鲁漠斯、柯枝诸国及旧港(Palembang)宣慰司, 各遣使贡马及

犀象方物。”

从永乐三年至永乐十一年的四次出航,郑和为明朝开辟了向海上发展的新纪录。

永乐十五年(1417年)十二月,郑和奉命护送前来朝贡的各国使者回国,并携有赠送各国国君的礼品,作第五次远航。这时的明朝,威望远震海外,它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发展起来,互市通商者,络绎不绝。明朝赠与和交换物品大多为丝绸、珠宝、瓷器等,换回大量的琥珀、珊瑚、珍珠、玛瑙、药材等,多数是供朝廷享用的奢侈品。十七年(1419年)七月前来朝贡者中,有诸国的王子、王叔或王弟,所献礼品也为各国珍奇异兽,如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麒麟、长角马哈兽、千里骆驼、鸵鸡、麋里羔兽等等。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春),郑和率大鲸宝船出发,第六次远航,于二十年(1422年)八月回到南京,随来的各国贡使总数达一千二百余人。郑和此次航行,据载曾远至非洲东岸。

宣宗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最后一次奉诏出使西洋。明成祖去世后,仁宗继位不到一年便也故去。宣宗继位后,海外诸国前来朝贺者渐少,宣宗决定重振国威,再行通好。是年闰十二月,郑和始行。这次远航距第六次的航行归来,已间隔六年之久了。这时的郑和,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行至古里时,已是宣德八年(1433年)三月了。郑和自此回国,七月到京。郑和船队的分鲸则奉命前去天方,得各种珍奇和天堂图真本于宣德九年(1434年)回京。

郑和前后七次出使西洋,航程最远者到达非洲东岸,他率领的船队的分鲸远至红海和麦加。在出使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明成祖对海外各国采取的是恩威并施的招徕政策,如前所说:“服者,赐以金帛,不服者,则以武力慑取之。”郑和在第一次航海途中,

经旧港,其酋陈祖义,甚豪横,称霸海上,劫掠过往商旅。欲谋郑和,被郑和缚回南京,诏戮于都市,除掉了阻碍海上交通的一大障碍。郑和第二次出使西洋,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独持不恭态度,派兵五万余,欲劫和舟,郑和趁其国内空虚,亲破其城,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家眷官属,带回南京。明成祖为了向海外诸国表示圣明,放他归国,又另立了锡兰国君。朝贡者日以渐多。郑和第四次出航,途经苏门答刺。苏门答刺原国王受那孤儿(Battak)国花面王侵扰,战时中药箭而死。当时有一渔翁率众杀死花面王,收复失土,替先王之子报了杀父之仇。先王妻如约,奉渔翁为国王。先王嫡子长成后,欲夺回王位,谋杀渔翁,赶走其子苏幹刺。郑和来到后,将王位赐给先王之子,追擒苏幹刺于南渤利(即南巫里),回朝后,诛苏幹刺。新王立,感明朝威德,朝贡不绝。郑和在航海过程中擒王摧敌,数建奇勋。

自宣德九年(1434年)归来后,明朝虽然也间或有船队出洋,但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影响之深都远不及郑和,明朝在海外的声誉也大不如前了。前来朝贡的海外侍者、通商客旅,比起永乐年间,就十分稀落了。

郑和远涉边陲,排除险阻,为明朝跟海外各国的通商和友好往来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航海纪录的最终完成,比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达·伽马于1498年到达好望角要早半个多世纪。根据郑和航程绘制的《郑和航海图》,共二十图,四十面,记有航向、方位、航程、停泊地点、暗礁浅滩、港口等,是我国最早的一份远洋航海图,对后世航行西洋提供了重要依据。郑和率领的船队规模之大、历时之久、造船在工艺上的成就,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杨怀中〕

三 马文升^①

司法官的风裁

马文升是明代回族著名政治家。

马文升,字负图,别号约斋,又号友松道人,世居河南钧州(今河南禹县)。其高祖马伯川,曾祖马献,祖马志刚,父马某,都未入仕。文升兄弟四人,长兄文玉,次兄文麟,弟文驭,事迹不详。

文升生于宣宗宣德六年(1426年)八月二十七日,他幼聪好学,为父兄及尊长所称道。正统十二年(1447年),文升二十二岁,参加乡试,中了举人。景泰二年(1451年),马文升中了进士。吏部尚书王直赏识文升的才华,推荐他任浙江道监察御史。这是一个司法的官职。文升勤力自勉,得到了主领御史台事的王文、王翱的礼遇和器重。文升在御史任上,先后出按山西和湖广,所到之处,剪暴除奸,震动甚大,有“神君”之称。

英宗天顺七年(1463年),文升出任福建按察使。他一到福建,就解决了拖延了十七年的王小三冤案。福建当道冯某,贪暴横行,百姓为患。唯有文升能使他稍有收敛。由于文升为官清正,廉明奉公,风裁甚著,成化元年(1465年),他被召为南京大理寺卿,成为掌管断案审案的主官。当他离开福建时,福建的百姓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马使留来天有眼,冯公不去地无皮”,以表示对他的赞扬和怀念。

^① 本文引用资料除另有注文外,主要根据《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马端肃公奏议》卷首《马公行略》及《马公墓志铭》。

边事功绩

成化四年(1468年)平凉、固原一带有满四变乱,官军进讨不利,形势甚为紧急。九月朝廷急召当时因父丧而归家的马文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协助总督项忠等对满四进行围剿。马文升迅速赶到固原,擒获了满四,解了明朝边疆之危。文升以功擢为左副都御史,继续巡抚陕西。他在陕西修筑关塞要隘,增设卫所,选将练兵,还用茶法向北方少数民族交换了八千多匹壮马装备了军士。待防务能力得到加强后,文升又平定了西北一带与朝廷对抗的割据势力。成化九年(1473年)冬,残元李罗忽、忽都鲁、乱加思兰等率军队分多路进犯边镇,文升一一击败,并擒获其平章迭烈孙,声名大震。文升还向朝廷请得了五万两银子及数万石粮食赈济受灾百姓。文升在陕西数年,苦心经营,基本上实现了西北地区的安定。成化十一年(1475年)春天,文升进为提督甘、凉、宁夏三镇军务。

不久,文升进为兵部右侍郎,十四年(1478年)又进为左侍郎,十九年(1483年)再进为左副都御史。这期间辽东多事,文升先后三次受朝廷派遣巡抚辽东,整饬辽东军务,安抚了辽东一带的女真等少数民族部落。他修城堡,练兵士,利兵甲。特别注意抚恤军民,整肃军纪,从而使百姓安业,社会宁靖。

弘治初年(1488年),新疆哈密卫被土鲁番人占据。为了重新赢得朝廷对哈密的控制,弘治四年(1491年),已任兵部尚书的文升向朝廷提出:哈密归附元朝时间较长,其地方“有回回、畏兀儿、

哈刺灰三种”^①人,而“北山又有小列秃也克力相侵逼”,^②必须派元人后裔去管理,方可慑服其地。孝宗采纳了文升的这个意见,封原哈密忠顺王脱脱的近族后裔名叫陕巴的为哈密新忠顺王,并派人亲自送往哈密。这一举动惹恼了土鲁番统治者阿黑麻。弘治六年(1493年)阿黑麻夜袭哈密,劫走了陕巴及明朝授予的金印。消息传入朝廷,引起明朝政府的严重关注。首先,在马文升的建议下,明朝廷拘留了土鲁番派遣入贡的使者亦满速儿等四十余人。随后,文升请求亲自往哈密一行,开始时他不主张用武力解决哈密问题。他认为“西域贾胡,惟图窥利,不善骑射,自古岂有西域为中国大患者,徐当静之”。当朝廷对这一问题讨论时,担心文升若去哈密,四方兵事无人能管,因而没有同意文升的请求和意见。弘治八年(1495年),阿黑麻愈肆骄横,于是文升挑选了精锐之兵,派遣总兵刘宁、巡抚许进等率领,联合西北军一道日夜兼程,奔袭哈密,迫使阿黑麻于弘治十年(1497年)送回了陕巴,哈密又重新置于明朝的控制之下。

文升还曾向朝廷陈奏了“御边三策”,就如何加强明朝边防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建议。在加强宣化、大同的防御方面,处理贵州及安南等处少数民族与官府的纠纷方面,文升同样为朝廷立下了功劳。

辅佐朝政

弘治年间,是文升仕途中较受朝廷器重的时期。孝宗还在东

① 回回,这里主要指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畏兀儿,指当时仍信仰佛教的维吾尔人;哈刺灰,指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

宫时，素闻文升之名，知文升之贤。他即帝位后，召见了文升，并赐大红金织衣一袭，拜为左都御史命掌院事。自此，文升成为孝宗身边的重臣和近臣，孝宗行事，文升往往不离左右，即使孝宗到太学读书，文升亦常随从听讲。文升“偶有龃龉”，孝宗“皆以身当之”。弘治二年（1489年），因文升久历边事，熟知戎务，被进为兵部尚书兼提督十二团营。此后，累官至吏部尚书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忠心耿耿供事于朝。他的政治业绩，概括有以下几方面：

一、整肃军旅 鉴于正统以来明廷与各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瓦剌、鞑靼等部落的冲突较多，而明廷军事力量日趋削弱。因此，文升在兵部任上时，极力主张整肃军旅，并采取了许多措施。

文升认为：“克敌制胜，莫先于军事之效劳，养锐蓄威，必在乎衣食之充足。古之名将，所以与士卒同其甘苦而颇加犒劳者，盖以此也。”^①他提出了“军心”及“富国”才能“强兵”这个根本问题。他很注意了解军心，关心士卒生活。他对军卒的衣食、哀乐、所想、所为乃至家庭赡养、家乡种纳等情况都能详细了解，他能够比较公允地体贴下层军卒的甘苦，从而向朝廷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明确指出：士兵们之所以不很好地喂养自己的马匹，之所以不很好地进行操练甚至不安心于自己的守卫，皆为军官的敲榨勒索所致。他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军中将领进行了严格的挑选，凡不合要求的，一律予以汰除。一次，文升因罢黜贪懦将领三十余人而惹起大怨，有人夜持弓弩，藏于他家门附近，还写下了文书射入东长安门内，对文升进行诽谤。孝宗闻知此事后，立即严令锦衣卫校官缉访，捉捕罪犯，并赐配文升十二名金吾骑士，护卫他的出入。

^① 《抚军士以蓄锐气疏》。

文升指出：“近年朝廷派出的将官，往往跟有同事官员，他们之间“偏执己见，各逞所长，不相协合”，如此下去，只能是“徒劳王师远出”，“欲望成功，盖亦难矣”。^① 因此，他多次建议朝廷，直接召集各路总兵共同商量防守事宜。

文升主持兵部十三年，不但在严军纪、择良弁、刊武书、熟操练、习兵法、利甲兵等多方面有所建树。而且在屯田、马政、储备等方面，亦数上奏折，提出建议。他自己还亲自制定了五花营八阵图法教授于士兵。

二、辅君恤民 文升从他的亲身经历中领悟到“民心”的得失是直接关系到明朝统治能否巩固的要务。因此，“安民”、“抚民”，可以说是他政治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天下之生财有限，不在官则在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宗社之安危系焉”。^② 要安民心，首先要爱民，“自古人君之有天下，未尝不以爱养斯民为首务也”。^③ 文升把爱民与节俭联系起来，多次上疏提出“爱民者必先于节用”，^④ 他提醒皇帝要“视民如己之子，节财如己之肉”。^⑤ “存一分，国有一分之益。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⑥ 在漕运、赈济、赋税、徭役等方面，要减轻百姓的一些负担和痛苦。文升在职权范围和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力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弘治初年，文升又上《陈治道疏》，提出了选贤能以任风宪；禁

① 《计议防虏方略疏》。

② 《恤民弭灾再奏疏》。

③ 《恤百姓以固邦本疏》。

④ 同上。

⑤ 《陈灾异疏》。

⑥ 《恤百姓以固邦本疏》。

撙拾以戒赃官；择人才以典刑狱；责成效以革奸弊；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核以示惩戒；禁公罚以励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士兵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敦怀柔以安四夷；节财用以苏民困；足兵戎以御外侮等十五条时政主张。

文升是封建官吏，他希望君主的“圣明”。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出发，他也能对皇帝提出一些劝戒，如：请谕教皇储；请勤于政事；阻止册封妃嫔等。弘治元年（1488年）二月，孝宗刚即帝位，教坊司以杂戏进于孝宗，戏中或出狎语，文升厉色说：“新天子当使知稼穡艰难，岂宜以此渎乱宸聪。”将其斥退。然而，当御史徐瑁、贺霖违背了皇帝的旨意，孝宗欲将其治罪时，文升又劝戒皇帝：即位之初，不宜治罪朝官。这两件事，反映出文升为辅君“圣明”，是用尽心思的。

三、整顿吏治 文升针对吏治混乱，贪官污吏充塞朝府的现象，极力主张振作纲纪，整顿吏治。为此，他提出必须“申明律意”，实际上就是要重视《大明律》的作用，以法治国。文升亲眼目睹和具体感受了朝廷官员于律多“置而不讲”，以致造成“伤和启灾”之危害。他要求天下大小衙门并两京都属官吏，必须各置《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读，用心讲解，务晓其意”。^①并通过各处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巡官遵照《大明律》的规定，对官吏进行考校，凡不称职者，该降该罚，依律施行。

文升整顿吏治采取的又一措施是裁汰冗官，选任贤能。他看到了贪官污吏败坏士风，紊乱纲纪的严重性，还在弘治初年，文升

^① 《讲明律意疏》。

即协助当时的吏部尚书王恕考察五品以下官员，汰除冗职二千余人。^①弘治十四年（1501年），时文升已近八十高龄，按例早应当退，因无适当的继任人选，廷推又荐文升为吏部尚书。不久，文升即上言三事，一曰裁冗官，二曰杜奔竞，三曰革滥进，都得到孝宗的采纳。^②弘治十七年（1504年）八月，孝宗早朝毕，将文升召入暖阁，对文升说：“明年又值天下诸司百官朝觐之时，卿一定用心访察，以求择黜至当。”因文升年高耳聋，孝宗再呼而曰：“卿听得见么？”仍命宦官扶其下阶而还。次年五月，孝宗死。文升以承遗诏的名义毅然汰去传奉官七百六十三人，表现了他的魄力。

明朝中期政治腐朽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宦官专权。文升经历了英宗朝王振、曹吉祥，宪宗朝汪直，武宗朝刘瑾等宦官窃权乱政的时期，他曾对宦官进行过不同层次的斗争。他也受到宦官不少的迫害。文升在巡抚辽东时，因战功受到宦官汪直的妒恨，遭到诬告，被拘捕入锦衣卫，以后又发配到重庆。一直到汪直伏诛，文升才得以获释复官。弘治初年，太监陈喜等打着皇帝的招牌在祠庙内伪撰碑文，以刮骗百姓的财物，文升察知后，即上《祛除邪术以崇正道疏》，陈述利害，并借皇帝之名义除去了此害。

正德初年，当文升承孝宗遗诏汰除传奉冗官后，太监王瑞又以“成造大婚礼器”为借口，请求起用新汰者七人，文升坚持不从，他说：“此辈皆本部考黜冗食人数，不可再录。”表示了他与宦官斗争的决心和革除弊政的意志。王瑞诬陷文升“违上欺君”，武宗竟听信王瑞之谗言，内外大臣们都为文升力辩，给事中安奎称：“陛下于老臣马文升之论列尚且置之不信，拒之不从，但不知此外可信从者

① 《马端肃公行略》。

② 《明史纪本末》卷六二〇。

何人？”才使文升免蒙危难。这时，朝中政柄已为宦官把持，且文升年事已高，他连续上了二十一道奏疏，辞去了官职，结束了他的仕官生活，回到家乡。归家后，文升足迹不到城府，而屏居于三峰山之别墅中，又更号“三峰居士”。取周公明农意，匾其堂曰“乐农”。在文升回家后三年，宦官刘瑾乱政，竟又罗织罪名，将文升予以除名，其家小皆遭株连。在文升被除名的第二年，即正德五年（1510年）六月八日，文升即含愤逝世，时年八十五岁。文升逝世后，葬于家乡以北大隗山麓。一直到刘瑾伏诛，文升之冤，才得以昭雪，被追赠为特进光禄大夫、太傅，谥端肃。嘉靖初年，又加文升左柱国、太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皆因文升而赠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和一品夫人。

奏议和诗文

史籍载，文升“能以功名全其始终”，“好学读书，春秋虽高，手不释卷，凡子史及性理诸书皆能熟记，为文尚理趣，诗亦典重，有《约斋集》及《奏议》、《三事记》若干卷行于世”。《约斋集》已佚，《奏议》今有《马端肃公奏稿》十六卷本、《马端肃公奏议》四库全书十二卷本。另外，文升还有《西征石城记》、《抚安东夷记》、《兴复哈密记》三篇记述自己经历的散文，合称《马端肃公三记》，流传于世，有多种版本。

文升一生为官，他的文章也几乎全部与时政有关。其奏疏陈词恳切，心诚情溢，辩理性强。他的奏疏中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

文升能文亦能诗。明代李维桢、罗文肃都曾为他的诗作过序。明末清初人钱谦益辑《列朝诗集小传》时，亦曾为文升作传。可见钱谦益时代，文升的诗集还流传在世。现今所存文升诗，仅在清刻

本《马端肃公奏议》之后附录有若干首。他的诗同样与时政相关,《南征过桃花源》、《抚陕征西过陇关》等诗,都有边塞诗的特点,这与他多年的戎务生活是分不开的。

文升有四子,长子璵,曾任六安州知州,累进阶亚中大夫。最初,璵曾以乡贡士待选于吏部,文升请求将其外放任职。当时,朝廷权贵子弟,多留作京官。文升说:“大臣的儿子都必须做京官,外边的官谁又去做呢?”明人王鏊曾有《赠和六安州马大夫序》,即是为璵写的;次子琇,曾随文升征战于陕西,做过锦衣卫指挥;三子玠,为七品散官;四子璐,武举出身,官至锦衣卫冠带舍人。文升另有女五人,均不见史传。

〔丁 力〕

海 瑞

家世和早年政治生活

海瑞(1515—1587年),字汝贤,又字国开,号刚峰。明初著名政治家、清官。正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15年1月12日)生于广东海南琼山。海瑞祖上原居福建,后移居广州。先世海逊之,明初任广州卫指挥。海逊之的儿子海答儿,洪武十六年(1383年)从军海南,遂为琼山人。海瑞祖父任知县。父亲海翰是廪生,于海瑞四岁时死去,留下祖田十余亩。海瑞母亲谢氏教海瑞读书,笃责甚严。海瑞幼时生活相当清贫。

海瑞生当正德万历年间,是明朝由盛转衰的时期。这时外患严重,朝政腐败,人民苦难深重,阶级矛盾尖锐。当时一首民谣说:“天子重权豪,开言惹祸苗,万般皆下品,只有奉承高。”人民渴望抑强扶弱,刚正清廉,直言敢谏,为民说话的好官出现。

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1554年1月),海瑞出任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儒学教谕。到任后制定教约,规定“诸生参见拜揖外,不许更执货物以进。凡俗例所云送节酒食饌先生者,俱不许举行”。^①即学生见先生只作揖,不许送礼。有一次,延平知府等官员来儒学视察,迎接的人都跪下,唯独海瑞不跪,只站着作揖。理由是“学官无跪礼,唯长揖请拜”。在场的人十分惊讶。又有一次,巡按御史到南平来,海瑞带领学生迎接,自己仍揖而不跪。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知县。到任后,

^① 《教约》,《海瑞集》上册第17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看到的是一片荒凉残破景象。他说：“瑞自滨海入中州知淳安县事，初阅册籍，民之逃亡者过半，问之则曰惫困不能堪赋役，朴直不能胜奸强使之。”^①“有田者无税，无田者反当重差。……苦乐不均，民穷为甚。”^②海瑞清丈均徭，按土地面积分摊赋役，减轻百姓负担，打击豪强；招抚流民，安置生产，解决了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当时倭寇骚扰严重，人民受害极大。海瑞以现成的保甲法组织乡民自卫。在《保甲法再示》中他说：“盖此法行则人各有亲爱邻里之心，知进退攻击之法。平时相亲爱，临难必相救援。假使倭寇至一县，则一县足以御之；至一图，则一图足以御之；至一村，则一村之人又足以御之矣。家自为守，人自为战，何事客兵！”^③海瑞说：“保甲法于御侮有大益。”

在淳安任上，使海瑞声名传扬的，是他平冤狱、断疑案，开始以人民敬重的“清官”出现。淳安县有胡、邵二姓，因争山地结下冤仇。胡姓有胡胜祖得病死去，其弟假造伤痕，诬告被邵姓打死。海瑞派人验尸，发现胡弟属诬告，没有造成冤案。^④

和淳安县同属一府的桐庐县，有一凶杀疑案多次审理未能结案。因海瑞审案有名，移交海瑞审理。海瑞多方调查，反复分析，判明此案系由谋财而起，案情大白。^⑤

在淳安任职期间，海瑞拿办了总督胡宗宪的儿子，顶回了要前来巡查的都御史鄢懋卿。胡宗宪时任浙江总督，权势很大。他儿子路过淳安，胡作非为，海瑞将其拿办，送交胡宗宪。鄢懋卿是权相严

① 《淳安县政事序》，《海瑞集》上册第37页。

② 《量田申文》，《海瑞集》上册第159页。

③ 《保甲法再示》，《海瑞集》上册第185页。

④ 《胡胜荣人命参语》，《海瑞集》上册172—173页。

⑤ 《徐继人命参语》，《海瑞集》上册第175—176页

嵩亲信,以左副都御史身份出京巡查东南盐政,一路挥霍,残害人民。但又发布告示,说自己“素性简朴,不喜承迎”。海瑞写信给鄢懋卿,说不按告示接待,会违背鄢爱民的好意;按告示上接待,又和鄢已过之处受到的隆重接待不同,不知如何是好。鄢懋卿知道海瑞秉性刚直,可能给他难堪,连淳安县所在的严州府界没进就绕道而去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海瑞调升嘉兴通判,鄢懋卿同伙诬陷海瑞,海瑞被削职改任江西赣州兴国知县。到任后,海瑞提出治理兴国八项建议,包括屯田、均赋役、招抚流民、革冗员等,和在淳安的施政措施差不多。当时有前兵部尚书张璠闲居南昌,其侄张豹、张魁到兴国榨取民财,欺压百姓,海瑞将他们治罪,平了民愤。海瑞在兴国任职一年多,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调任京官,离开了江西。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海瑞早年就关心海南的民族关系,研讨协调汉黎关系的政策。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以一篇时论文章《治黎策》中举。在文中,他提出了治理海南岛黎族的一些办法。海瑞主张发展海南交通,增加黎汉接触,减少仇视隔阂,反对对黎族用兵,但未被采纳。次年,他又以举人身份上《平黎疏》,重申他的建议,并附海南地图,加上说明文字,仍无人理睬。海瑞的治黎建议石沉大海。

海瑞到京后,任户部云南司主事。这时在位的嘉靖皇帝,二十余年不理朝政,炼丹求仙,妄想长生不死;大修宫观寺院,劳民伤财。官员乘机搜刮,民怨沸腾,危机四伏。海瑞上疏说:“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大臣持禄而外为谏,小臣畏罪而面为顺”。老百姓穷困不堪,讥讽嘉靖的年号是“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他劝嘉靖皇帝振作起来,说自己“披肝胆

为陛下言之”，完全出于忠心。这就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①时在嘉靖四十五年，海瑞年五十二岁。海瑞知道触犯皇帝要犯死罪，上疏前与家人诀别，安排好后事。上疏后，海瑞被捕入狱，随时可判死刑，首辅（宰相）徐阶等人设法救援。嘉靖重病在身，不久死去，新帝继位，海瑞被释放出狱。

海瑞出狱后，仍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旋改任兵部武库司主事。隆庆元年（1567年）擢尚宝司司丞，后又升任大理寺寺丞，同年又升为南京右通政。隆庆三年（1569年）六月，海瑞调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

疏浚吴淞 清理田赋

应天十府包括今江苏、安徽两省大部地方，多为富饶之地，但海瑞到任后，看到的却是民生凋敝的景象。这是因为“江南粮差之重，天下无有，古今无有”。老百姓土地大部分被豪强霸夺。海瑞巡历松江，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②此外，自然灾害也是重要原因。原来，这个地区的富庶是靠太湖水利，而太湖水量大时又靠吴淞江疏泄入海。吴淞江年久失浚，淤积严重，每遇大雨，太湖水入海不畅，泛滥成灾，水利变成水害。海瑞到职这年又值大雨，灾民遍地。海瑞上疏请求疏浚吴淞江，说：“吴淞江一水，国计所需，民生所赖，修之举之，不可一日缓也。”劳力从何而来呢？“吴淞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一举两利。”^③海瑞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将当时准备的救济粮食发给灾民，领粮

① 《治安疏》，《海瑞集》上册第218—221页。

② 《被论自陈不职疏》，《海瑞集》上册第237页。

③ 《开吴淞江疏》，《海瑞集》上册第231—232页。

者必须出工。灾民很多,劳动人手不愁不够。海瑞亲自巡视吴淞江,派人测量淤积长度,确定疏浚面积。结果量得应浚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三尺。江面原宽三十丈,加宽十五丈。隆庆四年一月动工,由于海瑞督导得力,百姓积极,二月完工。海瑞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隆庆四年、五年,又有大雨,没有造成水害。疏浚吴淞江快结束时,又着手对白茆河进行疏浚。白茆河对疏泄太湖水入海亦极必需,当时的白茆河亦淤积严重。

治服天灾同时,海瑞令豪强退田,解决百姓土地被强夺问题。当时这一带最大地主是原任首辅的徐阶和其弟徐陟。徐家拥有大量田亩,徐阶子侄横行乡里,作恶多端。徐阶于隆庆二年告老还乡,海瑞恰于隆庆三年到这里做官。徐阶在朝廷任首辅时救过海瑞,海瑞令豪强退田动不动徐阶,成为能不能推动退田的关键。海瑞不顾情面,不念私情,令徐阶退田。徐阶不好公开拒绝,退出田亩约半数,子侄受到制裁。其他豪强见海瑞连恩人徐阶都不放过,也纷纷退田,或逃避外地暂时避风。退田一事取得很大成绩。

在赋税制度上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一种简化的赋役制度,将田赋和各种徭役合并,除秋粮外,一律征收银两,防止地方官层层加码。这在一定条件下,于减轻农民负担有好处。

海瑞的退田、推行一条鞭法,妨碍了地方豪强大地主的利益,他们串通朝廷反对海瑞,说海瑞“庇奸民,鱼肉搢绅,沽名乱政”。^①海瑞被解职,在应天巡抚任上仅半年多。

清廉的一生

海瑞被解职后感慨万端,给人写信说:“生已促装南归,……这

^① 《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

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从此入山之深,入林之密,又别是一种人物矣。”^①又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纷纷口舌,何自而起?……人情世态,天下事亦止是如此而已矣,能有成乎!母子天性,熙熙山林,舍此不为而日与群小较量是非,万求一济,何益!何益!”^②隆庆五年,海瑞回到家乡,过上了闲居生活。

海瑞自幼丧父,跟着母亲长大。在南平、淳安、兴国做官时,把母亲接到身边。在北京做官时因北方天气冷,母亲没有来。到南京任职后又把母亲接去。应天巡抚职被革后,海瑞和母亲回到家乡,时谢氏已八十余岁,不久逝世。海瑞用别人送的赠礼买了一块坟地将母亲安葬。海瑞做官十几年,没有多少积蓄,仅用历年积攒的百多两银子买了一处住宅,土地还是祖上留下的十余亩田产。有人冒他的名义放债,他知道后严加追究。他在外做官,不收礼,不受贿,在淳安任知县时,在衙门里种菜,令家人上山砍柴,母亲过生日时买了两斤肉,被权豪视为寒酸,传为笑谈。

海瑞在家闲居时,由于名声大,经常有人请他写哀祭、赞颂、墓志、赠序等类文章,他自己也写些诗、杂记、序跋之类,还写了《元祐党籍碑考》。海瑞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没有成体系的学术著作留下来,留给后人的主要是书信、奏疏,从政和施政措施的文字。他也曾在家乡将自己的奏疏、书牍整理成《备忘集》刻印,分赠亲友。

时光流逝,很快过去十几年,海瑞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由于别人一再推荐,万历十二年冬,明神宗决定重新起用海瑞。次年一月任命海瑞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赴任途中,又被改任为南京

① 《复吴悟斋操江都院》,《海瑞集》下册第441页。

② 《再启阁部高中玄诸公》,《海瑞集》下册第424页。

吏部右侍郎,署吏部尚书。海瑞到任后,不改当年刚直清廉精神,虽年逾古稀,仍要做一番事业。发布《禁革积弊告示》,废除各衙门开票令街商无偿供应物品的陈规,明令规定:以后再有此事,“虽小费一分一文,不及先日万分之一,亦不姑恕”。^①当时吏治腐败,贪污成风,连负责监察的御史也不例外。海瑞决心整顿吏治,而且从御史下手,主张恢复明初旧制,廷杖失职御史。海瑞的“刚”主要表现为实施自己政治主张的坚定性,是政治家的“刚”,不是个人性格问题。他为贯彻自己的政治见解,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屡遭诬陷,不怕丢官、坐牢甚至杀头,表现了一个封建政治家的高贵品质。他自号“刚峰”是当之无愧的,是有名有实的。

海瑞主张廷杖御史的消息传出后,御史们惶惶不可终日,作恶多端的提学御史房寰“恶人先告状”,上疏奏劾海瑞。说海瑞“贬夺主威”,“损辱国体”,“指孔孟为贪夫”,“曰皇上为中人”,肆意抬高自己。尽是些空泛之词,没具体内容。海瑞上疏申辩,据理驳斥。明神宗以“是非自有公论,不必辩”为托词,不明确表态。海瑞要求告老还乡,神宗不准。事情越闹越大,为海瑞说公道话的越来越多,神宗迫于形势,将房寰免职。但当时的海瑞已重病在身,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四日(1587年11月13日)在南京逝世了。

海瑞逝世的消息传出后,百姓奔走相告,如失亲人。海瑞灵柩从南京经水路运回家乡时,江两岸站满了送葬人群,表达了人民对海瑞的悼念。

[李松茂]

^① 《海瑞集》上册第288页。

四 李 贽^①

家世和仕途生活

李贽(1527—1602年),字卓吾。明代后期进步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泉州府晋江县(今属泉州市)人。泉州自宋元以来成为我国主要对外通商港口,且为伊斯兰教早期传入我国地区之一。据李贽家谱记载,李贽一世祖林间是个大商人,“常扬帆海外诸国”。二世祖林驾经营范围更广,不仅“壮年航吴泛越,为泉巨商”,洪武年间还发舶西洋忽鲁谟斯,并娶色目女为妻,“遂从其教,受戒清净寺教门,号顺天之民”,且“终身不革”,成为虔诚的穆斯林。李贽的祖父林义方、父亲林白斋不再经商;林白斋以教书为业,因此李贽从小受到良好教育,肇基了其文化素养。

李贽家族中有姓林的、姓李的,林李同宗,一宗两姓。李贽原姓林,名“载贽”,后避讳去掉“载”字,又改姓李,成了“李贽”这个名字。李贽自号温陵、百泉、思斋、宏甫居士,还称龙湖叟、李老子等。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李贽二十六岁时,考中举人。学而优则仕。嘉靖三十五年出任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李贽性格倔强,因与“县令、提学触”,在此为官五年,很不得意。三十九年,出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到职仅数月,因父林白斋病故,回乡奔丧。时当倭寇在沿海作乱,李贽艰险备尝。守丧期满,携眷到北京,先以教书为业,后得到和在南京同样的职务。不久祖父又去世,因父已

^① 本文引用资料除注明者外,皆据中华书局版《焚书》、《续焚书》和《藏书》、《续藏书》。

早逝,李贽不得不再回乡料理丧事。他将妻子和三个女儿安置在河南共城,个人回乡。丧事完毕后李贽回到共城,两个女儿在贫病中死去,李贽和妻子相见,悲痛异常。嘉靖四十五年李贽再到北京,补礼部司务缺。任职期间,研读王阳明学说,深受影响,十分满意,说:“五载春官,潜心道妙。”隆庆五年(1571年),李贽重到南京,任刑部员外郎。期间与王阳明弟子及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王畿、焦竑、耿定理、罗汝芳等友好,师事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襍。泰州学派反理学,李贽从此走上反理学的道路。万历五年(1577年),李贽离开刑部到云南姚安任知府。这是他一生做的最大的官、也是最后的官,时年已五十。他将女儿、女婿留住湖北耿定理家,由于妻子的坚决要求,妻子同往。李贽在任上从政简易、清廉,虽不能说无为而治,但不扰民。任职三年期满,离开时,“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①李贽两袖清风,只带几卷图书,离开云南返湖北,结束仕途生涯。

李贽一生做的多是小官、冷官,自己又不热中官场,所以无多少政绩可言。但二十多年的仕途生活,给了他读书的机会,接触了泰州学派,为他以后成长为进步思想家创造了条件。

反理学的进步思想家

理学又称道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带有浓厚的禁欲色彩。它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说“人欲尽则天理存”。李贽在与泰州学派接触后已走上反理学道路。云南姚安知府任结束后,回到湖北黄安耿定理处,客居耿家,一方面教授耿家子弟,一方面自己读书。李贽和耿定理志同道合,亲密无间,但和

^① 光绪修《姚州志》卷五“循吏”。

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不合,因耿定向是道学的代表人物。万历十二年(1584年)耿定理去世,李贽不宜在耿家住下去,移居黄安邻县麻城。麻城东三十里有龙湖,景色秀丽,环境幽静,李贽送走家人,在这里“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过上专门的读书生活,并同理学展开激烈斗争。李贽在这里完成自己的主要著作《焚书》和《藏书》,以及后人为他编辑的《续焚书》和《续藏书》,成就了他作为进步思想家和史学家的事业。

李贽反理学的进步思想主要体现在《焚书》和《续焚书》中,这是他的书信、诗文、杂论汇集。针对理学鼓吹的禁欲思想和说教,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把人欲合理化。理学的禁欲主义尤其表现为对妇女的摧残,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禁止丧夫的年轻妇女再嫁,一座座贞节牌坊就是他们摧残妇女的罪证。李贽不同意这种封建礼教,把被封建道德斥责的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说成是“正获身,非失身”,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自然合理的现象。他收授女弟子,更遭到道学攻击,甚至激烈的人身毁谤。道学轻视妇女,鼓吹男尊女卑,谓女人见短不堪学道。李贽对此尖锐地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这在封建社会的当时,是可贵的男女平等思想。理学以虚伪为特征,李贽揭露道学家的虚伪,说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他们“无才无学”,“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李贽特别揭下耿定向的画皮,说他“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可他“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在《答耿司寇》中,李贽说他“所讲者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耿定向言不顾行,行不顾

言,言行相悖,是道学虚伪的典型。李贽的《答耿司寇》是声讨理学的檄文,同道学战斗的光辉篇章。

李贽的史学进步思想主要包含在《藏书》中。这是李贽的读史著作,分《世纪》、《大臣传》、《名臣传》、《儒臣传》、《武臣传》等,论述了从战国至元末的八百个历史人物。将“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誉为“千古一帝”,称农民起义领袖为“匹夫首倡”,把陈胜、窦建德和帝王并列,背离封建正统观念和儒家是非标准。他说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甚至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说“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这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思想观点,直到五四运动反对封建纲常礼教时,人们还以他的著作为武器。李贽的《续藏书》编成于李贽逝世后,书中叙述明代历史人物,从明初至明神宗以前的约四百余位,分《开国名臣》、《开国功臣》、《逊国名臣》、《靖难名臣》、《内阁辅臣》、《经济名臣》等,是研究明代史、特别是明代历史人物的重要著作。由于成书于李贽去世后,有人认为并非全是李贽著作,需加以考辨。^①

李贽的文艺思想亦有独到之处,并通过文艺评论表现了他的历史进步观点。文学观点集中在他的《童心说》一文,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又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李贽的意思是写真实,发真情实感,才能写出好文章,这不仅是李贽的重要文艺思想,亦可视为他在文学领域对道学虚伪的批判。他还通过对《水浒传》的评点,表达他的进步历史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他说

^① 参见白寿彝主编《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续藏书〉考辨》一文。

《水浒传》是“发愤之所作”，《水浒传》中的人物“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武松视虎如蚁”，“一味刚直，那得不使人敬仰”；“黑旋风禀忠直之性，即一味莽撞，大有可用处。好打强人，最是快人”；“梁山泊诸兄弟，……其义气之重，千古无两”。他甚至认识到，《水浒传》中的人物所以造反，是因为“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封建腐朽统治的结果。李贽通过评点《水浒传》表现出来的这些进步思想和观点，是他整个进步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其进步思想在文艺方面的表现。

不幸的晚年

恩格斯说：“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褻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①李贽正是这样的叛逆，他褻渎了那时被视为神圣的儒家经典，背叛了居于正统地位的礼教纲常，离经叛道，处于异端地位。李贽明知这一点，他说：“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又说：“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李贽是相当勇敢的。他知道自己著作会遭到焚禁，所以取名《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藏书》刊刻后，他说“宜闭秘之”，故名《藏书》。这两个书名体现了李贽对封建道学的抗议。

然而，李贽个人的勇敢不能抵挡居于正统地位的道学势力对他的压迫。《焚书》出版后，耿定向指使人写《焚书辨》，对李贽攻击。李贽应友人之邀去山西，他们说李贽“大坏风化，若不去，当以法治之”。李贽返回湖北麻城后，道学势力声称他在此住着不合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适,扬言把他赶回福建老家,动手拆毁了他的住处。李贽躲到友人处,迫于官府的搜查又到河南商城,再由好友马经纶领其到河北通州马家避居。官府仍不放过他,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明神宗,弹劾李贽,说他“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多刺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明神宗御批:“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①李贽被捕,在狱中自刎,时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年七十六岁。

李贽寓居马经纶家后,体弱多病,感到在世时间不长了,写下如下《遗言》:“春来多病,急欲辞世,幸于此辞,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余最幸事。”“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李贽遗嘱确是“回式葬”。他去世后,友人按他的《遗言》安葬了他。墓在通州北门外,新中国成立后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李贽的代表作《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整理出版,成为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李松茂]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

五 丁鹤年

家世和生平

明代回族有不少诗人,其中以丁鹤年最负盛名。金大车在南京,锁懋坚在杭州,马继龙、闪继迪等在云南,也都有令誉。

丁鹤年,号友鹤山人,生于元元统三年(1335年),卒于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终年九十岁。

丁鹤年的曾祖阿老丁、曾叔祖乌马儿是元初西域巨商。元世祖西征反叛诸王时,财力匮乏,阿老丁、乌马儿兄弟把全部资财奉献,并从军平叛,后元朝以功授官,阿老丁年老不愿仕,特赐田宅留京奉朝请;乌马儿擢某道宣慰使,后拜甘肃行中书省左丞;其祖苦思丁累官至临江路达鲁花赤;其父职马禄丁,四十岁始入仕任临川县主簿,后迁武昌县达鲁花赤,性豪迈,有惠政,解官之日百姓为之建“种德堂”,并请求留居武昌,遂为武昌人。

职马禄丁有五子,鹤年最幼。鹤年兄弟皆业儒,四个兄长中有三人举进士,其中有爱理沙,字允中,官翰林应奉;烈瞻,官至万户。其姐月娥,亦富有才学。鹤年十二岁时丧父,“幼时读书皆月娥口授”。^①

丁鹤年从小习儒书,就读于南湖书院,十七岁即精通《诗》、《书》、“三礼”。曾师事豫章名儒周怀孝。在诸弟子中周独器重鹤年,欲以爱女妻之。鹤年以母老,兄皆在外而辞。

丁鹤年不求仕进而厉志为学。幼时其父欲使他袭荫叔父桓州官职,鹤年辞之曰:“吾宗固贵显,然以文学知名于世者恒少,吾欲

^① 乌斯道《春草斋集》卷七《丁月娥传》。

奋身为儒生，岂碌碌袭先荫，苟取禄位而已耶？”^①

至正十二年(1352年)徐寿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克武昌，年仅十八岁的丁鹤年将生母冯氏安顿于城郊，护侍嫡母顺长江东逃至镇江避难。后嫡母病逝于镇江，他徒步往浙东投奔任定海县令的从兄吉雅谟丁。^②由于浙以西日乱，当时江南行御史台移治奉化，不少名公大臣赏识丁鹤年的才干，推荐他做官，都被他一一回绝。不久，吉雅谟丁去世，鹤年生活无依无靠，几乎陷于绝境，只好“或旅食海乡为童子师，或寄食僧舍卖药以自给”。^③当时，浙东一带属方国珍的势力范围，方氏“深忌色目人，鹤年畏祸迁徙无常居”。^④在浙东海岛潜踪匿迹，逃亡避祸，不得不“居简便夷俗，含凄效越吟”。^⑤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元亡。政局逐渐安定，丁鹤年在定海海边筑室定居下来，名其室为“海巢”。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各地交通多恢复，丁鹤年告牒武昌长官回乡迁葬生母遗骨。回武昌后，几经周折，终于寻找为生母冯氏埋葬之所，将其尸骨迁至武昌城西寒溪寺后山上父墓旁。

丁鹤年后半生主要是在杭州和武昌两地度过的，其间他曾游历江西、安徽、吴越、湖北、湖南等地，也有人说他到过四川。^⑥

丁鹤年晚年有较长一段时间隐居杭州，八十岁时曾代杭州父老作《送周(一作月)侍郎定江浙赋税还大都》一诗。乾隆《钱塘县

①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一一《高士传》。

② 一说是丁鹤年亲兄。

③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一一《高士传》。

④ 瞿佑《归田诗话》下。

⑤ 《寄乡亲济阳公》。

⑥ 《明诗纪事》乙签卷一七。

志》说他，“晚习天方法”，参加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最后，他结庐于父墓旁，卒于武昌。逝世后葬于武昌寒溪寺后的山上。^①

丁鹤年是元末明初很有影响的诗人，在当时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一生漂泊，诗多有遗失。曾自编《海巢集》，他的诗在明清两代中均有刻本和抄本流传，各种版本收诗数目不尽一致，以《艺海珠尘》本《丁孝子诗集》为最多，共收诗三百四十六首、铭五篇。丁鹤年尚有文集，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忠孝诗人

丁鹤年早年是在大动乱中度过的。他的不少诗篇真实地描述了他“避地长年大海东，萧条生事野人同”^②的悲惨处境。在《腐儒》一诗中，他沉痛地写道：

落魄乾坤一腐儒，生逢四海日艰虞。

异邦作客歌黄鸟，空谷怀人咏白驹。

岂有纵横干七国，亦无词赋拟三都。

时危那敢辞贫贱，第恨长年走畏途。

战乱连年，兵戈四起，元朝在各族农民起义的大风暴中摇摇欲坠。而作为元朝功勋之后的丁鹤年，不但“有家不可归”，^③而且仲兄烈瞻、姐姐月娥都死于战乱之中。丁鹤年百忧并集，千愁齐聚。思乡，忧国，怀亲，悲己。于是，“志国怀乡一寸心”，^④“一寸丹心都是愁”，^⑤便成为他这一时期诗歌的主旋律。

① 《(光绪)武昌县志》卷九《冢墓》。

②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一九。

③ 《岁百忧集》。

④ 《九日登定海虎蹲山》。

⑤ 《劳劳》。

丁鹤年忠于元朝。他清醒地感到元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心急如焚，但又束手无策。他看到元朝官吏的腐败，同情人民的疾苦，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在《题余姚叶散常州判海堤卷补先兄太守遗阙》中写道：

呜呼！只今四海俱横流，
平地风波沉九州。
苍生引领望援溺，
州县有官非叶侯。
州县有官非叶侯，
御灾谁复忧民忧。

无人忧民忧，而农民起义的风暴已席卷全国。丁鹤年看清了“有柱难擎杞国天”^①的局面，只好“惆怅无人解补天”，^②祈求“天运行将返治平”。^③

元亡不久，丁鹤年写了《自咏十律》组诗，格调悲苍凄恻，集中体现了丁鹤年当时的政治态度和内心世界。如第一首诗写道：

长淮横溃祸非轻，坐见中流砥柱倾。
太守九江先效死，诸公四海尚偷生。
风雪意气惭豪杰，雨露恩荣负圣明。
一望神州一搔首，天南天北若为情。

对元朝的覆灭表现了无限的沉痛和惋惜，对自己未尽到臣子职责感到无限的惭愧和悔恨。他希望有朝一日元朝再次兴起：

洪运未移神器在，周宣汉武果何人？（之九）

① 《逃禅室与苏伊举话旧有感》。

② 《题族兄马子英进士竹石嘉树图》。

③ 《寄张廷言》。

独有遗民负悲愤，草间忍死待宣光。（之六）

所以，戴良在《鹤年吟稿序》中指出：“一篇之作，一语之出，皆所以寓夫忧国爱君之心，愍乱思治之意，读之使人感愤激烈，不知涕泗之横流也。”^① 丁鹤年是饱蘸自己的血泪写诗的。

历史的潮流无法阻挡，元亡的现实不可抗拒。丁鹤年决心做一个元朝的“草泽遗民”，“偷生江南”，唯求“只留清气在人间”。^②

浪迹浙东时，丁鹤年常常隐匿佛道寺院；与僧道唱和，有《方外集》之作，其中多寄怀之诗。

丁鹤年大半生是在明朝度过的。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时，他年仅三十三岁。明朝建立后，社会日渐安定，丁鹤年的心境也逐渐平静下来，有时还颇为舒畅，他在《武昌南湖度夏》一诗中写道：

湖山新雨洗炎埃，万朵青莲境里开。

日暮菱歌动南浦，女郎双桨荡舟来。

丁鹤年由于长期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所以对明初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明朝的政绩是给予赞扬的。如《送周侍郎定江浙赋税还大都》一开头就说：“戈甲三边静，车书四海同。时平尚文治，第士明光宫。”对明朝削减赋税的措施，丁鹤年也极力称赞：

宣朝廷德意，问闾阎疾苦。

游民亦占籍，编户悉安堵。

力役均平赋敛轻，去者讴歌来鼓舞。

……

目击盛事，岂容缄默，乃歌曰：

① 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一三。

② 《赠表兄赛景初》。

生逢舜日当尧天，经营内外皆英贤。

八十衰翁百无外，茅檐击壤歌丰年。

但是，丁鹤年的出身和身世，特别是他的忠孝思想，使他始终抱着忠于元朝的态度。他曾著诗赞颂抗元“死节”的南宋士大夫是“端合附高名”；^①对于仕明的人，他可以结合为朋友，可以鼓励他们建功立业，但他本人却对元朝忠贞不二。他谢绝了推荐、邀请，不做明朝的官，以“遗民”终老一生。他有一组《采莲曲》，从内容到情调均为后期作品。这组诗以情歌的形式表达了他的气节情操，其中一首写道：

采莲复采莲，争如采荷好。

花谢叶独存，团圆以终老。

另一首写道：

莲开花覆水，莲谢藕在泥。

不学青萍叶，随波东复西。

他要“团圆以终老”，决不“随波东复西”。丁鹤年时刻都没有忘怀自己是先朝遗民。国破家亡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他的心头。因此，他在明初写的诗仍蒙上一层哀怨忧愁的轻纱。有些诗虽比战乱时的诗委婉含蓄，但因时过境迁，痛定思痛，更显得冷静深沉，艺术上也更趋老成，如《重到西湖》：

涌金风月昔追欢，一旦狂歌变永叹。

锦绣湖山兵气合，金银楼阁劫灰寒。

雪晴林野梅何在，霜冰苏堤柳自残。

欲买画船寻旧约，荒烟野水浩漫漫。

澹居老人至仁在《海巢集题后》云：“鹤年予友也，其诗忠义慷慨，有

^① 《题宋贡士袁庸死节传后》。

骚雅之遗意焉。”正点出了丁鹤年诗的主要特点。

丁鹤年的诗在艺术上善于学习古代诗人和元朝诗人的长处，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四库全书提要》云：“鹤年既绝意于功名，惟覃思吟咏。故所得颇深，尤长于五七言近体，往往沉郁顿挫，逼近古人，一无元季纤靡之习。”特别是他的怀乡志国之作，情真意切，雄浑悲苍，又“炼句精致”。他的古体诗语言朴实，通晓自然。他的题画小诗数量多，质量高，清隽流丽，富于情趣。如《题天柱山》：

枝翠五云中，擎天不计功。

谁能凌绝顶，看取日升东。

丁鹤年的诗在元末明初别树一帜，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是萨都刺之后的又一位杰出的回回诗人。

丁鹤年不仅以诗鸣于世，而且以孝子之名轰动一时，他主张做人“毋忘孝与忠”。^① 时人乌斯道曾撰《丁孝子传》^② 和《丁孝子诗》，^③ 详细记载了丁鹤年回乡迁葬父母遗骨的经过，诗开头就赞叹道：

丁鹤年精诚之心上达九天；

丁鹤年精诚之心下达九泉。

因此，丁孝子之名广为传诵。后人重刻他的诗集甚至有以《丁孝子诗集》题其集名的。^④

对于丁鹤年的忠孝思想，要有分析地对待；对于他文学上的成就，要加以继承和研究。

〔白崇人〕

① 《送赤土矶巡检徐白任满》。

② 《春草斋集》卷七。

③ 《春草斋集》卷二。

④ 如清乾隆刊《艺海珠尘》本。

梁 檀

梁檀，明末清初山西太原的回族书画家，又是一位品格高洁，精研教理的伊斯兰学者。

梁檀与傅山（青主）有很深的交情。傅是清初山右遗民领袖，又是一代博学通儒，平生操持严正，不轻易品题人物，但独对梁檀推敬备至，对梁“自标一宗”的书画风格也有很高的评语。傅山的《霜红龕集》为我们提供了梁檀事迹的基本材料。作为书画家和诗人，梁的作品多已不传，仅有少量画卷和题画诗幸存于天壤间，这些遗迹，对我们探索梁檀的艺术造诣和胸襟风致，亦大有帮助。

一

梁檀，太原人，明末诸生出身。字乐甫，号不麀。别号甚多，见于其画迹的钤记者，有天外野人、石崖士、蒹葭主人、芦鹭居等。明亡以后，以诗画隐遁，自甘贫寂，不求仕进，并专心致志于宗教修持。梁檀之名能传之久远，与傅山对他的汲汲揄扬分不开。傅山曾写过一篇《太原三先生传》，举梁檀为“三先生”之一，而三传中以梁传用墨最多，写得也最精彩。为便于考察，兹将全传照录如下：

太原老诸生梁檀者，先回回人，聪慧人未曾有。工绘事，年三十许，前后殚精临摸古人山水、人物、花鸟、鱼虫，无所不造微，即不屑细曲，一味大写取意。然亦应人责，得意画极少。字不合格，而孤洁秀峻，径自标一宗，要无俗气。家亦贫，旧居南关，小斋傍水，号芦鹭斋。古书桐琴，独寤歌也三十四年间。

回向精奉其教主事，日夜忏悔，不敢散逸。山与同宿三五夜，以一床事卧山，自卧地上一席，山听之，终夜不睡，时时呵

斥唤叹，如先生责让幼学者。山闻之起，深敬省，如闻晨钟，乃知其教之严净，非异端也。今七十矣，而奉其教不衰，可不谓用力于仁者哉！

傅山曰：梁君居芦鹜时，山恒以绘事访之，梁老辄叹曰：“有登天堂法不问，乃屑屑问此！”然谓山可与言，为山出其教青纸金书经，制度精净，为山讲之。然大概讲之，严克细微，颇近西洋天学，而复译辨之，非西洋学也，西洋似颇叛道矣。山敬之不敢议。斋壁挂青纸泥金画一幅，法用小李，宫殿层复。指谓山曰：‘此天堂图也。’又画果树一幅，寓其教分布枝叶之相顾。壁间琴上有燕子结巢焦尾，山奇之，为赋《燕巢琴》一篇记之。出斋门而东，临所谓芦鹜溪者，青渺渺然，映带乎萧索门庭，山指顾曰：“梁伯鸾在其中哉！”遭乱后避居西山一年，有即事诗画手卷于，山未全见也。^①

应该承认，这是一篇引人入胜的佳作，因其出自傅山之手而更具吸引力。

明清以来，回族产生过许多史传存名的人物，但具有鲜明民族与宗教标记的传记却很少见。本族人握管有术者颇不乏人，但往往耽溺于儒术及制艺之学，民族感情渐趋淡漠，其中某些曲学阿世之徒更不屑于为此。出自汉族士人之手的传记文字，一般很少涉及到传主的族属、信仰，以至我们要确认这一点时，常常须借助于其它材料的印证，借助于繁难的考证。傅山此传，梁檀的民族信仰彰明昭著，执笔人不但回避传主的特殊信仰，相反，竟以显而易见的敬慕心情，描述了传主的信仰之诚和修持之严。这部分文字约占全传三分之二，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梁檀其人，而且也是研究

^① 见《霜红龛集》卷一五。

明清之际北方伊斯兰教传播问题的重要史料。

从传文中不难窥见,傅山对梁檀的推敬之情可分为三个层次。表层是梁檀力求脱俗的书画见解与成就;中层是梁檀数十年“奉其教不衰”的宗教专注精神;其深层,也是用笔不多而寄意最浓的一层,乃是梁檀的隐士本色及入清以后甘守穷庐而不肯与时俯仰的遗民志节。这三个方面,除了信仰异趣之外,其他无不是傅山本人苦心孤诣为之追求者。在我看来,这篇传文之所以写得文情并茂,就是因为傅、梁二人思想志趣若合一契,傅山写梁檀,未尝不是在表彰遗民志节,阐扬自己所孜孜追求的精神境界。

我们不妨逐层做点分析。

以绘画言,梁檀的画风,“即不屑细曲,一味大写取意”的风格,也是傅山本人的画风。傅山作画也以写意见长,他喜作山水,“皴擦不多,邸壑磊落,以骨胜”。^①偶而也画墨竹松石之类,很像他的草书,“卓然尘表,不落恒谱”。^②也就是说,经常是率性而作,表现笔墨意象,并不以出规入矩、状物写实为能事。所以一般认为傅山是以书家而兼画家,是以书法的运笔之道描绘自己胸次中的块垒,仅寄其形状于山水花鸟而已。传世的《江深草阁寒图》最能体现他这一精神。^③

与傅山不同,梁檀曾潜心临摸古人作品,山水、人物、花鸟、鱼虫“无所不造微”。这表明他走的是“专业画家”的路子,并在具备了相当深厚的笔墨功底之后,才由工细造意一变而为大写取意。作为画家,他很可能以此为生计之补,故不能不多有应酬敷衍之

① 《清朝书画家笔录》卷一。

② 同上。

③ 参见《中国名画欣赏辞典》第799页,单国强《江深草阁寒图》。

作,“得意画极少”,亦可反映他懒得追逐俗名的落寞心境。壁上的“天堂图”是值得注意的。这可能是一幅“克尔拜图”,傅山说是用唐李道昭(小李将军)的青绿山水法画成,则可能是梁檀亲笔所绘,证明“一味大写取意”的梁檀,同样能画金碧辉煌式的工细山水。中国画家以青绿山水画法画“克尔拜图”,见于记载者,梁檀似乎是第一位,这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在中国与阿拉伯文化交流史上,都值得记一笔。总之,在丹青之道上,梁比傅更专长些,傅自言“山恒以绘事问之”,表明傅在绘画上请益于梁。邓之诚先生曾说:“梁辈行既高,为青主所敬事,且数从问画,知青主之画,实出于梁而微变之。”^① 这一分析无疑是有道理的。

说到书法,颇以此道睥睨古今的傅山,对梁的字也有很高的评语。他说梁“字不合格,而孤洁秀峻,自标一宗,要无俗气”。以傅山的标准而言,这个评语给得相当高,等于说梁的字已入“脱俗”之境。何谓“脱俗”?傅山有自己的界定,或者说有他自己特定的审视角度和评品标准。傅山在其著名的《家训》中就曾谈到梁檀的书法。其云:

梁乐甫先生字,全不用古法,率性操觚,清真劲瘦,字如其诗,诗如其人。品格在倪瓒之上三四倍,非人所知,别一天地也。^②

这段评语与传文中的评语基本一致,只是进而由字论诗,由诗论人。称梁的“品格”更在倪瓒(云林)以上,并特为点出:“非人所知,别一天地也。”这些话蕴义深曲,如不加以剖析,则很容易让人感觉傅有偏爱溢美之嫌。

① 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一“梁不虞”。

② 《霜红龛集》卷二五。

傅山在明清之际的书坛上是卓然一家,他尤以书论深刻著称,有人譬之如“老吏断狱,严而少恩”。概括起来,其特点主要是两点,一是反对柔媚流俗之体,力主苍遒古拙,不拘体式。他提出了“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①的著名观点,对清代书家影响很大,实际上开了清中期以后勃然崛起的阮元、包世臣及晚近的康有为等尊碑派的先河。二是他论书最重人品,重名节,毫不隐讳其因人论字的倾向。最典型、也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是他对赵孟頫(子昂)书体的一段议论:

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无可厚非,熟媚绰约自是贱态,润秀圆转,尚属正脉,盖自《兰亭》内稍变而至此。与时高下亦有气运,不独文章然也。^②

不赞赏赵字的某种熟媚习气,这并非傅山独家之论,明清间持此论者往往有之,至于露骨地提出“薄其人,遂恶其书”,“熟媚绰约自是贱态”,这是前无古人之语,而实际上已超出论书的范围,其政治寓意十分显豁。

赵孟頫是不是一个大节有疵的人,他的字是否真有腴颜事仇的“贱态”,这类说法流布甚广,本值得认真讨论,但显非本文所应涉及者。仅就傅山上面一段评语而言,平心而论,我以为是有失于偏颇的。而问题在于傅山是清初遗民群体中的中坚人物,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他本人坚定不移的民族与政治立场,使他的艺术观蒙上强烈的政治色彩,具有鲜明的反异族统治意识。于是,以宋室诸王孙身份入仕元朝的赵孟頫,便成了他痛加指斥的对象,其弦外之音一听便知。与此相应,他对梁檀书法所给予的崇高评价,也具有

① 马宗霍《书林藻鉴》卷一二“傅山”引全祖望云。

② 《霜红龛集》卷二五《家训·字训》。

因人重字、以字论人的倾向,所谓“脱俗”,所谓“全不用古法,率性操觚,清真劲瘦”等,是评字,也是评人,其中寓含着对梁檀品格的赞赏与认同。

傅山认为梁的品格甚至在素有“清高绝俗”之誉的元末画家“倪瓒之上三四倍”,“非人所知,别一天地”。这是一个意味幽深、耐人寻思的评语。我以为这里面可能包涵了两层意思,其一,傅、梁二人在遗民立场上志同道合,有很深的政治隐情,无法公诸笔墨,在这方面,傅以为梁比之为躲避乱世而遁迹于湖山的倪瓒来高出多了。^①其二,指梁的宗教信仰和修持。与倪瓒相比,倪瓒固然颇具清雅绝尘的飘逸风格,但终究脱不了落拓文人的习性,而梁有始终如一的宗教追求,二人精神世界迥然有别,这就是“非人所知,别一天地”的底蕴。

梁具有很深的汉文化修养,但他又是虔敬专一的穆斯林,其信仰之诚与遵行之严,使傅山大受感动。由“其教之严净”,得出“非异端也”的结论。令人感慨的是,当傅山以丹青之道频频请教于梁檀时,梁却劝说这位名播海内的大儒接受“登天堂法”,并取出“青纸金书经”——《古兰经》——为傅山宣讲,使傅山对伊斯兰教有了一定的了解。从“严克细微”的评语,“深敬省,如闻晨钟”、“敬之不敢议”的态度中,都可以窥见傅山对伊斯兰教的尊重和心态。这当然同尊重梁檀本人是分不开的。在梁檀影响之下,傅山成为明清之际南北大学者中唯一一个对伊斯兰教做出中肯评价的人。这不同于黄宗羲对回回历法的研究,因为黄宗羲仅限于一隅之学,而并

^① 请参见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倪瓒”条。

未涉及对整个伊斯兰教的评介；^①更不同于顾炎武对回回的诋毁。以顾氏的宏通博大，竟针对回回民族讲过一些非常偏隘的话，^②我以为这同长期形成的隔阂与陈见有关，如顾炎武也结交过梁檀一样的回回人物，他的观点肯定会大为不同。

梁檀虽然是前明诸生，但似乎国变以前就过着摒绝仕念、超然物外的隐居生活。他住在太原南关傍水而筑的芦鹭斋中，以古书桐琴为伴。“日夜忏悔”，凡三十余年，傅山比之若东汉的隐士梁鸿（伯鸾）。^③这一比喻，除见于前引梁檀传文外，还见于傅山《题梁乐甫画》一诗中，诗载《霜江冤集》卷七：

冻泉细依石，晴雪落长松。

仿佛素心老，微茫冷眼中。

伯鸾风雨白，芦鹭水晶宫。

若个琴书解，丹青乱长雄。

梁檀画的是杜甫“冻泉依细石，晴雪落长松”诗意，傅山题诗是借题发挥，颂美画家“微茫冷眼中”的超尘心境。“伯鸾风雨白”一联，使我们相信梁檀与一位贤淑的妻子共度清贫，其情节犹如梁鸿、孟光夫妇，这大概是傅山一再以梁檀比之梁鸿的隐义之一。有趣的是，曾经有燕子结巢于梁檀书斋的古琴上，为梁檀贫寂的生活添了几分生机。傅山夏日过芦鹭斋，见到此景，感慨梁檀“所与友者，如此而已”，便写了一篇《燕巢琴赋》，借颂美燕子来赞扬梁檀枯守贫寂、怡然自乐的品节。赋云：

吁嗟燕兮，尔其乐梁生之贫兮，梁生贫无以粮；抑爱梁生

① 黄宗羲曾研究回回历法，著《回回历法假如》等书，今已不传。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黄宗羲传》。

② 见顾亭林《日知录》卷二九“吐蕃回纥”条。

③ 见《后汉书》卷八三《梁鸿传》。

之清兮，彼复清冷而无裳；尔其取梁生悠远之韵兮，惟在芦渚水湄月夜龙吟一鼓之琳琅！^①

可见，傅、梁二人早在国变以前就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出自罗振玉之手的《傅青主年谱·附录》说，傅山自国变后，所交游者“大率胜国遗老学问艺术之士及方外而已”，梁檀便是被举列者之一。^② 梁檀于国变之时曾避居西山一年余，其后当搬回南关芦斋旧居，枯守穷庐，以诗画终天年。他在明末，便无仕进之心，入清后更不会趋事新朝。所交接者无非傅山、戴廷栻居晋中遗民，足见他是遗民行列中的一员，其遗民身份毋庸置疑。然则他的政治立场恐怕不仅仅止于此。前已论及，傅山推许他品格高于倪瓒三四倍，其中必有深义。邓之诚先生曾注意到这一点，他说：

青主论书专重人品，如云字不能庇人。此云高倪瓒三四倍，其推崇可谓备至。梁之高节，幸得此语而传。惜今人只重青主，而不知重青主所重之人，非聋盲而何？^③

傅山在《燕巢琴赋》之末尾写道：

尔能不为人之谅薄兮，每秋去而春来；我亦请与尔主人申盟兮，终不改弦而更张！

显而易见，“世人谅薄”一句，是讥刺那些革代之后随风使舵的投机人物，这类人还不如能守信如一的燕子；“申盟”一句，是傅、梁二人以志节相誓约，绝不“改弦更张”！足见《燕巢琴赋》作于梁檀西山

① 《霜红龛集》卷一。

② 宣统三年丁宝铨（衡甫）任山西巡抚，编印《霜红龛集》，并请缪荃孙、段朝端编《傅青主年谱》，稿成，丁请罗振玉审定，罗因过简略，乃别撰一编，后附刻于《霜红龛集》之末。见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宣统三年条。亦见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卷二〇《霜红龛集》。

③ 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一“梁不廛”。

避乱重归旧居之后,约当顺治初年。亦可见傅梁之交绝非一般,借用邓之诚先生的话说:“知其相要之心,深且久矣。”

明亡以后的傅山,有许多神秘隐蔽的行止,至今已很难窥见真情。全祖望注意到这一点,他在《阳曲傅先生(山)事略》之尾写道:

惟顾亭林之称先生“萧然物外,自得天机”,予则以为是特先生晚年之踪迹,而非其真性所在。卓尔堪曰:“青主盖时时怀翟义之志者。”可谓知先生者矣。

全祖望不肯点破“真性所在”,而是借用卓尔堪之语指出傅山是“时时怀翟义之志”的人物。翟义是西汉末丞相翟方进之子,王莽居摄,翟义起兵讨之,兵败被杀,事见《汉书·翟方进传》。这就是说,时时胸怀反清复明之志,才是傅山“真性所在”。因此,我们不能不怀疑傅梁之交有很深的政治基础,从这点出发,傅对梁的推崇备至便更容易理解了。

二

梁檀以画家而兼诗人,但传留后世的诗画作品却很少。《傅青主年谱·附录》引《仙儒外纪》说,他的诗画“不令人见”;傅山在《太原三先生传》中也提到“得意画极少”。避居西山时所作“即事诗画手卷子”,应属经心之作,而傅山竟未获全睹。这些,都反映了梁檀高自清标的格性,所以他的诗画传世者原本就不多。

与傅、梁同时的晋中名儒戴廷栻(字枫仲,祁县人),曾为梁檀编刻集子,所收应主要是诗,抑或还有文章、杂著之类。但这部集子久觅未见,也不见于公私著录,是否还有存世者,尚不得而知。另外,清代晋人王献明、钱虚舟编刻的《名晋逸诗》也收了梁诗,罗振玉《傅青主年谱》曾提到此事,但此书传布不广,憾无缘获读。

戴廷栻是傅山的好友,仕宦之家出身,国变后潜居不仕,专心

著书刻书，“操选政，钐版数十种行世，一时名满天下，学者仰之如山斗”。^①他聚书于丹枫阁，傅山时常登临，康熙十四年（1675年）八月，顾炎武自河南抵晋，曾住在祁县戴廷枏家中，尽览戴氏藏书，戴还为顾炎武构筑书斋。当时，北方有戴的丹枫阁，南方有冒襄（辟疆）的水绘园，^②都是遗民学者聚集纵谈之所。戴为梁檀编刻集子，很能说明梁在遗民圈子里的名望地位，也说明梁、戴间也有交往，一如傅、梁之交。

目前所知梁的诗书画作品传存于世者只有两宗，其一旧属邓之诚先生诗藏；其二现藏于山西河东博物馆。兹介绍如下：

据邓之诚先生《骨董续记》卷一“梁不麀”条载，邓先生于1919年（己未）游晋，无意中得到梁檀的《东山胜概图》卷子，“写穷冬风雪荒寒索莫之境，极见胸襟”。画上有自题诗十章，现依邓之诚先生原录抄之如下：

《山中》：才到山中一事无，山中日日看山图；相逢野老忘名姓，始觉身居太古徒。

《乱后山庄值雪》：暝色临深夜，明看雪满山；兵戈初战后，烟火几家残。细水经沙蹇，留湾怪石寒。樵人迷去路，空戴冻云还。

《东山四咏》。《谷口留云》云：山阙云补合，树少鸟衔栽；深居忘岁月，但看桃花开。谷口山横处，山深欲问津；桃花浮水出，应有避秦人。《山中值雪》云：山中无客到，一径入幽昏；雪落山上寒，云深不知晓。水冻石还瘠，云迷山亦寒；柴门深昼掩，正好雪中看。《山寺清松》：寺借山幽僻，山还寺点妆。

① 《霜红龛集》附《傅青主年谱》崇祯九年条。

② 同上，并见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卷二〇《半可集》。

水流山涧下，松落水生香。松风落日静，山寺晚开凉。门傍清溪水，应有山僧来。《深岩隐居》：高鸟投林去，淮南好隐栖。岂是倚山静，中原多鼓鼙。几家闻战伐，数处断村烟。何似深岩叟，遁迹不知年。

邓之诚先生认为，傅山所说梁檀“遭乱后避居西山一年，有即事诗画手卷子”，应该就是这幅《东山胜概图》卷，傅山误“东山”为“西山”，傅山未全见者，“或不止一本”。细读题画诸诗，我以为邓先生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军攻破太原，当月底攻破周遇吉据守的宁武关，进而连克大同、阳和，抵居庸关，兵锋直逼北京。三月十九日占领北京，明朝亡。梁檀“西山”避乱的一年当即崇祯十七年（甲申）到顺治二年（乙酉）的这一年之中。画的主要是“穷冬风雪荒寒索寞之境”，诗中有“兵戈初战后，烟火几家残”、“中原多鼓鼙”、“几家闻战伐”等句，诗画所反映的时间，大抵应该是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年）底到十七年（甲申）之间的冬季，当时正是李自成大军纵横晋中的时间。

梁檀此画历三百余年而寂然无闻，竟被邓之诚先生无意中发现并收藏，经邓先生题识发表，公诸学界，真古人所谓“物之显晦，固有时也”。邓先生于1960年逝世，此画的去向如何，这是我们所关心的。盼望经“文革”浩劫后，此画仍能安然无恙，亦望能早日刊印出来，一则使大家得睹梁檀手笔，二则以纪念邓先生发现护持之功。^①

梁檀第二宗诗书画作品的来历更为离奇。

^① 此画去向，我曾询及邓先生哲嗣、南京大学邓瑞教授，据言邓先生的收藏已多有流失，此画去向可能乃兄邓珂先生知道。邓珂先生曾整理再版了《骨董琐记全编》，熟知此画原委，盼能进一步介绍画卷细节，以飨读者。

梁檀诗书画残卷,1979年出土于清初山西医家张亦堪之墓,流落民间。山西河东博物馆于1985年在垣曲县征集到,1988年王泽庆先生撰文发表于当年《文物》杂志第3期。^①此卷残长135、高28.7厘米,画面分两部分,前部画山石杂草,题“吟案”二字,并题五言律诗一首,诗云:

石自何年设,期我北山头。
坐处供几案,当前逐水流。
吟成黄石郢,时伴赤松游。
不是栖真隐,安能许远俦。

画卷后部画青石丛草,题“研石”二字,又题五言古诗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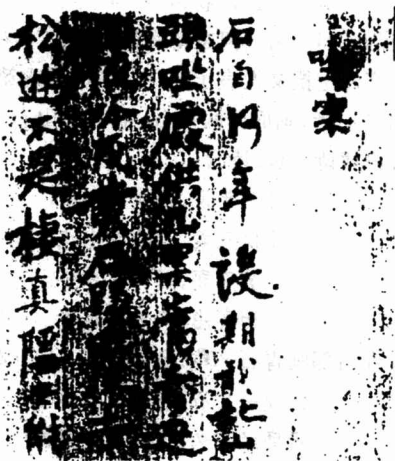
怪哉一片石,色若青磷峴。
研磨经岁久,上有笔穿痕。
谁遗近吟案,烟雨墨地浑。
携之五岳游,归致它山尊。
洗之移近岸,莫使蛟龙吞。
终当致远意,(下残)

此卷出土于医家之墓,说明墓主生前十分珍爱,不想数百年后重见天日,又回到人间!画上有“不廛”二字款,并有“梁君乐甫”印记,是梁檀真迹,应无疑义。从《文物》发表的照片看,山石丛草,点画自如,于飘逸中略见苍润遒劲,画风颇与徐渭(青藤)相近,显然是受到徐渭的影响。可惜画因长期深埋地下受到潮湿,墨迹已相当疏淡,又是黑白照片,难免有雾里看花之感。书迹比较清晰,字在隶楷之间,结体多用小篆,又有行书意,确有苍拙而不同流俗之

^① 王泽庆先生的文章是《从傅山和梁檀的交往谈汉回艺术家的友谊与民族文化的融合》。

处,在赵、董书体风靡书坛的明末清初,他的字竟能如此独出心裁,足见其人胸襟高洁不凡。看到他的墨迹,方能体味到傅山“字不合格,而孤洁秀峻,径自标一宗,要无俗气”的评语,真是知人论书,句句切中。

梁檀之名在中国书画上泯没无闻,在众多的清人书画史考述中竟无一席之地。幸有《东山胜概图》与《吟案·研石图》的发现,才使我们



梁檀墨迹

得窥庐山面目之一斑。明清之际的遗民书画家群体,规模大,蕴涵深,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写意画派而言,上承徐渭而下开“八怪”,起关键作用的是几位遗民画家。遗民画家的代表人物如陈老莲、八大、弘仁、恽格、吴历等,主要活动在南方,北方则显得名家寥落,有了梁檀,使北方阵容稍见起色。此外,遗民画家中,八大、弘仁、髡残等,都托身于梵境,寄志于方外;吴历先奉佛教,后皈依天主教,成了清初中国天主教史的重要人物。唯梁檀孤标独行,笃守伊斯兰教法不稍懈。这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

[马明达]

六 麻 贵

防御俺答的战守中升迁

麻贵，字西泉，明朝后期著名战将。出身于大同右卫一个回回军人世家，生卒年不详。他生当明朝嘉靖后期到万历末年，这正是明封建皇朝宦官专权，军政败坏的时候，也是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反抗不断发生的时候。当时有所谓“南倭北虏”，对于明的统治和人民生产、生活构成严重威胁。“南倭”是指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北虏”则属于国内民族间的斗争，指的是北方蒙古贵族武装的不断内犯。麻贵的父亲麻禄和哥哥麻锦，都是在抗击蒙古俺答汗内犯的守战中立功和升迁的，麻贵本人也正是在嘉靖末由舍人从军，并追随父兄的功业而屡立战功和不断升迁的。与他的父兄不同的是麻贵在晚年还参加了援朝御倭的战争，因而麻贵的功业和影响也超过了他的父兄。

麻贵的父亲麻禄，嘉靖中担任大同参将，曾随大同镇总兵刘汉出击蒙古板升（指归化城一带）获胜。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春，俺答汗率部围攻大同右卫，麻禄与副将尚表誓志固守四个月，俺答被迫退走。从军不久的麻贵和任千总的哥哥麻锦也参加了右卫的城守。青年时的麻贵，即娴于弓马，骁勇敢战，当时正值兵部尚书杨博奉命总督宣（化）大（同）军务，奖罚严明，颇有作为，将士也多砥砺自奋，这为麻氏父子、兄弟的立功升迁创造了条件。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俺答汗的儿子辛爱率部进犯通州，威胁北京。当时担任宣府副总兵的麻禄率军入卫京师，麻锦以游击将军、麻贵以都指挥僉事，参加了捍卫京城战斗。由于勤王有功，麻锦升任大

同参将，麻贵升任游击将军。到隆庆初年，这时麻禄可能因衰老退役或者亡故，而麻锦已经升任为大同副总兵，麻贵升任大同新平堡参将，新平堡也是杨博任宣大总督期间所筑牛心诸堡之一，为防御俺答入塞的军事要冲。

经过与蒙古俺答诸部多年的战争，隆庆初年明朝政府终于允许俺答汗通贡互市的请求，此后除个别蒙古首领仍时有骚扰外，凡俺答控制力所及的，东起蓟州、宣府，西到甘肃、固原数千里的长城沿线地区，烽火不起，蒙汉各族交往频繁，安居乐业。麻锦在万历初年已经升任总兵官，先在山西，不久即改镇宣府。麻贵则升至大同镇的副总兵，万历十年（1582年），又充宁夏总兵官，不久仍调任大同总兵官，负责京师西北的防务重任。麻贵父子、兄弟出生宣、大，驻守宣、大，而且部下又多宣、大家丁，这是一支强悍的、能征惯战的武装，包括蒙古、回回各族健儿在内，因此当时被叫做“达兵”。隆庆以后正是明朝政府与俺答各部互市往来的时期，作为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麻锦招集塞外叛人，归者甚众；麻贵约束部伍，不得扰害蒙汉百姓，维持长城内外的通贡互市，使塞上防务出现安定的局面，弟兄皆有勋劳。另一方面，也正如万历十八年（1590年）大学士王锡爵在奏稿里所揭露的，由于与蒙古各部通贡互市近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滋长了“吏恬卒玩”、“武官囊下求安，专借款关之利”^①的弊端，这些弊端对于骁勇善战的麻贵来说也在所不免。所以，万历十九年（1591年），麻贵被阅视少卿曾乾亨所劾，罪名主要是坠坏城堡，冒马媚虏以及占地盗粮等项，并因此而受到革职戍边的处分。

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宁夏镇军锋刘东旸等，因被巡抚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封贡》。

党馨压抑及侵粮而激变,他们劫持总兵张维忠,并请求招安。蒙古族(致仕)副总兵哮拜为之主谋,变军与蒙古宰僧、著力免诸部遥相呼应,事态扩大,全陕为之震动。明军久攻不下,师无成功。麻贵素以骁勇著称,明廷让他以副将率所部家丁赴宁夏,戴罪立功。在战斗中麻贵亲冒矢石,斩获甚多。提督李如松(朝鲜族)等部与麻贵合力进剿,并断绝了蒙古诸部对宁夏变军的声援,经过半年多的奋战,宁夏的变乱被镇压下去。麻贵以战功又被任命为总兵官镇守延绥。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七月,蒙古卜失兔纠合诸部深入定边营,麻贵率军乘虚直捣敌帐,多有斩获。十一月,卜失兔仍在三边(陕北安边、定边、靖边)一带窜扰,守将捍御无能,观望不前,多以退怯失职论罪。麻贵亲自率军赴援,号称敢战,从功升署都督同知。第二年卜失兔又率兵入塞扰掠,麻贵率一万五千兵马分左、中、右三路,衔枚疾趋,逾塞六十里,又一次取得胜利。不久,麻贵因病告归,保留职务而不理事。

援朝御倭与镇守辽东

万历二十年(1592年)五月,日本关白(宰相)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率水陆军十五万在朝鲜釜山登陆,陷汉城、平壤,控制了朝鲜大片土地,并直逼中国边境。明朝君臣意见不一,主战者提出唇亡齿寒的道理。万历皇帝乃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出兵援朝御倭。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二月,明军攻夺平壤,而在汉城郊外又受挫折。明朝政府本来就没有声援朝鲜、对倭作战的决心,于是便派人与日本议和,而日本方面丰臣秀吉的侵略气焰正狂,毫无和谈诚意,这样僵持了三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一月,日本水陆大军再次侵朝,明朝政府决定再次派兵援朝以兵部尚书邢玠任薊辽总督、杨镐经理朝鲜军务、麻贵则被任

命为备倭总兵官,不久又加升提督衔,统率援朝南北水陆官兵,麻贵标下蒙、回各族“达兵”也随军从征。其他军队有从宣(化)、大(同)、蓟(州)、辽(东)及保定府调来的北方兵和从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四川调来的南方兵,还有西南苗族兵一万五千人。

万历二十五年六月,麻贵统兵一万七千人进入朝鲜,由于敌众我寡,没有开展大的攻势。十一月明军云集,十二月杨镐与麻贵会同朝鲜都元帅权慄,率兵向盘踞庆尚道蔚山的加藤清正发动猛攻,这就是著名的蔚山之役。战斗开始,麻贵标下游击摆赛(回族)用轻骑诱敌陷入埋伏,斩首四百余,俘虏了清正部下的勇将。清正退保蔚山以南的岛山,这里地势高陡,筑有石城,城外围绕三层栅栏。明军游击陈寅领兵连破两道栅栏,杨镐指挥不当,放松攻城,耽误了时机。不久小西行长率水军来救,倭船虚张旗帜蔽江而下。杨镐心慌胆怯,不及下令,策马西奔,以致全军大溃,死亡将近二万人。杨镐还向朝廷报捷,说只死亡百余人,部下予以揭发,杨镐被免职,改派天津巡抚万世德经略朝鲜军务。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明朝派江南水师来援,水陆两军协同作战,明与倭互有胜负。八月丰臣秀吉病死,年底加藤清正率军先逃,以中朝水军为主力,在水战中,给倭军以沉重打击,小西行长等率残船逃回日本。

麻贵和他所率的这支军队在朝鲜不到两年,在战争中有胜也有败,蔚山之役是一次反胜为败的战役。蔚辽总督邢玠的题本说:“是役也,奋勇争先,战胜攻取者,诸将士之戮力;设伏用正用奇者,提督麻贵之苦心”,“是以堂堂正正成此奇捷,厥功伟矣”。^①麻贵自己也说:“倭奴盘踞七年,自蔚山大战败绩,不敢远出樵采。”这都说的是成就的一面,而没有说功亏一篑反胜为败的一面。这次大

^① 《朝鲜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一八,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一。

溃退的主要责任在经理杨镐指挥不当,麻贵作为一路主将自然也有责任。麻贵在国内曾被誉爲“百战百胜之将”,^①到朝鲜来原想有一番作为,然而当时的主客观形势使他不可能在朝鲜得到什么功勋。

援朝明军有北兵、南兵,“北兵长技,惟在于马”,“只知御达,未曾尝倭”,这一点在朝鲜君臣议论麻贵时,也怀疑麻提督“亦是北将,岂知御倭?”在麻贵刚到朝鲜时,朝鲜国王接见他,麻贵也向国王明白表示过:防御蒙古“则备知其情形,可以料得,而倭子则未尝知”。说明麻贵有自知之明,也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有时麻贵也曾忘乎所以地说过什么“一达敌十倭”的话,意思是说御达难而御倭易,御达都可以百战百胜,御倭更不在话下。朝鲜官员认为这是“不知彼此之言”,认为麻贵“沉蛰则有之矣,尝倭则未也”。麻贵也对在国内作战和在朝鲜作战的不同做了分析,认为在中国国内有城有兵有粮,“贼寡则出战,贼众则入守”,因此,“战必克,守必固”。而在朝鲜当时的条件颇为不利,缺兵少粮,认为“虽有智者不能善其策矣”。^②后勤供给常常陷于困境,甚至影响麻贵所部的军纪。麻贵被给事中徐观澜参奏的罪状并不是作战不力,而是“师无节制,士有饥寒”。^③

麻贵与经理杨镐关系不好,将帅不和,诸多掣肘。麻贵公然说:“经理性歹,萧按察(应宫)狂妄,不可与谋事者。”^④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互相攻讦毫不相让。萧应宫力保沈惟敬,而沈惟敬却是勾结倭寇的内奸,后被麻贵逮问,送北京处死。萧应宫主

① 《朝鲜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一八,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〇。

② 《朝鲜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一六,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〇。

③ 《朝鲜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一八,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二。

④ 《朝鲜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一八,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〇。

和,对主战的麻贵极力排斥。麻贵的职务是备倭总兵官,即“钦差提督南北水陆官兵,御倭总兵官后军提督府都督同知”,负有对倭军事指挥权的,但他“上有军门、经理,不可任意为之”。不仅如此,总督邢玠、经理杨镐又把入朝官兵分为三路或四路,各路兵马不相统摄,麻贵只不过是其中一路的主将而已,为此麻贵不胜烦恼,欲为辞去。特别是蔚山之战以后,麻贵的斗志更加消沉,当时他的左右亲信们是这样揣度的:“提督以西方宿将,到处有功,未曾一败。而蔚山之战,大功未就,年且衰老,水土不耐,公私忧愤,必欲回去,图做别总兵。”^①这是很符合当时麻贵的处境和心情的分析。援朝御倭战争不能取得更大战果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什么北兵不知御倭,供给困难与将帅不和,而是明朝政府始终没有支援朝鲜、对倭作战的决心。蓟辽总督邢玠到朝鲜之初,就带来了“阳战阴和”、“阳剿阴抚”政府八字密画。^②这就决定了这场战争的命运,只能是“阳战阴和,纵贼不讨”,“其始终所经营,不过欲得退倭之名而已”。^③

麻贵虽被参,却并没有被革职问罪,仍然负责提督军务。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麻贵被任命镇守辽东。这时正是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和建立八旗制度以扩张兵力之际,努尔哈赤与明朝政府还没有正式冲突。麻贵主要是抗达,及泰宁卫炒花和插汉虎墩兔等部的袭扰。万历四十年(1612年),麻贵引病乞罢归里。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熊廷弼任辽东经略时,与麻贵仍有书信往来。嘉靖末麻贵以舍人从军的时候如果是二十岁,万历末他已经是八

① 《朝鲜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一七,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〇。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

③ 《朝鲜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一七,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三。

十左右的老翁了，可能是在万历末年或者天启初年病逝的。麻贵骁勇善战，戎马一生，当时“东李西麻”并称，皆为一时良将。铁岭李成梁、李如松、李如柏，父子兄弟为朝鲜族；大同麻禄、麻锦、麻贵，父子兄弟为回族。又皆为少数民族，堪称佳话。当麻贵到朝鲜之初，有一次朝鲜国王曾向麻提督接伴使张云翼打问：“都督何如人也？”张云翼回答说：“其中虽未可知，大概沉厚有术，喜怒不形于色。成败利钝固未可逆睹，不多得之人也。”^① 朝鲜君臣的这一评价，确是形象地概括了这位沙场老将的威武和雄才的。

〔马寿千〕

^① 《朝鲜宣祖昭敬大王实录》一六，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四〇。

马守应

马守应是明末农民起义中重要的领袖之一。

马守应绰号“老回回”，^①明末陕西绥德州的回民，只知他出身于边兵，家世和生年均不详。大约在崇祯末年（1644 年左右）病逝。马守应是明末农民战争中起义最早而又坚持到底的重要领袖之一，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回族历史人物之一，在回族人民反压迫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代，回回已经遍布全国，在陕西北部延安府和马守应的家乡绥德州以及甘肃东部平凉、庆阳等地，曾是回民分布较多的地区之一。明中叶以后，由于吏治败坏、军政废弛和土地问题严重，导致流民外逃现象愈来愈普遍，这一地区的回民，每当麦熟时节便携带妻小辗转流徙，靠拾麦穗或者卖药来维持最低下的生活，遇到灾荒年景更加贫困无依，便纷纷起来暴动，反抗地方官府。回民起义常常同汉民联合，即“与荒民合党”，^②而汉族农民起义也有当地回民参加，为此，陕西官府专门对回民规定了不许持兵器、不许群聚、不许抢掠的禁条，而且设法严防汉族军民“附回”造反。这说明在西北回汉杂居地区，回汉族人民的联合斗争成为阶级斗争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形式。崇祯元年，陕西大旱，草木枯焦，出现了赤地千里、人相食的惨状。而明朝官府却不顾人民的灾难，对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各族农民仍旧“严为催科”，^③毫不留情，这无异火上加油，

① 据明末史料记载，当时使用“老回回”绰号的，有马守应、马光玉和孙昂等数家，说明回民参加明末农民战争者不止一支。本文专述马守应一支。

②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一。

③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

更加激起反抗的怒火。长时期的民变和兵变,在天启末年和崇祯初年终于在天灾人祸频繁的陕北、陇东地区汇成了农民大起义的洪流。从明统治者所掌握的情况表明,当时陕西流民武装的成分“有饥民,有镇兵,有回夷”,^①“回夷”是明统治者对回民的侮辱性称呼,这充分说明回族人民是明末农民大起义最早发难的主力之一。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序幕的白水县民王二掀起的暴动,就与这一带的回民起义有直接关系,王二劫了宜君县狱之后率众投入到白水县首蓿沟回民起义军营垒里去,而白水县首蓿沟的回民早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在这一带坚持抗明斗争了。到了崇祯初年,陕西鄜州、中部、雒川、宜川之间的回民便乘机而起,很快就发展到数万之众。

“老回回”马守应正是在浩浩荡荡的起义洪流里,从千千万万个回民起义军中涌现出的一位杰出的农民英雄。马守应最早是在崇祯元年(1628年),与高迎祥、罗汝才等人以边兵身份共同揭起反明义旗的。边兵或者叫镇兵,他们的起义主要是由于明朝政府财政困难和军官长期克扣军饷所致,从天启末年到崇祯二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的军饷竟积欠了三十六个月,士兵无衣无食,忍无可忍,纷纷逃散,并与饥民联合起义反明。而在边兵当中,不仅有汉族,也有回族、蒙古族的成员,所以高迎祥、马守应的这支队伍,就是由所谓“夷汉降丁”组成的“坚甲铁骑,兵有纪律”^②的汉、回各族联合的流民武装,开始时他们转战在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一带,崇祯三年(1630年)三月,马守应与八金刚、王子顺(据说就是白水举义的王二)等支义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破襄陵、吉州、

① 戴笠、吴汝《怀陵流寇始末录》卷四。

② 谈迁《国榷》卷九五。

太平。崇祯四年,马守应与高迎祥都成为以紫金梁(王自用)为首的三十六营农民起义军中的著名首领。崇祯五年(1632年),马守应与紫金梁等一度进军河南,活动于清化、修武,不久转入太行山。崇祯六年(1633年)五月,马守应又与混天王等率军数万出太行山东进河北,逼邯郸、沙河诸县。这一年紫金梁不幸牺牲,三十六营起义军由高迎祥率领,他们又由黄河北岸渡滹池,突出豫西,开辟新的反明战场。

崇祯七年(1634年)三月,马守应的一支武装联同过天星、满天星等共五营,以疾风般的速度由豫西进入湖北,经枣阳、巴东,西入四川,攻破川东重镇夔州,远近震动,这是明末农民军最早进入四川的一支武装。马守应与过天星等三万人马在川东停留的时间很短。不久,他们又返回湖广,在郧阳的黄龙滩作短暂屯聚后,又转入陕南商雒山区,同混世王等支农民军数万人一道,面对强大明军的包围,展开了艰苦的反围剿战斗。他们曾突入关中,连营五十里,猛扑西安,使明皇朝在西北的政治中心受到威胁。崇祯八年(1635年)八月,马守应等营由陕南商雒东进河南,开辟了浙川山区作为据点,在豫西卢氏、永宁、陕州、灵宝、南阳一带坚持抗明斗争。

马守应率领所部,转战各地,飘忽不定,以灵活多变的战术打击敌人,常常以智诱敌或者在败中取胜。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夺取陕州之役,马守应让部下打扮成明军模样,到陕州诈称换马,乘机突入关厢,出敌不意一举夺取了这座豫西北的重镇。崇祯九年七月,农民军领袖高迎祥在陕西盩厔作战中不幸被俘牺牲,八月马守应率军进攻河南省开封府城,火焚西关,明廷深为震恐。在河南鄢陵、扶沟,明军左良玉率部紧追马守应不舍。左良玉是一支颇为凶悍狡猾的敌人,马守应沉着应战,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向

郑州方向转移,并避入深山派人骂阵诱敌,被激怒了左良玉率军追入夹山,被马守应义军团团围住,不久粮尽援绝,左良玉自杀未遂,后来才率残部突围狼狈逃窜,这是马守应以智胜敌的一个典型战例。正由于马守应在流动作战中的胜利和不断给予明朝军队以打击,他在明封建统治者眼里被认为是属于农民军里“反复狙诈,怙恶不悛”^①的一个。也正由于马守应在农民军中是一个很有军事才能和作战经验的“多权韬”^②的英雄人物,他受到各支义军的信赖,并把他奉为“谋主”。^③

崇祯九年七月,闯王高迎祥的牺牲,使农民军遭到严重损失,农民战争一时陷入了低潮,就在这时,马守应不仅耀威开封,痛击左良玉,而且抓住战机,开辟新战场。他乘秋高足食和明军不备,以全军联合罗汝才、张献忠等营共二十万人马,马守应被推举为盟主、总掌盘子,这说明他一度在各支农民军中处于相当高的地位。这支大军由豫西南经湖北襄、樊,浩浩荡荡沿江长驱而下,进军至湖北东部,与久踞大别山区的英山、霍山地区的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玉(贺锦)等营会合,从崇祯十年(1637年)到十五年(1642年)间,回、革、左等营农民军主要活动于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地带,开辟和坚持了大别山区的反明斗争。马守应与革、左诸营善于利用山区的险阻,盛夏时在深山休整,秋高马肥再主动出击敌人,又能避开敌人的围攻和追击。他们还善于侦察敌情,掌握主动,各地老百姓包括“星卜市贩之流多为所用”,^④明军的虚实动静,农民军了如指掌。他们可以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采用“兵多则窜,

① 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②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四。

③ 戴笠、吴汝《怀陵流寇始末录》卷九。

④ 戴笠、吴汝《怀陵流寇始末录》卷一三。

少则迎敌”，“官兵未至，旋即奔逸”^①的灵活战术，主动攻击敌人。所以，镇压农民起义的明朝将官们在屡败之余也一再哀叹，由于回、革、左诸营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在江淮一带竟然出现了“贼为主，兵反为客，是以多败”的“民贼莫辨”^②的局面。就这样马守应与革、左诸营的铁骑纵横驰骋在大别山区和江淮平原，他们曾占据过和州、含江、江浦，明统治者的陪京金陵也暴露在农民军面前，以至沿江戒严，所在告警。农民武装沉重地打击了明皇朝在这一地区的封建统治秩序，有的地方官吏慑于农民军的威势，不得不“絮印视事于濒江湖”，在安庆竟出现了明朝守将与农民军之间“有无贸易，酒食交欢”^③的情况，明皇朝的威严扫地以尽，以致凤阳总督朱大典受到罢官的处分。在农民战争处于低潮的几年中，回、革、左诸营在江淮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其他各支农民武装的反明活动，为不久李自成、张献忠的东山再起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马守应不仅足智多谋能征惯战，而且如同许多的农民起义领袖一样，他也是一位具有革命气节始终坚持抗明的英雄。明统治者曾经多次向他诱降，都被拒绝。崇祯九年马守应在河南淅川军营里还杀死了前来劝降的明朝总兵，然后移营而去。^④这也是明统治者把马守应视为“反复狙诈，怙恶不悛”者的一个原因。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起义军进一步壮大，马守应率部北上正式并入李自成的闯王旗帜下，主要在湖北西部和湖南西

① 彭孙贻《平寇志》卷三。

② 戴笠、吴旻《怀陵流寇始末录》卷一三。

③ 戴笠、吴旻《怀陵流寇始末录》卷一四、一五。

④ 戴笠、吴旻《怀陵流寇始末录》卷九。又见谈迁《国榷》卷九五记崇祯九年（1636年）“巡抚河南陈必谦趋南阳，令南阳知县何腾蛟谕淅川贼，不听。总兵解进忠自往，被杀”。

北部一带活动,攻占了夷陵、澧州、常德等重要城市,这期间马守应还率军在河南配合李自成参加过几次重要的击败明军主力的战役,发挥了积极作用。李自成在北上之前曾授予马守应为“永辅营英武将军”^①的称号。李自成北上进攻北京的时候,马守应继续坐镇承天、荆州、澧州等处,牵制了这一带的明朝军队,成为独当一面的势力。在四川的张献忠这时也派人专程前来同马守应修好,表示进一步联合对敌。

老回回马守应本人和他这一支起义军的最后结局,据吴伟业在《绥寇纪略》里记载说,到了崇祯末年,“老回回已病死,众推其妻掌营”。又说,从马守应营里分出来一支别名“摇天动”的农民武装,共有八营二十余万,仍在江北的潜山、桐城一带坚持斗争。同书后面还有“大、小老回回”等绰号的出现。说明马守应虽然病死,他的队伍并未溃散。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朝统治者在诏书^②里还说,当时在四川有张献忠、湖北有老回回等支农民武装,仍在坚持抗清斗争。由参加明末农民战争到坚持清初的抗清斗争,是一个有意义的转变,是由反封建压迫为主的斗争转变为以反抗清朝民族压迫为主的斗争,老回回一支人马在湖北的抗清同顺治五年回回人米喇印、丁国栋在甘肃发动的抗清斗争一样,都属于遍及全国的抗清总运动的一部分,代表了回族人民同汉族人民采取联合行动的正确方向。

那么,《绥寇纪略》和顺治诏书关于老回回存亡的记载是否产生了矛盾?老回回马守应到底在崇祯末年已经病死了,还是清朝顺治初年仍在坚持抗清斗争呢?问题在于对“老回回”一词的解

① 谈迁《国榷》卷九九。

② 《清世祖实录》卷一五。

释,“老回回”应是一种旗号,“老回回”有时指马守应这个人,有时指马守应和他所率领的那支武装,后来又指已经没有马守应的原马守应所率的那支武装。这样就可以说,崇祯末年“老回回”马守应已经病死,由他的妻子或者子侄辈掌营,继续打起“老回回”的旗号,或者使用“大老回回”、“小老回回”的旗号来统率这支重要的农民武装,而顺治初年仍在湖北坚持抗清斗争的“老回回”,则已经是没有马守应的那支“老回回”武装了。“老回回”马守应和他的那支武装的结局大致如此。^①

马守应从崇祯初年同高迎祥、罗汝才一起成为明末农民战争中最早起义的著名农民领袖之一。他历经十多年的戎马生涯,先后转战于陕西、甘肃、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四川、安徽、湖南等省。明末农民战争有三个被明统治者称为“巢穴”的最主要的活动地区,陕西北部的黄龙山区,这是起义最早发动地区。另外两个是以商雒山区为主的陕西、河南、四川、湖北交界地区和以大别山区为主的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地区。马守应和他率领的这支“老回回”武装,则一直是这三大地区的积极开拓者和主力之一。特别是正当农民起义低潮时期,马守应与革、左诸营坚持大别山区的抗明斗争,实际上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中坚力量。回、革、左的斗争及罗汝才诸营的斗争,对于张献忠的入蜀建国,对于李自成的北上颠覆明的统治,起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在评论明朝之所以被颠覆时说,这不单是李自成一支力量的作用,实际上是各支农民军即所谓“群盗”的共同作用。这一评

^① 《河南师大学报》1984年第1期智夫成《关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老回回”之死》一文,据《记事略》和《(康熙)荆州府志》等材料,指出“老回回”在1644年被张献忠所火并,马守应本人也为张献忠所害。按此事仍待考。即使“老回回”所都被火并,并不等于马守应被害。

论是颇为公允之谈。马守应足智多谋,能征善战,同时具有坚定不渝的革命气节。他的威名和实力,使敌人闻风变色,受到各路友军们的普遍尊重。因此,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老回回”马守应成为仅次于李自成、张献忠的重要领袖。

最珍贵的是马守应始终坚持团结合作的品质,他的绰号是“老回回”,说明他公开打出了民族的旗号参加到以汉族人民为主力的大起义中来,他继承和发扬了明代回汉联合战斗的历史情谊,他同其他各支农民军首领们的团结合作关系一直很好。在当时尽管明封建统治者把回族侮称为“回夷”,并对回族人民采取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手段,尽管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起义特别是对于有少数民族参加的反抗斗争,总是极尽挑拨污蔑之能事,但是在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各种文献记载中并没有发现回汉联合斗争方面发生过任何纠纷。在起义军内部回汉族人民之间,在马守应与各路农民军首领之间,没有因为民族成分的不同而产生矛盾与不团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回汉族人民能做到这一点确是极其可贵的。马守应最早同王自用、高迎祥、罗汝才,后来同张献忠、李自成、贺一龙、贺锦等农民军领袖们,都是并肩战斗,互相支援,患难与共,情同手足的。马守应同张献忠、李自成的关系尤为突出。崇祯初年马守应已经起兵发难反明的时候,张献忠响应马守应的起兵,投在他的部下,受到马守应的赏识,号为“黄虎”,后来才独树一帜的。^①不少文献提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在一次严重失利之后,部伍失散殆尽,他单人独骑由陕西商雒跑到河南浙川马守应的营里,养病半年多,后来由马守应分给他一部分人马,再度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七。

起事反明。^①这件事对于李自成后来的恢复与发展壮大显然是起了作用的。特别是鉴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后期,在各路农民军中彼此猜忌、倾轧事件屡有发生,而马守应那种始终主动团结友军共同对敌的作风就更加可贵。这种作风不仅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即使在整個中国农民战争史中,也不多见,这是很值得重视并给以充分估价的。^②

〔马寿千〕

① 彭孙贻《平寇志》卷三;另见《烈皇小识》等书。

② 参阅《齐鲁学刊》1980年第1期孙祚民《论明末农民起义军回族领袖马守应》;《民族研究》1980年第1期马寿千《明代后期的回民起义与回族农民英雄马守应》。

清 代

一 米喇印 丁国栋

清初国内的形势

米喇印、丁国栋，是顺治初年甘州反清起义的领袖。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胜利地占领了明皇朝首都北京，推翻了明皇朝的腐朽统治，明朝灭亡。不久，清军入关。清政权代替了明政权而成为中国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者。清朝政权是以满族贵族为首的中国地主阶级政权，满族贵族在所实行的各种制度、法令、政策中，除了阶级压迫的内容外，更是尽量制造民族差别，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以利于其自身的统治。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着两种大的矛盾，一是各族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的矛盾，实际是明末农民战争的继续和发展；一是以南明诸王为中心的汉族反清派地主和满族贵族的矛盾，这是明末以来明清统治阶级间内部矛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因此说，清初的反清斗争既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也有民族斗争的性质。千百年来回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在政治经济上结为一体，在清初汉族人民的反清斗争中，回族人民也积极参加。清顺治

五年(1648年)爆发了甘肃的回民起义。

甘肃的政局

米喇印(?—1648年),甘肃省甘州(今张掖县)人,回族,行伍出身,起义前任甘肃副将,一说任甘肃副总兵。丁国栋(?—1650年),甘肃人,回族。

米喇印、丁国栋原为明朝驻防甘州等地军官,素有勇略。崇祯十六年(1643年)底李自成派遣贺锦部攻克兰州,渡河西进,庄浪(今永登县)、凉州(今武威县)“望风归附”,接着攻克甘州(今张掖县)、西宁(今青海西宁市)。大顺农民军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和青海的河湟地区。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李自成撤离北京。顺治二年初,清军占据了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这就使得河西农民军失去了与主力部队的联系,陷于孤立无援。同年,清军进军河西,占据甘州,“置官镇守”,当地投降了李自成的明军又纷纷降清。至此,清朝统一了河西各地。

清军入关后,民族矛盾激化。大顺、大西农民军坚持抗清,京畿人民反“圈地”斗争,江南人民反“剃发”斗争,如火如荼。李自成、张献忠先后牺牲,福王、鲁王、唐王政权相继失败。但桂王政权建立,桂王政权与大顺农民军形成抗清联合战线,顺治四五年间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反清斗争出现新高潮。这时各地降清的明将在江西、广东、山西都叛清反抗。

时清军略定甘肃,派去巡抚等官,而投降清朝的明朝官僚,仍旧供职,他们摇身一变成了新王朝的显贵,敲骨吸髓,无恶不作。“陇右为害无过于各衙门。”^① 孟乔芳就指出:“秦属有司,仍袭故

^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

明陋习,每一官莅任,辄有铺设,其费多至一二千两不等。”^① 陕甘巡抚张中元说:“陇右为害,无过于各衙门散买皮张,武职滥受民词。”“甘肃一带不特回变一事往往以鼓噪为常事,杀官为奇货,虽边俗之薄恶如此,亦皆抚镇之不得其人也。”^② 孟乔芳在镇压起义之后也承认:“三秦沿边甘、凉、西宁民穷多盗,皆由亲民官吏所致。”^③ 于此可见广大河西地区的阶级压迫形势。清朝在河西的腐败统治,残酷的经济剥削,使回族人民无法生活下去。

甘州首义

时米喇印、驻守甘州,他对清廷重满轻汉以及歧视当地回民的一系列政策深为不满。清廷又在甘肃继续推行剃发令,督抚“严行申飭厅将卫所等官,不啻颖秃舌敝”,人们仍“蓄发如故”,不肯剃发。于是清廷在军中强行推行剃发令,命令军官带头。顺治四年(1647年)五月,清摄政王多尔袞下谕:“这不剃头的,该管地方官并家长、乡守、地保、邻佑”,均加治罪。^④ 这剃发令进一步激发了甘肃降清将士和回汉人民,特别是回族人民的不满。汉族人民有蓄发习惯,回族人民和汉族人民长期相处,也形成蓄发传统。剃发留辮,形似脑后吊了一条猪尾巴,改变了人的形象,损害了汉族的民族尊严,也严重地刺伤了回族人民的感情。对此,回汉族人民不能不耿耿于怀。于是,丁国栋等人酝酿起义,米喇印说:清朝“强人以难堪,与其猪尾长拖,为人窃笑,何如鸿飞远走,赋我遂初”。丁国栋深表赞同,认为“明之未亡,殆关天数。公如有志恢复,杀巡抚

① 王先谦:《东华录》卷二。

② 《陕甘巡抚张中元揭帖》,《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

③ 乾隆《西宁府新志》卷三四《艺文志·奏议》。

④ 《顺治朝奏本》十七号。

以据河西，固易事耳。鲁阳挥戈，梁公夹日，与夫汉窦融、晋张轨之所为，安见今人之不古若耶！”^① 谋划已定，暗中准备，择期起义。

顺治五年(1648年)初，清廷调遣甘州之兵前往四川镇压抗清义军，一时军心浮动。米喇印、丁国栋见时机成熟，乘机在军中秘密串联，酝酿起义。三月的一天，米喇印佯言兵变，亟须安抚，在甘州北城楼设宴，邀请甘肃巡抚张文衡、分巡西宁道林维造、刘良臣、黄得功等阖城官吏赴宴，预先埋伏军卒。席间，米喇印奋袂而起，慷慨陈词：“夫甘肃省，甘肃人之甘肃，我大明二百余年所涵以貽子孙也。今者故国遗臣，纷纷起兵，余虽非西州豪杰，响应东南，窃有志焉。公等其有意乎？”张文衡见势不妙，故意推拖说：“今日佳节，止可饮醇酒，赏黄华，公事不便谈也。”^② 林维造等人默默无言。米喇印又申以大义祸福，张文衡等人形同木偶，不为所动。米喇印便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③ 一声号令，伏兵齐出，张文衡等措手不及，被一网打尽。米喇印占据肃州，宣布起义，废顺治年号，委派总兵、副将及司、道等文武官员，挥戈东进，各地回民“一呼百应”，连克凉州、古浪、庄浪，杀死凉州副将毛镔等。至此，黄河以西各营堡军民望风归附，义军很快控制了河西走廊。

渡河东进

起义军乘胜渡过黄河，河东各地回民热烈响应，兰州回民于四月十五日攻开兰州城门，众人拥入，立即将仓库钱粮及清朝各官署搜缴一空。同日，金县(今榆中县)“内外回贼，一时作变”，占领县

①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一七。

② 同上。

③ 同上。

城。二十日，临洮城内回民里应外合，攻破县城。二十一日，渭源回民也攻占县城。闰四月，米喇印亲统大军，进据兰州，拥立明延长王朱识镑，号召天下，起义声势进一步扩大，一些前明遗臣、士绅也“欣而往降”，接受职务，参加起义。有众十万，号称百万。河西、临洮、兰州等地接连起义，直逼甘肃中部军事重镇巩昌（今陇西县）。“关陇大震”。此时，河州（今临夏市）、岷州（今岷县）、伏羌（今甘谷县）各地回民纷纷响应。

围攻巩昌

四月二十三日，巩昌附近回民响应起义，围攻巩昌。闰四月初一日，米喇印派遣数万义军，再次围攻巩昌。在将近十天的攻坚战中，连破巩昌三关，取得了重大胜利。“城内困窘”，岌岌可下。时陕西总督孟乔芳接到巩昌被围的消息，一面飞报朝廷，请求援兵。一面亲自出马进驻秦州（今天水），派副将马宁昼夜兼程进攻巩昌。义军与马宁战于巩昌城外广武坡，义军不敌，撤至巩昌城下。闰四月初三日，城内清军开门出城，内外夹击，义勇奋勇还击，伤亡甚重，被迫撤离巩昌，向西转移。

米喇印率军撤离巩昌后，分兵驻守安定（今定西县）、狄道、岷州、洮州（今临潭县）一线。孟乔芳分三路进攻起义军：马宁为上路攻安定；张勇由中路取临洮；赵光瑞为下路取岷州、洮州、河州。闰四月中下旬，临洮、岷、洮、河诸州皆被清军攻占。

固守兰州

米喇印、丁国栋调集甘州、凉州等地援兵，联合兰州等地义军数万人固守兰州。闰四月二十四日，三路清军，会师兰州。满洲八旗和绿营军也由西安到达兰州，与孟乔芳会合。义军出城迎战，被

清军内外夹击。米喇印焚毁黄河浮桥，渡河西撤。

清军攻陷兰州后，悬赏捉拿米喇印、丁国栋及延长王朱识镑。五月初，张勇败义军于马家坪，朱识镑被俘遇害。

五月底，米喇印、丁国栋率军退往凉州。清军渡河追击。米喇印且战且退，在永昌县水泉堡^①附近与清军激战，米喇印战死。起义军在丁国栋率领下退保甘州。

退保甘州

八月，丁国栋与新疆哈密地区维吾尔族援军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同守甘州。丁国栋多次派军出城，与清军交战，互有胜负。汉中总兵南一魁入城招抚，丁国栋虚与委蛇，拒不交出马匹武器。同时派义军严守城头，排列火炮，不放清军出入。顺治六年（1649年）下旬，清军攻城，义军奋勇抗击，连战数十次，相持五昼夜，矢尽粮绝，甘州城破。丁国栋和部下黑承印率余部突围撤往肃州（今酒泉）。

肃州保卫战

丁国栋到达肃州后，联合新疆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人民，拥立叶尔羌汗国哈密巴拜汗之子土伦泰为王，重新组织力量，准备战计。嘉峪关内外，回、维等各族群众纷纷起响应，军威大振，河西再次震动。时大同总兵姜瓖举兵反清，占据山西省十余州县，陕甘清军前往镇压，唯马宁留守甘肃。丁国栋看到甘肃防务空虚，分兵出没于甘州、凉州等地。

顺治六年（1649年）五月，清军至肃州，挖壕筑垒，实行围困。

^① 一说靖远县的水泉堡。

义军凭城固守。十一月十八日,马宁乘夜以云梯攻城,占领北城楼,清军主力得以入城。丁国栋率义军拼死抵抗,坚守十昼夜。十一月二十八日,清总兵张勇率援军前来,与马宁合兵。二十九日黎明,义军所坚守的西南角楼失陷,土伦泰阵亡,丁国栋及其部将黑承印被俘就义。清军破城,大加杀戮。

顺治初年甘肃回民起义,实际是一次有汉族、维吾尔族人民参加的联合起义。起义队伍的余部一直坚持斗争,直到顺治十年(1653年)。这次起义声援了全国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打击了清王朝在甘肃特别是河西地区的腐败统治,镇压了大批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近代甘肃汉族学者慕寿祺先生评论米喇印、丁国栋说:“及观其奉故明延长王朱识镑,证以父老所传,始知当日此举,意在排满,以响应东南,不图穆教^①有此革命人才,足为陇右光。清史以叛逆目之,何所见之不广耶?”^②慕寿祺认为清初甘肃回族中出现米喇印、丁国栋,实为革命人才,是甘肃的光荣,而清史记载中把他们列为叛逆之类是缺乏史学眼光的。

[杨怀中]

① 穆教,即伊斯兰教,此处实指回族。

② 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一七。

二 马进良

马进良(?—1717年),字栋宇,西宁(清代属甘肃,今属青海)人。他生活的时代,发生吴三桂叛乱和噶尔丹之乱,马进良参加平定了这两次叛乱,为国家统一做出了贡献。

从“弱冠从戎”到总兵官

马进良少年习武,身手矫健,“甫弱冠从戎,技勇冠军”。^①隶甘肃总兵孙思克麾下,驻防河西凉州一带。由于作战勇敢,“由行伍拔补把总,迁千总”。^②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叛乱,陕西提督王辅臣于次年据平凉叛应,攻陷兰州,临洮、巩昌等附。吴三桂从四川派兵声援,一时震动陕甘,从西北方面形成对清廷的严重威胁。

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以甘肃提督张勇为靖逆将军,加总兵孙思克左都督,王进宝都督同知,讨王辅臣”。^③孙思克离开河西,率部东渡黄河,克靖远及附近城镇。和张勇围巩昌,旋又奉命赴援秦州,下礼县、清水、伏羌(今甘谷)等县。后再回师巩昌,王辅臣守将投降,河东大片地区平定。这些战役,马进良应在其中。

围攻平凉,是击败王辅臣的最后一战。孙思克“率师出静宁,击败辅臣将李国梁,斩级五百,获裨将三,复其城。进次华亭,辅臣将高鼎率裨将二十八、兵千余,迎降。遂至平凉,与贝勒洞鄂师

① 杨应琚撰《西宁府新志》卷二八。

② 李桓撰《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二八〇。

③ 蒋良骥撰《东华录》卷一一。

会”。^① 孙思克战斗中奋勇当先，屡战屡胜，但不幸右臂被砍，伤势严重，不能督战。马进良得知后高喊：“斫我总兵手，我必杀之！”^② 遂闯入敌阵，斩杀砍伤孙思克臂之敌，取得胜利，马进良身亦多处负伤。康熙十五年（1676年），王辅臣势穷投降，平凉之战结束，吴三桂之乱西翼被平定。孙思克因功擢凉州提督，仍回凉州。马进良“升授守备，迁山丹营游击”，^③ 仍在孙思克部下。

孙思克对马进良十分赏识，上疏荐举，说“进良随臣征剿有年，深知其谋勇兼全，谙练军务。自调补臣标游击以来，每遣发防御，果敢争趋，且爱士卒、得人心，请就近题补臣标中军参将”，^④ 康熙帝特允所请。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授马进良直隶石匣副将。马进良离开孙思克部。三十四年再拔为古北口总兵官。石匣副将是要职，古北口是京北重镇，从此马进良戍守京北门户，担当军事重任。

从征噶尔丹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正月，马进良入觐，康熙赐冠服。三月，奉命随征噶尔丹，马进良率兵一千五百，扈从康熙帝亲征。大兵分三路，康熙帝自统中路，发布命令说：“行军法令最为紧要，奋勇前进者赏功，怯敌退后者治罪，此系定例。马进良与总兵岳升龙、白斌均才力壮健，素有谋略，经朕简用倚任之人。”^⑤ 给予了马进良特殊信任。战斗中，康熙“躬率兵前行，诸军以次进发，抵克鲁

① 《清史稿》卷二五五《孙思克传》。

② 《清史稿》卷二五五《马进良传》。

③ 《汉名臣传》卷一四。

④ 《国朝耄献类征初编》卷二八〇。

⑤ 《汉名臣传》卷一四。

伦河,噶尔丹知圣驾亲来大惊,尽弃庐帐器械逃去。甲子,上亲率前锋兵穷追,噶尔丹仓皇遁走,沿途遗弃器物”,^①取得征噶尔丹的胜利。马进良在征战中“多著奇迹”。^②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被赐“骁勇将军”额,次年赏戴孔雀翎,四十二年(1703年)再拔直隶提督,达到其戎马生涯的顶峰。

马进良在直隶提督任上,整饬营伍,训练严明,军政皆佳,受到康熙谕奖。四十五年(1706年),马进良上疏,请求在哈喇和屯地方为官兵修建营房,兵部题交马进良设法建造,康熙怕“扣除兵饷”,影响防务,谕令内务府拨给。^③在康熙帝心目中,马进良是一名骁勇善战的良将,击败王辅臣的平凉之战后三十多年(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仍以他在战斗中奋不顾身的事迹,作为激励将士的楷模,说:“孙思克等在平凉时与贼大战,孙思克之手被贼砍中。马进良曾为孙思克标下武弁,闻之曰:‘砍我总兵之手者,吾必杀之!’遂突入万军中,追杀砍孙思克手之贼,马进良数处中伤,至今尚有伤痕,可谓奇勇矣!”^④马进良军中缺中军参将一员,康熙帝得知后命以马进良子马龙补授,以示对他的恩奖。

岁月流逝,马进良在古北口任上度过了将近二十个年头。康熙五十二年(一说五十三年,公元1713或1714年),马进良“以老乞休”。康熙览其疏“情词恳切”,命以原官致仕,辞官归乡。家乡一时引为光荣。马进良在西宁北关建修了一个礼拜寺。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马进良卒于家。康熙十分悲痛,说:

① 《东华录》卷一七。

② 《西宁府新志》卷二八。

③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二六。

④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四三。

“马进良效力多年，勤劳懋著，予告未久，忽闻溘逝，朕心深表怜悯。”^① 溢襄毅。马进良的家乡对马进良十分敬重，《西宁府新志》上说他“居衷诚笃”，“已入乡贤”。

马进良有功国家，光耀民族，是名垂青史的人物。

〔李松茂〕

① 《国朝耄类征初编》卷二八〇。

马 宁

马宁(?—1680年),宁夏(清代属甘肃)人。原为明参将,顺治二年(1645年)投清,隶汉军正白旗,委署凤翔中协副将。

打击反清义军

顺治三年(1646年),随宁夏总兵刘芳名剿镇李自成余部。“时李自成将贺珍、贺弘器、李明义等分据汉中、兴安、固原诸地,窥西安。”^①马宁与游击张勇将其打败。顺治四年攻克固原,俘获贺弘器、李明义。

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河西回米喇印、丁国栋在甘州(今张掖)杀甘肃巡抚张文衡等,起兵反清,以故明延长王朱识镑为号召。队伍南下,于四月连克凉州(武威)、兰州、临洮、洮州(临潭)、河州(临夏)、岷州,围巩昌,势如破竹。有“众十万,号百万。关辅大震”。^②清廷命陕西总督孟乔芳率兵镇压。孟乔芳进驻秦州(天水),派马宁、赵光瑞等解巩昌之围。马宁和回军大战广武坡,得胜,“又冲杀七十余里,杀回贼三千,余众悉溃”,^③巩昌之围遂解。孟乔芳再分兵三路,进击回军所占各州县。“副将马宁、刘友元、游击张勇破回贼于临洮内官营,斩获甚众”。^④临洮、河州、洮州、岷州相继被官军攻陷。马宁在战斗中“剿贼有功,委为副将,

① 《清史稿》卷二五五《张勇传》。

② 魏源《圣武记》卷七《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③ 《清实录·世祖实录》卷三八。

④ 同上。

提督中军事务”。^①

顺治五年五月,清军三路会攻兰州。朱识镔在马家坪被俘杀。马宁和张勇、赵光瑞等会师兰州城下,占领兰州。回军渡河西撤,清军追攻,战斗转向河西。顺治五年五月孟乔芳疏报:“官兵大破叛回于巩昌、临洮、兰州等处,城邑俱复。”^②

顺治五年七月,清军占领凉州。同月,河州回民再次反清,马宁等“差人去城下,唤出叛回头目十数人,伸宣朝廷神武不杀,再三抚慰,方始俯首受招”,^③再次将河州地区的回民反抗平息下去。八月,清军进抵甘州,马宁直接参与对甘州的进攻。甘州回民“占据城楼,火炮弓箭络绎棋置”,清军“分布掏壕,四面攻围,不时对敌,客主犄持数月”。至十一月二十三日,城内回民“食尽兵疲”,总兵南一魁进城招降,回兵“仍踞城头,排列火炮,不肯下城,不纳器甲,迁延两月,把守城门,不容官兵入”。总兵张勇“运梯扒城,有正红旗满洲官兵由西城先上,与同督标中军副将马宁、赵光瑞……等自西南角斫杀至西北角”,回军“拼死拒敌”,“退出北关,仍复死守”。在城外三十里北观音山和官军大战,“周围二十里血流成川,尸积如山”。^④顺治六年(1649年)二月,清军占领甘州。

顺治六年五月,清军到达肃州。甘州被破后,城内百余名“缠回”(维吾尔)被杀。丁国栋到肃州后,联合关外穆斯林,立“缠回”土伦泰为王,形成关内外穆斯林联合反清形势。肃州深壕高垒,城池坚固,清军从四面包围,但不敢进攻,只在城内回民外出放牧时伺机截击。此时适有大同总兵姜瓖反清,孟乔芳东调平定,攻拔肃

① 《兵部尚书阿哈尼堪等议复孟乔芳请补用马宁为副将题本的贴黄》。

② 蒋良骥撰《东华录》卷六。

③ 《巡按陕甘监察御史王世功为招抚河州回民揭帖》。

④ 《署甘肃总兵张勇为恢复甘州塘报》。

州交马宁、张勇。相持半年余,顺治六年底(1650年初),清军总攻,“副将马宁等竖架云梯攻克此城,斩土伦泰,生擒丁国栋、黑二,复克肃州”。^①米喇印、丁国栋反清最后被平定,马宁“叙功加都督同知”。

顺治七年、八年(1650年、1651年),马宁和赵光瑞攻灭北山(关中平原北面诸山)反清武装刘宏才部。九年(1652年)三月又进剿郃阳(今陕西境内)的反清武装,取得胜利,“寻擢四川右路总兵”,驻保宁(府名,辖境相当今四川南部以北的嘉陵江流域和平昌以北的渠江流域地)。

追击南明政权

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孟乔芳兼督四川兵马钱粮,上疏言:“今四川未定,当令右路总兵官马宁率精兵三千驻保宁,以步兵五千分驻保宁迤北广元、昭化间,以屯田为持久。”^②马宁参加规取四川。顺治十一年(1654年),“以军政卓异,赐鞍马弓箭”。^③顺治十五年(1658年),随定西将军李国翰再复重庆。后经桐梓趋遵义,与明将李定国部战,再自水西走云南。当时桂王朱由榔由李定国扶持在云南抗清复明。顺治十六年(1659年)逃亡缅甸。马宁追剿桂王加右都督,十七年(1660年)改授援剿云南前镇总兵,驻大理府。同年四月,吴三桂疏言:“滇南负固年有,一朝勘定,独永历在缅,李定国、白文选等分住三宣、六慰、孟艮一带,借永历以蛊惑众心,窥我边防,患在门户;号召诸蛮,患在肘腋;投诚生心,患在

① 《陕西总督孟乔芳为报肃州战况题本的贴黄》(顺治七年元月十五日)。

② 《清史稿》卷二三七《孟乔芳传》。

③ 《清史列传》卷七八《马宁传》。

腠理。请大军入缅,以靖根株。”^①彻底消灭桂王成为清统一西南边陲的最后一役。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马宁移住猛卯(孟养,清内属,今属缅甸)。同年十一月,吴三桂率兵入缅。马宁偕副都统石国柱、总兵沈应时、祁三升、马宝、高启隆、马帷兴等由姚关至木邦(一作“孟邦”、“孟都”,清内属,今属缅甸)。当时桂王部将白文选派人到木邦纠集土兵,马宁杀其将、降其众。康熙元年(1662年),缅甸政局发生变化,桂王被新缅王执交吴三桂。吴三桂杀桂王于昆明,南明残余势力最后被消灭,马宁“叙功加左都督”。康熙三年(1664年),攻剿已降复叛的水西宣慰司安坤。四年,平定云贵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稳固清朝在那里的统治。

康熙十一年(1672年),马宁升迁湖广提督,离开西南。十二年调山东提督。同年吴三桂叛乱。次年马宁奉命随顺承郡王勒尔锦师至荆州讨伐吴三桂,加太子太保。康熙十八年(1679年)奉敕还京。次年(1680年)卒。

马宁一生征战几十年,从西北到西南,对清初统一局面的形成有贡献,但也参与了对人民反清运动的镇压,是个功过参半的人物。

[李松茂]

^① 蒋良骥撰《东华录》卷八。

哈国兴^①

哈国兴(?—1773年),直隶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县)人。出生于将门世家,父哈攀龙曾任固原提督、湖广提督。哈国兴乾隆十七年(1752年)武进士,以三等待卫分至云南。乾隆二十三年任云南督标右营游击,五年后升至东川营参将。

哈国兴从乾隆十七年(1752年)到云南军营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病死于小金川军中,除了最后一两年参加了攻夺小金川之役,其他时期都是在云南西部同缅甸对我土司地方的袭扰而进行抗击和交涉。同其他为清廷效力四五十年的回回老将比较,哈国兴去世过早。然而,哈国兴出身将门,作战勇猛,且有谋略,深受皇帝宠信,因此他升迁较快,在云南的影响也较大。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缅军大规模进入我滇西腾越、永昌二府。哈国兴随总兵朱仑出征铁壁关(今瑞丽西北)。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哈国兴仅率九百名士兵,同数万缅军苦战四个昼夜。他们利用高山优势,竖起木棚作隐蔽,待缅军靠近才下令开枪,这样才能以少抵多,坚持不懈,直到提督李时升领兵七百人来援,终于解围。从此,缅方都知道清军里边有哈将军者。乾隆三十二年年年初,哈国兴奉命守卫猛卯司(今瑞丽),在激烈的攻防战中,他的右臂受枪伤,门牙也被打落,调回军营调养。由于战功卓著,赐戴孔雀翎,升任腾越营副将。年底又擢升为楚姚镇总兵。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到北京受皇帝接见,命在乾清门行走。九月,调任普洱镇

^① 本文取材,见于《清史稿》卷三一〇,《国朝耆献类征》卷二八六,《滇系》七之八《典故》,《阿文成公年谱》卷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外交类141号、337号。

总兵。十月，擢升为贵州提督，仍留驻滇西军营。不久，皇帝认为哈国兴自从对缅战事以来，甚为勇往出力，办理军务也颇妥帖，且又熟悉边情，因此又调任云南提督。同时，又赏加太子少保衔，以示奖励。

乾隆三十三年，缅甸一个小头目诺尔塔差人送来信件，表示应战说：“当真要比武艺，我们将地方上的城池、壕沟、粮草预备停妥了，并不缺少一样”，“莫说是天朝大皇帝地方，就是各国的人来，出不过我的手”。云南也在准备对缅大举进军。四月，经略傅恒建议兴办水师，以便水陆并进。哈国兴受命在盏达司（今盈江）西铜壁关外督造战船。七月船成，哈国兴随经略由猛拱、孟养等地进击。缅甸水陆防御甚坚，清军不服水土，生病者多，水兵又不能进。只有将军阿桂一路，出虎踞关，至老官屯，兵威颇壮。双方没有大的战斗，协议解兵。哈国兴出面与缅方头目谢己万及小头目得鲁蕴协议三事：一是不许侵扰边界，二是送还扣留的内地人，三是十年一贡。缅方头目发誓奉约，于是乃撤兵。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缅方迟迟没有照约行事。四月，云贵总督彰宝差派都司苏尔相前往老官屯缅方送信，缅方头目诺尔塔将苏尔相等一行人扣留，并致函哈国兴说：“你们大兵打老官屯时候，你们也打的不耐烦了，我们也累了，两边俱已停兵，两边人俱受太平了。你们打发苏总爷拿字到我们这里来，字内说的是你们的兵豪强，我们的人软弱，输与你们了的话。”“因此留下你们的人。穷人百姓做买卖的，你们都不放下来，闸起关口。”“求你们照前的话通了买卖吧，不要拦阻，照古礼相通往来。”诺尔塔来函还扬言哈国兴曾应允将木邦、猛拱、蛮暮三土司归还缅方。总督彰宝也怀疑哈国兴与缅方具约不以实。六月，乾隆皇帝召见哈国兴，斥责他对缅交涉时存有迁就完事之见。至于许给土司一节，哈国兴坚持从

未这样许诺缅方。皇帝以事情无可对质,是非难以判断,免去哈国兴在乾清门行走和太子少保銜。考虑到他屡次领兵打仗,颇属奋勉,降职为贵州古州镇总兵,以观后效。不久,乾隆皇帝从副将军阿桂等人的上奏中得知对缅交涉仍无进展。考虑到哈国兴在云南多年,熟悉边情,仍让他到云南军营办事。此后一段时间,哈国兴的处境相当困难。他已不是云南提督,却以贵州一个总兵的身份在云南办事。原是在对缅交涉中造成失误,却仍在办理对缅事务。阿桂等人让哈国兴办事,而朝廷已经不信任他。乾隆上谕就曾责问阿桂等人:你们的上奏好像对缅交涉“非哈国兴不行”,假设世上没有哈国兴,对缅事务就置之不问了吗?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五月,皇帝上谕以哈国兴在云南没有紧要事件,而夺取小金川的战事正需统兵大员,命令哈国兴即刻去将军温福军营效力。接着,哈国兴又被任为西安将军,统辖陕甘从征诸军。温福深知哈国兴带兵有方,命他独自带兵由策卜丹径取美诺。哈国兴并不盲目进军,他详察地形,认为策卜丹林深径狭不便取道。改为率二千人助海兰察攻玛尔迪克山寨。由于他作战勇敢又能随机应变而受到奖赏。九月,土司兵愿献鄂克什地(小金川东北境),向哈国兴请降。哈国兴饬令将南北两山、美美卡、木兰坝及玛尔迪克一并献出,才许其降。土司兵果然尽撤各栅,哈国兴以兵攻入鄂克什旧寨。十月,小金川首领索诺木派人到哈国兴军营投递禀帖,并送还前次俘去的外委臧儒,以求得宽宥。皇帝让温福用哈国兴的名义给与回檄,责备索诺木与僧格桑踞守要隘,抗拒官兵,说明本提督奉命随征,惟知奋勇杀敌,力缚凶渠,断不能为谎言所惑。哈国兴此时与海兰察、额森特等屯驻贡噶山,他们以五千之众,兵分三路,攻占路顶宗,先后击破敌卡五十余所,碉三百余座,俘获甚众。十一月,哈国兴率军进据兜乌山巅,与总兵马彪军会

合,夺下附近碉卡。各路清军向小金川紧逼。十二月,朝廷决定夺取小金川之后即三路进兵攻夺金川。皇帝上谕说,哈国兴虽是绿营汉员,对于领兵征剿之事曾经练习(指在香山设碉卡练习攻取事)。而且原在乾清门侍卫上行走,与满洲大臣无异。丰升额一路即着哈国兴为参赞大臣,分道并进。不是满洲人而授予参赞大臣职务,是清廷给与绿营汉员的一种特殊恩赐。不久,小金川被各路清军攻夺。哈国兴病故于军中。

乾隆皇帝对哈国兴的死深表惋惜,上谕说哈国兴从对缅用兵和在四川西路军营带兵攻剿,劳绩卓著,所以加恩授为参赞大臣。现在小金川已平定,正值进剿金川需人之际,倚任方殷,听到他的死,深为惋惜。赏银一千两,加赠太子太保,赐祭葬如例,谥壮武,入祀昭忠祠,图形绘制在紫光阁。乾隆皇帝为之制赞词云:“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将种。向略趱拉,屡举险要。中道病殁,成功未告。”

哈国兴的儿子哈文虎,乾隆三十七年由兵部带领引见,授为守备,到四川军营补陕西提标右营守备。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木果木战役中,与将军温福等同时阵亡,入祀昭忠祠,其弟文彪授为千总。哈国兴的弟弟哈国泰,乾隆三十六年在云南任千总,皇帝令其到京,用为巡捕三营千总,以便就近养亲。不久,调任云南临元镇总兵。

[马寿千]

苏尔相^①

苏尔相(1724—1800年),字君辅,甘肃灵州吴忠堡(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回民。乾隆七年(1742年)因家乡年荒,投奔在贵州当总兵的亲戚吉隆,在上江协当马兵。随后苏尔相由外委、把总、千总,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赴兵部引见,以守备补用。

苏尔相一生中的主要事迹是参加乾隆时期为打击缅甸地方头目对云南西南部土司的袭扰、勒索而进行的战争。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苏尔相随大将军明瑞出征,他领兵进军蛮结,第二年二月,追至天生桥、猛省地方。这次清缅冲突中,苏尔相接仗二十五次,均以超等功而受奖,七月补授为贵州定广协守备。十二月,苏尔相随副将军阿桂进兵奇木岭,再立战功。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六月,经略大学士傅恒等以苏尔相出师打仗著有劳绩,监造大炮颇知实心用事,奏请朝廷授予云南奇兵营都司。十月,攻老官屯敌寨,苏尔相身先士卒奋勇冲击,左腿受枪伤,仍旧力疾攻剿,毫不松懈。由于作战顽强,他屡蒙清廷赏赐银两。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缅方请求解围,愿奉表纳贡,并放回被拘的内地人员。阿桂负责办理撤兵事宜,苏尔相调回永昌。几个月过去,缅方并无音信,四月,云贵总督彰宝差遣苏尔相前往老官屯投送信件。缅方头目诺尔塔将苏尔相一行四人扣留不放,直

^① 本文取材,见于《清史列传》卷五七,《国朝耆献类征》卷二九〇,《清史稿》卷三七,《云南通志》卷一三九,《滇系》二之一《职官》,《腾越州志》卷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外交类337号、141号。

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四月,緬方头目得鲁蕴等人才伴送苏尔相及其随行兵弁到永昌,整整被羈留了七年。最初乾隆皇帝听说苏尔相被緬方扣留,非常气愤,传旨斥责苏尔相身为都司,带有兵丁同行,为什么不能同众兵舍死拼命杀伤彼众,为什么竟然束手无策,听其拘绊。阿桂等人递上苏尔相的申诉和诺尔塔的信函,乾隆皇帝仍不能原谅。指责苏尔相不能申明大义,骂贼捐躯,反而甘受拘绊,已属无耻贪生,罪责难逃。苏尔相的申诉只说了緬方询问言词,并无一言斥责,而且还为緬方所谓不通交易而辩解,更为国法所不容。“该犯罪情如此严重,其家属理应加之罪遣,以明法纪”。于是,陕甘总督明山奉上谕查办苏尔相的家属。苏尔相弟兄五人,他行二,三弟苏尔忠任嘉峪关署千总,父母和长兄都住尔忠处,老四尔福在家乡灵州。明山认为:“苏尔相原系回民,迁徙无常,行踪诡秘,若不将伊父兄提质,止据族戚一面之词,恐未的确。密札肃州镇、牧,将苏尔忠父子家属查拿,押解赴省,严加究诘。”明山的话还说明苏尔相父兄人等的无辜受牵累,和他们是回民有关。苏尔相的五弟原已过继给谭姓,在四川成都府开店,也由四川督臣查拿究讯。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苏尔相的父母及弟弟尔忠、尔福都被押解到刑部。乾隆皇帝下旨:“其妻子亦当严惩,而父母兄弟交川督办理即可。”第二年,贵州巡抚宫兆麟将苏尔相的妻子苏张氏及子苏若霜、女二黑、三黑等送交刑部执法,刑部判决将她们发往伊犁,给披甲人为奴。由于其子女尚未成年,改为先行监禁,等满服刑年龄时一并发遣。这之后,苏尔相的子女先后死于狱中,妻子也死在发遣途中。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苏尔相回到云南受到严厉审问,留有供词。云贵总督彰宝当年给的札谕牌票,苏尔相七年来一直小心拿着,不敢遗失。苏尔相在供词里说出了在緬甸被拘留和求死不得的经

过。供词说刚到老官屯时,“诺尔塔差人来说,天朝的文书我们是要搭盖棚子迎接的”。后来“诺尔塔说,你的文书骂我们作粪坑蛆虫,我王子叫留下你们,上起脚镣”。“因我要勒死,他们更加看守严紧”。供词又说:“只是我起初不曾就死,还活这几年就是我的罪了。”审查的人员诘问:“你系四品职官,为何活着?上吊抹脖子,分明撒谎。”苏尔相说:“死在内地,尸骨在主子的地方,所以痴心等着。”由于译出缅方来信,也说到当初不该扣留苏总爷,苏总爷多次闹骂寻死被救云云,此案才有了大的转机。乾隆皇帝命阿桂传谕苏尔相:他从前原是奉差前往而被羁留,本无过失。又得知曾屡次欲寻自尽,情颇可悯。上谕进一步安抚苏尔相,到京后准备加恩,让他不必忧惧,途中没必要锁解,云云。七月,苏尔相到京,赴部引见。奉旨苏尔相发往云南,交云贵总督李侍尧,补用游击,并给假让他回原籍省看坟茔,然后再到云南候补。乾隆还赐苏尔相诗一首,把他比喻为苏武:

差往缅甸因被羁,今知悔罪送旋归。

兵传后实非佳也,事贵先声信有之。

瘠地瘴乡怜久汝,冰天雪窖岂殊其。

设如比拟伊家武,无子无妻谓过伊。

苏尔相还没有离京返籍休假,皇帝得知他与缅甸头目得鲁蕴极为熟识,考虑到得鲁蕴到关进贡还人的时候,最好由苏尔相出面承办此事为妥,即令苏尔相驰驿回滇,等得鲁蕴到关,由苏尔相接待并伴送来京,此事办完再令随便请假回家。这年八月,苏尔相到云南,十月补鹤丽镇标游击。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六月,缅方进贡还人的事仍在观望。皇帝又传谕云南巡抚裴宗锡,酌给苏尔相假期回籍看视。苏尔相以边事为重,担心缅方随时有信到关,他请求仍留职守,待边事办毕再回籍省视。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云贵总督富纲称赞苏尔相老成干练,熟悉边情,驻防边地十分得力,奏请加衔补用。乾隆四十九年正月,赏参将衔,七月升署顺云协参将。五十一年改为实授。第二年又升任龙陵协副将。五十六年保列一等,赴部引见,准其一等注册。皇帝召见,赏戴花翎及大缎二匹。乾隆五十八年授鹤丽镇总兵,第三年又调腾越镇总兵,始终在滇西一带驻防。

嘉庆元年(1796年)和嘉庆四年(1799年)苏尔相先后在威远(今景谷)和缅宁(今临沧)参加镇压拉祜族联合瓦族的反清起义。嘉庆五年(1800年)苏尔相留缅宁办理善后事宜,不久因旧伤发作,返回腾越镇调理,病故于保山县。据苏尔相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供词所述,那一年他已经五十三岁,应该生于雍正二年(1724年),那么嘉庆五年病故的时候,他已是七十六岁的老将了。

苏尔相的儿子天贵,嘉庆元年荫生,曾以主事分发刑部行走。苏尔相死后,天贵奉旨入籍云南保山县。

[马寿千]

三 王岱輿

家世和当时学风

王岱輿,号真回老人。生卒年不祥。大概是生于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歿于清顺治年间,可能是在顺治十四五年(1657—1658年),活了五六十岁以上。^①

岱輿的先世,原是西域人。所谓“西域”,不知是指现在的新疆还是葱岭以西的地区。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岱輿的先人因“朝贡”到了南京。后来在钦天监作官,就在南京住下来了。

在王岱輿以前,胡登洲等人倡导的经学,其兴趣在于培养宗教教师,即现代所谓阿洪。在他们门下的学者不一定要懂汉文,但必须学习阿拉伯文,有时还要学习波斯文。这种学习方法的特点,在于培养直接阅读经典原文的能力。但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人,对伊斯兰教提出了一些问题,要求解答。同时,穆斯林中也有一些人读了一些汉文书籍,而不懂得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但想懂得伊斯兰教

① 岱輿有《真詮·自叙》,未署作序年月,但序中自称“真回老人”,当时作者年龄当在四十或五十以上。梁以浚为《真詮》作叙,跟岱輿《自叙》,同为《真詮》初次刻版前后之作,而梁叙署崇禎十五年(1642年)。从崇禎十五 years上推四十年或五十年,相当于万历二十年(1602年)或万历十年(1592年)。岱輿的生年,距离这个时期当不太远。我们说他“大概生于万历年间”,或无大误。

岱輿的卒年,可能是在顺治十四五年(1657—1658年)。何汉敬在顺治十四年中秋后四日,为《真詮》作序。依序文的口气看,岱輿在这时尚健在。到了第二年四月,马忠信写《希真正答·弁言》时,说“往日岱輿王子”,并且在《正答》定稿时没有说到请岱輿校阅,大概岱輿在这时已去世了。

自万历十年到顺治十五年是六十六年。自万历二十年顺治十五年是五十六年。我们说岱輿“活了五六十岁以上”,似尚稳妥。

义。于是,关于阐述伊斯兰教义的汉文著作和翻译,就成为必要的了。在明末清初,王岱舆和张中是这种新学风的倡导者,而岱舆的著作刊行更早。^①

岱舆在幼年时期,大概主要是受的宗教教育。在二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学汉文,能写信记事。三十岁以后,阅读了子史和性理书籍,还阅读了佛道两家的著作。他往往用伊斯兰教的道理同教外人谈论,并把谈论写成文章,后来辑成了用汉文写的《正教真诠》一书。^②

《正教真诠》和《清真大学》

《正教真诠》分上下两卷,共四十篇。上卷二十篇是讲宗教哲学的。下卷二十篇基本上是讲教法的。《真诠》采取了卫护伊斯兰教的立场,批驳了儒、佛、道跟伊斯兰乖违的地方。有人问他:“子之书,将以明道也,但言清真之道,使晓然明白,或正或偏,自有能辨之者,何必援引诸家,彼此辩论,不几树敌乎?”他回答:“然则是予区区苦心,终无一人谅之者矣。夫清真教道,指迷归正,劝人作

① 岱舆以前,已有关于伊斯兰教的汉文书,可考者有下列四种:(1)《清真教考》,张忻撰。忻,《回族人物志》明代卷有传。(2)《群书汇辑释疑》,詹应鹏撰。应鹏,《回族人物志》明代卷有传。(3)《省迷真原》。(4)《证主默解》。后两书撰者姓名不详。《真诠》上卷《易真篇》说:“或有粗知汉学而稍习经旨者,间亦注(著)书于世,无非浮语浅训,不过修身而已。或有两不相通,惟以道听途说,妄自纂而成编者,若《视迷真源》是也。观之莫不窃笑,作者竟不知耻,岂不有辱清真之至道哉!然浅近者无害于浅,但得其正何妨。其妄作者一览便知,犹不足论。譬如云掩日光,顷之自散,何害于明。惟恐精于文翰而鲜知经义者,纵然资性明达,惜乎未经止指(指正),遂以异端之学搅乱清真。虽然似是而非,但其巧媚,能夺人之心志,此清真之最恶,正人之深忌者也。若《证主默解》是也。”据此可略见两书的内容。

② 岱舆的先世和治学的过程,见《真诠·自叙》和梁以浚为《真诠》作的叙。梁叙说岱舆“四教博通”。“四教”,当是指回、儒、佛、道。

善,止人为非,乃人道当然。无此,则人道为不备。予既真知正学而不言,是为隐匿斯道。即作书言之,而不能恺切诚恳,犹无言也。如医家用药,不以受病之由与其患苦之所在,明告病者,彼必疑其不按吾病而妄投医药。虽有丹砂,瓦砾置之矣。且夫操戈同室,而欲不披发纓冠而救,非木石则奸顽人也。予即不肖,顾敢为此哉!”^①《真诠》初在南京刻版,约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后来有广州刊本、成都刊本。

岱輿又有《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两书。《清真大学》是系统地阐述宗教哲学的书,共分五篇。第一篇是“提纲”,总说本书的要义及其重要性。第二篇是“真一”,说真主独一的存在。第三篇是“数一”,说天地万物的由来和圣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尊贵。第四篇是“体一”,说人认识主圣的性能及其重要。第五篇是“总论”,申论以前三篇的意思。中间三篇分别阐述本体论、宇宙论及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本书重在正面阐述,在立意遣辞及全书组织上都比《真诠》要严密些。但以内容比较深奥,对后来的影响不像《真诠》那样地大。《真诠》和《大学》的文风颇不相似,可能其间有别人代笔之作。《大学》的最初刊本,无考。后来流传的,有成都刊本、北平清真书报社石印本、太原伊斯兰布道会排印本、马福祥排印本。

《希真正答》所论述,大意仍不出《真诠》、《大学》两书的范围。书用问答体写成,有些地方比《真诠》、《大学》更为明畅。书成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系弟子伍连城根据同学们的记载,在岱輿过世后写的。据说,本书只有传抄本,后马福祥据以排印。

岱輿晚年,住在北京。歿后,葬于京西三里河。

〔白寿彝〕

① 岱輿维护伊斯兰教的立场,见《真诠》书末的《问答纪言》。

马 注

早年的生活

马注,又名郁速馥,字文炳,号仲修,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生于云南保山。^① 注是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十五世孙。他幼年贫苦。父亲师孔,在他七岁的时候就过世了。祖父怜爱他,祖父不久也过世了。母亲吴氏带着他和他的哥哥渥,靠耕织过活。十八岁那一年,母亲也过世了。不过注总还有读书的机会。在十六岁的时候,中了秀才。过了两年,他在永历帝的小朝廷上做了一个小官。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永历帝在云南失败后,注以教书为生。这时,他二十岁,著有《樗棊录》一书,书没有传下来。

康熙四年(1665年),注二十六岁,到武定教书,他的文章和学问都有长进。他的兴趣向经世之学发展。著有《经权》二集,自信此书可以致用,并流传后世。^②

康熙八年(1669年),注三十岁。他看到吴三桂在云南的各种活动,感到云南会有变乱,就离开了云南,取道贵州等地,大概又经过河南、直隶,到了北京。

北京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伊斯兰教的学人也比别处容易碰到,他研究宗教知识的兴趣开始浓厚起来。他把一向爱文章喜

^①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年),注作《清真指南自叙》,自称“余年四旬有四”。由此上推,注的生年应是崇祯十三年己卯。

^② 《清真自叙》:“三十而著《经权》,期留青史,亦已编辑成书,自谓修其治平,得其至理。”《进经疏》:“著《经权》二集,期副上用。”

世功的心情收起来,对伊斯兰的研究下功夫了。这是他一生中很大的转变,^①是他后来成为宗教学者的关键时刻。遭遇上的不得意和交游上的影响,对于他这种转变可能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清真指南》的撰写

注累年研究的成果,后来集为《清真指南》一书。大概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注四十四岁的时候,《指南》已有了成稿。^②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注离开北京,取道山东,到了江苏、浙江。随后又改从水道,于二十五年正月初五到了安庆。后来又经过一些地方,到了陕西。二十六年秋八月离开了西安,冬天到了阆中。第二年二月,离开阆中,奔向回家的路。

注带着妻子法土墨和儿子世麒、世雄,^③走了四年绕大圈子的路,在各地交结了一些朋友,随时拿《指南》稿本向人请教。他说:“愚注不才,幸得游于燕、鲁、吴、越、齐、楚、中山、秦、蜀、滇、黔之会。海内名师,或睹其书,或见其人,或闻其教,采天下之遗珠,一准于经书。”^④这时的名师及教中学人,^⑤如山东的李延龄,南京的马之骐、刘三杰、袁汝琦,广陵的古之璜,湖南的皇甫经,陕西的舍起云,大概都是注在这次旅途中所结识的。三杰字汉英,之骐

① 《指南自叙》:“及三十五而访问经教,知天命之从来。日夜钻研,始觉前辙茫然,身心无济。于是因闻得晤,领海明师,或见或闻,著为《指南》一集。这可见注兴趣转变的经过及其跟交游环境的关系。

② 《指南》卷一《八箴》:“因检昔日纂录,删述全书,勉付剞梓,递相传阅,用公同志。”文末所署时间是康熙二十二年元旦。据此,这时《指南》已经成书,并要刊刻了。

③ 注的妻子,见《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公莹碑总序》,有传抄本。注的这位妻子可能是在北京娶的。

④ 这一段话,见《指南》卷四《世纪》。

⑤ 名师及教中学人,见《指南》卷一《海内赠言》及《指南》各卷卷首的署名。

字仲敏,之瓚字凤仪,这三个人差不多把《指南》已成的稿本都给校阅了。

注回到云南后,继续《指南》的增补工作。^①大概一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指南》形成了如下面的内容:

卷一、八箴,马承荫叙,保天佐叙,自叙,海内赠言,进经疏,援诏,请褒表,郁速馥传。^②

卷二、客问,真慈,体认,本用,天命,前定。

卷三、穷理,格物,性命,四行,天仙,神鬼。

卷四、认主,五课,戒持,课施,因教,世纪,本来。

卷五、格论,忠孝,宗戒。

卷六、问答。

卷七、八赞(独一,大能,普慈,调养,独慈,天国,地禁,判理),圣赞。

卷八、登霄说,登霄传,魔鬼传,教条八款,禁解,讨白(附条目),授书说,跋。

卷二和卷三讲的是天人性命之学,这两卷的要义又概括为卷七的《八赞》。卷四和卷五讲的是敬慎持身之道,这两卷的纲领又略备于《宗戒》一篇。卷六的问答,是杂论,共一百条,借问答的方式解释各种可能的疑问,所以补以前四卷的不足。卷八也是杂论。《教条八款》一一地提出了当时穆斯林社会的具体问题,乃以前伊

① 《指南》卷四《格论》篇末:“壬午之春,二月既望。是夜也,予辑书既倦,枕肱而寝。”这可见《指南》在壬午年仍续有辑补。然书中更无壬午以后辑补的痕迹。《指南》卷八末尾系有诗句,也只署“壬午初夏穀旦”。壬午就是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的后五年,注又作有《跋原道》,但他就不放在前八卷,而放在第九卷,作为一种补绪了。

② 《郁速馥传》,就是注在北京的弟子所作。传中只说到注出都返滇的事,当即这时的作品。这篇作品注可能亲自看过,并且可能是他自己放在《指南》卷一中的。

斯兰撰述中所未有的。这是注对王岱舆以来的经学撰述,在译述范围上之重要的发展。

卷一只是序说,不是书的正文,但在这里也收了几篇重要的文章。如《自叙》,可以看出马注求学的经过;《海内赠言》可以看出注交友的广和良友的多。《进经疏》和《援诏》是向清帝进献《指南》的奏疏,《请褒表》是请求清帝褒扬伊斯兰的表文。从后三篇可见注想借用政治力量提高宗教地位的设想。

注的文字追求典雅,特别喜欢用典,但并无雅趣。这也是注跟王岱舆等人所不同的。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六月,注在四川会理,作《跋原道》。四十八年作《天宫赋》。在这两篇文章外,后来又加上了《问答》三十一章,作为《指南》卷九。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注七十一岁。这时因武定有某种教派的流行,注认为这是“左道”,协助地方人士呈请武定府严办,并转请省当局通令全省查禁。事后,注忆记此案经过,并将过去所拟教款八条更定为十条,通告全省。这份通知,后来用“左道通晓”的标题刻在《指南》卷九的后面,作为《指南》卷十。^①自《指南》有初稿到《左道通晓》的写成,已经有三十年了。

《指南》远在有定稿之先,已有传抄本^② 在学生们和朋友们中

① 《左道通晓》在《指南》全书中刊为第十卷,但在《左道通晓》之前并未标“《清真指南》卷十”字样。这篇东西作为《指南》卷十,究竟是注的意思或后来刻书人的意思都不可知。

② 闽中的传抄本,见保天佐序。安庆有传抄本,见《授书说》。南京有传抄本,从刘智《天方至圣实录》之收有《指南》卷七中的《圣赞》可见。北京可能有传抄本,从《郁速轶传》之一再强调《指南》之重要可见。

间流传着。后来有了刊本,^① 它传布的广远似乎还在王岱舆《正教真诠》之上。

注的卒年无从查考,但至少也要活到康熙四十九年,他七十一岁的时候。关于他的事迹,^② 在见于《指南》者外,几乎见不到别的材料。注为咸阳王墓写有《王陵常住碑记》,笔法端秀。

〔白寿彝〕

^① 现在见到的《指南》刊本,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都刊本。这个刊本是根据道光八年(1828年)马大恩在成都的刊本。马本也是一种重刻本,他根据的是什么本子,尚待考查。

^② 本文所记马注事迹,除别有说明外,都见于《指南》卷一各篇。

刘 智

《性理》、《典礼》、《实录》和其它译著

刘智,字介廉,清上元(今南京)人。^① 他的父亲刘三杰校阅了马注《清真指南》的全书,三杰尝慨叹自己不能阐发伊斯兰的哲理。刘智正是继承父亲的遗志,^② 译著了大量有关伊斯兰的书,成为穆斯林中最有名的宗教著作家。

智的学习范围比较广泛。^③ 他从十五岁起,就跟着父亲读了八年的儒家书。后来学了六年阿拉伯文,又阅读了佛道两家的书和西洋传来的书籍。但他的中心思想却只是要阐扬伊斯兰的学问。^④ 他在知识领域的广泛的接触,使得他的著述具有了超过王岱舆、马注等人的有利条件。

智的译著,人所熟知的有三种。一种是《纂译天方性理》,简称《天方性理》。一种是《天方典礼择要解》,简称《天方典礼》。第三种是《天方至圣实录》。

《天方性理》于《例言》外,有经有传,经是全书的纲领,共一卷,分作五章。首二章说大世界理象显著之序,以及天地人物各具之功能,与其变化生生之故。次二章说小世界身性显著之序,以及身心性命所藏之用,与其圣凡善恶之由。末章“总合大小世界分合之

① 《清真指南》卷一《海内赠言》,收有刘智的父亲刘三杰的诗。刘三杰名下注有“上元广学”。

② 见《天方性理·自叙》、《天方典礼择要解·自序》。

③ 见《天方至圣实录》卷首的《著书述》。

④ 见《天方性理》袁汝琦序。

妙理,浑化之精义,而归竟于一真”。传是解说经的。每经一章,传即有一卷。经有一义,传就作一图,并作说明一段。这部书表示智的宗教理论体系。

《天方典礼》原来是一部完备的天方礼法书。因为篇幅太多,所以择取精要,叫作《天方典礼择要》,后来又因为怕初学的人不能读得明白,所以又加上了解说,叫作《天方典礼择要解》。全书共二十卷,前有例言,后有后编。二十卷的目次是:

卷一、原教

卷二、真宰

卷三、认识

卷四、谛言

卷五、五功一(总纲、念真)

卷六、五功二(礼真)

卷七、五功三(斋戒、捐课)

卷八、五功四(朝觐)

卷九、禋祀

卷十、五典一(总纲、夫道、妇道)

卷十一、五典二(父道、子道)

卷十二、五典三(君道、臣道)

卷十三、五典四(兄弟之道、朋友之道)

卷十四、民常一(总纲、居处)

卷十五、民常二(财货、冠服)

卷十六、民常三(饮食上)

卷十七、民常四(饮食下)

卷十八、聚礼

卷十九、婚姻之礼

卷二十、丧葬之礼

在这二十卷里,卷一是全书的总纲,其余十九卷可分为两个部分。卷二至卷四是认识的部分。卷五至卷二十是实践的部分。实践的部分又可分为四个部分。卷五至卷八,是五功,说的是天道。卷十至卷十三,是五典,说的是人道,是人与人相处之道。卷十四至卷十七,是民常,也说的是人道,是个人处理日常生活之道。卷九,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是补充的部分,是五功和五典的补充。这部书表述了智对于宗教法典之系统的见解。

《至圣实录》,除有《著书述》、《例言》外,有卷首一卷,正文二十卷。卷首好像是全书总纪的样子。正文卷一、卷二,是记至圣的先世及其四种传统。卷三是至圣年谱。卷四是孕产奇征。卷五至卷十五,是至圣历年事迹。卷十六,感应补遗。卷十七,至圣赞。卷十八,至圣仪行录。卷十九,天方风土考证略。卷二十,赞、颂、碑记、序说。概括地说来,首二卷可说是记至圣前的宗教,中间十六卷是记至圣,卷十九是记西方各国的伊斯兰教,卷二十是记中国的伊斯兰教。这书,可以说是表述了智对伊斯兰教的历史认识。

《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前都已有了成稿。^①四十三年,智请他的阿拉伯文老师袁汝琦和友人梁潘赏为《天方性理》作序。这时《天方性理》大概已有定稿,而《天方典礼》还在修改中。四十五年,智游北京,^②把他的书稿送请教内外的学人指正,得到不少积极的鼓励。四十八年,智回到南方。杨

^① 康熙壬辰,丁灏序《天方性理》说:“忆十载前,介廉以所著相质。”壬辰上推十年,为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② 游北京,见《天方典礼·例言》。

斐莒兄弟在山阳(今江苏淮安)为《天方典礼》刻版。^①后来智过苏州,便南游杭州。^②应宁波提督黑鸣凤之请,到宁波去住了一些时候。四十九年春,鸣凤和李封五、马耀寰^③也在宁波,把《天方性理》刻了版。^④鸣凤并把自己的意见分别跋在书中一些章节的后面。今《天方性理》有成都刊本,昆明刊本,马福祥排印本;《天方典礼》有成都刊本,广州刊本,金陵丛书本,金子云排印本,马福祥排印本,文通书局标点本。两书原刊本均未见。

《天方至圣实录》成书,离《天方性理》、《天方典礼》的成书已经很久。据智自己说,他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曾到山东游孔陵,“有感而归”,第二年二月开始译《天方至圣实录》。开译后不久,又先后到苏州、寿春、亳州、陈留、朱仙镇,访求遗经,寻觅助手。助手没有找到,遗经却在朱仙镇赛家找到了,这是一部西文《至圣录》。这所谓西文,当是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他喜欢得很。他的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帮助。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至圣录》全书告成,^⑤但没有立即刻版。一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袁国祚才刻全书于南京。^⑥离译完已距五十二年。

智另外还有许多译著。《真境昭微》、《五功释义》、《天方字母解义》、《天方三字经》等书,都有印本流传。《天方礼法书》、^⑦《天

① 康熙四十八年,杨斐莒序《天方典礼》说:“刘子南游,以书见示。”《天方典礼·例言》说:“复质诸山阳诸先生……遂付之剞劂。”《天方性理》丁灏序说:“不数年而介廉游京师,遇淮上,梓其《典礼》竣。”今《典礼》各卷,均有“山阳杨斐莒校梓”的字样。

② 见《著书述》。

③ 李封五,西凉人。马耀寰,宁夏人。并见《天方性理·例言》。

④ 见《天方性理》黑鸣凤序。

⑤ 全书告成,见《著书述》。

⑥ 袁国祚刻全书于南京,见《启承堂新刻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书序》。

⑦ 《天方礼法书》,见《天方典礼》的《自序》及《例言》。

方乐书》、^①《妇女经产书》、^②《晨夕功课》、^③《克而白记》、^④《分制指掌图》、^⑤《渔猎篇》^⑥等书,都久已失传。又曾用阿拉伯文翻译清朝典礼,^⑦曾想著《三极会编》,^⑧详情都已不可考。智自称“会通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学,著书数百卷”。^⑨现在传世的只不过五十几卷。^⑩智译著的散失,实在比传世的还要多。但智译著的精华,或已具备于上述三书。所以智说:“《典礼》者,明教之书也。《性理》者,明道之书也。今复著《至圣录》,以明教道渊源之自出,而示天下以证道之全体也。盖三书者,三而一者也。履阶而登,升堂入室,其庶几矣。”^⑪三书之中,尤以《天方性理》最为严整。《天方典礼》中,尚有前后不相应的地方。^⑫《至圣实录》,似乎还没有整理好,比《天方典礼》就还要差了。如就对一般人的影响说,《天方典礼》是第一,其他二书都在其次。

① 《天方乐书》,见《天方性理》袁汝琦序。按《天方典礼》后编《戒音乐》条下有注:“详见《天方乐书》。”此书似是解释禁乐的道理,而不是论述音乐功能的。

② 《妇女经产书》,见《天方典礼》卷二《沐浴》条下,又卷七《行经》条下。

③ 《晨夕功课》,见《天方典礼》卷八《诵应辞》条下。

④ 《克而白记》,见《天方典礼》卷八《周回克而白七匝》条下。

⑤ 《分制指掌图》,见《天方典礼》卷十九《铺陈孀室》条下。

⑥ 《渔猎篇》,见《天方典礼》卷十七《猎取者食》条下。

⑦ 翻译清朝典礼,见《天方典礼》杨斐墓序。

⑧ 《三极会编》,见《著书述》。依《著书述》所说,这是一部讲天文、地理和人体生理的书。

⑨ 著书数百卷,见《著书述》。

⑩ 《天方性理》六卷,《天方典礼》二十卷及后编一卷,《天方至圣实录》二十卷及卷首一卷,《真境昭微》一卷,《五功释义》一卷,《天方字母解义》一卷,《天方三字经》一卷。

⑪ 智说的一段话,见《著书述》。

⑫ 《天方典礼》中的译名,有不少歧出。

刻苦坚毅的译著生活

智的译著生活，一直是在刻苦坚毅中度过的。父亲死后，他把所有的钱都买了书，^①就已未必为亲友们所赞同。此后，僻居读书，不晓得经营生产，家里的人很讨厌他，把他看作一个怪人。^②他的工作，不为人知，^③不只习科举的人不懂得，治古文辞的人不懂得，讲宋明理学的人不懂得，就是素来笃于宗教的人也不懂得。当他完成《天方性理》、《天方典礼》的时候，毕竟还有几个教外前辈奖励他，有他的老师袁汝琦和教内同志俞楷、梁潘赏、杨斐棻兄弟、马汝为、丁灏、黑鸣凤等，为他作序，为他刻版，为他校订。到了他作《天方至圣实录》的时候，情形更坏，他自述^④这时是“生无同志，业无同事”，“入室则啾唔嚅呢，假寓则是非糅杂，谋一椽可隐而力不贍，兄弟戚友去之远之不暇，尝至一岁迁徙数处，无恒其友”。他深深感叹难于其学，复难于翻译，难于编著，复难于成；难于会通百氏而成一家之言，复难于以一人经理百务而无相为友。他的《天方至圣实录》，再没有同时的人作序了，也没有同时的人助他校订。如果没有袁国祚把稿本保留着，后来刻了版，恐怕《天方至圣实录》连传世的机会也没有了。

智的译著，数量大，方面广，这是超出前人的。他对于三级（天文、地理、人身）的研究，历史的撰述，都是以前经学家所未曾作过的。在撰述的形式上，他是第一个反对用经堂语，而主张用典雅的文字译经的。所以他在《天方典礼·自序》说：“经文汉文，原相吻

① 见《天方性理·自序》。

② 见《天方性理》袁汝琦序。

③ 见《天方性理》俞楷序。

④ 智自述的两段话，见《著书述》。

合,奈学者讲经训学,多用俚谈,有失经旨。愚不惮烦,每训文解字,必摹对推敲,使两义恰合,然后下笔。览者勿谓愚反经异俗,是反俗合经耳。”所谓“反俗”,就是不用经堂语气。所谓“训文解字,摹对推敲”,就是要寻求译文的典雅化。在撰述的内容上,他是第一个正式沟通伊斯兰和儒家的道理的。他的著作受到儒家,尤其是受到宋代理学的影响。所以他在《天方性理·自序》说,他“恍然有会于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也”。智的这两点表现,更表示他的时代已与王岱舆的时代不同了。这虽很显明的使他的工作脱离大众,并且有时可以增加若干穿凿的成分,但在那时候,要想把伊斯兰的学问介绍给教外学者和教内读儒书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

智的生卒年不详。他大概是生于康熙初年(1662年)。《天方性理》、《天方典礼》成稿时,可能是在四十岁左右。雍正二年,《天方至圣实录》作成时可能是在六十岁左右,他的年寿,总在六十岁以上。^①

〔白寿彝〕

^① 六十岁以上,是据《著书述》所记推定。

四 祁静一

祁静一(1656—1719年),经名西俩里,道号西俩龙吉尼(月亮的光)。祖居甘肃河州八坊小西关(今甘肃临夏市)。中国伊斯兰教苏菲主义戛迪林耶学派大拱北门宦的始传人。

祁静一七岁入小西关清真寺攻读阿文经典,聪颖过人,师不能难,十六岁时(1672年)随从毕家场马五爷阿布都·若海麻尼去西宁求教穆罕默德二十五世后裔,未得其传。1674年,穆罕默德二十九世后裔华哲·阿布都·董拉希在两广、云南等地宣教,后到河州,收祁静一为门徒,并谓:戛迪林耶的教旨是“单独的”,要“抛家离乡,独自静修”。祁静一听从师命,不求婚配,绝离尘俗,先后在河州杨妥家,陕西西乡等地静修六十四次,历时九年有余,“出则箪食瓢饮,屡空晏如,入则辟谷绝粒,慎独静修”,深得其师好评。并说“吾道东矣”,遂将“天人之奥,性命之微,理道之旨,静性之功,尽传于祁道祖”。让他在中国传播、发扬戛迪林耶的教理。祁静一遵从先师的旨意,往来阆中、西乡等地,足迹踏遍川、甘、陕三省,历尽名山大川,备尝千辛万苦,宣传教理,发展了一大批信众。他死后,葬于西乡鹿龄寺,后迁葬于河州大拱北。此后,门人弟子以他为榜样,不娶妻室,远离家乡,在河州、西乡和阆中大拱北属地静修养性,被称为“出家人”。

祁静一是一位虔诚的修道者。他一生主张以“绝尘俗为入道之门”,“清心寡欲为修道之功”,故凡人其教者,皆以淡泊持其志,宁静守其身。这就是祁静一的教理和主要遵行。

祁静一的主要学生有马如恒(河州八坊人,教众以大太爷称之)、马腾翼(东乡黑水泉沟人,信众以阿匍太爷称之)、马长清、妥

化清、沙明清、王再清等六人。他们在协助祁静一传教开拓大拱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祁静一为了承先启后,传授他的教理,不至乱辈失传,亲自拟定了前十辈取名次序:“一清风云月,道传永世芳”,现已传到芳字辈。

祁静一除通晓阿、波文外,还是一个爱好书文的人,据说他有札理论著,但大拱北几经烧毁搬迁,保留下来的墨迹几乎没有,只有一段自述,作为遗训口传心授以至于今:“噫!余自西而来!感为主的造成,于今二十七载矣!始而安榻于寺中,南北社之雅爱堪至,继而建巷城西;数十家之深情难忘,亲戚之所为者,无非至教,道末所图进者,亦是清真。可恋者碧山绿水,可慕者朴素之风,人谓余观妙入微,则吾岂敢。余且思淡泊宁静,乃其所愿。承蒙垂顾,莫酬分毫,虽浩浩之量,庶或见原,然区区之衷,多有抱愧,良夜思之,无由报人以德,我重思之,却愿赠人以言。饶一着,添子孙之福寿,退一步,宽驹隙之易过,忍一言,免驷马之难追,息一怒,养心神之精神,善哉言乎,良可忆也。大凡非礼之加,唾面自干者为贤,倘有横逆之来,存心忍耐者为贵,福寿皆由命,何必争长竞短,得失总在天,不须论是说非,休挑三寸舌,只陷七尺躯,鹬鹤争巢于林,只借一枝为栖,所占无多,鼯鼠竞饮于河,不过满腹之水,所求有限,来来往往,终属幻境,行行走走,到底成空。独不见绿鬓未几,而白发早侵,又不见贺者来临,而吊者随至。想及于此,良可慨也。夫今者余年向衰,辞气渐觉颠顿,鄙性事懒,容貌诸多不恭,况躬屈岩阱狭道,稍亦遍传,恐为所陷,且身驾汪洋扁舟,微起风波,必为所坠,聊目荒淡,奉恳诸亲,凡有公务,自度为高,若以私言,贻咎不少,开口神气散,所以因箴自警,舌动是非生,是故座右为铭。伏维鉴照,原有是禱。”

[马通]

马来迟

马来迟(1681—1766年),经名阿布都·哈里木。祖籍陕西长安,祖父马从善时迁居甘肃河州(今临夏市)。中国伊斯兰教苏菲主义虎夫耶学派花寺门宦的始传人。

马来迟出生于宦门之家,祖父马从善,明诰授建武将军,生有二子,长子榜俊,从事商业,往来于豫、陕、甘、青一带。次子家俊,为武拔贡,富冠河州,人称“马十万”。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一月十二月,生一子,取名阿布都·哈里木。不久马家俊的商店被火烧毁,喜忧之间,对子叹曰:“汝命运不佳,将仅有之产业,悉遭火化,汝何来其迟也”,后来就起名马来迟。马来迟出生前,其家已由“马十万”变成了破落户,生活逐渐困难。马来迟八岁时被送到青海民和米拉沟亲友马汉臣处,并在该地清真寺攻读阿拉伯文。后在河州八坊老王寺教长太巴巴的指导下,读完经文大学课程。十八岁时由太巴巴主持为他挂帐“穿衣”,成为一名青年阿訇,并经太巴巴推荐,先后在民和马营、河州八坊、广河三甲集等清真寺任开学阿訇达三十年之久。雍正六年(1728年)马来迟随河州的一位阿拉伯谢赫·哎最占伯勒去麦加朝觐,行至广州,在怀圣寺的伊玛目·艾勒夫大师处学习了三个月经典和阿拉伯地理、人情、方言等。然后和依斯哈格、估安巴及也门克俩米等人乘哈三来比尼的船,经两月余的行程,到达亚丁港口。先后在也门、麦加、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等地访师求教。其间在麦加谢赫·穆罕默德吉布尼·艾哈买提·阿格勒主持的虎夫耶道堂学习三年。他研究了纳格什班迪耶、沙孜林耶、戛迪林耶和赛哈来外勒顶耶等苏菲主义学理。回国时,著名学者茂俩拉买黑都米给马来迟取了艾比力夫图黑(意为开

路)的道号。穆罕默德·吉布尼·艾哈买提·阿格勒送给他《冥沙尼》、《卯路提》以及宝剑、拜毡、苏夫(白毛长衫)、克尔白幔帐和传教印章等,同时,还带回经典八十卷。现在其后裔还保存一部分(一般不让外人看),只在马来迟主要纪念日时陈列出来,让教众瞻仰一下。笔者于1995年有幸见到了这些遗物。即扇子一把,内写“贝七”(大赞起首和引导词);刀子一把,写有阿拉伯文,是马来迟用过的;鞋一双,牛皮底,缎面,绣花头;克尔白幔帐一大部分。另有一把刀(较小),马仲英曾带过,走时又交来了。雍正十二年(1734年)马来迟由海路经香港、广州回国。往返历时六年。回国后,在青海循化等地传教,信众在树尔湾修了一座清真寺,请他讲学。后应邀到云南、陕西、河南等地清真寺任教长,并授虎夫耶学理,受到众穆斯林的拥护,成为当时西北著名阿訇之一。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以来,经过他的艰苦说教工作,使青海卡儿岗地区的一部分藏族群众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成为花寺门宦的虔诚信众,影响较大。

马来迟主张《古兰经》和圣训为信仰基础,遵守念、礼、斋、课、朝天命功课,在道乘方面,主张“闹中求静”,就是既要静修参悟,也不能出家避开现实生活。同时,静修默念只限于教统接替人和一些好道之士,不要求所有信徒都要干这一切功课。他把静修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始传道祖,或“老人家”,具有“勿里”品级;第二等是始传道祖的高足门生,称“海里凡”,实际上是各辈继承人,具有“谢赫”的品级;第三等是好道的一般门弟,大多是“海里凡”的追随者,具有寻道者的品级。他的尊行严格。每月以三天、九天或二十一天的时间坐静修持。他每天要做84拜副功,48000次赞词(迪克尔)。念赞词时,主张出气念“俩一俩海,引兰拉呼”,吸气念“穆罕默德,若苏拢拉希”。他规定在晨礼后念自己编选的“耳勒提”(赞

词)和“牙细尼”(《古兰经》第二十二本),在哺礼之后念“未若的”和“瓦格阿提”(《古兰经》第二十七本),在晌礼之后念“范提汗”(《古兰经》第二十六本),在昏礼之后念“若何麻尼”(《古兰经》第二十七本),在宵礼后念“滩巴若”(《古兰经》第二十七本)。一般在“主麻”前,念“克汗非”(《古兰经》第十五本至第十六本),在穆罕默德生日或马来迟祖先忌日要干“尔曼里”。在干“尔曼里”时,有大小赞之分,“大赞”一般长达四小时,主麻开始念《卯路提》,“盘善拜”完经,每天约念二小时,七天轮一次。《古兰经》七天念完一次,了经时念《冥沙勒》。马来迟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家,他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从麦加朝觐回来后,开始在河湟传教,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病故。宣教数十年,信众最多时达到二十多万,是中国伊斯兰教著名经堂学者和苏菲主义学者之一。他在生前就将传教之事交给了四子马国宝。他死后,教众在临夏西川为他修了拱北和牌坊,占地数十亩,宏伟壮观,与临夏大拱北的建筑齐名。光绪二十一年河湟事变中全被焚毁。以后几次毁坏几次重建,直到1986年始完成了八卦亭和过亭、宿舍等的重建。

[马通]

马明心

马明心(1719—1781年),字复性,经名依布拉欣·阿则孜,道号维杂耶·屯拉海·穆罕默德·召非(维护主道的人),被清廷杀害后尊为“东海达依”(为主道牺牲的人)。祖籍甘肃阶州(今武都),因年荒迁居榆中马坡,后定居河州大西关。从也门留学回国后迁居定西官川马家堡。生于康熙四十九年(1719年)。中国伊斯兰教苏菲主义哲赫忍耶学派官川门宦的始传人。

马明心早年亡父,生活十分困难。由在清真寺干杂役的叔父抚养。马明心六岁进清真寺攻读阿拉伯文,九岁(另说十一岁)随叔父于雍正六年(1728年)沿着青海、新疆以及中亚丝绸古道徒步去麦加朝觐,途中突遇风沙,叔侄失散,马明心几经辗转,流落布哈拉。据传在纳格什班迪耶学派依斯哈克耶派道堂作杂役,后随道堂长老去朝觐,行至也门扎比德,为穆罕默德·布录载尼道堂收留,后在阿布杜·哈非格(1705—1780年)老师的指导下,干功修持,攻读经典,实现了求学愿望。其间曾去麦加朝觐十多次,并向一些著名学者求教。回国时,他的老师说:我们的教门已传了七辈。现在我们不再传了,你回中国,再传八代,就终止了,并给他《古兰经》、拜毡、手杖、碗和宝剑等传教凭证。乾隆九年(1744年)马明心取道陆路,经中亚、新疆返回河州。路经青海循化时,一些好道之士挽留他讲授《古兰经》和教义教法,受到一些阿訇和穆斯林们的拥护,从此在河湟地区开始传授他的主张。他主张“敬主赞圣”,“遵经从训”。他强调“先教而后道”,没有“教”作基础,“道”也不复存在。力行教乘,是进行道乘的基本条件,他认为真乘隐藏于教乘和道乘之中,为教乘和道乘所包含,在道乘修炼方面,除遵循纳子什

极的耶的宗旨外,还吸收了戛迪林耶的修炼主张,使其修炼更为严谨。他主张简化宗教仪礼(如改主麻十六拜为十拜);规劝穆斯林要虔诚奉教,恪守“舍勒尔提”(教乘)和“妥勒格提”(道乘),提出“海迪耶”(布施)要用以周济穷人,阿訇不能独受私用,更不得借此聚敛钱财;在婚葬中,以念一段《冥沙尼》代替在清真寺举行的诵经仪式,简化和节省了开支;教徒过“阿曼里”不主张宰牛羊,而以干果代替等;主张教权传贤不传子,反对父传子受;也不主张大兴土木,装饰清真寺,更反对用彩色飞禽走兽图画形象装饰清真寺和拱北;简化道乘修持,主张晨礼之后集体念“迪克尔”。晌礼之后,跪成半圆形念《古兰经》中的“亥亭”。宵礼之后集体赞圣,高念《穆罕曼斯》的一段。厉行了这些功课,就达到了“真乘隐藏在教乘和道乘之中,并为教乘和道教所包含”的基本要求,这样,传教的接替人与信仰应厉行的功课基本相同,既交还了教乘,也遵行了道乘;既是传教者,也是信教者。马明心的这些革新主张深得人心,信众日增。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在撒拉聚居的八工传教时,受到花寺门宦教主的排挤,遂引起花、哲两派的矛盾,后马明心被迫离开循化、河州地区,迁居定西官川山中,从此,官川成为哲赫忍耶传教基地,全国各地来此拜师求教者不计其数,仅求道的有名阿訇就有百余人,如云南古城马三爷、青海循化贺麻路乎、苏四十三、甘肃平凉穆宪章、宁夏灵州马以德、海原田五等人。经过这些学生的再次传播,追随者不断增多,遂形成了一个较大派别。官川马家堡的两个窑洞成了马明心的道堂,官川门宦之称,也因此而得名。马明心也被称为官川阿济兹。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青海循化马明心的学生苏四十三因与花寺门宦发生矛盾,上诉循化厅。由于清廷官吏偏袒花寺,压制

哲派,挑起两派械斗。苏四十三积愤难消,遂率哲派教众反抗清廷的歧视与压迫,杀了前来镇压循化哲派的知府杨士玠和副将新柱。攻开河州城时,得知马明心已被拘捕兰州,苏四十三遂率众围攻兰州,终因众寡难敌,全部壮烈牺牲于华林山。同时,马明心亦于同年三月二十七日被布政使王廷赞杀于兰州城,教众尊为“道祖太爷”。马明心全家及亲属均遭株连。长子马顺清被发配云南墨江县的他朗充军。在云南古城马三爷的帮助下,娶妻成家,后来从事营商贸易,富冠一方。其子马世麟经营进出口生意,财力雄厚,曾助杜文秀反清,失败身亡后,其子马元章率子侄十多人,逃离云南,在四川等地隐居,后回到张家川逐渐恢复了哲赫忍耶学派。马明心的夫人张氏、三个女儿以及侍女发配新疆为奴。在行程中大女儿病歿。张氏到伊犁某旗官邸为奴。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晚,乘机杀死旗官一家,自行投案,被杀害于伊犁。

马明心是一个诚实的苏菲主义学派学者,他躬耕自食,清贫修道一生,虔诚传教三十五年,教众遍及西北,门徒弟子散居各地。

马明心生前把教权交给了平凉阿訇穆宪章。马明心被害后,尸骨几经迁移,始于光绪年间,由四世孙马元章在兰州东稍门购置土地三十余亩,为其修建了拱北,习称“东拱北”。1958年反封建特权斗争中被拆除。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宗教政策时,退还部分原址,并拨款七十多万元,重建了马明心的墓庐。

[马通]

五 改 琦

改琦,字伯蕴,号香白,又号七芗,别号玉壶外史,是嘉庆、道光年间的著名画家,亦工诗词。

改琦世居宛平(今属北京市)。祖光宗,字昭来,雍正八年(1730年)武进士,由侍卫官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参将,葬母于松。乾隆间官寿春镇(在今安徽寿县)总兵。乾隆十六年(1751年)捕盗山中,以劳绩卒。乃疏请入华亭(今松江县),遂为松江华亭人。

据说,改琦幼聪敏,诗画皆如天授。自嘉庆、道光以后,琦以工于人物著名,出入李公麟、赵孟頫、唐寅及陈洪绶诸家,“愈拙愈妙,跌宕入古”。山水花草兰竹小品,亦“用笔超逸,迥出尘表”。^①

改琦的词有他特殊的成就。如《江城子》写“过西湖庄故居”:

小西湖上赤栏桥,柳摇摇,水迢迢。鞋痕一路,草长杂花飘。上学光阴浑似梦,风竹乱,纸鸢高。

这阙词写得恬静、旷逸。但旧日鞋痕,今日长草,却又流露出诗人抚今追昔的一缕愁情。往事已然浑似梦,诗人却在作梦的憧憬。改琦的词,在艺术上是成功的,在意境上却不免拘于个人的情趣,缺乏对现实的反映。他的画,如山水花草兰竹小品被称为“用笔超逸,迥出尘表”,其画风或也有与词风相类似的地方。

改琦有《玉壶山人集》传世。近人集《清名家词》,收有《玉壶山房词》。他的画,也有流传,但不多见。

[刘雪英]

^① 见光绪四年刊《华亭县志》卷一六,《清画诗史》已集下,《清史稿》艺术传三。

蒋湘南^①

蒋湘南，字子潇，河南固始人，是嘉庆、道光年间回族中博学而有独到见解的学者。

湘南幼孤贫，聪敏好学，读书过目成诵。他的叔父奇其才，为他准备了大批书籍。湘南读书刻苦，遇有疑问，必访名师求教。初从光州（今河南潢川县）马彭，学经史百家语和诗古文辞。十九岁时，举秀才。

道光五年（1825年），湘南以《说文》一文受知于学使吴慈鹤。第二年，他入京城应试，得当代名士蒋砺堂、阮芸台、陈硕士及顾南雅等的称许。吴慈鹤督学山东，邀湘南襄幕府。慈鹤去世后，湘南旋受陕甘学使周之桢聘，出入鄂尔多斯、额鲁特、哈尔滨、土尔扈特、乌刺惑（在今内蒙古、宁夏一带），作有《西征述》、《熊耳山籀字碑歌》、《宋二体石经残碑歌》。

道光十四年（1834年），湘南举副榜贡生，次年中举人。历游江督河督幕府。当时，河帅栗毓美创用砖工，因遭诽谤。湘南作《砖工记》为之辩解。又作《九河既道解》诗，详陈治理黄河的意见。因毓美去世，未能实施。三十年后，黄河河道北移。

湘南数应礼部试，不登第，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才科排副榜。补虞城（在今河南）教谕，不就。遂游幕四方。晚年多寓于陕。是时，川督惠诚被命防堵江南，路过陕西曾邀湘南入幕府。至扬州，因与谈兵事不合，遂返回陕西，主讲关中书院。咸丰四年

^① 本文所据资料，见《七经楼文钞》王济宏《序》、阎彤恩《原序》、刘元培《序》、马子贻《重刻蒋子潇先生诗文遗集叙》；《春晖阁诗钞选》藩筠基《序》、符孙《序》。

(1854年)八月,湘南病卒,年五十九岁。

湘南平生没有做过什么官,但关心时事。他对清朝各代政典都十分谙熟,能条其源流。他所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方殖民势力东来,英国殖民主义者以鸦片贸易,毒化中国人民并进行严重的经济、政治上的掠夺。于是朝廷上有禁烟之议。道光二十年(1840年)初,湘南驰书大鸿胪黄爵滋,以为“不禁鸦片,固非为政之体,而严禁鸦片,亦有难挽之势”。他指出,鸦片之难禁,与沿海文武官吏们的腐败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而自朝廷以至地方官吏之普遍吸食鸦片,亦为难以彻底禁烟的重要原因。湘南虽提出对禁烟的可行办法,但他对官方的揭露,表现了他政治上的见识和胆量。

湘南在青年时期,即才华充溢,自视甚高。他认为贾谊、董仲舒的思想,马融、郑玄的训诂,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朱熹的理学,都不无可议。此外,他对于算学、山川源流及刑名之学,都有探索的兴趣。

湘南初工诗。中年废诗专经。他与吴兰雪、郭羽可、魏源、龚自珍、方春、木广文诸名家结交,学益进,声誉日起。他在山东时,又多所交游,见闻日多,学益肆。吴慈恩去世,湘南从济南扶棺步行至吴,为吴下士大夫所称道,交往益广,学亦益富。

当时经学,有汉学宋学之分。当时文坛,有专主唐宋者,有专主秦汉者。湘南说经,以经证经,不拘于汉、宋门户之见。湘南论文,不模仿唐宋,也不标榜秦汉。他的门人刘元培说:

本朝经学,分汉宋两途。为汉学者,持宋学为空虚;为宋学者,攻汉学为破碎。先生皆以为不然,“儒者读孔子书、学孔子学。孔子,周人也,周之学,春秋《礼》、《乐》、《诗》、《书》,谓之四术。孔子益以《易》与《春秋》,谓之六艺。六艺,

皆周礼也。韩宣子聘鲁，见《易象》、《春秋》，曰：周礼在鲁，是《易》与《春秋》之二艺，《礼》、《乐》、《诗》、《书》之四艺，皆周公之礼，明矣。子曰：吾学周礼，告颜子曰，克己复礼。颜子亦曰：约我以礼。曾子传一贯之道，作《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中庸》证明之，曰：非礼不动，所以修身。可知孔门之学，但宜名为礼学，不宜称为理学。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孟、荀为再传弟子，仅百年，而《诗》、《书》已待辨正，况汉儒去孔子二百余年，宋儒去孔子一千余年乎？汉学、宋学之争，皆无与周学者也。吾为周学而已”。此先生论学之大指也。

文王、周公、孔子之《易》，皆用韵语。孔子直以文言为名，是必叶声韵者，始谓之文。人之生也，和言中宫，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徵羽。发喉引声，自有高下抑扬之致，《小序》所谓“声成文，谓之音也”。宋以后之文，多有声而无音。先生病之，曾曰：“宁为箏琶，无为土鼓。”又曾取《汉书》中志传为《史记》所无者，签而出之，以示古文门径，曰：“学醇论正，神华味腴，直起直住，不用语助虚字，足为伪八家对病之药。宋以来，论《史》、《汉》异同者，多右马而左班，乃穴坯之见也。”此先生论文之大指也。

刘培元的评议，大抵与实际相符，没有什么溢美之词。湘南的学术成就，在当时学术界中是少有的。

湘南以著作名大河南北，所著有《春晖阁诗选》、《七经楼文钞》、《周易郑虞通旨》、《十四经楼日记》、《中州河渠书》、《华岳图经》等。又修府州县志以十数，其中，《江苏省志》未卒业，《陕西通志》则始终其事。他的作品，开封、洛阳、扬州、西安皆有刻本。后经兵燹，惟《春晖阁诗选》六卷、《七经楼文钞》六卷存。今有其婿马

子貽同治九年(1870年)重刻本。

湘南师马彭,字春圃,一名斯农,光州人。精于《易经》,工诗。有《秋海棠斋诗集》。

湘南的女婿马子貽,名佩玖,是马彭的孙子。由举人历官四川高县、荣县、平武、威远、酆都等县尹。以迁建酆城功,升用知府。晚年家居,主讲于七阳书院,立南湖文社于家。光州修志,他实董其事。

[刘雪英]

近 代

一 伍长华^①

伍长华(1779—1842年),清朝大臣。字实生,号云卿,江苏上元县(今南京市)人。始祖伍儒,原为中亚撒马尔罕人。明洪武二年(1369年),应邀来华赴金陵,为钦天监刻漏科博士。伍长华是伍儒第十四代孙。父伍光瑜,字屏秋,贡生,任县学教谕,著有《补园集》。后绝意于仕途,以兴办地方慈善公益事业为己任。曾于南京下关长江岸边设生生堂,备置救生船,救助失身落水或轻生投水之人甚多,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伍长华虽生活在江南回族世家,但自幼饱读四书五经,受儒家文化熏陶较深。嘉庆十八年(1813年)应江南乡试,中举人。翌年甲戌(1814年)会试联捷,殿试一甲第三名,中探花,是清代“教门鼎甲之始”。当地人称之为“回回探花”或“伍探花家”,传为佳话。伍长华中探花后,任职翰林院编修。其间曾四校京闱,一主浙江乡试,一督广东学政。自道光二年(1822年)后,出任外官,先后历任

^① 本文资料除注明出处的以外,均引自伍贻业《清末禁烟又一人——伍长华》一文。

广西右江道,广东、长芦盐运使,甘肃按察使,云南布政使,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等职。他性格孤僻,不善言谈交际,保留了回族的饮食生活习惯。他不喜欢别人干涉他的个人生活,他也从不过问别人的个人生活。每到一地任职,他总是令属僚将当地粮价抄录汇呈,细心研究。在他看来,“此民生休戚之本也”,事关大局,不可小视。在甘肃按察使任内,适逢陕西军队哗变。他虽设计捕捉了兵变首领郑曼年等人,但却与陕甘总督杨遇春主张杀尽哗变士兵意见相左。他力主尽量避免激化矛盾,仅杀了少数兵变首领,陕甘人士对其处理结果极为满意,称之为德政。清代盐政和铜政弊病甚多,伍长华在云南布政使任上,亲自深入到境内各矿区了解情况,多次奏请免除铜厂民工积欠的工本银。他针对云南运铜进京弊端,将云南所产之铜由官船经汉口运往京城,改为由押运人员自行租船经天津运往北京,且规定沿途停靠地点和抵京时间。避免了各地官员串通船主勒索押运人员、偷盗所运之铜及押运人员沿途贩卖私盐的弊病。伍长华在云南任职期间,著有《云南铜法考》。

道光十八年(1838年)夏四月,清廷“以伍长华为湖北巡抚”。^①他于九月初四日由京抵达武昌,次日就任湖北巡抚。当时担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是主张严禁鸦片的代表人物。他不仅前后两次给道光帝上奏折,揭露鸦片大量输入对国计民生带来的严重危害,还率先在两湖地区收缴烟具,查拿烟犯,设局禁烟。伍长华到任后,对林则徐的禁烟活动给予有力的配合和支持。他俩在武昌共事虽然仅有三十多天的时间,但两人过往甚密,往返接触竟达十六次之多,有时一日两见,共商湖北大政及禁烟事宜。两人曾会衔奏请缓免湖北水旱受灾地区田赋钱粮,共同发布禁烟告示,剴切晓谕

^① 《清史稿》卷一八《宣宗本纪》二。

市民严禁吸食鸦片。九月初十(10月21日)清晨,林则徐与伍长华共赴校场,“率属查验收缴鸦片烟枪一千七百五十四杆,并烟斗烟具,俱槌碎焚毁。又秤验所获烟膏共一万六千七百六十四两。江夏获者,先投江心。汉阳获者,暂贮藩库”。^①武昌销烟比虎门销烟早两百多天,沉重地打击了弛禁派和英国鸦片贩子。

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清廷“召林则徐来京,以伍长华署湖广总督”。^②伍长华在署理湖广总督期间,仍一如既往地贯彻林则徐禁烟主张,封闭烟馆,惩处鸦片吸食者。他还对湖北盐务、漕运进行了整顿,利用盐捐兴办学校书院、修筑汉阳长江堤防。道光十九年(1839年)夏四月,周天爵任湖广总督,伍仍留任湖北巡抚。周任职期间,“用候补知县楚镛充督署谏员,制非刑逼供,囚多死,为言官论劾”。^③同时,周惩处大冶知县孔广义又遭到孔的反诘。最初道光帝曾让伍长华议处,他不愿落井下石,态度暧昧。清廷乃令兵部侍郎吴其濬前往湖北查处。吴其濬以伍长华有庇护周天爵之嫌相参劾,清廷遂以“审讯不力”为由,于道光二十年十一月革去伍长华湖北巡抚之职,伍即返回南京家乡闲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病故于南京。

[答振益]

① 《林则徐日记》第30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清史稿》卷一八《宣宗本纪》二。

③ 《清史稿》卷三八一列传一六八。

马 辰

马辰(1784—1860年),清末抗英将领。又名马光照,字云骥,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出身于官宦世家。始祖马依泽,原系西域鲁穆(位于小亚细亚)人。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充使来华修订历象,授钦天监监正,后徙居陕西泾阳县永乐镇。十一世祖马乾阶,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进士。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任河南南阳府知府,以宦籍家新野县,此由陕迁豫之始”。^①十八世祖马哈直,明洪武年间任安庆卫指挥使,遂定居安庆。祖父马大用,清雍正元年(1723年)武科举人。雍正五年,钦点武探花,补二等侍卫。先后任山西火器营参将,波罗、贵州等协副将,宜昌镇总兵,福建水师提督等职。父马家梁,乾隆丁卯科(1741年)举人,累官至会理知州。家梁弟家植,乾隆庚寅(1770年)科武举,无嗣。家梁以六子马辰过继其为嗣。马辰是马依泽三十一世孙。马氏一门,世代科第文武官员勋禄相承,为当地名门望族。

马辰受家庭及回族尚武习俗的影响,自幼喜爱武术。由武生投入浙江提标后营当差,拔补外委,洊升湖南抚标右营游击,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三月到任。十六年七月兼署左营参将,至十七年六月卸事,^②回原籍闲居。任职期间,多次出师川、楚、湖南、台湾等地,参与镇压白莲教及瑶族起义,以军功赏戴花翎。

马辰平时治军甚严。在湖南任职期间,训练士兵射箭和施放鸟枪项目时,看箭要较弓力,看鸟枪要端到一百个字念完,才许放

① 马凤洲《马氏宗谱》,同治元年手写本。

② 《查覆游击马辰被参各款折》,《林则徐集·奏稿》。

出。兵弁偶有过失,即严加斥革。^①因而所部能杜绝当时清军普遍存在的弊端,军纪较为严明。

马辰性情耿直,不好阿谀奉承,因而得罪权贵。道光十七年,有人以其“亏短火药、侵蚀马价”,“捏报兵丁阵亡、希图侵领赏恤”,“谋利居奇、私开茶室”,“任性妄为、笞辱把总”,“役使兵丁”等列款参劾。道光帝于十二月降旨让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逐条严加审鞠,务得实情,毋枉毋纵,以诚信谳”。^②经林则徐派员调查和亲提研鞠的结果,局贮火药业经抚臣钱宝琛委员逐一盘验过秤,尚余火药五百余斤,并无亏短。马辰十六年八月只上报七名兵丁病故,并无捏报阵亡,与藩司所复无异。其余所参劾各款,经查证亦均与事实不符。但仍以“失察家人私受替班兵丁规钱”为由,于道光十八年被革职回籍。

道光十八年(1838年)底,清廷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在离京赴粤途中,考虑到初次到粤,人地生疏,一切洋务夷情不得不先遣一两人密行查访。路过安徽时,起用了素谙武备、精力甚强的马辰,令其兼程先赴海口,代访夷情。林则徐初到广州时,又多次派遣马辰往返于澳门、广州等地之间,“侦探夷情,查访汉奸,皆能周详慎密”,因而受到林则徐的器重。在收缴鸦片和销烟过程中,马辰又积极“收缴溶化烟土两万余箱,昼夜稽查,不辞劳瘁”,^③深得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人的信任,曾联衔奏请道光帝予以任用。

虎门销烟后,英国驻广州商务监督查理·义律,竭力阻止英商

① 《遣用废员马辰及汉阳县县丞彭凤池片》、《查覆游击马辰被参各款折》,《林则徐集·奏稿》。

② 《查覆游击马辰被参各款折》,《林则徐集·奏稿》。

③ 《请将已革游击马辰县丞彭凤池分别开复升补片》,《林则徐集·奏稿》。

遵令具结,多方制造事端,进行武装挑衅。为了打击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林则徐在加强海防时,因素知马辰熟悉带兵,道光十九年十月四日(1839年11月8日),林则徐派马辰会同守备周国英、把总黄则华率兵二百名支援官涌守军。初六、初八两日,英国兵船两次进犯官涌,马辰等齐放大炮,瞄准敌头船轰击。击毁敌探水划船一只,击伤双桅舢板一只,毙敌数人,其余敌船受伤后狼狈逃窜。据林则徐奏报,马辰等在官涌一带,“旬日之内大小接战六次,具系全胜”。^①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1840年2月29日),马辰带水勇四十名由东涌上下濠前进,在其它将士配合下,于长沙湾附近“夷船寄碇之处,出其不意,一齐发火,复将喷筒火罐乘风抛掷”,焚毁济夷之船三十三只,“又将夷船高头三(舢)板前后延烧,该夷船驾驶逃开……。又烧毁海中沙滩所搭篷寮六处”,生擒“接济匪犯陈水生……共十名”。^②事后林则徐在《致怡良》信中十分高兴地说:“此次烧毁办艇,甚为痛快。不独寒汉奸之心,亦已落顽夷之胆矣”。^③同年四月,英国武装挑衅日益频繁。关天培令副将李贤和马辰分带兵勇四百余名,暗伏岛澳进行防堵。五月九日,李贤、马辰等在磨刀洋外火攻敌船,“将载有烟箱之夷船烧毁一只。另有夷船一只桅帆着火,弃碇驾逃。先后烧毁办艇十一只,又烧毁近岸篷寮九座。夷人带伤跳水、烧毙、溺毙及被烟毒迷毙者,不计其数”。^④

道光二十年六月,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后,林则徐加强了广东防

① 《英国兵船阻挠该国商船具结进口并各处滋扰在穿鼻尖沙咀叠次将其击退折》,《林则徐集·奏稿》。

② 《烧毁夷船以断英船接济折》,《林则徐集·奏稿》。

③ 《林则徐书简》(修订本)。

④ 《磨刀洋外焚剿贩烟英船擒获汉奸折》,《林则徐集·奏稿》。

务。七月十八日,林则徐侦知敌兵船五,泊磨刀洋,令副将陈连升率马辰挈五兵舶,各配六百人往逐之。马辰乘风破其头鼻,夷多溺,铅弹亦尽。小夷舟十,亟驶来救,围马辰船仰攻,炮及木排。马辰开小子母炮断其绳缆,敌船不能进。其后,英军兵船“驶至伶汀洋之北及矾石、赤湾等处”,林则徐、关天培派马辰、王鹏年等“整队出洋,探踪迎击”。八月五日,马辰等于龙鼓面击退英舰后,又于龙穴西南发现敌舰十只,他率舰靠近后,奋勇接仗,“连开三千斤铜炮两门,将其前后头鼻打坏,其船上拉绳人纷纷喊嚷,滚跌落海”,^①又一次打击了英国侵略者。在抵御英国侵略的战斗中,马辰与土家族爱国将领陈连升多次联合抗英,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当英国侵略者攻占大角、沙角炮台陈连升父子壮烈殉国时,正在守卫定远炮台的马辰,因琦善不准驰援,只好相向而哭,以示对陈氏父子的哀悼。

林则徐在广东主持军务期间,于道光十九、二十年,先后三次奏请起用和褒奖马辰。认为他“收缴趸船鸦片以迄毁化竣事,皆任其劳”,^②经历官涌、东涌之战,奋力剿防,屡屡获胜;多次亲赴外洋剿夷,均能奋勇向前,且于“军务历练多年,其才识均属得用”。^③后奉特旨马辰被补授都司,旋升福建漳州游击。咸丰十年(1860年)卒于官。

〔答振益〕

① 《关闸地方矾石洋面叠将敌船击退折》,《林则徐集·奏稿》。

② 《遣用废员马辰及汉阳县县丞彭凤池片》,《林则徐集·奏稿》。

③ 《保奖抗英出力之王鹏年马辰两员片》,《林则徐集·奏稿》。

郑国鸿^①

郑国鸿(1777—1841年),清末爱国将领。字雪堂,湖南凤凰厅(今凤凰县)镇竿镇人。出身于武将世家。祖父郑恂,行伍出身,清乾隆年间任直隶真定右营游击。父朝柱,历任守备、游击、副将。伯父廷松,乾隆六十年(1795年)在镇竿千总任内,从凤凰同知傅鼎镇压苗民起义,被义军击毙。廷松无子,以国鸿为嗣,遂袭云骑尉世职。

郑国鸿自幼聪颖明理,好胜心强,有着惊人的记忆力。稍长,师从社会名流严如煜探求经世之学。他牢记其父“读书明理,是武将之本,练武杀敌,是武将之志。你若能文能武,将来驰驱,就能折冲御侮”的教导,谦逊好学,苦苦攻读,历经数载,遂成饱学之士。精于《诗》、《易》,且善长文学、书法,有《诗经疏义》、《葩经招旨》、《昌学崇源》等著作流传于世。他刻苦锻炼,精心习武,常以岳飞“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激励自己,立志精忠报国,为国家为民族干一番事业。

郑国鸿于嘉庆八年(1803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期间,先后任湖南永绥屯守备、湖北黄州协都司、提标中军参将、广西平乐协副将、湖北竹山协副将、浙江湖州协副将、湖南宝庆协副将、浙江处州镇总兵等职。任职期间,他忠于职守,廉洁自律,仗义疏财,严格治军。在浙江湖州任内外出巡途中,身染重病,部属劝其回营就医,被他断然拒绝,并表示“职守所在,死而后已”。他克勤克俭、

^① 本文资料除注明出处的以外,均引自《抗英名将郑国鸿》,载《凤凰革命英烈传》,凤凰县党史办、民政局1987年铅印本。

节衣缩食。每当同僚及部下遇到困难时,他都解囊相助。他治军极严,即使是自己的亲信,违犯军纪也依法严惩不贷。他经常说:军法不严就无法带兵打仗。对违犯军纪者徇以私情,上对不起朝廷,下对不起庶民。他将自己带兵经验总结为“诚信必孚,赏罚必明,真伪必察,甘苦必均”。由于他勤于职守,办事公正,深得上司信赖,部属拥戴,愿意为其效命。

郑国鸿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擢处州镇总兵,调防镇海,充翼长。行前他曾对同僚们表示:我虽年过花甲,但救国之志犹存。若英夷胆敢来犯,我当效法古人杀敌卫国,舍身取义在所不惜。道出了他高尚的爱国情怀。是时,鸦片战争已经爆发,英军侵犯广州、厦门时,受重创后,乘浙江防务空虚之机,于7月攻占定海。1841年3月,郑国鸿和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定海镇总兵葛云飞率兵收复定海。定海东、西、北三面为重山环抱,南临大海,系镇海、宁波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收复后三总兵齐心协力加强海防。由于钦差大臣裕谦对定海战略地位认识不足,削弱了防御能力。为了有效地打击侵略者,三总兵划分了防区:东南临海要隘竹山门由郑国鸿防守;城西全城制高点晓峰岭由王锡朋防守;葛云飞坚守东岳山土城,担任正面防御。三者互为犄角,相互策应,做好反抗英军入侵的准备。

为迫使清政府全面接受英国所提出的割地赔款、鸦片贸易合法等无理要求,英国政府新任命璞鼎查为侵华全权代表并增派援军。9月26日,英舰四艘闯入竹山门,郑国鸿指挥发炮轰击,断其首船船桅,仓皇逃窜。道光帝闻讯后,传旨嘉奖。28日,敌战舰炮击晓峰岭,同时派出舢板船于竹山门登陆,被郑国鸿率兵击退,毙敌甚众。傍晚,英军绕至定海城南,占据未设防的五奎山,并于山上搭设帐房,设置炮位。次日,葛云飞于土城开炮轰击,毁五奎山

上英军帐房五顶。进攻县城之英军也被葛云飞击退,并焚毁其火药船。连日激战,英国侵略军屡屡受挫。当时敌兵二万,我三镇守军仅有四千,援兵不至,加之连日大雨,积水盈尺,我军陷于孤立无援兵疲粮尽的绝境。郑国鸿往来于泥沼中激励将士们竭力杀贼,“城亡与亡”。部下曾劝郑国鸿退保晓峰岭,合力以抗。他却坚决地回答:“竹山不守,晓峰焉能自存?武将效命疆场,份也”,表示了以身殉国的决心。10月1日,英军乘大雾发起总攻,分三路同时来扑,国鸿奋击,枪炮皆热不可用,短兵拒战。而土寇夺取晓峰岭,险要尽失。郑国鸿知道为国献身的时刻已到,将官印交给军校,单骑冲阵,挥刀斩敌甚夥,在激战中,被数十创而殒。王锡朋、葛云飞同日殉难,所部数千将士几乎全部为国捐躯。定海保卫战是鸦片战争中战斗最为激烈、士气最为高昂、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道光帝阅过定海之役的奏折后,对三总兵及广大官兵英勇杀敌、效命疆场的事迹为之坠泪。谕令俟定海收复后,郑国鸿等三总兵入祀昭忠祠,以表彰他们抗英卫国的业绩。后人在赞扬郑国鸿的诗中写道:“郑帅断右臂,裹创强撑搢。张目犹呼公,扬扬如平时。”“公死复何憾?公名日星垂。”^①咸丰元年(1851年),郑国鸿专祠在其家乡凤凰建立。

郑国鸿之子郑鼎臣,继承父志,为报国难家仇,招集水勇,雇募火攻船只,会同营员渡洋,暗伏定海县城内外并各岛屿,预备焚烧攻剿。1842年4月24日,他暗向各船装载柴草火药等物,驶至梅山港分三路向北前进。守备徐櫟宝督率火攻船只,先由十六门分作七排,放进街头。该处停泊大夷船三只,各排船只重重继进,围住夷船,即日引燃。武举蒋忠清带兵接应,亦开枪放炮,迎面攻击。

^① 光绪十八年修《宁河县志》。

内应得手,各起而攻英夷。敌船惊惶逃窜时,放炮自毁或撞毁船只多艘。郑鼎臣复见五奎山有逆夷屯扎,上山攻击,逆夷即溃散。接着郑鼎臣之水勇总目袁高荣带领船只在洋剿防,砍死夷贼两名,生擒白黑夷各一名,夺获三板船一只并夷刀等件。5月17日至21日,郑鼎臣及其水勇又在定海螺头门等地用火攻,大挫英军。他因前次焚烧夷船多只,此次复能奋勇立功,清廷授给四品顶戴并赏戴花翎。^①

郑氏父子的抗英斗争事迹,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仰与怀念。

〔答振益〕

^① 《清宣宗实录》卷三七〇、三七一。

沙春元^①

沙春元(?—1858年),清末爱国将领。字梅芳,河南郑县(今郑州市)人,出身于贫苦的回民家庭。幼年丧父,由其母抚养成人,故事母以孝闻。他素不习书,而乐与文士友,尝令人讲解史鉴。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培养了他的爱国思想;回回民族长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养成了他慷慨、刚烈的性格。

道光十一年(1831年),沙春元以武功超群、力大善射举于乡。次年中道光壬辰科武进士,以蓝翎侍卫任山西吉州营都司。1852年(咸丰二年),在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下,安徽各地不断爆发人民起义。清政府调沙春元率部于豫、皖交界处的光州(今河南潢川县)等处防堵。由于沙春元平时注重军事训练,关心下属,赏罚严明,并且每次打仗总是冲锋在前,身先士卒,又善于以少击多,稳定了清政府在豫、皖两省的统治,受到清廷的赏识。不久,晋升为游击,调任天津镇标右营游击,驻防天津。

1856年(咸丰六年)10月,英法列强为了扩大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取得的权益,以达到修改约章、索取赔款和增设商埠的目的,在美、俄等国支持下,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咸丰七年)12月,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为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两国公使决定率领部分侵略军乘船北上。美、俄公使以调解为名随同前往。1858年2月,四国公使在上海向两江总督何桂清投递照会,提出赔偿军费、公使驻京、增开通商口岸等无理要求。当遭到清廷拒绝后,侵略者决定进军天津,迫使清政府就范。沙春元就是

^① 李焕乙《清真先正言行略》下卷,1917年重刻版。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调防大沽,投身于抗击英法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的。

大沽地处白河口,系天津门户。1858年4月中旬,英舰十余艘、法舰六艘、美舰三艘、舢板船二十余只,载海军陆战队两千多人,在各国公使率领下,分批抵达大沽口外。清政府盲目自大,昏庸无能,既不愿满足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又不愿面对现实积极部署防务,只是寄希望于俄、美的调解。英法侵略者却借谈判之名争取了一个月的时间,积极进行战争准备。5月19日,英、法两国火轮八只,驶入拦江沙内,与先已停泊火轮八只联络停泊,鸣鼓悬旗,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因咸丰帝多次诏令羁縻,并不得先行开炮,致有借口,加之前线最高指挥官直隶总督谭廷襄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侵略者只不过是挟而已,仍不让将士们作任何迎战准备。5月20日,英法联军向谭廷襄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准许四国公使前往天津谈判,并限令交出大沽炮台。当日十时,英法兵舰及舢板数十只闯入大沽口内,并炮轰两岸炮台,双方对峙近一月之久的大沽之战终于爆发。

大沽系北方军事重镇,清政府在此修有炮台四座,安置大炮二十尊,驻军有八九千人众。当英法军舰向南、北炮台发动攻击时,下级爱国官兵自发奋起抗击侵略者。双方彼此互击,英船受伤六七只,舢板四只被击沉,侵略军死伤百余人,使英法联军遭受到沉重打击。在战斗中,沙春元临危不惧,率所部北炮台官兵首先向敌开炮还击。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炮台之上,当矢炮交加,神色自若,亲燃巨炮,悉力悍御。由于敌人炮火猛烈,沙春元所守北炮台顶盖被炸毁,形势万分危急。部属劝其速下台以避之,却遭到他的坚决拒绝。怒叱之曰:“失地丧失(师),惟一死报国耳。此我死

所也,尚何言?”^①说完仍坚守战斗岗位,继续指挥战斗。正鏖战间,为炮火击中,“洞腹肠出,顿时阵亡”,^②为抗击英法侵略以身殉国。沙春元及广大下级官兵在大沽之战中所表现的爱国热情,连《西人月报》也不得不承认“大沽武弁之忠勇”,“并非不战而溃之比”,“若使统御得人,未必不收其效”。^③但由于清廷推行卖国投降政策,负责指挥战斗的直隶总督谭廷襄及提督张殿元、副都统富勒登泰等文武大员,“一闻炮声,心胆先怯”。他们虽近在咫尺,不仅对守台官兵坐视不救,而且一个个临阵脱逃,致使大沽终于陷落。沙春元为国捐躯的英勇事迹,在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沙春元家乡父老对其壮烈殉国奔走相告并表示沉痛的哀悼。李焕乙咏诗云:“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对其报效祖国、马革裹尸的献身精神,给予了热情的歌颂和赞扬。咸丰皇帝谕令在其原籍和阵亡之地入祭昭忠祠,并赐云骑尉世职,以示优恤。

〔答振益〕

① 李焕乙《清真先正言行略》卷下。

② 《直隶总督谭廷襄等奏炮台被占津郡势难战守折》,见《第二次鸦片战争》(三)。

③ 夏燮《中西纪事》卷一四。

二 徐天尧 安玉贤^①

徐天尧、安玉贤皆甘肃人。清咸丰初年在新疆塔城雅尔噶图金矿采金。同时聚此采金者，有众多回民（清文献中称“民回”）和汉民，均系“无业贫民”。太平天国起义后，清廷为筹饷镇压，令“广为开采”，采金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自咸丰元年（1851年）《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后，沙俄取得在塔城设贸易圈特权。“贸易圈”（又称“货圈”、“买卖圈”、“夷圈”）全由俄人管理，建房存货，中国人不得入，实为有实无名之租界地，进一步入侵中国之立足点。雅尔噶图金矿出金越来越旺后，沙俄垂涎，胡说该处是俄国领土，中国人入俄土采金，令中国矿工撤回。雅尔噶图在塔城西南，距卡伦（边界哨卡）七八十里，完全在中国境内，实是中国领土。中国矿工不服，继续在此采金，不惧俄人威胁。当地中国官员虽坚持雅尔噶图“实非俄罗斯地方”，但迫于俄人压力，清廷忙于镇压东南太平天国起义，无暇顾及西北边陲，以“现获金砂不旺”为由，“将民人全行撤回”，屈服于沙俄讹诈。徐天尧、安玉贤等人继续前往采金，认为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采金，外国人无权干涉。沙俄蛮横无理，驱赶中国矿工，并以种种手段残酷迫害。咸丰四年腊月二十六日，“番贼用烟火烧熏，熏死良民六名”；五年五月十八日，我矿工六人进山，“被贼用枪打死五名”，安玉贤被抓，受严刑拷打后放出，令其“回城报信”。遭夷贼残害，“冻饿、绳捆、投河、立逼身亡良民数百名”。我矿工向官府禀报事实，严正表态：“小的看俄罗斯之意，有（意）暗占我国疆土。小的等俱系天朝黎民，犯法既

^① 根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有关各卷和故宫有关档案写成。

死,情所甘心,但不惧怕俄罗斯。”表现了中国矿工维护主权、力御外侮的无畏精神。徐天尧、安玉贤等九名矿工代表,抬着被害者尸体,前往塔城衙门向专管通商务的章京萨碧屯请愿,求其出面与俄交涉赔偿命价。遭萨碧屯拒绝。后“复有民回徐天尧等背来死尸二首,祈请查办抵偿”,仍遭拒绝。矿工们忍无可忍,群集沙俄贸易圈外,“倡言要放火烧毁夷圈货”,清塔城参赞大臣英秀派兵将矿工驱散。七月十四日四更时分,五六百回汉矿工集合行动,安玉贤用苇子点燃夷圈草堆,火势蔓延,当夜风大,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很快将贸易圈内存货、房屋烧毁,沙俄分子恐慌逃走。七月二十三日,英秀等具奏朝廷,陈述事情经过,说“七月十四日四更时分,有雅尔噶图一带金厂驱逐回城之民回等,……放火烧毁俄罗斯贸易房屋”;并诬民为匪,胡说“此等民回多系无业匪徒……已严飭满汉官员及该管官等,务必设法陆续缉拿,……以便从重定拟”。九月二十一日,徐天尧等上禀朝廷,控萨碧屯勾结俄人残害民人,历述事实真相,说“具投天伸冤民人徐天尧,年五十二岁,系甬州人。今告到前任厅官萨大老爷侵吞国课,私通番夷,固卖疆土,且无王章,大干法纪事”。“萨厅长在贸易圈子明来夜去,又拜干亲,又请番犬衙内饮筵作乐”,“萨厅官居五品,与番犬为亲为友,大失皇上纪纲,惹众耻笑,成何道理”。“今国家不应出此贪官,万民受害不浅,种种冤情,哀哀投天上告”。“原告民人徐天尧、康德禄、安玉贤、李伏有、马文栋、王宗浩、马隆兴、何腾蛟、马占彪……”。萨碧屯被革职,英秀调离。但徐天尧、安玉贤亦被捕,押送伊犁。安玉贤临行前,“万首齐观,敛钱资助路费,势颇汹汹,其意为若办理不得其平,众情必不帖服”,表现了群众对英雄的支持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后经二年谈判,签订《中俄塔尔巴哈台议定赔偿条约》,中国贴补俄商损失折银十三万五千余两,以武夷茶五千五百匣折赔;俄人以保护

马维骐^①

马维骐(1846—1910年),字介堂,云南大庄人。祖马诚元末自南京来滇,任建水州牧;父定邦,道光乙未(1835年)恩科武举第一名,又有文才。维骐遵父训,自幼勤勉学习,学文之余,兼习武略。十三岁闻师讲马援传,立志效命疆场,保土卫国。二十三岁时(同治七年,1868年)父卒,母王氏维持家务。维骐继父总统团防,维护地方,同治十年擢参将。1883年中法战争起,维骐从岑毓英师出关,以偏裨当一路。初驻军兴化,应援北宁,屡挫法军。旋进攻宣光,维骐着越服,与越人数名,深入敌区,侦察敌情,并绘制地图,归呈岑毓英。岑阅图大悦曰:“虏在吾目中矣!”遂据图部署,大破敌阵。维骐又奉命援救刘永福黑旗军,时永福被法军包围,维骐苦战数昼夜,将敌击退。继又助攻临洮,获胜。法军退往河内,越南战局改观。《清史稿·马维骐传》简述维骐参加中法战争立功经过:“法越之战,滇军多有功,而以维骐及覃修纲、吴永安功为著。师攻宣光,垂克;法援大集,围刘永福军,维骐锐身驰救,鏖战二昼夜,击却之。从攻临洮,功最,迁副将,赐号博多欢巴图鲁。”

中法战争结束后,维骐多年在边疆及民族地区用兵,晋总兵。光绪二十四年,授广东潮州镇;总督岑毓英荐升广东提督,总督刘长佑奏授建威将军。光绪二十八年,擢四川提督,总督岑春煊晓其精武略,军事一以属之。“赵尔巽督川,改编巡防军,奏充翼长,训练士卒,创设将弁学堂,军民绥戢。”维骐统兵,“每战谋定而后动,

^① 根据《清史稿》卷四五九《马维骐传》、《清史列传》卷六四《马维骐传》及马维骐次子媳蔡建筠及曾孙马纯武所写材料写成。

所向克捷；推诚待下，得士卒心”；“大敌当前则声色不动，军行所至则市井无惊”，这虽系过誉之词，但显示了他用兵的严谨和谋略。当然，他用兵的对象，并不始终是对付敌人的。

马维骥不单精武，还通文墨。1905年兵行西藏归来，面对高山大江，即景赋诗：“大江声不断，战罢一归来。阴雨沉千嶂，风云荡二台。东流何浩淼，西顾几徘徊。此地信天险，筹边待将才。”他写的字，“点如坠石，画若夏云，钩若屈金，戈如发弩”，“得者珍之”。成都武侯祠存其题词和“隆中对”墨迹，昆明金牛街清真寺也有他写的匾额。

马维骥还热心教育，在家乡办龙泉书院，从四川购书数千卷寄回，得马联元之荐聘请名师任教；又制织机数百架，发展地方工业。树人还树木，植松树万棵，绿化家乡。在粤时倡建滇黔会馆，影响遍川滇黔粤。

宣统二年(1910年)维骥卒于任，谥“果肃”。三年，蜀绅以公遗爱在民，请建专祠。诏曰：可，命地方官春秋致祭。维骥故里建有果肃公家祠，有碑两块记其事。

〔李松茂〕

马秀廷^①

马秀廷,字文仲,云南师宗县大新村(原属陆良县)人。祖居陕西凤翔府,明初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征滇,秀廷祖随军到云南,补乌撒(今贵州威宁)卫千总,定居下坝。后代马应选移陆良,秀廷即应选后裔。

秀廷年幼习武,后从戎。在军中勇敢作战,升为哨官、管带。1883年底中法战争爆发,秀廷随岑毓英部统定远、镇远两军,督师出关,“转战宣光、临洮”,战斗中“身先士卒”,带兵“恩威毕具,赏罚严明”,中法之战“功劳卓著,为国效忠”,诰授建威将军。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帝制,建立民国。1915年袁世凯窃夺革命果实,复辟称帝,国人群起反对。同年12月底蔡锷在云南起兵,组织护国军讨袁。秀廷追随蔡锷,反袁护国。“吾滇首举义旗与之对抗,当五华誓师之日,通电中外,兴师北伐。袁亦命将捣滇,取道邕州,欲由罗平、师宗直窥省垣”,时秀廷驻军罗平,扼滇、桂要冲,力阻亲袁军西进。亲袁军被挫,改道广南,进扰开化、邱北、阿迷、弥勒、宁州,“而建水、蒙自、个旧、石屏等县,蹂躏尤甚,或被掳掠而积储一空,或遭焚毁而屋舍成墟,……城破之处,尸骸横陈,东南半壁,惨不忍言”。由于秀廷守御,“独师宗、罗平、陆良、泸西四属人民未蒙其难,……马公秀廷之功也”。秀廷有功民国,民国委为陆军中将,蔡锷将军委统普防国民军,并请给三等嘉禾章,保护桑梓有功,民国九年(1920年),罗平、陆良、泸西、师宗、弥勒、邱北、阿迷、宁州、开化等十一属绅民敬立“铜柱铭勋”碑,纪念他的

^① 据马秀廷墓志和纪念碑材料写成。

功德，“迄今日追忆，实有不能忘情者”。碑高 2.10 米，宽 1.95 米。十年动乱期间，碑被推倒于大新村公路旁，现已列入历史文物，予以保护，并新建碑亭，碑置于其内。

秀廷急公好义，救困扶危，大荒之年，寄银元赈济乡人，每人十元；大新村修建清真寺，大力出资相助。乡人至今感念其恩泽。

（李松茂撰，李松茂书）

秀廷公，字子清，号子清，大荒之年，寄银元赈济乡人，每人十元；大新村修建清真寺，大力出资相助。乡人至今感念其恩泽。

白金柱^①

白金柱(1856—1908年),字载廷,云南沙甸人。父早亡,由母抚养长大。幼喜武未习文,“公幼失怙恃,不事诗书,喜聚群儿作垒石为城、折木为兵之戏。长而英毅,倜傥不全,以弱冠入行伍,从马维骥军”。金柱在军中勇猛、力大过人,民间誉称“白大牛”。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马维骥部奉调参战,先攻宣光,再战临洮,白金柱“摧锋陷阵,皆身先士卒”,力挫法夷,为滇军中回将之一。战争结束后,镇守边关,整顿边务,多次在民族地区用兵,“以功累保至记名提督,调补开广总镇,赐胜勇巴图鲁名号”。清末,革命党兴,民变纷起,白金柱奉命参与平定同盟会员周云祥领导的个旧矿工起义和河口边民起义。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十日,在河口染瘴卒于军,天子闻而震悼,谥忠果。

据白金柱孙白琮回忆:“听公(金柱)之同事告知,当年在其防区内,也有革命党地下活动,公发现后,暗地令其离去,并未逮去邀功。与侵境法人交往,则威武不屈,以国家疆土尊严为重。”白琮忆说其祖父自幼与母(白琮曾祖母)相依为命,长大后事母至孝。平时乐于助人,提携亲朋邻里;提倡家乡教育,兴办学校;虔诚信仰伊斯兰教,热心资助清真寺经堂教育。金柱临终前嘱,所遗家产除供家人生活费用外,尽量用于兴办教育,振兴家乡,造福桑梓。

子,白耀明,本书另有传。

[李松茂]

^① 根据锡良撰《记名提督云南开广镇总兵白忠果公墓志铭》和白金柱追忆材料写成。

左宝贵

左宝贵(1837—1894年),清代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字冠廷,原籍山东齐河县,其先祖于乾隆年间迁居费县地方镇(今属平邑县)。父左世荣、母杨氏。家无恒产,靠租种少量土地和农闲时肩挑叫卖谋生。他幼失怙恃,孤无所依,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回族尚武的习俗和奋斗不息的精神,年青时悲惨的经历,练就了他强壮的身躯和坚强的意志,陶冶了他勇敢、骠悍的性格。所有这一切,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左宝贵生活在鸦片战争以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蓬勃发展时期,清政府为挽救其濒临灭亡的命运,一面命令各地举办地主武装团练,一面不断招募兵勇,改革兵制,以增强军事实力。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左宝贵于1856年(咸丰六年),挈两弟宝贤、宝清投效江南大营,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左宝贵和历代许多封建将领一样,也是靠镇压人民起义发迹的。在清政府的驱使下,从1856—1868年(咸丰六年至同治七年)间,他转战楚、淮、皖、齐、燕、苏以及辽东等地,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起义。他镇压了1872年(同治十一年)的热河朝阳县东荒一带人民起义;1875年(光绪元年)宋三好领导的东北大东沟一带伐木工人起义、宫四领导的庙儿沟挖金工人起义;1876年哈力套改一带的“马贼”;1877年建昌、朝阳一带的“边匪”。1878年,他擒获了奉天境内积年“巨寇”赵西来。1891年(光绪十七年),他镇压了热河朝阳一带的金丹教起义。在镇压人民起义过程中,他总是飞军冲入,东荡西决,身先士卒,摧锋直前。因而得到清统治者的赏识

和信任。1865年(同治四年),钦差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檄左宝贵赴前敌管带忠勇营;1867年,又奉命管带河间练军;1871年,被委派管带古北口练军马队后营;1876年(光绪二年),奉命“招募奉字军,以宝贵为翼长”。“复募贵字营并靖边各队”。^①盛京将军崇实、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先后以“营务严肃、谋勇兼全”,“勤明忠实、骁果耐劳、晓畅兵事、谋勇兼优”^②入奏,视其为军事干才。咸丰帝、同治帝、光绪帝曾先后赏给他六品军功,颁赏奖武金牌、白玉翎管、白玉搬指、大小荷包,赐予铿色巴图鲁勇号,赏穿黄马褂、头品顶戴,赏戴双眼花翎。把他由一名普通士兵提升为建威将军记名提督、广东高州镇总兵。

左宝贵善于带兵,严格治军,身为将领,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每临敌,辄衣士卒衣,身先犯阵。“部下有受伤者,皆以私财贻其家属。”^③因而深得军心。

左宝贵,“心存利济,见义勇为。若救荒、助赈、筑坝、开渠诸善政无不襄成。即惜字会、牛痘局、育婴堂、栖流所、同善堂诸善举,亦皆一力经营,始终不懈”。^④他为驻军所在地及家乡百姓做了一些好事,举办不少公益事业。在沈阳驻扎期间,左宝贵于“讲武之余,每欲振兴学校。于营口海神庙、沈阳练军公所、南北寺设立大小义学数处。筹薪水、给膏火。公事退,间辄轻裘缓带,亲至学中考核其课程,循循然有儒士风”。^⑤左宝贵驻沈期间,对修建交通道路也很重视。他还捐资为家乡和营口修建清真寺,并为家乡平

① 民国六年修《沈阳县志》卷九人物,《左宝贵传》。

② 《清史列传》卷六〇《左宝贵传》。

③ 民国六年修《沈阳县志》卷九人物。

④ 《左忠壮公事略》,《竹园丛话》第二十一集。

⑤ 光绪二十二年《重修费县志》卷一一人物二。

邑地方镇修建一座三孔石桥(俗称将军桥)。左宝贵做了诸多善举,深受各地群众的崇敬。

1894年(光绪二十年)8月1日,日本政府蓄谋已久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在此之前清政府内主战、主和两派意见分歧很大。当时掌握清廷外交、军事实权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保存自己实力,不做战守准备,竭力乞求俄、英等国出面调停,力图避战求和。而左宝贵却早在5月日军进驻仁川之后,已洞悉到战事不可避免。派员到汉城测绘地图,备作战之用。他认为“朝鲜为中国门户,而奉省为扼要之区,所有海防江防宜俱加周密。事关大局,稟请添军置炮,预备不虞”,^①体现了高度的责任心和爱国心。

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于7月中旬决定派马玉昆统毅军、左宝贵统奉军、卫汝贵统淮军之盛军、丰升阿统奉天盛军开赴朝鲜,增援直隶提督叶志超在牙山的驻军。左宝贵在接到赴朝的命令时,他星夜调集队伍,仅在两天之内部队就开拔了。行前他到外国朋友家告别时,心情沉重地说:“这次战争与剿胡匪不同,我怕是不会回来的了。”^②可见,他对清政府及军队的腐败、战争的结局有着清醒的认识,是抱着以身殉国的决心前往朝鲜的。

当8月初,四路援军先后抵达平壤时,原驻牙山叶志超、聂士成部,在平壤暂时驻扎下来。在赴朝四大军将领中,卫汝贵是李鸿章的亲信,“恇怯无能,性情卑鄙,且平日克扣军饷,不得兵心”。他所部盛军,是驻平壤四大援军中兵力最多的一支,也是训练、纪律最坏的一支。入朝后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不但不能作战,尚须防

① 光绪二十二年《重修费县志》卷一—人物二。

② 《沈阳三十年纪》第137页,见阿英《中日战争文学集》,北新书局版。

其骚扰。丰升阿也昏庸无能,因其所部根本不能打仗,群众戏称之为“鸭蛋兵”。惟有左宝贵“素称勇干,忠勇奋发”,^①所部战斗力较强。8月下旬,叶志超、聂士成率军先后抵达平壤。由于叶谎报军情,饰败为胜,竟被清廷委以统领平壤诸军之重任,全军皆惊。叶志超任平壤驻军最高统帅后,不是积极备战迎敌,而是成日饮酒作乐。一再强调平壤城低而圯,万不能守。“平壤城卑粮少,又难转运,万守不住”,^②为其弃城逃跑制造借口。战前左宝贵曾向清廷建议,如果能将卫汝贵所部撤离,诸将皆可效死,否则将同归于尽。针对叶志超畏敌和幻想不战而退的想法,左宝贵力主“敌人悬军长驱,正宜出奇痛击,使只轮弗返,不敢窥觊中原”。“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哉!”^③他认为既然“奉旨御寇,力即不及,义不可挠”。^④左宝贵以民族大义为重,竭力主张备战迎敌,与叶志超之流的贪生怕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李鸿章、叶志超一味避战求和,坐失战机,日军前锋部队9月初逼近平壤后,制定了四面包围分进合击的战术。当时驻扎平壤清军总数达三十五营,兵力约一万五千人。加之平壤城“临大同江,三面有城墙。城墙石质,高达十公尺,不易攀登。其四面多沼泽,实为天险之地”。^⑤若叶志超决心据守,布置指挥得当,鹿死谁手,尚难断定。但在此关键时刻,守城主将叶志超获悉日军即将攻城,又提出弃城逃跑主张。9月9日,“左与叶相聚面商。左主

① 《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② 同上。

③ 栾述善《楚囚逸史》。

④ 光绪二十二年《重修费县志》卷一—人物二。

⑤ 《中日战争》资料丛刊第一册。

战,叶主退守,意见不合”。^①左宝贵愤怒至极,须眉皆竖,怒骂曰:“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我冢矣!”^②14日晚间,正值战事紧张之际,“志超将冒围北归,宝贵不从。宝贵虑志超遁去,以亲兵守之”,^③制止了叶志超弃城逃跑的可耻行为。

9月15日凌晨,日军分三路向平壤发起总攻。大岛义昌少将率混成第九旅团向大同江东岸发动进攻;陆军中将野津道贯率第五师团本队向平壤西南发动进攻;陆军少将立见尚文率朔宁、元山两支队向平壤城北牡丹台、玄武门(北门)发动进攻。因城北扼平壤通往义州大道,又是清军后路通道,日军在这一线布置兵力达八千人,约占其总兵力的一半,是其主攻方向。担任城北防务的清军将领,正是被誉为“东方诸将之冠”骁勇善战的左宝贵,统兵三千,左宝贵及其部属面临严峻的考验。清军防地地形及布防情况是:玄武门跨山为城,城外有牡丹台,高五丈余。清军在台上修筑堡垒一座,在台外自东北向西北修堡垒四处,拱卫平壤城北安全。凌晨四时许,日军朔宁支队及山元支队分别向牡丹台外东北及西北清军营垒同时发起猛攻。左宝贵登城指挥清军顽强抵抗。双方枪炮对施,硝烟弥漫,咫尺莫辨,“倭人死伤无数,仍猛进”。^④激战持续至八时许,日军凭借其优势兵力及炮火,攻占牡丹台外四处堡垒,形成了对牡丹台的三面合击之势。牡丹台是平壤城的制高点,是平壤城能否保全的关键所在。清军在左宝贵的指挥下,凭险据守。他们用毛瑟枪、速射炮向日军猛烈射击,誓死抵抗,重创了日本侵略者。日军恼羞成怒,增调重炮向牡丹台排炮轰击。击毁牡丹台

① 易鼎顺《质墨拾余》,《中日战争》资料丛刊第一册。

② 民国六年修《沈阳县志》卷九人物。

③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资料丛刊第一册。

④ 同上。

胸墙及清军火炮,步兵乘势蜂涌向上,牡丹台终被日军攻陷。正在玄武门指挥作战的左宝贵,见牡丹台失守,“知势已瓦解,志必死”,乃遵回族礼节,先期沐浴,身着“御赐衣冠……黄马褂,珊瑚冠”,“登陴督战”,“往来睥睨指挥”。^① 为其安全着想,部下劝他取下头上翎顶,以免引起敌人注目。他却坚定地回答:“吾服朝服,欲士卒知吾先,庶竟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② 一面严督兵弁奋勇血战,一面躬踞炮台,亲量大炮准星,“手燃大炮,左右轰击。虽屡受枪伤,犹裹创指挥,誓死抵御”。^③ 正激战时,“忽飞子中其项,营员劝其暂下,宝贵叱之”,^④ 以示临阵死节绝不后退的决心。在左宝贵行为的感召下,军心大振,均勇往直前拼死效力。15日辰刻,正酣战中突然一颗炮弹将我炮击毁,铁穿宝贵腋下,仍裹创督战。又一飞弹至,“受伤堕地,犹能言,下城始殒”。^⑤ 为了抗击日本的侵略,左宝贵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时年五十七岁。

左宝贵牺牲后,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光绪帝赐予他“太子少保,谥忠壮,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⑥。令将其事迹交付国史馆立传,在其生前立功省份建立专祠,以示褒扬忠烈。家乡为他营建了陵墓,墓中埋葬了左宝贵生前穿过的一只靴子,这就是左宝贵的衣冠冢,一直保留至今。一位在沈阳生活多年的英国传教士回忆道:“在沈阳听到我们的好将军死了,悲哀与恐惧混在一起,一般人都是这样。因为除了他,再没有人能保护满洲了。在沈阳无

① 民国六年修《沈阳县志》卷九。

② 《清朝野史大观》卷八。

③ 《清史列传》卷六〇。

④ 光绪二十二年《重修费县志》卷一—人物二。

⑤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资料丛刊第一册。

⑥ 《清史稿》卷二四七列传。

论高贵的、卑下的都敬爱他”。“直到如今,他在一般人心中也占据一个位置”,^①反映了沈阳人民对左宝贵的崇敬。文人们写下了许多诗文,赞扬左宝贵英勇抗战为国死节的行为。在朝鲜,平壤人民传说每年9月15日,如果下雨的话,可以看见“有个军人跨着白马,高挥着在暗淡中仍然发着白光的军刀,向北方走去”,“这骑白马的将军就是左宝贵的英灵”,^②反映了平壤人民对他的敬仰和怀念。左宝贵是中日甲午战争中第一位战死沙场,以身许国的清军高级将领。他壮烈殉国的英勇斗争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气节和坚决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传统,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答振益〕

① 《沈阳三十年纪》第143页,见阿英《中日战争文学集》。

② 《雨夜七星门外左将军之魂显圣》,《中日战争》资料丛刊第六册。

马福禄

马福禄(1854—1900年),清末将领。字寿正,甘肃河州(今临夏)韩家集阳洼山人。其父马千龄,字松坪,年青时以农商为业。1863年(同治二年)随马占鳌参加河州回民反清起义,系起义军领导人之一。1872年(同治十一年)太子寺大捷后,随马占鳌降清,被授予蓝翎顶戴之职。千龄有四子,福禄行二。

马福禄幼年时师从康泰学习经史,于读书之余,常练习弓箭刀石,以善射著称。十二岁时曾单骑逐狼,缚之而归。稍长,弃文就武。常对人说:“国势凌夷,强敌环伺,非武无以挽救”,^①反映出其习武目的志在报国。他身体魁武,臂力过人,手持八十斤重大刀,二百斤重石锁,上下挥舞,旋转如飞。1875年(光绪元年),参加武科乡试,名列第一。第二年省城中武举。1880年(光绪六年),赴京会试,以其骑射娴熟,武功超群考中头名。殿试时由于用力连折三弓,光绪视其粗野,又不熟悉跪拜之礼,故而降赐进士,留京充当侍卫。旋以亲老乞养为由,辞归故里。在家期间,务农之余,常调解邻侣纠纷。以其办事公正,善断是非曲直,深受人们敬重。

自光绪初年起,花寺门宦内部新老教派之争,在循化一带撒拉族内部愈演愈烈,由于官府处置不当,终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3月,爆发了花寺门宦老派教众反官府的斗争。事发后,河州总兵汤彦和下令“不分新老,一律剿办”。致使新老两派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官兵,再次发生了河州、循化一带回族、撒拉族联合反清斗争,史称“河湟事变”。起义发生后,马福禄积极响应官府号召,

^① 马鸿宾《清振威将军总兵马公行状》。

倾全家财力组练乡勇,为清廷效力。汤彦和得知河州被困消息后,急忙由进剿循化途中回援河州,屯兵距河州四十里的双堡城。次日夜大雨倾盆,起义军向其驻地发动突然袭击。汤部“八营之人,逃脱者仅数百耳。汤镇台与亲随勇丁抛枪弃马,无衣无履,亦岌岌乎不免焉”。^①只是在马福禄的接应护送下,才经藏区逃往兰州。陕甘总督杨昌浚见马福禄忠实可用,令其招募骑步组成“安宁军”,协助调来镇压河湟事变的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巡抚魏光涛剿抚反清回众。12月,马福禄、马安良诱降围攻河州回军首领马永琳、周世祥等人,河州围解后,残暴地将马、周等一百三十七人杀害。在处理“善后”工作中,他又在今青海米拉沟一带大杀无辜,以交人耳朵代交人头,杀人无算。起义士兵因痛恨马福禄助清残暴镇压起义群众,放火烧毁了他在阳洼山的住宅,甚至连其亲属房舍也无一幸免。河湟事变被镇压后,经董福祥举荐,马福禄累功至记名总兵。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董福祥调京任武卫后军统领,马福禄及其所部简练军(由安宁军改称),于次年奉调京师,驻防正定(今河北定县),拱卫京畿。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爆发了席卷全国的义和团运动。5月底到6月初,俄、美等国侵略军四百余名以保护使馆为名,分批乘车入京。6月9日,马福禄所部简练军随董福祥甘军奉调守卫京师。10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组成侵略联军二千多人,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经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因沿途受义和团阻击,14日到达廊坊,马福禄奉命率部前往阻击。18日,马福禄与总兵姚旺率部三千余人,在义和团配合下向侵略军发起猛攻,逼近廊坊车站。马福禄“令骑兵下设七覆,步兵张两翼,敌近始发枪,倒者如仆墙。敌

^① 《乙未循回纪略》,见《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弹落如雨,骑兵以散处少伤。两翼左右复包抄其后,短兵相接,敌不支,遽却”。^① 激战中马福禄身先士卒,挥短兵闯入阵,喋血相搏,表现了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被称为“庚子之役第一恶战”的廊坊大捷,沉重地打击了西方侵略者。西摩尔在逃回天津租界后不得不承认:假若中国军民所用的也为西式枪炮,则他所率联军必然会全军覆没。侵略者承认“这是欧洲人在亚洲人面前的丢脸”。^②

廊坊大捷后,马福禄奉调入京攻打使馆。他在正阳门城楼上安置大炮,居高临下轰击美、日使馆,负伤后仍坚持指挥战斗。7月2日,复率部进攻英国使馆。英军在逼近正阳门的城墙上,设置十道栅栏负隅顽抗。马福禄对马福祥慷慨激昂地说:“事既决裂,挽回无术,我辈唯有恪遵朝命,以身报国,为民族争光。”^③ 说罢,指挥马福祥向敌继续发起猛攻。经过激烈战斗,马福祥又突破英军两道栅栏。他督战益力,昼夜循环攻之,连毁七栅,是夜,大雨倾盆,马福禄亲率敢死队发起猛攻,英军不支纷纷退却。正当他“大呼跃栅,飞弹忽入其口”,^④ 壮烈殉国,时年四十八岁。同时为国捐躯者,有其族弟马福贵、马福全、马福恒、马福宣;侄马耀图、马兆图及亲属百余人。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甘屈服于外来侵略的大无畏的英勇献身精神。

马福禄英勇捐躯后,其遗体安葬于北京阜成门外三里河清真寺旁。清廷追封他为振威将军,谥忠烈。1955年,马福禄长子马鸿宾将其遗骨迁回甘肃原籍安葬。

〔答振益〕

① 《清史稿》卷四九五《马福禄传》。

②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二卷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③ 和龚《马福祥年谱概略》,《宁夏文史资料》第十一期。

④ 王树枏《清振威将军马公神道碑》。

三 杜文秀

永昌惨案

杜文秀是近代以回族为主体的云南各族人民联合反清起义的杰出领袖。

文秀字云焕,号百香,清云南省永昌府保山县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十一月初八日,幼聪颖负大志,应童子试,名列前茅。十六岁补廪生,中秀才。

清朝政府自嘉庆、道光以来吏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危机四伏。又对回回民族实行空前的高压政策,民族矛盾日益严重。这时云南地方回汉民族经常以日常琐事发生冲突。永昌地处西南边陲,这种冲突尤为突出。地方官吏或敷衍塞责,不能认真办理;或挟私徇情,任意抑扬。于是是非混淆,舆论失实。回族人民衔冤难告,嫌怨日深,从而酿成了大规模的回汉械斗和屠回巨案。

嘉庆五年(1800年),顺宁府(今凤庆)悉宜银厂回汉民因口角争斗,事态扩大,回民被击杀十八人。道光元年(1821年),云龙州白羊厂回民与湖广及临安汉人“因争厂地礮硎挟嫌”,发生械斗,双方死伤多人,其中死伤回民居多。回民赴京控告,地方政府奉旨处理,给回民死者每户给银九两,草草了事。^①道光十九年(1839年),缅甸(今临沧)官府唆地方恶棍屠杀城内回民一千七百人,同

^① 《白羊厂回汉械斗案》,荆德新编《云南回民起义史料》第10—11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时将城郊五寨回民一百七十余户,全部焚杀。^①劫余回民在张富、马效青、黄巴巴、蔡发春率领下,聚众自卫。

清朝地方官府,始则“助汉抑回”,终则公开屠杀回民。缅甸事件很快冲击到保山。保山县城内有回民四千余人,城外五十余村均有回民居住。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汉人万春组织烧香会,将金鸡村等七哨汉民,组成数百人一香,或千人为一香。势力既成,目无官府,率众围困县城,企图尽屠城内回民。幸赖太守陈芝楣多方排解,虽未酿成大祸,但嫌怨已深。二十五年(1845年)四月,保山城东板桥地方回汉青年因唱秧歌,发生口角,进而斗殴。回汉之不肖乘机煽惑,纠纷日益扩大。而保山县之官府已被汉绅所包围,与香哨首领呵为一气。始则拆毁板桥清真寺,焚烧当地回民房屋。接着又对金鸡村、八达营、乙丑村等处回民大肆屠杀,脱逃出来的难回前往保山城内避难。^②

八月,张富等在距保山城六十里地的丙麻地方大败清军,邓川知州恒文据此以为保山城内回民“悉属匪类”,密召香首周曰痒、练首沈聚成密谋策划,亲授屠杀回民机宜。九月初二日黎明,哨练入城。城内原住回民加上从城外逃进城的,共有八千余人,“无分老幼男妇,混行杀戮”。杜文秀阖家遇难,仅以身免。他的未婚妻马小有姑被恒文家奴黄贵掳匿。当时人即称此为“永昌惨案”。清吏昏庸,回汉之争,至此转为纵汉杀回的局面。风声四播,人心益增不安。保山以外各州县,也不时发生流血事件。

① 《马文昭叩阍封章》、《缅甸回民叩阍稿》,白寿彝编《回民起义》第一册,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年版。

② 李元丙《永昌府保山县汉回互斗及杜文秀实行革命之缘起》,《回民起义》第一册第3—10页;盛毓华《永昌回汉互斗案节略》,《云南回民起义史料》第63—64页。

北上叩阍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杜文秀星夜绕道至昆明,向云贵总督贺长龄上诉,长龄未能秉公办理。文秀与丁灿庭、白廷杨、刘义、沐文科北上京城叩阍。要求严惩永昌屠回案的凶犯,为死者昭雪。二十七年七月,道光帝命陕西巡抚林则徐为云贵总督“赴滇申办”。则徐抵滇,以“只问良莠,不分回汉”相标榜,实为永昌官绅所左右。二十八年师次永平,判七哨凶徒四百三十名;与此同时,他认为滇西回民“良善少而顽梗多”,判回民四百九十一名。还冤杀各县回族士绅七十六人。^①更以“安抚”为名,将保山子遗二百户“难回”强迫押送瘴毒之地潞江西岸的官乃山居住。文秀于二十七年九月被刑部押解回滇,他看到永昌惨案如此了结,实出预料。冤案未雪,子遗者又面临灭种之横祸。他在压力之下又不得不书写“遵断甘结”,表示承认林则徐对此案的判决。杜文秀还落了个“状告失实”的罪名。他家资荡然,无以为生,又不愿迁居官乃山瘴毒之地,便辗转于成都、蒙化(今巍山)之间。在成都忧愤成疾,几病死。继至蒙化为本小生意,暗中结盟,建立了“忠义堂”、“永胜堂”,联络各地义士,宣传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消息,俟机应变。

叩阍的失败,使杜文秀丢掉了对清廷的幻想,最终被迫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

丙辰惨案

咸丰六年(1856年),有临安矿商与回民争楚雄石羊矿,诉于

^① 马元《林则徐与“白绫血书”》,《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官,官府裁决不公。见临人势盛则扶临抑回,回人势盛则扶回抑临,导致流血械斗,互有死伤。临人退出矿区,将其积恨转移于一般回族民众。二月,临人尽屠南安、楚雄、三井、武定、广通、禄丰等处回民,并扬言要进省屠杀由楚雄逃至昆明的回民。于是,滇东南的新兴(今玉溪)、昆阳、澄江等地回民风鹤频惊,一如道光年间永昌的回民,人皆自危。

有新兴武举马凌汉,“恨临人之强横”,“怒官吏之不为保护”,便挺身而出,于四月初九日率众从海口到达昆明,驻顺城街清真寺内,意在堵御临人,保护省城回民。省府不察,派昆明县王某,邑绅黄琮等出城弹压,令其解散。凌汉历诉回民受害情形,请求申雪,官府漠然视之,对临人反行袒护。凌汉愤极大骂,官府对城内回民益加疑惧。

时藩司青盛,素歧视回民。黄琮奉旨团练,私意亦在制回。今见马凌汉此举,遂起剪除回民之心。碰巧马凌汉在城外打了一次胜仗,有省城陕西回族武举妥福、妥寿前去慰劳。官绅借此诬告妥氏“造无门之锁,阴谋作乱”,对省城回民疑忌更甚,胁迫巡抚舒兴阿密飭各府厅州县灭回。

初十日,舒兴阿召集临安人和各乡团练绅士入城,听号令。十六日,青盛自上院出,当众紧急宣布:凡遇回人,“格杀勿论”。以黄琮为首的团练和临安恶霸,分头搜杀,“不论良莠男女老幼悉殄灭之”。^①历时三日,杀犹未已。十九日,青盛母亲外出,道经沙腊巷口,见被杀的回族妇女剖腹街头,卧于血泊之中,胎儿还蠕蠕转动,非常惊讶,便回去责骂青盛说:“男子作事,与妇女何涉,乃惨毒至

① 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第一册第294页。

此!”^①因此,杀稍止。然回民仅剩余数十人,押禁在臬署中。妇女投水未死者,则囚禁于报国寺、苾忠寺。临人见有姿色者,则割襟为记,然后抢劫而去,当时人称这种作法为“割襟”。

这次大屠杀,昆明回民被杀者二千多户,两万余口,较道光年间永昌惨案更加残酷,影响更为恶劣。云南地方最高当局在屠杀省城回民的同时,他们又传令各府厅州县“聚众杀回,须横直剿灭八百里”。各地官绅、团练便打着“奉宪灭回”的牌子,掀起“灭回”的恶潮。临安、昭通、腾冲、元谋、武定、元江、鹤庆、丽江、剑川等地回民先后罹难。各地回民得不到保护,只得奋起反抗以自卫。一场回民抗暴自卫的风暴席卷全滇。马敏功、马如龙、马德新起于临安;马二花、马连升起于东川、曲靖;马凌汉、杨振鹏起于昆阳、海口;徐元吉起于澄江;田余庆起于河西;马荣起于寻甸。于是,三迤糜烂,滇局不堪收拾了。此年岁在丙辰,时人称这次大屠杀为“丙辰惨案”。

大理政权的建立

杜文秀既结盟于蒙化,静观时变,及闻楚雄、昆明屠回噩耗,知大祸再起。

三月,滇西北鹤丽镇标千总张正泰聚集无赖游勇,歃血为盟,成立“合义堂”。七月,屠杀鹤庆、丽江、剑川回民,进围邓川、浪穹,兵锋指向大理。大理及郊区回汉冲突不断升级。八月初,大理回民惊恐万状。回民父老求知府唐惇培制止。惇培表面上召集回汉士绅商订“互保”条约,实则以堵防张正泰为名,将回族团练全部调往上关防守。回民又请求知县毛玉成保护,玉成率众向唐惇培和

^① 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第一册第294页。

迤西道林廷禧请命,均遭拒绝。玉成垂泪而已。此时有贵州回民吕藩,住在丰城庄,素以多策谋称。情势危急,回民都来找他问计,表示愿意听从他的驱使。吕藩说:“某日黎明,团练汉人将来夺村。我们预先准备好引火之物,埋伏在附近汉村中。等到他们出兵,各村同时放火,他们会心慌意乱,不战自溃了。”大家按照他的主意办理,各个回民村庄幸得一时保存。大理城内回民看到求官府保护无望,只好分区设防,筑起木栅,防备攻击。

初九日,团练期满,迎团于四乡。火烧回族村寨、清真寺。初十日,团练围攻大理西门,回民拼死抵抗,血战数日。后赖有死士五十余人,奋力占有武营军库,得火药若干、大刀多柄、陈旧火枪多枝,得以暂时勉强抗拒。

蒙化回民于事前两日得大理回民求救书。“忠义堂”的领导人即在清真寺开会,决议救援。他们通知各村共募得志愿青年近千人。共举马天有带队冲锋,蓝金喜、马朝珍、马金保统帅中军,马三进士办下关粮草事务,马云霄督后队,杜文秀则订行军律例、掌军法。同时通知“永胜堂”,联同弥渡、赵州回众,会师大理。

八月初五,鸡鸣起行。卯时,已距下关不远,遥见关外汉团来屠下关、营头上、小关邑等处回民。红旗^①业已进关,有即与城内汉团会合之势。马天有出其不意,挥众而上。红旗军惊溃,天有遂入下关,进据大理。清军团练均未大战而散,知县毛玉成、迤西道林廷禧,死于乱军之中。知府唐惇培逃往宾川,死于途中。提督文祥时在姚州,分兵回救,已无及矣。其时张正泰急向大理奔来,回民军分三路出击,大败张正泰军。

杜文秀暨蒙化回民,既据有大理,远近回民,应者日众,势力渐

① 当时清军团练执红旗,回民军执白旗。

大。蓝金喜、马金保、马朝珍、马良、杜万荣、马名魁等，都自矜有功，各不相下；金喜贪财务得，御下寡恩，更失人望；更有盛者，借机报复，侵扰人民。回民内有识之士，都恐自开衅端，遗人间隙。便发起大会，公同商讨。会中金喜等竞相夸伐，独有文秀沉默不语，最后说：“欲举大事，须收拾人心，不当专尚武力，且汉众我寡，尤须重用汉人。”大家都佩服他的见解，吕藩尤力赞其议。于是下令严禁杀戮无辜，掳掠民财，并厚葬知县毛玉成。对同情回民的文祥夫人予以抚慰。于是回汉仇杀的局面，顿成过去。而援回抗汉之师，转化成协和回汉各族共同对抗腐败的清朝地方政权的团体。

九月二十五日，文秀被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升坛授命，授吕藩为军师，马金保为中军将军，杨荣为骠骑将军，刘纲为平东将军，陈义为镇西将军，马良为平北将军，朱开元为平南将军，蓝金喜为奋勇将军，杨德明为左翼将军，宝文明为右翼将军，马天有为前军将军，马朝珍为后军将军，张子经为总理军机正参军，马国忠为总理军机左参军，马印图为总理军机右参军。马安国为都掌教，管理伊斯兰教事务。此后又陆续设官授职。大抵武职为将军、大将军、都督、中郎将、翼长、领军、指挥、先锋、统制等；文职为参军、大参军、参议、参谋、主政、主簿、司务等；又有大冢宰为文职之最高领导，大经略为武职之长，有大司马为军事要员，承审司为司法之官。任用之人，开始以回民为多，其后则汉人之数目大增。对各少数民族旧有之土司根据其原来职位之高低授以抚夷大都督、抚夷大将军、宣政司、副宣政司等职。做到“外连夷长，内结汉民，进无异心，退有余地”。^① 宣布起义军的纲领：“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

^① 《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四七。

文秀手订《管理军政条例》，内有关于帅府执行五条，关于镇守官吏执行十四条，关于军令执行二十八条，关于行营二十三条。^①略见其政治建树之大概。

一、保举官员，须审查才能，酌量功勋。果然堪授此职，方可保举前来。亦须循序渐进，勿得越级滥保。若有不论才能功勋，或私自受贿，或亲故滥行保举，实属不重名器。一经查觉，本人罢职，该保举官滥保一员降一级，二员降二级；如至十员以上，罢职。

一、地方税课，旧有例者，方准抽收。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如土产等类，亦不准勒逼抽收。违者，一经查觉，小者记过，大者参处。

一、府厅州县各衙内，不须多养闲人。至六房书吏，两班差役，以及门房签押各行，须择忠厚明白者用之。一切猾吏，不准任用，以为民害，并量其事之轻重劳逸，每月分别等第，给以工食，不准私索民间分文。如有私索一两至五(十)两者，杖一百追赃；自十两以至二十两者，杖二百，追赃抄家；自二十两以至五十两者，拟绞；至一二百两以上者，拟斩。

一、文武官员，无论镇守地方，或攻开地方，不准估娶民间妇女，为妻作妾。违者，罢职。

一、发兵征讨地方，须委统带官一员，即如元帅亲临。所有各将官，无论何职，务须听号令，勿得违抗。如违，准管带官按所订军令认真惩办，而统带官亦须秉公提调，量能委派，不得于所喜之人委以平顺之事，故意使之成功；亦不得于所恶之人，委以凶险之事，故意使之获罪。如违，实属存心偏袒，有负委托至意，应参处拿问。

一、带兵官经过投诚地方，如有擅入村寨，妄动一草一木，奸淫

^① 详见《回民起义》第二册第111—120页。

吓诈等情,查出,不论官兵,均枭首示众。

一、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营干事,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违者,不拘官兵,从重治罪。

一、官兵有(如)经过文武庙宇,不准驻扎。违者,治罪。

文秀深受清政府实行的反动民族政策之害,从永昌和昆明惨案中他认识到,直接下令杀害回族人民的罪魁祸首是清政府各级官吏,挑拨回汉“互斗”的也是清政府,汉族人民也“同受其害”,是无辜的。文秀为此制订和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大力改善回汉关系,加强民族团结。他“重用汉人”,“不分汉回一体保护”,“回人犯罪较汉人定罪加严”。在他的二百九十七名统属官职中,汉、白、彝、景颇、傈僳、纳西等族官员就有二百八十四名,回族官员仅十三人。文职三十六名内阁参军中,大都为汉、白族。十八大司中汉族有大司寇李芳园,大司成梁国玉,大司略董飞龙;白族有大司卫姚得胜;彝族有大司防李文学。杜文秀指出:“至若迤西,回之受职者数千,汉之受职者数万。”大理政权军队中,“汉兵十之七八,回民(兵)十之二三”。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十分尊重。杜文秀在民族政策方面用力最勤,效果最突出。民族问题在当时当地是最不好解决的问题,杜文秀成功地解决了。从而实现了回、汉、白、彝、纳西、傣、傈僳、景颇各族人民联合反清的政治局面,为大理政权坚持十八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秀依李芳园的建议,“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废除府厅州县制,把属地改为六十四衙,每衙设大使一人(镇守使)、参军一人(州县官)、主簿一人(管财务)、承审司一人(管司法)。进而严明法制,廉洁吏治,稳定了社会秩序。老人传说,当时滇西“偷盗绝迹,夜不闭户”。

文秀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对发展农业、商

业、矿业、手工业生产极为重视。兴修水利,发贷耕牛、籽种给农民耕种。农忙季节则避免大量调动军队和征调夫役。规定“田赋征粮米,除丁银”。“地方税课,旧有例者方准抽取。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每年征粮一次,其余大小苛敛一律豁免”。并轻征商税招徕外地商人、商贩和手工业者免税;在交通要道或险要地带派兵保护,以利外地商人通行;在外商贸易之地设立专门办事机构;对进入滇西货物数量及其价值进行登记,如其在境内被盗或遗失,由地方当局负责赔偿;整修道路,促进滇西与四川和缅甸之间的贸易;在大理南门外、永昌、腾越等地设立行店和货栈为商人提供方便。滇西地区商业和手工业发展较快,一些城市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大理城内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滇西地区“百姓安居乐业”。

伊斯兰教受到了保护,有了一些发展。掌教阿訇有一定的地位,有的大掌教直接参与政事。^①文秀下令修复了各地被清军毁坏的清真寺,在大理城内新建了几座清真寺,各清真寺设立“经馆”,聘请著名经师担任“经馆教谕”、“训导”,发展经堂教育,培养伊斯兰学人。同治元年(1862年)刊刻《古兰经》,名曰《宝命真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古兰经》刻本。

自咸丰六年(1856年)文秀得大理建立政权,延揽人才,励精图治,扩充军队,向四方发展。经十一年之久,至同治六年(1867年)十月大理政权已奄有云南之半。昆明西之镇南、姚州、赵州、弥渡、宾川、云南、邓川、浪穹、云龙、丽江、鹤庆、剑川、永昌、永平、龙

^① 田汝康《有关杜文秀对外关系的几个问题》的章后注文43引“印度事务部档案”称:大理文职官员等级表中包括一些宗教领袖的官衔,如维持清真寺都掌教(从二品),都掌教(正三品),副都掌教(正四品),都掌教典籍(从四品),都掌教中书(正五品),司经馆教□(谕)(正五品),司经馆训导(正六品),司经馆主簿(正八品),司经馆司务(正九品)等。这段记载的实施情况,尚不了解。

陵、腾越、顺宁、云州、缅宁、永化、蒙化、大姚、姚安、广通、中甸、维西、禄丰、安宁；昆明南之思茅、普洱；昆明北之罗次、武定、元谋、禄劝，均已归大理政权掌握。其最盛时已占有云南五十三座城池。昆明东之曲靖、寻甸，阳受云南政府的任命，实亦阴听文秀的指挥。贵州方面，则有金万照、张翎翔、马河图等，占据新兴府及普安厅所属各州县。陕西、四川方面，则有蓝大顺、蓝二顺、蓝朝鼎等先后攻至绵竹、西安。这几方面都是大理政权的别动队。此时大理政权几近掌握西南各省。如其势力东连太平军，北接陕甘起义回民，则中国境内革命形势将另是一番景象，大清帝国之危亡必将指日可待了。

四反围剿

咸丰六年，大理政权建立伊始，提督文祥奉朝廷命自姚州向大理进发。都司何有宝奉恒文命西上，与文祥会师。有宝骁勇当前锋，所向披靡，从镇南直攻至红岩、赵州，距大理三十里。文秀亲率大军前往迎敌。暗派吕藩诱说有宝子反清。文祥拟诱捕有宝父子斩之。有宝杀捕者，远遁。文秀挥兵掩杀，文祥营溃乱，退回镇南。这是清军第一次西征，被杜文秀击败。

十年(1860年)二月，提督褚克昌倾师西犯，连陷姚州、大姚、云南等县后，又分兵进攻红岩、弥渡、宾川。大理震动。文秀亲率大军于红岩、赵州对敌。急调扬威大都督蔡发春于云州，发春星夜来援，乘其不备，相继克复红岩、弥渡、云南县等要地。时迤东南友军马如龙率领东南回民义军赴迤西援助，自曲江出发，取道通海、嵎峨(峨山)，出易门，入南安州(今双柏)。宜良汉族诸生李芳园亦率部由安宁经易门至南安州，联合攻取广通县，进占楚雄，截断克昌后路。克昌粮运不济，军心动摇。七月，蔡发春攻克褚克昌的宾

川大营,克昌兵败身亡,全部覆没。这是清军第二次西征,也被文秀击败。

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署云南布政使岑毓英镇压了迤东曲靖等地回民起义军,率大军西征,破文秀于罗川,进占楚雄,分军取景东,复元谋、镇远。邓川、云南、赵州、浪穹、鹤庆、弥渡、宾川均不战而得。继陷永北,败文秀于镇南。遂命张润、张愉等攻上关,钱大川攻下关。文秀督师力战,攻上下关者皆败。文秀挥兵追击,诸城已失复得。岑毓英腿部中伤,命李惟述扼楚雄,余部退归省城。这是清军第三次西征,经时一年,终被文秀击败。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马如龙已降清,为临沅镇总兵,继署提督,久久无功,不为清廷大吏信任,急于立功自效。清军分中路(西路)、北路和南路发起攻势。中路又分为二支:一由参将杨振鹏、副将李惟述指挥,自楚雄攻镇南;一由参将杨先芝、游击合安国指挥,夺取姚州。北路由昭通镇总兵杨盛宗指挥,自昭通进攻永北,再出鹤庆、丽江,攻占上关。南路由署腾越镇总兵田仲兴和署普洱镇总兵李锦文指挥。其一自景东攻蒙化,一自普洱攻威远、云州和缅宁。马如龙亲率兵九千,在楚雄、定远之间往来策应。^①四月,文秀分三路反攻,一出大小驛川进攻楚雄;一援镇南,攻大姚;一驰援姚州。如龙本与文秀同时起兵反清,其部下大都为回民,今如龙同室操戈,屠杀同族兄弟,部下多不乐意。合安国、杨振鹏且与文秀暗有联络。如龙军容虽盛,实无战志。未几,振鹏溃于宾川,安国溃于姚州,李惟述退保楚雄。其北路杨盛宗溃于永北,撤回昭通。南路以“瘴疫盛行,粮饷不继”为借口,田仲兴退守新平,

^① 《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卷二八第6页。

李锦文部撤归普洱。^①马如龙称病,引兵东归昆明。这是清军第四次西征,又被文秀击败。

反招抚

清朝云南地方当局对大理政权实行军事围剿不能得手,巡抚徐之铭奏请朝廷从事招抚。以马德新为云南伊斯兰教著名学者,人望甚著,马如龙与文秀同为回民,遂委马德新、马如龙出面遣人西上议和。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派马载堂抵大理,招抚未成,反被杜文秀说服留居大理任职。五月,遣督标中军副将杨振鹏奉命再赴大理劝降。行前马德新、马如龙分别致函杜文秀。振鹏尚未到大理,五月十五日文秀即致书振鹏,说明不可议和及难于议和之故,并劝其“无烦尊驾到榆”。其文云:

想滇南大势,自兴师以来,我等所据城池不少,所戕官员甚多,而今竟转和息,复予官职,是无异杀刺史者为刺史,杀宰相者为宰相。体制何存?在朝廷岂不虑貽笑于天下后世乎?推其心,不过因江南未靖,西洋复来,各省纷争,天下鼎沸,暂为缓此急彼。俟彼处稍定,必将举全师以压我境。迨至彼时,我兵已散,我将各离,始知朝廷包藏祸心,则谋不及施,勇不及逞,嗷嗷待毙,悔之晚矣。此不可和者,一也。

数年以来,我兵到处,杀其父母,夺其子女,掠其玉帛,焚其房屋。凡受害者,无不饮恨于心。所恃者,用威之后,继之以恩。纵有一二不平之人,亦因兵权在我,一切精壮尽为我用,彼即思逞,附和无人。若一从和,则精壮散,兵权分,不平之人于以将计,暗中调为,乘隙生变,以雪前耻,以报前仇。彼

^① 《云南通志》卷一一〇第40—41页。

时外兵逼境，内患迭兴，真使我辈手足无措，必将坐受其困矣。此不可和者，二也。

当此时也，我以图谋大事，汉民假我以仁，摩民以义，凡有驱策，莫不听命。则此时之民，无不视我为父母，即视彼为仇讎。为我驱策，无不听命。若一从和，是为朝廷之民，归之朝廷，彼又将视朝廷为父母，视我为兄弟。一旦有变，犹欲驱百姓以迫敌，则是驱兄弟以攻父母。有是事乎？有是理乎？况为兄弟也者，势必顾父母以攻抗傲之兄弟，未有顺弟兄以攻恃怙之父母。此不可和者，三也。

若一从和，则半年两载之后，或朝廷另委督抚，另委提镇，来滇视事，将现受其职者调往别省。欲从之，则抗违君命。欲从之，则虎已离穴。当乎其际，势必不从。不从，即叛矣。昔日之叛，实因天回激成，犹可说也。后日之叛，必因违君命而起，有何言哉？则是前日之误，犹为不误，后日之误，终为大误矣。此不可和者，四也。

天下穆民，本属一家，何分低昂，今之所设都督、将军、先锋、统制等官，外虽各有官职，而内实顾持教门。所以远近亲友，无不乐从。若一受大清之职，则某也身荣贵显，某也食贫居贱，富贵失望，贫贱攸分，人心含怨，势必至操戈入室，同类相伤，祸有不可胜言者矣。想朝廷以和相议，以官相饵者，尽在此矣。此不可和者，五也。

抑或谓：既受清职，权自我操。远近亲友，莫不尊亲。岂不思曩日之督提镇州县府厅，实因天回之故，遂至戕杀多员。彼朝廷命官尚难免此，况由叛而得之官乎？异日人思报复，心怀不平，将谓我杀官而得官，彼又杀官而得官，又何不可乎？出乎尔，反乎尔，事有必至者矣。此其不可和者，六也。

至若迤西，回之受职者数千，汉之受职者数万。十八土司俱各袭职。文则划策，武则立功。三教同心，联为一体，纵不能远期大成，亦可以偏安小就，效法南诏，历年八百。揆诸时势，差堪自信。若一从和，则回之受职者固无庸议，汉之受职者将置之于何地乎？富贵失望，贫贱交迫，势必至操戈入室，同类相残，祸有不可胜言者矣！此难于和者，一也。

凡此旧官，秩然有序。若谓现在城池，即令守其土者仍旧职守，我迤西官多地少，安彼则此怨，安此则彼怨。况此同僚，视如手足，一切英雄，素有大志，誓不愿为贪官所屈。若一从和，则各率兄弟，分别四方。昨接来函，传集面谕，无一应者。此难于和者，二也。

现在迤西边患已息，内政就绪。府厅州县安堵如常。士农工商，各归本业。同心捍卫，众志成城。一闻讲和，纷纷聚讼，情愿敌忾，不愿从和。犹恐误中奸计，别生事端，则已安之地，反遭蹂躏。揆之人情，和之一说，不惟回不愿，而汉更不愿矣。此难于和者，三也。^①

文秀对于当时不能妥协的局势，洞若观火。大理政权领导集团反抗清政府情绪之炽烈，更跃然纸上。同年冬，徐之铭、马德新派田余庆三赴大理招抚，被文秀断然拒绝。三年（1864年）四月，马德新亲赴大理“和谈”，当他劝文秀接受清政府委任的官职时，文秀义正词严地说：“以一个合法运动的领袖，竟卑怯地放下武器，从压迫者手里接受一个平凡的职衔，我深深替这些人感到羞耻。”^②马德新大理之行也以失败告终。稍后文秀致马德新函说：“官吏反

① 《覆杨振鹏书》，《回民起义》第二册第105—107页。

② 罗舍《清季云南回民起义始末》。

覆无常,前车在鉴,未可信也。且满人夺我中夏,主政二百余年,今之官吏大都忘其根本。吾三迤,回汉一心,誓绝满虏,有进无退。况今者太平天国业已克复十有余省,石达开奉命来滇,将与吾歃血为盟,互相援助,扫尽腥膻,以安吾民,指顾间事耳。”^① 这里指朝廷为“满虏”,革命情绪堂堂正正,坦然无讳。徐之铭的招抚政策宣告完全失败了。

东征昆明

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文秀以云贵总督劳崇光病卒,岑毓英引军征黔未归,马如龙围剿滇西“丧师而归,人望顿失”,昆明空虚,遂决计东征。调集二十万大军,兵分五路,以扬威大都督蔡廷栋为大经略,大司戎马国春为总指挥,率大司平马兴堂、大司寇李芳园等十八大司^②统摄之。文秀誓师,云:

此次出师,本为兴汉,戒勿滥杀。如临其境,如遇其民,各当发明宗旨。但得汉回一心,以雪国仇,是为至要。统兵官等须知仁义之师,以道德为甲冑,以亲爱为戈矛,以相应为攻击。

我军有三事焉:始则锄满,次则拊汉,三则除奸。而彼军反对,然后戈矛相见。彼杀我先杀,彼止我先止。

战胜攻取之际:毋肆掳掠,毋贪财货,毋凌妇女。遇官吏顽梗不服者,杀之。良善被挟者,抚之。诸恶元凶,法所必诛,

^① 马观政《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回民起义》第一册第298页。

^② 十八大司为大司戎马国春,大司衡杨荣,大司藩安文义,大司平马兴堂,大司寇李芳园,大司政刘诚,大司隶刘纲,大司令马清,大司勋米映山,大司闾马旭,大司徒马德才,大司卫姚得胜,大司疆段成功,大司征马德仲,大司防李文学,大司农刘应贵,大司定马德善,大司骑马国玺。记载稍有不同。

严加惩办,理宜不赦。^①

又传檄三迤,宣布东征的原因、目的、任务和有关政策,号召回汉各族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清朝统治者,文云:

总统兵马大元帅杜,为兴师五路,收复全滇,除残暴以安良善事:

窃思滇南一省,回汉夷三教杂处,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尝有畛域之分?慨自满清僭位以来,虐我人民二百年余于兹矣。妖官偏袒为计,石羊起衅,池鱼皆殃;强者逞鸱张之威,弱者无鼠窜之地。尔时百姓危若倒悬,可恶妖官犹安然高枕,置苍生于不问,弃黎庶其如遗。甚至汉强则助汉以杀回,回强则助回以杀汉,民不聊生,人心思乱。

本帅目击时艰,念关民瘼,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伤,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伤。爰举义师,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至大事之图成,惟天命之是听。无知妖官穷谋诡计,倒行逆施,杀协镇者封以协镇,杀都邮者授以都邮。高明退身,庸愚堕计。始也助汉以杀回,今也助回以杀汉;继也助汉以杀汉,今则助回以杀回。鸿沟之血未干,乌合之师突至;妄思螳臂以当车,奚啻鸡卵之击石。

今者小计略施,月奏三捷;雄师半出,功收数城。然妖官未除,祸根犹在;全滇不取,亿兆难安。况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用是师兴虎队,将选龙骧,粮运千仓,饷筹百万,枪炮在其前,弓弩列于后,长矛伏中,短刀相接,分五路以并进,效一怒而安民。剑戟横空,胜气腾云,千里旌旗蔽日,威镇雷动九天。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① 杜文秀《誓师文》,见《回民起义》第二册第127页。

凡尔城乡绅耆,远近士民,达务知时,不乏俊杰,转祸为福,定有同心。或率众而来归,或开门而效顺,定当量才而录用,不别户而分门。自此烽烟永靖,同登衽席之安;如其天命有归,共成王霸之业,岂不乐哉!岂不快哉!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机,行将后悔。况天命人心,去之久矣,纵背城航海,亦奚以为!檄文到日,凛遵勿违!此檄。^①

五路大军出动,东北路由大司衡杨荣等指挥,出武定、禄劝,攻占富民,再东取嵩明、寻甸;东路由大司政刘诚、大司隶刘纲、大司勋米映山等指挥,沿迤西大道东进,经楚雄、禄丰,进攻安宁;东南路由大司戎马国春指挥,由禄丰下易门,占领昆阳、新兴,然后转战晋宁、呈贡;北路自鹤庆、丽江攻取永北;南路由顺宁、云州、缅宁攻取景东、镇远和威远等地。前三路为主力,后二路旨在防御清军两翼攻击。大军东下至楚雄,守将李惟述不能支,遂得楚雄。马如龙遣夏毓秀抵御于禄丰,未及战,退守安宁,再退守梁家河。七年正月,大军已迫近昆明近郊。二月,清军中回族将领杨振鹏、田余庆、杨先芝向义军投诚。至此,昆明西北南三面,悉在重围之中。大司政刘诚扎潘家湾、梨烟村、夏家窑、马街、渔村。大司平马兴堂扎柴村、麻园、黄土坡。大司勋米映山扎大小普吉、马村、小坝。大司疆段成功扎五华寺、西岳庙、土坝河。大司藩安文义、大司戎马国春扎万寿宫。大司卫姚得胜由呈贡据澄江。大司寇李芳园则奉蔡廷栋,由富民过寻甸,破嵩明,击杨林。清军自杨林退驻大板桥、小偏桥一带。清军仅余东路由昆明通宜良的粮道,“尚可绕越行走”。马如龙据守昆明,所步兵才一万五千人,署总兵合安国、守备马云龙、军功马学林等回族将领谋以献城。事泄,被马如龙诛杀。

^① 杜文秀《兴师檄文》,见《回民起义》第二册第131—132页。

清廷任命刘岳昭为云贵总督,岑毓英为云南巡抚。岳昭驻曲靖以图寻甸。毓英西上赴援,取道宜良,攻陷小板桥、金马寺、古亭庵,进至大树营,得与如龙会合,打通了滇南与省城交通线。此时清军势稍振,连夺呈贡、武定、元谋、禄劝、罗次、晋宁等地。毓英四出督战,义军激烈战斗。澄江与杨林两地的争夺尤为剧烈。双方死亡惨重。杨林之战,义军枪弹伤毓英鼻部,几贯头脑。

八年(1869年),清军调集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湘、川、黔、粤等省大军入滇,攻陷杨林后进攻嵩明。此处为义军东路指挥部,由大司寇李芳园、大司平马兴堂率二万精锐驻守。清军长期围困,城内粮械俱绝。李芳园、马兴堂被俘。寻甸陷于孤立无援,守将马天顺亦降。东征大军总指挥大司戎马国春闻讯后病逝于昆明城郊万寿宫。使东征大军由优势转为劣势。

此时,大司疆段成功与马如龙战于五华寺,如龙腹部中炮伤。成功粮尽,求于廷栋。廷栋与成功素有隙,竟拒不与。复贷于马清,亦不得。成功遂与如龙约降。八月十三日,成功率所部五千人归清。所部有不愿降者,仍鏖战至两日,始定。清军以法国开花大炮轰击,起义大军在昆明近郊二百座营垒全线瓦解。蔡廷栋诈降,逸归。自此各大司军心动摇,或败或退,义军最后在土堆地方激战两月余,十一月十六日土堆失守,义军将士壮烈牺牲。文秀多年培养的精锐,丧失几尽了。义军历时一年十个月之久的围攻昆明战役,以失败告终。

大理保卫战

嗣后,清军得以从容整理昆明附近州县,并分遣杨玉科、李惟述等率师西进。大理方面由进攻转为防御。双方互有胜负。大司衡杨荣调度军事,荣骁勇有余,智谋不足,滇西军事部署大不如清,以致清军节节西上。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清军迫近大理。

杨荣迎战,时败清军。董飞龙、蔡廷栋守下关,虽居重围,无怯色。杨玉科行反奸计,阴说董飞龙降。飞龙焚屋庐,易红旗,清军遂入下关。上关守将马国玺见下关火起,亦纵火逃。两关俱失,大理的屏障尽撤,战事进入城郊。时杨荣以出卖杜文秀与大理政权为条件,暗中投降了杨玉科。杜文秀亲冒枪矢,指挥作战。十一月大理环城各垒尽失,外援已绝。然城内皆百战余生,誓死抵抗。清军用开花洋炮四面环攻,并挖地道穿城下点燃火药攻之,东城墙被炸毁十余丈。义军死守,清军仍不能进。清军以二十七门大炮排列城墙,向下轰击,义军退守帅府和几座清真寺内。

二十五日,文秀召开大理政权最高军政会议。文秀主战,杨荣主降,争论激烈。杨荣说:“今兵临城下,内缺粮草,外无救兵,如背城决一死战,吾所愿也。我毙清军多矣,我虽死,亦得所偿矣。惟兵败之后,玉石不分,鸡犬不留,恐吾人死后,游坟诵经之人亦不可得耳。”他要杜文秀“舍一人之身,救数万生灵”。文秀气愤地说:“汝言是也。吾愿舍我一身,救阖城百姓。我庇此俦十八年矣,但愿汝能庇之十八日也。今我当全体同仁,以阖城百姓交于汝,何如?”荣说:“卑职愿负此任。”此时文秀的子女已被骗作人质,帅印也被窃走献给杨玉科。会后,文秀家属、亲友、佣人共百余人,全部服毒自尽。文秀亲率将士数百人出帅府,配合义军,向清军猛攻,奋力血战,直至二十六日天明,撤回帅府。

文秀血战归来,按回民习惯换水(沐浴净身),请河州老巴巴念“讨白”(忏悔词),然后升帅座,再次嘱咐杨荣说:“我今以阖城百姓交汝矣。”遂升黄呢大轿,有经生二人随从。文武分班跪送,哭泣不能成声。大理百姓堵塞街头哭送,他们都想最后再看一眼给他们带来十多年安定生活的杜大元帅。文秀不时掀起轿帘向沿途百姓点头致意。轿出大理北门,文秀取出胸前预藏的孔雀胆毒药,服

之。转至萝卜营东,清军遣四轿夫来接,至五里桥下与杨玉科相会。文秀说:“杨大人本帅凑汝成功。不干城内百姓之事,汝须另眼相看。”玉科说:“此事皆因受逼而起,奏明皇上,终须分辨。”文秀说:“胜者为王,败者休。尚何言也。”言毕,文秀头渐垂于胸,孔雀胆毒发作,文秀气绝。时在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午时,是年文秀四十九岁。杨玉科取其首级连同帅印、衣冠,派人送省。当地回民将其遗体葬于下兑村。

文秀有三子三女,长子宗杨、次庚杨、次成杨并次女,均于大理城破后被岑毓英处死。长女凤杨,任东征昆明的监军,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于嵩明被俘,被马如龙杀害于昆明白鹤桥。幼女于襁褓之中被保姆从大理带出,逃至云州,得以长大成人。

十二月,岑毓英抵大理。初九日,杨荣等已降的大理政权高级军政人员尽被杀。十一日,大理城内外回民被驱赶至洛阳村,以大军围困,一声炮响,开始屠杀,老弱男妇无幸免者,持续三天两夜,数万人倒在清军屠刀之下,洱水为赤。事后清军斩人耳人手,装满数十大筐,驰送昆明,炫耀战功。

杜文秀是一位站在中国近代史前沿的历史人物,他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反对外国侵略。他胸怀广大,深明大义。他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前无古人的广大胸襟,他实践了以回汉联合为基础的各民族人民的联合反清,这在中国农民运动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上,都是空前的创举,做出了前人所没有做出过的伟大事业。大理政权的一些政策措施,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实际利惠,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被时人和后来者称赞。今天云南各族人民说起杜文秀,都怀着崇敬的心情,称他为杜大元帅。大理政权失败了,但四十年后清朝终于灭亡了,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前进中,大理政权作出了贡献;杜文秀以身殉

李国纶

李国纶是大理政权中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官至大司空,又是大理陷落后坚守腾越的领导人。国纶字金章,永昌施甸人。其为人团结彝、汉,轻侠仗义,富资望,有权略。用兵以攻抚兼施为策。

同治五年(1866年),国纶奉杜文秀命,率兵万余人镇腾越。抵腾日,首先惩罚了犯法的回族兵弁。“正人先正己”,回民犯法者,必按法惩治,为各族人民作出了表率。另外,减轻赋税,酌定应需夫役数目,每年征粮一次,其余大小苛敛,一律豁免。事权统一,军令整肃。招民垦荒芜,缉拿盗匪。“腾民陷水火久矣,一旦得此,如庆更生”。

腾城外,如猛连、密果、大蒲窝等地,形势险要,皆为清军百战固守之区。国纶兵一出,如疾风扫叶,摧陷无遗。明月、荷花池等地清军团练负隅顽抗,国纶遣绅士说降,誓不杀一人,终使团练感服来降。国纶乘胜占领了河西、大平子、营盘山、蛮东大营等地。

同治七年(1868年),李国纶在腾越与英国斯莱顿上尉为首的英缅政府代表团商谈滇缅通商事,国纶志节凛然,不与签订任何丧权辱国之条约。

同治十一年(1872年),大理失陷后,岑毓英派李惟述来攻,被击退。十二年四月,又派徐联魁率部增援。徐挖地道,轰崩城墙。李国纶不能再守,缢死妻妾子女十余人。其妻妾牵国纶衣,哭泣诀别,国纶亦泣,说:“谁教汝愿嫁好男儿作丈夫也?”遂率精锐千余人,乘夜突围,据乌索继续抗清。岑毓英又派徐联魁、蒋宗汉前来围攻。连攻数月,不能克,清军死伤数千人。同治十三年春,清军调集枪炮四面急攻,国纶再突围至云峰山,清军追剿,并断国纶汲

道。国纶率三十余人,乘夜缒岩突围,带病潜伏黑山门,亟图再起。清军悬重金搜索,被叛徒告密,不屈死。时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四日,上距大理城破已二年了。后人评论说:“国纶忠于文秀,守穷城五载,大小经百余战,据乌索以后,穷促益甚,志节犹不衰。”当地汉族人民还在昭忠祠供奉李国纶的牌位,表达了一种崇敬和怀念的感情。

杜文秀自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攻占大理,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一月大理陷落,历时十七年而不足。大理陷落后,李国纶据腾越继续抗清,直至十三年五月退据云峰山,前后十八年。

〔杨怀中〕

苏天福

苏天福(?—1862年),清代捻军起义杰出首领,又作苏添福,绰号苏老天。豫皖一代旧俗,在姓与名之间加以“老”字以示尊敬,非深仁厚德者难享此殊荣。河南永城苏平楼(一作苏家寨)人。其生年不详。入捻前曾当过永城寺儿集清真寺里的代刀师傅,正式职业是农民兼小贩,“种过地,贩过羊,开过粉坊,卖过油”(江地《捻军史调查与研究》),在永城县城内还开设了一家苏家茶馆,经营茶叶、茶水业务,兼营粉坊,制售粉条。同时到山东、江苏一带贩运私盐,走南闯北,结交江湖豪杰。咸丰元年(1851年),在贩盐途中遭官军追杀,被捻军初期领袖张乐行相救脱身,为后来入捻埋下了伏笔。

咸丰二年(1852年),张乐行族子张扬率捻党十余人到永城抢掠地主绵羊百余只,被地主团练逮捕入狱,张乐行闻讯后率捻军“万余人围永城,劫扬等十八人出狱,众依乐行自固,乐行声势始大”(事见《涡阳县志》),此次劫狱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天福的内应,因为这时他与永城的汉族铁匠“老锤手”冯震共同领导了城内的回汉商人联合罢市。清道咸以来,永城及附近地区连年水旱,地方官或为粉饰冒功,或为中饱私囊,仍旧催捐加赋,激起民怨。负责剿捻事宜的清吏周天爵曾向朝廷报告:捻军之起,“州县官无一不是罪人”(《周文忠公尺牍》,转引自《捻军》)。这次联合罢市,使官府免税一年,客观上使永城清军顾此失彼,对张乐行的劫狱是一个有力的支持,所以事后永城官府和地主迁怒于苏天福,要抓他治罪。苏天福避难到亳州,托庇于已受朝廷招抚的张乐行门下,永城地主武装便以搜捕苏天福为名,不断到亳州抢掠寻衅,毫

州地主团练也不甘示弱,以牙还牙,终于引发了“苏天福事件”。

以永城劫狱事件为核心的“苏天福事件”震动朝野,连远在北京的咸丰皇帝也从事件中看出了张乐行假抚真反的用意,在御旨中指出:“张落刑以保守雒河集为名,实则狼子野心,难保其不暗结土匪”(《钦定剿平捻匪方略》),命令河南巡抚英桂率兵相机将张乐行和苏天福二人一并剿捕。在安徽则命令袁甲三逼张乐行逮捕苏天福以表明受抚真心,暗中派兵准备将二人一网打尽。张、苏二人及时识破清政府诡计,与龚得树等人一道,在亳州雒河集(今属涡阳)共同举起了捻军起义的大旗。

苏天福参加捻军起义后,在豫皖一带南征北战,威震敌胆。到咸丰五年,初期捻军逐渐形成了以张、苏、龚、王、刘为首的五部,是年八月,各路捻军齐集雒河集,议定捻军采用黄、黑、蓝、白、红五旗军事编制,张乐行为盟主兼黄旗捻军总目,苏天福为黑旗捻军总目,称“顺天王”;接着,张乐行、苏天福部捻军,打败清河南道员张维翰部,攻占永城会亭驿和夏邑,东出砀山,西扑商丘马牧集,南围亳州,下蒙城,兵临鹿邑及颍上城下,声势大振;年底,在麻种集击溃清专司剿捻事宜的提督武隆阿;咸丰六年初,捻军在张乐行、苏天福等人率领下,兵分五路进攻河南,围永城,克夏邑,活捉夏邑知县,连败清总兵丘联恩和崇安部,困清河南巡抚英桂于归德城内,所向披靡;咸丰七年三月,捻军与太平军李秀成、陈玉成部在霍丘会师,蓄发受印,接受太平天国封号和领导,洪秀全封张乐行为征北主将、鼎天侯,封苏天福为立天侯;此后,苏天福与李秀成部配合,纵横皖北,清兵望风溃逃。

捻军的节节胜利和苏天福的赫赫战绩,引起了永城地主阶级的极端仇视和恐慌,在苏天福率部参加定远战役最为紧张的关头,地主团练用极其卑劣的手法,假装换粉条冲进他全家居住的苏家

茶馆，暗下毒手，杀害了他在永城的母亲、儿子、儿媳和孙子一家老小。民间流传的一首捻军歌谣中唱到：“八月十五吃粉条，苏天福把泪掉。门口杀孩子，客屋嗷嗷叫；男杀男，女杀女，一家都杀了。”（《捻军歌谣》，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苏姓本是永城望族，为了避免清兵株连九族，举族一两万人忿而入捻，更加坚定了苏天福反清的意志和信念，也大大增强了他领导的黑旗捻军的实力。咸丰八年十一月，苏天福部与太平军陈玉成部配合，共同取得三河大捷，击毙清军悍将、浙江布政使李续宾及同知曾国华（曾国藩胞弟）；次年七月攻占定远县城，安徽巡抚翁同书退保寿州（今安徽寿县），取得定远战役的决定性胜利，用实际行动对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做出了响亮的回答。

咸丰九年以后，苏天福部黑旗捻军以定远为中心配合太平军作战，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是，随着太平军在各个主要战场的失利，斗争形势逐步发生了逆转：咸丰十年的桐城卦车河战役，捻军元气大伤；次年五月，捻军主力试图从定远渡淮河北上被阻，撤回定远；年底，张乐行、苏天福率定远捻军悉部再度北撤，一路损兵折将，经寿州返回颍上；同治元年（1862 年）五月，太平军皖北重地庐州（今合肥）失陷，英王陈玉成随后遇害，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总督豫鲁皖三省军务，集合重兵围攻皖北捻军，局势更对捻军不利。同年三月，张乐行、苏天福率二十余万捻军主力在雒河集与僧格林沁展开战略决战，鏖兵数日，因清军调来洋枪洋炮等先进武器，捻军伤亡惨重，陷入清军重围，多次突围均告失败。苏天福在一次率众突围时遭清军伏击，不幸因叛徒出卖被押送僧格林沁大营，他严辞拒绝僧格林沁的威逼利诱，宁死不屈，最后被凌迟处死。同时遇难的还有苏豹等十几名永城苏姓家族出身的捻军大小将领。

（许宪隆）

马如龙

马如龙(1832—1891年),乳名阿五,原名席珍(或品珍),字云峰,又字现彩(或献),讳如龙。建水回龙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32年),死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享年五十九岁。马如龙自称出身忠良世家,世沐皇恩,先世江南人,始祖马坚公明时入滇,官临安(建水)卫指挥。其叔马济美为江西九江镇总兵。马如龙青年时身体魁梧,好武艺,乡试武庠第一,授予武生。

清咸丰元年(1856年)临安西庄汉族地霸潘德等,带领厂客(双柏县石羊厂)团练入临安县城搜杀回族,城内外回族老幼均被杀害,幸免逃脱者都奔回回龙寨。回龙回族筑垒自保,马如龙被推为首领。清总兵伊昌阿命守备沈裕后攻回龙,马如龙率众奋起反抗,拼死一战,击毙厂客头目林五代,杀死沈裕后等。马如龙领导下的回龙义军两败清军,击溃汉团,决定联合建水馆驿以马敏功为首的回民义军,成为滇南一支强大的反清势力。在清廷“灭回”流单后,各地大肆屠杀回民,蒙自、沙甸、开远告急,马敏功派马如龙率队往救,与当地起义回众合力抵抗,声势浩大,清官兵屡败。接着又往救盘溪,盘溪攻下后,利用地势险要,西有高山峻岭,东有盘江,建为另一回民起义军基地。后来回众以马如龙英勇善战,战功卓著,被推为首领。回民起义军在“老巴巴”马德新威望号召下,团结马如龙、马敏功、徐元吉、马凌汉各处回民起义领袖,形成滇南一支强大的回民起义军。清咸丰七年(1857年)春,马德新与马如龙、徐元吉一道,率领滇南回民起义军进攻昆明,一路几乎没有遇到大的抵抗,五月二十一日滇南起义军进围昆明,与守城清军开战,南城外六街三市到处起火。围城三月城内无食,连五华山树

皮、翠湖浮萍、荷叶都被吃尽，督抚及团练慌作一团，束手无策。总督恒春夫妇急得上吊自杀，但在马德新、马如龙“只欲报仇，不敢为逆”的主张下，与新上任的总督吴振斌达成和解协议，滇南回民义军围城宣告结束。清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提督褚克昌自镇南（现南华）向大理起义政权发动进攻，清军此次比第二次“西征”规模大、清军攻陷姚州（现姚安）大姚、云南（现祥云）县后，又进攻红岩、弥渡、宾川，为击败清军进攻，杜文秀不得已而求救滇东南起义军，于是马德新致函马如龙说：“东西回本是一家，宜互相救援，以成犄角，若迤西回军为官兵所灭，则迤东南之回岂能独存。”要他赴援滇西，马如龙同意并亲自率滇东南回军赴滇西救援。四月马如龙率部自建水曲江出发，取道通海，嶲峨（今峨山），进入安南州（今双柏）三家厂。时宜良汉族诸生李芳园亦率部由安宁到安南州与马如龙联合攻战楚雄府城，截断清军后路，使其陷于两面受敌和进退维谷的困境，注定了褚克昌“西征”必将失败的命运，紧接着马如龙攻克安南、定远（今牟定）等州县。大理起义军在扬威大都督蔡发春率部二万余，自顺宁（今凤庆）、云州（今云县）东下，配合杨德明等部于五六月间收复红岩、弥渡和云南县等战略要地，七月蔡发春在虎应龙、保文明的协同下，攻克褚克昌的宾川大营，取得了全歼清诸路军的辉煌胜利，宣告了清军第二次“西征”的彻底失败，褚克昌本人也战败身亡。起义军滇西大捷后，马如龙将楚雄、大姚、广通和白盐井交给杜军接管，他则引军东归。杜文秀起义军在滇东南起义军马如龙的支援下取得的这次重大胜利，给予了清王朝在云南的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并使大理政权东部疆域得以扩张至楚雄一线。由于马如龙领导起义的目的“只欲报仇，不敢为逆”，因此在咸丰七年（1857年）、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在协同杜军粉碎清军西征后，又第二次与清招抚协议，两次招抚因清总督无

诚意,才导致马如龙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第三次攻省,总督徐之铭等官绅只得放弃进攻,进行招抚。在清政府的收买政策下,马如龙认为今“朝廷降旨招抚,官从和办,当知顺逆,是以从和办理”不失忠良后代,所以在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马如龙等人放下武器,退还城池,遣散所属各地抗清回民和疏通官道为代价,换取了官阶,马如龙被委任为临元总兵,杨振鹏等人各授以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的官职。其后马如龙受云贵总督徐之铭、潘铎指使充当“以回治回”的先锋,曾多次写信和派杨振鹏、田庆余、马负图等人去大理说降杜文秀,以高官厚禄引诱。在同治元年九月马如龙出省城到建水署元新营对参将梁士美进行报复时,同治二年一月发生武定参将马荣率军进昆明,马荣指使部将杀死总督潘铎,马德新被迫出任云贵总督的“灯霄之变”,马如龙在建水闻变,迅速回师省城,将马荣逐走,马如龙由于复城有功,清廷授予云南提督,给效勇巴图鲁称号,从此他更死心塌地报效清廷。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进剿滇东起义军马联升、马荣部。马如龙率军包围寻甸、曲靖,诱杀了起义军首领马联升、马荣,夺取了寻甸、曲靖。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以马如龙为首三路“西征”清军,由于马如龙和岑毓英不和,力量分散,进军无进展。大理杜文秀起义政权由于统一了滇西,恢复了经济,有较强的实力,于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多路进军东征,扫清滇西、进军滇东南并包围了省城昆明,劝说马如龙归顺,马如龙反而决心“城存则存,城亡则亡”,“首可断,志不可断”,在获悉守城部将图谋与杜文秀义军内应,则将副将合国安、参将马学林、守备马云龙等捕杀。杜文秀起义军东征,由于各方面原因失败了。其中与马如龙策反、奋战有关,他卖命效忠清廷,得以把滇西起义军镇压下去。因此在清廷为其立传《原任湖南提督马云峰传》中,歌颂说:“(同治)七年杜逆其婿蔡扬威、督伪大司十八

人,逆党三十余万进犯省城。公与岑襄勤誓同生死,分班战守。其间大小数百战,无不亲临前敌,躬冒矢石。”“报捷到京,奉旨奖励,并赏给头品顶戴赐上方珍物。”“同治十三年到京陛见,奉旨调湖南提督,值慈禧太后寿辰,命赴慈宁宫听戏三日,钦赐回教肴馔,并玉如意、衣料、香炉等物,前后召见四次,复命恭亲王亲验伤痕,写成御览。”“清光绪四年,因旧伤举发……十七年正月歿于蜀。”“是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谕:马如龙着照提督军营立功后病故例议恤,于云南省省城建立专祠。生平战绩令付国史馆立传,以嘉忠荃。”马如龙从起义军领袖变成清廷“以回治回”的工具,忠实镇压回民起义而一再受到清廷嘉奖。

[马维良]

四 白彦虎^①

白彦虎(1841—1882年),陕西泾阳人,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自卫抗清斗争中最坚决的首领。少年时念经、习武,一度从军入伍。

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陕西回民自卫抗清起义爆发,白彦虎是西安府一带起义首领之一。面对团练武装的疯狂烧杀,白彦虎及其他回民武装,对团练和清军发动坚决反击,多次在西安外围击败清军马德昭部。九月,在咸阳苏家沟与马生彦等联合抗击清钦差大臣胜保所部数万人的进攻,取得重大战果。

同治二年(1863年),钦差大臣多隆阿来陕,佯装与回民和谈,却乘回民不备,猛攻同州府各回民营垒。九月初,进攻西安府属之苏家沟等处,白彦虎等部回民军经过力战之后,向西撤往凤翔一带。不久,蓝大顺部农民军在盩厔与多隆阿部激战。白彦虎、马生彦曾主动配合,堵截清军援兵。

同治三年(1864年)初,白彦虎等各路回民武装被迫撤离陕西,在甘肃庆阳府宁州属的董志塬扎聚三年之久。在这里,陕西回民武装组成十八大营,其首领均称元帅,白彦虎为元帅之一。这期间,西捻军张宗禹部进入陕西,在董志塬的陕西回民军纷纷南下,与捻军共同作战,给清军以重创。白彦虎曾率部袭击阿拉善旗定

^① 本文资料根据马长寿、冯增烈等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纪录》(未刊本)中的“长安县”;《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三〇、卷五〇,书牍卷一五至卷二〇;《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二九三、卷三〇一;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一、卷二四;王安定《湘军志》、《平回志》,见《回民起义》第三册;《平定关陇纪略》,见《回民起义》第四册;《豫师青海奏稿》;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卷六;《歌唱英雄白彦虎》,见《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

远营。

同治七年(1868年)十一月,陕甘总督左宗棠到陕西,第二年四月进驻泾州。董志塬陕回武装抗击清军失利,十八大营合并为四大营,白彦虎为元帅之一。以兵力护送家眷辎重,分路退往同心城、宁安堡(今宁夏中宁县)、金积堡一线。当刘松山率清军围攻金积堡的时候,白彦虎等部陕回武装曾袭击隆德、静宁、会宁等处,以牵制清军和切断清军粮运。九月,白彦虎与杨文治等部在固原黑城子、三营一带与清军作战,不久,在盐茶厅(今宁夏海原)西四十里之西安堡,与清军黄鼎、马德顺部激战,阵毙总兵官、记名提督马德顺。白彦虎又与崔伟、马生彦等经会宁、安定,进至狄道(今临洮)与河州回民武装会合。白彦虎等陕回武装曾多次联络河州回族、东乡族武装驰援金积堡,每次增援均为清军所阻。当金积堡战事结束,清军进围河州的时候,白彦虎又率部撤往西宁。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白彦虎驻扎西宁小南川汉堡。第二年六月,以刘锦棠为主帅的清军进抵碾伯(今乐都),准备进犯西宁。八月,马桂源、马本源与白彦虎等陕回首领密商联合抗清。碾伯到西宁,两山对峙,湟水中流,大峡口至小峡口之间数十里,高峰危耸,南北沟岔纷歧,以白彦虎为首的陕西回族同当地回族撒拉族联军,利用有利的地形,为了民族生存,凭险拼死抵御。由同治十一年九月下旬开始到十一月下旬,前后两个月,大小五十余战,白彦虎胸部中枪伤。清军攻占西宁后,禹得彦、崔伟、毕大才等支虎口余生的陕回男妇老幼约二万人,被押赴平凉、秦安、清水等地安插。

白彦虎深知左宗棠的残忍刁诈,誓不投降,率领眷属及部众约二千余人,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二月下旬由大通经永安冒着冰雪严寒向河西奔驰。三月初,白彦虎所部历尽艰辛,奇迹般地通过

地势狭险仅容单车又有五营清军防守的扁都口,经山丹至甘州(张掖)城外之梁家堡。清军杨世俊、杨占鳌等部分道追堵。三月中至四月中,白彦虎率部众进至高台。肃州回民曾多次出城配合白彦虎部迎击清军。白彦虎率部与清军周旋于高台属之毛目、双树屯,金塔属之牛头湾以及肃州郊外的野麻湾、塔尔湾。白彦虎善于流动作战,不愿进驻肃州,困守孤城。他决定长途跋涉远走新疆,率所部经文殊山进军嘉峪关外的大罩滩、黑山峡,由敦煌奔向哈密。

在敦煌期间,白彦虎部纪律严明,不骚扰百姓,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出关前筹措粮秣,向民间借贷,民团鸣鼓而攻。部下请求反击,白彦虎阻止道:“吾与官军战,不与百姓决雌雄。”

同治十二年(1873年)夏天,白彦虎率部在哈密联络当地维吾尔人共同抵御清兵的追击。不久即率部进军北疆。当时北疆的形势,据清哈密帮办大臣景廉所奏,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古牧地等处,“现为安夷、回逆分踞”,他们之间是忽离忽合的关系。景廉主张对安集延和回民宜分而不宜合,否则迫使回民投顺安集延,“为官兵多树一敌”,甚不可取。乌鲁木齐民团首领也是这样主张。而左宗棠、刘锦棠依仗其优势兵力却采取回民与安集延一概剿洗的错误方法。白彦虎到北疆是投奔这里的回民自卫武装的,左宗棠必欲杀害白彦虎,“纵令投降,亦必杀之”。白彦虎已断绝了向清廷投诚求生之路。北疆以妥明及马明为首的抵抗阿古柏的回民武装,此时已被扑灭。在清军追击面前,白彦虎被迫采取了联络阿古柏以抵御清军追击的策略。他将眷属安置在玛纳斯,率部在红庙子、古牧地及玛纳斯一带与清军作战。他不敢踞城死守,无心恋战,且战且走。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吐鲁番战役中,马人得率众向清军投诚。白彦虎已先期避往托克逊,与阿古柏会见。

对于白彦虎作战中的规律性,左宗棠掌握得很清楚,他认为白

彦虎“自陕至甘，未尝占据城池，遇劲军未尝恋战，有时见劲军蹶踪而至，给诸逆目断后，自挈党伙先逃，所犯之处未尝久留，且不踞城池，专为凯便窜逸之计。观其过肃城不赴马四之招，现踞红庙子，不踞乌垣，亦可概见”。又说白彦虎“智长于用伏，官军计划稍疏，辄为所陷”。白彦虎与阿古柏联合之后，左宗棠认为白彦虎“自知势力不及安集延，思借为声援以自固，凡帕夏所欲，不敢少违”。并“与土回坚拒官军，自观成败，伺间脱走”。白彦虎由陕甘到新疆十多年的战斗经历也正是这样。

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刘锦棠连克达坂城、吐鲁番和托克逊，进展迅速。白彦虎已经作好退往南疆的准备，家眷辎重已经先行。达坂城之役，阿古柏的亲信大通哈(大总管)和几个胖色提(营官)被清军俘虏，他们都为阿古柏向清军乞款，表示愿意缚送白彦虎，献出南八城以自赎。阿古柏制服不了白彦虎，他与白彦虎之间的矛盾却激化了。光绪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阿古柏被杀。《阿古柏伯克传》作者英国人包罗杰说：“至于阿古柏伯克会遭到凶杀，如果我们考虑到在他周围的那些像东干(指回回)首领之类的可疑部属，就不足为奇了。”

形势急转直下，阿古柏次子海古拉携阿古柏尸体西窜，途中被其胞兄伯克胡里谋杀。白彦虎在刘锦棠清军追击下，由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撤向库尔勒。沿途抢收秋粮，实行坚壁清野，为了阻挡清军追击，下令掘开开都河，使喀喇沙尔至库尔勒之间漫流泛滥，数十里一片泽国，起到阻滞清军进攻的作用。当年十月，刘锦棠所部清军追至库尔勒，白彦虎大部人马早已西进，经库车，拜城逃往乌什。伯克胡里分道逃往叶尔羌。清军舍伯克胡里，专追白彦虎。白彦虎由乌什向西南进军喀什噶尔，并已先期遣人用金银货宝向俄国“买路求生”。十二月十七日，清军攻陷喀什噶尔。

白彦虎向北,经过阿特巴什的纳林河桥逃入俄境。

白彦虎进入俄境以后,男妇老幼居住在吉尔吉斯境内的托克玛克地方。由于白彦虎的声望,他们受到当地吉尔吉斯、哈萨克等族穆斯林的敬仰和关照。在俄居留没有几年,白彦虎即患重病,临终前仍念念不忘中原故园。光绪八年(1882年)八月,白彦虎病故,终年四十一岁。^①

白彦虎带去的虎口余生的回族男女老幼,有陕西籍的,也有甘肃籍的,经过百余年的生息繁衍,已经发展成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一个有八万人的少数民族。他们被称作东干人、东干族,他们也自称回回、回族。老年人仍会说十九世纪晚期的陕甘回回方言。他们知道自己的根在中国,对中国回回民族怀有认同感。

[马寿千]

^① 又据东干族学者苏三洛说:1882年7月26日东干领袖白彦虎因患肺炎在比什凯克病故,终年五十余岁。待考。

马化龙^①

马化龙(1810—1871年)是我国伊斯兰教哲赫林耶教派第五代教祖,以总大阿訇的身份行使教权,曾在官府捐纳了一个千总的头衔。他在西北回民和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是一位德高望重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

马化龙世居宁夏灵州金积堡,幼年受教于甘肃伏羌县南关马二阿訇及山东金爷的门下,攻读阿拉伯文。长大后由其父哲赫林耶第四代教祖马以德为他“穿衣”,充当阿訇。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世袭为哲赫林耶教派第五代教祖。马化龙在自卫抗清过程中曾接受清宁夏将军穆图善的招抚,并赐名马朝清。后来马化龙给左宗棠多次呈递禀帖,也自称“灵州金积堡卫千总马朝清”。同治十年(1871年)抗清失败,正月十三日马化龙被凌迟处死,教下群众为怀念他的悲壮殉难,尊他为“十三太爷”,道号尊称赛义德·束海达依,意为殉道者的领袖。

哲赫林耶教派,自乾隆年间马明心创立,到马化龙期间,前后不到百年,教派势力有了很大发展,其活动范围之广,教徒之众,都超过了前几代,以宁夏灵州为中心,在甘肃、新疆乃至黑龙江、云南等地都有教徒分布。远近教徒的束脩馈赠源源而来,加之祖孙三代世袭教主,财富积累日益雄厚。马化龙扩大了秦渠、汉渠之间大

^① 本文资料根据《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平定关陇纪略》卷九,见《回民起义》第四册;《平回志》卷三、卷五,见《回民起义》第三册;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二〇、卷二二;《甘肃文史资料》第一辑《清同治甘肃回变中的马化龙》;宁夏将军穆图善奏折,见国家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民族类;《清文宗实录》卷一六九;《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三八、卷五三。

片膏腴土地,由教下群众为他耕种。马化龙派他的儿子马耀邦往来北京、天津、包头、归化(今呼和浩特)及江南各地,“开设店铺,分布伙友,领本营运,以探听衙门消息,交结回民洋商”。马化龙成了宁夏地区富甲一方的大地主。

同治元年(1862年)春,陕西爆发了大规模回民自卫抗清斗争,八月,宁夏府平远所(豫旺城,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回民马兆元领导回、汉人民举起反清义旗。开始,马化龙拒绝参加马兆元的反清行动。后来,为群众性的抗清形势所迫,马化龙被拥戴为自卫抗清领袖。为此,马化龙后来一再向左宗棠辩解,说他的抗清是迫于“狂飙骤至”,“被胁勉从”。《甘宁青史略》一书记录了马化龙当时的一段自述:“吾本念经人,遭逢乱世,为众推戴,不得不维持桑梓,苟延残喘。俟东南军务平定,甘肃重见天日,必有贤明长官主持西北大局,届时吾即投诚,当一个太平百姓,于愿足矣。”这段自述和马化龙在抗清斗争中的表现是一致的。由于斗争只是出于自卫,当清廷用剿的时候,为了维持桑梓,马化龙出面送银送面,递呈乞抚,要求停止进军。遭到拒绝,就不得不“互相保卫,竭力守御”。如果清廷用抚,即马化龙幻想的穆图善那样的“贤明长官主持西北大局”,马化龙可以出面接受抚局,这也是为了维持桑梓。而只有维持桑梓,保境安民,当一个太平百姓,他才可以维持在回民中的地位。总之,清廷方面对宁夏回民时剿时抚,即兵力雄厚时用剿,无兵可调时用抚。以马化龙为首的宁夏回民则是时战时降,战是为了维持桑梓而自卫抗击,降也是为了维持桑梓而忍辱求生。马化龙在自卫抗击时,并没有放弃求抚的幻想,而他在抚局期间又没有完全丧失对清军可能进攻的警惕。

事实正是这样,同治四年六月,清军雷正綰部会合曹克忠部向金积堡一路杀来,尽管马化龙一再派人送银送面,并递呈求抚,清

军根本不予理睬而一味进扑,在金积堡附近的强家沙窝,马化龙和陕西的回民马步劲旅给予敌人以猛烈的狙击。清军腹背受击,狼狽逃窜,弁勇伤亡二千余人,军装、火药、器械和马匹都成了马化龙的回民军的战利品,紧接着,雷正綰部全军溃变,陕甘同时震动。这是马化龙求抚不成而自卫反击的一个典型战例。

同治八年八月,刘松山奉左宗棠之命率大军向金积堡合围。在清军环逼下,马化龙最初对抚局仍存幻想,一再向穆图善、左宗棠以及刘松山提出维持抚局,并主动向清军送银送面送地图。刘松山等部清军在“痛剿以慑服其心”的思想支配下,凭借着优势兵力,依仗外国列强提供的贷款和新式枪炮,对金积五百多座回民堡寨进行野蛮的剿杀。以马化龙为首领的金积各堡寨的回民和留在那里的陕西回民联合一道,凭借着纵横的沟渠和坚厚的碉墙,发扬回族人民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逐堡逐寨、寸土必争地同来犯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使得清军每攻占一座堡寨,都要付出巨大的伤亡。同治九年正月,在马五寨的争夺战中,骄横不可一世的清军统帅翼长刘松山被寨中回民击毙,清军粮运被截断,各路同时溃退,左宗棠受到朝廷斥责,叫他扪心自问,何以对朝廷?又经过将近一年的拼搏,金积堡粮援俱绝,马化龙只得亲赴刘锦棠军营投降。同治十年正月十三日,马化龙和亲属以及回民军中抗清英雄一千八百余人惨遭杀害。

马化龙在宁夏回民自卫抗清斗争中,作为这一斗争的组织者、领导者,他的功劳是主要的。他的求抚、投降是被迫的。左宗棠之所以要除掉马化龙,主要因为马化龙在回民中的威望太高。左宗棠说,马化龙造了些“疗病则愈”、“求嗣则得”的“奇迹”,教下群众对他的信奉竟到了“如醉如痴,牢不可破”的地步。刘松山也说,宁夏回民素听马化龙之命,地方公事及征收钱粮一向都由马化龙主

持,甚至文武各官的薪粮也都由马化龙发给。所有这些都正是清封建统治者所最为忌讳和绝对不能允许的。左宗棠曾深有顾虑地说,如果失掉这个机会不予除灭的话,恐怕今日之马化龙就会成为异日的李元昊,那就不可收拾了。这就是左宗棠一定要杀掉马化龙的主要原因,其他所谓马化龙的种种“罪行”,都只不过是左宗棠为了杀掉他而寻找的借口而已。

在整个自卫抗清斗争期间,马化龙采取了“安辑地方,保卫汉民”的和睦相处的政策,清封建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回民起义期间,宁夏和灵州等地城里衙署和居民“均尚完好”,“回汉民人亦俱安堵”,他们之间是“交相贸易,和好如初”的友谊关系。在战乱时,马化龙仍在重视农事,多次捐银兴修水利,并亲赴唐渠监修。马化龙曾派回民马占魁管理灵州地方事务,马占魁尽力于协和民族关系,注重农田水利,也受到回汉族人民的好评。

[马寿千]

马占鳌

马占鳌(1830—1886年),字魁峰,又字鼎臣,经名阿布都·阿齐兹。生于道光十年(1830年),甘肃河州(临夏)漠尼沟人,祖籍陕西大荔。其父于清初来河州经商定居于河州小西乡。出身宗教世家,虎夫耶学派花寺门宦大阿訇之一,俗称漠尼沟阿訇。知识渊博,能言善辩,受到穆斯林信任。同治二年(1863年)与河州马悟真(东乡族)、闵殿臣等率众自卫反清起义,被推为大帅。马占鳌接任统帅后,提出反对抢劫和杀害汉民,后因一些人不听此令,擅自抢劫杀害北塬汉民。因此,辞掉大帅去大河家闲居。后攻打永登县不克,受伤。后经马悟真说合,仍任河州自卫反清起义军大帅。同治三年(1864年)马占鳌率起义回军攻打河州城,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夺战,马占鳌受伤,弟弟战死,攻城回军伤亡很多,同年十月终于攻开了河州州城,击杀了清军守备,守城汉民亦有伤亡。马占鳌开始四面出击,攻巩昌、扰兰州、袭金县、击安定(今定西)等城,使陕甘总督穆图善首尾难顾,困守兰州,在攻平番时,马占鳌伤了左眼。不久攻取狄道(今临洮),声势大震,成了西北回民自卫反清起义军重要首领之一。同治九年十一月金积堡陷落,宁、灵回民起义失败。左宗棠即调集大军进攻河州。同治十年秋后,左宗棠移帐安定,他分兵三路进攻河州。中路傅先宗率鄂军从狄道过河进攻,左路杨世俊率楚军进军峡口,右路刘明灯率楚军进军康家崖。同时调洮州“蕃兵”把守隘口关卡,又调徐文秀率部从会宁进兵作应援,结果首战康家崖,刘明灯部被义军打得尸横遍野,溃不成军,义军撤回洮河以西,清军渡河直扑三甲集。三甲集陷落,义军失去了以洮河拒敌的天然屏障,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马占鳌和他的各

部首领马永瑞、马云、马海晏、马悟真、马万有等商议后决定将主力撤回太子寺，放敌军进屋，然后关门打虎，一网打尽。马占鳌说：“成败在此一举。”严格要求各路首领与义军，要在这一生死存亡关头，一定听指挥，奋勇杀敌。果然清军调集三十多营，由傅先宗率领，向河州进发，途中又不见抵抗，认为义军全线溃逃。当清军进入太子寺时，马占鳌采取黑虎掏心的战术，由先行官马海晏率领，选出敢死队五百人（另说三百人），每人带土坯一块、水一壶、叉子枪一支，深夜潜入清军中心，在新路坡上筑起一简单工事，把所带的水泼在工事周围，形成冰墙。次日晨当清军发现后，非常惊奇，即进行围剿，这时，义军五百枪手弹不虚发，打死清军一批又一批，同时，马占鳌指挥义军从外部攻进敌阵，“敌人猝不及防”，自相践踏，死伤枕藉，喊声不绝”。傅先宗被击毙，兵勇死伤大半，敌军全部溃退三十里。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夜，义军又乘胜在董家山突袭，徐文秀中弹而死，全军覆没，郑守南等总兵以下十多名将领全部毙命，左宗棠得报大惊。义军获胜后，马占鳌根据当时形势，不顾部分起义首领的反对，力主降清。“马占鳌说：‘陕西的白彦虎失败了，宁夏的马化龙也失败了，陕西已告肃清，甘肃也大半平定。我们只剩河州同西宁两个地方，还要同清朝作对是不行的。况且我们已经闹了十年了，再不想结束办法，究竟闹到什么时候呢？我认为这时乘胜投降，过去的罪恶由我一人担当，他们一定少办善后（即镇压一批起事的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等到失败了才投降，办善后一定很重，大家受累，恐怕死的人不少。’说到这里，多数人还不同意，还有人主张攻过洮河，再看形势。马占鳌说：‘我们一直往下搞最后目的是什么？如果一直要战到成立国家的话，必须选出一个皇帝。但坐皇帝我可不行，大家如能选出个令人心服的皇帝我愿扶持，我们就一块儿干到底。不然的话我看还是早点投降

的好。’说到这里,大家虽然知道终究得走投降的路。但仍有人主张把三甲集的驻军赶过洮河,叫他们更知道我们的厉害,然后再议投降。马占鳌说:‘够了!只是这一个胜仗,已经增长了大家的骄气,忘记了胜仗中曾有不少人死亡;再打胜仗过洮河,那一定会再死亡些人,然而大家却只知胜不知败,话就更难说了。’马占鳌就这样再三开导,终于决定了一个以胜利投降的历史创举。”^①投降后被左宗棠编为三旗,任督带中旗旗官,从而由反清转向镇压起义群众。同治十三年三月马占鳌通过花寺的投降派马永福将西宁的马桂源、马本源诱骗到兰州被杀害,家属被斩首,未成年男子充军河南,妇孺发配为奴。有位克拉阿訇斥责马占鳌说:“你是个大阿訇,天经言穆民害穆民,不得‘脱离’,你害死两个教主,岂能得脱离(赦免罪过之意)。”马占鳌一怒之下,将克拉阿訇杀了。事后他心中有愧,为了赎罪,自己出资,选派了三位阿訇去麦加朝觐,以此来安慰一个宗教家的“良心”。

投降后马占鳌率领骑兵参加在刘锦堂西进的部队内,由循化进入化隆、贵德、碾伯,最后进入西宁、大通,结束了河州、西宁的事变。马占鳌因助清军镇压河湟起义群众有功,受花翎五品军功顶戴,后官至补用总兵。总之,马占鳌的反清自卫是正确的,到了后来他看到义军失败的趋势,遂以胜取降,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但以投降效忠,弯弓反射,杀自己的同教同族,做清廷奴才,换得父死子继的富贵荣华,这是错误的。马占鳌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月二十一日病故于大河家。享年五十七岁。生三子:长子安良,次子国良,三子毓良。

[马 通]

^①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1986年第二版。

马海晏^①

马海晏(1837—1900年),甘肃河州西乡莫尼沟人。家中务农。其父有七子,海晏为次子;七子为马海渊。海晏小时习猎,出入深山密林,练就骑射本领。年长,在积石关至拉卜楞一带,以畜力代客运货,作“驮脚”生意。后有积蓄,来往于陇、陕间贩运货物。当时路途多盗匪,海晏以武艺高强,常以“流星锤”自卫,同行商伴多仰赖之。不及十年,积累日丰,家业日富,海晏弃商,攻读《古兰经》,从事伊斯兰教活动。

同治初年,西北回民群起反清。河州回民在花寺门宦大阿訇马占鳌领导下,各门宦联合,攻下河州城。马占鳌亦河州西乡莫尼沟人,和马海晏有姻亲关系,素敬其武艺。马占鳌有谋略,善言词,在宗教中有地位;马海晏有武艺,勇猛善战,二人相契,占鳌为大总戎,海晏为先行官,率领河州回民武装反清。同治十年(1871年),左宗棠指挥的清军占领金积堡后向河州扑来,八月渡过洮河,进击三甲集、太子寺、大东乡。马占鳌、马海晏组织力量在太子寺和清军决战,占鳌邀结循化八工、米拉、碾伯及四乡回民(包括撒拉、东乡族)聚集太子寺,挖壕筑卡,阻击清军前进。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四日,马占鳌、马海晏共同筹划,借清军过年宴饮之机,由马海晏选带精壮射手,乘黑夜潜进清兵新路坡营地,以所带土坯浇水筑成“冰城”三座(时值隆冬,坯、水相结马上冻固)。“三垒环峙,……皆以善枪者穴居墙下”。天明,清军发现自己营地间出现回军三垒,

^① 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第三、四册有关资料和《清史稿》《马福祿传》、《董福祥传》写成。

遂大举进攻,记名提督傅先宗冲在前。马海晏镇定指挥,以善枪者射其冲在前者,趁敌乱之际命善刀矛者上前砍杀,毙敌无数,傅先宗被当场击毙;十一日,乘大风扬沙,回军再主动出击,杀死清兵右路指挥、记名提督徐文秀,其部下伤亡大半,“总兵郑守南、李其祥、杨文林、刘笃志,副将卢才华、王福昌,参将吴明胜,游击陈东海,都司李湘南、张有才、舒有贵,均殁于阵”,取得河州反清战役巨大胜利。“太子寺战役”被称为“黑虎掏心”,写下了西北回民反压迫斗争史的光辉一页。但马占鳌主张打胜投降,态度坚决,反对投降的人被砍头。马海晏附合马占鳌意见,同意派人到左宗棠大营请降,并于同年七月亲自到兰州晋见左宗棠,甘心受抚。马占鳌、马海晏等率领的回民武装,被改编为三旗马队,受河州镇总兵沈玉遂节制。马占鳌任督带兼中旗旗官,马海晏为督标中营管带,帮助清军捕杀坚持抗清的闵殿臣、马彦龙等,成为清廷“以回制回”的工具。

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命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东调,防卫京师。行至甘肃,董令马安良(此时马占鳌已逝世,由其子马安良袭其职)、马海晏组织马队,带领甘军东行,入卫京畿。次年(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循化、河州一带回、撒拉族人民再举反清义旗,激成“河湟事变”。总督杨昌浚镇压不力,固原提督雷正綰、甘州提督张永清调赴河州、西宁亦无力镇压。清廷派董福祥回甘,以马安良、马海晏为先行,渡洮河,进河州,“以回制回”,分化瓦解,将起义镇压下去。马安良、马海晏河湟事变后军权在握,逐渐发展成地方军阀势力;在镇压河湟事变中帮助河州总兵汤彦和脱离大难的马福祿,也开始掌握兵权。

1900年,义和团运动起,八国联军侵华,马海晏、马福祿又奉命东调(马安良留守地方),卫戍京畿。马福祿、马海晏所统之兵称“简练军”,归董福祥所统之武卫后军辖属。“福祥入卫京师,檄随

行”。“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出永定门,福祥兵杀之。于是董军围东交民巷,攻月余不下”。马海晏、马福禄参加了这些战斗。“五月,各国联军躏杨村而西,……抵廊坊”,马海晏、马福禄领兵在此与侵略军血战,力挫洋人,“为庚子之役第一恶战”。“六月,福祥檄令攻使馆”,马海晏、马福禄又被调入城内,在正阳门与敌作战,马福禄战斗中牺牲,马海晏与福禄弟马福祥继续领兵与敌战。后接命令,扈驾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奔,撤出战斗。行至宣化,马海晏病死,年六十三。追认记名总兵。

海晏有三子:长马麒、次马麟、幼马凤。马凤早年与藏民格斗死,马麒、马麟另有传。

[李松茂]

马桂源^①

马桂源(1843—1873年),亦称马归源,祖籍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县),寄籍西宁,是伊斯兰教花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的第四世孙。马桂源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大哥马复源,本为花寺门宦教主,后于咸丰八年(1858年)被清政府指派为巴燕戎格厅及循化厅各庄回民总约,赏戴五品花翎。咸丰十年(1860年)马复源逝世,十八岁的马桂源继承了花寺门宦教权,任回民总约世职并仍袭五品花翎,被教下称为“顶子太爷”。二哥马本源,自幼习武,中武举,后与弟马桂源一起统领西宁回民起义军。

同治十年(1871年)底,左宗棠镇压了西北金积堡和河州的回民起义军后,又进而镇压西宁和肃州的回民起义军。西宁在清代是甘肃省的一个府治,管辖区包括西宁、碾伯(今青海省乐都县)、大通三个县和贵德、循化(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巴燕戎格(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丹葛尔(今青海省湟源县)四个厅,是回族和撒拉族人民的聚居区。这里的回族像西北其他地区的回族一样,深受清政府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长年以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压抑回民”。回民不堪忍受欺辱。咸丰十年(1860年)马文义已在巴燕戎格厅带领回族人民举起抗清起义大旗。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碾伯县地主团练又无端杀害三名回民,并扬言尽洗米拉沟回民,当地回民联合撒拉族人民再次奋起反抗,马桂源作为宗教首领被推进了马文义的起义大

^① 本文所据资料除另有所注外,主要参考了《清穆宗实录》卷二六、二七、三三;《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三。

军之中。清政府派兵镇压起义军,但屡屡失利。起义军力量迅速扩大,很快占领了碾伯至享堂(今青海省民和县)的大路,中断了西宁与兰州的咽喉要道。身为西宁办事大臣的玉通只得求助于在回民中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宗教领袖马桂源,转请马文义能通融一下,恢复西宁与兰州的交通。马桂源对玉通的请求斟酌再三,为了使清军对回民起义军“改剿为抚”,他答应出面说合。协议达成后,西、兰交通一时复通,清军的粮饷、军火得以供给。为表示答谢,玉通立即保举马桂源为署循化厅同知,马本源为署循化厅游击。同治七年(1868年)马桂源兄弟双双被赏戴花翎,马桂源任西宁府知府,马本源为西宁镇标游击,并代行总兵职务。清政府如此器重马氏二兄弟,目的在于“以回治回”,缓解当地回民的反清斗争。

马桂源接任要职后,全面掌握了西宁地区的军政大权。他们从广大回、撒拉和各民族群众的利益出发,将镇标营换进回族战士,西宁的局势发生了巨变,城门启闭、公文往来、官民出入等都由回民将士做主处理,西宁成为起义军的一统天下,而玉通等人则被软禁,丧失了作用。马桂源弟兄组织和带领回、撒拉人民发展农牧生产,建筑西郊通济大桥以发展贸易交流,还修葺文庙以联络汉族人民的感情和加强民族间的团结。同治八年(1869年),玉通病死,豫师接任了他的西宁办事大臣的职务。这位新任大臣竟住在距西宁三百华里的平番(今甘肃省永登县)“遥控指挥”,这使马桂源弟兄管辖西宁更为方便。

同治十年(1871年)初,西宁起义军的首领马文义故去,马桂源的叔父马永福作了起义军首领,军内引起动荡。马永福热心名利,酝酿着投靠清军的计划。此时,金积堡陷落,白彦虎、崔伟、禹得彦率陕西回民起义军由金积堡向西南撤退,驻扎在西宁的小南川一带。白彦虎等人讲明利害,劝说马永福坚持抗清,马永福才暂

缓了他的投诚打算。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左宗棠进驻兰州,开始以军力围剿西宁。他先派何作霖率老湘军及董字等八营由平番开赴碾伯。八月初,刘锦棠所统十八营也奉命抵达碾伯。九月初,左宗棠以追剿陕回为借口,派刘锦棠率军二十营进犯西宁,同时命令马桂源弟兄协助作好内应,马桂源弟兄面临进与退的选择。这时,马桂源部下的光眉克、巴麻耳两位阿訇认为帮助敌军夹击兄弟部队是极大的错误,所以他们一面尽力劝说马桂源弟兄不能与清军合流,一面发动广大回族群众抗清。面对清军的压力和回族人民的抗清情绪,马桂源弟兄还是听取了两阿訇的告诫。他立即致函左宗棠,强烈抗议清军行动。同时密约陕回首领白彦虎等人在东关私宅商谈,成立了两军联合指挥部,推举马本源为统领陕湟兵马大元帅,进行统一指挥,全力迎击清军。马桂源弟兄的举动粉碎了左宗棠离间土回和客回(即当地回民起义军和陕西回民起义军)的阴谋。两路起义军联合起来后,在小峡至大峡沿湟水八十华里的各山头筑起大大小小的碉堡,以防止敌人的侵入。

同治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872年9月13日),西宁以东五十里的小峡地区回民起义军和刘锦棠所率清军展开了激战,这就是著名的西宁战役的开始。这是一场苦战,从八月十一日到十月十八日的六十八天中,马桂源弟兄领导着西宁回、撒拉起义军和陕西回军在不足四十里长的战线上,与刘锦棠部队浴血奋战。彪悍骁勇的起义军战士,他们以丰富的经验,充分发挥地形熟悉的优势,“每战则弥山塞谷”,^①四处扰乱敌军,使敌军首尾难顾,伤亡惨重。面对险峻的山谷和起义军坚固的防势,三四个月的时间内,连战五

^① 《左文襄公奏稿续编》卷四二。

十余仗,刘锦棠仍未打出碾伯地界。最后,鬼谋多端的左宗棠施了一计,他一面令陈湜、沈玉遂率领河州归附部队进攻循化;一面唆使西宁城内绅士闭城叛踞。马桂源得此情报,立即分兵围西宁,碾伯兵力相对削弱,刘锦棠乘机侵进。清军的装备和训练都强于起义军,加上他们有后膛大炮的助战,起义军作战异常艰苦,牺牲者几近万人。马桂源的胞弟马真源和陕回首领白彦虎都在战斗中负伤,撒拉五工首领多拜也在战地牺牲。此外,由于西宁城内绅士的背叛,关闭西宁城门,使起义军腹背受敌,马桂源分兵环攻两个多月拿不下城来,大大影响了对清军的作战。刘锦棠得势后,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每夺一地,即修卡筑堡,建造桥梁,起义军被逼逐步后撤。从十月初,敌对双方对小峡口反复争夺,十月十八日小峡要隘终于失守,马桂源起义军退至巴燕戎格,白彦虎等部放弃了大小南川向西川转移,打算经大通去肃州与马文禄会合。同治十二年一月西宁之战以起义军的失败告终。但这一战役从规模、时间与艰苦激烈程度,皆可视为青海地区少有的大战。马桂源弟兄不惧艰险、顽强作战的精神也是为人们称道的。清军统帅左宗棠感慨地说:“陇事以金积、河湟为最苦最要,皆它军生平所未经见者,盖亦非唐宋以后所有矣。”^①

十月下旬,刘锦棠部进入西宁,陕西起义军领袖崔伟、禹得彦及青海回民首领冶福兴、马来福等被迫依附清军。随马桂源退至巴燕戎格的回民,在早已于八月中旬就完全投靠清军的马永福的招诱下,也有三千人先后回到西宁。是时,西宁回民起义军仅有驻守在大通县向阳堡一带的马进禄、马寿等部还有一定实力,马桂源与他们联合继续抗清。十二月初,起义军在向阳堡起事,并很快攻

^① 《答袁筱坞宫詹》,《左文襄公书牍》卷一二。

克大通县城。同治十二年(1873年)初,刘锦棠以招附的陕回崔伟、毕大才部为前驱向大通向阳堡发起攻势。当马桂源弟兄得知向阳堡失落、大通被围后失守、千名回民起义军牺牲、退至大通的白彦虎部二千人突破清军的拦击也转往了肃州,他们急速结集部队进驻小南川的唐隆台前去支援大通,但清军据险扼守,马桂源难以攻破,只好返回驻地。清军得手大通,为进而攻克巴燕戎格扫清了道路。这时,驻河州的清军陈湜、沈玉遂奉左宗棠之命,以降服的马占鳌为先锋率部向巴燕戎格进剿马桂源弟兄。正月二十九日,这支清军由大河家取道下六族藏区(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塔加、金源、初麻、石大仓一带)抵达距巴燕戎格城二十里的端庄。叛降清军的马永福打开城门前往接迎,给驻守巴城的起义军造成威胁。与此同时,清军刘明灯、敖天印也率部会于巴燕戎格城。马桂源处于层层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困难;加之清军派回族兵勇混入起义军,造谣煽动,瓦解斗志;又兼天降大雪,行动极为不利。马桂源在无力抵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秘密派遣心腹前往马占鳌处求救。马占鳌“接受”了马桂源的请求,诱骗马桂源“尽缴马械”,并约他于二月初四在巴燕戎格会面。马占鳌将此消息密告沈玉遂,沈玉遂预先派兵扼守了各山要隘。当马桂源等人被骗如期到指定地点赴约时,全部落在了清军手中。据传说,马桂源被捕后,用煤气熏哑了嗓子才押往兰州。^①

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三日(1873年4月9日)马桂源、马本源以谋反大逆罪遭刚刑,马真源被斩首,马桂源的儿子发放到广东,其他亲人也遭厄难。马桂源弟兄死后,清军进入巴燕戎格,威逼回、撒拉人民交出军械马匹,但这里的人民牢记清军杀害马桂源等起

^① 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

义军首领的仇恨,他们拒绝归附清军,死也不交马械,坚持与清军斗争。直到四月,在清军的强大兵力镇压下,西宁回、撒拉起义军已远不是对手,最终失败了。

〔朱桂同〕

马文禄

马文禄(?—1873年),也称马四,甘肃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人,猎户出身。在众猎勇之中,马四堪称狡悍者之首。他带领有八十余人的回族猎手,人人擅长叉子枪,三百步外发无不中,被誉为强中之强。同治年间,马文禄领导回民起义,猎手们也都成为起义军的成员。

同治元年以后,肃州回民在马文禄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起来,形成了肃州地区的回民抗清斗争之强大力量,并在陕西和金积堡、河州、西宁各处的战斗结束以后,成为西北陕甘回民起义军最后汇合抗清的重要阵地。肃州回民起义之前,马文禄曾带领几名猎勇入关,住在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密约肃州回民一起举事。事毕返回自己住地嘉峪关时,肃州大小官员竟无人知晓。马文禄见守关游击外出,便乘机发难,夺关据守。此举博得同族人的敬佩,先后投奔马文禄参加抗清的人越来越多。同治四年二月(1865年3月),马文禄揭竿起义,迅速占领了肃州,成立了甘肃回民军的最后统帅部。

肃州是河西的重镇,“城高三丈六尺,厚三丈有奇,外环城壕,阔八丈三尺,深二丈”,^①地势的险要在历史上颇负盛名。且这里又是回族与新疆各族联系的枢纽,清军对马文禄的回民起义军占据肃州尤为重视,清政府曾调兵遣将恣意拿下肃州,但攻城困难,都未能行动。金积堡、河州、西宁等地平息以后,清政府集中兵力来对付肃州这个陕甘回民起义军的最后堡垒。

^① 祁韵士《西睡要略》。

同治十一年(1872年)春,左宗棠派遣徐占彪、杨世俊带领二十多营清军进犯肃州。这时的马文禄正领兵镇守肃州,他的部下除强悍勇猛的猎手以外,还有一大批当地回族人民和金积堡、河州、西宁集中到这里来的回民起义军斗士。此外,白彦虎率领的起义军自大通退出后,攻克了甘州、高台两城,已靠近了肃州,与马文禄全力合作。马文禄被推为“兵马大元帅”,统一指挥来自各路的起义军与清军决一死战。起义军声势浩大,战斗力旺盛。受命进犯肃州的杨占彪等部,经过半年的周旋才进驻到甘州城南三十华里的红水坝防线,结果被在这里防守的马文禄部下包围,兵力损失了大半。左宗棠急派金顺、宋庆领兵十营前去支援,同时把兰州的供给站迁到了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以便就近补给。金、宋与徐占彪残部合股力剿肃城,一连与起义军打了好几次大仗,肃州周围一百多个堡垒被破坏,起义军的力量骤减。当清军侵占到肃州城西南二十多里的塔尔湾据点时,起义军失去了鼎立配合作战的能力。

这时,左宗棠一面抽调陶生林率领的降军十多营继续增援,一面又令金顺、张曜的二十多营军合围,先后总计六十多营的清军参战,肃州处在了重重包围之中。清军日夜炮轰肃城,马文禄起义军全力抵抗,城墙随塌随补,十分顽强。清军挖掘隧道,马文禄组织起义军从城市堵塞,这样清军整整围攻了十八个月,肃州起义军在马文禄的领导下,坚守不移,肃州城仍在起义军手中。

同治十二年七月(1873年8月)左宗棠无计可施了,只好匹马上阵,亲临肃州督战,同时刘锦棠也率兵赶到。左命各部全力轰击城池,开辟地道,爬壕登城,刹时间“城上炮石如雨”,“城外尸横遍野”,回民起义军粮源断绝,马匹皮革均已食尽。在此艰苦情况下,起义军至死不放弃肃州城,清军仍无法攻入。最后,直到白彦虎部

失利,率精兵退走新疆,马文禄又排斥众人建议,在清军死亡惨重的局势下,起义军不得已开城请降了。起义军将枪炮数百件、叉子枪三千一百零七件、矛子二千余件,以及无数的刀叉拱手交给了左宗棠。对肃州之战甚为头痛的左宗棠,并没有因为马文禄的开城归附而善心大发。他进入肃城后,纵兵大杀。左宗棠还将马文禄腰斩示众,其他八名回民起义军领袖也被磔死。城内居住的回回,除土著者不准移动外,其他从肃州、关外、西宁、河州、循化及陕西外来的回回一千五百七十三人,全被屠杀。夜间又进城放火,把城内回回五千四百余人也都屠杀一空。肃州之战,是陕甘回民起义以来的最后一次血的洗礼。自此,同治年间轰轰烈烈的陕甘回民大起义消沉下去了。

〔朱桂同〕

五 马新貽

马新貽(1821—1870年),字谷山,号燕门,别号铁舫,山东菏泽县人。始祖马鉴,明洪武年间,以军功授指挥同知,由武昌迁居山东曹州府东北的马家海。其祖父、父亲皆为地方士绅。马新貽六岁入私塾读书,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中举人,二十七年中进士。从此步入宦海生涯。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至同治二年(1863年)的十八年中,他一直在安徽境内任职。先后任太和、宿松、亳州、建平、合肥等县知县,后升任安庆、庐州知府,安徽按察使、布政使。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蓬勃发展时期,安徽又是太平军和捻军的主要活动地区。作为封建官吏,马新貽转战安徽各地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起义。咸丰二年,在建平县筑城浚池,练勇筹饷以抗太平军。三年,太平军挺进安徽,淮河南北的捻军活动频繁。马新貽常身在军营,直接与太平军、捻军交锋。五年三月,曾率部协助收复庐州,并于庐州、巢湖等地打败太平军的援军,因功升知州,“先换顶带”。^①九月,又相继击败盛家桥、三河镇、柘皋等地的太平军,以直隶知州补用。十一月,再次收复庐州,得以赏戴花翎。六年十一月,安徽巡抚福济保奏补马新貽为安庆知府。七年七月,调任庐州知府。当捻军联合太平军攻陷桃镇,并连攻上下派河时,马新貽又在舒城打败捻军和太平军,因功于军机处记名,以道员用。八年,升为安徽按察使,上任之初,太平军陈玉成部与捻军合攻庐州,马新貽亲率兵勇出城迎击,获胜后率众穷追至七里站中伏,军溃失

^① 蔡冠洛编《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一编政治政事·马新貽。中国书店,1981年。

印,被革职留任。九年、十一年,其母、父先后逝世,马新貽两度回籍守孝,曾在菏泽办团练、筑圩以抗击攻入山东的捻军。在这三年中,安徽巡抚翁同书和临淮军统领袁甲三,一再上书朝廷,褒其“办理营务,屡次亲自督队;熟诸戎机,调和将士,训练兵勇,属营中不可多得之员”,^①奏请留其助理军务。于是,同治元年(1862年),马新貽自山东赶回安徽,配合钦差大臣袁甲三收复庐州,且于寿州打败捻军。经袁甲三奏荐,加按察使衔、署布政使。二年,皖北练总苗沛霖起兵反清,围攻蒙城,马新貽协助安徽巡抚唐训方攻苗沛霖,“于弹尽粮绝之时,尽心守战,衣不解带,目不交睫,抚循士卒”,^②竭力守住蒙城,因功授按察使,不久便升为布政使。

同治三年(1874年)至七年(1878年),马新貽在浙江任巡抚。此时,浙地战事初停,百废待兴。马新貽在修筑海塘、减税劝农、整顿吏治、充实海防、安靖地方、振兴文教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四年二月,派段光清主持兴建翁家埠海塘。五年十月,建海宁石塘,修绍兴东塘,浚三江口。鉴于百姓生活困顿,而官员浮收甚烈之弊,四年八月,奏请“海运经费,请以减存行月,南月谷米变价,以及杭、嘉、湖三府,行月食米折征”。^③后又因严州、绍兴水灾,马新貽力主赈济,奏请减金州、衢州、严州、处州等处浮收钱漕和罢漕运诸无名之费。打击了浮收之风,给百姓以修养生息之机。为整顿吏治,马新貽先后两次上书,将庸劣之官员革职、回籍候选或开缺。由于浙江宁海、象山交界之南田历来有海盗出没,马新貽为严厉打击海盗,曾命副将张其光等追击。嘉兴、湖州与苏州界有“桅

① 蔡冠洛编《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一编政治政事·马新貽。

② 孙衣言《马端敏公神道碑》。

③ 《(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一三九。

船”势力为霸一方，马新貽会同江苏巡抚郭柏荫，将首犯及悍党数十名，一并拿获，盗匪悉平。五年，奏请改造战船，振兴水师，充实海防。在文教方面，马新貽往往能“厚待于士，会诸城书院皆兴复，士群至肄业，皆视为子弟，优以资用，奖励之”。^①六年，提出：对旧藏、私藏之善本经书进行校勘，缩小板式刊印，增大发行量，以期流传较易，弥补以往工价浩烦，寒士艰于购取之不足。对战后浙江文教事业的复兴起了促进作用。

六年十二月，清政府嘉其在浙之业绩，升为闽浙总督。七年调补两江总督，晋位至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御史。不久，又被任命为通商事务大臣，掌南洋通商事务，步入其政治生涯的顶峰。即任之后，马新貽奏明所办事宜：“最要者六条，曰培养民生以筹办善后；修筑运堤以宣防河务；清查官亏以讲求吏治；选择将才以整顿绿营；酌留水师以联络江防；恪守条约以办理洋务。”^②这基本上概括了其任两江总督的主要政务。其中尤以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措施较为引人注目。

在其即任之前，宿迁的商民常为水旱两关之税所苦，蒋坝百姓又为淮关烦重之差役所苦，以致商业凋敝，农业萎缩，人民生活百无聊赖，故常投诉于官。马新貽提出：泗州坝应照旧案专查黄豆、饼片、芝麻、铁货、药材、煎碱六宗，其余无论何项货物，淮关巡役概不得过问。又宿迁旱关，本非旧例，应请裁撤，以苏民困。这种减税免役政策基本上解决了关卡滥收费的问题，促进了当地农业恢复和商业发展。

当时，江北地区因同治五年水灾而南徙的难民很多。他们最

① 《清史稿·马新貽传》。

② 《清实录》卷二四九。

初以租牛开荒的形式来谋生,后因获利甚少,往往弃田不耕。马新贻任两江总督时,弃田现象已十分严重。他一面积极赈济灾民,一面鼓励开荒,不仅解决了弃田现象,而且还安置了众多流亡的难民。

为整顿绿营,马新贻对军务工作进行一些革新。首先,针对因水灾财源减少,兵饷难于筹集的情况,奏请截留江北漕粮八千六百六十石,均匀发放给各省标兵,以保证基本开支。其次,马新贻目睹额兵差役多,口粮少,应募者多为老弱,皆不可用的情形,拿出裁兵增饷之方案,改建新军,即自营兵中挑出二千人,立为新兵四营,均于省城择地驻扎。其在省外者,惟徐州镇标尚称精劲,挑出一千人,立为徐防新兵左右二营,严申纪律,优给口粮。屯于省城江宁的,由马新贻亲加督训。第三是加强河防,以固江宁。将淮阳水师数营,分汛扬州至清江段运河、里下河、高宝渚湖,俾与长江水师联络。九年,应江宁知县莫祥之之请,浚北河口、挑筑沙洲圩大坝。其倾心军务是以前所未有的。同治九年七月,马新贻至督署旁右箭道演武厅考课武弁,近午时分校毕,由演武厅步行回署,当走近西角门时,为张汶祥所刺,次日身亡,卒年五十岁。马新贻被刺,有说是张汶祥为海盜复仇,也有说与当时湘淮两系矛盾有关,迄无定论。

马新贻死后,清政府着赏太子太保銜,照总督例赐恤,并入祀贤良祠,谥端敏。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伊子马毓楨,着加恩赏给主事,分部行走。于江宁、安庆、杭州海塘、菏泽、临淮为其建专祠。其历年奏折,被编为《马端敏公奏议》,其弟马新祐编有《马端敏公年谱》。

[哈正利]

郑魁士^①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西南、西北回民掀起声势浩大的自卫抗清斗争,内地散居回民跟随汉族人民以不同形式参加反清起义,包括参加太平军、捻军的起义。同时,也有一批回族武将,参加对太平军、捻军的镇压,其中由广西开始,无役不从,官至提督的郑魁士,就是最为清廷卖力的一员。

郑魁士(?—1873年),直隶宣化人。道光四年(1824年)由行伍考拔左营外委,八年,补独石口协右营把总,十二年升城守营中军千总,二十八年选补湖南提标中营守备,二十九年赴宝庆,参加平定李元发起义,三十年升镇筴镇标都司,赏戴蓝翎。

咸丰元年(1851年),郑魁士跟随提督向荣到广西参加镇压太平军的战斗。三月,在武宣打仗获胜,赏换花翎,擢湖南九溪营游击。二年,参加防守桂林的战役,又北援长沙,额中枪伤,擢升副将,以其勇猛善战,赐号沙拉玛巴图鲁。三年正月,太平军由武昌顺流而东,越江西,克安庆。郑魁士带领兵船,沿江东下。向荣催调,不遵行,被参劾,本应正军法,以其为将备中得力之员,改为革职留营,戴罪立功。不久在江宁作战有功,赏还翎顶。清廷在上海雇火轮船及师船,由海入江,派郑魁士迎提战船。

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郑魁士奉命统带湖南官兵七百名赴庐州(今合肥),跟随江南提督和春作战有功,五月,开复副将,并免其加捐。十二月,署安徽寿春镇总兵。由四年正月开始,郑魁士负

^① 本文资料根据《清史列传》第七函,卷五一;《清史稿》卷四二八,列传二一五;《清文宗实录》。

责攻夺庐州的军务。太平军在庐州设防严密，殊死守城。郑魁士率湖南及宣化官兵环攻不下。五年九月，捻军张乐行、苏天福（回）、龚得树聚众万余，和春派郑魁士率一千五百人赴蒙城助战。冬十月，清军乘夜袭攻庐州，郑魁士带兵潜至城下，立云梯，众军随登，庐州遂被清军攻陷。郑魁士被优叙，加提督衔。

咸丰六年（1856年）春，捻军在皖北和豫东纵横出击，声势大振。郑魁士在蒙城、三河、南屏等处接仗，疲于奔命。在怀远，郑魁士被围，身被二十余创，险些丧命。清廷嘉其勇，赏穿黄马褂。这时，向荣已死，和春以钦差大臣督师江南。郑魁士奉命会同巡抚福济督办安徽军务，实授寿春镇总兵，成为可以专折具奏独当一面的统兵大员。他率兵攻陷舒城、庐江、无为等州县，清廷对他给予优叙，并颁赐御用棉袍及翎管、搬指、荷包。又以郑魁士躬冒锋镝，中炮伤甚剧，特诏嘉奖，赐药调治。十一月，奉命会同巡抚英桂镇压捻军，并曾一度节制三省官兵。咸丰七年春，太平军、捻军大举出击，清军饥疲不相顾。郑魁士一再受挫，巡抚福济对他忽参忽保，迄无定见。郑魁士被摘去顶戴花翎，冬十月因功又赏还提督衔和顶戴花翎。

咸丰八年（1858年）春，福济参奏郑魁士性情骄蹇，与诸镇不和，颇难驾驭。清廷降旨，调郑魁士赴江南大营，听候和春调遣，说明和春对郑魁士是信任的，他们之间关系较好。这时郑魁士腿疾渐愈，经和春保奏，上谕说，郑魁士曾在宁郡会办防剿，深得军民悦服。于是，十二月，授浙江提督，督办宁国军务。这是郑魁士一生中的最高官阶，然而他的官运也就此为止，且颇受坎坷。随着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转入低潮，身为武将的郑魁士，等待他的也只有兔死狗烹的下场。咸丰九年初春，他就遭到巡抚胡兴仁的参奏，胡兴仁说，郑魁士性情乖僻，措置失宜。具体罪状是：皖南南陵

被围，守将求援，因有书无禀，怒掷于地，竟不发兵，解围后，却说是提督声威所致。都司、守备以下，露体箠楚，道台、知府以下，当面呵斥。前任提督得用之人，不论贤否，必遭屈辱，等等。清廷上谕并未切责郑魁士，只说，郑魁士奏催浙饷折内，亦多有不满胡兴仁之语，该二员器量浅隘，各不相能，恐致貽误大局云云。说明郑魁士的问题，只不过属于性情、器量以及巡抚、提督间各不相能的问题，这都是官场中平常之事，没有什么重大是非。

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郑魁士因为伤疾未痊，请假调理。清廷以郑魁士畏葸无能，屡次退守，并不协同防剿，命以总兵降补。六月，又奉旨随同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甲三军营效力。七月，郑魁士补甘肃宁夏镇总兵官，赴江苏镇江办理军务。十一年三月，以病开缺回籍。十二月，诏令郑魁士赴北京，听候简用。

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清廷给直隶总督刘长佑的上谕说，郑魁士“在皖北军营时，打仗尚称勇敢。惟系宣化府回人，平素性情桀骜，多与统兵将帅不和，遇事率多龃龉。多次饬令赴营征剿，均以病辞。现在刘长佑军营，着刘长佑密行察看，郑魁士性情是否较前和平，行止是否安静，若令带兵剿贼，能否得力，即行据实密陈。该督惟当不动声色，密切体察，不可稍行泄露”。这个上谕强调要不动声色，密切体察，不可稍行泄露，实际上掩盖着一个秘密。同治二年正是西北回民自卫抗清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清廷曾多次密令河南开封、洛阳和山西归化（今呼和浩特）、大同等处对回民严密监视。尽管郑魁士一直对清廷忠心效力，甘为鹰犬，清廷对他仍不放心，因为他是宣化府回人，就得密切体察与防闲，上谕反映出清廷欲盖弥彰的虚弱本质。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捻军挥师北上，山东、直隶告急，郑魁士被调往直隶军营效力，以督带练军得力，七年九月受到优叙。

八年,郑魁士旧伤疾发,奏请回籍。同治十二年(1873年)死于宣化。郑魁士道光四年(1824年)由行伍考拔左营外委时,如果二十岁左右,同治十二年应是七十左右的老人。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中,对郑魁士的治军和作战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郑魁士坚苦刚毅,骁勇绝伦,驭众恤兵,严整宽厚。军兴以来,无役不从,与军务相为终始。每临大阵,首陷凶锋,出生入死,身受重伤先后八九次,遍体创痕鳞积。大江南北一时名将无不推魁士为最。勋勤卓越,恳恩优恤。清廷上谕说:前任浙江提督郑魁士,由广西带兵,转战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直隶、山东等省,宣力行间,叠受重伤,勋劳懋著。兹因伤发病故,轸惜殊深。着交部议恤,并加恩予谥,以彰忠荃。赐祭葬、谥忠烈。光绪十五年慈禧归政,追念功绩最著诸臣,各赐祭一坛,郑魁士名列其中。

[马寿千]

六 马德新^①

马德新(1794—1874年)字复初。云南太和(今大理市)人。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生于一个伊斯兰世家马老阿訇家里。相传他是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第二十一世孙。幼年聪颖好学,对阿拉伯文经典有较深基础。青年时不远千里到当时伊斯兰经堂教育中心陕西深造,投入经学大师胡登洲“四传弟子”、著名经师周老爷帐下钻研伊斯兰学问。回云南后应聘到建水回龙和玉溪设帐开学。教经中深感学识不足,“真传之未得,名师之罕遇”,决定亲赴天方探索真谛。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四十七岁时孤行万里,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四月到圣地麦加朝觐,瞻仰克尔白,又到麦地那谒圣陵,为探索伊斯兰学问,他到埃及开罗在伊斯兰世界最高学府艾资哈尔大学深造一年,后访问历史名城亚历山大港,再到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以及巴勒斯坦圣城耶路撒冷访附近的古圣贤陵墓和遗迹。他遍游各国“与天方宰臣、百官、学士、大夫究天文杂家之学”,“采风化、审人情、博览诸书注解,精求各教理法,嗣朝觐天方,伏垦库藏奇经”等学术活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六月初自沙特吉达港启程,九月底到达新加坡,博览东道主尔买勒家所藏经书典籍和观测、研究天文学问题。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回到家里。他这次外出天方诸国考察学习,从四十七岁到五十五岁的一次壮游,整整八年(1841—1849年),行程数万里,在旅途行船中几遇逆风、触礁、瘟疫、饥饿的威胁,都以坚韧不拔精神战胜困难,化险为夷,锻炼了意志,增长了见闻,丰富了阅

^① 本文材料来源于《云南回族史》。

历。自天方回云南后享有极高的声誉,教内外人士一致以“复初巴巴”(波斯语,即德高望重者)的尊称,一直流传下来。云南各地穆斯林争相聘请他去开学,他一一婉谢,仍回到出国前执教的临安(建水)回龙村开学授徒,从事伊斯兰经典的译著工作。几年后移教于新兴(玉溪)龙门大营,以他学识渊博、崇高声誉,“四方从学之士,星列云集”,在云南经堂教育史上盛极一时。回龙和大营先后成为云南清真寺经堂教育的中心,培养造就了大批经师,国内外知名的经堂教育家马联元就是“复初巴巴”杰出的“门人弟子”之一。

马德新回国的時候,清政府正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以不平等条约瓜分中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全国各民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世纪50年代爆发了波浪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者以离间分化,蓄意制造回汉矛盾、相互残杀,以转移对清政府的矛盾,以至接连出现滇西缅宁(临沧)、永昌(保山)、石羊厂(双柏)屠回事件,激起全省回民武装反抗斗争,形成了滇西以杜文秀为首,滇南以马德新、马如龙为首两支回民起义队伍。在清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马德新、马如龙领导了临安、潞江、河西、新兴、海口、寻甸、曲靖回民起义军向省城昆明进发,先后派人稟请总督法办祸首、安抚回众,即可解散回众,但总督不理,还派兵攻打,起义军于闰五月进围省城,与守城清军展开激战。围城三月城内居民无食,吃树皮,督抚及团练大臣乱作一团,束手无策,总督恒春夫妇急得上吊自杀,眼看城垣即破。继任总督吴振械深知马德新“七十衰翁尚主兵”是因为残酷屠回引起,回民志在报复,不是真正造反。于是他只身窜往曲靖,派士绅汪之旭进省经与马德新说和,马德新等人“只欲报仇,不敢为逆”同意议和,于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马德新写了“永不滋事”甘结。事后清廷特命他为二品伯克,滇西回回总掌教,想

借他在回民中的威望以缓和紧张局势。但官方对于和议无诚意,以致发生咸丰十年(1860年)及十一年(1861年)起义军两次包围省城的事。这两次主要是由马如龙领导,称三迤大元帅。德新已不是直接的领导者。清同治二年(1862年)正月,马荣部从武定进昆明杀云贵总督潘铎于五华书院,昆明秩序大乱。藩司岑毓英使男妇年迈者六十余人手捧香花,恳请马德新出面维持,随后又派几个彪形大汉把他抬入轿内,抬到督府请他护理总督。这时马德新正在礼拜,缠巾未放下就被抬走了,这样就当上了云南护理总督。正月底马如龙带领军队由临安赶回时,马德新也就离开了督府。

马德新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尔林(学者),他的著述领域十分广阔,从《古兰经》到经注学以及各种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著作,而这些著作多是在战争中,以及脱离战争生活后不断写作而成,现存于世的大约有三十七部:

- ① 《四典要会》,四卷,中文版 1859 年。
- ② 《醒世箴》,中文版,1862 年。
- ③ 《天理命运说》,中文版,1862 年。
- ④ 《性命宗旨》,中文版,马安礼作序,1863 年。
- ⑤ 《会归要语》,中文版,未注日期。
- ⑥ 《礼功精义》,阿文版,1863 年。
- ⑦ 《据理质证》,原为阿文版,此为中译标题,1865 年。
- ⑧ 《大化总归》,二卷,由马开科以中文笔录,马复初校订,1865 年。
- ⑨ 《理学执中》,阿文版,标题为中译,1867 年。
- ⑩ 《礼法启爱》,阿文版,马安礼译成中文,未注日期。
- ⑪ 《觉世宝谏》,阿文版,此为中译标题,1868 年。
- ⑫ 《道行究竟》,原为波斯文,也有阿文版,此为中译标题,未

注明日期。

- ⑬ 《归真秘言》，阿文版，未注日期。
- ⑭ 《幽明秘言》，阿文版，此为中译标题，1865 年。
- ⑮ 《真德弥维》，阿文版，未注日期。
- ⑯ 《逻辑》，阿文版，未注日期。
- ⑰ 《行为之果》，阿文版，未注日期。
- ⑱ 《信仰向蒙》，阿文版，未注日期。
- ⑲ 《抚慰之说》，阿文版，未注日期。
- ⑳ 《阿丹的故事》，阿文版，未注日期。
- ㉑ 《寰宇述要》，原为中文版，1863 年译为阿文，此书是伊斯兰教宇宙哲学观专论。
- ㉒ 《天方历源》，中阿文并行，马育龄校订，未注日期。
- ㉓ 《天方历法图真本》，中文版，1851 年。
- ㉔ 《天方字母释义》，原著为刘智，马复初校订并作序，中文版，1863 年。
- ㉕ 《朝觐途记》，原文为阿文版，马安礼译成中文，1861 年。
- ㉖ 《礼法捷经》，中文版，未注日期。
- ㉗ 《文章句法次序》，中文版，未注日期。
- ㉘ 《词尾变化次序》，阿文版，未注日期。
- ㉙ 《天方诗经》，阿拉伯原文校订，未注日期。
- ㉚ 《真诠要录》，此为《正教真诠》的校订本，三卷，中文版，1864 年。
- ㉛ 《指南要言》，四卷，中文版，此为《清真指南》的简明校订本，1864 年。
- ㉜ 《天方性理注释》，1864 年。
- ㉝ 《阿勒壁春秋》，中文版，马安礼作序，1861 年。

③④ 《实录宝训》，二卷，中文版，马光烈作序，1858年。

③⑤ 《天方蒙引歌》，中文版，1866年。

③⑥ 《视天大赞真经》，中文版，为马注《至圣赞》一文修订。

③⑦ 《宝命真经直解》，五卷，中译本诠释，未注日期。

这些著作内容包括认主学、性命学、教义学、语言学、历史、天文历算学、文学、游记等，对阐述伊斯兰教义，沟通中阿文化贡献巨大，对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有极大影响。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云南局势已定，岑毓英升为巡抚，马如龙被调湖南，马德新早已在新兴(玉溪)大营经堂教学。岑毓英害怕马德新在回民中的崇高威望，派马忠把年已八十一岁高龄的马德新骗至呈贡安江村加以杀害，他的墓现在玉溪北城大营桃园后山。

[马维良]

马联元

马联元,字致本,云南新兴(玉溪)大营人。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一月九日。他的远祖应祥,父亲学宽,都是著名的阿訇。学宽寿一百〇一岁(1793—1893年),弟子遍于云南全省。^①

联元儿时,跟着父亲念经,同时也学习汉文。二十岁左右,汉文和阿文都已通达。二十二岁受聘为河西小回村讲席。这时,云南的反清战争正在进行,杜文秀已在大理立定了脚,马如龙已跟官军妥协。一般的穆斯林,有的是跟着杜文秀,有的是跟着马如龙。阿訇们和经生们也抛弃了自己的业务,参与了各种不同的活动。联元心里为教门担忧。后来舅父马仁山到麦加朝觐,他就跟着舅父到麦加去了。

在朝觐以外,联元游踪所至,有土耳其、伊拉克、埃及、印度等国。他于所到之处,访问学者,考问经典。在土耳其,他从尔不都哈密德('Abdal-Hamid)学习《奈格施邦定记刻尔》。在埃及,他从尔不都浪宾来素礼('Abdallahbin al-Rasul)学习古兰读法。在印度,他从拉哈麦图拉(Rahmat Allah)学习《沙米教法经注》(Alshami)。这种博求名师的办法,使他的学业大进。

四五年以后,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联元回到了云南,云南的情形,跟他离开的时候,大大不同了。杜文秀已经全盘失败,马如龙已经调出去。穆斯林死于战场、死于仇杀、死于诬害、死于流离失所的很多。马德新也被加上了一个罪名,砍下了头。穆斯林中有名的人,都在乡间偷偷地躲起来了,害怕天外飞来的横祸会随

^① 见《万仙马公墓志铭》。

时来到自己的头上。各地经堂,停办的停办了,解散的解散了,谁也不肯再出来多事,还想再办什么学校。联元把传道授业的重任,挑在自己的肩上。他决定来改变云南伊斯兰教的这种残破衰落的局面。这时,父亲已是八十岁以上的人了。他得到大家的同意,代替父亲主持大营的寺政,并招收生徒,重振经堂。远近学生闻风而来的很多。在初开讲的时候,已有一百人左右了。

联元看到来学者一天比一天多,寺里的房屋容纳不下,就设法集款来扩充宿舍,增加讲堂。因为来学者有许多家境清贫的,他又想法设置助学金。看到来学者往往因家庭问题,在努力进修的时候,被迫停学,他想出一个办法。他从许多经典中采集要语,成为选本,尽力使它容易记,容易学。这样,可能中途辍学的人在短时间内也能得到宗教知识的梗概,可以长期学习的人也得以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这种办法,是经堂教育上的一种革新。

联元还教学生读汉文书籍。这也是他在经堂教育上的改进。向来读汉文的人不懂得本教的经典,学习教典的人不懂得汉文,双方的见解都不易沟通。王岱舆等人用汉文著书,只是能使读汉文的人懂得伊斯兰的道理,而不能对专读阿文或波斯文教典的人有什么好处。现在联元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下手,而要学习教典的人能读汉文书,直接从汉文书籍中学习了。他的成绩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虽不可知,但他这种办法不能不说是后来云南的中阿并授制度的前驱。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联元年六十,主讲大营已二十六年,前后培植的人才约有两千人的光景。在他六十大庆的寿屏上题名的,西而缅甸宝石厂的教长,东而贵州马台河的教长,北而四川叙府的教长,南而云南思茅的教长,以及云南各著名穆斯林区域如大理、蒙化、楚雄、寻甸、沙甸、田心、大庄、河西、婆兮、馆驿、回龙等处

教长,都是他的弟子。

就在六十岁这一年,联元提倡刻《古兰》全经,并刻《亥听译解》。《亥听译解》把汉文译文放在原文的下面,使读者能够读文寻义,这是中国有汉阿文对照本《亥听》之始。《古兰》,杜文秀曾经刻过,但杜文秀失败后,人们也不敢保留他刻的版样,使用他印的经了。所以联元倡刻《古兰》,虽不是创举,而在战后对于大众的方便上说,也正如是一件创举一样。一直到现在,这部刻版还保存着,它的印本普及于云南各地。

六十岁这年的九月,联元离开了大营,往缅甸去。到了宝石厂,到了瓦城。第二年,到印度,住在干补勒(Gangpur),专心著述,卷帙甚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闰五月十九日,联元寿终于干补勒,年六十三岁。^①

联元译著的书,约二十余种。^②已出版的用阿文、波斯文写成的,有:

一、《米府他哈》(Mifāh),是一本讲解阿文变字法的书。

二、《哈哇遂来》(Hawāṣil),是一本讲解阿文文法的书。

三、《取命腰雨》(Kīmiyyā' i),或译《古文仙法》,是一本讲波斯文文法的书。

四、《摆天乃》(Bayān al-Muttasiq),是一本讲阿文修辞的书。以上四种都是关于语文学方面的编著。

五、《伊玛尼解》(Taḥṣīl al-'īmān),是一本解说伊斯兰基本信仰的书。

六、《性理微言》(Laṭā'if),是把刘智的《天方性理本经》译为阿

① 以上见《致本马老夫子寿屏》、《致本阿衡哀启》、《大杂学自序》。

② 见《致本阿衡哀启》。

文的书。

七、《四篇要道》(Faṣl),是用波斯文写的。

八、《清真玉柱》('Umdatalslām),也是用波斯文写的。这两书都是伊斯兰概论性质的书。以上四种,都是关于伊斯兰之基本的论述或一般的说明。

九、《教款捷要》(Muhimmat),波斯文写的,是一本讲教条的入门书。

十、《讨追哈》(Audihal-Taudih),是一部讲解《伟嘎耶教典》的大著,有上下两巨册。以上两种,都是关于教条的。

这十种著作,很显然地,都不出于经堂课程的范围。大概联元所著作的东西,也就是他平日和学生们讲习的东西。在阿文著作的种类上,联元不及马德新的多;但在数量上,联元还是超过了马德新的。这些著作,多为云南木刻,只有《讨追哈》是石印印的,上册在印度出版,下册在昆明出版。另外,还有《虎推布》(Khutab)一书,也是在云南刻的。

用汉文写成的书,除《亥听译解》外,有《辩理明正语录》二卷,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昆明刻版,是辩驳耶稣教三位一体之说。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英国牧师对他有劝教的意思,他遂有这一本书作为一个严正的答复。^①

联元身体魁梧,有“高哈只”的称号。精神也特别比平常人好。常常一面写作,一面回答学生们的问难。这样成了习惯,到老还是一样。^② 他爱护教门的心很热。教中的别派,标新立异,他毫不客

① 以上各书的译名,全用习惯的译法,加方括号者,是本文作者所译。未记各书刊印时间者,其时期待考。

② 据昆明正义路礼拜寺教长沙平安口述。

气地加以指责,在讲论和写作的时候都明白地说出。因此他招致了很大的忌恨。在他六十岁那年,有一个人到寺里去刺他。据当时人的推测,就是对他的言论的一种报复。他到缅甸、印度去,也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①

联元有三个儿子。长安贞,原是佛寺里的小沙弥,能作木工。他时常到寺里去听联元讲说。联元把他收为养子,教导他,他的学识进步很快。后来在缅甸任教长多年,甚得当地教胞的爱戴。民国二十年去世。次子安义,字宜之,先后在广州和上海任教,晚年在昆明东门讲学,学生很多。用阿文著有《聚礼明证》和《明德实语》二书,都在昆明出版。1943年去世,年七十六岁。三子安康,字健之,在昆明永宁寺讲学。安康子玉龙字瑞图,先后在广州及大营任教,主办《天方学理月刊》,^②译有《回教认一论》、《穆圣的默示》等书。^③他谦逊好学,但可惜身体太弱,1945年去世。

联元高足弟子田家培,字植卿,河西人。先后在云南各地及广州任教。联元倡刻的《古兰》,就是家培一手写成的版样。1943年,在开远大庄去世,年七十六岁。

[白寿彝]

① 据玉龙口述。

② 在广州出版。

③ 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玉龙另有《伟嘎耶》等译稿,未完成。

王 宽

王宽字浩然,北京人,以“王五阿訇”为大家所熟知。他是王崇名的侄孙。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八月十一日。儿时就很聪明,崇名特别喜欢他。崇名到各地去讲学,常常把他带在身边。他有这样一个有学问的叔祖来爱护,就有了很好的进修机会。加上他好学不倦,家里藏经又多,他在学业上的进展,是别人难以赶得上的。

宽学成后,先后到外地及牛街寺讲学。他的讲说,深入浅出,为群众所欢迎。对经生们讲解,说明义理,剖析文字,尽量详尽,但督导很严。经生有了过失,立加责斥,没有什么姑息。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宽携弟子马德宝赴麦加朝觐。游迹所及,有埃及、土耳其等地。在土耳其,谒见皇帝哈米德,哈米德赠他经书千余卷,并派经师哈夫足哈三和阿里雷塔随宽东渡,传授《古兰》读法。

三十三年(1907年),宽回国后,锐意兴学,即与同志创办回教师范学堂于牛街礼拜寺内。^①改良教法,增订课程,对汉文及别种普通学校中的科目都正式讲授。在经堂内兼授中文的办法,宽施行的时候比马联元要晚三十年光景,但改经堂为新式学校的形式,则是宽的创举。

光绪三十四年,宽又和马邻翼等创办清真两等小学堂,招收穆

^① 回教师范创办时期,据赵振武《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十一期)。

斯林子弟入学讲习。^①后来又在三里河、花市、教子胡同、海淀分设小学四处,以求教育的普及。

宽办这种教育的时候,正当清政权摇摇欲坠,商业萧条,经费的筹措要费很大的力气。有时候,甚至要他典当房屋衣服来暂缓学校的窘迫。这种办法,显然不能持久。回教师范不久就停办了。清真小学堂也于民国元年(1912年)为京师学务局接收。可是学校的停办,并不就是他主张上的失败。他提倡的这两种教育,在不久以后,南北各地有人继起推行了。

1912年,宽创办中国回教俱进会,他被推为副会长。这是中国穆斯林有全国性组织之始。至于这个会后来被人利用,那是另外一回事,应作具体评论。此后,他到上海、南京、开封、归绥(今呼和浩特)各地讲席。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尽力向一般群众进行宗教教育。他在开封的时候,于短时期内成立了宣讲经学的地方有一二十个。在茶馆里,在澡堂里,随时都可以听到宣讲的声音。只要礼拜的时候到了,许多做小生意的人都停止了交易,赶到礼拜寺里去了。每年两度的会礼,宏大的东大寺礼殿容纳不下礼拜的人,礼殿的前廊下跪满了,二门以内的空地上也都跪满了。他的感召力量是相当大的。^②

1918年冬,宽漫游蒙古各地。他年龄大了,旅途太劳顿,塞外也太冷,肺部受了伤,回北京后就得了哮喘病,他还不大在意。第

① 光绪年间,北京薛思曾创设清真学塾,或作清真义学,于法源寺后。思曾又自著《天方三字经》,教小学生们诵习。又,北京安铭于光绪二十六年,在谢文节公祠后,组织宛平民立初级小学。又,镇江童琮在光绪三十二年光景,创立穆原学堂并自编课本。这三个学校都比宽办的小学校早,但对后来的影响也都远不及后者的大。

② 这是作者自己的见闻。

二年春天,病得厉害了。三月十五日去世。年七十一岁。^①

〔白寿彝〕

^① 以上关于宽的事迹,除另注出处者外,都根据尹伯清《王浩然阿衡传》及《补遗》,马善享《王浩然阿衡轶事》。

马启西

马启西(1857—1914年),字公惠,经名以黑牙,道号西纪元。祖籍临潭王家嘴,生于咸丰七年(1857年),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创始人。

马启西的父亲马元,是北庄门宦的遵信者,因家贫招赘于敏士元家,生子名生春,后改为启西。马启西童年在临潭旧城上寺攻读阿拉伯文,十一岁在旧城范玉麟开设的私塾中就读汉文,后到新城新店子范绳武处攻读《四书》、《五经》。数年后,在洮州应考被取为第二名童生,三年后去巩昌应试,榜列第四名秀才,但因家庭贫穷,无力进取,遂在家攻读诗书,博览诸子百家,并钻研伊斯兰教学者刘介廉等的各种论著。光绪十七年(1891年)马启西在临潭旧城西凤山开设私塾一所,除向学生讲《四书》、《五经》等课外,还给一些愿意了解伊斯兰教的回汉学生讲解伊斯兰教的教理。在讲学的同时,马启西在西凤山窑洞中开始坐静,从事宗教“功修”。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旧城北庄门宦所属的达子沟拱北开设经堂,讲解伊斯兰教义。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因北庄门宦的反对,马启西遂迁出达子沟拱北,与北庄断了关系,在其家设立了讲学所,取名金星堂,继续讲解儒学和宣传伊斯兰教义。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和教生集资在西凤山下修建了一座清真寺,从此,与北庄门宦的矛盾激化,多次发生械斗,并上告兰州官府。兰州当局委派洮州厅查办,并定于当年八月开审。审讯前洮州厅翻阅旧卷,认为双方有意生事,拟将双方头领正法,故在开庭时,先不问情由,将双方头领痛打一顿,各押八人。后经兰州十坊头人从中调解,予以了结。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马启西感到难以立足,遂率领教

生马英才、马进元、丁仲和等取道新疆到麦加朝觐。行至撒马尔罕后，因俄国爆发二月革命，中亚道路受阻，遂于宣统元年（1909年）返回临潭旧城，将“金星堂”改名为西道堂。积极从事传教活动。由于他的主张适合当地穷苦群众的意愿，所以除本县群众外，还有河湟、洮岷等地区遭灾遇难的一些回回、撒拉、保安等族群众也前来投靠西道堂。他提出入道堂者，必须带田产，成为道堂公产。从此，一个以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主的小集体和一个团结兴旺、生气勃勃的新兴教派出现于旧城镇，遂引起了河州地方军阀的注意。民国三年河南流民武装白朗到临潭，马安良命临潭群众组织起来抵抗，他的兵士随后就到。但白朗到旧城，群众抵抗死伤上千人，而马安良的兵未来支援。1914年古历闰五月十九日马安良以“西道堂勾结白朗，屠杀良民”为由的莫须有罪名，派张顺元部包围了西道堂，将马启西及其弟启晋、启化、子德隆、侄希隆以及信众苏占魁等十七人绑赴西河滩杀害，和政台子街西道堂副教主丁全功及其群众也同时遭到杀害。两地道堂被封，旧城八十多人被押到临夏八坊东马店。后经马占奎等的劝说，马安良始将所扣押之人放回。马启西一家及其创建的西道堂遭受了一次惨酷的打击。

马启西在宗教方面主张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根本信仰，在传教布道方面重视刘介廉的汉文译著为宣教蓝本。他认为只要厉行了五件天命课，就是一个完美的穆斯林。同时，对信众一再强调，要重品德，讲信义。主张移风易俗，倡导男子不留长辫，反对女子裹足。在教育方面，主张办学，鼓励男女上学念书，不强制儿童念经。在经济方面，重视营商贸，实行信众以道堂为家，同吃同住同劳动。财产公有，不积聚私财。

马启西的汉文较好，但没有留下完整的著述，仅仅在创教期间写了一些有关伊斯兰教方面的对联和诗作，充分反映了他的宗教

思想。现就他的对联中的一些代表作选录如下：

读书得好意理合天经三十部，养气通神明道统古圣百千年。

居广居由正路方能保全元气，良友良亲明师不啻坐于春风。

名实兼收不独润身还润屋，经营具到真能成己更成人。

勤礼五功体认乎无声无嗅，谨斋三月操存于不睹不闻。

人当以己之生命为永迹继续之永生而努力，故此生虽是过程，此生毫不空虚。

人人必须求生存，而劳其形，动其心。然所为在己而不在人，盖人与人之间，亦不过至诚之一化耳。

马启西创建的西道堂是把伊斯兰教教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一个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分配的新兴社会组织，是要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他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和实践者。

〔马 通〕

七 丁拱辰^①

丁拱辰(1800—1875年),又名君轸,字淑原,号星南,福建晋江陈埭乡人。是一位最早放眼世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振兴中华的爱国科学家。生长在一个回族商人家庭,父亲丁宗璧经常跑浙江和台湾等地经商,接触外界、接触新思想较快。幼年时丁拱辰家境贫寒,全靠母亲纺纱绩麻供给读书,十一岁停学,仍坚持自学,十七岁迫于父命弃儒经商,暇时仍读书不辍,尤其喜爱数学,通三角八线之法,又研究天文,夜观星象,并亲手制作观测仪器。1831年,他三十一岁的时候,到国外去谋生,到过吕宋诸岛(今菲律宾)及伊朗、阿拉伯,开扩了眼界,看到了列强在各处的横行霸道,激发了爱国救国的志向。

鸦片战争爆发,丁拱辰深受鸦片流毒和列强侵略的刺激,认识到正如当时魏源所总结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要,而且开始身体力行,苦心钻研,著成《演炮图说》,呈献给官府,试之有验,为他奏闻于朝廷。丁拱辰又自己捐献资财,铸大炮四十位,小者二千斤,大者五千斤,炮身短而炮口大,略仿西洋模式。他的爱国举动,感动了道光皇帝。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二月三十日,道光的上谕认为呈缴上来的图式,极为中肯,具见矢志同仇,留心时务,可嘉之至。丁拱辰受到六品官衔和花翎顶戴的赏赐,在他的故乡敦朴宗祠内还立了“名达九重”的匾额。当时朝野著名人士对丁拱辰在科技上的重要贡献和爱国精神,都曾给予很高的评价。魏源认

^① 本文资料根据张家瑜《丁拱辰其人其事》(未刊稿);林国强《清末回族科学家丁拱辰》,见《泉州社科通讯》。

为丁拱辰的《演炮图说》“甚合时用”。林则徐读了《演炮图说》，积极表示令丁拱辰回福建，“面谈细底，方觉快心”。叶志谦称赞《演炮图说》是“谋国谋心，事先利器，配金配火，虞备除戎”。邓廷桢赞扬丁拱辰“辨微妙解弧三角，策事真通垣一方”。状元林鸿年为丁拱辰像题赞诗说：“诸葛神机用火攻，舟车战法古原通，极西浅濶量天尺，本出玃衡矩度中。”除了《演炮图说》，丁拱辰经过勤苦学习，参阅大量中西军器制造资料，还写出了《演炮图说后编》、《增补则克录》、《西洋军火图编》等军事著作，他设计并与工人制造了一辆铜质火车模型，写了《西洋火轮车火轮船图说》的论文，是我国第一篇关于火车的科学论文。同林则徐、魏源一样，丁拱辰代表了当时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中国先进分子，也是近代中国兵器创作的先驱者。由于时代的局限，丁拱辰的科技贡献，在鸦片战争期间没能充分发挥作用，而十年之后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却被赛尚阿及李鸿章等所重视和利用。这是由当时中国善于内耗而怯于御敌的国情所决定的，非丁拱辰始料所及。

〔马寿千〕

杨 枢^①

杨枢(1844—1917年),字星垣,广州回族,哈吉。祖籍为辽东盛京(今沈阳),先世隶汉军八旗,随军入关,分驻广州,至杨枢时已历七世。杨家为将门世家,杨枢在青年时代却仰慕西洋文化。同治六年(1867年)入广州同文馆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由于他学习勤奋,进步很快,是同文馆的高材生,受到英文教习三顺的器重。杨枢又是学生中从事翻译工作最为积极的一个,他曾参加翻译过《国际公法》以及外交、政治、天文、地理、生理、化学等方面的书籍,并以《同文馆译丛》的名义出版。杨枢在翻译工作中成绩卓著,曾受到同文馆提调王汝梅的嘉奖。他还协助教习三顺编写一本英语语法《三顺文法》,并合作编写以广州语音来说明的《英语拼音》。这些工作对早期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具有积极的意义。

同治九年(1870年),杨枢由广州同文馆毕业,被分派到两广总督衙门任西文通事。这个时期正是洋务运动兴起之际,一批军用和民用工业引进西洋技术设备和雇用西洋技师,促进了中西技术文化交流。杨枢在广州这一重要通商口岸担任总督衙门的西文通事有十四年之久。他的翻译业务和外交知识,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光绪十年(1884年),著名洋务派代表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主张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兴办军用、民用工业。杨枢的能力和才干得到赏识,被提升为道台衙兼理当地洋务局差事。这期间,杨枢除了处理日常的洋务活动,还办成不少实事,显示了他的才能。

^① 本文资料根据王希隆《清末回族外交官杨枢》,见《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留东清真教育会编《醒回篇》。

一项是创办了广州机房,是一座引进先进机器设备的纺织厂,织成的布匹质量很好,可与进口洋布匹敌,深受各地消费者的赞誉。据云,从此“世之言布匹、杂货,俱以洋广并称”。再一项是杨枢创办了广州造币厂,铸造被称为龙洋的广州银币。这两项都是当时以求富自强为目标的有成就的洋务活动。

杨枢受到张之洞的援引,渐渐步入清政府的外交上层。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日甲午之役中国的惨败,中国朝野为之震动,于是要想富国强兵就必须学习日本的经验走日本的路,这成为当时朝野上下的共识。在这种背景下,张之洞奏派杨枢赴日本考察,任驻长崎领事三年,对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情况,杨枢都进行了考察,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杨枢以候补四品京堂出任驻日公使,当时称为“钦差出使日本国大臣”。这时正是中国学生大规模留学日本的时期,也是以东京为重要据点的中国民主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驻日公使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杨枢1903年5月至东京就任的时候,中国留日学生有一千多人,到1905年猛增至八千六百多人。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联合各革命团体成立了同盟会,大批留日学生加入该会。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东京成为反清与保清、革命与立宪各种势力角逐的场所。作为驻日公使的杨枢,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在日本,他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活动服务,与日本法政大学校长订立协议,在法政大学开设法政速成科,接收收费中国留学生学习宪政知识,为清政府培养宪政人才。杨枢与顽固守旧的清朝官员不同,他了解世界发展趋势,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有自己的看法,他曾对自己的侄子杨殿镛和自己的同乡、孙中山的助手汪精卫谈到:“民主革命,势所使然,问题在迟早而已。吾老矣,行将退休归田。而加入革命之举,虽吾

子侄亦不禁。”杨殿镛在日本成城学校学习期间,与同盟会员刘庆恩、赵钟琦(二人均是回族)等人常相往来,杨枢是支持的。

杨枢身为驻日公使,他对本民族的振兴问题也非常关注。1907年,留学日本的国内十四省三十六名回族青年在东京发起组织“留东清真教育会”,以“教育普及,宗教改良”为宗旨。该会成立后,创办了回族历史上第一个自办的刊物《醒回篇》,刊登会员撰写的文章,邮往国内各地,宣传进步思想。教育会发起组织者中有不少同盟会员和爱国爱教者,这是一个进步组织和进步刊物。杨枢支持他侄子杨殿镛参加该会,并且在使馆会见回族留学生。《留东清真教育会纪事》云:“丁未(1907年)六月,乃发起斯会,经前钦差驻日大臣杨星垣先生助金以资会费,并率诸公子及随员之同教者,合留学同人,摄影于使馆,以为纪念。”从纪事可以得知,杨枢此时已经卸任,在回国前于使馆与留学同人合影留念。

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杨枢奉命出任驻比利时公使,第二年九月因病去职回国。往返欧洲途中曾前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民国成立,杨枢已年逾花甲,定居于广州福地巷,以吟咏自娱,1917年病逝于广州,享年七十三岁。

〔马寿千〕

王子斌

王子斌(1854—1900年),清末享誉北方的武侠,参加变法的志士,名正谊,字子斌,以字行。原籍沧州,幼年发奋学艺,从师双刀李凤岗阿訇学习武功,得其刀术绝技,人称“大刀王五”。他为人慷慨侠义,不满清朝的政治腐败,贪官污吏鱼肉人民,遂劫官济贫,常活动于河北、河南、陕西、甘肃数省,多年奔走江湖,从未失手,侠义之名,不胫而走。后在北京珠市口设源顺镖局,以护镖为业,自为局主,行合法买卖,镖局是专门保护旅客商贩,避免路上被人行劫的民间组织。局主都是武艺高强,交游广阔,在社会上有名气的人物。北京是“天子脚下”,有了真本事才能站得住脚跟。子斌武艺出众,在江湖上名气甚大,他的镖车上插一支“子斌”二字的镖旗,就可以北到山海关,南至清江浦(今江苏省清江市),^①无人敢犯,故平生从未发生过失镖的事情。

子斌身为侠客,关心时局。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加深对中国侵略,民族危机加深。子斌对清廷的对外卑躬屈膝异常愤慨,他同情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发起的变法运动,故与维新派著名人物谭嗣同结为密友。嗣同思想激进,为人义侠,主张用激烈手段改革清朝的政治,较之康有为、梁启超更为激进。嗣同爱好武术,以侠义自命,从子斌学习武术。子斌每天都从珠市口源顺镖局到嗣同住所浏阳会馆(今菜市口北半截胡同)看望嗣同,并教嗣同舞剑,希望在变法中能助谭一臂之力。嗣同给朋友沈小沂的信中反

①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一八条:“王五为幽燕大侠,以护镖为业,其势力范围,北及山海关,南至清江浦,生平专以锄强扶弱为事。”

映了他的侠士作风。信中说：

嗣同弱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矢，尤乐驰骋。往客河西，尝于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深阻，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腓肉狼藉，濡染褙裆。此同辈所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①

子斌是嗣同的武术老师，嗣同的变法维新思想也影响了子斌，嗣同也希望子斌能参加进来。嗣同这种心情写在《赠舞人诗》里。诗云：

二十年来好身手，于今侠气总萌芽。
终葵入道首殊钝，浑脱观君剑欲花。
太一神名书五夜，无双帘影第三车。
台城片土萧闲甚，容得干将与莫邪。

快马轻刀曾过我，长安道上老拳工。
粗枝大叶英雄佛，带水拖泥富贵穷。
归些游侠三岛外，忽然走入众狙中。
散官奉职真无状，输汝江湖卖舞容。^②

子斌当时为著名的京师大侠，故嗣同称颂他武艺超群。“台城片土萧闲甚，容得干将与莫邪”，是说变法运动中子斌大有用武之地。

据传，子斌曾向嗣同提出过一个经营满蒙之地，伺机直逼京师的计划。嗣同写的《吴铁椎传》中，多少透露了点消息。他说子斌曾对他说：

今夫出居庸塞而北，缘边而东，满蒙奉吉之原，广漠千里，

① 谭嗣同《与沈小沂书》，《谭嗣同全集》第430—431页，三联书店1954年版。

② 《谭嗣同全集》第476页。

芄草如毳，林莽丛灌，鸷野所都。吾将大市骆驼牛马羊，召彼使牧之。逐水草而居，且耕且猎，支幕以为宫室，湮酪以御饥渴，请尽使奉吾子。不然，即蕃而息之，货其骆驼牛马羊，归以其资结士子，能为马新息乎？^①

子斌的意思说，居庸关外，东边千里地区，就是满、蒙、奉、吉之地，水草丰茂，鸷禽猛兽甚多，而人口稀少。在那里买入骆驼牛马放牧，发展农牧业，再招徕流民，经营市镇，占有地盘，自成势力，我可以奉你为塞外主人。你不愿意这样作，也可利用经营的收入，结交朋友，干你的事业。嗣同对子斌的这个建议没有考虑，但可看出子斌的雄谋大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下诏决定变法维新，任命康有为等人主其事，嗣同以四品京卿的身份也参加新政。不料由于袁世凯的出卖，慈禧太后把光绪帝囚禁于瀛台，推翻新政，下令逮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领袖。情势危急，子斌和嗣同密议，想带领人马在城内起事，救出光绪帝，推翻慈禧太后。时间紧迫，已来不及动手。子斌又劝嗣同东渡日本，他对嗣同说：“君行吾从，保无他。”但嗣同已决心为变法捐躯，他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②子斌说：“君死吾收君骨，君请自择矣。”嗣同被捕入狱后，子斌极力营救。嗣同有《狱中遗札》三封，其一说：“尔等满怀忠爱，可嘉之至！……尔等不必见面，必须王五爷花钱方能进来。惟王五爷当能进来。”其二说：“速往源顺镖局王

① 谭嗣同《吴铁椎传》，《谭嗣同全集》第207—208页。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子斌五爷处,告知我在南所监头。”^① 子斌不避险恶进监探狱。狱卒慑于子斌大名,也不敢拦阻。子斌打算劫狱,又被嗣同竭力劝止。

嗣同在狱中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

望门投止(宿)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仰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②

这里的“昆仑”指侠义人物,梁启超先生解释说,两昆仑一指康有为,一指子斌。^③ 1898年9月28日,清政府匆忙将谭嗣同等六人押解宣武门外菜市口斩首示众。子斌计划劫法场,未能下手。嗣同死后,子斌遵嘱,将嗣同给夫人的书信递寄湖南。此后,子斌在北京进行秘密活动,聚集数百人,欲有所举,但因康、梁逃亡海外,所志未遂。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京发生了义和团运动,据梁启超回忆,子斌被义和团杀死。^④ 又一说当年八国联军入北京城内,子斌率领属下镖客数十人,与敌人搏斗两月余,后遭侵略者杀害。还说子斌的头颅被悬挂在北京城头示众,经《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与大侠霍元甲商议,由霍元甲夜间登城取下子斌头颅,进行安葬。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不清楚了。

① 《谭嗣同全集》第447页。

② 《狱中题壁诗》,见《谭嗣同全集》第496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所谓两昆仑者,一指南海,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浏阳少年尝从之受剑术,以道义相期许。戊戌之变,浏阳与谋夺门迎劈,事未就而浏阳被逮,王五怀此志不衰。”

④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庚子八月,有所布划,忽为义和团所戕,资志以歿。呜呼!王五真男儿,不负浏阳。”

据当代回族著名武术家马贤达先生实地调查,子斌的后裔仍居住今日北京珠市口。其宅第即当日子斌的源顺镖局旧址。

〔杨怀中〕

李元庆

李元庆(1838—1904年),清末抗粮斗争首领。河南祥符县(今开封县)东乡治台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家有黄河泛滥后压沙地八十余亩。自幼习武,道光年间武庠生。为人耿直、热情,善于言谈,好打抱不平,深受群众敬重。义和团运动后,为了支付巨额赔款,清政府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各省封疆大吏争相效尤。光绪三十年(1904年),河南巡抚陈夔龙为掠夺民脂民膏并讨好清廷,设清源局,托委司道对自黄河决口后河占沙压已报荒免征多年的沙荒地切实整顿,重新征税,且追交先前已经减免的十八年钱粮。声言“倘系抗不完纳,亦需拘案严追”。^①当年八月压沙地征粮告示贴出后,引起开封东乡治台、鲁屯、阮楼、九牛寨、老府庄、城岗集、大花乡等数十个村群众的愤怒与恐慌。他们奔走相告,感到无以活命,说这是万年灾,将人逼到死路上去了。表示要坚决拒交钱粮,进行反抗。李元庆系当时治台周围十三个村群众组织棉花会^②、老虎会^③的首领,平时办事公正,在回、汉群众中又享有很高威望,很自然的被群众推为领袖,担负起这次开封抗粮抗捐的领导任务。

早在光绪十年(1884年),河南巡抚鹿传霖曾令祥符县清查原来沙压已垦荒地,定期交租。由于农民反对,以舆情不靖,事遂中

^①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

^② 棉花会:当地多种棉花。穷苦人家多到地里拾棉花,诱发不少矛盾冲突。李元庆发起组织该会,于每年十一月一日唱戏,开戏后方准拾花,化解了矛盾。

^③ 老虎会:当时村庄周围常有冻饿致死之人,官府乘机勒索。李元庆发起组织该会,每逢路死之人,仅给钱五串,避免官府更多的勒索。

止。这次对已垦沙压荒地征粮和追交欠赋的命令公布后,抗粮怒火遍及全县。群众请求李元庆出面赴祥符县署与县令孔繁杰进行交涉。李元庆与刘国柱、韩大德、郑文林等十名代表首次与孔见面时,明确提出“开封地区沙压严重,人民疾苦,粮是绝对不能出的”,^①请其转呈巡抚收回成命。孔繁杰表面向代表保证代为转呈,暗中却与陈夔龙密谋策划,共商对策。当李元庆等代表第四次赴县府请愿时,官府则明确表示粮是一定要征的,不完粮不行。李元庆据理力争,说开封五门四门沙,一门无沙种棉花,无粮可交。

当多次交涉失败后,农民群众积极进行迎战准备。李元庆一面派出苏全发赴各地分送请帖进行联络,一面先后在神岗集、顺城集、八里湾、治台、李长庄、杜良寨、厂上、十方院等地召集各村代表开会,商讨对策。当时祥符全县共有七十二社,黄河以南共五十四社,黄河以北有十四社,黄河以南五十四社皆派代表参加会议。会上代表们共同商定,禁止米、面、柴草运入开封城内,如违禁私运没收粮草,车辆焚毁。若遇敌情,以鸣钟传帖为号,各村协调行动,相互支援。各村农民严密把守交通要道,不许粮草进城。致使开封城内物价飞涨,一片混乱。陈夔龙、孔繁杰一面派人混入农民队伍内部刺探情报,伺机破坏;一面密谋派兵镇压。为了鼓舞群众斗志,李元庆决定召开群众大会。会前发出的传单上写道,开会期间“大家都要停犁住耙”。“击钟为令”,“一村打钟,各庄齐鸣,钟响出发”。^②九月二十四日,在距开封二十五里的薄酒店泰山庙前召开了群众抗粮大会。上午各村群众数万人聚集在广场上,李元庆在群众欢呼声中站在石狮上对大家说:“开封地瘠民贫,五门四门沙,

① 《一九〇四年开封(祥符)抗粮运动》(手写稿),存开封市地方志编委会。

② 同上。

一门无沙种棉花,用什么交粮?”“我们要活下去!我们要求巡抚陈夔龙收回成命,一天不收回我们不准一切柴米粮草进城。”“今天我们全是兄弟了!”“有福同享,有祸同担,打死老虎同吃肉,打不死老虎同受伤。”^① 这时恰逢清兵押送粮草进城途经村边,愤怒的群众当即放火烧毁。会后,李元庆发动群众将“茶岗、小黄铺、招讨营等处电杆砍毁十余里”^② 以示反抗。李元庆伙同抗粮群众代表商定,利用十月一日“城隍出巡”庙会四乡群众进城赶集赴会之机,里应外合起事。但举事计划被官府侦悉,陈夔龙惊恐万状,一面急令关闭开封城门,实行戒严,派兵日夜防守;一面调遣常备军驰赴开封东乡弹压。^③ 当李元庆于晚间得知清军即将血洗治台村时,当即鸣钟报警。一时间钟声四起,由近及远。各村回汉农民闻声而来的约万余人,他们手持锄头、桑杈、铁锹、木棍、大刀、长矛等作武器,飞快汇集到治台。李元庆在清真寺门前召开了各村首领会议,布置战守,声明纪律。十月一日清晨,清军包围了治台村,抗粮群众面对荷枪实弹的清兵毫无畏惧,蜂拥直前与官兵展开激烈巷战,“击毙弁兵崔振河等数名”,“并夺去、砸毁毛瑟枪各一杆”,^④ 多次打退清军的进攻。终因敌我装备悬殊,在清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开始溃散。在治台血战中,抗粮群众死伤二十余人,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抗粮斗争被反动统治者镇压下去了。

抗粮斗争失败后,陈夔龙对抗粮群众进行了残暴的屠杀和迫害。他严令缉拿李元庆,但李在拳师丁仁的保护下安全转移,后又

① 《一九〇四年开封(祥符)抗粮运动》(手写稿)。

② 《梦蕉亭杂记》卷二。

③ 同上。

④ 《河南巡抚陈奏查办祥符县东乡地方匪徒借端煽聚折》,载《东方杂志》二卷一号。

化装到杞县玉皇庙、曹庄清真寺等地活动,以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嗣因缉拿甚严,他又不愿家族、亲属遭受株连,年逾花甲的李元庆遂在“陈留县韩岗白马庄村外旷地桑树上”自缢身亡。陈夔龙对李仍不放过,令“将其尸身押解来省,飭令戮尸传首犯事地方”,^①借以威吓群众。事后官府逮捕李元庆亲属及抗粮群众五十二人,陈松当堂死于严刑之下,治台村清真寺教长洪福海被诬以“知情同谋”,“玩法已极”的罪名,被判监禁二十年。一时间腥风血雨笼罩了豫东大地。

李元庆领导的祥符农民抗粮斗争,历时一月之久,先后与陈留、通许、杞县、中牟、郑县(今郑州市)、彰德(今商丘市)、封丘、孟县、滑县、武陟、阳武等州县农民取得了联系。影响所及,陈留、考城、安徽的颍州(今阜阳市)、亳州等地,都爆发了群众性的斗争。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取消了先前勒令补交的“欠赋”,知县孔繁杰暂行革职,知府石庚记大过一次,巡抚陈夔龙办事操切,几酿巨变,调离它用。

李元庆的斗争事迹,受到广大回汉群众的赞扬。建国前,以反映李元庆领导农民抗粮斗争为内容的豫剧《大誓薄酒店》曾在通许、陈留乃至徐州等地上演。“李元庆造反”的故事,在民间更是广为流传。至今开封一带还流传着“中牟通许硬似铁,治台出了个李大爷”的民谣。

〔答振益〕

^① 《梦蕉亭杂记》卷二。

现 代(上)

一 马骥云

马骥云(1883—1952年)武昌首义志士。名少青,以字行。河南固始县人。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为生活所迫,清末流落武汉,入新军第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当兵。他痛恨清政府的专制腐败,同本标高尚志、杜武库等富有革命思想,常相过从,作排满活动。1906年参加日知会,同年5月在汉口参加了同盟会湖北分会,为湖北早期同盟会会员之一。12月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在湖南发动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日知会因密谋在湖北响应,于1907年1月被查封。为了继续坚持斗争,马骥云、陈人杰等人组织了振武尊心社。1908年,为统一分散的革命力量,二十九标中各革命团体合并为军队同盟。其领导层除标代表外,下设交际、宣传、登记、军备、庶务五个组,马骥云为登记组负责人^①,是该组织重要领导成员之一。1909年马骥云加入孙武等人在汉口发起组织的共进会,其在武昌县华林住处奇英学舍,是共进会秘密活动机关之一。当时设在武昌黄土坡二十号的同兴酒楼,是专门结纳新军吸引同志

^①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二版。

的秘密联络机关,在侦探密布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前往联系,为在新军中发展扩大革命力量做了不少工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当时湖北两大革命组织都感到有联合的必要。1911年9月24日,马骥云作为二十九标和共进会的代表,参加了在武昌胭脂巷机关部召开的共进会与文学社的联合大会,会上商订了起义日期,制定了起义计划^①。内定起义领导机构及起义后军政府组成人员时,马骥云被推为军事筹备员和军政府的司勋。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原为文学社总机关部,被定为起义时总指挥部。马骥云作为军事筹备员,冒着极大的危险常到此处,研究起义时队伍具体部署等有关事宜。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赶制炸弹,不慎爆炸。沙俄巡捕闻声赶到,将枪支、旗帜、册籍、文告全部搜去,秘密机关遂遭破坏。清吏根据沙俄巡捕房提供的名册,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在这千钧一发时刻,马骥云等人挺身而出,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并很快将汉口共进会机关被破坏之事告诉了武昌革命党人,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0月10日,武昌首义打响后,马骥云积极参加了攻打督署衙门的战斗。他率部“以必死之心冒敌人炮火喊杀前进,攻至督署辕门以内”^②,取得了武昌首义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其后,他又率队参加了攻占善后电报局的战斗。11日汉口光复后,马骥云参加了汉口军政分府的领导工作。武昌起义胜利后,旧官僚黎元洪,立宪派汤化龙利用革命党人软弱幼稚,窃取了军政府的领导大权。以蔡济民为首的革命党人组织了与立宪派、旧官僚相抗衡的决策机构谋略处,作为继续推进革命的领导核心。谋略处组成人员都

① 参见蔡寄鸥《鄂州血史》;《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二版。

②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二版。

是武昌首义前后革命的核心分子,马骥云作为革命党人的代表参与了谋略处的工作^①。民国元年春,马骥云任新扩建的鄂军第四镇第八协协统,兼施(恩施)鹤(鹤峰)宜(宜昌)稽查使。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为削弱革命党人军权,1913年把他调往北京陆军部任部附闲职。据1913年邓玉麟致北京稽勋局函中记载,辛亥有功人员分甲乙丙丁四种,共685人,马骥云列甲种136人中第35名^②,可见其在武昌首义中的地位和作用。1916年,马骥云在武汉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在湖北反动统治的斗争。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马骥云继续追随孙中山坚持革命斗争,任大元帅府参事,兼豫南剿匪第一路军司令,积极准备参加北伐。1927—1929年间,任第六路军总指挥部秘书处主任。在此之后,他绝意于仕途,定居武汉靠行医为业。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占领武汉后,曾动员其出任伪职,被他断然拒绝。建国后,任湖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52年病逝于汉口。

[答振益]

^① 《辛亥革命回忆录》(四)。关于谋略处的成立,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均有记载,但所述组成人员不尽相同。

^② 邓玉麟《致北京稽勋局公函》,载《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丹鹏晏^①

丹鹏晏(1888—1911年),乳名根柱。开封市人。体壮身长,有侠士风。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之一。

丹鹏晏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姐弟四人,依靠母亲在学院门开茶馆度日。这里乃各方人士荟萃之地,谈天说地,比古论今,有一说书人经常在此讲绿林英雄豪杰除暴安良之事。鹏晏常听之人迷,想效法豪杰为民除害。他到清真东大寺拜武术名家李占发为师,勤学苦练,十四五岁即长成为身高体壮的英勇小伙子。

光绪三十年(1904年)秋,河南巡抚陈夔龙向开封一带农民加征粮款,激起四乡农民的不满,公推治台村回民李元庆去县衙交涉取消加征粮款之事,遭到祥符县(今开封)拒绝。入冬,李元庆和治台村清真寺洪枢海阿訇商议抗粮斗争。在东乡薄店村召开四乡农民大会,参加者万余人。决议抗粮罢市,不准米粮柴草入城,并砍毁电线杆十余里,切断开封与外界联系,引起城内恐慌。清军副将杨荣泰于夜间带兵包围治台村,向群众开枪,死伤多人。李元庆逃到陈留县(今属开封县)后自杀,洪阿訇被捕判刑。此时,年已十六岁的丹鹏晏认为行侠仗义时机已到,积极参加斗争。清军进攻治台时,他乘夜逃往山东曹州(今菏泽)躲藏。

清末,河南东部农村纷纷成立红枪会、白枪会、花枪会等组织,保护村庄。反清的秘密结社——仁义会也逐渐壮大,在抗粮中,鹏

^① 本文参考书目:陈夔龙著《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河南文史资料》第六辑、第七辑(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白宗正著《丹鹏晏烈士传略》(《河南省民族宗教史志资料通讯》1984年第1期)。

晏结交不少仁义会人员。从曹州返回开封,认识仁义会头目于化龙,参加仁义会,被派往朱仙镇,以做生意为名,暗中发展会员,并担任区分部首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仁义会准备在开封东乡组织起义,由于叛徒出卖,于化龙等被捕牺牲,更加深丹鹏晏对清政府的仇视。他到理事厅街的沧浪池澡塘当堂倌。各地不断爆发起义,清政府加强统治,公共场所中张贴“免谈国事”条子,人们禁若寒蝉。革命者暗中奔走联络,等待时机。

1908年,同盟会河南支部为了发展河南革命力量,派杜潜(字扶东,封丘人)回开封,很快发展会员二百多人。东京同盟会总部策划在武昌举义的同时,还作了通盘的筹划,推动南北各省起而响应。河南支部派刘积学回开封执行这项任务。1911年夏,张钟端也奉派回国参加辛亥起义,并被推举为革命军总司令。

同盟会河南支部负责人之一的王庚先常去沧浪池澡塘洗澡,丹鹏晏逐渐取得王庚先的信任。王向鹏晏讲全国的起义形势及各地的反清斗争,使鹏晏又激起反清斗争的信心和决心,表示愿率自己的仁义会区分部五百弟兄参加反清起义。王庚先把丹鹏晏介绍给张钟端。12月20日(辛亥年十一月初一),革命军总部委任丹鹏晏为民军敢死队队长,任务是率仁义会五百名敢死队员于12月22日夜埋伏在西南城坡新法政学堂之中,以火起为号,率队向一里之外的河南巡抚衙门进攻。

12月22日晚,起义活动已安排就绪,革命烈火就要爆发之际,混入起义军中的奸细、清军开封巡防营总稽查张光顺向巡防营统领柴得贵密报,河南巡抚齐耀琳指使柴得贵率兵数百名于夜11时包围设于开封优级师范学堂之革命军司令部,进行严密搜捕,共捕数十人,丹鹏晏也在其中。丹鹏晏被捕后,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慷慨陈词:“本想推翻满清,建立革命大业,今为革命而死,我不悔

恨。”12月24日，风雪怒号，天地暗惨，人们莫不为之哀惋。十一位烈士沿途高呼：“革命万岁！”“共和万岁！”丹鹏晏与张钟端等在开封西门外英勇就义。临刑时他坦然地要求告诉老母，以伊斯兰教礼埋葬他。清政府要使烈士们暴尸示众，看管很严。其母李氏请人于雪夜中把丹烈士遗体抬至回回寨村他外祖父家中，按伊斯兰教礼葬于回回寨村。

辛亥革命胜利，民国元年5月初，河南都督同意向烈士家属发抚恤金。丹烈士之母不识字，在领抚恤金时登记人不知有“丹”姓，把烈士之名写为“单鹏彦”，一个名字错了两个字，连姓也错了。刻碑时也无人更正。

附：河南辛亥革命十一烈士遗骨于1932年12月迁葬开封南关墓地时，曾立碑纪述传略。丹烈士传略照录如下：

单烈士鹏彦传略

烈士单鹏彦者，先开封人也，居学院街，世奉天方教。少失学，家贫至不能为衣食。稍长，逢人问字，渐悉家国事。汴垣有仁义会者，志在光复。烈士隐身茶肆，倾心结纳，遂充该区分部首领。当是时，革命潮流弥漫全国。乃王庚先等组织秘密机关，烈士携会中壮士五百人加入。辛亥十一月朔，总部委为民军敢死队队长，令初三夜屯集西南城坡新法校中，俟火起，攻督署，事泄被捕。临刑从容谓众曰：“本欲推翻满清，建革新大业。事败而死，乃吾分，无所恨。寄语老母，仍以教礼葬我。”母李，年七十有二，哭子丧明，家计甚萧条云。

赞曰：封崔崔邪，坎在中耶，繫君之官邪。后之过丘墓而凭吊者，其闻君之风邪！

马玉贵^①

马玉贵(1885—1957年),字青山,湖北省谷城县城关文风亭人。兄妹五人,青山行四。自幼家境贫寒,三岁时丧母,五岁又丧父,随大哥马玉山生活。光绪末年,因生活所迫,入伍为新军,几年以后,由湖北分到西安,在陕西新军二标一营左队任正目,后升为什长。

马青山从小饱尝剥削压迫之苦,具有忧国排满思想。他为人豪爽正直,遇事沉毅冷静,好打抱不平,在士兵中享有威信。参加了反清秘密组织哥老会,与张云山、万炳南诸人同为陕西会党巨子。马青山在新军中和西安回民中积极从事秘密反清活动。宣统二年六月初三日(1910年7月9日),马青山参加了由同盟会、新军、哥老会三方首領在西安大雁塔举行的歃血结盟仪式,焚香结拜,喝鸡血酒,宣誓“同心同德,共同反清”,结盟者称三十六弟兄,加入了同盟会并正式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马青山作为新军、哥老会和西安回民的首領,参加大雁塔结盟会议,加强了哥老会与同盟会的联系,也进一步加强了回、汉民族间的团结。起义前夕,马青山与麦苋街回民杨三等人联系,由回民青年五百余人组成一个营,以小皮院回民邬登瀛为营长,随时准备同革命军一起行动。

西安起义原计划在宣统三年八月十五日(1911年10月6日)行动,因准备不及而推延。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消息传来,西安局势紧张,革命党人临时决定九月初一日(10月22

^① 本文资料根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六册,郭希仁《从戎纪略》;民国初年《国民新闻》、《秦风日报》、《帝州报》等。

日)发动起义。马青山参加同盟会、新军、哥老会三方首領在西安西郊林家坟召开的会议,决定立即发动起义。马青山率领新军和城内回民积极投入战斗。特别在第二天,起义军强攻满城,城中数千名旗兵拼死抵抗。马青山了解到大小差市之间有一小段城墙早年崩塌,后来为一私人住宅后墙填补,当即令士兵把后墙挖开,马青山与另一起义军首領刘世杰率先領兵冲进满城,经过酷烈的巷战,为起义军拿下满城光复西安立下了第一战功。

由于同盟会人员较少,起义过程中新军里的哥老会成为战斗主力,而新军原有之组织、建制已荡然无存。哥老会首領万炳南、张云山和马青山等人的哥弟遍于新军之中,这几位首領自然地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中万炳南、张云山等人认为起义成功,陕西已成为哥老会的天下,革命军政府的最高权力应属于自己,以至于同盟会与哥老会的关系紧张起来。马青山恳切表示既不为名,又不为利,积极靠拢同盟会,并协调哥老会与同盟会的关系,避免革命阵营的分裂。

陕西革命军政府成立,马青山被推举为“秦陇复汉军总理粮饷兼管军务大都督”。他不断维护同盟会与哥老会两支革命组织的团结,还十分重视陕西回、汉民族间的团结。西安回民一千多人参加了光复之役,为创建民国立了功勋。复汉军政府在安民告示中强调“汉回人等,一视同仁”。由于同治年间回民起义的影响,西安回汉关系仍有隔阂,辛亥起义时有人乘机造谣,说什么“回回要造反”,“杀完旗人杀回回”等等,西安回民惶惶不安。马青山多次在南院门等处向广大汉、回群众演说,讲明推翻清朝统治,各民族团结一致,创建民主共和国的道理。并以都督名义,发布《严禁挑拨回汉关系》告示,指出:“此次兴兵举义,宗旨复汉灭清。回汉不分畛域,早经宣布分明。近有无赖之徒,竟敢捏造凭空。扬言回汉不

和,是非播弄于中。……倘再造谣生事,拿获立正典刑。”马青山的严令使坏人受到威慑,回坊人心趋于安定。

陕西是响应武昌起义最早的省份,西安光复不久,就遭到清军的东西夹攻。马青山派参谋谢彩臣带领卫队两营回汉战士数百人赶赴华阴,参加收复潼关的战斗。马青山率所部一标及炮卫队一营,驰援西路。十一月,在乾州,复汉军分三路向甘军反击,张云山为西路,张凤翔为中路,马青山为东路。十五日会战时,马青山率所部回、汉将士数百人,突入敌营,因其他两路接应不上,后继无援,而被数千名甘军包围。马青山誓死督队,卧地不退,振臂高呼,奋勇杀敌,赖官兵用命,杀出重围,驻守礼泉。这一战青山腿部受伤。在西线战场上,马青山以骁勇善战而闻名。一次,他带二百余人巡哨,忽遇清军大股约二千余人前来,与之战于唐陵之北,对峙四小时,毙敌数百。又一次,他率所部与敌遭遇于抑密,即令士兵占据有利地势,节约用弹,不准妄发一枪,敌军连冲数次,均不得逞。待其接近时,下令用开花炮击其前锋,无一走脱者。至晚收队,我军无一伤亡。当时人们称赞这次战斗是“自军兴以来,未有如此之万全也”。

在西线战场上,与秦陇复汉军对峙的甘军主力是马安良率领的以河州回民为主体的十六营振武军和崔正午率领的以张家川回民为主体的五营骁锐军。马青山以回民关系,请西安清真寺三位阿訇,持函去凤翔前线面见崔正午,劝其休战。崔正午顽固不化,扣押三位阿訇。三人策反崔的部下后走脱,至张家川面见回民首领李大少(李德仓之子),述说马都督劝崔休战之事。李大少请三位阿訇复命马都督,张家川回民决不效崔正午之所为,如崔正午执迷不悟,将打击其后方,以援陕西革命军。

在马安良的振武军围攻乾州之际,马青山曾多次以回民的身

份致书于马安良,责其“率同胞以害同胞,于心何忍!陕甘交战,辛苦于冰天雪地之中,主客两伤。死丧于弹雨枪林之下,人神之所共忌,回汉之所不容”。马青山并用同治年间清军残酷屠杀回民之历史教训,说明回民与清廷不共戴天,以启发马安良之民族感情,劝其弃暗投明,勿为升允愚弄。马青山亲自在前线向甘军喊话,并让回族士兵把白帽掷给甘军,劝他们不要同室操戈。他还向甘军发了《复汉军总理粮饷兼管军务大都督马晓谕甘军示》,讲明“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保民者王,殃民者贼”。“仰回、汉诸军均知,但能舍逆从顺而来,无不推心置腹……与之重饷。他年爵赏,共指河山”。马青山以回民关系,对马安良、崔正午及其所部的分化、争取工作,是促成马安良决心停战的主要因素之一。

民国元年(1912年),甘肃宣布拥护共和,马青山代表陕西革命军政府亲去兰州,与甘肃方面达成停战协议。他多次在甘肃各界人士欢迎会上和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揭露清朝封建统治的黑暗、腐朽和对回族人的压迫、屠杀,热情歌颂创建中华民国与五族共和的伟大意义,呼吁西北回、汉各族捐弃前嫌,加强团结,建设国家。在兰州,马青山同马安良、马福祥等回族将领互换庚贴,结为金兰之好。

民国二年(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讨袁的二次革命。8月初,川军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陕西军政府为了讨好袁世凯,也为了借此机会削弱马青山的兵权,派他率一个混成协(相当加强旅)入川“讨伐”熊克武,当马青山率军经秦岭过栈道于10月中旬到达四川夔州时,熊克武早已放弃重庆他往。此时,马青山被袁世凯电召到北京,面见袁世凯的第二天,被扣押于军警执法处;罪名是“援川不力,逗留不前”。实际上是四川前线军中有人陷害和夺取兵权。据马青山后来回忆,可能由于自己是河南口音,才没有被

处死。不久改为软禁,袁世凯死,恢复自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马青山为陆军部少将咨议的职务。

马青山在北京被扣押,是他一生中的大转折,保住了性命,却丢了在陕西的权势。陆军部咨议只是空衔,闲居北京,一面与马福祥、马鸿逵等西北回回上层在官场上应酬,一面又与著名阿訇王浩然往来谈论教门。1923年马福祥任绥远督统时,马青山任警备司令、参谋长和副官长。北伐战争期间,任马鸿逵师的参谋长。1933年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马青山任参议闲职。

建国初,马青山已年近古稀,闲居北京,终日礼拜养身,过着悠闲安静的生活,1957年9月25日患脑溢血去世。寿千为父亲立碑,碑文曰:“忆昔日辛亥首义,念七树勋,都督秦疆,声威显赫;看今朝革命成功,古稀归真,安厝京郊,身后哀荣。”

〔马寿千〕

赵钟奇^①

赵钟奇(1878—1970年),字毓衡。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6月24日),卒于1970年8月26日,享年九十二岁。为辛亥革命、护国运动中的回族爱国名将。原籍云南省赵州(后改凤仪县,现属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出生在一个回族农民家庭。童年时代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清廷腐败,杜文秀领导以回族为首的,联合各民族反清起义被镇压失败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遭受压迫,培育了他不满现状、反抗压迫、追求进步的思想性格。1898年考上秀才。1901年23岁时补廪生。他读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提高了文化修养和明辨事理能力,但他未停滞或拘泥于这些旧思想和道德规范,而是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立志报国开辟未来。1904年他被地方官费选送日本学习军事,先后进入日本振武学校、士官学校七期,与李根源、罗佩金、唐继尧、顾品珍、张子贞、谢戎翼等人同学,在此期间与湖南的蔡锷、四川的熊克武等人,都有友好往来,于1909年毕业。在日留学期间,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了“中国同盟会”革命组织,赵钟奇参加了同盟会。为促进回族人民继续革命,于1907年相约在日本的回族青年三十六人,在东京组织了“留东清真教育会”,公推东京政法大学的回族青年保廷梁为会长,他与王廷治、孙永安都是教育会的重要成员。他们创办了刊物《醒回篇》,提倡经书两通,改革经堂旧制,发展民族教育,要求把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和发展有回族特点的民族新文化。《醒回篇》里,字里行间、时时暗示民族革命的思想。1909年在日

① 本文材料主要来自《云南回族史》。

本土官学校毕业,赵钟奇受同盟会派遣到保定军官学校当教官。1911年转入新军,任团参谋长,驻上海与陈其美联系。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在上海发动起义成功任沪军都督,赵钟奇任第十一军先遣队参谋长,在上海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赵钟奇因功晋升为第四旅旅长。1912年7月回到云南,经蔡锷任命为督署代参谋长,兼任云南讲武堂第四期生徒队队长、战术教官。1913年蔡锷离滇,唐继尧任云南总督。大理哥老会首领杨春魁勾结新军第四团第三营兵变,唐认为赵钟奇是大理人,情况熟悉,在地方上有威望,派去解决兵变。他率一个加强混合团,星夜赶往大理使叛乱迅速平息。晋升为陆军少将。1914年被任命为陆军第二师少将旅长,1915年8月被任命为驻滇西卫戍司令官。

1915年袁世凯篡夺革命恢复帝制,云南省政府12月25日通电全国,宣布云南反袁称帝,开始了护国运动。当时军队由师长张子贞、刘祖武,旅长赵钟奇、孙永安、刘云峰联名发出“铲除帝制,重建共和”的通电,反映了反袁斗争的坚定性。云南宣布反袁护国后,立即组织了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任三军总司令的“云南护国军”。赵钟奇原编第一军第一梯团,下辖华封歌、李植生两个支队(团),但唐继尧将赵钟奇的梯团留下,委以重任。1916年1月龙济光进军云南,赵钟奇率李植生支队,配合挺进军的杨述、叶成林两个纵队,向滇东南阻击龙济光军,在广西境内经过激战,击溃敌军。1916年4月奉调贵州永宁支援蔡锷,与顾品珍一起向川军进攻,攻下资阳后,转而包抄张鹏舞部取得胜利。与顾品珍会师简阳强攻全歼敌军和击退王陵基援军,占领成都。蔡锷正式就任四川督军职务,赵钟奇以功升督署参谋长。1917年1月北京政府为护国有功人员晋级授勋,以示羁縻,晋升赵钟奇为陆军中将,授二

等文虎章。1917年唐继尧组成靖国军自任总司令,以便恢复对四川的统治,派韩凤梧、刘云峰、赵钟奇为一、二、三路军司令。1918年赵钟奇调任永宁道尹,1918年7月为靖国军第二师师长,左翼总司令。1921—1922年顾品珍入主云南军政,任赵钟奇为云南盐运司司长。在旧社会,这个职务是肥差,专授予对长官效劳或有战功的人,以示优待,但赵钟奇处脂不润,依然两袖清风,实属难得。1922年龙云主持滇政,聘赵钟奇为滇西宣慰使,后又委为腾越道尹。1931年全国取消道尹制,加之国民革命蜕变为军阀混战,赵钟奇毅然弃政归田,乡人列队迎接,可见他人望之隆。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抗战。龙云于8月间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回滇后,新组建五十八、六十两军,出师抗日,当时急缺下级军官,特聘赵钟奇为全省高中以上学生集训总队总队长,加强学生后备训练,学生经短期训练后多数考入军官学校,再经训练即派往部队。这些经过训练的学生在抗日部队上,均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从1931年起赵钟奇就被选为云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与议长李鸿祥均是德高望重的人。解放战争时期,卢汉主持省政,赵钟奇担任高等顾问,卢汉准备起义,他多予阴助,事遂有成。

1950年初,赵钟奇在凤仪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陈赓、周保中信函盼赴昆襄助国事。与此同时朱德总司令派人持函到昆明找赵钟奇,他到昆明愉快地参加了革命工作。1950年间,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分别签署命令,先后任命赵钟奇为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1年被邀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接见。1964年他担任云南省第三届政协常委、副主席。从1954年起至1958年、1963年,他连续当选为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直到1970年以九十二岁高龄逝世于昆明。

赵钟奇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不顾年迈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积极以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协助党和政府做各方面上层爱国人士的工作,起到了党组织难以起到的特殊作用。他以崇高的威望和影响,主动促进民族团结,积极做好回族内部的团结;他关心、帮助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解放初期城市回族青年失学、失业的多,在他建议下,云南民族学院开办了回族青年专门班,毕业后参加工作,这些回族学生现在已成为各级组织的骨干和领导。他还关心回族文化的发展,1952年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他积极主张回族男女青年婚姻自主,可以回汉通婚,以利于民族间交往。他不断得到党中央的关怀爱护,曾多次赴北京出席人代会,朱德总司令均以师生弟子礼相接待,并请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与他合影留念。1957年朱总司令来滇视察工作,邀请赵钟奇等辛亥革命老人聚会,征求意见畅谈往事。他的思想境界经历了三次转变,由一个受压迫的农民儿子,转变为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反对帝制,拥护孙中山。解放后,又转变为一个新民主主义者,对共产党由拥护、了解、信任以至热爱,一生追求真理和进步,并随时代前进,是他最优秀的品德。他性格谦和,淡泊宁静,廉洁自持,处脂不润,外柔内刚,坚持原则。所以从军、从政始终贯穿一条红线:追求革命真理,向往进步潮流,热爱本民族,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

[马维良]

二 丁竹园^①

丁竹园(1869—1935年),名国瑞,号竹园,字子良。北京人。“幼学诗书,聪颖过人。受其叔父影响,青年时代便研习中医,且颇有造诣。”1895年到天津谋生,曾任正兴德茶庄司帐,与资东穆竹荪交往甚密;又在津行医,对内、妇、儿科均精通。1906年联络同业成立医药研究会,并以其居处为诊所,名“敬慎医室”,在天津医药界声名日隆。

丁竹园行医不忘爱国,“以医济人”,“以言济世”,1897年起以“竹园演说”著文,刊载于天津《直报》、《中外实报》;1902年后又不断为《大公报》、北京的《正宗爱国报》撰写文章,“议论国事切中要害,开导人心言词诚恳”,以“忧世忧民之苦心,阐发公理,持论正大,规谏政府”,“救国情殷”。1907年更自创《竹园白话报》(次年改称《天津竹园报》),把以言济世、以文救国活动推进一步。

丁竹园议论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时事诸方面;文笔犀利,通俗易懂,深为社会欢迎。其议论内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倡导白话文

白话文是针对文言文而言。在清末,提倡白话文是一种反封建活动,是在文化领域内进行的反封建斗争。丁竹园认为,宣扬爱国,开通民智,要用白话文,因为“妇女小孩不论粗细人,一听就懂”,在“识字的太少”的中国,尤为“启蒙通俗之利器”,而“文言论说皆长篇一片”,难为民众所接受。他的白话演说更有名,被誉为

^① 本文主要据《竹园丛话》和《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四辑上有关资料写成。

“白话名家”。《竹园白话报》是我国早期白话报之一，他是我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和著名实践者。

二、为民说话 为国分忧

丁竹园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国难当头、人民水深火热的年代，救国救民，是他言论和活动的宗旨。他说：“鄙人亦是中国一分子，对于国家的安危，岂能漠不关心。”他痛切陈词、大胆直言，说：“全球最不公最不平的事情，莫过于中国的政治！”“天下最惨最苦的境遇，莫过于专制国的国民！”历史上的人民反抗都是“官逼民反”。辛亥革命前的中国，“遍地是饥民，到处生计窄，省省捐税重，省省冗员多”，“举国贪婪成风，把二十二省，弄成一个黑暗世界，民怨积郁”，所以武昌首义一爆发，“到处响应势如破竹”，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丁竹园十分高兴，说：“四五千年的君主专制国，一变而为民主共和国，自有中国以来，这总算是第一次万象更新。”但现实发展使丁竹园大失所望，他感慨地写道：“自去年武昌起义后，我对朋友说，此中国最后之希望也。不料百日之后，即丑态百出。或陆地硬要行船，或甘做外人傀儡，或名为救国而实乱国，或阳示改革而阴实破坏，或意气用事不顾大局，或借端诈财鱼肉百姓。……而旧日之贪官污吏马屁手，反而任事当权。”他明知“言出祸随”或“因言贾祸”，仍直言不讳，将“个人之利害祸福，惟置之度外而已”，并说“凡是干报馆的人，莫不全家豁出身家性命，牺牲利益幸福”，丁竹园就是这样一个人。

三、正确看待国家和宗教的关系

清代，回民由于遭受残酷民族压迫和宗教迫害，经常起义反抗，流行“争教不争国”的口号，意思是起义为保卫教门，不是为争夺政权，而保卫教门亦即保卫民族生存。后来列强入侵，中国面临被宰割的命运，丁竹园出于强烈爱国意识，高呼“保国即是保教，爱

国即是爱身”，说：“无论那一教，既是中国民，就当同心努力地维持我们国家大事。没了国，还能保得住教吗？”又说：“在中国清真教的人奉的是清真教，可全是中国的国民，……把国家维持得强盛了，教门一定亦跟着发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理解国家和宗教的关系，认识上取得飞跃，丁竹园不愧为回民先进分子。

四、化除畛域 共图国强

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特别是清朝统治者的挑拨和分而治之政策，回族和汉、满等民族的关系有时十分紧张，甚至冲突流血。丁竹园作为回族先进知识分子，强调中华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以抵御外侮，维护国家独立、民族生存。他说：“中国欲自立，非通国的人民，结合团体不可”，而要结合团体，“最要紧的，是先要化除界限，不必分满汉，亦不必分回汉。只要是中国人，你就算沾中国的水土之恩，就应当掏出忠心来，保卫国家。若是各分畛域，岂不是自灭势力吗？”又说：“以后不论满汉，务必要化除界限，……不结团体自顾自，终归是一同当苦力。”把民族团结的重要，说得入木三分。在中国，民族和宗教有密切关系，民族团结往往体现为不同宗教信仰者间的合作。丁竹园说，各族各教“自当以国事为重，各信各教，各享各自由，井水不犯河水，何苦无故的结怨为仇呢？”这种各行其是、互相尊重的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民族宗教观。丁竹园还为满族劳动人民说话，反对不加分析的“排满”，说“满汉本不当分”，“愿革命军，不必显以排满为宗旨，须以改良政治、剪除贪官为前提”；满人“把持政柄的固多，而颠连困苦的穷旗人，仍居大多数，吃一份七折八扣的钱粮，连饭都混不饱，今天同他们一起受罪被祸，未免冤屈一点儿”。这种符合今天阶级分析的观点，在当时更属难能可贵。

五、改良宗教 发展教育

改良宗教、发展教育是当时回族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观点，“留东清真教育会”的宗旨即宗教改良、教育普及。丁竹园亦持此观点。他认为，当时回民中“念书的太少”，“念经的太多，教民的负担太重”，应“多立小学堂，……念书的一多，自然就容易筹生计了”。还认为：“念书最能兴扬教门，不念书最能败坏教门”，“清真教的诸君，以后务必多多的提倡教育，提倡实业，但求教育与实业日见发达，宗教亦就自然的光荣了。”大声疾呼：“千万在生计上多多的注意，空谈宗教，那是靠不住的。”回民设立的团体，应“专以谋普及教育之发达，与教中人生计之稳固为宗旨”。这是当时流行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想的表达，是丁竹园为受苦受难的回族大众开出的寻求出路的良方。

丁竹园一生爱国，“以言济世”，用过的笔名有“穆思霖”、“清真教人”、“愤民”、“杞忧生”、“报奴”、“候补亡国奴”等，反映了他不同时期的心态。1923年，将其几十年发表过的文章，汇编成《竹园丛话》，由敬慎医室印，共二十四册，成为我国报刊史、白话文运动、回族文化史的珍贵资料。竹园行医一生，“以医济人”，据多年实践经验，配制“丁制坤顺丹”、“舒肝平安丸”等成药十多种，还写有《说疫》、《治病捷要》等医著，丰富了我国医药学宝库。

子叔度，承父业，仍以行医为生，医室仍名“敬慎”。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第二中心医院中医科主任，被选为天津市人民代表。1957年去世。

〔李松茂〕

丁宝臣

北京回族人士丁宝臣,是我国早期的白话报倡导者之一,由他编辑的北京《正宗爱国报》,从各方面揭露了封建官僚和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及他们的丑恶面貌,因而,他的行动遭到袁世凯的仇视,终于被害。

丁宝臣,名国珍。清光绪元年(1875年)生于北京德胜门外西村一个小商人的家庭。父丁庆恩,母魏氏;均有相当文化程度。丁宝臣兄弟四人,长兄丁子良,名国瑞,号竹园;丁宝臣行二;三弟丁绍三,名国璋;四弟丁子瑜,名国琛。丁庆恩夫妇认为回回路子窄,做小生意的穷人太多,有文化的人太少,因此,从小就教子女读书识字。

丁宝臣五岁时,其叔父丁庆三五岁的儿子不幸夭亡,丁庆恩夫妇恐丁庆三忧伤过度,故将丁宝臣过继给他。

丁庆三的外祖父是清廷太医院御医,丁庆三自幼在外祖父家学习文化和中医,后来,丁子良与丁宝臣亦随叔父学医。学成以后,丁子良在天津行医,丁宝臣在北京行医。

丁宝臣的父母和叔父在回民中都是比较进步的,受他们的影响,青年时代的丁宝臣虽然以行医为业,但他更关心国家的命运。甲午(1894年)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廷的腐败,人民生活的苦难,使他忧心忡忡;庚子年间,席卷华北的义和团运动,极大地振奋了民气,也使丁宝臣兴奋不已。但当他看到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封建统治者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中国人被大批屠杀的惨不忍睹的情景,愤恨之余,更激起他恨国不强之感。叔父丁庆三对他说:“行医行善,其善有限;其他行善,亦然如此。若有大权,可行大

善,亦可为大祸;汝当想万全之策!”又说:“欲救国救民,不可只限回族。”在丁庆三的影响下,丁宝臣毅然弃医,于1906年12月在北京创办《正宗爱国报》,自任主编,由其长兄丁子良及四弟丁子瑜任副主编。后丁子良又在天津以行医为正业,兼办天津《竹园白话报》。《正宗爱国报》和《竹园白话报》以老百姓易懂的语言,首开白话办报的先河。弟兄俩以这两报为阵地在北京互相呼应,互相支持,宣传爱国保国、爱民保民的思想,并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唤醒民众觉悟,追随着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同改良主义保皇派展开斗争。

1912年(民国元年)8月24日,孙中山先生应袁世凯之邀由上海抵达北京。《正宗爱国报》对孙中山先生的此次北京之行报导甚详,从8月底孙先生抵达到9月中离京,几乎每天都有他活动的消息,不仅在当时向北京民众宣传和介绍了这位革命先行者的思想和风采,也为今天我们研究孙中山先生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9月2日,北京报界举行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欢迎会结束后,孙中山先生与北京报界负责人合影留念。《京话报》主编彭翼仲、《正宗爱国报》主编丁宝臣等参加。

1913年,孙中山先生发动反对袁世凯独裁的“二次革命”。丁宝臣主编的《正宗爱国报》成了国民革命军兴兵讨袁的喉舌。它大量报导各省来电兴兵讨袁的新闻。如: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独立;黄兴发动江苏督军程德全在南京、安徽、江苏独立;各省相继并发革命等消息,报上均有反映。报纸同时揭露了袁世凯所谓“善后”借款成功,是用以扩充军备。

1914年(民国三年),袁世凯下令修缮太和、保和、中和三大殿,祀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露出袁世凯企图登极做皇帝的端倪。当时京师大学堂的刘廷琛写了一篇《复礼制馆书》,劳乃宣发

表了《正续共和论》，宋育仁发表演说，公然宣传“还政于清”，在紫禁城内还出现了一个“筹安会”，一时间复辟舆论甚嚣尘上。

在这种情况下，丁宝臣以《正宗爱国报》为宣传工具，用种种形式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他以“鲤鱼跳龙门”的传说为题发表文章说：“龙门虽可跳，可惜你是乌龟”，用辛辣的语言讽刺袁想当皇帝的野心。他还写有《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文章，反对封建的血统论。这些文章引起袁世凯对他的仇视。

当局欲缉捕他的消息传来，丁庆三曾要他到天津大哥丁竹园处（法国租界地）避难。但他认为“革命者生而何惧，死而何怨！”“要鼓起勇气勇往直前。”“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①万事休。”就是说只要活着就用自己的志气干革命，直到一死方休。他还认为人活着可以看见自己所作诸事，死了也就看不见了，故他在生前躺在“水流子”^②上照了一张像，以便看看自己死后是如何情况。这种举动，也表现出不怕死的勇气和决心。

1914年7月1日，丁宝臣终于被捕。被捕后，《正宗爱国报》报社即被查封。当时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各商号以成美号刘记货栈经理刘竹溪、杨春和为首，及丁宝臣好友杨书堂、刘幼溪等多人联名，想营救丁宝臣。经多方联系，闻京师警察厅索要银元一千元，并需联合铺保百家。刘竹溪等人在两日之内即办好银元千元，联合铺保一百二十余家，呈上后只等放人。不料7月18日，丁宝臣即被杀害（闻系该案解交总统府处理），终年三十八岁。

丁宝臣被杀害后，由丁宝臣两个内弟马志远、马仲安在报社旧址（和平门外大马神庙）将《正宗爱国报》改组为复华印刷所。丁子

① 回民管人死亡叫“无常”。

② 回民死亡后停尸的用具。因入土前净身时，水顺流而下，故名“水流子”。

良回天津行医,继续兼办天津《竹园白话报》,丁子瑜(丁宝臣四弟)在北京德胜门外马甸组织广义学校,自任校长。家中只留丁庆三一人,其他男女老小均逃至天津,以防灭门九族。

丁宝臣是我的祖父。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我的父亲丁少臣常常含着眼泪给我们讲起祖父被杀害的种种情况,在我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故记之。

〔丁文舟〕

蔡大愚^①

蔡大愚(1874—约 1930 年),字冰吾。其先祖淮安山阳人,元季迁江宁,明初迁宝庆,明末清初又迁四川金川县,后定居成都。按清乾隆时蔡氏回族议定字派,应为“开”字辈后裔。出身于伊斯兰教教师家庭。清末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其间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参加同盟会。毕业后,约 1901 年回国。目睹清政府的腐败,他不愿做官,曾与成都土桥家乡好友、回族名流周子宾、马道修等秘密组织民主活动,事泄后,蔡大愚出走上海、北京等地,为“教育救国”主张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同时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历任四川嘉定(今乐山)中学教务长、上海中国公学教员,并创办北平清真第五小学。

1908 年秋,在途经安徽省时,与杨光灿(留东清真教育会四川籍会员)、杨光瓚(清末进士)兄弟邂逅,得知留日回族学生在东京发起组织留东清真教育会时,不禁为之欢欣鼓舞,并欣然为该会创办的刊物《醒回篇》作了序。在序文中阐述了其对宗教的认识,分析了奉伊斯兰教者落后的原因,以及振兴回族的制胜之道等。并对该会的成立寄以很大的期望,“盖以其地为近代讲学之盛,而酬接还又又多天下之俊杰,会设于斯,取资广益,他日教育普及,扶衰救弊,必有异于吾乡所云者。当额手预为同胞贺矣!”(《醒回篇》)1912 年 9 月,作为北京国民党总部派往甘肃的特派员,随甘肃提

^① 本文参考资料:马明晖《一生致力于民族教育的蔡大愚》,见《成都少数民族》(成都文史资料第三十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 年 7 月;王希隆《蔡大愚其人与甘肃护法运动》,载《西北史地》1984 年第 2 期;《醒回篇》。

学使马邻翼来到兰州,筹建国民党甘肃支部。经过努力,国民党甘肃支部于11月在兰州成立。同时,他在兰州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引起了甘肃地方守旧势力的仇视,12月25日,守旧势力把持的第二届甘肃省临时议会通过提案,要驱逐他出境。省督赵维熙“为颜面所碍”,未下逐客令而让此提案暂时作罢。

1913年1月,马邻翼正式委任他主持甘肃法政学堂教务。3月,又委任他为校长。当时,法政学堂一切均不正规,蔡大愚到任后,“始将教授试验等事按部令规定。……严功课,除积弊,遇学款不足或捐己俸为弥补”。并迁移校址,营建校舍,改组科别,使法政学堂逐渐成为一所正规学校。由于他的苦心经营,191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该校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即今兰州大学前身),并正式委任蔡大愚为校长。这时,学校的教师已达三十五人,其中八人曾留学日本,其余也多为北京、天津国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学校开设三十六门课程。其中有不少近代欧美国家法学体系中的课程,如《民法物权》、《民法概论》、《国际法》、《伦理学》、《政治学》等。蔡大愚还亲自担任讲授《伦理学》、《经济学》、《国际法》、《行政法》的教员。该校遂成为传播新思想、新学说的重要场所。

在创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同时,他还积极致力于兰州回民的普及教育事业。民国初年,兰州回民教育十分落后,没有一所正式学校。他和马邻翼于1913年5月12日倡设了“兰州回教劝学所”,下设四所初等小学和一所高等小学,劝学所设四名劝学员,负责动员回民子女上学的事。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他们请甘州镇守使马璘(玉清)任劝学所长,而实际工作则由蔡大愚负责。他亲自为劝学所筹集经费,招聘教员,无论回、汉知识分子,凡愿在劝学所所属学校任教者,必须由他亲自出题考核,合格者方可录用。他还经常到各学校检查教学情况,听教员讲课,抽查学生作业。在

他的努力活动下,兰州回教劝学所所属各学校的教学质量、教育经费都优于其它同等学校,为兰州培养了第一批回民学生,对当地回民普及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当年劝学所回民学校的学生,后来很多都成为甘肃知名人士。

1913年3月,国民党首脑宋教仁被刺杀身亡。9月,国民党发动的反袁“二次革命”被镇压。11月,袁世凯宣布国民党非法,国民党甘肃支部于当月被解散。1914年3月,袁任其亲信张广建取代赵维熙为甘肃省都督。袁世凯复辟称帝后,张又受封为子爵,张广建恃袁仗势,专横跋扈,实行独裁统治,人们敢怒而不敢言。惟蔡大愚不畏强暴,以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姿态勇敢地进行了迎击。1916年春节,他书写了“探卢、孟以为学,羨巢、由而立行”的对联,贴在校长住宅门口,表示自己要研究、探索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的思想,像中国古代贤人巢父、许由一样不与世俗官僚为伍。他在学生中,在社会上多次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自由、科学等内容的演讲,并联系张广建在甘肃的暴政,进行抨击。洪宪年号颁布后,蔡大愚痛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被袁世凯断送,为之失声痛哭。袁世凯死后,张广建开会追悼,蔡大愚写对联予以讽刺。上述革命活动在兰州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张广建的憎恨,1917年6月,张广建政府发布公告,明令禁止蔡大愚宣传民主思想。

1917年,蔡大愚准备以武力推翻张广建的独裁统治。他和法政学校教员杨希尧、赵学普、学生师世昌结为同志,秘密联络狄道(临洮)驻军中的进步军官焦桐琴等,及回族实力派马安良及其子马廷勳组织发动一次武装倒张(广建)运动,这一运动起事前和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护法军政府直接取得联系,得到孙中山的支持,故又称为“甘肃护法运动”。

蔡大愚是这次运动兵变的总策划者,以法政学校为总部,在城内官升巷设“二阳公寓”作为秘密联络点,联系“当时军政学界思想新颖之分子”,并取得一些省防军将领的支持。11月,蔡大愚邀马廷勳、焦桐琴至兰州与赵学普、杨希尧等开会,作了详细的起事计划,决定以焦桐琴负责发动的狄道新建右军和马廷勳负责指挥的循化撒拉族武装为主体,组成甘肃护法军。循化撒拉族武装在冬至节前赶抵狄道,扼守洮河河沿,在冬至节与新建右军同时发难,占领狄道后即向兰州进军,并通电全国,宣告甘肃独立,响应孙中山北伐。起事后政治方面由蔡大愚负责,为壮大实力,由赵学普与其舅父边永福联络狄道地方力量。由杨希尧发动循化隆务寺十二“昂欠”(藏语部落)起兵,策应护法军。还制订了简明军纪。计划制定后,焦桐琴、马廷勳分赴狄道、河州(今临夏)准备。

后因狄道新建右军中“有尹、洪两个班长酒醉走漏了消息,被人向统领吴桐仁告密,吴当即下紧急命令,收去各营子弹。四路派亲信防守,邮电交通全部断绝”。蔡大愚得悉后,命赵学普从河州领得子弹五百粒送往狄道,决心仍按计划起事。

起事前夕,蔡大愚率赵学普、马培清等人,潜伏于狄道西郊二十里铺指挥。但在冬至前一天晚上,赵学普、边永福潜赴城内时,被埋伏的守兵枪杀。焦桐琴在城内听到枪声,误认为是河州军队和撒拉族武装已到达狄道城外的信号,急忙登上营墙开枪联络,枪声引起分统刘忠荃查问,焦在匆忙中当机立断,击毙刘忠荃及连长张承让,急呼部下起事,因事起仓促,士兵畏惧,集合不起来,焦被迫逃走。此时在兰州近郊阿干镇驻防的右军营副胡登云同时起事,率部向狄道进发,在中铺与守军发生激战,伤亡数十人,最终遭到失败。当夜十二时蔡大愚在二十里铺得知事败消息,知已无力挽回,遂与马培清等人潜回河州。马廷勳父子原对起事抱观望态

度,听到起事失败的消息,转变态度按兵不动。后来郑瑞青和杨希尧的起事也失败了。至此甘肃护法运动已告流产。蔡大愚见甘肃护法运动已完全失败,甘肃也不能再活动下去,后由马安良派营长马有禄护送其经藏区回四川成都。

蔡大愚回到成都后,居住在市内状元街青莲巷,并经其堂妹蔡开蓉的介绍,娶新繁县一女子为妻,未生育子女。在成都居住一段时间后,蔡大愚前往广州,任广州军政府咨议、川陕劳军使等职。后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任职。蔡大愚善于学习,追求真理,好书法、绘画,在文字写作方面也有较深的造诣。生活上淡泊自甘,廉洁自持,常在外奔波劳累,生活却很简朴,常以大饼清茶充饥。在南京病逝后,由朋友同事料理其丧事,遗物赠与当地清真寺和贫民。

〔郭嵩明、马明晖(为蔡大愚外甥)〕

刘庆恩^①

刘庆恩(1869—1929年),民国初年兵器专家。字国臣,四川德阳孝泉镇人。祖籍为广东客家人,原本汉族。幼年时入私塾就读,聪颖好学,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因家境贫寒,很快辍学。稍长,随叔父至成都谋生,投赛姓回民门下学习经商业务。赛无子嗣,见庆恩聪明伶俐,善解人意,甚为疼爱,视若义子。赛返还武汉原籍时,庆恩随其赴汉寄居,并皈依伊斯兰教,遂成回民。

刘庆恩虽从赛经商多年,但无意就此求得发展。赛深解其意,且认为庆恩少有壮志,将来必成大器,遂将其送入设在广州的广东陆军学堂学习。经数年苦读,刘庆恩掌握了指挥、操练技能,炮台营建、行军、布阵、攻守之法。特别是对枪械修理制造有着浓厚的兴趣。毕业后,历在益珠、虎门、江阴等炮台任事,参与中日及台湾之战^②。刘在抗击日本侵略战斗中腿部负伤后,辞退军职,返回武汉。因对枪炮修理制造有所专长,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充当技工。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刘庆恩被选中,以官费生资格被派往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成城学校补习日语等课程,后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工科学习兵工技术。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时,刘庆恩率先加入,为同盟会首批会员,积极从事

^① 本文资料除注明出处的以外,均引自马彦虎《“留东清真教育会”三位四川籍会员事略》一文,载《回族研究》1984年第1期。

^② 《致吴敬恒函》,载《蔡元培全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

革命活动。1906年冬,一群四川籍留学生在宿舍里就革命与立宪问题进行争论,周先登虽理屈词穷仍然坚持主张君主立宪,纠缠不休。性情直朴,主张正义,敢于斗争的刘庆恩,“一怒之下,用火铍向他击去,周先登吓的抱头鼠窜而去”。“刘痛击周先登,曾经在留日学生中搏得一致好评”^①。1907年,刘庆恩等来自国内十四个省区的三十六名回族留日学生,在东京上野精养轩发起成立以“联络同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②为宗旨的回族进步团体留东清真教育会,并创办了回族史上第一个刊物《醒回篇》。宣传普及教育和进行宗教改革,在近代回族文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08年刘庆恩由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后,“由汉阳炮厂派来柏林,调查制炮、用炮之术”^③。在此期间,他与当时在柏林的蔡元培过往甚密。当辛亥武昌首义消息传到柏林时,刘庆恩欣喜若狂,他撕毁清朝龙旗,自制两面三色旗交叉置于办公桌上,以示庆贺。当清廷驻德国使馆参赞前往进行干涉时,他理直气壮地回答道:“裂龙旗者,我也,制三色旗者,我也。汝欲目我为革命党,我便是革命党,将奈何?”并拳殴参赞将其逐走。1911年10月中、下旬,蔡元培曾两次致函吴敬恒(吴稚晖),向其介绍陆军四川生刘君的经历和专长。说他“为人颇粗豪,好面斥人过,忤之则饱以老拳”。“然其人实颇机警,在此竭力用功,觅得克虏伯厂所调查中国现有炮位及其实力表,用汉文译之”^④。他依据收集资料,对革命党人及清军拥有各种大炮性能进行比较后,认为要扩展革命力量,必须购买新式攻城炮。蔡向吴建议,将购炮任务交刘庆恩办理。刘果然不负

①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② 《留东清真教育会章程》,载《醒回篇》。

③ 《致吴敬恒函》,载《蔡元培全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④ 《致吴敬恒函》,载《蔡元培全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

重托,很快将购炮之事办妥并运送回国。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根据刘庆恩的革命表现和所学专长,委任他担任汉阳兵工厂(原湖北枪炮厂)总办(厂长),负责兵器生产和研制工作。刘就职后,除正常进行军工生产外,还创办了汉阳兵工专科学校,培养了一批中国自己的军工人才。1915年,刘庆恩主持研制出中国第一支自动步枪,经北洋政府陆军部检验合格后,正式投入生产和使用,刘因此受到政府嘉奖。

刘庆恩为实现自己多年来富国强兵的愿望,随即又提出了研制新式大炮的计划,却被陆军部以种种借口予以拒绝。买办势力为其自身和外国主子的利益,也对刘进行冷嘲热讽,造谣中伤。愤怒之下,刘拿出自己全部积蓄,并向亲友筹措资金作为研制经费。经过努力,克服无数困难和技术难题,终于研制出射程远,命中准确的新式大炮,再次为中国人出了气,争了光。

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列强入侵、军阀混战、人民无权之际,刘庆恩花费大量心血所研制、生产出来的新式枪炮,并未达到其富国强兵的夙愿,却被各派军阀用来作为相互混战和屠杀人民的工具,他为此极为愤慨。1919年5月,在陆军部召开的会议上,他对此予以愤怒谴责。由于情绪过于激动,导致脑溢血当场休克。经抢救脱险后,落下半身不遂后遗症,他即辞去汉阳兵工厂之职,在家休养。一病卧床十载,于1929年4月在上海病逝。他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同窗好友吴玉章,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出面为其治丧。遵刘庆恩之嘱,按照穆斯林丧葬仪式,将其安葬于上海江湾回民公墓。刘庆恩临终前曾作诗一首:

病床难忘救国志,
十年沉痾愿未酬。
老天使我身复健,

诗言志,表明了一位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的兵器专家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爱国情怀。

〔答振益〕

[illegible]

三 马 骏

品学兼优的学生

马骏,字遁泉,号天安。1895年9月12日,生于吉林省宁安县(今属黑龙江省)一个回族家庭里。1903年,马骏入私塾读书,后入马六舟创办的清真两级学校。少年时代的马骏聪颖好学,功课极好,深受师生的钟爱。1912年,考入吉林一中读书,1915年就读于当时北方著名的天津南开中学。马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的国语和英语演讲,多次获学校的奖励;他在南开校刊上经常发表文章;他多才多艺,能演话剧和评书,在南开中学第十三次毕业班同学录中,有马骏身穿制服的半身像,下注云:“马君骏,君性慷慨磊落,口才便捷,曾两任本校演说会、学生讨论会、自治励学会会长,又任义塾服务团总董及教务长。”年轻的马骏身上凝聚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种种优良传统,当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际,这种种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德生发出一种炽烈的爱国精神。

五四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1919年5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学生运动。天津学生即刻响应,举行示威游行。马骏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他与周恩来等人,组织发动了天津学界、商界的罢课、罢市斗争。6月5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南开学校广场召开了数千人爱国大会,马骏在会上带领大家高声宣读《宣誓书》:“(一)誓保国土;(二)誓挽国权;(三)誓雪国耻;(四)誓除国贼;(五)誓共安危;(六)誓同终始。”会后,示威请愿,要求北京政府

释放被捕学生,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密约。

6月27日,马骏被天津各界联合会推选为总代表,同郭隆真、刘清扬等到北京,联合北京学生三十余人,前往新华门向北洋政府请愿,迫使其在“巴黎和约”上拒绝签字。在爱国学生的压力下,总统徐世昌不得不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签字。

8月,山东镇守使马良捣毁了“回教救国会”等爱国团体,杀害了回教救国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位领导人。天津学生联合会派郭隆真、刘清扬等十多人为代表,汇合北京学生代表瞿秋白等人于总统府前请愿,要求惩办马良。结果全体代表被捕,关进北京警察厅拘留所。马骏带领千余人二次进京,被津京等地学生代表公推为学生运动的总指挥。他率领津、京、鲁和唐山、烟台等地请愿代表五千多人,直逼总统府,在天安门前,展开了学生请愿大示威。他们宣传演讲,与军警对峙三天三夜。军警用皮鞭枪托毒打学生交出马骏。马骏挺身而出,大声呼喊:“我就是马骏,要逮,逮我好了!”马骏对同学们说:“我们此来就是抱定牺牲精神的,我虽然被捕,不必恐惧;坚持斗争,一定会胜利。逮捕一个,便会激起十个、百个、千个爱国者,爱国者是逮不完的……祖国万岁!”他郑重宣布:“吾人死为国死,死为争国不亡而死,死后惟愿全国父老以及后之来者,万不可把国亡了。将来如得幸福有日,则吾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死亦瞑目于地下矣。吾人之死不为自私,不为名利,但愿全国同胞父老秉此牺牲之精神,永留光明之纪念于天壤已矣,吾人去矣,愿即以此留别我国同胞父老。”回肠荡气,坦然面对死亡。

8月28日,周恩来等为营救被捕同学来到北京,在全国人民抗议下,北洋政府于30日不得不将马骏和两次被捕的请愿代表释放。大家称颂马骏为“马天安”。

9月16日,周恩来、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二十名青年举行

会议,宣布成立“觉悟社”。它标志着天津反帝爱国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它不仅推动了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更重要的是宣传了民主科学思想,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觉悟社曾聘请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赴津指导该社的活动,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由周恩来主编了《觉悟》创刊号。马骏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他们为什么不去?》和《一个小蜘蛛》两首诗。诗中赞美顽强的斗争精神,是马骏自身的写照。

早在6月16日,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天津选派马骏为代表,赴上海参加学联工作。9月,他和刘清扬在上海参加了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的筹备工作。11月10日,全国各界代表二百多人齐聚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联合会,马骏当选为该会驻沪常任理事,负责日常工作。这次大会由刘清扬任主席,报告大会成立的意义,并有孙中山的代表黄大伟、章太炎、黄炎培到会讲话。会后到租界地游行,马骏担任总指挥,显示了全国各界团结力量的强大。

11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枪杀抵制日货的中国学生,制造了“福州惨案”。天津各界联合会为声援“福州惨案”,成立了国民大会委员会,马骏被选为委员,由上海调回天津。马骏领导学生调查日货,天津各界近十万人焚烧日货,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直隶省长曹锐将马骏等逮捕,后又拘捕了前来营救马骏的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等四位代表。两次被捕二十六人,押在一个狱中。周恩来和马骏一方面领导大家与警察厅斗争;另一方面组织大家学习政治、外语、数学和历史,并组织演讲会、娱乐会和体操锻炼。马骏以《演说学》、《警厅拘留中的批评》、《研究问题的方法》等题目作了报告;周恩来对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及阶级斗争史、《资本论》等做过较为系统的演讲,深受大家的欢迎。经过全国人民和青年学生的斗争,当局于7月18日释放了周恩来、马骏等同志。

周恩来编写了《警厅拘留记》，记录了狱中进行的各种斗争。经过革命的洗礼和锻炼，马骏于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

领导吉林的“五卅”运动

1922年2月，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马骏到哈尔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马骏利用《晨光报》开展活动，又和韩铁生等人组织“救国唤醒团”。他是党派到吉林的第一个党员，也是来东北区的最早的共产党员。他在宁安建立第一个党小组，是东北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1925年，日本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李立三、刘少奇等人领导了上海二十万人的大罢工，全国响应。马骏领导吉林人民投入了声援沪案的斗争。他以“吉林爱国六人团”的名义发出宣言，并成立“吉林沪案后援会”，马骏被选为会长。6月10日各校学生示威游行。14日召开对上海遇难人员的追悼大会，马骏报告了“五卅惨案”的经过，与会者群情激愤。马骏义正词严地向军阀政府提出十项要求。接着宣读通电和祭文，数千人示威游行，包围了日本领事馆。

吉林“五卅”运动的迅猛发展，震惊了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张作霖，他电示吉林省长公署，要杀害马骏等领导人，北方党决定派马骏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5年8月中旬，马骏离开吉林去北京，经上海出国。

以身殉国 以身殉信仰

1925年10月，马骏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被选为中山大学公社（学生团体）领导人，负责党务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4月，

中共北方党组织领导人李大钊惨遭杀害,党的组织遭到重大破坏。7月,蒋、汪合流,中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马骏受党的指示,秘密回国,他先到武汉,后经天津抵达北京,就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负责重建北京市委,恢复党的活动。

12月3日,马骏不幸被警察厅逮捕,马骏从容地写下“故共产党员马骏之墓”九个大字,视死如归。1928年2月15日,马骏在北京英勇就义。1945年4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审定:追认马骏同志为烈士。

马骏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以天下为己任。他忧国、爱国,终以身殉国,以身殉信仰。他为世人树立了一面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帜。

〔杨怀中〕

郭隆真^①

郭隆真(1894—1931年),女,原名郭淑善,后又用过嵌浚、隆真、林一(或林逸)等名号。1894年4月11日出生在直隶省(今河北省)元城县(今大名县)金滩镇一个封建绅士家庭。父亲郭荣桂崇尚维新,是一个思想开明的读书人;致力于教育,业余行医,喜济贫病者。他也是郭隆真的启蒙老师。在父亲的影响下,郭隆真从小反对缠足,喜爱读书。并在她的强烈要求下,终于获得了同哥哥一起上学的机会。郭隆真最感兴趣的是阅读描写古代女英雄的小说,听父亲讲维新派和民主革命的故事。特别是讲到那位为争取女权、为了女界和中国的民主自由壮烈牺牲的秋瑾的故事,使郭隆真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全国各地都纷纷举办新学,1906年郭隆真的父亲在金滩镇办起了一所小学,但只收男生,不收女生。郭隆真即向父亲提出应该办一所女校。郭荣桂欣然同意了女儿的意见,于1909年独树一帜的以女儿郭淑善的名义,在自家北院办起了元城县第一所女子小学校。这大概也是当时河北平原农村中的第一所女子小学。一切经费由郭隆真家自出,年仅十五岁的郭隆真担任教员。除她的妹妹淑文和侄女等外,她还走访邻里与亲友,鼓动说服叔叔、伯伯的女儿们也来上学。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学习

①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刘清扬《郭隆真烈士传》,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载《中国妇女》1959年第9期;周恩来《三个半月的觉悟社》,载《觉悟》第1期,1920年1月;马惠卿《五四运动在天津》,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历史博物馆编《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

新课本,如国语、算学、修身、历史等等之外,还教给学员们一些反封建礼教的歌谣。1912年5月,直隶省学台到元城县视察办学情况,发现了这所女子新学堂,对郭家父女大加赞扬,并将这所学校迁往县城,更名为“红石桥女子高小”。郭隆真也被选送到天津直隶北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不久父亲病逝。1917年因母命难违,郭隆真只得嫁到儿时由父母包办“门当户对”的婆家。婚后不久,隆真提出要返回天津读书的要求,如不同意就离婚。婆家终于同意了这个要求,隆真回天津女师上学后再也没有回过婆家。在学校里,她衣着朴素,态度爽朗大方,待人和蔼可亲,同学们都喜欢接近她。特别是知道她是同封建婚姻作斗争后才取得读书的权利时,更引起了同学们的同情和尊重。郭隆真先上的是简易师范班,再上预科,以后才正式考上师范本科第八级,所以在校时间较长。女师虽是直隶省最高的女子学府,但在1919年“五四”前夕,学生们被周围的高墙和影壁与外界隔绝开来,她们过着一种修道院式的生活,使人十分厌恶。郭隆真为国家命运担忧,再也安不下心来读书了。她曾对当时在淑贞女校读书的妹妹郭淑文说:“现在我才懂得,从家到天津,如同从一个深渊到另一个深渊。如今国难当头,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我们无聊地活着干什么?……宁愿舍身取义,也不当亡国奴!”有着赤诚爱国之心的郭隆真,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寻求救国的真理。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这个波澜壮阔反帝爱国运动,震撼了全国。消息传到天津,郭隆真和邓颖超等女师学生,立即起来响应。5月5日郭隆真等召集各班代表开会,她慷慨陈词:“国难当头,妇女应该从深渊中跳出来,冲破封建束缚,救国救民。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5月25日在郭隆真、邓颖超等人发起下,联合淑贞、中西、普育等女校的学生和一些小学教员,在东门

里江苏会馆开会,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到会达六百多人,郭隆真被选为评议委员兼讲演队长。会后,她们在市内各宣讲所、民教馆及公共集会的场所,甚至在郊区农村进行讲演,宣传救国真理,宣传争取妇女解放、男女自由平等、反对包办婚姻等合法权利。

1919年8月山东济南镇守使兼戒严司令马良,残酷镇压爱国运动,杀害了山东回教救国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位回民爱国领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郭隆真和马骏、刘清扬等集合回族同学一百多人,到清真大寺召开回民群众大会,当众揭露披着教友外衣的马良杀害回民马云亭等的罪行,戳穿反动当局的阴谋,并将马良为清真寺所题匾额砸个粉碎。8月23日天津学联组成以郭隆真等十人代表团进京,会同北京、唐山、山东等学生代表二十五人到总统府请愿,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卖国贼马良,要求爱国自由。却遭到了军警的逮捕。警察厅长常朗斋是回族,企图利用民族感情对他们进行分化拉拢。郭隆真严词拒绝。反动当局在全国各地纷纷抗议的压力下,才于8月底将郭隆真等代表释放。代表们回到天津后,在马骏、郭隆真和周恩来等人发起下,于1919年9月16日在草厂庵学生联合会办公室成立了“觉悟社”。会上通过了由周恩来草拟的十条决议,决定出版《觉悟》杂志。另外还决定“社员用抽签的方式,决定代表个人的号数,代表各人对外的姓名”。郭隆真抽的是十三号,她的别名为“石杉”。这是我国早期青年革命团体。它冲破封建世俗,打破男女界限,团结奋进,努力研究各种新思潮,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久,郭隆真等人受天津各界联合会的派遣,与上海、河北、山东、河南、湖北代表三十二人去北京,会同群众二三百人,于10月1日再次去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提出五点要求,包括取消二十一条及惩办马良并取消山东戒严令等。总统徐

世昌拒不接见代表,竟下令派军警逮捕了马骏、郭隆真等代表三十余人。由于全体代表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北京当局于11月1日被迫释放了全体代表。郭隆真获释后,返回天津,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抵制日货的斗争。

1919年11月16日福州学生焚烧日货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竟公然开枪,打死我爱国学生和巡警,制造了轰动全国的“福州惨案”。为了声援福州人民的爱国反帝斗争,抗议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天津各学校学生一千多人上街游行。郭隆真率领女界爱国师生,参加到游行队伍之中,在街头讲演、散发传单。她还被选为代表,到省公署请愿,要求政府向日本帝国主义“严重交涉”。为了掀起抵制日货运动,由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等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了国民大会委员会。郭隆真、马骏等人被选为善后办法起草委员会,具体负责拟定抵制日货办法。之后,郭隆真和刘清扬等人研讨和制定了抵制日货办法,调查各商号购买日货的情况。为了加强各校学生团结,在郭隆真和周恩来、马骏等人的倡导下,女界爱国同志会与学联合并,于12月10日在天津总商会办公地正式成立新学联。不久第二次国民大会于12月20日在南开广场胜利召开。到会的有回教联合会等一百七十多个团体的群众数万人。郭隆真和刘清扬等人,负责维持秩序和接待工作,还在大会所设讲演台上发表演说,向民众说明购买日货之害,并揭露日本商人与通日奸商狼狈为奸的种种诡计。演讲完毕,大会宣布焚烧日货,直烧到下午六时。接着举行了示威游行。北洋军阀政府更加紧了对爱国人民的镇压。直隶省长下令禁止抵制日货,取缔学生的反日爱国活动。1920年1月23日亲日奸商魁发成勾结日本浪人殴打调查日货的学生,激起了天津人民的无比愤怒。1月29日天津学生五千多名举行示威请愿活动,直隶省长曹锐动用

军警,用刺刀、枪托、水龙驱散学生,逮捕了郭隆真、周恩来等代表。重伤六十余人,轻伤者八百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九”流血惨案。经过郭隆真、周恩来等关押中秘密串联全体被捕代表绝食斗争,取得了在检查厅可以看书学习的权利。又经过半年艰苦斗争,反动当局于7月7日开庭审讯,并于7月17日宣布“期满释放”。这一天,在法庭门前,民众如潮,当郭隆真等二十四位代表走出大门时,群情鼎沸、掌声雷动,并给他们每人胸前戴上铸有“为国牺牲”字样的纪念章和大红绸花。

1921年初,郭隆真与周恩来等197人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到巴黎后,她和张若茗被分配在一个云母厂做工,生活十分艰苦。工余坚持自学马克思主义著作,了解法国工人运动状况,亲身感受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坚定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1923年郭隆真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她结束了四年的勤工俭学生活,离开法国,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5年郭隆真奉调回国,在中共北方区党委领导下工作。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区党委书记李大钊派她到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妇女部工作,并负责香山慈幼院的党的地下工作。她创办了缙云女校和《妇女之友》社,并以此为掩护,到各大学活动,发展党团组织。1926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京津疯狂镇压革命运动。1927年4月6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逮捕了李大钊和郭隆真等数十人。因她事先早有戒备。敌人什么证据也没有查到,在无任何口供的情况下,判处她十二年徒刑。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于1928年底被释放出狱。

1929年初,郭隆真到上海找党,几经周折终于遇见了邓颖超,这才与组织接上关系。很快她被派往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和省职工委员会书记;在省委书记刘少奇的领导下,在哈尔滨、沈

阳一带开展工人运动。后来发生了“中东路事件”，领导中东路工人的斗争成为党的主要任务，于是郭隆真与李梅五等被派到哈尔滨中东路铁路三十六棚总工厂工作，并担任党支部书记，以李梅五家属身份住进了工厂宿舍，向工人们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觉悟。由于她待人热情、性格豪爽，深得工人们的爱戴，亲切称她为“大姐”。她帮助工人们创办了《火车头》报，组织工厂委员会，与黄色工会进行斗争；认真执行省委决议，同李梅五的叛卖行为进行坚决斗争。1930年3月李梅五终于被清除出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在总结中东路工作斗争经验时说：“在工作上最积极，在政治上又最正确的是大姐（郭隆真）”。

1930年秋，郭隆真被中央派到中共山东省委工作，化名为郭林逸。当时山东省委连遭两次大的破坏，新省委刚成立不久。郭隆真被任命为青岛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主要从事工人运动。郭隆真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去纱厂和大英烟草公司等处，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建立广泛联系，并与陈少敏、董汝勤等地下党员深入工人群众中，访贫问苦，发展了一些共产党员，建立起党的组织。逐步把工人们组织起来，把她们的自发行动引导到有领导地向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作斗争上来。一次被暗探跟踪，不幸被捕。敌人一时不辨真伪，但确认她是“共党重要分子”，即移解到济南第一监狱。在敌人种种酷刑下，郭隆真毫无惧色，大义凛然，一句口供也没有，直到牺牲前，敌人始终没有弄清她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1931年4月5日在山东军阀政府韩复榘的命令下，郭隆真等二十二名共产党员，被绑赴济南纬八路刑场。她高呼：“革命胜利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万岁！”等口号，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年仅三十七岁。正如她的亲密战友邓颖超赞扬的那样：“她用火一样的热情爱护着国家民族，亦同样以火热的高度憎恨着当时的亲

日卖国贼。在五四运动中,在她一生的革命工作中,都证明她是一位坚决勇敢,不顾一切,专诚不懈的奋斗者!”

〔黄庭辉〕

刘清扬^①

刘清扬(1894—1977年),女,字婉如,别号“念吾”。1894年2月15日出生在天津市一个殷富的商人家庭。刘清扬,在少年时代就受到了爱国思想的熏陶。她目睹了八国联军在天津的烧杀劫掠;她看到了瑞士和比利时投资修建电车路时,毫不顾及中国人民的死活,一次轧死一个回民小孩,小孩家长哭叫了一天,当地官员根本不管;她更看到封建官吏奴颜婢膝、丧尽天良地将我国同胞送到洋人面前去杀头的悲惨情景。这在刘清扬的幼小心灵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伤痕。

1905年,十二岁的刘清扬进了天津严氏女学校念书。学校里的一些进步教师,在课堂上讲述中国被瓜分的危险,讲朝鲜沦亡的惨状等,并教唱“毁家纾难奠国基,同乐自由天”一类歌曲,启发了刘清扬等学生的反帝爱国思想。天津爱国人士忧愤于国家缺乏国防设施,发起由民间集资建设海军的国民捐运动,刘清扬和同学们在教员带动下,不仅踊跃捐献,还负起代收捐款的任务;市民们赞扬她们是“热心的爱国少年”。辛亥革命前夕,十八岁的刘清扬正在天津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女师)念书,经人介绍加入了天津共和会,这是一个与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小团体。她曾和进步师生一道,赞助过该校教员白雅雨和李运清等人组织和发

^①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刘清扬《天津国民捐和同盟会活动的回忆》,载《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马惠卿《五四运动在天津》,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2期;天津历史博物馆等编《五四运动在天津》(历史资料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刘清扬《回忆建党初期党领导北方人民进行的英勇斗争》,载《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动的滦州起义。在起义前夕她同李运清的女儿李韵娴等一起,秘密运送手枪、子弹进北京,又鼓动其三哥刘乃扬,支助白雅雨等人去滦州截留清军军火,策划起义所需的路费等。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爱国学生运动。消息传到天津,5月5日女师学生在郭隆真、邓颖超的发起下,召开了全校同学紧急会议,决定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从女师毕业离校后的刘清扬,时刻都在关心母校的爱国活动。当天她参加了会议。会后,她和郭隆真等联络中西女中、严氏女中、淑贞女中、普育女中等校学生,于5月25日在东门里江苏会馆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刘清扬被公推为会长。参加的会员达六百多人。该会“以提倡国货并唤起女界之爱国心”为宗旨。会后,刘清扬和郭隆真、邓颖超等,组织讲演队,走上街头,向广大妇女及各界人民宣讲“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提倡国货”等问题。后来更进一步宣传“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要求妇女解放,争取妇女自由平等”等。她们讲的“声泪俱下,听的人也很感动”。她们还打破男女界限,与男学生一道进行爱国活动。5月6日天津南开、北洋等九校学生也纷纷集会,并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刘清扬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员们总是与学生联合会密切合作,互相支援。6月5日天津学联在南开广场召开第一次爱国运动大会,会后游行请愿。刘清扬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员一起出动。她们以整齐严肃的阵容,站在金钢桥畔省公署对面,迎接学联的请愿大队。天津《益世报》曾以《女学界之光荣史》为题,作了报导,并赞扬说:“以少数弱女子具精诚毅力,始终不渝,我中国不可亡矣!”6月9日学联为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扩大宣传,在河北公园召开公民大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全部到会,刘清扬等人就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八小时工作制等问题,向大家演说。她的果敢行

动和组织才能,受到各界爱国人民的称赞和拥护,先后被选为“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抵制日货委员会”常务委员。

天津各界联合会鉴于巴黎和约签字日近,决定派刘清扬等十位代表进京,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6月27日,刘清扬等和京、津代表二十余人,及数万学生到新华门总统府递交请愿书,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代表。斗争坚持两天,徐世昌才被迫接见京、津代表,并举行了会谈,在北京代表发言后,作为天津代表的刘清扬继起发言,她痛斥了徐世昌一伙的卖国行径,并义正辞严地指出:“拒绝巴黎和约并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这是四亿人民的呼声,今请大总统立即致电巴黎我国代表,拒绝签字,并取消二十一条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次请愿,我们既受人民重托,绝不空手回去。”

8月间,山东济南镇守使兼戒严司令马良,悍然下令捣毁了“回教救国后援会”等爱国团体,枪杀了该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位回民爱国领袖。消息传到天津,刘清扬、郭隆真、马骏等几个回族先进青年义愤填膺,他们带领学生到回民聚居地区进行宣传,揭露马良杀害回民爱国同胞的罪行,并动员群众在清真北寺召开回民大会,将马良给清真寺写的金字匾额摘下来,劈个粉碎。之后天津各界联合会,公推刘清扬、郭隆真等十人和唐山、山东济南、烟台等地代表赴京,联合北京代表瞿秋白等二十五人,于8月23日第二次向总统府请愿,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当天下午全体代表被捕,拘押在京师警察厅内。当警察厅长常朗斋知道刘清扬、郭隆真是回民后,办了丰盛的清真宴席,进行分化拉拢,遭到了拒绝。接着,他们又叫刘清扬的哥哥来劝说,将刘清扬保出。刘清扬先质问常朗斋:“本来救国无罪,你应该释放全体代表,今只放我一人是何用意?”后又对她哥哥说:“我想家兄也不愿我作女界爱国的罪

人。我现在只知道有国不知有家,既不放全体代表,我也不回去。”第二天,天津《益世报》发表了“刘清扬百折不回”的新闻,报导了这件事情。

请愿学生代表的被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8月28日天津各界再派周恩来等代表进京为营救被捕代表而斗争。在全国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于8月30日释放了刘清扬等全体代表。

9月16日刘清扬和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二十位男女青年,在草厂庵学联办公室成立我国早期的青年革命团体——“觉悟社”。这个团体以“实行文化运动”、“要求教育改革”、“提倡社交公开”为改造社会和改造思想的现行办法,规定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宗旨,并决定出版《觉悟》杂志。

为了推动全国的爱国运动,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共同发起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公推刘清扬、马骏等三位代表,负责到上海联络。经过两个多月筹备,11月10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在北四川路青年会内召开了成立大会。全国各地到会代表二百余人、上海地区一千余人参加了大会。刘清扬、马骏等被选为常务理事,并担任大会主席。她在讲话中指出:在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今天,全国人民“唯一之天职,应群起自救救国”,“今组全国各界联合会,乃国民救国之起点,亦自救之急务”。她还指明,本会的宗旨是:“(一)救国家于水火;(二)促国民自治精神;(三)救世界人民保守永久之和平。”孙中山先生的代表黄大伟、章太炎、黄炎培等也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后举行了著名的“反帝大游行”。

1919年11月间福州学生焚烧日货时,日本侵略者公然开枪打死打伤我爱国学生和巡警,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福州惨案”。为声援福州人民,11月23日上海各界各团体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

开集会,到会群众三万多人。刘清扬代表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两条办法:“(一)筹商国民大会,断绝国民与他(日本)人之交易、不买他货,并不给他各种原料……(二)说明通电外交部严重交涉”。以后,刘清扬、马骏回到天津,11月30日天津成立以抵制日货为宗旨的国民大会委员会,她们被选为委员。12月20日在南开广场举行国民大会,到会有回教联合会等一百七十多个团体,民众达数万人之多。会上焚烧日货,会后举行示威游行。1920年1月29日,北洋直隶省长曹锐竟动用武力镇压请愿学生,重伤数十人,先后拘捕了周恩来、马骏、郭隆真等二十八名代表,制造了“一·二九惨案”。早已安排下来的刘清扬等即南下南京、上海、广州,并转到南洋,向各界同胞宣传动员,以唤起为营救天津代表而斗争。斗争持续了半年,北洋政府为正义所迫,于7月中将被捕天津代表全部释放。

1920年8月觉悟社召开了年会,总结了天津爱国运动的经验教训,并决定派刘清扬和周恩来等十一位代表去北京,请李大钊指导和帮助,于8月16日上午由觉悟社发起包括“少年中国学会”等四个团体代表共二十三人参加的座谈会,在陶然亭公园召开。刘清扬被推为会议主持人,会上由邓颖超报告了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多的活动。周恩来阐述了觉悟社年会上提出的“改造联合”的意义。最后,李大钊讲话,鼓励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才好团结一致。会后发表了《改造联合宣言》和《约章》。

1920年12月,刘清扬和李大钊的助手张申府等响应“留法勤工俭学”的号召,去法国留学。1921年2月间,经张申府介绍在巴黎加入共产主义小组;2、3月间刘清扬和张申府又介绍周恩来参加该小组。随后,刘清扬和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等五人正式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小

组之一。1922年2月刘清扬和张申府赴德国柏林,在那里又成立了一个中共海外支部。1923年底,她们奉李大钊之命回国。她先到天津,于1924年2月间和于方舟、邓颖超等建立了天津第一个党小组,创办了《妇女日报》,以宣传和发动妇女群众。时值国共合作之时,刘清扬由中共指定加入国民党,并派往广州工作。5月北上,随李大钊等赴苏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在上海组织了妇女国民会议促进会。1925年4月全国国民大会促进会在北京召开,刘清扬等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会议,并担任大会主席。她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依靠国民党左派,与右派——西山会议派进行斗争,使会议终于按照中共的计划,通过了全部提案。刘清扬等五人被选为驻会委员。会后,她还在改组后的北平国民党特别党部任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并与张邑兰等创办了《妇女之友》等刊物,以发动妇女参加国民革命和北伐斗争。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刘清扬等人发动妇女,参加北京成立的“沪案雪耻会”,并在天安门多次举行群众集会,声援上海工人。1926年3月18日北京总工会、总商会、学总会等一百八十余团体和学校、万余人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以抗议日本侵略军炮击大沽,反对八国最后通牒,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刘清扬为主席团成员。会上成立了“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会后,由陈毅指挥游行,刘清扬等率领群众队伍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请愿,遭到军警镇压,刘和珍等四十七名志士遇难,二百多人受伤。惨案发生后,段祺瑞不顾全国的抗议,竟密令通缉“乱党”,搜捕共产党人,封闭北京国民党部。刘清扬和李大钊等被迫暂避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1927年2月刘清扬奉调赴武汉国民政府,先后在何香凝、宋庆龄领导下从事妇女工作。

1927年4—7月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第一次国

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刘清扬退出了国民党,离开了共产党。8月离开武汉,辗转上海、天津,回到北平,隐居清华园。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国难当头,刘清扬立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她先后被推举为北平妇女救国会主席和北平各界救国会常务委员,并与张申府、陈豹隐、许德珩等进步教授,联络清华、北大等校师生,于1935年11月18日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1936年5月31日,她参加了由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发起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选为常务委员。为宣传和动员全民抗战,为营救“爱国七君子”,她奔走呼号。

卢沟桥事变发生,刘清扬等组织北平抗战后援会,支援二十九军的抗日战争。她们组织红十字妇女救护队,上前线运送伤员,刘清扬的家也成了为二十九军提供情报及分发工作的中枢。北平沦陷后,刘清扬等于1937年11月下旬到达武汉,与李德全等人参加了由邓颖超发起的“儿童保育会”,以动员各党各派力量抢救前方受难儿童,开展募捐运动,并创办了十所“儿童保育院”。以后,她又到重庆,在宋庆龄领导下,担任战地儿童保育委员会理事、重庆妇女联谊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等职。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清扬在香港、桂林等地进行反蒋抗日活动。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1945年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及妇女委员会主任。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参加民盟北方区委和北平支部的工作,来往于平、津之间,组织和领导了河北省和天津市民盟支部的工作。她介绍和输送了不少进步青年到解放区去。1948年10月刘清扬进入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并于1949年初回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她历任第一、二、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妇联、河北省妇联、华北妇联等执行委员、常委、副主任，全国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北京市妇女联谊会主席、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等职务。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为中国妇女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1961年刘清扬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她还担任过全国妇联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中国红十字协会副会长等职务。“文革”中，刘清扬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和折磨，精神和身体受到摧残，不幸于1977年7月19日在北京逝世。

〔黄庭辉〕

吴 祯

吴祯(1880—1923年),河北涿县人。长辛店铁路工人,“二七”烈士。

北京长辛店,是我党在北方工人中开展革命斗争活动最早的地方。1921年5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的第一个自己的组织“长辛店铁路工会”正式成立。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工会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他们成为党联系广大工人和开展工人运动的骨干。回族工人吴祯就是其中的一个。

吴祯原籍涿县,为生活所迫来到长辛店谋生。那时候,人们常把长辛店叫“伤心店”,工人生老病死无保障,劳动伤残被踢开的惨状比比皆是。吴祯在机械厂当了旋工,他力气大,勤快,旋机车大轱辘的手艺不错,可家里日子还是穷得没法过。一年到头,全家人吃的是熬野菜、糠窝窝,住的是四壁透风的破房子,他有三个孩子先后在贫穷的折磨下死去。面对人吃人的社会,吴祯充满了仇恨。

1921年初,邓中夏等几位同志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之托,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吴祯积极地参加了学习。在那里,他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懂得了阶级压迫和剥削是广大工人受苦的根源,并确立了为工人阶级的翻身解放而斗争的信念。

随着阶级觉悟的提高,他努力地党工作着。有个名叫邓长荣的工头,依仗北京的军阀官僚为后台,妄图搜罗一帮人另立工会,破坏工运,广大工人恨透了他,工会决定由吴祯等几个工人惩办他。吴祯带人在工厂外的一个小桥边拦住邓长荣,义正词严地教训了他一番,并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这个自称“站在街心一跺脚,大街南北两头颤”的恶棍,惶恐万分,狼狈地跌到了臭水沟里。

不久,邓长荣就灰溜溜地离开了长辛店。其他工人学着吴祯他们的样子,又撵走了几个平日百般欺压工人的工头。这个斗争,使长辛店工会发展得更迅速了。

吴祯担任过工会下设的调查团团长,还被大家选为工会委员。调查团的成员们把自己褂子上第三个扣子拆下换上白别针,作为标记,他们是专门了解敌人动向的。1922年,工会领导的八月罢工斗争和紧接着而来的驱逐大工贼谢德清、赶走洋厂长祚曼的斗争取得胜利,工会威信越来越高,吴祯和他率领的调查团员们在这些斗争中机智勇敢地 and 敌人周旋。那些日子,吴祯常常腰掖一把月牙斧,白天黑夜不着家,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对敌斗争上。

1923年2月4日,开始举行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觉悟了的长辛店铁路工人团结在工会的周围,同反动的军警、工头进行了殊死搏斗。吴祯和调查团团员是负责监视敌人行动,搜集情报的。大罢工开始后,整个京汉铁路瘫痪了,作恶多端的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一面勾结军阀吴佩孚,向长辛店派来三千大兵威胁镇压工人,一面又派几个“宣慰员”要求谈判,这些阴谋在工人坚决反击下,连连破产。2月6日下午,长辛店机厂的大烟囱忽然升起了青烟,大兵们到处喊叫“开工了”。吴祯见此,立即带人进厂调查,原来是早先被赶跑的几个坏工头、总管带着一帮受骗招来的外地游民,搞假开工。吴祯带着调查团团员经过反复的奔走解说,使受骗的人们离开了工厂,戳穿了敌人的阴谋。接着,吴祯又带人用镰刀割断通往河水的电源,把敌人在短期内复工的计划打乱了。

2月6日午夜,敌人使出了更凶残的手段,他们捣毁了长辛店工人分工会的会址,挨家挨户地逮捕了十二位工会干部,吴祯也被捕了。为营救战友,2月7日早晨,工人们同反动军警展开了英勇斗争,被押在保定军法处监狱的十二位工会干部遭到了敌人灭绝

人性的迫害。吴祯在狱中被折磨得身患重病,于 1923 年旧历四月初九牺牲,终年才四十三岁。

〔马寿千〕

四 马本斋

马本斋(1902—1944年),学名马守清,经名尤素夫。河北省献县东辛庄(现名本斋村)人。父马永长,没有文化,是个乐天派。母白文冠,善良、纯朴,常给幼小的本斋讲“岳母刺字”、“苏武牧羊”、“木兰从军”的故事。马本斋十二岁进学堂,读《三字经》、《千字文》和《弟子规》等启蒙读物。他聪明、好学,对事物的分析往往有独到的见解。一次老师哈二先生给他写了个上联:“两城二塔双河水”,马本斋接着挥笔写了下联:“孤村一寺独木桥”,老师十分赞许。后来哈二先生向学生说:“贫穷自在,富贵多忧”,马本斋不同意这种说法,改为“富贵自在,贫穷多忧”,被先生撵出了学校。

马本斋十六岁时,河间发生水灾,子牙河两岸一片凄凉。只好跟着父亲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他们经过北京,流落到张家口。常言说:“穷回回,干三行,烧饼果子宰牛羊”。在当地回民帮助下,父子俩开了一个“永庆奎”果子铺。

1921年,马本斋到张宗昌部入伍当兵。他勤学枪法,苦练动作,不久升为班长,并派去东北讲武堂深造。他认真攻读《兵器学》、《战术概则》和《论带兵法》等课程。两年毕业后,因成绩优秀,被提升为连长。

1924年夏末,直奉战争爆发,在军阀混战中,马本斋被奉系军阀任命为担负后勤运输的“杠子营”营长。1928年初春,他率领“杠子营”随刘珍年的部队开到胶东烟台。在一次战斗中,运用强攻和奇袭相结合的战术,取得了胜利,被任命为团长。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他增长了阅历,目睹无休止的军阀混战,遭殃的还是穷苦百姓。他感慨万分,奋笔疾书:“风云多变山河愁,雁叫霜天又一

秋,空有满腹男儿志,不尽沧浪付东流。”于是1935年毅然弃官解甲归田,回到家乡老母身边,到群众中去历练救国之路。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马本斋耳闻目睹日寇到处烧杀抢掠的暴行,特别是冀中回汉人民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马本斋的母亲教导两个儿子本斋和进坡,日本强盗打死我们乡亲,抢走我们的东西,这个仇咱们得报。本斋和进坡让母亲放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绝不饶过敌人。村里的青年们也纷纷来问,咱们怎么办?马本斋把盒子枪亮出来,大声说:“血债要用血还,咱们拿起武器,拉队伍,跟鬼子干!”同年8月30日,东辛庄全村男女老少集中在清真寺,马本斋在礼拜大殿的台阶上以宏亮的声音对大家说:“乡亲们,咱们堂堂正正的中华民族,凭什么让日本鬼子欺侮?乡亲们,不当亡国奴,就得抱起团来跟鬼子们干!”他带领众人宣誓:国难当头,为国为民,雪耻复仇,死而无怨!许多人把家里藏着的长矛、单刀、流星以及打兔子用的火枪都献了出来。从此,东辛庄回民义勇队宣告成立,马本斋被推举为队长。马母语重心长地教导本斋,一定要好好给大伙办事。回民义勇队的组成,震动了四乡,马本斋很快率领这支约两个连的义勇队开赴抗日前线。他们在沧州、河间公路上打翻了日军的军用卡车,在子牙河畔狙击下乡骚扰的汉奸队伍。他们使用土枪、大刀运用多种形式,反击日寇实行的“清乡”、“蚕食”、“治安强化运动”等,打得日伪军一听说马本斋的名字就吓得胆战心惊。

同年11月,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派人与马本斋取得了联系。正在寻找八路军的马本斋立即决定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8年2月,他带着队伍参加了八路军,认为这才算有了靠山。同年5、6月间,在河间沙河桥与回民干部教导队汇合,编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马本斋指挥这支回民

抗日武装,在敌后截军车、袭据点、毁公路,屡建战功,威震敌胆。日本的《东亚圣战报》惊呼:“回民教导总队的动向,应引起我大东亚之皇军的注意,并应认真对付。”

1938年10月,马本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夏天,这支回民武装被中共中央军委命名为冀中回民支队,上级派红军干部郭陆顺任支队政委,马本斋任支队司令员。

1940年5月,日寇抢修德石公路,企图发挥其机械化作战的优势。马本斋经过详细侦察敌情,并亲自勘察地形,制订了“引蛇出洞,围点打援”的作战方案。派出少数兵力佯攻安家村据点,自己率主力埋伏在康庄的一片开阔地。不出所料,百余名敌人从衡水乘坐两辆车,急驶救援安家村。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马本斋一声令下,猛烈的火焰射向敌人,仅四十分钟就全歼敌人,而回民支队无一伤亡。康庄战斗的胜利,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高度赞扬,冀中军区授予“能征善战的回民支队”锦旗一面。

1940年这一年中,在马本斋的率领下,回民支队转战冀中一带,大小数十战,打得敌人闻风丧胆。伪军们互相赌咒时常说:“谁要办了亏心事,叫他出门碰见马本斋。”冀中军区为表彰回民支队的成绩,奖给他们一面锦旗,赞誉回民支队是“打不烂,拖不垮,攻无不克的铁军”。12月,毛泽东亲笔题词:“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敌人得知马本斋是孝子,妄图利用马母瓦解这支部队。1941年8月27日,日伪军突然出兵包围东辛庄,抓去马本斋的母亲。马母年事虽高,却有一颗爱国心。儿子拉队伍抗日,她积极支持。有的老人不让儿子出去打仗,她去做劝说工作。她和村里的妇女们一起为子弟兵做饭、洗衣、照顾伤病员。当日伪军包围东辛庄枪杀无辜百姓焚烧清真寺时,她挺身而出,怒斥敌人的暴行。

马母被捕的第二天,关押到河间县日本宪兵队。敌人摆酒菜企图感化她,又以高官厚禄让她写信劝诱马本斋“归顺皇军”,都被马母顶了回去。敌人露出了凶相,立即换上刑具,连夜审讯马母。在诱骗、逼供、严刑拷打面前,马母坚贞不屈,义正辞严地说:“告诉你们吧,我儿子当八路军是我叫他去的,要我写信叫他投降万万不能!要杀要剐你们冲我来吧!”敌人的伎俩连遭失败,便指派在伪河间县政府当差的回民去“照看”马母,同样被马母一眼识破。马母进行了三天绝食斗争后陷入昏迷状态。9月7日,她突然睁开眼睛呼喊:“本斋,娘对得起你,你要好好打鬼子,给娘报仇,给乡亲们报……”,话未说完,一阵咳嗽之后,她为抗日救国献出了生命,显示了一个伟大母亲崇高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

1941年夏秋期间,马本斋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作战灵活机动,他率领冀中回民支队打遍冀中平原,并转战于冀鲁豫边区,创造了辉煌的战绩。在冀中,回民支队给日军山本联队以沉重打击。狡猾的敌人放出空气说:“马本斋如果拉队伍过来,最低给个师长”。马本斋针锋相对地放话出去:“八路军的政策不杀俘虏,山本只要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保证留他一条命”,“有我马本斋就没有你山本,有你山本就没有我马本斋”。当马母被日寇捕去后,支队同志请求立即去营救,马本斋心如刀割,但他以抗日大业为重,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他向郭政委表示:“我是共产党员,从入党起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了。娘被抓走,儿子照样打鬼子!”马母为国殉难的噩耗传来,马本斋没有流泪,而是化悲痛为力量,统率回民支队,更加英勇杀敌。1942年6月,马本斋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三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从1937年至1944年,马本斋率部经历大小战斗870余次,歼灭日伪军36700多人。

1944年1月底,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来到回民支队,向

指战员作了奔赴延安担任新的战斗任务的动员。由于长期戎马生涯,斗争环境艰苦,马本斋积劳成疾,身患重病,波及脑髓,住进医院。部队出发时,他躺在担架上去送行,他说:“同志们想我,我也想念同志们,但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行动,个人感情都必须扔掉!你们要跟着共产党走,坚决抗战到底!”2月7日,马本斋半坐着,手里拿着一本《论持久战》和一支钢笔,停止了呼吸,年仅四十三岁。

马本斋忠于人民忠于党,不屈不挠地同敌人战斗,他的死重于泰山。在延安,从党中央领导到各界人士,对马本斋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怀念和沉痛的哀悼。

毛泽东挥笔写下:“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题词:“民族英雄,吾党战士!”朱德亲撰挽联:“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林伯渠、李富春在挽词中写道:“率大军抗日寇远近播英名,冀鲁豫河山增色;奉教义承母志生死矢忠魂,伊斯兰健儿典型。”

[马国超]

刘震寰

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回民抗日武装中,冀中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和冀鲁边区刘震寰领导的渤海回民支队,有广泛的社会影响。马本斋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病逝,刘震寰则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新中国的建设。

一 回民抗日的一面旗帜,转战南北的优秀指挥员

1912年5月,刘震寰出生在河北省沧县(今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北赵河村一个回族农民家庭。这里是沧县东南的一片泊淀碱洼地,回族农民的生活十分困难。父亲在刘震寰呀呀学语时被官府抓去,以“窝匪”罪砍掉双腿而残废,母亲也在他七岁时贫病而亡。尽管生活艰难,家里还是送他去上了七年学,后来实在无力供养他,便先后送他到沧县捷地、天津咸水沽当学徒。

1932年,刘震寰回到家乡,在丈人家屠宰牛羊、串街叫卖。这期间他在当地一所学校认识了从鄂豫皖苏区回来进行地下斗争的共产党人刘格平,1935年8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仍以叫卖身份在周围各地收集国民党军警情报,运送、张贴传单标语,掩护中共津南特委组织委员邸玉栋,并在邸的领导下,于1936年8月建立起一支由刘震寰领导的、有三十多人参加的红军武装。这支武装刚成立,就袭击了一支日本武装走私车队,成为轰动一进的“沧州事件”。为了保存力量,党组织指示这支力量隐蔽起来等待时机。

1937年9月24日,日寇占领沧州,刘震寰根据党的指示发动回民组织抗日武装,他指挥的沧县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38年8

月在沧盐公路件龙堂地带伏击日军骑兵队旗开得胜,一举歼灭日军大佐一名(这是抗战时期冀鲁边区击毙的职务最高的日军指挥官)、骑兵十余人,缴获其战马和步枪,轰动了津南地区。1938年10月,这支小队正式编入冀南军工第六军分区沧县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刘震寰任政治指导员,一年后部队改名,又任大队长。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动员“蒙回及一切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主张。津南地区回族共产党员积极贯彻党的主张,注意发动、组织和吸收回族人民武装抗日。起初,由于没有正式打出回族抗日武装的旗号,回族群众在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方面有顾虑,多分散抗日,形不成联合力量。1938年底“冀鲁边区回族抗日救国总会”建立后,刘震寰与沧县县长丁润生及自己所领导的津南支队六大队回族干部、战士经过广泛讨论,认为建立回族抗日武装有利于回族人民参加抗日,两人向冀鲁边区党政军组织作了汇报和建议,受到上级组织的支持,遂由刘震寰和王连芳负责筹建回民抗日武装。

1940年8月1日,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和以十八名回族干部为骨干的回民大队,在河北新县镇清真寺正式成立,刘震寰任大队长兼回救总会武装部长、组织部长,王连芳任政委兼回教总会主任,张文林(汉族)任指导员。从此,津南地区飘扬起一面回民抗日武装的旗帜。

在抗日战争期间,刘震寰表现出了坚定的抗日立场和高超的组织、指挥能力。1942年日寇大“扫荡”中,刘震寰的表弟“老实刘”经受不住考验从部队逃跑当了土匪,被回民支队抓住后,大家都建议宽大处理,刘震寰却不徇私情,果断下令处决。震寰是在“老实刘”家里抚养长大的,他大义灭亲的精神得到了“老实刘”母

亲的理解,这位母亲又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了回民支队,其中一个后来牺牲在战场上。刘震寰更以他高超的组织指挥才能,领导回民支队在抗日战争中打了一系列漂亮的战斗。日寇、汉奸对他又恨又怕,先是悬赏一千元大洋,后来又悬赏一万元大洋捉拿他,都没有得逞。回民大队则在一年内由刚成立时的几十人发展到四百多人,扩编为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发展到了二千多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刘震寰领导渤海回民支队在敌后频频出击,围歼罗寨,占领捷地,拔除大姚庄、小山、苏基、辛店、小白兔据点,并在花寨战斗活捉日本军官森田,还成功地进行吕家桥、齐家坞、崇望、李村战斗,在抗日战争后期,胜利解放了阳信、惠民、庆云、无棣、黄骅、新青等县。

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震寰率领渤海回民支队挺进东北,指挥部队阻击国民党军队于平泉,攻占长春飞机场。

接着中央命令回民支队抽出全体回族指战员,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回民支队,任命刘震寰为支队长兼党委书记,在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一带,回族地区进行土改、反霸、支前工作,到1947年,部队发展到由回、汉、朝鲜、满等民族参加的一万余人的部队。

1948年秋,回民支队对外保留番号编入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二师,仍由刘震寰领导。辽沈、平津战役结束后,刘震寰指挥部队抢修津浦铁路,修复漯河大桥、长台关大桥、汨罗江大桥、中南铁路,抢修奥汉铁路,为运送军用物资、保障解放大军南下立下功劳。1951年,刘震寰率领部队入朝,担任修护铁路、大桥任务,美国侵略者为破坏我志愿军补给动脉,多次出动飞机轰炸清川江大桥、大同江大桥,但在我铁路大军抢修下大桥始终未断。

二 民族、统战工作的优秀实践者

刘震寰是一位回族出身的共产党干部，一生主要生活、战斗、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他是党的民族、统战工作的优秀实践者。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侵华战争前后，就利用中国清朝对回族穆斯林的腐败政策，挑拨回族与汉族、与祖国的关系，进行分裂活动。“七七事变”后，他们则加紧在占领区实施其“以回制回”和分裂回、蒙等少数民族的阴谋，在津南地区，任命回奸刘佩忱为伪“华北自治联军”副总司令，并成立了伪“回教联合会”，宣传“反共、亲日”，鼓吹“回回争教不争国”。刘震寰领导的回民支队成立的本身，就以实际行动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一次统一战线、民族政策方面的政治较量。

在组建回民支队时，经过上级批准，刘震寰为回民支队聘请了曹遼、丁溪野两位阿訇。这两位阿訇不仅在回民节日带领支队指战员参加回民的社会活动与宗教活动、为牺牲的回族指战员举行葬礼，还在清真寺向回族群众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回民支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情况，对巩固和壮大回民支队，发挥了特殊作用。两位阿訇还创作了许多回民抗日歌曲教战士、群众演唱，其中一首《伊斯兰抗日进行曲》中有：“伊斯兰、伊斯兰，抗日英勇又勇敢，在这广大的平原上，坚持敌后反扫荡……”流传很广。后来，又聘请杨明斋阿訇常年跟随部队，他不仅负责部队的民族宗教生活，还直接参加部队战斗，锻炼成为一名“编外”战士。回民支队每到一处，都以自己更为接近回族人民的身份，用回族穆斯林最容易接受的形式，宣传回回“争教必争国，国有教乃存”的道理，揭露敌人，教育群众，吸引群众以各种形式参加到抗战中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自己领导的少数民族革命武装中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发

挥回族党员干部、回族武装力量在少数民族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进行民族宗教工作和统战工作的具体实践。后来,党中央正是看到了回民支队的这种特殊作用,在这支部队进军东北后,果断地将回民支队安排在后方进行回民地区的土改、反霸工作,为巩固和发展东北根据地和解放区,作出了贡献。

回民支队成立之初,冀鲁边区各种武装林立,一些因各种原因组织起来的“绿林好汉”,有的一度投向回奸刘佩忱;有的既不投敌也不抗日。刘震寰针对这部分人多出身贫苦、讲义气、善战的特点,发动回民支队利用各种关系进行统战工作,主动争取:能经过教育改造者,吸收到回民支队来;动摇不定者,来去两便;不投敌又不投我者,争取不与我为敌;动摇不定者,争取其少投敌或晚投敌;已投敌而有可能争取者,力争其不与我顽固对抗乃至暗中帮助我方。刘震寰还亲自深入当时最大的地方势力李景文驻地,以“拜把子兄弟”形式与之达成协议,从而使其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除日寇直接指挥的大扫荡外,未主动向我进攻,还做了一些掩护工作。争取过来的“绿林好汉”中,不少成为优秀战士、干部。回民支队拔除的日伪据点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这些统战对象所提供的可靠情报或里应外合而实施成功的。

1954年抗美援朝胜利后归国,刘震寰带领铁道兵回族干部,参加西北的社会主义建设,曾任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西海固回族自治州党委书记。1958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先后任工委书记、民政厅长,1959年起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兼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二届常委及政协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二届副主席等职,主要从事民族、宗教、统战工作。任期内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广泛团结党内外各界人士,积极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尤以1962年贯彻中央批示主持各类“神仙会”,积极“贯彻

政策、调整关系”成绩突出。

1968年4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根据中央指示,刘震寰作为老干部代表,被“结合”为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分管农业生产指挥工作,直至1971年12月28日因大面积心肌梗塞逝世于青岛。此前,他曾于1970年率宁夏代表团参加中央“北方农业会议”,向周总理汇报了改变西海固地区农业生产贫困落后面貌的设想,周总理曾握住他的手说:“大革命时期广西也有个刘震寰,可他是反动大军阀,而你却是一位回族革命者。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呀!”

〔王永亮〕

安德馨

安德馨(1893—1933年),著名抗日烈士,字润吾。祖籍河北清苑县,后举家迁居保定。父安老成,为清末保定练军士兵。解甲后靠卖小吃煎包谋生,家境清贫。安德馨自幼抱有救国之志,常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励。决心弃文习武,誓以铁血报效国家。自保定清苑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山东武术练习所,练就一身精湛武艺,以备为国效命。1917年12月,段祺瑞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由,招募参战军。安德馨目击时艰,以为非习军事不足以救国,遂入参战军当兵,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由于他忠于职守,作战勇敢,很快得到升迁,历任司务长、排长、连长等职。1920年直皖战争段祺瑞战败后,参战军被改编,安德馨转入奉系张作霖部任职。1925年秋,被保送到东北讲武堂第六期步兵科深造。翌年6月,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奉军二十三师少校营长兼本师副官长。1928年东北“易帜”后,二十三师缩编为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九旅,他任该旅第六二六团一营中校营长。1930年9月蒋冯阎中原大战后,他所在部队进驻山海关沿线。“九·一八”事变后,目睹祖国大好河山遭日军疯狂入侵,东北三千万同胞惨遭蹂躏,安德馨痛心疾首,多次请缨抗日均遭拒绝。1932年7月,他所在六二六团奉命驻守山海关。山海关即榆关,是当时河北省临榆县县治所在地,系联结东北和华北的咽喉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天下第一关”之称。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为将战火引向华北,即图谋进占山海关。当时关东军已推进到关外长城沿线,多次制造事端,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有效的打击日本侵略者,安德馨一面加紧部队军事训练,一面积极对士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常以“吾们既作军

人,即是以身许国的人”。“到战场上,希望生还,算不了军人;死在战场上,要想留下整尸首,算不了军人。我们军人,能不畏牺牲性命,这才叫以身许国,尽军人天职,才不负人民血汗饷需,国家的委任”^①,以此激励士兵的抗日爱国热情。为了解除作战时的后顾之忧,他将妻子及儿女送回保定故乡。在给其家兄的信中写道:“日寇内侵,国难日亟,军人效命,正在斯时”^②。“我已准备为国守土,置生死于度外。家中诸事,可请大哥负责照管”^③,并嘱托兄长善事老母,抚其幼子。寥寥数语,表现了他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视死如归的英勇献身精神。

1933年元旦之夜,日军在山海关南门外鸣枪,投掷手榴弹,向我哨兵开枪寻衅。当我驻军九旅派员质问交涉时,日军竟反诬我军进行挑衅,提出撤退南关中国驻军,南门交由日军警戒等无理要求。安德馨在得知此事时愤慨地说:“日本人真把我们欺负到家了。他们想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山海关,我们如果不和他们血战到底,就对不起山海关父老,也没有中国人的血性”^④。日军无理要求理所当然的被拒绝后,立即调配兵力准备发动进攻。我军也连夜布置防务,安德馨所部一营奉命守卫南城。他在战前全营官兵召开的战斗动员会上说:“我安某一日在榆关,日人一日绝不能过去。日人欲过去,只有在我们的尸首上过去”^⑤,“吾侪报国,是其时矣”^⑥。在安德馨的鼓动下,全营官兵无不义愤填膺,皆愿效

① 《申报》1933年2月13日。

② 《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③ 晨光学社编《从榆关血战到热河失守》,天津佩文斋1933年3月出版。

④ 《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⑤ 同上。

⑥ 《申报》1933年1月10日。

命沙场，与榆关共存亡。

1月2日上午十时，日军开始炮击山海关。随后一百多名日军利用地形掩护，迂回到南门城下，一面开枪向城内射击，一面架云梯爬城。守卫在城上的一营官兵，在营长安德馨的指挥下，不顾当局不准还击的命令，奋起自卫还击，当场击毙日军儿玉中尉等多人，余者狼狈逃窜。日军恼羞成怒，调来关东军主力第八师团铃木第四旅团三千余人，向榆关发动了全线进攻。一时间硝烟四起，杀声震天。安德馨率全营官兵固守南门，上下一心，沉着应战。每当敌军进入我火力网内他才下达射击命令，各种枪炮同时向侵略者发出仇恨的子弹，致使攻城日军血肉横飞，死伤狼藉。日军发起多次进攻，均因一营官兵顽强抵抗而屡屡受挫，当日战局处于僵持状态。

1月3日上午十时，日军出动陆、海、空三军向榆关发动立体进攻，南门是其进攻重点，战斗尤为激烈。十多架日军飞机临榆关上空进行狂轰滥炸，并不时向南门守军阵地疯狂扫射。停泊在山海关海面的日本军舰，也向县城开炮轰击。日军主力在坦克的掩护下，向南门发动猛攻。在敌我双方装备与人数极端悬殊的情况下，安德馨及全营官兵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恶战。当南门城楼被轰塌时，他命令士兵立即用沙包构筑防御工事，抗击来犯之敌。上午十一时，日军坦克突破一营阵地，三百余名日军尾随其后冲入南门，战事万分危急。安德馨身先士卒，挺身而出，亲率大刀队与敌展开肉搏战。杀得日军尸横遍野，抱头鼠窜。这时一营将士已死伤过半，安本人手部、腿部也相继负伤。他稍事包扎后，指挥士兵修筑工事，准备继续投入战斗。下午二时，日军再次发起进攻。顷刻间，炮弹如注，城墙被毁，十几辆坦克及大批日军由南门冲入城内。安德馨深知为国捐躯的时刻已到，他拎起

大刀,率领全营健在官兵冲入敌阵,与日寇作最后的拼杀。战至城内清真寺附近,他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下午四时,守城之六二六团官兵在弹尽粮绝、后援不继的情况下,奉命撤出临榆县城,山海关终被日军攻占。榆关之战,在敌我双方武器装备和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激战两昼夜,日军死伤六百多人,其中在安部防区仅南门一地,日军死伤就有三百余人^①。独立第九旅伤亡甚大,安德馨所部一营生还者仅二十人左右。安德馨及其所部的抗日义举,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极大的激励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日斗志。

安德馨的壮烈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安德馨殉难时,因战事吃紧,草草掩埋在榆关水西门旁。战火平息后,当地穆斯林冒着生命危险,将其遗体运往秦皇岛清真寺。1月18日,当其遗骸由专人护送到北平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表王以哲将军及各界代表、回族民众共千余人,到车站迎接。次日,在停放其遗体的教子胡同清真寺内,北平各界举行了公祭大会。北平军政机关首脑、民众团体代表和广大市民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与哀思,纷纷踏雪而来,致祭人数达万余人。1月20日,安德馨灵柩由北平运往家乡保定时,北平市长及各界代表数千人前往车站向其遗体告别。当其遗体运抵保定时,家乡人民悲痛万分。22日,保定各界数千群众为安德馨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将其安葬于南关外中马池村,并决定将其故里将军庙街改名为德馨街,以资纪念。2月12日,上海回族群众举行“追悼榆关殉国安营长德馨暨死难军士大会”,全国各省市回族民众团体、地处西北边陲的青海省都派出代表赴沪参加了追悼大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① 《申报》1933年1月9日。

暨国民政府特派代表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等千余人参加了追悼会。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蒋介石、孙科、宋子文等，都送了花圈和挽联。会上还决定购捐“安德馨号”飞机支援抗日战争。此外，南京、天津、开封、镇江等地各界民众，也都为安德馨及死难士兵举行了追悼大会。天津《大公报》、《国闻周报》，上海《申报》、《生活周刊》，南京《中央日报》、《中央时势周报》等报刊都用大量篇幅热情赞扬了安德馨及所部一营与“天下第一关”共存亡的爱国壮举。《世界日报》发表社论说：“人莫不有死，军人以身许国，尤不当惜一死。军人必如安君，始无愧为国干城”^①。张学良将军亲书“守土共存亡，先鞭作我三军气；挥戈思勇决，信史传兹百世名”^②挽联，以示哀悼。

安德馨及其所部的榆关抗战，是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地区第一次以武力抗击日本侵略者，表现了中国军人守土御侮的爱国精神，是自“东北事变以来第一次最光荣之争斗牺牲”^③，在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榆关之战指挥者和殉国者的安德馨，是回族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人们将永远怀念他。

〔答振益〕

① 《回族抗日斗争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② 晨光学社编《从榆关喋血到热河失守》，天津佩文斋 1933 年 3 月出版。

③ 晦《山海关战端已开》，载《申报》1933 年 1 月 7 日。

马君图

一 少年壮志,名扬三晋

马骏(1880—1945年),字君图,以字行。明代著名回族军事家马文升后裔,山西晋城人。君图生而聪颖,十六岁参加童子试,名列前茅。后入山西大学堂西学斋学习,少年文章颇有才气,毕业时被授予“举人”。

马君图是个具有爱国、进步意识的回族青年知识分子。在山西大学堂读书期间,他就注意到,1897年,英商成立了福公司,意在攫取河南与山西的采矿权;1898年,英商福公司与山西商务局签订合办矿务章程;1901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借清政府命各省通筹庚子赔款之机,以250万元将山西孟平路采矿权出卖给英商福公司。马君图对地方官员的这种卖国行为义愤填膺,便联络西斋青年学生群起反对,这是山西收回路矿权的先声。在爱国学生与各界群众的努力下,清政府于1903年正月下诏:许山西矿务尽先由晋丰公司办理,并最终收回了孟平路矿权。

同期,我国改行癸卯学制,留学之风已开,马君图在当时“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思潮影响下,也认为在国家危亡多事之秋,非寻章摘句所能济世,遂不畏穆斯林离乡之艰难,毅然考取公费留学生,入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冶金专业。他在伦敦读书期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了同盟会,马君图成为同盟会欧洲支部的早期成员之一。事为清廷驻英当局密探侦知,上报国内,幸得山西巡抚丁宝铨多方回旋,君图全家始免株连之祸。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马君图放弃学业回国。当时陈其美

正在上海“中部同盟总会”任庶务部长,马君图便在陈的手下工作。1912年,陈其美把马君图介绍给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关外大都督、北伐军总司令的蓝天蔚,推荐君图作关外督府外交司司长。马君图力助蓝天蔚收复了烟台。

在马君图的老家山西,阎锡山于1911年10月23日独立,任山西军政府都督。阎为网罗人才,几次敦请马君图回晋任职。至南北议和,蓝天蔚辞职出国,马君图便回到了山西,在阎锡山手下工作,历任河东观察使、第一届国民参议员、河东道尹、河东盐运使、省政务厅长、省实业厅长、省教育厅长、省政府委员、省查禁毒品委员会委员长、省文献委员会委员长、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马君图生性刚直,有胆略,作事大刀阔斧。1915年赴京参加袁世凯召开的“国事”会议期间,对袁氏复辟帝制不满,便率先退场以示反对,并立即乘专车回山西。赴河东道尹任时,凡沿途属县官员依旧俗于城外路旁张旗列队、奏乐摆宴奉迎者,均革除官职;任内无论土豪劣绅肇事,还是真假“土匪”扰乱,一律严惩。在任实业厅长期间,经过多次与外国公司交涉,收回了阳泉矿权。任查禁毒品委员会委员长期间,查出山西辛亥革命元老黄国梁的侄子黄太清大量制造和贩卖鸦片,毅然下令处决,还下令处决了晋军中一名大量贩毒的师长。马君图与阎锡山的关系比较密切,深得信任,是阎在山西推行“新政”的得力助手。但马君图连阎也敢得罪:1930年,阎锡山认为继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之后,自己“出山”的时机已到,便联冯反蒋、发起中原大战,马君图认为中国连年战祸,民不聊生,如图中原则山西民力不济且难成功,力劝阎停战息祸,未被采纳;马君图便借故不受阎所授北平市市长、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职,愤然回到晋城,闭门谢客,以表心迹。后来阎氏在中原大战中兵败,曾说“悔不听君图之言,致有此败”,马君图闻而叹息,二人

再次重归旧好。

二 关心民族文化,创办崇实中学

马君图作为一位出身回族家庭的官吏,对回族文化、民族教育有深深的感情。

辛亥革命后,王浩然阿訇在北京成立中国回教俱进会,马君图积极响应,他在山西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晋支部,并创办了太原伊斯兰布道会,1920年至1935年,还亲自担任晋城东寺学董。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曾先后聘请马自成、王静斋、庞士谦、尹光宇、杨敬修等伊斯兰教学者讲学。王静斋1924年出国朝觐是在马君图和马福祥的资助下完成的,而尹光宇则是由马君图出资聘请代自己朝觐的。王静斋朝觐归来后,立意翻译《古兰经》,马君图便聘之为山西省教育厅咨议,每月薪金30元。1933年,太原伊斯兰布道会在马君图的倡导下,专门成立了译经小组,由尹光宇、杨敬修等主其事,到抗战前夕译出7卷。后来杨敬修坚持不懈,终于译出《古兰经大义》。山西运城清真寺也是在这时经马君图倡导与资助修建的。运城有回民始自清同治年间,向来有回民而无寺,1915年马君图任河东道尹时,委铁凤岐等购地3.6亩,建成运城清真寺。此外,长治清真寺是1928年修建的。马君图还捐赠经书数百册,与程增光、朵席儒等创办了增儒图书馆,这是山西回民建立的第一个图书馆。马君图在各处任职的办公处所内,都设有礼拜的专门房间,每日按时礼拜,这在当时的回族官吏中是不多见的。

马君图对回族教育十分关心。晋城回民过去囿于陋习和生活不便,多不上学念书,失学者十之八九。1920年,马君图捐资兴建了晋城第一所新式回民小学——晋城清真小学,回民贫困子弟可以免费入学读书。后来他看到回民子弟从小学毕业后因生活不便

而不愿到普通中学念书,便毅然“毁家兴学”,变卖部分房产和夫人的陪嫁首饰,扩建校舍,购置机器、仪器、原料、药品、资料,聘请专家教授,于1927年创办了山西晋城清真中山职业学校。这是我国回族自己创办的第一所中等职业学校,设有纺织、建筑、化学工艺等工业技术课。次年申请备案未获批准,遂名“山西晋城清真实业学校”,设小学、中学两部。1931年正式定名“山西私立清真崇实中学”,1937年增设了高中部。这时,崇实中学已发展到有校舍300多间,仪器设备价值10多万元,图书馆藏有《四部备要》、《太平御览》和历代名家诗文集等珍贵资料,还有文物、字画380多件。学校造价40多万元,有基金7.4万元、奖学金1万元。这样的设备规模,在当时同类学校中不多。冯玉祥将军曾在1930年参观过这所学校,在了解了办学经过后感慨说:马君图是“山西的武训”,并赠图书数百册。晋城的师生也敬誉马君图是“崇中之父”。

抗日战争爆发后,崇实中学曾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后来迁移到远乡白洋泉河村,与县立护泽中学合并为“护崇联合中学校”,先后为晋城、阳城、高平、陵川、沁水等地培养出相当于中专学生六七百名,高小学生三千多名,小学生近万名。开山西新式回民教育之风。

马君图自己也喜欢读书、研究,善诗作,喜著述。主要著述有《历代史诗》、《咏清史诗》、《大学新义》、《正教理论》和《清真要义》等。《正教理论》与《清真要义》是他学习、研讨伊斯兰教义的心得,有石印本和铅印本问世。《历代史诗》与《咏清史诗》是他在阅读中国历史及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历史典籍时有感而发的文学作品集。其中《咏清史诗》有11首发表在1925年2卷1期的《回光》杂志上。其中《左宝贵》一诗写道:“各路军皆死,将军血染斑。九连城下死,胜似曳兵还。”颇能反映他的心志。

三 抗日太行,为国捐躯

马君图母子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国捐躯的。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平津、河北相继沦陷,山西娘子关失守。当年秋天日机轰炸太原,阎锡山命马君图率文献委员会撤往太行山区。行前,马君图将阎预付的两个月工资计1200元取出,购买了400袋面粉,存放在太原清真寺,嘱咐寺上救济难民,自己仅携80元回到晋城。在晋城,马君图向崇实中学1000多名师生发表了讲演,他说:“现在是中华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志士报国正在此时。(现在)阎(锡山)长官奉(国民党)中央之命抗战,我辈能守则守,不守则领导民众游击,配合正规军,牵制敌后,以策应将来。”演说中声泪俱下,感人至深。一些崇中学生后来一直对此记忆犹新。

1938年2月,晋城失陷,崇实中学也被日寇毁坏。时已五十八岁的马君图率晋城、崇中师生及文献委员会工作人员1300多人退入太行山区,一面与敌人周旋,一面在斗争间隙组织学生补课。当时,重庆中国回教协会曾活动孔祥熙汇款3000元,促马君图渡洛入川,到重庆工作,马君图退回汇款,坚持留在山西,与在他全力资助下成立的山西回民抗日义勇军(300余人),活动于晋城、阳城、壶关一带,为此,国民党中央军委授予他中将参议衔,阎锡山授予他上校顾问衔,办理晋东南慰问事宜。马君图多次派人持密信到日占区动员群众捐款送粮,接济敌后抗日部队。此前,在1937年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驻扎晋城后河村期间,曾两度与马君图晤谈,晋东南共产党代表谢丰也曾与马君图商谈过抗日时局,马君图对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表欢迎。所以他率领的回民抗日义勇军,属归阎锡山,也与八路军互通情报。

日本侵华军鉴于马君图在山西的地位与声望,特别是他在华北回族中有较高知名度,专门指定一个名中向井的人长驻晋城,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策反工作,策反不成便来硬的。1942年5月23日,他们侦知马君图慰问抗日军民后住晋城附近贤访村,遂派兵袭击,激战中一名秘书、一名警卫牺牲,马君图在其他警卫掩护下越墙突围。马君图八十九岁的母亲及续妻张氏^①不幸被俘。日寇企图以马母作人质逼马君图就范,马母不为日寇的拉拢威胁所动,拒绝给儿子写劝降信,后于次年绝食而亡。

1943年,日军大举进攻太行山区,6月的一天深夜,日伪军以重兵围袭马君图所住大东掌村,抓住了马君图。日寇如获至宝,先诱以利,叫马君图写信劝晋东南回民降日,遭到拒绝;继而以死相逼,马君图顺答说:“如果我怕死,或者求利求荣,我是早就背叛了我的国家,何必等你们吓死了我的妻子、杀害了我的老母亲,并抓住了我之后再投降呢?”并指斥日军高级军官说:“你们侵略中国犯下滔天罪行,你们把势力扩展到朝鲜和我国东北还不够,又要吞并全中国,野心太大了!必将受到全世界民众的谴责,必将失败!我听真主口唤,任凭你们发落,不会为你们做事。”日寇利诱不成,又惧于他的声望,遂软禁马君图于晋城花胡同内司家巷6号。在被囚禁的几年中,华北一些回族宗教界人士利用日军安排的“劝慰”机会及各种关系途径去探望他,马君图总是坚定地表示:决不当汉奸。

1945年,在我国军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武装的有力反击下,日寇侵华战争失败,同年4月日军从晋城撤退,裹胁马君图至长治,途中日伪医生给马君图注射过药剂。1945年6

① 马君图的前妻程氏,在珏山战役中惊惧致病而卒。

月23日,马君图在长治含恨离世,终年六十五岁。国民党中央政府于次年10月19日发布命令说:马君图“抗战军兴,号召地方青年,协助抗敌,屡奏膺功。及被执不屈,并母妻相继以殉。一门忠烈,洵堪矜式。应予明令褒扬,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以彰其忠尽。”中国回教协会专门为马君图举行了纪念会,并出版了《中国回教协会会报·纪念马君图先生专辑》,内有一位署名“不丹”的诗人称赞马君图是“三晋之介子推”,可谓当之无愧。

马君图生子三人,长松年,英国谢费尔大学钢铁冶金专业毕业;次鹤年,山西大学毕业;幼熙年,山西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均有子嗣。

[王永亮]

五 韩幽桐^①

韩幽桐(1908—1985年),女,原名韩桂琴,曾用笔名静尧、友桐。吉林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人。1918年初小毕业。1926年毕业于吉林省立女子中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并作为女中的代表参加全省学生联合会,领导吉林学生罢课、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同年暑假后到北京,考入师大女附中,后转入私立国民大学。由郭隆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兼作团的工作。在担任中共妇女刊物《妇女之友》社的副主任期间,曾发表《打倒封建》等署名论文。1927年秋考入国立京师大学法学院攻读政治学和法学。适逢谭哨云、马骏来京,重建被破坏的中共北京地下市委,内定韩幽桐担任妇女部长。同年12月初,筹备中的地下市委又遭破坏,韩幽桐也被捕。因无确证,经京师大学校长刘哲保释出狱,押送还乡。不久仍回校。

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韩幽桐和法学院同学积极宣传反帝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韩幽桐担任法学院学生会领导人之一和北平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之一。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女中豪杰。曾于12月4日,组织率领各校学生在车站卧轨三日,争得乘火车南下示威,要求南京政府抗日。曾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门前示威,要求抗日,遭到镇压,被押上火车送回北平,到北平的第二天早晨即被逮捕,经审讯后关在军法处监狱。经北平大学法学院院长保释出狱。1932年该校改名为北平大学法

^① 本文参考资料:张友渔《韩幽桐传略》(秋风整理)。

商学院。当年暑假韩幽桐毕业后,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当研究生,成为该大学第一名女研究生,研究国际法和外交。曾翻译她的导师、日本著名法学家横田喜三郎所著《平时国际法》,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暑假前,韩幽桐完成学业回国。她参加了华北救国会抗日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进行上层妇女界的统战工作,参与成立妇女抗日救国会。“七七”事变后,同张友渔一道去济南,担任中共山东联络局的交通工作,公开职业是在十三路军政训处所办的政治干部训练班教课,讲国际形势、宣传抗日救国。济南失守后,1938年初转到西北联大担任教授,讲授国际法和日本问题。同年10月被解聘。

1939年,韩幽桐到重庆,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参加全国救国会的工作,进行民主宪政运动,并参加领导妇女运动。曾同沈钧儒、邹韬奋、张友渔等共同写了《我们对“五五宪草”的意见》,批判国民党的《五五宪草》。并写了不少关于民主宪政和妇女问题的论文,在《全民抗战》、《中苏文化》、《妇女生活》、《反攻》、《反侵略》、《战时青年》等进步刊物上发表。

皖南事变发生后,韩幽桐同张友渔被中共南方局派往香港。1941年3月到达,在廖承志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文化运动,积极宣传民主抗日。并在《华商报》、《大众生活》、《世界知识》等报刊上发表了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同时担任《青年知识》的编委。此外,还参加了救国会香港工作委员会,负责妇女界的活动。“太平洋事变”后,撤退到桂林。从1942年2月到1943年3月,在桂林协助张友渔做迎接从香港撤退的进步文化人士的工作,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并同邵荃麟等进行文化运动和上层统战工作。工作之余从事著述。1942年桂林新知书店以国光出版社名义出版了她所著的《怎样研究国际问题》。

1943年3月,韩幽桐回到重庆后,在邓颖超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开展民主运动和妇女运动,公开职业是由中共南方局通过王炳南介绍安排在美国新闻处做日文部翻译(笔译)。她翻译了日本平野义太郎所著《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中的一章《走向民主》,由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并主编了一部《法与法学》论文集,由重庆三联书店出版。她积极投入妇女运动,同李德全、史良等发起组织的中国妇女联谊会重庆分会成立,韩幽桐担任理事。

日本投降后,因韩幽桐是东北人,周恩来决定派她去东北做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1946年春她来到东北,从沈阳随军步行几百里,到达哈尔滨附近的宾县。1946年4月,松江省政府在宾县成立,韩幽桐被选为省政府委员。同月28日,哈尔滨解放,松江省政府迁入哈尔滨,她担任了教育所所长。1947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她任该委员会委员同时还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和民族委员会委员,主要工作仍是松江省教育所所长。她跑遍全省各县,深入了解情况,从实际出发,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彻底改造原有学校,并将松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改为省立行知师范学校,自任校长,为解放战争和土改工作培养输送干部,并为整顿小学奠定基础。平津解放后,1949年夏调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1950年调到北京,任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副司长,分工主管工农速成中学教育。1952年各大行政区设立法院,韩幽桐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华北分院副院长。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她改任最高法院民事庭副庭长。

从1954年开始,韩幽桐连续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韩幽桐从法学理论和实际工作的结合出发,写了《关于离婚问题》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批判封建婚姻制度,主张妇女有离婚自由的权利,这对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和指导人们的正常家庭生活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1957年被选为

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韩幽桐调任自治区党委委员、监委委员,高级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她遵照党中央的民族政策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原则,建立了适合于该自治区实际情况的审判制度。1963年下半年调回北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兼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书记处书记,从事法学研究,帮助法制建设和开展国际法学交流工作。

韩幽桐曾多次率领妇女代表团、法学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进行国际交往。1964年3月,她曾以中国法学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第八届大会,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回国后,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她,赞扬她“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并幽默地称她为“当代中国的穆桂英”。

“文革”中,韩幽桐受到残酷迫害,从1966年到1970年冬被隔离审查,剥夺自由。从1970年冬到1972年夏被下放到河南息县,强迫劳动。1972年夏到1975年初,回到法学研究所进行所谓“学习”。她在被批斗中,敢于坚持正义,决不低头,表现了她的铮铮铁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韩幽桐重新担任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粉碎“四人帮”后,积极开展法学研究,整顿组织,清除极左影响。1978年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法制组长,全国妇联执委、常委,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她积极宣传阐释新宪法,多次做报告,参与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等几十个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工作。特别是关心青少年犯罪问题,经过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出了对青少年犯罪进行综合治理的建议。1978年,她在北京率先召开了民主与法制讨论会,对法学界解放思想、打破禁区,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79年她参与主持召开全国法学研究规划会议,制订了法学期

发展的规划。

韩幽桐多次率领法学代表团访问各国和参加国际会议。在法学所接见外国法学界人士,她总是站在马列主义立场,结合我国的实际,宣传阐述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真相,驳斥别有用心者的诬蔑和攻击。

1982年,韩幽桐患了癌症,但仍抱病工作,终因病情恶化,于1985年3月13日与世长辞。她去世后,她的《为的是理想的追求》(1987年北京法律出版社)、《韩幽桐文集》(1991年重庆出版社)相继问世,这是她留给后人的宝贵的文献。

〔马寿千〕

马宗融^①

马宗融(1892—1949年),字仲昭,经名伊斯玛。四川成都人。原籍陕甘,祖辈逃荒而来。父亲卖牛肉维持全家生计。有八个弟妹,宗融居长。读过私塾和中学。1913年在成都一所德文学校学习德文。后由上海转赴日本东京求学。1918年因参加抗议段祺瑞政府卖国密约的斗争而被驱逐回国。与友人罗世安在上海参加留日学生救国会,并参加《救国日报》的发行工作。五四运动爆发,更加激励了他的爱国心。与罗世安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边做印刷工人,边学法文。后入里昂大学学习文学。毕业后在法国工作十多年。

马宗融的妻子罗世弥,即著名女作家罗淑,是宗融好友罗世安的妹妹,比宗融小十一岁。1929年他们在法国结婚,第二年生女儿小弥。马宗融在中法大学任学监,罗世弥在里昂大学学教育。1933年他们回到上海。

马宗融的文学翻译活动,始于1923年。他用文言文编写了《法国革命史》,并以《小说月报》为阵地,翻译介绍法国文学。先后计有长篇小说节译斯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同属于“近代名著百种述略”专栏,在我国为第一次认真的译介本。他翻译的短篇小说有采尔博的《婴孩》、《一条狗的死》,法朗士的《布雨多阿》。并在1926年6月出版的罗曼罗兰专号上发表了创写的《罗曼罗兰传略》。

^① 本文参考资料:1992年成都市伊协编《马宗融先生百周年诞辰纪念特刊》;哈培钰《马宗融传》;马小弥《罗淑小记》。

1933年马宗融携妻女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教学之余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曾为《太白杂志》写过一组风俗志。当时在《文学》、《译文》等刊物上经常有马宗融的译著发表。他还经常向读者报导法国文坛的动态。1935年,马宗融与鲁迅、茅盾等著名作家一道被邀参加由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编评委员会,着手有计划地整理、翻译中国及世界各国的文学名著。马宗融的译作五幕喜剧《塞维勃的理发师》被收入文库的第三册,它宣扬了启蒙思想,表现了打击封建顽固势力的倾向。1936年5月,马宗融在《文学》月刊上发表《浪漫主义的起来和它的时代背景》,文章系统地考察了十七、十八世纪以来英、德、法等国家的文学运动,揭示了影响文学发展的社会、政治、宗教等背景情况,阐明了浪漫主义在欧洲的源头和在法国爆发一场文学革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该文对于三十年代我国文学理论建设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马宗融有散文集《拾荒》和两本儿童寓言故事及一批文章和译作发表。

三十年代马宗融已是著名左翼作家。抗战前夕,他积极投入救亡运动。1936年6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又与鲁迅、茅盾、巴金等联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表明“将更加沉着而又勇敢地在这动乱的大时代中,担负起我们艰巨的任务,以争取民族自由”。

抗战期间,马宗融积极投入抗战文艺工作。1938年5月,他参与筹建了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总会设在武汉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成都分会,并几次被选为文协总会的候补理事和理事。1944年1月在重庆,当郭沫若愤而脱离“第三厅”,另外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时,马宗融应邀担任文工会专任委员。他日夜忙于开会、谈话、宣传及观摩戏剧、讨论时局。凡有利于抗

战的活动,他都支持和参与,凡不利于抗战的事他都反对,敢于直言,打抱不平,表现了他刚烈无畏的性格。他高度评价文字宣传工作在民族危亡时刻的作用并不亚于武士。他认为正是由于有这批作家、文人的活动,“民族的历史才得以永传,民族的文化才赖以不绝”。

为了激励回族同胞的抗战热情,马宗融参与奔走筹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抗日名将白崇禧任理事长,马宗融为几个常务理事之一。为了动员回汉民族团结抗日,马宗融特请作家老舍执笔编写了一部宣传剧本《国家至上》。他带老舍去访问清真寺,结识回民朋友,并组织讨论和反复酝酿修改,1940年初剧本完成。他又商请中国万岁剧团排演,在重庆、成都、昆明、大理、桂林、香港、恩施、西安、兰州、康定等地先后演出,受到各族各界,特别是大后方广大回民的欢迎。马宗融热心于回民文化教育事业的提高,1939年发起成立了“回教文化研究会”,提倡对中国及世界回教文化的研究,并在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上发表了《理解回族人的必要》。又在回教协会会刊上发表《我为什么要提倡研究回教文化》等文章。马宗融曾为提高回民文化素质,培养回族人才而奔波,他与回族人士马剑青一起向回教救国协会申请拨款两千大洋,开办了成都西北中学女生部,又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内办了一个回族垦殖专修班,招收各地回民青年学习农学院基础课程,两年毕业后回故乡工作。

马宗融为人坦诚、热情、健谈,交了不少朋友,在法国留学时与陈毅要好。他同文艺界的朋友交往更多。1925年与巴金第一次相会,就一见如故,推心置腹,成了终生知己。巴金说“他像一团火一样,走到哪里哪里的气氛就热烈起来”。

1938年2月9日,罗淑在成都为马宗融生了一个男孩,不幸得了产褥热,2月27日去世,享年才三十五岁。马宗融深受刺激,痛

不欲生。罗淑安葬在成都老西门外,马宗融在爱妻墓旁为自己留下了一席之地。老友巴金为罗淑整理出版了《生人妻》、《鱼儿坳》和《地上的一角》三本创作集。罗淑还有两个翻译集问世。

1946年秋,马宗融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他积极投入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参加游行总是站在队伍最前列,结果第二年就被复旦解聘。为了生活,他带着第二个妻子和女儿、儿子,去台北台湾大学任教。生活上较舒适而政治空气沉闷。他的好友台大中文系主任许寿裳(也是鲁迅的好友)在一个夜晚遇刺身亡。另一个好友乔大壮回苏州老家后跳河自杀。马宗融深受刺激,郁闷不乐,借酒消愁,不久得了肾炎,全身浮肿。他不听巴金来信劝阻,执意要回大陆,被人用担架抬上民生公司轮船,回到上海。正是上海解放前夕,兵荒马乱,没能得到应有治疗,1949年10月10日深夜病逝。老友巴金写了《怀念马宗融大哥》的文章,说“我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在他身上闪闪发光”,这是对他最了解最正确的评价。马松亭大阿訇和一批回民朋友赶来为马宗融料理丧事,安葬在上海回民公墓。马宗融一生淡泊,靠教书和写作挣得的钱仅够维持生活,毫无积蓄。他遗下的弱女幼子由巴金照顾成人。

〔马寿千〕

马 坚

马坚(1906—1978年),字子实,又署“自适”。阿拉伯历史语言文化专家、翻译家、教育家。云南沙甸人。幼时在家乡读书,经汉兼习。后经白耀明帮助,去昆明读中学,毕业后回沙甸鱼峰小学任教。1928年,辗转去西北虎嵩山处深造,次年又到上海哈德成主持的伊斯兰经学研究社学习,同年在云南《清真铎报》发表《新月问题的研究》,署“甘肃虎嵩山先生讲云南留甘生马坚笔记”。1931年,中国第一批留埃学生组成,马坚在其中。年底他和纳忠等共同到达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这是伊斯兰世界的最高学府,马坚在这里一方面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同时将阿拉伯名著介绍到中国。1934年,他翻译的《回教哲学》(又名《回教一神论大纲》),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他应埃及回教联合会邀请,去讲演中国伊斯兰教。他的讲演共12部分:1.回教何时传入中国,怎样传入中国?2.回教与中国各教之比较,3.中国伟人对回教特色之赞扬,4.回教何以普遍中国,何时普遍?5.中国回教徒的宗教状况,6.中国回教徒的学术状况,7.中国回教徒的政治状况,8.中国回教徒的经济状况,9.中国回教徒的社会状况,10.中国回教衰落之原因以及救济之方法,11.中国回教留埃学生团,12.结论。马坚用阿拉伯语讲,讲词在埃及《胜利》周刊连载。由于读者广泛需要,由开罗求古书局印成单行本。有人将单行本译为中文,在《正道》杂志发表。白寿彝先生时正在开封主编《伊斯兰》月刊,也在该刊1935年第3期予以报道。1936年,马坚翻译的又一部阿拉伯文著作《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由上海中国回教书局出版。时隔二年,马坚的新译《回教真相》,1938年初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年中,发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1939年初,日伪派出朝觐团去麦加宣传,掩盖侵略真相,蒙骗穆斯林世界。正在埃及留学的中国学生接到国内通知,立即组成朝觐团,以庞士谦为团长、马坚为副团长,赶往麦加。赴麦加途中,马坚编辑《朝觐典礼概要》,人手一册。到麦加后,他们以民族大义,对伪朝觐团作了工作,出色完成任务。回埃及途中,马坚拟就《告世界回教同胞书》,寄国内外各大报;同时在渡轮上发表演讲,声讨日寇侵略罪行,申述中国抗战的正义,博得热烈掌声,表现了青年马坚的爱国热情。

1939年秋,马坚回到祖国。先在家乡云南任教,并和白寿彝恢复《清真铎报》。后到上海和哈德成等翻译《古兰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环境恶化,马坚回到家乡沙甸。1943年初,哈德成经由重庆亦到达沙甸,和马坚继续译经。当时生活清苦,哈德成不幸染疾,于同年10月病逝。马坚写了《我所认识的哈德成先生》,表示对恩师的怀念。马坚在译经同时,继续翻译或整理他在埃及译就的作品,1941年有《回教教育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4年又有《回教哲学史》问世,这部译作新中国成立后易名《伊斯兰哲学史》,由中华书局出版。他在云南大学任教编印的《教义学大纲》,后来以《教典诠释》的译名出版。除成本译作外,马坚在三十至四十年代还写有多篇研究伊斯兰教义和阿拉伯历史文化的论文,如《回教先贤的学术运动》、《改良中国回教教育刍议》、《阿拉伯文化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古兰经的各种译本》、《伊斯兰的教育》、《伊斯兰教对于学术的奖励》、《爱资哈大学在二十世纪的使命》等,载于《清真铎报》和《月华》等刊物。此外,马坚还写有《留埃见闻录》、《埃及通信》,报道他在埃及的学习生活。马福祥曾致书马坚,显示回族高层人士对青年马坚的厚望。

1946年,马坚应邀到北京大学任教。从此他离开南方到北方

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直到逝世。他讲授阿拉伯语、伊斯兰教史等课程。这些课程由马坚引进中国最高学术殿堂。同时他以学者的身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迎接新中国到来。1949年7月7日,他在北京回民举行的纪念七七抗战大会上演讲,以《古兰经》的教训阐明七七抗战的意义,再次抒发十年前他赴麦加朝觐时抒发的爱国激情。1949年10月2日,首都回民在回民学院集会,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马坚在会上讲话,歌颂共同纲领和新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月11日,首都文教界回民于东四清真寺举行座谈会,马坚和白寿彝、庞士谦等参加,号召回民积极参加新中国各方面的建设事业。同时写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成功对于回教各国人民的影响》、《回民同胞对于新时代应有的认识》、《伊斯兰教婚姻制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不相冲突》等文章,阐述中国革命成功的世界意义,畅谈中国革命成功开辟了回族历史的新时期。他还写了《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时论文章,说明伊斯兰教创传的真实过程和回民风俗习惯,以增进民族团结。他积极参加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筹备、成立工作,负责一定领导职务。当宁夏回族自治区即将成立时,他积极拥护,在《中国穆斯林》上发表文章祝贺。爱国、爱教、爱族成为马坚这一时期社会活动和学术写作的主题。

作为学者,作为阿拉伯语言历史文化专家,马坚这一时期也写了大量学术著作,主要的有:《回回天文学对于中国天文学的影响》、《伊斯兰文化的光芒——庆祝阿维森纳诞生一千周年》、《元秘书监志“回回书籍”释义》、《阿拉伯文化对于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伊斯兰哲学对中世纪时期欧洲经院哲学的影响》等。他编译的《回历纲要》于195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穆斯林民族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常用工具书。他多次

撰文论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传统友谊,如《中国与阿拉伯各国之间又古老又年轻的友谊》、《中国与阿拉伯悠久的传统友谊关系》、《中埃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等,增进我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友谊,拓宽我国的外交渠道。他将我国的《论语》、毛泽东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译为阿文,将埃及共和国宪法译为中文,促进中阿文化交流。他还写有《全世界最古老的国家埃及》、《中世纪的巴格达》等文,介绍丰富多彩的古阿拉伯世界。他翻译的《阿拉伯简史》197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翻译的《阿拉伯通史》(上、下册)1979年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马坚已与世长辞。他还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和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谈的翻译,我国政府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声明由他以阿拉伯语向全世界广播。

马坚终生为之奋斗的还有翻译《古兰经》,无论在埃及、在上海、在家乡,以及不惑之年来到北京后。他翻译的《古兰经》前八卷,新中国成立之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文通俗易懂,附有大量注释。第七和第八章《古兰经》译文在《中国穆斯林》上连载,但后来未能继续下去。他翻译的全部《古兰经》,在他去世后于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白寿彝教授作序。他写有多篇介绍《古兰经》的文章,除上面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写的有《古兰经的纂集和流传》、《古兰简介》、《重读古兰经》等。1952年为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译的《古兰经》(上)写的“译者序”,全面介绍了我国《古兰经》的汉译本和我国翻译《古兰经》的历史。

关于马坚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白寿彝教授在《忆马子实》一文有如下概述:“子实早年在开罗,专攻阿拉伯文和伊斯兰宗教学,英文水平相当不错,对波斯文、叙利亚文也有所接触。他在开罗留学期间,出版了用阿拉伯文写的《中国回教概观》,用阿拉伯文翻译了《论语》。后来,他又用汉文译出了《回教真相》、《回教哲

学》、《回教哲学史》、《回教教育史》、《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先后在国内出版。他还翻译了《阿拉伯文学简史》和《阿拉伯通史》。《阿拉伯通史》是一本有名的著作，译本为学术界所推崇。《阿拉伯文学简史》可惜没有能在他生前定稿。此外，还著有《回历纲要》、《穆罕默德的宝剑》。”又说：“子实在 1939 年回国，先后在昆明明德中学和蒙自养正学校主持教务，并主持《清真铎报》编辑工作。1946 年后，他任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教授达 32 年。新中国开国时期，他任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继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长期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理事。”白寿彝先生说：“子实的一生，无论在研究学问或别的工作上，都是扎扎实实的。子实名坚，他的一生，可说是名实相符的。”

历经“文化大革命”的艰苦岁月，马坚仍矢志于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1978 年春，他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把晚年献给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说：“我是一个回族教育工作者，……虽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左眼已失明多年，右眼视力已很微弱，行动吃力，但我要把自己的晚年全部献给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马坚一生是这样做的，也是对他一生的总结。但由于积劳成疾，1978 年秋去世，年七十二岁。

〔李松茂〕

纳 训^①

纳训(1911—1989年),字鉴恒,经名努尔。云南通海县纳家营人。幼时在家乡从师习经,后到昆明明德中学读书;由于勤奋好学,成绩优良,于1934年由学校选送进入埃及开罗爱资哈尔大学学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投身于抗日爱国宣传活动,利用报刊、演说等形式,向当时朝觐的十余万各国穆斯林揭露日寇侵华罪恶行径,声援祖国的正义抗战,有力地鼓舞了国际上反法西斯战线的士气。毕业后,时值抗战艰苦的阶段,归途交通断绝,遂留埃及从事翻译工作。在十几年的学习生活中,学业精深,视野扩大,尤其阿拉伯文造诣达到很高水平,为其翻译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此期间,纳训先生曾用阿拉伯文翻译了国内出版的《孙中山》传记,介绍了这位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光辉业绩,歌颂结束了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广泛流传于阿拉伯各国并深入人心。他还下了极大精力翻译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译本在质量方面有很大突破,超越了前人;该译文根据开罗前进学术出版社1907年所翻印最负时誉的巴格达版本,并参照贝鲁特天主教出版社的1928年版本,择善而从,直接译自阿拉伯全文,反映了该书内容的全貌;四十年代初,译成前两卷,译文约50余万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分五册出版;该书的价值正如纳训

^① 本文参考资料:《玉溪地区民族志·回族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回族大辞典·纳训》,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纳国昌《回族阿拉伯文学翻译家纳训先生》,载《回族研究》1991年第1期(创刊号)。

本人在《一千零一夜》译后序中所说:它“内容丰富,情节离奇,充满美妙的幻想,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显示了阿拉伯人民高度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它描述了阿拉伯色彩斑斓的风土人情,记录了阿拉伯几个世纪的变迁,闪耀着阿拉伯古老文化的光芒。”因此,《一千零一夜》译本问世后,经久不衰,始终拥有最广泛的各阶层读者,深受国内外关注和好评。此外,纳训先生还翻译了《古兰经的故事》、《阿拉伯名哲学家传》等,同时还将一些中国文学作品译成阿拉伯文,介绍到阿拉伯国家,主要有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朱自清的《背影》、鲁迅的《风筝》、曹禺的《雷雨》等。

1947年,纳训先生由埃及回国,任昆明明德中学校长,继又主编云南回族刊物《清真铎报》。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在云南民族学院、云南省文联等部门工作,并且又开始重译《一千零一夜》,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次年,随团出访麦加、巴基斯坦等地。1960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部,进行《一千零一夜》全译本的编译工作,经二十多年的辛勤努力,至1985年六卷本全部出齐,共约200余万字,成为中国翻译卷帙浩繁之世界文学名著的一项重大成果。此外,为满足广大少年儿童读者需要,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翻译的《一千零一夜故事》。纳训先生曾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等,终生为祖国的翻译事业及加强中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马兴东]

六 金尔珍

在我国最著名的金石书画团体杭州西泠印社里,悬挂着一块“题襟馆”匾。“题襟馆”三字遒劲豪宕,豁达端庄,疏密有致。到西泠印社参观游览的人看了,无不击节叹服。民国三十四年《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载:“金尔珍(清),秀水人,向居上海,字少芝,号吉石。精鉴古,工行楷,出入晋唐。五十后,专学眉山,更号苏龢。偶写山水,仿麓台、墨井两家,深得古致。”金尔珍,1840年生于浙江嘉兴,1917年病故于上海。他与一代大师吴昌硕、任伯年等金兰结拜,人称“少芝四弟”。清光绪甲申(1884年)八月间,漫游日本,杨伯润、张熊等赋诗送行,张熊并为金氏绘《遨游东海图》。任伯年在光绪丁亥(1887年)正月廿日曾画“吉石先生顾影自怜图”。金尔珍积极参与杭州西泠印社及上海豫园书画善会的组建,出入其中。“题襟馆”系他1914年6月七十五岁时书写的。

金尔珍书法颇有名,倪禹功称“能与高李龢齐名”。请他书写匾额题词的不少,一般匾额每字酬金4块大洋,一副对联亦需3块大洋,这在当时是较高档次的笔润,足以说明金尔珍书法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他的书法作品有《梅花草堂临晋唐小楷》、《梅花草堂临书》(小楷)等,罗振玉为《梅花草堂临书》题书名。

金尔珍擅长国画,侧重山水,尤喜画梅,他画的梅秀劲妩媚,梅的清雅隽永皆出诸笔端,故其书斋署名“梅花草堂”,其别署尚有“三十六鸳鸯湖之长”、“烟雨耕夫”等。他寓沪鬻画以资奉父,所作山水出入麓台、墨井之间,花卉翎毛颇有新意。他的国画作品仅据《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载录,有《仿李长蘅溪山晴霭图》、《梅花草堂岁朝图》、《梅花奇石图》等。其中《仿李长蘅溪山晴霭图》较出

名,收入了日本《支那名画宝鉴》。日本著名学者河井仙郎、长尾甲是西泠印社社员,金的好友。日本书法家苏峰拜金为师,他的名字是金尔珍题的。

金尔珍嗜金石,工刻印,又富收藏,凡商周秦汉彝鼎尊匜圭璧之属,靡不摩挲考据。因此他鉴别精详,名闻一时。金亦善诗,常与沪上朋友吟诗作对。著作有《梅花草堂诗》。金尔珍自己对书画、诗词、金石情有独钟,并教育后辈热爱中华文化。其悼念嘉兴籍回族书画家、表兄郭小庭的诗曰:“寒香书屋忆周旋,忽忽驹光五十年。一事告君堪慰藉,两家群从食书田”,对金郭两姓后辈子孙学有所成感到快慰。

金尔珍在沪几十年,素常往来的好友有高邕之、吴诵清、杨伯润、吴伯滔、张子祥、陆廉夫、朱梦庐、吴俊卿等,均为当时沪上名流。

金尔珍还撰写过一本专门记叙其姐金尔英事迹的《金孝女传》。据清光绪《嘉兴府志》载:“金孝女,名尔英。父傅庆,号芝山,鰥不复娶。女失恃,犹未笄,昼操作,夜课弟尔珍读。父双目起翳,舐以舌复明,饮饌衣履,先意承欢。庚申迺地沪城,闻女贤者,争执柯。女以患难余生,愿终身侍父。喜读《女诫》、《孝悌图说》等书。在室四十年,卒。”金孝女故事传流四方,还感动清皇,赐下“孝女匾”。“孝女匾”悬挂在故里嘉兴清真寺,解放前毁损。上海著名画刊《点石斋画报》曾刊“金孝女图”。《金孝女传》已佚,据说其首句云:“我高祖来之西域。”金氏祖上信教至诚,乐善好施,曾向嘉兴清真寺捐助房产和坟地2亩,俗称“金家坟(地)”。清末迁居上海,济贫扶困,收留的贫困亲友常住不返,有人以“孟尝君食客三千”比喻金家的慷慨。金尔珍之妻斋月必住上海高墩路清真女寺一个月,封斋礼拜;后年届高龄,即请阿訇到家领拜,讲解教义。金尔珍夫

妇均安葬于嘉兴回民墓地“金家坟”。

〔郭成美〕

嘉兴回民墓地“金家坟”位于嘉兴城南门外，是嘉兴回民集中安葬的地方。据当地回民传说，该墓地在明朝初年建立，当时嘉兴回民因受迫害，被迫迁居嘉兴城南门外，死后便安葬于此。墓地内有许多家族墓，其中以“金家坟”最为著名。据传，该墓地的建立与金家有关，金家在嘉兴回民中是一个大家族，其祖先在明朝初年迁居嘉兴，死后便安葬于此。墓地内有许多家族墓，其中以“金家坟”最为著名。

嘉兴回民墓地“金家坟”的建立，反映了嘉兴回民在明朝初年所遭受的迫害。当时，嘉兴回民因受迫害，被迫迁居嘉兴城南门外，死后便安葬于此。墓地内有许多家族墓，其中以“金家坟”最为著名。

嘉兴回民墓地“金家坟”的建立，反映了嘉兴回民在明朝初年所遭受的迫害。当时，嘉兴回民因受迫害，被迫迁居嘉兴城南门外，死后便安葬于此。墓地内有许多家族墓，其中以“金家坟”最为著名。

嘉兴回民墓地“金家坟”的建立，反映了嘉兴回民在明朝初年所遭受的迫害。当时，嘉兴回民因受迫害，被迫迁居嘉兴城南门外，死后便安葬于此。墓地内有许多家族墓，其中以“金家坟”最为著名。

嘉兴回民墓地“金家坟”的建立，反映了嘉兴回民在明朝初年所遭受的迫害。当时，嘉兴回民因受迫害，被迫迁居嘉兴城南门外，死后便安葬于此。墓地内有许多家族墓，其中以“金家坟”最为著名。

嘉兴回民墓地“金家坟”的建立，反映了嘉兴回民在明朝初年所遭受的迫害。当时，嘉兴回民因受迫害，被迫迁居嘉兴城南门外，死后便安葬于此。墓地内有许多家族墓，其中以“金家坟”最为著名。

嘉兴回民墓地“金家坟”的建立，反映了嘉兴回民在明朝初年所遭受的迫害。当时，嘉兴回民因受迫害，被迫迁居嘉兴城南门外，死后便安葬于此。墓地内有许多家族墓，其中以“金家坟”最为著名。

金颂清

金颂清,字兴祥,浙江嘉兴人,清末书画家金尔珍之子,沪上学者、书商。生于1878年,卒于1941年。

金颂清精儒学,二十一岁时补博士弟子员,后致力于经世之学,著有《管蠡小识》,博论新政西学。他深晓日文,与海宁王静安同受业于日人藤田丰八,译述成书甚多,都言东西史地及农事新政。善书法,常为日本友人书写唐诗《枫桥夜泊》,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尚保留有他的墨迹。亦绘画,早年擅写山水,意在青藤白阳之间,晚年画梅。爱好金石,1923年辑《梅花草堂集古存印》。

1902年其父金尔珍有病,类似中风,一时未能痊愈。金颂清称:“余从此遂弃儒就贾,即以书画经籍金石为生计矣。”金颂清对图书文物的研究有较高的造诣,善鉴真伪。1926年他在其父收集的大量古籍藏书的基础上,于上海虞洽卿路即今西藏中路九江路口的大庆里开设“中国书店”,专营古今图书。书店经理先是陈乃乾,后为回民郭石麒,店员多回民。金颂清的儿子礼和、祖同、贵南常到店里帮忙。他本人则经年长途跋涉,远至日本,近则北京、天津、洛阳等地,收购旧书字画。当时上海书店书摊较多,买卖多注重一些善本,该店却在清代精校精刊书上着力,独树一帜,颇具特色,受到社会各界关注。鲁迅、郭沫若、郑振铎、阿英等我国文坛巨匠均是书店常客。据报载,鲁迅所购各书,日文方面多在“内山书店”,古旧书则自到书店购买,其中以“中国书店”去的次数最多。鲁迅自“中国书店”购得的书籍有:《八史经籍志》、《承华事略》、《常山贞石志》、《华光天王传》、《阮嗣宗集》、《诗经世本古义》、《南宋六十家集》、《顾端文公遗书》、《癸巳存稿》等。郑振铎购之“中国书

店”的书籍更多,郑氏《劫中得书记》涉及图书 88 本,其中得之“中国书店”21 本,几近四分之一。《西谛书话》记其得书后“一见狂喜”、“尤为得意”的《云林石集》、《今吾集》、《笔云集》、《梅岩胡先生文集》、《月壶题画诗》、《文山全集》、《林下词选》等亦得之“中国书店”。据统计,在 1940 年 1 月 4 日至 2 月 3 日一个月时间里,郑振铎有十六天去了“中国书店”。郑振铎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市书市颇为可观,一些收藏家每天到“中国书店”等书店收购,几乎是风雨无阻。他们往往以“中国书店”为集中的地点,一包包的邮件,堆得像小山自己阜似的。书店和鲁迅、郑振铎等很熟,熟悉他们的住址和所需的书目。书店按他们的需要,特地把书存放开,并派店员送到他们家。

金颂清为人正直,热爱祖国文化,支持进步事业。他的“中国书店”曾参加了“以国家的力量”来抢救“许许多多的民族文献”的工作。1939 年前后,日本加紧掠夺我国图书文物,为了从日寇手中抢救国家文物,在当时从事文化事业的进步人士的倡议下,“中国书店”有意识地大量采购古旧书画、书籍放在豫园路 44 号郑振铎和爱文义路张寿咏家。金颂清派书店的行家参加对这批图书进行整理,分甲、乙两类,登记编目和包装,最后由“中国书店”出面寄往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许地山先生收。据当时经办人之一杨金华回忆,共寄去 2790 余件,全是我国非常珍贵的图书文献。

金颂清和子女大力支持郭沫若等在上海办的《救亡日报》,把“中国书店”店堂后的一间灶披间供《救亡日报》编辑、发刊之用,承担了很大的风险。这事后来被日本方面知道,曾勒令书店停业七天,施加种种限制。“中国书店”在金颂清病故后的第二年倒闭,倾向进步而遭反动派扼杀是其倒闭原因之一。郑振铎这样记述:“有一天到了中国书店,那乱糟糟的情形依样如旧,但伙计们告诉我,

日本人来过了,要搜查救亡日报的人,但一无所得。”“还有一天,我坐在中国书店,一个日本人和伙计们在闲谈,说要见我和潘博山先生,这人是清水,管文化工作的。一个伙计偷偷的问我道:‘要见他么’,我连忙摇摇头,一面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装着一个购书的人。这人走了后,我向伙计们说道:‘以后要有人问起我或问我地址的,一概回答不知道,或长久没有来了的一类的话。’为了慎重,又到汉口路各肆嘱咐过。我很感谢他们,在这悠久的八年里,他们没有替我泄露过一句话,虽然不时的有人去问他们。”“中国书店”积极从事中日文化交流,该店不仅经营中国古旧书籍,而且还经销日本珂罗版印的书籍画册,同大阪博文堂、东京文求堂有业务往来,驰名于日本。

除了“中国书店”,金颂清还开办过不少书店。1914年与罗振常创“食旧廛”于上海天主堂街,翌年停闭;1915年创“青籟阁”,未久亦停;1931年与罗振玉创“墨缘堂”于大连,后并于罗氏;1932年创“中国通艺馆”于上海汉口路;1937年创“秀州书社”于上海西摩路32号即今陕西北路。金颂清著《海日楼读书记》四卷,乃目录学著述。

金颂清为亲友身后营谋丧葬不知凡几,日常捐助善举不断。他曾佐罗叔言奔走北方赈灾,捐款修葺嘉兴礼拜寺。他“奉教尤虔,谨笃于斋拜,即万不得已于朱麻尔日必拨冗赴寺礼拜。临歿前数日,数问今日星期几,而终于朱麻尔。”

金颂清初娶孙氏,生子宝书、管书。孙氏卒,继娶马氏,生子礼和、春源、祖同、贵南,生女福娟、德娟、淑娟。宝书十九岁亡,管书、春源分别在两岁和一岁夭亡。

[郭成美]

金祖同

金祖同(1914—1955年),字寿孙,笔名殷尘、晓冈,清末民初沪上学者金颂清的第五子。生于1914年,他幼小受祖、父影响,舞文弄墨,聪敏过人。郑逸梅说他“美风仪、擅辞令,早年即头角峥嵘,渊博如老儒。”特别在甲骨文研究方面,更出人头地。二十岁左右,金祖同造访章太炎,对其甲骨文为“真伪莫辨之物”的说法及其他问题进行讨论,多次驰书申辩。章太炎连续复书作答。金使章太炎对甲骨文的认识开始有了转变。一个初涉殷墟、血气方刚的小青年与一代大师、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互通信件、谈古论今、研讨学术,一时被传为佳话。在日期间,金祖同经常和郭沫若同应《书苑》的征稿,深得日方学者的钦佩。金祖同的甲骨学论著有《殷契遗珠》、《龟卜》、《邦斋藏甲骨拓本》、《中国文字形体的演变》、《剖面的殷代社会举例》、《殷墟卜辞讲话》、《甲骨文辨证》、《章太炎先生书后跋》、《闲话甲骨文》、《孔德所藏卜辞写本录副》等。郭沫若亲自为《殷契遗珠》、《龟卜》、《甲骨文辨证》作序。

“祖同金君,亦有志于契学,而拓墨之艺尤精。渡日以来,于此邦藏家所搜甲骨,拓存殆尽。其用力之勤且专,良属后起之秀。本编之成,彼亦有与有力焉。”这是郭沫若在自己的巨著《殷契粹编》序言中对他的学生金祖同的赞语。1936年金祖同赴日师从郭沫若学习甲骨文,他将携带的上海刘体智所藏全部甲骨拓本,毫无保留交给郭研究发表,郭沫若1937年4月著成《殷契粹编》。

金祖同写过一本著名的《郭沫若归国秘记》。他生前一再说,抗战爆发,能陪郭沫若先生自日本归来,参加抗日救亡,这是一生最值得回忆的。那时,金祖同和钱瘦铁瞒着日本当局,共同策应郭

沫若秘密归国。当郭沫若在上海公开露面,发表抗日言论时,日本当局才知道,便恼羞成怒,把尚在日本未及回国的钱瘦铁关押起来,同时出动舆论工具对郭沫若、金祖同大肆污蔑,进行人身攻击,还歪曲篡改历史,把郭沫若归国渲染成“中国文苑之谜”,在国际上也造成一定影响。为了反击,金祖同将郭沫若归国的详细经过写成《鼎堂归国实录》少量发行。后改成为《郭沫若归国秘记》,1945年9月用殷尘这个笔名,由上海言行社出版。《郭沫若归国秘记》的发表,当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至今仍不失为研究郭沫若秘密归国的珍贵史料。郭沫若、金祖同情谊甚深,1937年郭逃离日本时,曾手书一纸“遗言”,嘱托金祖同在他万一不能脱身而遇到危险时,带回国内发表。

金祖同曾在宋庆龄、沈尹默等人的支持赞助下,出版过《透视》期刊,参加了《说文月刊》的编辑。其妹金德娟对笔者说,抗战时期,金祖同曾与宋庆龄共事于中国福利会,宋曾亲笔用英文在一本书的扉页上题词“Appreciate your work”,意为“你的工作成绩很好”。并参加了祖同的第二次婚礼,十分器重他。姜德明《书叶小集》记:“不久前偶然见到夏衍同志,问起金祖同来,他说当年认识的,而且也谈到《救亡日报》在困难的时候,曾经得到过他的帮助,得以在中国书店的灶披间发稿编报。”当时阿英同志与他更熟悉。“印象中金祖同擅于交际,与各方面的人都有来往,其中包括政界人士,但是就其政治倾向来说还是比较进步的。”叶灵凤说:金祖同“借出他的书店余地供救亡日报使用,实在是很勇敢的行动。”抗战胜利后,金祖同曾在台湾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并将于台湾收集的高山族文物在上海展览,颇有意义。

金祖同是当时沪上著名学者,除精研古文字学、考古学,还善书法,酷爱欧阳通《道行法师碑》;又喜篆刻,不肯多作,郭沫若曾为

他订有润例。其文章还有《读伊斯兰书志》、《金山卫访古记》、《流沙遗珍》、《台湾的高山族》、《写给郭夫人安娜女士》等,辑有《郭沫若、鲁迅、刘大白、郁达夫四大家诗词抄》、《郁斋宋元押印存》、《郁斋钦印集存》等,其中《读伊斯兰书志》,对伊斯兰教认识不乏精辟之论,被收入《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49年2月,金祖同用“疾雨”笔名发表了《革命青年领导者郭沫若》。金祖同在日本期间,注意保持回族的风俗习惯。有次他陪作家凤子到郭沫若家吃饭,安娜夫人特意用自己从小养大的鸡款客,口中还念念有词。

上海解放后,祖同曾去北京探望郭沫若,郭拟介绍祖同去革命大学学习,未果。1951年祖同参加上海市革命纪念馆筹备处工作,后又转上海图书馆工作。

[郭成美]

马 骥^①

马骥(1886—1938年),国画家。原名马骥,字子骥。出身于四川省西昌县一个回族小商家庭。幼年丧父,靠长兄马俊成开书画装裱店为生。受装裱店环境影响,他对国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常对着壁上的字画以指头“空临”。加上他天资聪颖,到发蒙读书时,已能作整幅图画了。马俊成见他艺术天赋好,对他倍加鼓励。1902年,马骥十六岁时,拜西昌城内名画家周境塘为师,学习绘画。周先生重临摹,更重“师法造化”,且无门户之见,兼采各家之长,写意与工笔兼施。其绘画风格和见解对马骥的影响很大,使马骥对他十分敬慕,故自号“企周”。同时马骥的天赋和勤奋好学的精神,也深受老师的喜爱,老师曾把自己多年精心绘制的、一直不肯轻易示人的《潇湘八景图》传予马骥。并鼓励他,要他发奋为人,卓异自立,画学精微无止境,不能做井底之蛙,要到名山大川、通都大邑去开扩眼界,增长知识,拜师深造,才能取得更大成就。马骥很理解先生的心意,于是更加刻苦地习画,并积极作出门远行的准备。他常到县境内的风景名胜地泸山、邛海等地写生,在不长的时间里,就积累了画稿盈筐。由于家居西昌(旧称建昌)风景秀丽的邛海之滨,故其作画曾署款“建昌马”或“邛池渔父”。1906年,他应邀到会理,参加景庄庙巨幅壁画的创作,并举办个人画展。以八椽屏《火烧百鹊寺图》得到画界好评。然后去云南大理写生,1908

^① 本文参考资料:张运鹏《名画家马骥》,见《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12月第一版;吴嘉陵《马骥》,见《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五辑,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1988年10月。

年回到西昌。

马骀出身贫苦,接近劳动群众,拥护社会变革。当辛亥革命浪潮波及到西昌时,周境塘首先剪掉辫子,马骀带头响应。他为人正直,憎恨邪恶。除了国画创作外,还喜作漫画,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进行辛辣的讽刺。

为了实现他的远大抱负,1912年6月18日,他只身离家出游,徒步到风景秀丽的峨眉山、乐山一带写生作画。历尽艰辛,最后到了成都。初以卖画糊口。不久与成都画界的张慎行、丁六阳结为朋友。后来同几位国画界朋友创办了《神州画报》,大家推他担任主编。当时西方绘画艺术已经开始在成都传播,使他的见闻视野更为开阔。他兼采西方素描手法,参考透视原理,并广泛吸收历代各家之长,逐渐形成了他国画艺术的独特风格和技巧。

马骀个性耿直,对军阀横征暴敛深恶痛绝。曾在画报上发表了揭露原咨议局副议长罗纶贪污铁路股款的《骡子图》和袁世凯在四川爪牙代理都督胡景伊逐走省议长胡骏以朱大镛代之的《胡儿牧猪图》。虽击中时弊,却触怒了当局,扬言要查封画报社,逮捕主笔。马骀只得离开成都,与画友张慎行一道同游川南,然后由宜宾顺江而下,过三峡,出夔门,到汉口,沿途写生作画。这次写生的部分作品,收入了后来出版的《马骀画宝》中。他在汉口住了一段时间,又转回四川北部的剑门栈道写生作画。旅途中受回族教友相劝,与张慎行在川北分道。马骀北上,依靠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将军避祸。是时马福祥在西北招贤纳士,对他的国画艺术大加赞赏,他的画名又得以传闻于西北。由于他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曾向马福祥提出拟到山川秀丽、人文荟萃的江南去寻师访友,得到马福祥的支持。于是他由陇至秦,游长安古都,登华山,过潼关,经河南到山东,然后南下苏、浙、皖等省,大江南北的名胜古迹游历殆尽。凡游

踪所至,他都写生作画,其作品大都录入后来出版的《马骀画宝》和《企周画集》之中。

1920年左右,马骀到了上海。他的画曾一度被人视为“不脱江湖俗气的川派”。他不服此说,但自省青年时读书不多,诗、书修养不足。于是虚心求拜上海著名书画家曾熙(农髯)为师,学习中国文学、诗词和书法,成为曾的入室弟子。彼时四川籍的另两位画家张善子、张大千兄弟也在上海,同在曾先生门下学习。马骀和张善子年纪相当,且往来密切,遂结为“金兰之交”。同时执教于上海美专,与黄宾虹、徐悲鸿、刘海粟等共事。

经过曾农髯的教诲,马骀在书法、文学和诗歌等方面有了更深的造诣,从而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境界。曾在与友人通信中自谓“检十年前自作之品观之,不胜惭愧万分,始能自辨其川派之恶俗,幸弟不耻下问,逢人请教,竭力避去川派之恶习,今得立足沪滨。……今上海川中画家,脱去川派者,只张善子、张季爱(张大千——撰者注)昆仲与第三子,尚受大众赞许”。

马骀国画的技艺日渐精进,凡国画十三科,他都擅长,而尤工“博古花卉”,受到国画界很高的评价,而名闻遐迩。1929年,马骀家乡西昌县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曾向马骀征稿。他在上海作了“西昌八景六名胜”共14幅国画,在上海制成锌版寄回西昌。1930年左右,日本帝国画院慕其名,邀请他去日本东京举办了一次画展。尔后,其画又曾到过伦敦、巴拿马、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展出。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日寇侵略华北,民族危机严重,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马骀,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宣传洪流中。他以画笔作刀枪,亲身投入并组织学生画宣传画等,歌颂抗日英雄。他画了一批国画,参加上海书画界发起的义卖捐款,支援前线。其中有一幅《临敌不惧,勇冠三军》是他

亲临战地上写生创作的。他将前方战况剪报寄回西昌,托友人张贴在西昌城外南门口,让家乡人民了解国家大事。他还把上海报刊上发表的自己和其他画家画的反日军侵略的漫画剪辑成两册,寄给在家乡教书的女儿,要她把画册作为对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的教材。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侵华日军飞机轰炸上海,马骥唯一的一个儿子头部被弹片击中身亡,他因之悲愤抑郁。不久,上海沦陷,他忧国忧民,在战乱中贫病交加,于1938年2月2日病逝于上海法租界西门路寓所。书画家曾农髯为之收殮,并把噩耗函告西昌亲属。

1941年,《西昌县志》出版,他生前为志书作的14幅画被刊于志书之卷首,给家乡人民留下了珍贵的墨宝。据《西昌县志》介绍,马骥的国画作品和国画论著有《马骥画宝》、《企周画集》、《马骥画问》、《企周画剩》、《四言画诀》和《马骥画诀大全》等六种。其中,1929年出版《企周画剩》第一辑,该辑第一幅《秋山萧寺图》被王念兹选入《近代名画大观》画册中。第二幅《寒夜出征图》是歌颂北伐军的,他大胆地把现代人物形象画进国画中,在当时是一大创举和革新。同年,应上海世界书局约请而作的《马骥画宝》出版,该书历时五年而成。由国画家黄宾虹先生为之作序,康有为、但懋辛、石仙和张大千分别题词。对马骥的国画艺术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君企周,画宗南北,艺擅文词,众善兼赅,各各精妙,编订成帙,用广流传,行见纸贵洛阳,共争先于快睹,何翅堂开宝绘,集名画之大成耶。”(《马骥画宝》序)

马骥特别注意培养画界新人。在上海美专任教期间,汇编了适合初学者及研究者所需的美术教材数种。他把自己的国画艺术理论和在国画艺术创作实践中的心得体会,全部笔之于书,编印出

版了《四言画诀》和《马骀画诀大全》等,比较系统而全面地把国画艺术的各个方面的法则、要领编写成通俗易懂的歌诀,是当时最完备、最适用的画谱。使后学者有良法可循,少走弯路,收事半功倍之效,受到了社会广泛的欢迎。其画册被北京荣宝斋和上海书店等多次重版翻印,发行至国内外。

〔郭嵩明〕

七 马安良

马安良(1855—1920年),名七五,字翰如,经名阿布杜·麦知德。甘肃临夏(河州)漠尼沟人,生于咸丰五年(1855年),系马占鳌的长子。同治十一年(1872年)随父降清,率所谓“十大少爷”去安定左宗棠大营请降,左宗棠赐名“安良”,授七品军功顶戴。此后与其父镇压西宁、肃州起义军时非常卖力。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随提督董福祥镇压河湟一带回民起义,杀害大批反清义军和群众。在办“善后”中,向河州、临洮回民收所谓罪款白银45万两,粮2万多石。同时,将花寺主要负责人,河湟事变的主要负责人马永琳一家数十口全部杀害。穆夫提教主马维汉亦未幸免。马安良因功被授花翎副将总统衔,赏穿黄马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等逃到西安时,率部赴陕护驾,深得嘉许。同年董福祥被革职回家。马安良回甘肃驻防河州,后升任宁夏镇总兵(未到任)。宣统元年(1909年)任甘肃马队第一标标统。1911年辛亥革命时,张云山、张凤翔等革命军占领西安。清政府任命升允为陕西巡抚,陕甘总督长庚命马安良在家乡扩充军力,为升允攻陕作准备。当时马安良只有一营三旗,住河州,接长庚之命后欣喜若狂,到12月底即募全16营,约6000余人。鞍马自备,有来复枪、毛瑟枪7000余支,总称精锐西军。升允以马安良为主将组织甘军分三路进攻陕西革命军,第一路以西军提督马安良为主将,从平凉、邠州等地沿陕甘大路攻乾州;第二路以固原提督张行志的“壮凯军”为主向凤翔等地进发;第三路以旧甘军及省县绿营兵为主力,向长武等地进军。1912年1月2日马安良总部驻扎在乾州十八里铺,1月3日马安良在侦察时被围,被

附近西军飞驰急救脱险,随即与马廷勳、马国仁等与革命军激战于乾州外围铁佛寺。由于张凤翔和马玉贵(回族,时任陕西粮饷都督)等革命军的增援,战斗未分胜负。4日升允、彭英甲等到达十八里铺,又派陆洪涛、马国仁率部向铁佛寺进攻,5日拂晓,张凤翔率醴泉革命军增援,双方相持于铁佛寺,革命军占领陵坡。马安良急率护卫马队数十人救援,行至武则天陵园,由于众寡悬殊,马安良二次又被围困,被升允救出。经过长时间攻守战,乾州未克,醴泉亦未得手。2月28日,陆洪涛攻下醴泉,乘胜向咸阳推进。升允向清廷只表扬陆洪涛,而不提马安良。当陆洪涛再次攻咸阳受挫,逼迫退回醴泉,马安良虽近在咫尺,升允也来信告急,但马安良仅派兵救出升允而不肯援助解围。与此同时,马安良与张行志密约,张攻凤翔,马攻乾州,会师进攻长安,与陆洪涛争高低。但连战两月,云梯,地道均未奏效,凤、乾两地仍未攻开,马安良一筹莫展。到3月2日,清帝溥仪已退位一月,而升允接到电报密而不宣,仍督饬马安良、陆洪涛等加紧进攻。但张云山将清帝退位诏文,射出城外,马安良得知即质问升允,升允无法掩饰,遂将南北议和、清帝退位的诏书面交马安良。3月2日,甘肃攻陕各军,在承认共和的形势下,双方停战议和。3月6日(农历正月十八日),陕军首领张云山在乾州城外古庙中会见了马安良。一见面就说:“大哥,我给你磕头”,马安良连忙还礼,互相扶持,言归于好,并和马玉贵说了“色俩目”。不久入陕各军,次第撤退,马安良率部回到兰州。住南滩街,称帅府街,不久,马安良被甘肃都督赵维熙保举为甘肃提督。民国时期,任国民党甘肃支部长,一时成为甘肃政局中举足轻重之人物。1914年因与甘肃督军张广建不和,被张排挤,遂率部移驻河州。同年派军队杀害了两道堂创始人马启西、丁全功等数十人。还杀害了省参议长李镜清。1917年任河西护军使,奉调兰州,至

锁南坝(东乡族自治县锁南坝),突患重病,返回河州病故。

〔马 通〕

马福祥

马福祥(1876—1932年),字云亭。甘肃河州韩家集阳洼山人。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六岁入本村清真寺学习阿拉伯文,八岁攻读诗书,十四岁随兄马福禄习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曾以乡试第二名中武举。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河湟事变时,清军大部东移,参加中日甲午战争,留驻军队不多,在起义军的打击下,“兵不敷调”,清廷下令甘肃各地,准回绅招兵买马,“练士勇以资防卫”,马福禄、马福祥兄弟招募士勇二百人,名“安宁军”,分步、骑两营,福禄为督带兼步兵营管带,福祥为骑兵营管带,与马安良部同归河州镇汤彦和节制。是年七月,汤彦和军被起义军打败,马福禄、马福祥兄弟保护汤彦和经洮岷回到兰州,汤受处分,力保马福禄、马福祥兄弟忠实可用。

河湟起义军失败后,清军捕杀了起义军领导人马永琳、周七十和马维汉等,董福祥命马安良、马福禄、马福祥办善后,马福禄、马福祥在青海米拉沟杀害群众很多。董福祥授予马福禄记名总兵,并将马福禄、马福祥的“安宁军”编入“简练军”。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马福禄、马福祥随董福祥的简练军北上京畿,驻防蓟州。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马福禄、马福祥统率的马步七营移防山海关。六月十日,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发,马福禄、马福祥奉命赶赴黄村,配合义和团阻击侵略军。六月十六日与义和团在廊坊车站合围八国联军,马福禄骑兵下马设伏,步兵张两翼,敌近发枪,八国联军死伤很多。十八日,敌弹如雨,马福禄、马福祥仍“挥短兵闯入阵、喋血相搏”。同年六月马福禄、马福

祥奉命回师北京,在董福祥的指挥下,攻打八国使馆,八国联军借口保卫使馆,于七月初,以二万兵力进犯北京。马福禄、马福祥奉命入卫京师,戍正阳门,八月十三日,八国联军攻正阳门,马福禄、马福祥力战夺数栅栏,不幸马福禄中弹阵亡,兄弟子侄等死者数十人。八月十四日侵略军进入京城,慈禧、光绪西逃,董福祥率兵保驾,马福祥接替马福禄率部随行。马福祥与慈禧近侍张兰德结为金兰,与升允亦有往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辛丑条约”签订,马福祥保驾回京。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慈禧以“马福祥兄弟在京有战功,沿途宿卫亦著劳谨”,积功以提督记名,不久补为副将。光绪三十年被调任甘肃庄浪协镇。光绪三十一年升允任陕甘总督,马福祥调任陕甘督标中协。次年,马福祥升任西宁镇总兵,又兼阿尔泰护军使。时达赖喇嘛十三世图丹嘉措由库伦回西藏,经兰州与升允失和,又与塔尔寺活佛阿嘉呼图克图十九世不和,经马福祥调解双方和好,受到升允好评。

宣统元年(1909年),升允将部分甘军改编为常备军,共分马步四标,马福祥兼任步兵第二标标统。二月马福祥兼代新疆八里坤镇总兵。冬伊犁将军长庚调任陕甘总督,将常备军改为边防队,马福祥任西路边防统领。宣统二年任新军第二标标统,曾先后镇压八沟藏民反清起义、凉州会党反清起义,并偕甘凉道尹张毅查办甘州烟苗案等。

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武昌首义后,全国各地响应,西安也为革命党所占领,甘、宁、青、新也受到影响,长庚与升允将甘肃各军并为“甘肃东征军”,命令攻陕,并令马福祥募回军出击,马福祥托词“服制未除,呈请终丧”,长庚命其留戍兰州。

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十四日,甘肃接到清帝退位诏书及全国息兵的通知,长庚密不发,命继续攻陕。二月二十四日,马福祥、

王之佐、水梓等联络省内外甘籍人士，倡组甘肃省临时议会，推李镜清为议长，马、王、水等三十余人为议员，主张承认共和。三月十八日，水梓、马福祥等致电袁世凯承认共和，袁派赵维熙为甘肃临时都督。此期间，马福祥反对黄钺在秦州另立甘肃共和政府，又劝解赵（维熙）彭（英甲）争权构衅。五月，袁世凯任马福祥为西宁镇总兵，后改为青海办事大臣（马未就任）。八月，袁世凯委马福祥为宁夏镇总兵，即率昭武军十三营计二千余人上任。民国二年（1913年），马福祥会同将军常连、宁夏知府陈必准为宁夏满人筹拨田土并修渠一道，俾令自食其力，以免冻馁而养身家。是年七月，马赴京觐见袁世凯，途中智擒王德尼玛，解至包头。袁以马智勇双全，改为宁夏护军使，节制阿、乌、鄂三旗，授陆军中将，给二等文虎章。

民国三年（1914年），流民白朗军三月由豫入陕，有众四万余，号称“公民讨贼军”。五月由陕入甘，陇南、陇东各地农民、会党纷纷响应。马福祥派马鸿逵配合袁军围剿白朗。白朗到达临潭后，伤亡很大，又返回陕、豫，以失败告终。

民国四年（1915年），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通电各地，马安良、嘉木样上表劝进，马福祥未预其事。

民国五年（1916年），马福祥专理包绥军务，在河套等地与卢占魁等多次冲突。六月袁世凯死，黎元洪接大总统。授马福祥“勋四位”。民国六年五月，北京大总统冯国璋嘉马福祥“勋高金城”，特“晋授予勋三位”，加上将衔。

民国七年（1918年）十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授马福祥“圭五等太常……勋二位”。

民国九年（1920年）七月，直皖战争起，马福祥电拥直系，皖系败后，皖系甘督张广建不安于位，甘人提出“甘人治甘”，回族将领拥马福祥督甘，汉族以陇东镇守使陆洪涛为首，指使其邦统张兆钾

反对,马福祥力主由北京决定,北京为了避免西北回汉关系,遂以马福祥为绥远都统。马福祥则要求马鸿宾继任宁夏护军使。冬,甘肃地震,马福祥拿出兰州财产一部分,作为救灾。

民国十年(1921年),马福祥就任绥远都统,其子马鸿逵升混成旅旅长,驻防绥远,马鸿宾任宁夏镇守使。

民国十一年(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马福祥素与奉系张作霖有旧谊,迟迟不表态,后勉强发出通电,追随直系反张。

民国十三年(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败,曹锟退位。段祺瑞出任北京临时政府执政。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马福祥应召出席,并表示竭诚拥护执政。十二月孙中山北上,马福祥见孙中山,表示听从领导。

段祺瑞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冯则荐委马福祥为西北边防会办。以其部将李鸣钟为绥远都统。

民国十四年(1925年)七、八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刘郁芬部入甘,马福祥要求收编子侄部队,冯玉祥将马鸿逵、马鸿宾分别编为国民军第二集团军第七师、第二十二师,二马分任师长。

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马福祥出任航空督办,驻平地泉(今山西)。九月,冯玉祥誓师五原,以马鸿逵为国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第四路总司令随孙良诚开赴陕西,进攻刘镇华部,以解西安之危。

民国十七年(1928年),马福祥在国民党中央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是年马仲英起事河州,反对刘郁芬苛捐杂税,居南京的马福祥电西北诸马及各方名流,务劝息兵。马廷勳等以马福祥为国民军张目,纵容马仲英部,烧毁河州马福祥住宅。

时蒋、冯、阎利害冲突,勾心斗角,马福祥奔走三方,纵横捭阖,

人称“和事佬”。其实马福祥的势力范围与阎相界,故不能不结好于阎,其子侄又为冯玉祥的部下,他又依附于把持中央的蒋介石,他只能如此。

民国十八年(1929年),蒋介石在军校创办“蒙疆训练班”,马福祥为讲席。五月,蒋冯欲战,而马鸿逵、韩复榘于五月二十一日通电倒冯投蒋,蒋介石将马鸿逵编为十一军。不久马鸿逵、唐生智、韩复榘、石友三会晤于徐州,欲倒戈反蒋,会后,马鸿逵密告蒋介石,蒋将马之十一军扩编为十五路军,马福祥又奔走于韩、石之间,韩、石复投蒋。是年,马福祥任青岛市市长。

民国十九年(1930年),马福祥调任安徽省主席。九月,马福祥调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在南京召开王公会提出开发西北,加强团结,发展教育等。

马福祥重视民族教育。民国四年,马福祥在临夏八坊等处设立小学五所,民国五年曾在宁夏城内设立公共图书馆一处,民国六年马福祥倡议设“蒙回教育劝学所”派员下乡开办小学,鼓励蒙族子弟入学。民国七年,马福祥自捐资金筹办蒙回师范一所。他先后在北平(北京)、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兴办学校六十余所。

民国八年(1919年),马福祥回家路过兰州时,出资大洋1500元,募捐2500元,交兰州回教促进会,作为甘肃青年留学外国、外省之用。同时在宁夏各县增设清真小学十余处。

民国十一年(1922年),他出资刊印刘智伊斯兰教汉文译著等,并题字作序。是年,他与回族上层在北京牛街创办清真中学,马福祥任董事长。原设济南穆家东门清真寺的成达师范被迫停办,后经马福祥出面主持迁北平复校。他的代表作有:《蒙疆纪要》、《蒙藏状况》,主持《朔方道志》的修纂工作,民国十五年告成。共32卷,40余万言。历时九年(1917—1926年),马福祥为主修。

民国十六年(1927年),马福祥居天津,撰《训诫子侄书》,刊印《昭元秘诀》。是年十月马福祥发起创办《月华》杂志。又与上海回绅哈少甫、马晋卿、蒋星阶出资修建三层楼一幢,创办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和敦化小学。

民国二十年(1931年)将牛街清真中学改为西北公学。月拨经费1200元,在行政院会上提出:“设立蒙古地方教育行政委员会”以及“给予边疆教育基金”均通过。1933年5月成立了回民教育促进委员会。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八月马福祥逝世于平汉路列车上,葬于北平阜成门外三里河。终年五十六岁。马福祥善于交际,悉心运筹,依靠权势较大的统治者,在军阀派系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终于打下了马氏家族统治宁夏多年的基础。从时代背景论,确非无能之辈。

[马 通]

马 麒

马麒(1869—1931年),字阁臣。甘肃临夏县马集柴东岷人,生于同治八年(1869年),后迁乧藏。其父马海晏是同治年间河州回民自卫反清起义领导人之一。后与马占鳌等人降清,被改编为马队三旗,马海晏任旗官,受河州镇节制。马麒以武生随父在河州镇马队见习,后任哨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河湟事变”发生后,随董福祥、马安良军镇压河湟群众有功,获“六品军功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初起时,清政府调派董福祥所统甘军入卫京师。马海晏率简练军随董福祥入京,马麒亦随军进京,被编为武卫后军,归兵部尚书荣禄节制。同年六月,董福祥军奉调攻打西什库天主教北堂和使馆区。后因天津失陷,慈禧下令停止攻打使馆,命堵击八国联军进犯京师,董军所属各部遂在通州、杨村、廊坊、张家湾、卢沟桥一带浴血应战,杀敌获胜,受到慈禧、荣禄的赏识。同年七月二十一日慈禧在侵略军的不断进攻下,恐京师不保,遂挟光绪帝逃离北京,命董军护驾。董福祥率马福祥(马福禄阵亡后,由其弟福祥接任统率其军)、马海晏在宣化追上车驾,但马海晏由于疲劳过度,在宣化病故。慈禧念其忠诚可嘉,追封为挂印总兵,遗职由其子马麒继任。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马麒返甘,居巴燕戎格厅扎什巴镇。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升任花翎副将,为循化营参将,取得了巴燕戎和循化地区的领导权,扩大了势力范围,建立了封建统治的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陕西督标张凤翔攻占西安,响应革命,宣布独立。陕西巡抚升允和陕甘总督长庚煽动回军反对革命,

命马安良等紧急扩军援陕,企图扑灭陕西革命军。马安良借机招募回兵 6000 人,将镇南军扩充为精锐西军,马安良任总统,马麒为帮统,马国仁、马占奎、马廷勳、马璘为分统,即东行援陕。同年 11 月,马安良接升允旨意命马麒、马占奎等率马步六营进军宁夏,宁夏革命党人刘华堂自觉力量不及,即撤到城外,马麒进银川后烧杀抢掠,劫掠财物运往河州。镇压了宁夏革命党人后即率兵与马安良围攻乾州革命军,激战数月。不久清帝退位,马安良宣布拥护革命,率西军移防甘肃,并坐镇兰州。马麒回防洮岷,升任洮岷协副将,其弟马麟由管代升任西军分统,其叔马海渊、长子马步青等,升任西军营官,从而马麒成为能左右西军的主要人物。

马安良、马麒控制甘肃后,一方面由于西军的势力日渐强大和跋扈,引起汉族绅士的疑虑和不安。另一方面,由马麒出面上书袁世凯,请求马安良主持甘肃一事,因议长李镜清等汉族绅士的竭力反对未得到批准。于是“二马”与李镜清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李镜清,甘肃狄道人,辛亥革命后,被选为甘肃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李为人耿直,对人对事无所顾忌。其时,西军在甘肃纪律不整,烧杀抢掠,时有发生,而宁夏地方也向甘肃省参议会告发马麒所部在宁夏镇压革命时的烧杀抢掠恶迹。李镜清以议长身份,要求甘肃都督严惩马麒及有关人员,但甘督赵维熙慑于马安良的势力,偏袒西军不予查处。李因此愤愤不平,返回原籍狄道。同年 7 月马麒在马安良的支持下派西军营官马统、哨官马有功等暗杀了甘肃省临时议会议长李镜清。李镜清被害后参议会和李的家属虽上告马安良于北京,但当时袁世凯正在阴谋恢复帝制,急需各省支持,为了拉拢马安良、马麒等人,故未过问此案。甘督赵维熙为了缓和这种矛盾,报请袁世凯政府调西宁镇总兵兼青海办事长官马福祥为宁夏镇总兵,马麒为西宁镇总兵,马安良为甘州提督,从而达到了

分散回军势力孤立精锐西军的目的。

1912年马麒脱离西军,赴西宁就任西宁镇总兵。到职后他千方百计结交甘督张广建为靠山,并通过张广建表示拥护袁世凯。袁称帝后授予马麒五等勋位、一等云骑都尉世职,封为“锐威将军”,奖赐一等文虎章。马麒乘有利时势将西宁镇、西宁府、青海办事大臣三权合并,1915年北洋政府裁撤了西宁办事大臣,改任马麒为甘边宁海镇守使兼蒙番宣慰使,达到了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目的。

在多年的军政生涯中,马麒悟出一条“升官靠军队,发财靠军队,扩充地盘也靠军队,没有军队就难以立足”的道理,所以他积极谋求建立一支直接掌握的武装。1915年他呈准甘肃督军,并报陆军总部核准,将西宁各军统编为西宁青海巡防马步全军,简称“宁海军”,自任总统,其弟马麟为帮统,初为8营1300余人。他仿照北洋军阀督练新军的办法,先后请来湘军出身的颜镇南和保定陆军学堂毕业的张昌荣主持训练军队。到1922年,马步总兵力约增至32营6600多人,马1500匹,各种枪支2500支,其军力已超过各镇。他的建军方针是以家族为核心,全军从总统、帮统、统领到营长46人中,其家族成员就占32名,为统治青海奠定了基础。青海是以藏、蒙为主的多民族地区,没有藏蒙民族及其头人的顺服,其政权是不会巩固的,为此,马麒派其弟马麟到藏区四处游说,并通过传统的祭海会盟等形式拉拢结交各盟长、王公和各千百户,为其统治打下社会基础。1916年划青海为特别行政区。马麒颁发玉树千户、百户执照,承认藏族部落头人的封建特权,并提倡移民实边,募兵屯垦。同时提倡兴办教育,将西宁所属两等学堂,改名为海东师范学校,改蒙古小学为宁海蒙番学校。

由于军费开支急剧加大,原甘肃省藩库每月限领的军饷已不

足用,马麒除加强关卡“厘金”、金矿“课金”等地方税收外,还开辟了三条财政收入渠道。(1)包揽盐务税收。任用外甥马辅臣为专营青海盐务的总负责人。在湟源、西宁等地开设盐店,承包湟源盐局税务。同时,青海所有盐池的装、运、销和征税,统由他垄断经营。还任命马辅臣为矿务马队管带,配以武装,经常往来于青海各地金矿、盐场和收税关卡。为马麒搞到了一大笔财政收入,解决了马麒在扩军中的主要困难。(2)贩运羊毛出口。青海羊毛素为地毯、长毛绒的上等原料。光绪年间,英商仁纪、新泰、瑞纪、聚立,美商平和,德商美最时,俄商民利等 18 家洋行曾在西宁、湟源等地开设商行,每年青海向外运出 700 多万斤。在天津每担收购价为白银 40 两。1912 年马麒指示马佐在河州设“德义恒”商号,抢购外运青海羊毛,到天津售给英商兴隆等,换取枪支弹药、布匹、百货等,转运到青海。1915 年在西宁东关又开设了“德顺昌”商号,由其军需处长任经理,更多的收购羊毛、皮张出省,购进大批京广百货、茶叶、布匹,成为马麒最大的后勤供应。(3)在牧业区征收草头税。草头税即牧业税,是清代丁税的变异。马麒于 1916 年开始改征草头税,全省共征收白银约 30 余万两。每年农历 7 月 15 日乘祭海会盟机会,对蒙藏王公千百户下达当年草头税任务,再由盟、旗、千百户所属部落由上而下,层层分摊到各户,各自交纳。其税额年年上升。

1914 年,甘肃护理都督张炳华(四川人)支持四川经略使尹昌衡力争玉树地区划归四川管辖。甘督理由是:玉树“地方辽阔、番民众多,近与西藏有宗教的渊源,远与英人有国际关系。前清时归西宁管辖,而相距西宁尚有二十余日途程。”同时,“西宁地处遥远,鞭长莫及,如果派驻军队,粮饷难以供给,不如划归四川,借以息事宁人,避免与川边方面引起冲突”。马麒坚决不同意张炳华的理由

和主张,致书力争说:“青海为民国领土,玉树为民国人民,派兵保护,为甘肃应尽之义务。且青海西界新疆,南界西藏,皆系中国领土,而原函称‘远与英人有国际关系’一语,尤不识意之所在。因英藏之交涉,遂并视青海为畏途乎?抑意中已不认西藏为中国领土?”马麒严厉指出:“前清对于蒙古、西宁,徒取羁縻政策,义务既多放弃,权利因已损失。外蒙、西藏皆系前车。青海全境尚系我国之势力范围,若不为未雨之绸缪,必致有后事之追悔!”从而阻止了这一企图。马麒为了加强玉树防务,根据幕僚黎丹、周希武的建议,将玉树划为特别行政区,派兵驻守,有力地防止了当时英俄帝国主义策划瓜分我国蒙藏地区的阴谋,保卫了我国边防。

其实早在1913年10月13日英帝国主义勾结西藏地方亲英分子密谋在印度西姆拉召开有英、藏、中三方谈判西藏行政区划和独立问题会议,简称“西姆拉会议”。1914年4月27日,英帝国就提出了一个已由英国和西藏地方政府事先签字的条约草案,并附一份已划好内藏和外藏租界的西藏地图,以威吓手段要中国代表签字,北洋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不敢签字,并照会英使不承认。

1917年9月,川、藏部队发生冲突,川军大败,金沙江以西地区为藏兵所占。这时英帝国认为西藏兵力还难以与川军长期对抗,便指使在甘孜的副领事台克曼出面调停,双方同意停战一年。台克曼即到北京,同英驻华公使向北京政府交涉,提议重开谈判,着重解决取消内外藏名称,将巴塘、打箭炉、道孚、炉霍、瞻对等处,划归中国;将德格以西各地划归西藏。北洋政府认为事关重大,难以承认。英方又以德格以西多为荒僻之地等花言巧语,诱其上钩,并拒绝北洋政府在昆仑山以南,当拉岭以北驻军。北洋政府于1919年9月5日通电西藏毗连的各省征求意见,此即为所谓的“歌

电”。马麒即通电全国(即所谓的“艳电”),驳斥了英方条件中在地理位置上的严重错误,揭露了英帝国的阴谋,严肃陈述了近年来藏兵虽攻陷了川边十多个县,但是兵力尚未能越过当拉岭北,今川边划界已为奇耻,还痛斥了袁世凯丧权辱国。此电发出后,川、康、滇、甘各省及一些民间团体均通电响应,极力反对,迫使北洋政府对西藏的谈判,未敢再议。从此,马麒不仅保住了玉树地区的统治权,而且在客观上也起了阻止北洋政府签订新的丧权辱国条约的作用。从而维护了国家主权的完整,并派朱秀等前往西藏,促使西藏地方政府进一步内向,赢得了荣誉。

1917年9月,马麒平息了宗社党人吕光在贵德一带所进行的“复清灭民”的复辟活动。1918年6月因调处拉卜楞寺内部争权问题,派马麟率兵千人进行镇慑。1920年派马步元率兵镇压海南赛力亥寺抗税事件。6月马部300余人在果洛玛沁雪山开采金矿,引起藏民反对,即进行镇压。1921年派马麟为征讨果洛司令,率千余兵力再次镇压果洛。1925年9月派马麟再次镇压拉卜楞寺,残杀僧众。该寺控告到兰州,经调处,设拉卜楞寺设置局,脱离宁海军管辖。

1926年,冯玉祥撤销甘边宁海镇守使及蒙番宣慰使,任马麒为甘边宁海护军使。同年国民军入甘,9月改编马麒为暂编第26师师长。1927年7月任马麒为甘肃省政府委员。1928年马仲英起事,7月马麒派朱秀、周希武赴兰与国民军谈判,中途发生“莲花台事件”,朱、周死难。同年国民党中央决定设青海为行省,定西宁为省会。1929年1月1日青海省政府成立,首任主席为孙连仲,马麒为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同年9月孙连仲调任甘肃省主席。同时国民军东撤,参加中原军阀大战。阎、冯失利,国民军受蒋介石牵制。1930年1月,南京政府任命马麒为青海省主席。1931年8

月,马麒病逝于西宁,享年六十二岁。

纵观马麒一生,从戎务政四十五年,以辛亥革命为标志,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约二十五年,基本上是效忠清皇朝,从事镇压甘肃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维护清廷的统治秩序,阻碍了中国历史的进步,大多表现为罪恶行为。只是参加1900年抵抗八国联军的英勇战斗是爱国的光荣行为。后一阶段,约二十年时间中,一般说是功大于过,特别是对“西姆拉会议”及其前后导引出的一系列事情,他能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同国际帝国主义,国内分裂势力及当时北洋政府的妥协退让,丧权辱国行为作坚决抵制和斗争,是最重要的一次爱国主义表现,是难能可贵的。

〔马 通〕

马 麟^①

马麟(1873—1945年),字勋臣,马海晏次子,马麒胞弟。幼读私塾。1895年河湟事变,与兄招募回勇,维护地方。1900年八国联军犯京师,和马麒随父海晏赴北京,参加庚子之役,抵御洋人侵略。父死,兄麒继统父军,马麟在马麒下任哨官。回甘后,承父业,在甘南牧区贩运皮毛、土产,经商赚钱。1909年马麒任循化营参将,马麟随兄在军中任管带,都司衔。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陕西革命党人继起,光复西安;马麟和马麒奉命随西军统领马安良征战陕西,镇压革命。11月底,麟和兄奉命北上宁夏,镇压那里的会党、民军起义。马麟为前锋,进入宁夏府城银川,又攻平罗等地,平定起义,被任命为宁夏洪广营游击。马麒以有事必和弟麟相商、不能分离为由,马麟未去就职,和兄一起赴陕西乾州,会师在那里作战的马安良。时清帝退位,双方言和,西军回甘肃。

回甘后,马麒率西军主力驻甘南,升任洮岷地区协副将,马麟任分统,在西军中自成一系。1912年马麒迁西宁镇总兵,马麟随行。“宁海军”成立后,马麟带兵驻拉卜楞地区,与藏民屡有接触,以后多次在藏族地区用兵,其兄马麒为决策者,马麟为执行者。后又移驻玉树结古。结古和拉卜楞是马麟军事活动的两个重要地区。马麟带兵不忘经商,在这两个地区从事商业活动。

1917年5月,宗社党人吕光复辟活动扩大,占据贵德。马麟为司令,马海渊为副司令,带兵前去清剿。吕光将黄河渡桥和船破坏,据险死守。马海渊绕道至贵德县临城河东乡,马麟率部驰至,

^① 主要据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青海三马》有关资料写成。

合击,将吕光击溃,生俘吕光及其“将军”白成和“提督”辛凤翔等,荡平这次叛乱。

1920年至1922年,马麟以其对伊斯兰教的虔诚和手中握有的巨大权力,在河州老家组织修建乜藏大寺。马麒派一个步兵营和几十辆大车参加,当地青壮年自带干粮,不讲报酬,几乎全体加入。修寺木料从青海境内黄河中流放乜藏,每放一趟约需三百人,沿途居民供应饭食;从大河家至乜藏有七沟八山,木料上山过沟由附近居民拉运,劳苦异常。修寺工匠、画工皆当地一流。寺落成时,八方云集庆祝,场面极为壮观。由于当地群众笃信伊斯兰教,马麟也因此提高了威望。寺竣工后又建其公馆,两项工程历时三年。

1925年,国民军进军西北,甘肃形势大变。1928年,马麟侄马仲英起兵反国民军,率众进攻河州,其部称“黑虎吸冯军”。两军对峙,马麟被任为河州宣慰副使(宣慰使为甘州镇守使、东乡人马璘),出面调解,没有结果,马麟称马仲英“野性难驯”。1928年青海建省,1929年初正式成立省政府,马麟兄马麒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因马麒坚辞兼职,由马麟任;不久省军垦委员会成立,马麟兼任委员长。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国民军东下,马麟进驻兰州,任甘肃保安司令,旋任甘肃骑兵暂编第一师师长。1931年马鸿宾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未到职前,由马麟维持兰州政局。6月,马鸿宾到职,骑兵暂编第一师移驻凉州(今武威),由马步青继任师长,马麟回西宁。同年8月,马麒病故,马麟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

代理和正式任职省主席期间(迄1938年),马麟整理财政,发行省钞,成立青海省金库,发行“青海省金库维持券”,但不能解决问题。1932年借玉树发生青藏冲突,成立青海省财政整理委员会,1933年7月又成立各县临时维持费经征所,问题也未能解决,

财政收入大多为其侄马步芳所控制的军方扣留。鉴于以前发行的“金库维持券”不断贬值,1934年再发行“青海省临时维持券”,结果饮鸩止渴,越发越滥,民怨沸腾,物价飞涨。1933年6月,马麟具呈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求将拉卜楞地区归青海(拉卜楞属循化管辖,青海建省时划归甘肃),没有成功。主持青海省政近五年(迄1935年底),政绩平平,财政紊乱,掌握军权的其侄马步芳咄咄逼人,马麟渐有不能抵挡之势。1935年底到达西宁的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洞察到这种形势,在其名著《中国的西北角》中写道:“青海之两大巨头,一为省主席马麟,一为新编第二军军长兼一百师师长马步芳。马麟仅在社会与宗教上有相当地位,而马步芳则握有军事政治的实权;马麟为老派人物之代表,而马步芳则为汉回青年的领袖。记者于二十一日先访马麟,马氏身躯之高,至少在七尺以上,谈话夹重浊之临夏土音,初听之,不易了解。惟其态度比较忠厚,持论亦为和平派之人物,观其左右及各种布置,绝难发现其有积极的政治野心。旋由谭克敏先生陪记者往访被人目为‘青海王’之马步芳。”果不出范长江所料,半年之后,1936年8月,马麟迫不得已,电请国民党中央,因病休假六个月,蒋介石复电照准,由马步芳代理省政。10月12日马麟飞往南京,要求去麦加朝圣,蒋介石同意,给旅费一万元,除已照准的六个月假外,再续假五个月。同月27日,马麟在沪乘轮船出国。

1937年4月,马麟回到国内,回西北途中在西安停留,经马麟友好、马步青老师马德涵安排,和周恩来会见,同桌吃饭。周恩来谈了中共抗日主张、国共合作等问题,请马麟协助送回失散之西路军人员。马麟表示回青海后尽力而为,对于中共团结抗日主张,表示赞同。事后有人问马麟对周恩来的印象,马说:“很好,很好!周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又竖起大拇指说:“周先生是共产党的了

不起的人才,有远见,也很健谈,我是很佩服的。”^①

回到青海后,马步芳不交出省政大权,马麟名义上还是省主席,但已不能控制省政,马步芳甚至说他“连自己的家都管不住,还管什么省政府!”1938年2月,白崇禧到青海视察,马步芳与白密谈,商定:(1)改组省政府;(2)对马麟的旧人员一概不用;(3)将马麟调任国民政府委员;(4)青海省党政军事务,统由马步芳负责。不久,蒋介石来电:免去马麟本兼各职,任命马步芳为青海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马麟的国府委员只是空名。回到家乡乧藏,结束在青海的政治生涯,过起回乡颐养天年的生活。

马麟做官发财,回到家乡后大兴土木,修建园林,悠度晚年,并利用其声望权势左右乡政。1945年1月病卒于家。按伊斯兰教礼仪安葬。未发讣告,亦无行状之类文字传世。

[李松茂]

^① 《西安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八 白崇禧

白崇禧(1893—1966年),字健生,出生于广西省临桂县会仙镇山尾村的一个回族家庭。祖籍江苏省南京市水西门。其太高祖榕公,是清朝进士,曾任四川开县知县,笃信伊斯兰教。递传至第十八代,即白崇禧之父白志书(别号友三),早年在桂林本族白远盛杂货店打工,后经商,娶永福县罗锦圩马氏为妻,生七男四女,夭折三男一女,长成四兄弟,即崇勋、崇伦、崇禧、崇祐。白崇禧幼年丧父,由其母马氏抚育督促学业。马氏系笃诚之穆斯林,对其子女多有熏陶。

白崇禧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岁时,开始就读私塾。在老师的教授下最初攻读三字经、五言诗、千家诗、对子书,后来学习琼林、四书、诗、书、礼、易、春秋、左传等。读私塾五年,晚睡早起,刻苦用功,奠定了扎实的文化基础。十岁时与六弟崇祐两人到离家三华里的会仙镇会仙小学走读两年。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十四岁时报考同盟会员蔡锷(松坡)为督办的陆军小学。全省千余人报考,仅录取一百二十人,白崇禧以第六名被录取。蔡锷鼓吹革命思想,学生多受鼓舞,纷纷剪发革新。这是白崇禧接受军事教育的启蒙,导致其后来步入军事生涯。十六岁时,白以名列第二考入广西省立初级师范;入学后,屡试第一,按校规则,被推举为领班生。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他遂与过去陆军小学同学多人,加入广西北伐学生军敢死队。家中长辈们闻讯,极力反对,学生军敢死队出发当日,家人赶至桂林北门城堵截,企图阻拦白崇禧。他事前已知家人反对。便托同学帮他携带武器和行装,他则从桂林西城门后绕道北门外与北伐学生军敢死队会合。部队行军至全州、

永州,改乘民船,押輜重经湖南祁阳、衡阳、湘潭等地至长沙,又经洞庭至湖北汉阳之蔡甸、梅子山,加入南军阵营,与北军对峙。不久,南北议和成功,各省学生军奉命解散,编入南京陆军伍生队受训。半年期满白被送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制三年,课程与旧制高中大体相同,外加军事科目。毕业后白被派往北苑卢永祥之第十师,入伍半年,旨在熟悉军营生活,随即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学科以战术、筑城、地形、兵器四大教程为主,学习二年。毕业后白被授予上士军衔,分发部队当见习官半年,后升为少尉军官。

民国五年(1916年),白崇禧回广西在第一师第三团任见习官;次年升为第一连上尉连长,夏威、黄绍竑、张淦为第二、三、四连连长。白崇禧当时在广西的主要任务是剿匪与禁烟,因白崇禧在剿匪禁烟中,严格执法,堵防漏洞,制止舞弊,铁面无私,颇有成效。于是,他在家乡广西省初出茅庐,崭露头角,为舆论所注意。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东与孙中山为敌,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广西局势混乱。当时白崇禧在旧桂系任模范团第一营营长。黄绍竑任旅长。黄派其部下陈杰夫同白商讨形势,决定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因此,黄委托白崇禧以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广州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认为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于是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白崇禧带着委任状秘密回到梧州,告知黄绍竑。黄、白在粤军李济深支持下,排除内部障碍,剪除陆荣廷羽翼,又争取当时任粤军旅长的李宗仁合作,共同成立定桂讨贼军,李为总指挥,黄为副总指挥,白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发兵袭击南宁,致使在桂林的陆荣廷逃往湖南,又进攻柳州、庆远,进逼贺县、平乐,肃清陆荣廷及沈鸿英残部;又击退乘

虚而入的云南唐继虞(唐继尧之弟)部队,于1925年统一广西。定桂讨贼军改为督办公署,李宗仁为督办,白崇禧为参谋长,黄绍竑为行政长。接着,李、白、黄又协助粤军统一广东。1925年春,白崇禧在桂林与马佩璋结婚。1926年初,李、黄派白崇禧到广州,与国民政府商讨两广统一问题。3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两广统一委员会,并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白崇禧为参谋长。原广西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改纵队为九个旅,白崇禧兼任第九旅旅长。白崇禧在广西统一、两广统一问题上,先后两次以全权代表身份与国民革命政府谈判,取得成功。两广统一为国民革命政府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白崇禧为此作出一定贡献。

两广统一之后,国民革命政府于1926年7月7日誓师北伐。在北伐开始的时候,国民革命军要经过湖南,受湘军反动势力阻挠,于是派白崇禧、陈铭枢秘密到长沙游说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部下唐生智(唐与白是保定同学),唐犹豫再三,终于同意归附。后来唐生智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1927年初,白崇禧任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他运用声东击西战术,先后占领杭州、宜兴、吴江等地。3月21日,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立了上海市临时政府,欢迎北伐军进入上海。白崇禧兼任上海警备司令。4月4日,汪精卫、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在上海召开秘密反共会议,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崇禧是这次反革命政变的指挥者与执行者。此后,白崇禧在蒋介石营垒中飞黄腾达。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政府抗衡,白被任命为第二路军总司令;10月20日,南京军事委员会下令“讨伐唐生智”,白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1928年1月5日,南京政府任命白为西征军总指挥,进攻湖

南唐生智部,25日占领长沙。

1928年4月8日,国民革命军将两湖各军改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为正、副司令。北伐军继续向北进发。6月3日,张作霖率部退出北京,白崇禧向北京进军。翌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15日,国民政府宣告北伐成功,统一告成。9月2日,白崇禧从北平赴天津誓师东征。23日,白改编张宗昌余部,直鲁联军瓦解。由于桂系军阀控制了两广、两湖,还在平、津两地扩充军队,并且排挤了忠于蒋介石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严重地妨碍了蒋的个人独裁。1929年3月21日,蒋介石将李济深软禁于汤山,此举激怒了李宗仁、白崇禧,二人率部宣告反蒋。蒋介石撤销了李、白本兼各职,并将二人开除出国民党,致使矛盾更加激化。3月29日,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利用分化手段,收买桂系师长李腾辉等人阵前倒戈,迫使桂系放弃武汉。李宗仁和白崇禧仓惶逃回广西。5月10日,李、白又同西北的冯玉祥联合反蒋。蒋与冯、白、阎在中原地区展开大战,双方动用兵力100多万,死伤30万。至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蒋获得胜利。白崇禧随李宗仁退回广西,他们以自治、自卫、自给相标榜,锐意经营广西。

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桂系与张、杨一致采取“逼蒋抗日”的立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蒋介石电召白崇禧“共赴国难”,8月4日派飞机将白从桂林接到南京,委任为副总参谋长,并兼任军训部长,参与制订作战计划。当时日本报纸报导,战神到了南京,战争不可避免。白在抗日战争中参与指挥过多次会战,以足智多谋著称,“小诸葛”的声誉风靡一时。他参与或策划的战役主要有:(1)1938年3、4月间的台儿庄会战。白崇禧于3月24日随同蒋介石到前线视察,事后白暂留台儿庄协助李宗仁指挥军事。会战进程中,白经常到战地与各军、师的高级将领联络,代表武汉

大本营面致慰问,鼓舞士气。台儿庄之役,重创敌军,举国振奋。武汉有十多万人上街游行庆祝,用卡车载李宗仁、白崇禧的巨幅画像为先导;(2)武汉会战。此次会战,长江北岸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因病住医院动手术,由白崇禧于1938年7月17日代理战区司令官。会战始于8月初,国民党以五倍于日寇的兵力,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阵地战术,结果在10月下旬终于溃败。武汉会战末期,李宗仁病愈复职。蒋介石为了加强重庆外围实力,增设桂林行营,指挥第三、四、七、九四个战区的军事,委任白崇禧为桂林行营主任;(3)桂南会战。这是白崇禧就任行营主任后亲自指挥的战役。1939年11月15日,日寇从北部湾进犯钦州,又由钦州攻南宁。24日南宁失守。12月4日,南宁北部的昆仑关失陷。日军企图断绝我越桂国际交通。白崇禧将兵力部署为北、东、西三路,于12月18日开始向昆仑关之敌攻击。北路军于25日在昆仑关东北夺得重要高地,又以炮兵增援将敌阵地占领,空战中则遭受损失。此役击毙日军五师团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敌军死伤约8000人,为抗战以来攻坚战的首次胜利。同时,西路军、东路军也协同作战,于1940年10月30日收复南宁,日军仓惶逃窜;(4)长沙会战。这个会战分为三次:第一次在1939年9月14日至10月14日,第二次在1941年9月6日至10月9日,第三次在1941年12月19日至1942年1月16日,均由桂林行营指导第九战区作战。第一次会战,敌第十一军司令冈村宁次率部至距长沙二十里左右,不敢再前进,即用空军掩护撤退。国民党舆论宣传为长沙大捷,但日军不承认战败,说是战略退却;第二次会战,国民党军队先后歼灭长沙附近的敌便衣队及伞兵队,并调集各路军赶至指定地区将敌人重重包围,又分段截击、侧击、尾击向北突围退却的日军,缴获日军大批武器,击落敌机三架、击毁汽艇三艘;第三次会战,在十七

天内伤毙敌军万人以上。从以上列举的事例,可知白崇禧在八年抗战中是有重要贡献的。

抗战初期,白崇禧与在武汉的周恩来关系甚密,曾多次邀请周恩来、叶剑英研究抗战战略问题,并赞赏周恩来的一些建议。1938年2月,白崇禧特邀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对即将开赴徐州前线的广西学生军讲话。白崇禧成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聘叶剑英为副教育长。白崇禧从周恩来那里得到一本《论持久战》,深表赞同,将基本精神摘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1940年10月,国共两党关系恶化,1941年初白崇禧伙同何应钦炮制了“皖南事变”,进一步成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御用工具。

白崇禧出生于回族家庭,受过伊斯兰教熏陶,抗战期间又被推举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在某些方面维护了自身族教的利益。在他掌权任职期间,曾下令国民党官兵不得在清真寺驻扎。为此,特地制定一块盖上大印的牌子,分发全国各地悬挂在城乡清真寺大门口,使清真寺免受国民党军队的骚扰。他支持并创办过一批回民学校。他在一些讲演及文章中,提出过若干唤醒回教同胞觉悟、提高穆斯林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教育素质的主张;当然,其中也有把回教引向信仰三民主义的企图。

白崇禧在日常待人接物中,反对官僚架势,反对打骂士卒,主张吃苦耐劳,禁烟禁赌,反对不良嗜好,在国民党统治阶层中是比较自守自节的。

解放战争期间,白崇禧跟随蒋介石参与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白曾被蒋介石委任为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和华中“剿匪”总司令等职。他在1948年到武汉任华中“剿总”司令之后,依靠桂系主力,与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余汉谋集团、川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集团

组成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军事集团,在湘鄂粤桂陈兵 40 万,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从 1949 年 5 月开始,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武汉,又经过宣沙战役、湘赣战役、衡宝战役,以及解放广东、广西的战役,至 12 月 14 日,解放了中南大陆地区。白崇禧乘军舰从钦州湾出海,逃往海南岛,后来到了台湾。被委任为国民党军事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已没有什么权力,并备受冷落。1966 年病死,终年七十三岁。

〔白先经 凌云〕

马鸿逵

马鸿逵(1892—1970年),字少云,乳名三元。甘肃河州韩家集阳洼山人。生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2月11日,祖父马千龄,父马福祥。马鸿逵幼儿时在家塾中习读《四书》、《五经》三年,由于“对书本无兴趣”而停学。光绪三十年(1904年)马福祥以纹银千两为马鸿逵买得“蓝领知县”虚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马福祥调任西宁总兵,马鸿逵随父到西宁,开始了三年的苦读生活。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马福祥主婚,陕甘总督升允证婚,马鸿逵与甘州提督、固原马进祥之次女马柏芳结为夫妻。马柏芳(1884—1943年)生三子一女。长子马敦厚,次子马敦静,三子马敦仁(少亡),女儿银莲与青海马步荣婚配。宣统元年(1909年),马鸿逵入甘肃陆军学堂学习。宣统三年(1911年),由教官易抱、杨涛、朱廉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8月因秘密策划反清武装失败,被甘肃总督长庚押送给平凉西路巡防统领马福祥处,马福祥痛斥后,令马鸿逵在“昭武军”中任教练员。

民国元年(1912年)任昭武军骑兵营营副。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委任马福祥为宁夏护军使,马鸿逵在河套地区围剿反袁拥孙的卢忠祥等起义军。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以马鸿逵围剿白朗有功,授陆军少将军衔。秋,入京任袁世凯的侍从武官。民国四年(1915年),昭武军改编为“宁夏新军”,马鸿逵为司令,仍在总统府任侍从武官。民国五年(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马鸿逵继任大总统黎元洪的侍从武官。1917年张勋复辟,段祺瑞率“讨逆军”进京驱张,拥冯国璋为代总统,马鸿逵因其父与冯是盟兄弟之故,仍在京为冯代总统的侍从武官。1918年10月,段祺瑞驱冯

国璋拥徐世昌为总统,马鸿逵乃离京返宁夏。1919年段祺瑞将宁夏新军改编为第五混成旅,马鸿逵任旅长。该旅辖三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营,仍驻宁夏。

1921年直系军阀曹錕控制北京政府后,为拉拢西北地方势力,乃调任马福祥为绥远都统,令其侄马鸿宾继任宁夏护军使(后改为宁夏镇守使),马鸿逵仍任第五混成旅旅长,随父前往绥远。

1924年,冯玉祥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总执政。段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马福祥为西北边防会办。马鸿逵为国民军新编第七师师长,所部驻宁夏磴口、金积等地。1926年1月冯玉祥被张作霖逼走出国,9月冯玉祥由苏联考察回国后,在绥远五原誓师,加入国民党。冯任命马鸿逵为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总司令兼第七师师长。10月马率部解西安之危,吴佩孚部刘镇华的镇嵩军溃败,马鸿逵兼任西安警备司令。1927年5月马鸿逵随冯军出潼关,任河南省洛阳警备司令。6月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在徐州会商,一致决定进行“清党肃军”的反共活动。冯部改编为国民党第二集团军,马鸿逵任第四路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率部驻郑州。秋冬之交,马部在豫东与直鲁联军战于兰封、曹县等地,皆胜。1928年蒋、冯、阎联合反奉系张作霖,双方大战于津浦线、京汉线。马鸿逵部与奉军战于京汉线。张作霖于6月在皇姑屯被日军暗害。蒋介石以编遣为名,企图削弱非嫡系的冯玉祥、阎锡山各派军事实力,双方矛盾由此激化。马鸿逵部因隶属冯玉祥,其第四军遂被蒋介石缩编为陆军暂编第十七师,马任师长。

1929年5月,冯部马鸿逵、韩复榘、石友三在洛阳联合通电,宣布倒冯投蒋。蒋即复电嘉奖。将马部十七师扩编为讨逆第十一军,马鸿逵任军长兼六十四师师长、郑州警备司令,蒋还拨军饷30

万银元、千余支新枪。

1930年4月阎、冯倒蒋，战于中原。8月马鸿逵部攻占山东泰安，阎军败逃。秋，马鸿逵升任讨逆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徐州警备司令。

1932年马鸿逵十一军被蒋缩编为第三十五师，马任师长，师部驻信阳，指挥围剿红军。8月马福祥病逝。9月蒋介石又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并只准带两个团进宁，11月马率部北上赴宁。1933年2月，马鸿逵任宁夏省政府主席、省党部特派员（后改为主任委员）、第十五路军总指挥。提出清丈土地、整理金融与禁烟、建立保甲、围剿红军为治宁四大方针。

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西北副督办后，引起西北三马警惕，于1934年1—3月，马鸿逵与马鸿宾、马步芳三人联合率部逐孙殿英部出宁夏。

1935年1月马鸿逵清丈土地结束。全省耕地由原来的80余万亩激增至1828750亩，使其田赋收入由原来的285367元激增至2522207元，民怨沸腾。春，马部在同心的预旺、丰州等地围截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1936年6、7月继续围剿红军。构筑封锁边区线。12月通电反对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马鸿逵任第八战区中将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10月马鸿逵以“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办法开始征兵。用私印省钞227万元收大烟2625254两反手出售。

1938年2月马部进占内蒙阿拉善旗，命令全省羊毛施行统购统销，凡私存私售皆按资敌者严办。

1939年马鸿逵命令宁夏银行经营全省羊毛、驼毛、枸杞、甘草等土特产，私售者严办。1942年夏，蒋介石来宁视察，调解马鸿逵

与马鸿宾的矛盾,共同防共。冬,马鸿逵命第一、二骑兵旅参加绥西抗日战争。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在银川召开第八战区高级军官会议,策划封锁陕甘宁边区,马在会上力主“剿共”。1943年马鸿逵的次子马敦静任十一军中将军长。1945年经国民党政府批准,将省会改称银川市,吴忠镇改为吴忠市,至此,全省设两个专区,十三个县市,三个设治局。马鸿逵任西北军政公署副长官。

1946年至1947年,马鸿逵配合胡宗南进攻延安,组织宁夏兵团并任总指挥,向盐池、定边、安边、靖边等地进犯。7月发布告宁夏全省民众书,发布反共总动员令。11月马部在榆林袁大滩战役中惨败。

1948年11月,马部第二次出兵包头与解放军作战,并大量兑换黄金、美钞,为逃离作准备。同时国民党政府批准“回籍养病”,其次子马敦静代理省主席。1949年5月,马鸿逵令马敦静与马步芳部联合作战,向陕西咸阳、乾县进犯。8月1日马鸿逵任甘肃省主席,命宁夏兵团坚守固原。马部被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击溃,被俘5000余人。8月26日兰州解放,马步芳军被解放军全歼。9月1日马鸿逵飞重庆,9月19日马敦静飞重庆,9月底马鸿逵、马敦静父子飞台湾,10月10日蒋介石以“擅自撤兵”为由,给马鸿逵以“撤职查办”处分。1950年经蒋介石特许,由美国人陈纳德代办领取六张出国护照后,马鸿逵去美国洛杉矶“医病”。从此,马鸿逵在洛杉矶市郊购宅一所,以“养马聊资生活”。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病歿于美国洛杉矶郊区寓所,终年七十八岁。

〔马 通〕

马步芳

马步芳(1902—1973年),字子香,经名侯赛因。生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甘肃省临夏乜藏沟人。马麒次子。幼时在乜藏清真大寺读阿拉伯文,后就读于西宁国民学校,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

民国四年(1915年)随父从戎,在宁海军军官训练团学习军事,毕业后任甘边宁海镇守使署一等参谋。民国七年(1918年)任宁海巡防马队第一营帮带(即副营长)。民国九年(1920年),其父马麒为了控制青海南部和北部,以玉树、都兰为基地,并将宁海军扩编为二十营,任命马步芳为骑兵第十五营管带(营长),后改编为骑兵第一营,驻防巴燕戎。

为了扩军,马步芳收罗横行乡里的盗匪头目为其部属,一时兵丁大增,继而出台各种苛捐杂税,掠夺农民,壮大自己势力。同时,延伸势力到循化、隆务寺等地区。

民国十四年(1925年),国民军入甘,马麒为了扩军自固,提升马步芳为宁海军骑兵团团长,率部驻享堂,以防不测。不久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陇南镇守使孔繁锦、河州镇守使裴建准和兰州的李长清、黄得贵、包玉祥等被国民军剪除。马麒以处境危殆,对抗无力,据说他唆使族侄马仲英潜赴河州,发动回民反抗国民军。马步芳为了掩人耳目,曾派心腹喇平福到群科尔马朝佐处与马仲英、马步云秘密会商。马步芳愿以死力支持。后来马仲英在三花观与国民军交锋时,马步芳曾率所部骑兵和化隆东西堡民团应援。到达河州乜藏,闻国民军李松昆等旅进兵河州,声势浩大,未敢参战,即返回防地。

民国十七年(1928年)八月,孙连仲率部进入西宁。马麒被迫交出军政大权。但马步芳部尚据化隆,为了消除这一隐患,即派旅长高树勋,以清乡为名,率部赴循化、化隆。马步芳除表示顺从外,还以重金贿通高树勋,经高推荐,马步芳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独立第九混成旅旅长。

民国十九年(1930年)阎、冯倒蒋,爆发中原大战,孙连仲率兵东下参战。马麒、马麟度过了寄人篱下的艰难日子,马麒接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部由化隆调驻西宁,任改编的第九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冯玉祥失败后,又改编为青海暂编第一师师长,随之投靠蒋介石,被编为新编第九师师长。从此,青海军权落入马步芳之手。

民国二十年(1931年)马步芳怕马仲英危及西宁,遂出兵河西,击败马仲英,占领甘州。并设计残杀马仲英守城部队200余人,逼迫马仲英离开河西,到新疆去。同年成立青海蒙藏文化促进会,马步芳任理事长,并设蒙藏小学(后改为中学)一所,为自己培养在牧区催收军马、草头税和其他摊派款项事务的专门人员。同年八月,其父马麒病故,青海省政府改组,马麟任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任省政府委员。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二月发生青藏战争。原因是玉树苏尔莽地区两个不同教派的寺院(一为黄教寺院,名尕丹寺,另一个是白教寺院,名得赛寺)间发生矛盾,引起这场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西藏地方政府亲英集团乘机派兵进犯玉树,引起青藏战争。马步芳派其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部所属部队,于十月在金沙江西岸击退藏兵。次年六月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称为“青藏和约”。同年马步芳任青海回教促进会会长,该会设立了回民中学,附设小学两所,各县也成立了分会,分别设立了小学。

青藏战事后,马步芳军事集团在西北的声望随之提高,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当时全国抗日呼声很高。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抗日,派人联系驻在张家口以东的孙殿英,蒋介石得知后,给孙许以察哈尔省主席,有意挑起孙、冯矛盾。但孙不愿当察省主席,竭力保其实力,以图另起。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部屯垦督办,令其率四十一军开赴青海。马步芳与宁夏马鸿逵、马鸿宾怕危及他们的利益,遂商定共同阻止孙殿英西进。宁夏出兵3万余人,青海出兵2万余人。孙殿英有7万余人,号10万之众。孙、马战斗一年多后,孙殿英损兵折将,败走山西。宁青三马在阻止孙殿英作战中取得了胜利,但因内部争分战利品时发生矛盾,引起宁青失和。宁夏二马损失惨重,灾民40余万,伤亡群众5000余人,总计损失达2000多万元。马步芳所得战利品太少。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蒋介石任命马步芳为新编第二军军长,并将所辖新编第九师改编为一百师。马步青被任命为骑兵第五师师长,受到蒋介石的器重。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青海省政府成立保安处,马步芳任处长,并着手编训保安团队。全省划为15个保安区,共编组107个保安团,团丁15万人,各种步枪5万余支,马枪600余支。这些团队大多派往河西堵击北上红军。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八月马步芳任“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十月率部到河西堵击红军。正当马步芳与红军在河西展开激战时,忽闻西安事变发生,张、杨扣蒋,于学忠在兰州向蒋军发难。马步芳等待混乱事态的发展去向。当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被释放后,才一面向国民党中央祝贺,一面加强河西军事,镇压西路军。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五月结束,历时七个多月,残害活埋

红军数千人,红军遭受重大损失。

民国二十六年新编第二军改编为八十二军,马步芳任军长。抗日战争开始时,马步芳奉命派出马彪的一个兵力达 8000 人的骑兵师,驰骋中原,奋勇抗日,在抗日史上留下了英名。

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国民党要员白崇禧到青海视察并与马步芳秘议后,于同年三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马步芳为青海省政府主席,并任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主任委员。推行了一套新的统治政策,使各族人民身受其害。同年马步芳派喇平福去果洛强征草头税,激起反抗,击毙驻军数十人,并处死喇平福。马步芳闻讯派出二团兵力进行镇压。

民国二十七年马步芳接管了马麟在西宁开设的协和商栈,以及省内外设立的分栈和办事处。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马步芳在青海等地设立了德兴海商号,进一步统管了青海土特产品的购销和其他课金等。此后因玉树等地藏族群众反对压迫剥削,马步芳多次派兵镇压。

民国三十年(1941 年)马步芳将青海回民促进会办的高级中学,改为昆仑中学,自任校长,培养统治青海的骨干。

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马步芳成立了湟中实业公司,自任董事长,此后又成立了西北工矿公司、西北畜牧公司,从而达到全面统制青海商贸、工矿、畜牧以及金融等的目的。

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派其子马继援率整编二十二师,开往陇东,参加反人民的战争。此后多次增兵,企图阻止解放军西进。

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七月,南京已经解放,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八月二十六日兰州解放,二十七日马步芳携眷经重庆,逃往香港,同年十月国民党政府以擅离职守给予马步芳“撤职议处”的处分。1957 年 5 月任台湾国民党政府

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61 年因被台湾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指控有贪污行为而辞职。1973 年病歿于沙特。

[马 通]

九 马鸿宾

马鸿宾(1884—1960年),字子寅,又名得仓。甘肃临夏县韩家集阳洼山人。生于光绪十年(1884年)。马千龄之孙,庚子之役抗击八国联军,在正阳门殉职的武进士马福禄的长子。他幼年在家乡习文练武,十六岁时,父亲以身殉国,叔父马福祥盛意栽培,不让离其左右,马鸿宾对马福祥也很孝敬,1905年马福祥任西宁镇总兵,成立西宁矿务马队,让马鸿宾任队官,后来,这支队伍发展成为马鸿宾的一支基本武装力量。1910年马福祥调任宁夏总兵,马鸿宾随叔父的昭武军到宁夏,任骑兵中营管带,1915年晋升为统领。1916年河套发生兵变及会党作乱,为了“进剿”,经袁世凯批准组建“甘肃新军”,马鸿宾任司令,率部在绥西屡败哥老会的首领弓占元、包永华。不久,兵变,会党再起,他们又联合察哈尔“独立队”,推卢占魁、金占魁为正副首领,复出包、绥,向宁夏发展。马鸿宾身先士卒,勇猛奋战,并设计击毙了金占魁。1917年初马鸿宾率甘肃新军在宁夏和绥西磴口一带追剿哥老会头目高士秀和冒充清皇族后裔称帝的达尔六吉部,在贺兰山俘达尔六吉以下200余人。同年冬卢占魁又率残部至榆林,马鸿宾率部到庆阳配合榆林驻军堵击,卢军覆灭。

1921年初,马福祥任绥远督统,马鸿宾代理宁夏护军使,7月改任为宁夏镇守使,仍兼甘肃新军司令,晋为陆军中将衔。马鸿宾开始扩充兵力,除原有步骑十二营和使署卫兵一个营外,又扩编了步兵三个团,下辖七个营,其势力已仅次于马福祥。

早在民国初,甘肃全境已禁止种植鸦片。1921年陆洪涛就任甘肃督军后,陇东南开禁种植鸦片,波及宁夏。马鸿宾以此攻击陆

洪涛,后经马福祥权衡授意马鸿宾默许种植鸦片,收取烟苗罚款。

1925年,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有意联合西北回军势力,遂以马福祥为会办。马鸿宾也受冯节制。时甘肃共分八镇,回、汉军阀各半。1925年秋冯玉祥派刘郁芬代理甘肃督办。次年直奉军阀联合攻打国民军,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通电讨刘郁芬,刘将张免职,派马鸿宾为陇东镇守使,张又联合陇南镇守使孔繁锦与刘开战。马鸿宾积极发起“平番会议”,企图通过调解平息战乱,这一倡议虽得到甘肃各界赞同,但因张兆钾条件苛刻,使会谈流产,以致马鸿宾威信受损,不久终以国民军孙良诚、吉鸿昌等打败了张兆钾而告终。

1926年冯玉祥取消了宁夏镇守使建制,改马鸿宾部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二师,次年冯玉祥委任马鸿宾为甘边剿匪司令,命令马鸿宾出击宁县、正宁等地的张兆钾余部,马鸿宾因不愿离开宁夏而迟迟未动,遂受到记过处分。9月冯又将马鸿宾等改编为第二集团军第二十四军,马鸿宾任军长。不久原国民军二军李云龙和樊仲秀联合反冯,宋哲元出兵河南打樊,马鸿宾赴陕西防务,由于马鸿宾主张交战中少杀人,故受到当地群众拥护。

1929年冬,中原大战前夕,冯玉祥改编马鸿宾第二十四军为“护党救国军”第四方面军第七军,马鸿宾任军长。

不久,马福祥奉蒋介石之命,到华山游说冯玉祥,被冯扣押,马鸿宾亲至华山营救马福祥脱险。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调吉鸿昌到河南前线,宁夏省主席一职,命马鸿宾接任。马鸿宾到任后,深感力量不足,遂令各县成立护路队,由地方豪绅出资招兵买枪,无力自备者酌情发给,委马赞良、马忠分别为北路和南路司令,经过一年多的调整,组成了一支自己能指派的军队和政治力量,使宁夏得到暂时平静。

这时马福祥继续得到蒋介石的信任,由青岛市长升为安徽省主席,又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冯玉祥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马鸿宾因马福祥的关系,得到蒋介石谅解,并委派为暂编第七师师长,兼甘凉肃边防司令,旋又命代理甘肃省主席。1931年1月马鸿宾带二营兵力赶到兰州就任了省主席。1931年8月25日在蒋介石派来视察甘肃党务工作的马文车支持下,驻守兰州的西北军暂编第二旅旅长雷中田发动了政变,将马鸿宾看管起来。马被扣当日,马文车以甘肃省党部整理委员会名义,出面召开了“甘肃省党政军学农工商各界代表联席会议”,通过决议:(一)雷中田担任全省保安总司令,(二)组织临时政府,推杨思、李朝杰、赵晚江、马文东、李克明、雷中田等13人为委员,(三)马文车担任临时省政府主席,兼教育厅长。但除雷、马等少数委员积极活动外,其余处于观望态度,其原因是雷的实力有限,难于控制全局,加之进攻宁夏的苏雨田未能旗开得胜而逃往后套。这时蒋介石来电要释放马鸿宾,于是雷中田已感不妙。10月坚决主张扣押马鸿宾的赵晚江被刺身亡,其余人员人人自危。此时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从四川到兰州,欲谋重返政治舞台,力劝雷中田释放马鸿宾。雷中田、马文车看有台阶可下,提出只要马鸿宾回宁夏,可以恢复自由。吴佩孚出席宴请兰州要人会上,邀请马鸿宾参加,宣布恢复自由。蒋介石怕吴佩孚东山再起,命军队进攻兰州,并通令将马文车撤职查办,马文车、吴佩孚、雷中田仓惶出逃,次年蒋介石任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从此,蒋介石控制了甘肃。

马鸿宾获释后,积蓄力量,准备主政宁夏,蒋介石未允,并发表驻守在河南的马鸿逵为宁夏主席,马鸿宾驻防河南,以卫中央。后来蒋介石怕西北诸马壮大,形成对自己的威胁,遂于1933年冬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引起诸马警觉,当时甘肃绥靖公署主

任朱绍良,令诸马堵击,马鸿逵、马鸿宾和马步芳共同指挥阻击,使孙殿英败退太原,所部3万人,分别由胡宗南、阎锡山整编。

1935年至1936年,马鸿宾奉蒋介石之命率部到陇东阻击北上抗日的红军。先后堵截红二十五军及中央红军,均遭惨败。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高潮,宁夏“二马”整编为第十七集团军,马鸿逵为总司令,马鸿宾为副总司令兼八十一军军长,率一个师、一个旅和一个骑兵团到绥西抗日。1940年马鸿宾利用沙窝地形,击退了日军的西进,并击溃了六个伪蒙骑兵团。1942年蒋介石命傅作义为绥西防守总司令,马鸿宾为副总司令。1942年马鸿宾撤回宁夏驻防中卫一带。

1946年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马鸿宾被任命为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其子马惇靖接任八十一军军长。胡宗南进犯延安,马鸿宾受命派兵协助,3月马惇靖派其一七九团进驻环县、将台,立足未稳,于次日晨被一野击败,团长马奠邦被俘。1949年春蒋介石又以第八十一军和甘肃白海峰的骑兵团合编为固海兵团,以马惇靖为司令。希望马鸿宾配合马步芳、马鸿逵抵抗人民解放军,巩固大西北。这时全国形势有利于人民解放军,大局已定,马鸿宾对蒋介石的命令采取应付态度,约束自己的部队守而不进。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马步芳军队土崩瓦解,大局无法挽回,马鸿宾即去绥远会见傅作义准备起义。当他返回宁夏的途中,其子马惇靖已于9月19日与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在中宁县城签订了和平解放的协定,同时宁夏马鸿逵的军队在马全良、卢忠良率领下也宣布起义,宁夏全境解放。经人民解放军改编,原八十一军成为一野独立第二军,马鸿宾之子马惇靖、马惇信分任正副军长。

新中国成立后,马鸿宾历任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第一副省长

兼民委副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马鸿宾从历史教训中认识到民族团结很重要,1955年视察临夏时,他对群众说:临夏回汉世居为邻,鸡犬相闻,大家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生产,加强民族团结,提防野心家扰乱民生。马鸿宾晚年竭诚拥护共产党,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于1960年10月21日病故于兰州,享年七十七岁。

[马 通]

马 佐

马佐(1884—1966年),字辅臣,号矿务。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堡子乡堡子村人。生于光绪十年(1884年),是马麒的外甥。幼年攻读阿拉伯文和汉文,青年曾来往于拉卜楞贩运粮食、皮毛等。1915年马麒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任青海蒙番宣慰使时,提升马佐为矿务马队管带,管理各金矿、茶卡及盐场等处。1924年任西北骑兵第九旅(后改为第七旅)第一团团长,随旅长马步元开赴晋绥,在冯玉祥指挥下,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后,遂撤回青海。不久被任为樵运局局长,控制了青海大部分金矿和盐业收入,除为马麒聚财外,也为自己积累了大量资金,成为富豪巨户。1936年被马步芳免职。此后在西宁经营多种商业、工业,获利甚多。1937年后,返回临夏县西川堡子村,继续营商,并创办民生火柴厂,筹办大夏河西川民生水电厂,是临夏地方民族工业及水电事业的开拓者。在经商、兴办企业的同时,热心公益事业,出资修建大夏河第一座石墩木板桥,并在临夏市八坊修建28座大院,瓦房300多间,让贫苦无房的市民居住,租金很低,甚至免费。1936年在堡子村出资创办“德永小学”,并长期支付学校一切开支。因屡次捐资助学,被国民党政府甘肃省教育厅颁发银质奖章一枚。人民解放军进入临夏后,他和马全钦、马丕烈等受王震将军之命,劝说青海马步芳残部投诚,并随解放军赴新疆,争取骑五军官兵放下枪炮,投向人民解放军,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工业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工商部部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青海省副省长等职。1966年病歿于西宁,享年八十二岁。

[马 通]

端木杰^①

端木杰(1897—1972年),爱国民主人士。字文侠,安徽安庆市人。少年时,就读于安庆清真小学堂。清宣统初年入怀宁中学堂(今安庆一中)学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黄焕章率江西浔军数百人窜入安庆大肆抢掠,并枪杀了革命党人吴春阳。原在安徽督练公所任职、后创办敢于仗义执言的《通俗报》的韩衍,在安庆组织安徽青年军,号召青年学生报名参军,保卫地方安宁。负有正义感的端木杰激于义愤,怀着报国之志,遂投笔从戎参加了安徽青年军。他们白天上课,夜间值勤,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了大量工作。1912年南北议和时,端木杰随张汇滔淮上军至南京,担任总统府警卫工作。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南京留守政府被解散,端木杰入北京军需学校第一期学生班学习。他学习勤奋,1914年年方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校十四年间,历任教官、教务主任等职。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教书循循善诱,深受好评。其间,曾一度在北洋参战军督练处及陆军部总务厅兼职。自1928年起,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经理法规研究所教务主任、军政部军需营造司司长、交通部参事、中将军需总监等职。因其对培养军需人才怀有浓厚的感情,在担任上述职务期间,仍在中央军需学校、陆军大学兼任教官,主讲经理(会计)学,系该学科当时国内少有的专家之一。由于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门生遍及全国各地。

① 此文资料主要依据王俊贵《爱国主义者——端木杰》一文,载《回族研究》1991年第3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端木杰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勤部副部长。1945年,后勤部改组为军政部后方勤务总司令部后,转任副总司令。抗战期间他一直主管全国各抗日战场的军需物资供应及运输工作。在国力衰竭、财政萎缩、物资供应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他尽职尽责、积极筹措,想方设法基本上保证了各抗日战场的军需物资供应。为粉碎日寇的军事封锁,他跋山涉水,不辞劳苦,亲赴滇缅边界考察、策划修建了滇缅公路。他不满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限制和迫害,以民族大义为重,力主一视同仁,在其职权范围内,多次违令拨给八路军、新四军给养物资。端木杰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端木杰任职期间,廉洁自律,仗义疏财,关心家乡回民公益事业发展。众所周知,自国民党反动统治确立后,吏治败坏、贪污盛行,几乎可以说是无官不贪,故百姓戏称其为“刮民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大家族更是狂征暴敛,乘机大发国难之财。而端木杰在抗战期间,身为国民党三军总后勤官,地位显赫,权倾一时,其经手军需物资,何止千亿、万亿,但他不为所动。他为官二十多年,除在南京购置一套并不豪华的住所外,在家乡或各地再没有购置一所房屋、一亩田产。每当部下或亲友有困难时,总是用平时薪俸积蓄予以周济。抗战胜利后,他积极筹划倡办安庆回民中学,深得当地回民赞许。像这样做官一生两袖清风者,在国民党官员中实属凤毛麟角。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当后方勤务总司令部改组为国防联合总司令部时,他辞去所任职务。应粮食部之聘,任该部政务次长。年底,因病离职。1947年,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任职期间,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和实行独裁统治。1948年9月三大战役开始后,敲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丧钟。为了欺骗人民,争得喘息

时间,日暮途穷的蒋介石,玩弄“和平”阴谋时,他坚决主张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并主持政府工作。1949年初,他出任李宗仁政府交通部部长,兼任中国航空公司董事长。任职期间,多次拒绝下达破坏铁路、桥梁等交通设施的命令。南京解放后,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在人民解放军大举进攻下,广州也岌岌可危。国民政府机构及人员,一部逃往重庆,一部逃往台湾。国民政府让交通部所属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迁往香港,作为联系台北、广州、重庆的空中走廊。8月,广州解放后,蒋介石为确保空中交通命脉,维持在西南的残局,一再严令“两航”在港全部人员、飞机及器材迁往台湾,指定台北松山机场作为“两航”基地。9月,端木杰由重庆赴台北视察台北交通工作时,蒋介石责令他电召“两航”总经理赴台研究迁台事宜。讨论中,他极力赞同中航总经理刘静宜在台北设立基地需要巨额经费和一定时间,在港员工也未必都愿来台,只能逐步搬迁的意见,并说服蒋介石没有扣留刘静宜让其回港工作,为“两航”起义争得了宝贵时间。

1949年11月9日,“两航”总经理刘静宜、陈卓林代表全体员工4000余人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发表通电,宣布自即日起,“两航”与国民党政权断绝关系,归依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于11月12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复电“两航”全体起义人员,对他们的爱国行动特予嘉勉。“两航”起义后,蒋介石电召端木杰由重庆赴台。蒋考虑到“两航”总经理均由他所委任,临时更换主管,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不利,故未追究其责任。只是让其飞港争取起义人员返回台湾;与港英政府交涉,把在港“两航”飞机及器材运往台湾;租用外国飞机维持台湾与西南的空运。端木杰到港后,决心弃暗投明,称病不理公事。当蒋介石令行政院长阎锡山代理交通部长、伪造将“两航”财产出售给魏劳尔(韦乐尔)合同,企图借外国人

之手阴谋夺取滞留香港 72 架飞机及器材时，“两航”向港英当局提起诉讼。在诉讼期间，韦乐尔为让端木杰在出售合同上签字，先以数百万美金引诱，他不为所动；复以手枪相威胁，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拍案而起拒绝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开庭之日，端木杰委托律师代为宣布：“我身为交通部长，中航董事长，中航出卖合同无我签字，合同无效”。挫败了蒋介石政府的阴谋，致使“两航”滞港 72 架飞机、设备、数以亿计的财产，终于回到人民手中。在党组织精心安排下，1951 年 1 月初，他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与家人团聚广州，受到党和政府的热情接待和照顾。1953 年春，举家迁京，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和关怀。1954 年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并被选为民革中央委员。后又当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1956 年中风后，长期卧病在床。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病中仍不忘祖国统一大业。1972 年 1 月病逝于北京寓所，遗骨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答振益〕

十 吴鸿宾

吴鸿宾(1902—1988年),甘肃天水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兄弟六人,排行第六。童年慈父见背,生计靠母亲操劳,过着清苦的日子。当时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对外屈膝投降,对内镇压义和团和革命党人,人民群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在他的心灵中产生一股救国救民的愿望。进私塾读《四书》、《五经》,后上天水新式学堂,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他经常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追求进步思想,并于1926年3月18日参加了反对段祺瑞的游行活动,遭到北洋军阀士兵的毒打。不久经天水同乡葛霁云的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京西区区委书记。中共北京大学法学院支部书记。他积极从事学生运动,编辑《新政治月刊》。1929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受组织调派到中共中央军委从事联络各地上层人士和搜集情报等工作。1932年调任中共甘宁青特委书记。1936年“西安事变”时,他担任杨虎城将军的秘书,支持张、杨主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奔走呼吁。受周恩来指示,为营救西路红军做了一些工作,回到兰州主持建立西北第一个中共回民特别支部,往来于天水、平凉、榆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宣传动员各方面力量支援抗日战争。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成立后,成为办事处谢觉哉的主要助手。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组建了甘肃民盟组织,并担任民盟西北总支部甘肃特派员。1946年中国民主同盟甘肃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后,被推举为主任委员。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到处屠杀革命志士,他也是被捕对象,组织决定让他撤回延安,他充满胜利信心,向亲朋好友继续宣传当时革命形势,鼓励人们坚持

斗争。在绕道去延安的途中,西安已获得解放,他便来到西安西北局,参予研究解放甘、宁、青、新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军管会第二副主任,兰州市市长。还先后担任一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第一、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民盟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甘肃省第四、五、七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甘肃省人大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政协甘肃省第五、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十年动乱中,吴鸿宾受冲击,开始被关押在水南农校,失去自由达四年之久,又逼迫赋闲六年,其间又遭抄家和批斗之苦。他作为一个老党员,沉着自如,坚信马克思主义,坚信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会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统一、繁荣和富强的国家。“四人帮”不过是一阵阴风恶雨,一定会过去的。吴鸿宾于1988年2月3日在兰州逝世,终年八十六岁。2月10日省委书记李子奇主持的500多人的追悼会上,省政协主席葛世英在悼词中说:“吴鸿宾同志参加革命六十多年来,坚信马列主义,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吴鸿宾同志品德高尚,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马 通]

刘屹夫

刘屹夫(1907—1984年),名恩隆,字屹夫,以字行。1907年4月2日出生于北京牛街。其远祖在明朝初年从南京水西门迁来北京,牛街习惯称他家为水西门刘家,简称门刘家。其祖父虔守伊斯兰教义,清朝晚期任银库库官,廉洁自律;擅长医道,公余尝施医济人,从不受酬,为乡里所尊敬。其父早亡,母马氏忠厚仗义,爱憎分明,屹夫与兄恩庆(伯余)及姐三人,由祖父与母亲抚养,秉承家教,刚直勤奋。民国以来,家境由小康转为清苦。屹夫中学时代,除自住房外,别无恒产。

1921年屹夫入北京河南中学学习。1923年受《新青年》杂志及各种社团的影响,回族青年中也在议论如何使回族自强,为中华振兴贡献力量。当时牛街回民风气闭塞,刘氏兄弟与同学李廷弼等联络十三人,于1923年成立了《穆友社》,意为穆斯林朋友,以讨论时事,交流学习心得,砥砺言行,联络感情为宗旨。李任社长,屹夫是中坚分子。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北平回民曾组织后援会,《穆友社》积极参加义演募捐等活动;并应允义务为回族印刷工人办夜校,教文化,但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屹夫据理力争,《穆友社》内部意见不一,导致分裂。部分社员在屹夫组织下,发展十余青年,另成立“追求学会”追求真理,屹夫任会长。从研究伊斯兰教开始,不仅研究学术及一般思想交流,对会员思想、生活有严格要求,屹夫要求自己更为严格。他们在严冬徒步到郊区回民村落,观察社会,锻炼身体;为研究伊斯兰教而学习阿拉伯文,并从英文刊物上翻译有关伊斯兰教的文章在《正道》杂志上发表,还翻译英文《和平的宗教》、《穆罕默德传》等由清真书报社出版。进而学

习文史,阅读大量“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和社会科学读物。

1926年刘氏兄弟腾出部分自住房办起中才小学校,任课教员多是“追求学会”会员,艰苦创业,实现了为本乡(牛街)办实事的愿望。中才是牛街第一所兼收女生的学校。当时屹夫已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学习,参加小学的筹划,但未任教。他的家境更为清苦,只靠兼教家馆维持生活。1931年大学毕业后,任河北顺德(邢台)第三女师教员,后在保定育德中学、山东济南乡村师范教书,都是因为从事进步活动被迫离职。1935年到山东泰安科学馆工作,接受冯玉祥的聘请,任冯将军个人的数理教员。在山东刘屹夫已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屹夫义愤填膺,矢志随冯玉祥抗战,但到武汉时,他目睹国民党一片失败气氛,感到失望,他与冯坦率交谈,冯将军推心置腹地告诉他说:“要抗日就要去找共产党。”当即亲笔写了介绍信,介绍他去找周恩来同志。从此屹夫怀着对抗日、对革命的极大热忱,奔赴陕北,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经西安到延安,1937年11月到陕北公学学习四个月,仍被派回冯将军处教书,兼作统战工作。1939年初回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半年后去晋察冀边区,在五专署做援助敌占区抗日委员会秘书。1941年美国军队派观察组到解放区,屹夫担任翻译,他流利的英语与不卑不亢的态度深得好评。

1942年他被派到敌我争夺激烈的游击区龙华、涑水、易县一带工作,由于敌伪诬蔑宣传和残酷烧杀的高压,群众对我心存疑惧,尤其是几个回民聚居的村庄,加上宗教的影响与民族生活习惯,对共产党有盲目的对立。领导与刘屹夫谈了这里的工作困难,当时他还不是党员,但毅然答复说党的、抗日的、革命的要求,就是再困难也去,何况我是回民,有责任帮助本族兄弟解放自己。选定

了西水冶村谢家为突破口和立脚点。屹夫以诚挚的态度,开门见山说明自己是八路军,是回回老表。当他看到老人疑惧的目光,就跪在炕上恭诵了《古兰经》首章,和老人一起接“堵阿”作祈祷,局面豁然开朗。端茶烧饭,如待久别亲人。屹夫详细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民族政策等,谢家一户疑惧全消,从此成为堡垒户。他又把工作深入到敌占村,争取了几个伪村长,一些作伪职的人争相向我靠拢,继而开展了与解放区的秘密贸易,丰富了解放区紧缺物资的供应。

屹夫 1943 年 3 月入党,6 月转为正式党员。在一分区三专署作回民工作,后转到冀察城工部,作北平城市地下工作。1943 年到 1945 年间,他经常往来于解放区与北平之间,在北平建立了地下直属支部,有党员七人都是回民,其中包括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办公室工作的杨汝佶(雪门)同志。刘屹夫出入北平就住在麻刀胡同自己家里,凭借刘家在牛街的信誉关系,尽管有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但从未被敌发现。

日寇投降,刘屹夫有了发挥学业专长的机会。1945 年被调任下花园发电厂副厂长;1947 年 3 月调大连任远东电业中央试验所副所长,参加了东北电力系统的接收工作,医治战争创伤,恢复供电。同年 11 月组建佳木斯电业局局长,1949 年 5 月组建牡丹江电管局任局长。

1950 年 5 月调任东北电业管理局设计处处长,是新中国电力勘测设计事业的开创人之一。当时该处技术人员只有他一人,经他发展到 1952 年该处有工作人员 900 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已达 436 人。刘屹夫善于以党的气魄,作知识分子的工作。为调集人才,他从华东招聘一批技术骨干,有的人是留学美国的,设计处在沈阳,但要经常到抚顺、阜新、鞍山等地工作,屹夫允许他们每周末

与家人团聚,公费报销车费,使他们感到组织的关怀。朝鲜战争爆发,东北逼近战火,有人心存恐惧,请假回南方一去不返,屹夫自己并发动党员作思想工作,使也想走的同志打消了念头,稳定了工作情绪。他善于交友也敢于重用,他聘来的几个技术专家都安排在重要的技术领导岗位上,发挥特长,并让他们给年轻同志讲技术课。有人说这些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这些人自愿从南方来到东北参加建设,仅这一点就说明是爱国的知识分子。”1958年他在贵州任水电厅厅长时,缺乏技术骨干,请求华东电管局支援,答复说只有几名“右派分子”可以调出,他说“全要”。调来后被安排作了体力劳动,他知道后立即把这几个人调到技术岗位,发挥了很大作用。后来“文革”中竟成了“爱右派”一条罪状。他以极大的热心关怀培养年轻技术干部。他对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帮助无微不至,为活跃生活举办周末舞会、晚会,成立乐队,使冰天雪地的东北让青年同志感到温暖。有人不愿作技术要求低的工作,他风趣地说:“听说苏联还有磨刀专家,行行出状元嘛!”他经常在饭厅、宿舍与同事幽默风趣地聊天。他对工作十分认真,有条不紊,制订纪律严格执行。他一生要求自己严格,他是回民不与汉民同志一起吃饭,但质量从不两样,后来在电力学院有回民学生,设立了回民食堂,他与学生吃同样菜饭。屹夫嫉恶如仇,对别人缺点错误,有时激动起来批评方法简单,只是由于他对自己更为严格,别人也不甚计较;他对自己的缺点也不放过,1980年东北电力设计院庆祝三十周年时请他出席,他在发言中自我批评说:“在三十年前三反运动时,搞过的‘思想站队’是错误的,我向同志们道歉!”

刘屹夫 1952 年调北京任中国电力设计局副局长,1954 年 4 月任电业管理总局生产技术处处长,1955 年 10 月调任国家电力部技术司副司长,除 1956—1957 年在西安动力学院任副院长领导电力

教学工作外,多年来经他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电站、电厂,仆仆风尘往来于大江南北、荒漠高原,为祖国电力建设事业洒下了辛勤的汗水。

1979年9月屹夫以七十二岁高龄,调任河北保定华北电力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他制订建设规划,亲临教学第一线,带头听课,亲自讲经济管理课程。他对外语特别关注,设立了外语提高班、教师进修班,他本人俄语、英语均熟练,经常在饭厅与学生用英语交谈,提高学生使用外语谈话的能力。他治学严谨和惊人的记忆力深深地感染着学生。1983年他已患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仍一声不响坚持工作,关节炎发作走路困难,仍应学生要求讲团课,他以沉痛的心情,慷慨激昂地讲了“三·一八惨案”的亲历经过,散会坚持自己踏着月光缓缓走回家里。1984年3月6日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七岁。

刘屹夫从一个爱国的回族青年,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党和国家的优秀技术干部。他一生高度热情的对待工作,严于律己,刚正不阿。他去世后电力学院师生评价他说:“屹夫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

〔刘东声〕

刘格平

刘格平(1904—1992年),回族革命先哲、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者、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河北孟村人。青少年时,接触进步思想,对地主家庭不满。在南京上学时,受到五四运动影响,到天津工商大学补习班学习,于1922年7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2月在家乡堤东村建立了团支部,点燃了冀东、津南地区的革命火种。1925年春,刘格平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到驻河南的国民二军开展兵运工作,并以军官身份参加了北伐。同年和地下党的代表张隐韬组建了津南农民自卫军,张任司令,刘任副司令兼参谋长。遵照党的指示,宣传反帝、反封建,维护农民的利益,制订了军纪、政纲,并发出了武装起义的宣言,这是在我国北方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武装斗争的尝试。是年冬天,刘格平到天津组织了工人起义军,任总指挥,有力地打击了奉系军阀在天津的势力。

1926年8月,刘格平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以中共津南特派员的身份,返回津南地区创建党组织,先后在沧县直隶省立第二中学、泊头省立第九师范等处创建了党支部。1927年初,又在沧县建立了堤东区委员会,相继组成了中共津南特委,刘格平任第一届特委书记。随着革命斗争在津南、鲁北一带的开展,先后建立了河间、献县联合县委,盐山、庆云县委等一批党的地方组织。

1927年刘格平在津南,为了反对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提高农民觉悟,组织发动了献县东部地区的借粮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土地革命时期,刘格平被党组织任命为中共顺直党委的军事委员兼津南特委书记。在鲁北开展了“团结改造绿林武装”的工作,创建了一支三百多人的“津南革命

军”，派进了党代表，提出“革命军不杀无辜，不抢农民，只打击军阀势力和贪官污吏”等口号。接着于1928年春，在庆云、盐山一带组建了“津南革命军第一支队”，在刘格平领导下，攻占了庆云县城，缴了县民团和警察局的枪枝，在津南地区引起震动。当刘格平去河间、献县一带再次发动农民起义时，因坏人告密而被捕，判刑三年，他父亲为营救他出狱花掉了大部分财产。

1931年6月，中共党组织派刚出狱的刘格平去晋、陕开展军运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运动高潮，刘格平在西安团结回民中的代表人物冯瑞生等，组织领导了回民抗日救国会、回族青年读书会等民众团体。这时南京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到西安，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让学生只能安分读书，不许参加政治活动。刘格平依靠回民群众发动知识界、学生组织，领导了驱逐戴季陶运动，宣传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2年秋，刘格平回到沧州，担任中共津南特委军事委员，领导津浦沿线党的工作，策划武装斗争。1934年4月，又在庆云县领导发动了津南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马颊河民工暴动。当时国民党庆云县政府贪污河工公款，却转向农民摊派，激起民愤。党组织决定发动河工斗争。刘格平在抗议大会上慷慨陈词，揭露县政府贪污公款，强迫群众捐款和出工的罪行，并向群众散发“告庆云县人民书”及大量传单、标语。反动县政府逮捕了中共庆云县委书记，派一百多军警包围了会场。刘格平带领群众近千人包围了军警，组织了两三万人到县政府请愿，包围了县衙，砸了县公安局，缴了警察三十多支枪，迫使县长接受条件：承认群众抗河工的正义性；用公款修河和停止向群众摊派；立即释放被捕的群众和革命者等等。斗争取得胜利，威震四方。津南特委决定建立农民自卫军，创建北方苏区。刘格平以组织部长兼军事委员的名义通知

津南各县准备暴动。迫于国民军进驻泊镇、盐山,对自卫军虎视眈眈,张隐韬、刘格平等决定北上天津,暂避锋芒。北撤时中了埋伏,张隐韬牺牲,刘格平受伤被捕。

刘格平先后被关押在庆云监狱、沧县监狱、北平国民党三团、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等处。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大批革命者,分南北两狱,刘格平担任北狱的支部书记。遵照党的指示,领导狱中党员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敌人对刘格平软硬兼施,酷刑和利诱都动摇不了他那铮铮铁骨的革命意志。刘格平顶住了敌人诱降和在反共宣言上签字的阴谋,绝不“坚决反共,为党国效劳”的宣誓。“七七”事变后,刘格平等同志提出按释放政治犯的条件释放他们,敌人把对他们的无期徒刑改判为十年,到1944年释放出狱。

刘格平出狱后,中共渤海区党委任命他为天津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领导天津市的抗日爱国运动和发展党的组织。1945年5月,又调他到山东开展民族工作。不久,山东省成立回协,刘格平任主任。接着,鲁中、鲁南、渤海等区回协相继成立,开展了减租减息、发动回民群众参军参战,积极投入抗日战争。并先后组建了鲁中回民支队和鲁南回民支队。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支调往延安后,刘格平又协助成立了冀中的第二个回支以及滨海、渤海一、二分区的回民大队等武装。日本投降后,这批回民抗日武装又转入解放战争的洪流之中。

鲁中回支参加了解放泰安、支援临朐的战役,坚持青州、临朐、临淄等山区的斗争,打击还乡团,配合大部队作战。鲁南回支参加了解放枣庄的战役,后编入徐州警卫部队。滨海回民大队参加了解放枣庄、临沂的战役。1948年,刘格平调任渤海区党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渤海军区副政委,开展土地改革和镇压匪特并发动组织

了支援淮海战役的工作。在刘格平直接领导下,滨海回民大队和渤海一分区回民大队、渤海二分区回民支队合编为渤海警卫团,投入了解放济南主攻泺江的战役,立了大功,后改编为山东军区警七团,一直坚守在胶东半岛的海防线上。

为迎接全国的解放,1949年2月,中央委派刘格平任渤海干部支队第一书记兼政委,率队南下,在上海成立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舒同任校长,刘格平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1949年9月,刘格平作为少数民族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上他发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它标志着我们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到人民民主和民族平等的时期,少数民族代表和与会代表共商建设新中国的大政方针,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感到荣幸和愉快,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自己的国家,克服一切困难获得伟大的成功!”在这次会上,刘格平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代表少数民族参与新中国的国家大事。他深入民族地区考察访问,贯彻中央的民族工作方针和政策,调解民族纠纷,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曾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和赞许。

1953年,刘格平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同年,他还担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和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主任。1954年和1959年连续两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民族委员会主任。他的努力工作和取得的成就,曾受到中央主管统战工作的领导人李维汉的赞许,认为在刘格平主持民族工作期间,是民族关系最好、工作最正常、执行民族工作路线最健康的时期。

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刘格平当选为自治区主席,区工委书记处书记。宁夏回汉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开拓建设,

各项事业在不断发展。1960年5月在开展“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刘格平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被撤职并调离宁夏,宁夏大批干部受打击,挫伤了元气。刘格平到中央党校学习,1964年分配到山西省任副省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格平的冤案彻底平反。

“文革”开始后,毛主席、周总理关怀刘格平,指示他“出来主持山西工作,把煤炭抓好,以免影响全国”。1967年刘格平任山西核心领导小组组长,随后担任革委会主任和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不久又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政委。他原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69年又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林彪、“四人帮”为搞乱山西,挑起武斗,乱中夺权,刘格平受到冲击,被调到石家庄办学习班,受批判之后下放到唐山瓷厂劳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亲自批示把刘格平调回北京,安排他任全国政协委员。1992年3月11日刘格平同志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刘格平生前有人给他祝寿时,曾写下这样的评语:“精英马骏是先行,继有沧州举赤旌。唤醒虎龙惊顺直,坐穿狴犴壮津平。桃花情薄梅花髀,泾水性浑渭水清。利禄从来如腐鼠,鸛鹤志在普天明。”短短数语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刘格平坚持真理,不断革命,大义凛然,宁死不屈,顾全大局,含冤不恨的悲壮的一生。

〔丁毅民〕

马青年

马青年(1917—1997年),又名马青廉,经名撒力海。生于1917年,陕西省安康县城关人。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幼年在原籍上学,因家境贫寒,于三十年代初随陇南茶商来到六盘山区,与宁南人民同吃山区苦水和土豆度过了艰难竭蹶年月。1935年秋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等率领北上抗日的鄂豫皖红二十五军来到了西吉县兴隆镇,欣喜若狂的马青年参加了人民军,当了一名红军战士。他经常陪着徐海东等领导作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对红军有了较深的认识,从心里感到红军是热爱群众、保护群众的一支最好的子弟兵。红二十五军为了支援和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于8月中旬迅速攻开隆德城,翻六盘山,兵临平凉县城。随即又转移到陇东地区,以牵制国民党兵力。在激烈的战斗中锻炼了马青年,他于这年9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连队指导员。1936年5月红军西征宁夏,6月西征红军总部司令员彭德怀批准,在徐海东领导的十五军团领导下,组建了回民独立师,马青年由十五军团政治部宣传干部被提升为师长。与红七十三师、七十五师、七十八师,从宁条梁出发,在彭、徐指挥下,出奇制胜,夜袭小桥畔,围攻安边,解放定边、盐池、同心、预旺、韦州等地。马青年英勇作战,冲锋在前,得到领导好评。

1936年夏党中央提出要“帮助回族与蒙族人民建立独立政府”。为了适应新区形势的发展,开始筹建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党中央还派李富春同志来到同心,帮助筹建回民自治县政府。并成立了由李富春、程子华、王首道、唐天际、黄镇、杨奇清、马青年等组成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10月召开了豫海县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预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要成员,贫农出身的回民马和福当选为政府主席,李德才(回)为副主席,政府机关下设军事部、土地部、没收委员会、保卫部等,马青年被选为军事部长。这是我国历史上创造的第一个县一级回民自治政府。11月上旬红一、二、四方面军主力会集同心城,回汉群众夹道端着茶水、糖果、瓜子、油炸糖酥馍欢迎红军,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同心西门外广场召开了万人军民联欢大会,自治县政府主席马和福代表广大回汉人民热烈欢迎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会上朱德、彭德怀、张国焘、贺龙都讲了话。1938年豫海回民自治政府马和福主席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后,马青年以一二九师镇固平办事处主任身份,继续在这里做回民群众工作。大约在1941年回到延安,任抗大一大队队长兼指导员。继任陕甘宁边区回民协会理事长。解放东北时,他任冀、察、热、辽中共地委委员兼中共赤峰县委书记。1949年天津解放后,任天津第九区区长。湖南解放后,他任中共长沙市委常委、秘书长。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长沙调到西北局,不久回到甘肃任省民委副主任、中共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1951年8月调中共临夏地委书记、行署专员,1956年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1962年任西北局统战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马青年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陕西省委统战部长,1980年后历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第二、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还出访过非洲国家。

马青年是红军干部,曾长期在甘宁地区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善于团结人,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民族统战政策。工作中严肃认真,勤勤恳恳,是党培养出了一名优秀的少数民族领

现 代(下)

一 蒋翰臣及其家族

蒋翰臣(约 1827—1897 年),南京富甲一方的蒋氏家族的创业者。名春华,以字行。原籍安徽含山。清中叶有蒋锦堂者以运漕而迁居南京,历文源、恒清二世,均以小商小贩谋生。至翰臣与福基兄弟,艰苦创业,改变了家族面貌,自称“金陵蒋氏”。

翰臣青年时在清军中因功官至四品衔同知,赏戴蓝花翎。后退出仕途,与弟福基(名春源,约 1833—1885 年)一起经商。时值平定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物资匮乏,他们以贩运紧缺的盐而积累了原始资本。据曾在蒋氏家族服务了两代人,参与了蒋翰臣创业的马培基在所著《金陵蒋氏家事》中说,同治三年(1864 年)太平军“退出金陵,曾国藩初定东南,地方久经糜烂,十室九空,库帑空虚。曾氏出示招商承运两淮食盐,运往湘、鄂、皖、赣四岸急解淡食久困,我家首先醖资纳官,领证购照,驰往十二圩盐场用帆船满载大批食盐,溯江而上,舳舻千里,偏遇顺风,每抵一岸,销售一空,利益何只倍数!空船放回,随船拖带上江各省土产、竹木、桐油、生漆、棕麻、药材种种民生用品”,根据市场急需,经年累月,得以发家致富。

后来蒋翰臣兄弟又与同乡刘鉴中合资开设“春生鉴”号,转而经营缎业。缎是南京地方手工业名产,南京回民操织缎业者甚多。“春生鉴”经营的素缎,为求产品工精质细,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他们自设作坊,自织自运,盛名遍及赣、鄂、湘、川、滇、黔数省,往往货运在途,已被预订一空。“春生鉴”号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收歇。此时其弟福基已去世多年,老弟兄两房生齿日众,遂分了产业。二房分得“鄂岸”、“湘岸”、“皖岸”的盐票10张,分布在苏、鄂等地的典当铺“福源典”、“福安典”、“同沛典”等字号计6月。“盐票”即盐田的股份权凭证,10张的价值当超过6月典当铺。大房蒋翰臣健在,分产后又苦心经营多年,其产业当远超过二房所值。此后各房都以汉口为枢纽,在各通都大邑广开商肆,经营典当及盐业等。本世纪初,上海已开埠而向国际性都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其迷人的魅力吸引着蒋翰臣,在他七十寿辰前夕,他借避寿之机亲赴日本考察,归来后反复思索,在临终时从自身的经济实力出发,遗嘱后人收缩诸行业,将资金投入上海的房地产业,奠定了蒋氏家族在上海进行开拓的基础。

蒋氏家族受伊斯兰教影响,把施舍视为天职。蒋翰臣常年为本民族、为乡梓造福,一诺千金、万金而不惜,救灾赈贫,散衣施药,晚年仍认为“愿多未逮”,谆谆教诲诸子,公益为人生分内事,要世代举办以遂己志。蒋翰臣生前就忧虑上海回族同胞日众,且多贫困,那里尺土寸金,恐怕十年后就难有葬身之地。他在七十寿辰时,免去祝贺仪礼,捐资购得市郊土地6.9亩,交上海清真董事会备用。

蒋翰臣有五个儿子,依次为长城、长恩、长洛、长松、长泰。他们本是守成一代,遵父亲吩咐,在辛亥革命前夕举家迁往上海,开创房地产业,经营至本世纪三十年代,这期间是蒋氏家族的全盛时

期。

为了方便回民生活,长子长城还在汉口开设了春源油行,在南京有德大酱园,在六合有广大油坊,都具有一定的规模,经营也很出色。抗日战争开始,中华各民族陷于灾难,江南沦陷,蒋氏经济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同趋于衰落。

蒋翰臣的第二代都出生于清末,受到传统文化教育。翰臣曾为自己和第四子长松各捐了个举人。这一代的妻室中有了宦门闺秀,二子长恩的妻子马氏是漳州知府的小姐,有一定文化教养。蒋氏尽管已经富有,愿“遗子以经不以金”,将注意力转向百年树人。三子长洛(字森书,?—1911年),曾辟园于南京小火瓦巷,题名为“实园”,以为与文人雅会之地。长洛又创办一所中学。因南京钟山又名蒋山,乃命名为钟英中学,广招各族子弟入学,开清真伙食,以爱国主义教育著称。在三十年代抗日高潮时,钟英中学广大师生群情激愤,纷纷要求赴抗日前线,当时社会上有“要当兵,进钟英”的美誉。蒋长洛还为上海清真董事会办学提供英语、国文教师月薪50元及学费年600元。蒋氏的社会公益事业,自发家起至抗日战争前夕,大都是蒋翰臣五子长泰(字星阶,1870—1935年)经办的。清末他应两江总督端方的要求铺设了南京第一条弹石马路(城内至下关段),并在两边植树造荫。为继承祖国医学传统,以造福人民,他出资创办了中西医院,建成后每日门诊量在千人左右。长泰还出巨资翻盖上海清真别墅,把原来只有六间两厢的陋屋,修建成礼拜殿、沐浴室等齐全的可容数百人的民族宗教场所,后又扩建成上海日晖港清真寺(现改为民族招待所)。蒋氏还在南京兴办了南郊义学,建筑了息心亭殡舍,重建了花牌楼清真寺(即今太平路清真寺),修缮了汉西门清真寺和净觉寺;还在无锡兴建了第一座清真寺,在苏州扩建了太平坊清真寺等。

蒋翰臣有十一孙,以“国”字排名,都受过良好教育,这一辈的夫婿选择也以文化素质为主要条件。蒋长洛的女婿是傅统先教授(1910—1985年);蒋长松的女婿哈雄文(1907—1981年)是位建筑学家,在上海沪江、复旦、同济等大学任教授,曾任中国建筑师学会理事长、北京十大建筑艺术委员会委员等职。蒋长恩的儿子蒋国榜(字苏龢,1893—1970年)早年曾师从国学名家郑鼎臣、冯煦、李详等,晚年师从集哲学、佛学、诗词、书法于一身的一代宗师马一浮。国榜为奉养母亲,在杭州西湖花港观鱼景点附近购别墅一幢,被俗称为蒋庄,为西湖三大庄园之一。建国后,蒋国榜迎马一浮来蒋庄同住,并在此筹建智林图书馆,自任协纂。1957年周恩来总理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亲临蒋庄拜访马一浮,蒋国榜在座,并一同合影留念。蒋国榜是位文人雅士,自称“天方学人”,常寄情于山水,曾捐资修缮浙江嘉兴的烟雨楼,在南京清凉山添建方亭一座。1970年蒋国榜逝世,子女秉承遗愿,将劫后余下的马一浮遗墨、著作、书信等捐献给国家,并提出请求展览于蒋庄,受到政府重视,蒋庄得到重修,改名为“马一浮纪念馆”,对外开放。

金陵蒋氏是江南沃土上回族经济百花园中,在适宜气温下,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开放的一枝奇葩!

〔郑勉之〕

魏子青^①

魏子青(1870—1928年),名步云,字子青,以字行。开封市人。原姓王,过继给舅父,改姓魏。幼家贫失学,以提篮小卖为生。成年,苦心孤诣经营工商业,家产渐丰。1913—1917年历任河南省商务联合会总干事,后改会长制,改任会长。1914年3月,他代表河南商会参加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大会。他一手创办汴、郑、洛三座电厂,还创办其他工商业,解决不少回民就业问题,是回族中第一个电力实业家,也是发展河南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先驱者。当时报纸称他为“工商巨子”、“河南巨商”。

清末,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励着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当时爱国人士把发展民族工商业当作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手段。辛亥革命后,全国掀起了一个兴办工商业的热潮。具有爱国心的魏子青也卷进这个浪潮之中,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先是办电厂。

清末,河南省有三次官办、官商合办电厂之事,皆未成功。魏子青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筹办电灯公司,邀杜秀升(回族,开封人)和杨绍泉(汉族,开封人,进士、翰林院编修)参加董事会,共集资25万两银子,其中杜、杨二人投资4万两,魏投资21万两。电厂定名为普临电灯公司,由魏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杜、杨任副董事长。宣统二年(1910年)开封地方政府同意公司申请,将开封南

^① 本文参考资料:《中州今古》第二期、第三期;民国六年《大梁日报》3、4、7月份;《河南辛亥革命史事长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出版。提供材料人有:魏子青孙子魏志远,开封供电局离休局长、普临电灯公司老工人马宗法,开封回族老人陈再坪、马志昆等。

关三里堡四营房北乱葬地 50 亩征用为发电厂厂址(今为开封供电局院),开工建厂,1912 年建成发电。营业部设在城内鼓楼街魏家院内。初有发电机两部,可带动 16 支光灯泡 1 万盏,供应市区及火车站地区用电。1917 年、1932 年、1934 年先后增加发电机五部,不但能供照明,也供工业上使用。起初,开封人不知电为何物,故发电后先在用户中试用,不收费。人们安上电灯后晚上灯光四射,照耀如同白昼,官绅之家和大的商店争相使用,借以炫耀或招揽生意。军阀、官僚看电厂有利可图,于 1929 年、1932 年、1945 年把电厂三次收走官办,由于他们只会搜刮民脂民膏,不懂经营之术,造成企业严重亏损,又把电厂发还魏家经营。1938—1945 年,电厂被日本侵略军霸占,机器损坏严重。1948 年 10 月,开封解放,电厂也获得新生,1956 年公私合营,魏家股金定为 10 万元,电厂改名为开封电灯公司。

1914 年 11 月,魏子青与实业界白吉甫(回族,开封人)诸人商议在郑州开办电灯公司,呈请省长核准立案。1915 年春,在郑州大同路创办郑州明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20 万元,魏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白德清(白吉甫之子)任经理,负责日常工作。本拟于 1916 年 6 月发电,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机器未按时运到,至 1917 年才发电,供照明用电。1919 年公司扩大规模,迁到郑州西关外金水河旁(今一马路郑州供电局院)。魏子青去世后,董事长由杨绍泉接任,经理为魏相民(魏子青的长子),公司更名为郑州明远电气公司。1949 年 3 月,被郑州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郑州电力公司。

1917 年魏子青筹备在洛阳开办电厂,定名为普照电灯公司,投资 5 万元,杨绍泉任董事长兼经理,并具体经办。电厂设在洛阳东站西闸口以西的岗子上,营业部在城内北大街。1918 年开始发

电,供照明用电。1922年因机器损坏,资金困难,电厂关闭。

魏建立三个电厂后,需要大量用煤,考虑到河南省密县(今新密市)煤的蕴藏量丰富,且又居于开封、郑州、洛阳三市之间,遂于1919年在此投资建煤矿,以供应三个电厂用煤。因他办煤矿外行,又无精力照管,加上交通不便,所以他的“自己电厂用自己的煤”的愿望终未实现。煤矿为当地人无偿占有,抗日战争时期,魏相民把它卖掉。

魏子青创办的电灯公司在重重困难中坚持下来了,“据统计,1892—1918年全国共有电力工业八十一家”。而魏子青即创办三家,这对一个回族实业家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

开封虽然工商业发达,市面繁华,但没有一座设备先进的现代式剧场。魏子青与杜秀升合资在马道街路东购地建丰乐园剧场。宣统二年元旦正式开张营业。经官府批准,妇女可以入园看戏,这是河南妇女进戏院看戏之始。但要求男女有别,虽夫妇也不得同席看戏。这里主要是上演京剧,民国初年也曾演过一些电影。著名京剧艺术家、爱国艺人汪笑侬在此上演爱国名剧《哭祖庙》等剧目,盛况空前,当时《河南日报》载:“一时坐客观剧者不下数千余人之多,可谓豫省历来新到名角演剧之盛况所未有也”。1922年,此剧场因失火毁于一旦。1923年,魏与杜又合资在丰乐园剧场的废墟上创办了“新商场”。商场分楼上楼下,既有百货店铺,又有游艺场所,如同上海的大世界,在开封又轰动一时,顾客如云。

清末,魏子青在河道街路南开办开封当时最大最豪华的澡塘——浴华楼,此澡塘也名噪一时,成为社会名流的聚会之所。

魏子青晚年在鼓楼街路南创办一间印刷所,设备有圆盘机、四开机等,主要印刷商业上用的单据和其他业务。还创办中州实业染织厂。

1917年,魏子青准备招股开办开封自来水公司和商业银行,由于资金不足,未能如愿。

鉴于回民贫困者多,子弟无力求学,由郭苾臣领衔,魏子青、杜秀升等人在光绪三十四年创办开封第一座回族小学——私立养正小学堂,设于清真东大寺后院,开始设有阿文和汉语,辛亥革命后,按教育部规定科目教学。此校是今开封市回族小学的前身。他还创办一些回民的慈善事业。

魏子青对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洋货倾销、工农业凋敝不满,关心祖国的振兴、强盛。他支持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河南重要集会几乎都在丰乐园举行。如:同盟会河南支部成立大会,河南国民捐事务所成立大会,国事维持会河南支部成立大会,国货维持会河南支部成立大会等等都在此举行。五四运动时期,学、商各界在此开会声援北京学生运动,1920年在此纪念“五七国耻纪念日”,反对日本霸占山东和日本在福州、珲春等地的暴行,抵制日货等等。1919年7月31日为反对向日本贷款修铁路,追还陇海铁路观音堂到潼关段路权大会也在此召开。这些会议起到了“激励民气”的作用。

1912年5月,由同盟会河南支部等36个团体组织在开封召开第二次救亡大会,派代表赴北京抵拒“善后大借款”,成立河南国民捐事务所,刘青霞(汉族,尉氏县人,富孀)当选总理,魏子青当选协理。1913年3月,河南成立国事维持会河南支部,魏子青当选参议。1919年9月,河南学、商两界组织国货维持会,他捐洋400银元作公费。为支持全省维持国货活动,普临电灯公司特定廉价章程:1000盏电灯以上减收定价三分之一,并免收安装费。

1928年因郑州土地被军阀霸占,魏子青连气带病离开人世。他一生中创办了不少工商业,尽管他一生谨慎行事,但仍逃脱不了

民族资本家的可悲命运。

100

〔陈廷良〕

[illegible]

1950年，在“三反”斗争中，王德林因患肺病，经组织批准，到天津疗养。在疗养期间，他仍坚持学习，阅读马列著作，并撰写了《论无产阶级专政》、《论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等文章。1951年，王德林因病去世，享年45岁。

杜秀升^①

杜秀升(1881—1960年),名光俊(曾用名龙彬),字秀升,以字行。开封市人。长期经营面粉等工业,建国前历任开封总商会、河南省商会副会长、会长,是河南省著名回族企业家。

杜秀升生于开封镖局镖头之家,幼读诗书,擅长剑术。青年时在其父经营的聚泰蜡烛糖果店当学徒,后继父业,任该店经理。

清末,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励着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青年的企业家杜秀升与魏子青(回族,开封人)、白吉甫(回族,开封人)等人结为金兰,同赴上海考察,认为中国欲强盛必须发展工商业,产生实业救国思想。1910年(清宣统二年)投资近2万元与魏子青等人创建河南省第一座电厂——普临电灯公司,任副董事长;同年元旦,与魏子青在马道街合资兴建的河南第一家新型剧场——丰乐园正式开张营业;1923年,与魏子青又在丰乐园剧场的废墟上创办了“新商场”,如同上海的“大世界”。三者皆开河南工商业者之新风。嗣后,他又在鼓楼街开设钜昌西药百货店和钜昌汽水厂等。

1924年,开封永丰面粉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另行组建益丰面粉公司,聘杜秀升为总经理。他改进经营管理方式,积累资金,逐渐增设英式机磨6部,后得到金城银行贷款,资金周转灵活,营业渐好。1933年,又改装3部德式机磨,产品质量提高,“获利较丰”。

^① 本文参考资料:《河南文史资料》第1卷、第9卷、第32卷;《开封文史资料》第3卷;《抗日战争中的回族》;白晴峰、傅文溪撰写的《杜秀升》(打印稿)。

开封信昌银号倒闭,杜秀升以债权人资格,1934年参与改组复兴的“兴记信昌银号”。当时陇海铁路已修至西安,陕西盛产小麦,信昌银号资金投向西安,创设华峰面粉公司。1938年5月,杜秀升到西安,以债权团负责人资格接管华峰面粉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41年,杜氏当选陕西省面粉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他领导西安的华峰、成丰、福豫、和合;宝鸡的福新、大新;汉中的大新和蔡家坡等面粉厂,统一接受当时政府的抗日军粮生产任务,给各厂分配生产指标,协调各会员厂的关系。为了保证军需任务,华峰公司挖掘潜力,把日产面粉4000袋提到6000袋,成为当时大后方三大面粉厂之一,并能生产出少量一等粉和麦精,供给来华参加抗日战争的美国第14航空大队的飞行员食用。大片国土沦丧后,大后方整个军需民用的食粮,主要依赖于四川的大米和陕西的面粉。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杜秀升领导的陕西面粉工业,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保证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军需民用,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946年1月,杜秀升返回开封,又出任开封天丰面粉公司和益丰面粉公司合并的河南特种面粉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经营西安和开封两家面粉公司。

武陟县的鲁连城于1919年创办成兴纱厂,到1930年纱锭达8000锭子,由于经营困难,1931年秋季把纱厂租给杜秀升,租期五年,更名为钜兴纱厂,产品商标为“二仙阁”,一直经营到1936年。

1946年,郑州明远电灯公司重组后,定名为“郑州明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杜任董事长。1947年任全国电气事业联合会理事。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官办的河南商务总会陷于瘫痪。1912年,杜秀升与魏子青、刘海楼等筹建新的商会,1913年2月开封商会正式成立,他任商会干事,次年商会由干事制改为会长制,他出任副会长。1917年,开封商会改称开封总商会,并代行河南商会

职权,杜秀升(当时用名杜龙彬)升为会长。1931—1935年,河南省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在军阀支持下兼开封总商会会长职务,1935年,杜秀升又接任会长。1938年5月,杜氏去西安,组成河南流亡商会,参与当时河南省政府的有关活动。日本投降,1946年1月,杜氏回到开封,继续主持商会,担任理事长。同年3月,河南省商联会进行常务理事选举,又称为选“坐庄”常务理事,五人当选,杜秀升为第一任执行常务理事,任期半年(5—10月),其间出席了中华全国商联会成立大会。1947年11月,省商联会夭折,杜氏以开封商务会名义继续代行省商联会职权。1948年春,企业倒闭增多,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日益加重,商民无力负担,苦不堪言,商会应接不暇,稍有迟缓,动辄抓人。杜秀升借养病避居上海,会长职务由副会长马运五(回族,开封人)代行。

杜秀升善于交际,在从事商务活动的同时,广事结交河南省军政要员,来往密切,参与一些政治活动。1919年任河南省铜元局代局长,1920年前任豫泉官银钱局会办。1922年段祺瑞执政,他被指定为北京临时参议院参政员,赵倜主豫期间,他与其宪兵营长马吉第(回族,安庆人)结拜盟兄弟。1924年,张群任河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局长,他又与张群结为盟兄弟。1926—1927年,被聘为督军公署顾问和省长公署咨议。1932年任河南省营业税局总局长。1938年7月在武汉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上,杜以河南商会会长身份当选为参政员,为第一、二届参政员。1946年11月,当选为国大代表。

作为民族企业家,杜秀升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掀起抵制日货的高潮,他以商会会长身份发动全城商户举行罢市,抵制日货,同时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商户利益。“七七”事变后,他毅然弃去家业到大后方,追随抗日活动。1939

年,日伪政权为拉拢他,聘他为“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河南本部名誉委员”,他在西安发表声明,严词拒绝。上海解放前夕,有人劝他去台湾,他表示决心留大陆,不去台湾。

杜秀升一生敦睦邻里,维护商界,把“惟桑与梓,必恭敬之”,自书为座右铭。他待人和蔼,人有所求,无不勉力而为,因而颇有声望。

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6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0年1月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1960年9月,因患癌症在上海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陈廷良〕

安树德

安树德(1886—1950年),字润身。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月十二日出生于山东德州长庄乡北营村。其父安宝森,系明初来华菲律宾苏禄东王巴都噶叭啞喇第十五代孙。安树德童年时无钱进学堂读书,靠为别人打短工和卖水挣钱补贴家用。1913年秋,备补军左翼第二团团团长冯玉祥在德州招兵,二十七岁的安树德弃农从军,开始了他一生中的命运转折。

初入伍时,安树德在李鸣钟连当了一名伙夫,两年后提升为班长,又过了两年,恰逢旧军阀张勋率领“辫子军”进京上演复辟丑剧,冯玉祥部奉命作战,一举击溃张勋叛军,维护了辛亥革命创建的共和体制。安树德在这次反复辟活动中因果敢勇猛升为排长,受到冯玉祥赏识,不久就被任命为新兵营营长,负责为国民军训练新兵。他“早起晚睡,终日里非常有精神,不辞劳苦训练新兵,确系与士兵同甘共苦”,并且在新兵中灌输“烟酒必戒,嫖赌必戒,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信条(王赞亨《苏禄国王后裔安树德》,山东人民出版社《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他每有战事必身先士卒,1923年,他带新兵营在天津杨村与奉军作战时,挥舞大刀赤膊上阵,活捉敌师长,“安回子”的事迹在国民军中一时传为美谈。

1924年以后,安树德跟随冯玉祥参与发动北京政变,彻底驱逐末代皇帝溥仪小朝廷;而后进驻西北,铲除甘肃地方势力李长青和包玉树;平息河州事变,追剿尕司令马仲英,因功先后晋升为团长、旅长、师长,一度担任西宁城防司令。1928年10月,国民军安树德部会同吉鸿昌及魏凤楼部,“驱走河州北原回军,一直从河州西方进抵大河峡”(韩定山《马仲英与河湟事变》,中华书局《文史资

料选辑》第27辑)。安树德旋被任命为“青海剿匪总指挥,任命鲁崇义为副总指挥,追剿马仲英”(屈伸《孙连仲部在青海追击马仲英部的回忆》,《甘肃文史资料》第24辑)。

安树德在西北与马仲英作战过程中,注重联络民族宗教感情,反对民族仇杀,为当地回族群众作了一些有益的事,例如1929年,他“痛感青海回族文化落后,愚憨麻木一至于斯,于是极力呼吁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改变愚昧落后状况”,筹组“青海回民教育促进会”(孔祥录《青海回民教育促进会概述》,《青海民院学报》1985年第4期),他自任会长,另以西宁回族绅士刘善为副会长,创办女子小学,时人对此此举有较高评价,《新甘肃》发表评论:“青海回民对于教育向未注重,故回民知识缺乏,思想落后,种种不幸事件遂由而起。回民有识者有鉴于此,遂有回民促进会之组织,前会长安树德于民国十八年七月建立小学一处……”《青海历史纪要》中说:“安氏从甘肃聘来邓某(女)为校长,是为青海有回民女子学校的开始。”

1930年新旧军阀中原大战中,安树德率十八师奉命留守后方,任务是架设军用无线电台,与兰州保持通讯联系,分兵控制甘青交通线,为冯玉祥免除后顾之忧。冯玉祥失败下野,安树德不愿随国民军投归蒋介石,弃甲归里,在北平作了寓公,并于1932年回到德州原籍,买田置地,投资经商,创办实业,成为德州著名的开明士绅。其主要事迹有:

带头捐款,主持重修苏禄东王墓、清真寺、明永乐皇帝御制碑亭等建筑;在德州火车站附近自费开办“水馆驿”(戒烟馆),收容吸食鸦片者在馆中强制戒烟,于德州四周城门挂图宣传戒烟好处和吸毒危害,烟民们赠其“戒烟功德匾”;造福乡梓,修堤治水,德州地近运河,常遭水害,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私吞修河款,引起民众公愤,安树德利用与韩同在国民军中共事旧谊,追回修河款项,亲自带领

德州父老上堤治水,工程完成后,乡民们共送他一块“德硕望重”匾。

安树德解甲归里后,在北营购置了200多亩地,实际也就是原来的东王墓祭田,从而成为北营最大的地主,全村的回民几乎都成了他家的佃户,地租或对半分,或四六开,以对半分者居多,与同时期其它地方相比,地租较轻,其中显然有民族感情和家族感情的因素。此外,他还利用从军十余年的积蓄跻身工商业,其长孙安受益著的《安树德解甲归田简况》中记载:“在外商,投资美国美孚及德士古两石油股份公司;新加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美孚外商承办人张金山、黄浦在芪、李之丹。德士古外商承办人李云中、祝洪义。对外使用字号:美孚-德昌,德士古-德润厚;图章:安树德、安润身;对外承办人:田猛如、杜鹏成;翻译:李镜明。在国内,德州有德润厚、同聚油坊、山城玉银号。平原有德润昌。济南有卷烟厂。泰安有新泰煤矿。郑州有德源兴商号。天津有同德油坊、义德里货栈。”

在家庭生活方面,据安树德后人们回忆,他治军有方,治家从严,一生为人正直。他现任开封鼓楼区政协主席的儿子安文选在书信中回忆说:“先父对子侄辈要求甚严,一直把他青少年时推车卖水为生的小独轮车视为珍物而存放,告诫子侄辈莫忘自己也是穷人出身。对子女学习督促甚严,常说:回族也应有学问,不然难以成器。我于六岁即入学读书,绝不允宠娇,夜晚必秉烛复习,方准入睡。”

1947年后,安树德忙于各地的商务,稍闲则居于平津两地的寓所,北营的田产由其父安宝森经管。1950年,安树德在天津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许宪隆]

二 铁宝廷

铁宝廷(1884—1965年),民国年间著名珠宝玉器商、古玩鉴赏家。二十世纪上半叶,蜚声中外的“翡翠大王”,人称“铁百万”。直隶三河(今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大马庄村人。铁氏家族祖居此村,其父铁志文,字心泉。“铁百万”原名铁广善,字宝廷,经商后以字代名。“百万”为商界同仁所赠名号,后来成了世人对铁宝廷的“官称”。

大马庄是三河县境内的回族聚居村,铁氏几代人都在村里务农,或从事一些小本生意。自志文一代起开始经营珠宝玉器。宝廷自幼随父进京摆玉器摊,做一些本钱不大的古玩、玉器、手饰、摆件、佩件一类的生意。在此期间,他经常往返于京郊集镇、庙会及城中珠宝玉器市之间,出没于官宦人家及各大饭店旅社之内,在其父的指导下开始学着鉴赏古玩、珠宝、玉器。

十九世纪末叶,铁氏买卖有所发展。积累渐厚,便与汉族同行李春桥合伙,在北京大红庙开设了一处古玩玉器店。此类铺面名曰“局子”或“局眼”,形同住户一般,只经营一些零碎物件。因经营能力尚弱,故无甚字号可言。铺面经营物件,夹着布包便可囊括,开停颇为自由。故此时仍属开创时期。此时宝廷才十岁左右。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京城一片混乱。铁氏父子与李春桥不得不散伙,回家乡大马庄村暂避一时。至二十世纪初,经艰苦创业,铁氏生意日渐发达起来。宝廷随父在北京廊坊二条重新置下一家小铺面,从此铁氏开始了独立经营阶段。

宝廷兄弟二人,其兄广为,原来一直在家务农,铺面开张后,人手不够,广为也进京帮父经营。此时,已有些东西可壮门面,故起

了字号,名曰“德源兴”。此号是从其父字“心泉”二字所出。按当时的说法,玉器铺一开到前三门就像一点样子了。铁氏生意即从这时兴旺起来。

铁氏在京城经商取得了很大发展,但因来自农村,仍保留着浓厚的农民意识,当有了相当积蓄后,便不断在家乡大马庄附近添置土地,在村中扩建房屋,买下了大片产业。后来,铁志文便让广为回老家经营这些家产、土地。直至土改前后,铁氏买卖的经营发展,一直与大厂老家血肉相连。

德源兴发展很快,经营的重担也逐渐从老掌柜铁志文的肩上移交给铁宝廷。后来,志文见宝廷已经成熟,便息肩颐养,将铺子交与宝廷经营。这时宝廷已练就一双慧眼,颇获父亲赞赏。此后,他凭着高超的鉴赏力和精通商务的本领,使德源兴珠宝玉器店珍藏日富。尽管当时的铺面外观仅有一间半门脸儿,但就在这里,宝廷打开了沟通我国各大城市和通商国外的大门。

时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德源兴走上中兴之路。珠宝玉器行的经营额往往大得惊人,但并无多大的店铺规模和职员队伍,一般只需几个人便可。德源兴中兴之时仅雇用了四五个伙计,且多是家人和亲戚。这几人素质较高,既有一技之长,又是多面手。如伙计马义,字直斋,既是宝廷的亲戚又是门徒,他既能经营生意,又有一身武功,兼做保镖。铁大义是宝廷长子,精通英语,崔文禄精通日语,他们既做生意又是翻译。旧日的北京,在前门廊坊二条街上,皆是珠宝、古玩、玉器铺面、摊点。铁氏与徒弟们常到街上采购。当时城内还有一些诸如青山居一类的珠宝玉器市,不论“人市”“鬼市”,他们均常光顾。古语云:“黄金有价玉无价”。珠宝玉器的价格高低全凭一双眼,而玉器尤甚,对于举世无双之宝,实难比价。珠宝商客难免眼高眼低,难定分寸。而宝廷独具慧眼,常常

出手不凡,敢出大价购进他人不敢问津之物,他一眼就可“吃透”一件珍品的“艺术价值”,令众多的古玩玉器同行倾心叹服。所以,同行们每遇一件贵重之物,多请铁掌柜过目。铁氏几乎成了当时珠宝玉器行的“权威”。

德源兴铺面虽小,所经营的品种却均属腰掖袖藏之物。如烟壶,便可分出百十个品种,从材料上分就有磁器的、玛瑙的、白玉的、碧玉的、青玉的、净体的、水镜的、茶镜的、棕镜的、法镜的等,再从其他角度如造型、画面、大小上分类那就更多了。又如宝石类,从色别上可分为红宝石、蓝宝石、钻石、祖母绿、金绿宝石、紫锂辉石、海蓝宝石、黄玉、碧玺、翡翠、石榴石、尖晶石、锆石、橄榄石、紫晶、黄晶、月光石、绿松石、青金石、软玉、玛瑙、珊瑚、琥珀等等。现存于故宫珍宝馆内的珍藏之物,除纯金器之外,均在德源兴经营范围之内。当然,经营品种不可能固定,而是随世间流行而变化。譬如:清朝中叶一度讲究“红货”,于是“红货”大兴;清末崇尚“绿货”,于是“绿货”又风行一时。铁氏不但独具慧眼,有高超的鉴赏力,而且精通此行的行情变化。故此,铁氏在经营品种广泛的同时,相对而言又专长于“绿货”。鼎盛时期,尤把很大力量放在“绿货”上面。所以他所经营的“绿货”,在京城一花独放。诸如翡翠戒指、祖母绿、猫眼石等类品种,应有尽有,且工艺精湛、小巧玲珑,中外客商叹为观止。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铁氏的经营范围从北京向外界呈放射状发展,闯入国内外市场,近至上海、天津、南京、长沙等各大城市,远及日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一时间,海内外的中、外报纸,同称其为“翡翠大王”。此后,此称竟成了他姓名的代称。

经营珠宝玉器,大多以购进、卖出为主。而铁氏并不局限于此。他凭借自身工艺美术上的天赋和造诣,又加上业务上开创了崭新的门路,一块平庸的璞料,到他眼里,就会因其某点特征而现

出一件独特的艺术品。当时北京城内有许多专事加工业的玉器作坊,俗称“玉器作”。每个玉器作都有一拨人,数量不等,有的仅一两个人,活都做得挺好。这种玉器作与铁氏来往的有四五家,如刘宝臣玉器作、高纪川玉器作等。此外还有专事磨活的作坊、制造木座的作坊、制造锦匣的作坊、镶嵌作坊等,不少户都与铁氏来往。通常德源兴负责采选购进各种璞料,如缅甸的翡翠石、非洲的芙蓉石等。一般的选购均有宝廷亲自经手。每当看中一料,出钱买下,然后取其天造地就的独特之处,具体设计,授意专门作坊进行加工。经数月或数年而做成,便是稀世珍品。据说一次宝廷看中了一块出自新疆的大翡翠石,长约4尺、宽约2尺、厚1尺左右,便出1万元现大洋的高价买下,当时令同行震惊不小。此料经宝廷授意刘宝臣玉器作加工,三位工匠干了八年时间,磨出三大物件:一长方玉玺、一方玉玺和一棵蝈蝈白菜。余下之料还做了大量小件,如松树、美人、玉壶、玉碗之类。仅三大物件,美国商人前来购买时,出100万美元购价而不得,最后以130万美元成交。从此美国商人送与宝廷“铁百万”之雅号。此时,铁氏买卖之兴隆、家资之雄厚、珍藏之丰富,“百万”已不足论称。铁氏到美国买东西,一次便汇回国内花旗银行48万美金。铁氏当时是北京四大银行“中南”、“盐业”、“金城”、“大陆”的股东之一,可谓京城屈指可数的富商。

基于铁氏的才能、名望和经济地位,不断得到京城商界、宗教界等社会各界的敬仰与推崇。民国元年(1912年)8月,孙中山先生进京时,老掌柜铁心泉代表回民出席了中国回教俱进会在前门外织云公所组织的欢迎会,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演说。铁宝廷时,已被推举为公会联合会理事、北京回教会监事,后来又挂名宁夏省政府参议等头衔。

铁氏的经商处世方针,即为不参与政界宦海的争斗,专思经商专业之道。故当时光顾古玩玉器店铺者虽是些高官厚禄的达官贵人、商魁政客、艺坛名流一类,但只是买卖者之间关系而已。政界人物如李宗仁、白崇禧、马鸿逵、宋哲元等人都频频光顾德源兴,北洋政府要员顾维钧亦是德源兴的常客。当时社会各界大员要人不光顾德源兴者为数不多。之所以如此,一是铁氏经商注重信誉,二是铁氏经多见广,慧眼识宝,货源广大。那些要人想买一些贵重之物,必登门拜访。铁氏铺中收藏,亦令这些腰缠万贯的军政界要人惊羨不已。许多贵妇人到德源兴,看到这些金碧辉煌、溢彩流光、夺人眼目的稀世珍宝时,都流露出一种惊诧与希冀之色。艺坛名流如梅兰芳、张宜云等也是常来常往的座上客。德源兴有条规矩:任何人买了此店的东西,可随时退回,不让赔钱。这一经营方针正迎合上述人们的心理。旧日官场,政治风云变幻无常,忽而“座上客”,忽而“阶下囚”,钱财的有无也是变幻不定。于是他们对这种高档之物,有钱时买,无钱时卖,或去或留随手腰掖袖藏可带。梨园名流积蓄一些“红”“绿”真货,总比纸票保险。何况德源兴的东西又漂亮得着实令人动心。

铁氏除去同国内交往之外,与海外诸国客商也有广泛联系。宝廷曾去日本经营玉器,在其他各国他也颇为有名,外商每每来华谈货,必直接找“翡翠大王”铁百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曾携所藏珍宝参加了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太平洋“泛太”博览会。当时国内前去参观的代表人物有宋哲元、杨北耕、张自忠等军政要员。此次参展之物有白玉大磊、白玉炉子、翡翠瓶、芙蓉石达摩、白玉梅瓶及好石图章,皆为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一时轰动了日本,传为佳话。

珠宝玉器业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明清以后,北京已成为

这个行业的中心,颇为繁荣。处于鼎盛时期的德源兴,则为此繁荣增添了绚丽的一笔。然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城乡一片混乱,此业受到了严重影响,铁氏也因此受到了一次沉重打击。

商业经营上的飞黄腾达,并未减少铁氏的农民意识。他继续在老家投资置办房地产,还为儿子在家乡娶了媳妇,令其在老家过日子。日军入侵不久,宝廷因娶两房儿媳一事,来老家小住。喜事刚过“双八日”,老家遭人打劫。绑票者的目标本是铁氏本人,但正巧宝廷于前一日已返京城,结果绑去三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后经说“票”者从中说和周旋,牵扯了两三个月,才以2万元现大洋赎回人质。为此,铁氏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

日军在北京占领时期,德源兴在京的仓库又遭到了一次劫掠,当时称之为“砸明火”。事情发生在东交民巷道正银行的库房。铁氏在此与其他几家商主合用一个库房,收藏着一批珠宝玉器及一些金条,昼夜有人看守。但由于内部有人卖底,一日突然闯入一批蒙面者,绑上看守人,抢走了大批东西。尔后经当时北京市侦缉队协助查办,查清此案原为几个外国浪人(当时俗称“混混儿”)所为,其中有一美国人、一白俄人、一波兰人、一德国人。这伙盗徒在拘捕中有一人被同伙打死,其余经审后,交给该国使馆,所劫物资虽追回一部分,但也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

俗语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遭劫被盗一案刚过不久,铁氏及徒弟马义又被日本宪兵队通缉。一日,日本宪兵队开着汽车来到了德源兴抓捕铁、马师徒二人,正好二人刚出去购货,宪兵队扑空,便把任务交给外二区通缉。二人闻讯后本想出逃,后因家业庞大,且又不知罪名,一逃之下,必弄假成真,几十年基业便毁于一旦。经朋友指点及疏通,师徒二人决定冒生命之危到宪兵队投案,弄个水落石出。师徒二人先后来到日本宪兵队,到此一看才知,此

处是一所人间地狱,踏入其门者凶多吉少。

此次通缉,原来是日本宪兵队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所致。信上说铁宝廷是国民党“蓝衣社”成员,说马义是宋哲元手下的马团长。在审讯中,师徒二人用日语回答,先使在座的日军小队长吃了一惊,免去了一通迎头毒打。接着他们列举大量与他们交往的中外有名的商号、熟人,最后,铁氏提到了在日本所结识的商界友人,一下震住了负责审讯的日本军官。后经一些商号和各界要人作证,此案才算了结。这件事虽无什么经济损失,但在铁氏的思想深处却笼罩了一层深厚的阴影。他深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珠宝玉器实在无法经营发展下去了。

京门珠宝玉器业,在日军入侵前达到鼎盛时期,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开始走下坡路。抗战期间,由于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打击接踵,铁氏逐渐把买卖向香港及国外转移。到日本投降时,国内的玉器业已近终局,就业者也多转他业。德源兴亦从鼎盛走向衰落。

1947年,宝廷师徒一行三人,运送一批货物从天津乘“万里”号轮船去上海,途中因轮船触礁遇险。幸好师徒三人被我解放区军民营救,其携运之物若干箱,除手提之物外,尽丧海底。

获救后,师徒三人在解放区小住一段时间,等上海来船接运。我方军民对其所带价值连城之珍宝秋毫不犯,并予以保护和照顾。因知其是国内外知名人士,我解放军一名政委与其谈话,阐述我党的政策。宝廷对此十分感动。不久,师徒三人便由解放区乘船到达上海。到上海后,许多知名人士如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都来迎接。在这段时间里国内外大报(包括解放区的报纸)都对铁氏遇救一事做了重点报道。当上海的大报记者让他谈感想时,他说:“我是在解放区被救上来的,他们对我照顾得挺好。在那里比上海还好,没有卡子检查。”表现出铁氏对解放区的感佩之情。

此后,宝廷又回到北平,料理家务。在此期间,我方那位与之谈话的政委已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曾与铁氏在北平秘密会面。政委在谈话中开玩笑说:“我在北平,你可以去告密。”宝廷指指自己的脑门说:“我决不是那种人,谁对我好,我心里明白。”

在大马庄经营老家产业的兄长铁广为,也是个开明绅士,曾为我方干过些事情。铁氏城里、乡下一直未分过家,到土地改革时期,老家人口全部至京。此时北平市内宝廷已置下十几处产业。宝廷从上海回京后,兄弟二人便商定将家业平分。然后宝廷带着部分子女南行,把北平的产业留给兄长及所留子女、徒弟。他早年已在台湾置下了相当一部分地产,很有开拓潜力,不久就携家人从上海转道香港迁居台湾。在台湾开拓商区,继续经营珠宝玉器业。

关于铁氏本人的日常生活曾有过不少传闻故事。宝廷虽久居京城,但依然俭朴如初。据京东的回族老人说,铁百万在京这么多年,连饭馆都没去过。每天粗茶淡饭,窝头大饼子,吃得香甜。还说在北京城连“叮咣车”都没坐过,到哪去都是步行。此种传闻,虽有夸张色彩,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铁掌柜生活简朴的习惯。铁氏的亲族近友亦说,铁宝廷一直保持着农家本色,吃的是家常便饭,穿的是粗布衣裳。他的住处到铺子足有六七里路程,他每日步行至店,从不坐车,到了晚年,依然如此。一次一位外国人回国前把自己的汽车留给他顶帐,办完手续后,他让司机把车子开来。汽车开来后,他便让司机把汽车开到购车行卖掉,然后给司机发了几个月的工资。司机十分奇怪地问:“您为什么白花工资而不让我给您开车呢?”他说:“你不要不落忍,我不坐汽车,可给你工资是应该的。你再找活儿给别人开去吧。”

铁氏是位虔诚的穆斯林,每日到清真寺礼拜。他对施舍赞助之事多有慷慨之举。作为回教会的监事,他出资赞助筹建过伊斯

兰教经学院和花市的原穆德学校。据说有一次捐助过一箱珊瑚,价值相当可观。平时一些小型的有关教门及慈善事业的募捐,他都能慷慨解囊,这与他的朴素生活恰恰形成鲜明对照。

铁宝廷老先生自解放前离开大陆后,一直留居在台湾经商,有时也到美国走走。1965年于台湾病故,终年八十一岁。老先生身后有七子一女,其中有二人在国内任教(现都已退休);六人在美国,除一人任教外,其余都继承父业,经营珠宝玉器。1975年以来,铁氏亲属常回国内探亲或从事外贸订货业务。国内亲属也有人出国探望。目前还有许多铁氏的侄孙后辈及亲戚朋友在大马庄居住。1982年底,在美国经商的铁大昌回国,曾回故乡探望,受到乡亲们热情接待。1988年6月,大昌、大鹏兄弟二人又一次回国联系业务,并专程到大厂回族自治县走访,受到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领导的欢迎。在县城重点参观了县服装厂、特艺厂、金漆镶嵌厂等厂家,并与服装厂签订了业务合同。兄弟二人对家乡的变化感受颇深,表示在有生之年尽力为故乡多做一些事情。

〔李廷禄〕

马伯声^①

马伯声(1890—1966年),又名马玉骏。祖籍山东德州。1890年出生于山东泰安城内圣泉街一回族平民家庭。幼年受伊斯兰教熏陶,接受私塾教育,青少年时期加入基督教会,毕业于教会中学。青年时代涉足工商界,后致力发展民族实业。因创办济南仁丰纱厂(济南国棉三厂前身),成为当时山东省知名民族工商业家。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济南市商业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济南市商会理事长及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少将高参、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顾问等职。1947年竞选“国大代表”,仅获“候补国大代表”资格。1948年9月离济,经天津往上海、台北,旋驻香港。1949年12月返回济南。1952年,因涉嫌贪污仁丰纱厂敌伪股份被法院拘留,后无罪释放。移居天津吃定息,1966年春病故。

马伯声求学经历曲折。十岁左右,被父母送入泰城西关“天书观”上学,后由回族拔贡杨茂洲资助,转入“杨氏义塾”免费读书,因家贫而时常辍学。十七岁读完小学课程,毕业后在当地小学任教。1911年,结识泰城基督教美以美会华籍牧师文荣泰,经其向美籍牧师、校长韩培瑞推荐,入萃英中学读书并加入美以美会,学费由该教会提供。在校学业成绩突出,常被美籍教士请作汉语辅导或为在泰安的外国人导游、翻译。1915年中学毕业,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招募华工赴欧参战,应募考取翻译,由青岛乘船出发,辗转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地参加运输军用物资,历时三年,接触和学习到西方许多新知识,对日后兴办民族工业影响至深。

^① 本文参考资料:《山东省志·少数民族志》,《山东近现代回族》。

马伯声于1919年12月回国后,即谋求在工商界发展。1920年3月,供职于济南英美烟草公司,经营该公司在山东的高级卷烟业务。1921年转向保险业,供职于太平保险公司,因得英籍经理施孟士赏识,不久便代管长江以北至沈阳、西达太原的保险业务。施孟士回国去世后,升任公司经理,经营近十年,恪守赔偿信用,业务兴隆,1929年交三弟马一青经营。1927年转向民族工业。是年于泰城西关回族聚居区创办仁德面粉厂(“仁德”系其父名字),系泰安近代机制面粉业的开端,日产“山虎牌”面粉500包,面粉分为1—4等,每年盈利用于仁德学校开支及救济贫民。1929年,创办济南仁丰纱厂。1930年,投资于济南惠丰面粉厂。1937年,兴建青州永年面粉厂和永年电灯厂,兼任该厂总经理。

创办仁丰纱厂,使马伯声成为名噪一时的济南工商界巨子。1928年“五三惨案”后,济南民众掀起抵制日货高潮。1929年英国一调查报告称:“青岛日本纱厂,开办以来,每年除一切费用,净得纯益金50%。”马伯声读后,痛感“日本在青岛办纱厂,利用我国的原棉、原煤和廉价劳动力,辗转产销,瞬息万利,实无异沥血肥虎”,遂萌生发展民族纺织业的想法。经过考察论证,决定在济南建厂。取得中国银行支持,先后筹资600万元,从英国购进新设备,逐步增建配套,形成自纺、自织、自染的独立体系。注重产品质量和信誉,所产“蜘蛛美人牌”十二磅原白布驰名国内,并与日本在青岛生产的名牌大五幅布竞争国际市场。1937年12月底,日军侵占济南,对仁丰纱厂实行“军管理”,查封并接收了纱厂财务账目、房产、设备、原料、成品和现金,使纱厂经营陷入困境。马伯声试图通过游说收回经营权,均无结果,遂离济。抗战八年中,主要在天津著书立说,主要有《泰安建设计划》、《工业管理》、《仁丰纱厂创办经过》等。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敌伪产业处理局接管、审

查仁丰纱厂,于1947年9月发还民营。马伯声抓紧经营管理,使纱厂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仁丰纱厂注意招收回族工人,四十年代末达三四百名,约占全厂职工总人数的20%。

马伯声还曾投资泰山林果业,并在济南经营木材加工业。1930年,联合泰安部分士绅,集股创办泰山森林公司,林场面积2400多亩。1937年12月,日军侵占泰安,遂关闭仁德学校、仁德面粉厂,斥资办仁德农场。该农场在泰山南麓购置土地,又在金山脚下垦荒150亩,建果园,购入苹果、肥桃树苗及杏、梨、柿树等数千株,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聘请金陵大学园艺系毕业生为技师。泰山森林公司除育苗、造林外,还发展畜牧、养鸡、养蜂、桑蚕和酿造等多种经营。由于战乱,森林公司和果园损失严重。日本投降后,又在济南购买日商“和田木场”,更名俊丰木场,内有机器厂房和火车专用线,规模较大,也因战乱难以维持。

马伯声比较重视民族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1927年,在泰城西关回族聚居区创办仁德学校、扫盲夜校、平民识字班等教育事业。仁德小学教学设施较先进,主楼为黑砖瓦二层楼,前有走廊绿色木栏杆。校歌歌词为:“教泽普及,仁德厚矣!民智开兮,万古春。”对贫困学生免收学费、免费供课本及校服。从曲阜、济南聘请优秀教师任教。该校德、智、体教育水平平均居全县上游,曾获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的“兴学奖状”,泰城百姓赠以“普沾教泽”匾额。当时隐居泰山的冯玉祥将军,多次参观该校,与马伯声交朋友,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南京前,曾勉励师生“共同奋起,抵抗日寇,保卫国家”。日军入侵后推行奴化教育,马伯声毅然关闭该校。1932年,创办济南惠鲁工商学校。1947年仁丰纱厂发还后,举办纺织工业技术训练班,从培养专业人才入手,运用科技发展生产。聘请本厂工程师任教,招收厂内外青年学习纺、织、染、电、铁工等技术,学员

多数被分配在济南、徐州、淄博等地从事纺织工作。

〔鲁 仁〕

陈经畬^①

陈经畬(1880—1967年),著名爱国企业家、慈善家、教育家。南京人。家境贫寒,父兄均以织缎为生。陈经畬在私塾读了几年书,1898年到一家钱米店当学徒。1901年,经同乡提携,只身到汉口当店员,寻求谋生之道。1905年,同乡、同族马棣臣出面集资,开设“义顺成鞋帽百货店”,陈经畬由股东资助人股,被聘为经理。后来他又创办了“汉昌皂烛厂”。他办事重信誉,也特别重视质量。制鞋是从自制布鞋入手,创造名牌产品,精选用料,式样标新。生产的肥皂,在经营最困难的时期也从不许降低标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激发了他的爱国心。毅然甘冒损失,将义顺成百货店改为国货店,不再经销进口货。他还认为要救国光靠经商不行,还得办工业,而且要搞现代工业。并逐步将商业资本转移到工业中来。他从上海订购一套制造肥皂的设备,从德国订购一套从肥皂废液中提纯甘油的设备,重金聘请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负责技术工作,准备将作坊式的汉昌皂烛厂改造为机械化的制皂工厂。他还投资搞桐油出口事业,创建了义顺泰桐油行。1933年,他当选为汉口总商会会长。

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陈经畬毅然将义顺成国货店和义顺泰桐油行关闭。汉昌肥皂厂部分设备迁到重庆,1940年被日机炸毁,另一部分拆存于汉口英租界的设备,1944年也毁于飞机轰炸。1939年甘油设备运抵上海,高纯度的甘油是制造炸药的原料,日寇当然不会放过,通过日商来谈判,要求合作,陈经畬严词拒绝,最

^① 本文参考资料:《中国工商人物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后仍被日寇劫去。所有事业全部停顿,损失惨重。

1940年陈经畬以文化、经济团体代表的身份,被国民党聘为第一、二届国民参政员。1941年在重庆参加参政会会议后,潜回上海租界住地。9月被日本宪兵队和汪伪特务逮捕,扣押一个多月,日伪威胁利诱,要求合作,他不为所动,保持了民族气节。敌伪无奈,勒索一笔巨款后释出。

1943年,陈经畬以六旬高龄,独自一人通过敌人封锁线,跋涉数千里返回重庆,见到的是上下竞发国难财,义愤之余,他独自隐居。1945年抗战胜利,陈经畬为之鼓舞,偕长子元直、次子隆恕东归复业,到汉口去实现他实业救国的夙愿。1946年4月,汉昌肥皂厂、义顺成百货店和义顺泰油行复业。全部复业资本,仅及1938年“汉昌”一家资本额30万元的三分之一,可见战时损失之惨重。1946年11月,汉昌投入机械化生产。此后内战深入,市场萎缩,民族工商业奄奄一息,汉昌也濒临绝境。

陈经畬一生奋斗,为兴办工商业历尽艰辛。还十分热心社会福利事业,而且在刚刚向成功之路起步之时,就着手实施这一宏愿。早在1912年,他在南京创办“秋潭助学金”,资助优秀贫寒学生上中学,直至大学。1914年,南京疫病蔓延,贫苦民众求医无力。陈经畬关怀故乡疾苦,及时募筹款项,在南京回教联合会的支持下,创立了南京北城临时送诊所。1914年6月20日开诊,9月20日结束。以后又继续办过几年,取消“临时”二字,更名为金陵北城送诊所,每年送诊近16000号。1932年改为常年送诊,一年共送诊70000号。

1915年,他参观汉口一所育婴堂后,发宏愿要将家财首先用在穷苦孩子身上。他捐银1000两,又从义顺成赢利中拿出1000两,设立“预悯堂”专户存放,以后每年存入,到1931年已有存款6

万元。这是他以后兴办儿童福利事业的经济基础。

1924年,陈经畬与至友杨叔平(回族)合力创办“南京适道小学”,奖助贫寒优秀子弟。1932年扩大为“南京和平门清真寺小学”。

1931年,湖北省大水,汉口市内水深数尺。陈经畬毅然出任湖北省水灾急赈救济会副会长,水灾过后又担任湖北省水灾善后救济会副会长,为从事大规模社会救济工作而竭尽心力,从而在汉口工商界树立了声望。大水退后,许多无家可归的孤儿流落街头。陈经畬率先倡议并募集10万元捐款,成立汉口孤儿院,他担任院长。聘请毕业于两江师范学校的李嘉禾为院务主任,负责孤儿的教育,让孤儿们学习一些技术,以便成人后能自立于社会。抗战开始,日机轰炸武汉,孤儿中在武汉有亲友的疏散了一部分,其余150余人转到万县儿童教养院。抗战胜利后,汉口孤儿院在原址恢复,陈经畬仍任院长,聘请对儿童教育事业有经验的朱涵珠担任校长。孤儿如能考取中学,则从秋潭助学金中补助,直到大学毕业。建国后,汉口孤儿院继续开办,1955年由武汉市民政局接管。

陈经畬早年曾发宏愿,要将大部分家财用于家乡南京穷苦孩子身上。1931年,他与至友,又是同民族、同乡、同事的杨叔平合作,在南京创办一所养教结合、培育人才的南京孤儿院。该院的紧邻是陶行知的晓庄师范,杨叔平经常去求教。陶先生曾在人力上给予支援,介绍教师去孤儿院任教。著名教育家、南京市立一中校长李清悚参加孤儿院的董事会,任董事,经常给予具体指导。孤儿院从1932年6月开始购地建屋,1934年6月全部落成,完成了陈经畬生平最大夙愿。孤儿院强调师生一体,亲如家人,重在身教,陶冶品德。学生毕业后,院方帮助介绍工作,或资助深造,乃至政治上受迫害,无不随时帮助。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南京大屠杀,使千百万难民颠沛流离,陈经畬大为震动,一方面为他的企业和宁、汉两个孤儿院做好善后工作;另一方面,他投身到难民救济工作中去。他以汉口总商会会长、汉口各界抗敌后援会副会长和江苏旅汉同乡会会长的身份,成立江苏难民救济委员会,下设八个收容所,为九死一生的难民们供给食宿,酌发衣被。收容所至1938年6月结束,流动人口逾万人,陈经畬为收容工作倾注了全部精力。

1948年秋冬,时局动荡,陈经畬正在彷徨无主之际,结识了中共地下党,阅读了有关书籍和文件,对中共的政策有所了解,并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有的工商界上层人士去沪或去港。陈经畬对人说:“别人要走,我决不走。”他和张难先、李书城、喻育之等各界上层人士,组织了武汉和平促进会。后来演变为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和武汉市治安委员会。陈经畬任该会财务组长,会同副组长,经多方筹措,向即将逃跑的军警致送“酬劳费”,以换取他们撤退时不破坏市政设施和工厂。在维持真空期间治安及迎接解放等工作中,作出了贡献。武汉地下党工作委员会书记曾惇在回忆当时的斗争时说:“李书城、陈经畬、朱裕璧等社会知名人士曾为掩护我们出过很大力,甚至担了不少风险,他们对党的事业是有贡献的,我们永远不会也不该忘记他们。”

建国后,党和人民对陈经畬委以重托。1949年9月,他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参加了《共同纲领》的制定。他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财经委员会委员、武汉市副市长、武汉市工商联主委、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南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一至三届中央委员、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一至三届代表和常委、全国政协一至四届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委、民建武汉

市委会副主委、湖北省工商联主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湖北省副省长等职。他任武汉市副市长后,曾函杨叔平:“这样的厚遇,真是出乎意料。”

陈经畲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主要是主持市工商联的工作,1955年任省工商联主委,为配合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了大量工作。他的汉昌肥皂厂,得到政府扶持,能生产肥皂、甘油和牙膏,年年盈利。1954年他申请公私合营,1955年才批准,后改建为“武汉化工原料厂”,生产多种现代化工原料,远销国内外,实现了他的实业救国的愿望。头三年定息,他考虑影响,不得不领,但领后专户存银行不用,以后干脆不领。1957年他将股票等等全部献出,未接受。1966年再次献出,终于如愿。

1967年初,陈经畲在汉阳扁担山选定了一席之地。同年5月29日,以肺癌不治去世,终年八十七岁,葬于扁担山公墓。1988年3月,迁葬于武昌九峰山回民公墓。

[马寿千]

温少鹤^①

温少鹤(1888—1968年),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实业家。别名嗣康。四川巴县(今属重庆市)人。六岁启蒙读私塾。后进入开智小学和重庆府中学堂读书。完成学业后,考入成都四川高师学堂,攻读理科。他读书非常用功,成绩一向都很优良。毕业后,回重庆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曾任重庆省立甲种商校和巴县中学教员、校长。1914年任巴县劝学所视学。后劝学所改称教育局,任局长。同时,积极支持当时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重庆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他作为教育界知名人士,被选为该分会主要成员之一。1922年,又任巴县教育会会长。1923年,参加筹备创办重庆大学工作。

温氏先祖为来华定居的穆斯林。原籍西域撒马儿罕国。来华始祖温尔里,精通天文,“洪武时,遣充贡使朝明太祖于金陵,因识我祖天文秘奥,钦留在朝,佐理钦天监监副”(《温氏族谱》)。其家族中人才辈出。清末民初,温少鹤的四伯温友松任重庆总商会主席,经营了川江航运最早的轮船公司。同时开创了重庆的缫丝业,还兴办地产公司、银行和盐号等。他很器重温少鹤的才干,并加以培养。后把温少鹤由学界调到了商界。先在商会作他的助手,颇得商界好评。后被邀任商会事务所所长,并接任《商务日报》社社长。

^① 本文参考资料:官商闻《温少鹤》,载四川省地方志资料丛书《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三辑,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省志人物志编辑组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11月;温田丰《我的上一代——追忆父辈和少鹤四哥》,见温田丰著《六十年来的人和事》,重庆出版社出版,1995年5月;《温氏族谱》摘抄件。

1922年,全国总商会在上海召开国是会议,重庆总商会派温少鹤为代表前往参加。事先他征集和整理好重庆工商界对国是的意见到大会发表,其发言切中时弊,受到各地代表的重视。通过该次会议,结识了章太炎、张季直、梁启超、黄炎培等名流学者。回到重庆后,他奔走传达,在商界中声誉日起。1923年,他担任了总商会会董。继又在丝厂搭股,1924年重庆丝业公会改组时,他“振兴丝业,扩大销路”的主张为丝商所拥护,被选为丝业公会总董。1925年温友松去世。1928年他当选为总商会主席,以后连选连任多届。

温少鹤原是教育界人士,自己没有资产,也不会做生意。进入商会后,力图向工商业方面发展,个中也曾有过失败的经历。二十年代末曾与人合资在上海开办“一心牙刷厂”。任商会主席后,又与人合伙开设“同德字号”,经营山货贸易。因不熟悉业务,均告失败,不得不借款还债。

他在任职商会期间,特别重视发展教育和公用事业。他非常赞同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主张,在上海结识黄后,便和黄的职教社建立了联系,并力促商会创办学校,培养商业人才。1925年,创办了重庆市商会私立商业职业学校,由他任校长,并亲自任教。他还兼任学校董事长多年。1932年,他又倡议创办了重庆市商会私立中学,该校为一所普通中学。由商会推荐人员组成董事会,他担任校长。1934年,经四川省教育厅核准,以上两校分别被定名为益商职业学校和通惠中学。由于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学生增多,原校舍已不够用,后由他主持并经两校董事会同意,将两校合并,重新组成新的董事会。拨出经费,在两路口教门厅购地一百一十方丈,修建新校舍,于1935年竣工并迁入,由他担任校长,直到1944年。为推进职业教育,培养商业人才,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29年,他代表商界发起并参与创办重庆自来水公司,由于热心筹备,他被推为该公司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后直接负责业务经营,1943年被推为公司的常驻董事。

抗日战争以前,重庆交通十分落后,深感闭塞,他倡议由市商会筹组巴县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集资修建了重庆至璧山、重庆至北碚两条公路。并购置了一批汽车,经营公交。他被推为公司总经理。1936年国民政府准备召开国民大会时,他曾被推为四川商界的国大代表。

中共早期重庆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的漆鲁鱼和温少鹤是亲戚,与温少鹤弟妹之间交往密切,曾对他们传播了进步思想。温少鹤的堂弟温田丰和漆鲁鱼为抗日救亡,于1936年发起组织了“救国会”。同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由“救国会”发起,在市商会礼堂举行“鲁迅先生逝世追悼大会”,温少鹤作为发起人之一,亲自参加了追悼大会,并致悼词。同时,商会所办的《商务日报》副刊以一周的时间出版纪念鲁迅的专刊,该刊也因支持学生运动被当局视作违检,受了处罚。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任中国红十字会重庆分会会长、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重庆分会干事长。积极协助为回教救国协会总会筹办永济医院等,在回族同胞中有较高的声望。1938年,经陈立夫、陈果夫介绍加入了国民党。由于三青团势力的排挤,他曾一度未担任商会主席。但不久又被恢复。

1946年,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在重庆召开了促进和平民主运动的座谈会,次日《新华日报》进行了报道。国民党市党部为了攻击该次座谈会,假借商会负责人温少鹤、仇秀敷的名义,事先起草了一份诬蔑中共的启事,企图交二人签字后准备见报。当市党部将

启事送温少鹤时,见仇秀敷已先在上面签了字,温少鹤看后毅然将歪曲事实和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不实之词逐一删去,并对来说人:“要登可以,就照我删改的稿子登。”终使该党部的阴谋落空。

重庆解放前夕,温少鹤同商会的其他负责人一道,在川东地下党的指引下,尽力维持好社会秩序。并根据地下党的指示,采取拖延办法,拒绝了警备司令部逼迫商会交出黄金三千条的勒索。重庆解放之日,他同其他三位工商界人士一道,乘船渡江,前往海棠溪迎接解放军进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担任了市工商联领导工作。积极参加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历任重庆市民建和工商联主任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民建中央委员等职。曾受到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

温少鹤生活简朴,行为严谨。毕生坚持天天写日记。喜诗词,善书法。1968年7月,年届八旬的他因患食道癌,逝世于白象街寓所。

〔郭嵩明〕

丁德山^①

丁德山(1878—1950年),字子清,以字行。世居北京东直门外,弟兄三人,子清居长。自幼家境贫穷,靠父亲做小贩为生。清光绪末,父病故,家徒四壁,无以为生。兄弟三人向人借了一些锹镐工具,挖黄土担进城内叫卖,实际是出卖劳力的苦役。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修理东华门大街道路,路两旁的摊贩,尽都趋赶到附近神机营练兵场的空旷场地上。就是这样一个旷场招来了许多购物者和游人,终日熙熙攘攘。因为这个旷场,地点适中,整天开放,遂于1903年3月,把它定为市场,取名“东安市场”。

丁子清从一开始就认定,这里必定要成为兴盛发达的“宝地”。他用全身的力气,借到一点本钱,占了一个摊位,置办了锅碗,开张卖豆汁和扒糕。他的豆汁摊收拾得干净,服务态度好,赢得了顾客。丁子清还发现,太监这一特殊阶层的人物,有时是用得着的人物,每当遇到来这里闲逛的太监,就口呼“吉祥”,有时太监“赏脸”,还白喝一碗豆汁。为了多挣点钱,兄弟三人还分赶庙会,特别辛苦的是,赶一年一度的厂甸集会。厂甸的开放时间是从正月初一至十五,为期半个月。为了占据摊位,在隆冬季节,要露宿街头。赶庙会、厂甸和市场的摊,一年下来也颇能剩下点钱,为其将来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经济基础。

^① 本文参考资料:丁福亭等《北京东来顺羊肉馆发家史》,北京民族文史资料第二辑;宗泉超《历史上的东安市场》(北京出版社《燕京春秋》);陈宗番《燕都丛考》第二章内一区。

三年后,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丁子清通过某太监,并央得地方官厅的许可,在原来豆汁摊的基址,盖了一间简易棚子,改营贴饼子、稀饭和简单菜肴。这时在粥棚前悬挂出一条蓝地白字的横布标:“东来顺粥棚”。这是“东来顺”三个字第一次在市场上崭露头角。

为了开拓经营范围,在东直门外他们住家附近典了二亩地,由他母亲和家人种菜。每天把采摘的鲜菜,一部分送到粥棚,一部分尚可在市上出售。这些“自家园”的蔬菜,对粥棚的生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既炒出可口的菜肴,也收到物美价廉的作用。粥棚内常常坐无虚席,生意日益红火起来。从粥棚的经验,使丁子清明白,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一环。

民国元年(1912年)的二月二十九日东安市场遭到建场以来的一次最大的劫难,袁世凯在北京发动兵变。驻在市场附近帅府园的炮兵和驻在禄米仓的步兵,直奔东安市场而来,先是挨户抢劫,最后放了一把大火,把全场一家不留地全部烧掉,好不容易盖起来的东来顺粥棚,也完全被焚毁。这一把火没把丁子清毁掉,他反而绝路逢生地走上了成功之路。原来丁子清曾结识一位广兴木厂的张经理,过去木厂都兼营土木工程,丁、张之间颇为投契,当丁遇到困难,即央求张某为之垫办工料,就粥棚的废墟建起几间瓦房,彻底改变了粥棚的面貌。在经营上从贴饼子粥,改成爆、烤、涮和各种炒菜的饭馆,改称“东来顺羊肉馆”。从此,东来顺踏上了兴旺发达之路。弟兄三人齐下手,各有分工。丁子清掌柜,丁德富掌灶,丁德贵理财。雇用几名职工,招收学徒,扩充业务。伴随着东安市场的日趋繁荣,在丁子清的企划之下,他是不甘心把东来顺仅仅局限在这几间瓦房之中。

当时北京最有名的涮羊肉馆,首推前门外正阳楼。该店有高

超技能的切肉师傅,把羊肉精选之后,经冷冻压实,去掉膻气,然后切成薄片。这种肉片放入火锅内,一烫即熟,吃起来鲜美可口。丁子清了解到,要想把涮羊肉做到好处,首先要解决的是切肉问题。于是丁子清跑到正阳楼,找到那位切肉高手和他交了朋友,继而以高工资请到东来顺“帮工”兼带学徒,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把切肉的绝窍学到手,自此他们照样可把选好的羊肉,每一斤切成60片左右的薄片。一斤切好的肉片的卖价,约合2.5—3斤羊肉的市价,利润是很高的。切肉问题解决之后,对于涮肉的火锅和各种调味品也悉心研究和改进。丁子清在王府井大街开设了“长兴铁铺”专门制做烤肉、爆肉工具,对涮肉火锅,把烧炭的筒子加大,筒口缩小,炉篦子要稀疏以加大风力,提高火力,加快烧水的速度,使锅里的汤经常滚开。各种调料大部是自己加工制做的。制酱油、高醋,是向通州一位高手学来的,有口蘑酱油、甘草酱油。自做调料,不仅质量提高,成本也降低了,给业务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丁子清从德胜门外马甸的羊店,整批购进活羊,一次就买几百只。这时他在东直门外购得500多亩田地,租给佃户耕种,他买进的活羊,就交给佃户放牧,只供羊饲料,放羊不给工资,而以羊粪代偿。秋后的羊只都肥壮了。自己经营屠宰,把可供涮肉用的肥美部位留来自用,剩下来的卖给羊肉铺。从羊只活体的购入、喂养、屠宰、销售等各个环节,形成了“一条龙”的经营,每个环节上都做到了“有利可图”。据该店账面统计,每年仅羊肉片一项,销售量多达十万斤以上,利润可观。

资本积累多了,于1928年,丁子清开始扩建东来顺店堂。改建成三层楼房;1930年又向某太监购得临近的一处小铺店,把东楼的南部也加以扩建。至此,三楼上下,同时可容500人就餐,东来顺已跻身于京城的大饭馆的行列!1942年前门外的正阳楼歇

业了,东来顺的涮羊肉独占鳌头,一跃而成京城第一家。后来,“老北京”人都把秋后到东来顺吃涮羊肉当做一种惬意的享受!

丁子清不满足只把东来顺停留在大型的羊肉馆的档次。他还要拔高它的档次,于是向著名饭庄元兴堂、东兴楼等大企业学习供应大场面宴席的经营和管理方法。他要把东来顺办成一家名符其实大饭庄。

丁子清在经营上的“雄心勃勃”还表现在扩大东来顺的同时,更以东来顺为中轴,发展相关的其他企业,它们是:

一、1932年,丁子清以低廉的价格,向法院标买了金鱼胡同西口,即东安市场北门对面的天义酱园。购进后改名“天义顺”,继续经营酱园业务,但多加以改造,或增加经营范围。如安装电磨,自制面粉,自己榨油。除副食品外兼售粮油,凡生活用品,应有尽有。

二、1940年前后,在朝阳门内开设永昌顺酱园,专做批发业务,并把天义顺的“下脚货”在此推销。

三、在王府井、堂子胡同和禄米仓等地购进多处房产,有的充作东来顺堆房,有的出租。如菜厂胡同三号,是清末满族官僚一所大住宅,有房屋200多间,丁子清在此开设了“大中公寓”,长期租给东安市场和附近商店的职工居住。

四、丁子清在东直门外陆续购进土地约在500亩以上。土地长期租给佃农耕种。收获的蔬菜,除供东来顺使用外,多余的转给市场出售,谷物、小麦、玉米、豆类等,收进后自行加工,榨油,或制造酱、醋等副食品。

五、丁子清一家搬进城内居住后,原东直门外的住宅改成“大车店”接待农民。

从上述情况来看,丁子清以东来顺为中心,派生了农业、粮油加工、副食品和旅店服务业,雇用职工多达300多人。丁子清的经

营思想灵活,只要有利可图,不论生意大小,都肯经营。例如每逢进入夏季,是羊肉馆的淡季,他针对季节性的需要,东来顺增添冷食、冷饮,如冰镇水果、杏仁豆腐、豌豆黄、冰激凌等等。不仅利润很高,又可使淡季不淡。再如东来顺平时的粮食吞吐量很大,丁子清就在粮油市场上作投机倒把生意。当天义顺开展了粮油业务之后,丁子清的倒把活动更加公开化了。

丁子清在经营管理上,有很强的竞争意识。他不允许在东来顺的四周再出现羊肉馆。原在市场北门处,有一家“会元楼菜馆”,和东来顺竞争很剧烈。结果会元楼斗不过丁子清而宣告歇业。这时稻香村的老板,看到涮羊肉的利润可观,欲收购会元楼开设羊肉馆。丁子清得到信息后,马上抢先把会元楼买下,一时派不上用途,就把房屋租出去,但在租约上写明:“不准开设羊肉馆”。丁对东来顺的经营方法上,也煞费苦心,对于长期顾客,如当时协和医院职工、京汉铁路局等处职工,他们长年来东来顺就餐,为拉住这些常客,对他们采取三节结账的方法。此外,丁子清始终把门前的“粥摊”保存下来,一以用来表示丁子清“不忘本”;还表示丁子清发了,还跟苦哥们在一起,这曾博得一些人的称赞。

至于丁子清对职工待遇和管理方法上,采用“勤行”传统的对职工的剥削方法。旧社会,不论饭馆的规模大小,用人统由专司职业介绍的“口上”来分配,口上的负责人称“头头”,他是职业介绍的中间人,也属“牙行”的一种。饭馆职工,工资极低,甚至没有工资,而职工赖以糊口养家的,只仰赖每天的小费收入。按照职工不同的岗位,小费分成若干份,每天领取。以东来顺为例,丁氏三兄弟,每天要各领一大份,然后还有家具折旧,甚至丁家一位寡居的女儿也要提给半份。经此七折八扣的,剩下来的才是分给职工的,所以旧社会“勤行”中人,都是较为贫困的。但是东来顺每于年终结账

后,丁子清对于灶头、堂头、案头、柜头等比较有手艺或负责的职工,都另外馈赠“红包”几十几百元不等。得到馈赠的人,要“保密”,借以拉拢分化,以使这些人更效忠他的事业。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丁子清可算得是一位回民中开拓型的企业家吧!?

〔刘盛林〕

三 白瑞启 白泽民

白锡昌(1874—1953年),字瑞启,是一位开明的实业家,他受当时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决定从自己做起,通过发展实业努力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便继承了祖传的制药技术,在家乡定州创建了“白敬宇药厂”。

白瑞启是“中国白敬宇眼药”的第十五代传人。白敬宇的祖先是西域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利用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制药技术以行医卖药为生。在成吉思汗进军黄河北岸时,西域各民族纷纷随之迁往,白氏的祖先也迁居到河北定州,子孙后代都继承祖业,成为当地的名医,并在世代行医制药的经历中不断总结、发展,逐步丰富了行医制药的经验,传到白敬宇这一代已自成一家,尤以“白敬宇眼药”独树一帜。白瑞启继承了这份祖传的医药遗产,发展制药事业,就是要实现自己造福人民、报效祖国的夙愿。

“白敬宇药厂”以研制眼药为主,使用“金羊”牌商标,并能生产多种中成药,在河北省的定州、祁州一带销售,渐渐树立了良好的信誉。清末民初时,虽然生产方式仍是手工业作坊的形式,但已发展到有300多工人的工厂,药品的种类不断增多,有瓜子眼药、棒状草库眼药、粉状高级八宝眼药等,此外还有红灵丹、明目丸、黄连上清丹、牛黄解毒丸、追风膏等九十余种丸散膏丹,经营日见规模。民国时期,白氏家族已成为定州的首富之家了。

白瑞启生有二子四女,长子白国恩号泽民,次子白国庆号双十,前三个女儿早亡。1944年1月,他年届七旬又喜得一女,取乳名稀一,意在古稀之年又得一女,另取学名国华。从给孩子起名一事便可见他教育子女“不忘国恩、报效人民”的一番苦心了。他教

育子女要把医药事业当作功德事业,发展医药事业是为了造福万民。他还主张民富不忘报国。他在创业的实践中一直身体力行,乐善好施,1917年河北省发生大水灾,民不聊生,他及时邀集本县知名人士成立救济会,积极开展救灾活动,带头开办两个粥厂,赈济灾民,并慷慨出资创立孤儿救济院,所需粮食、经费全部由他捐助,还为儿童建立半日制学校,把能劳动的妇女组织起来成立了织席厂,用收入的一部分解决灾民的生活困难,一部分用来改善救济院的生活,一时间,在远近乡里中被诵为美谈,本县乡里在他家的门前修建了碑楼、碑坊,以表敬意和谢忱。

当年,冯玉祥的部队驻扎在河北的时候,军纪严明,生活俭朴,与当地人民鱼水情深,很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但部队给养并不充足,连冯玉祥将军本人生活也十分节俭。白瑞启对冯将军的思想开明、为人仗义、治军有方、为政清廉十分佩服。每当看到他的部队有困难时,便慷慨解囊,经常在经济上给以接济和帮助,和冯将军过往密切。不想因此惹怒张作霖,后来吴佩孚和张作霖组成“讨赤联军”讨冯,奉军到定州时以“赤化”为罪名对白氏横加迫害,把白氏在定州的老家抢劫一空,白家无奈迁居北平,住在护国寺附近的棉花胡同,但仍未逃脱反动军阀的魔掌。1927年,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国民党勾结反动军阀掀起反共高潮,张作霖也在北平加紧逮捕、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白瑞启和其次子白双十也在此时同期被捕,先关在府右街光明殿张学良部的驻地,后又解往奉天(今沈阳)。1928年,张作霖回东北的路上于皇姑屯被炸毙命。不久张学良易帜后,幸亏一位在东北军中任军医处处长的本家在少帅面前斡旋,白氏父子才得以获释回到北平。父亲被捕的那天白泽民出去办事,得信未归,幸免于难。

白泽民1905年出生在河北定州的这个医药世家里,然而他却

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但在父亲实业报国思想的影响下,为继承祖业,他放弃了在大学里所学的法律专业,把做律师的才华全部发挥在制药事业上。他不同于自己的前辈,吸收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药品研制和经营管理方法上进行了改革和创新,他引进机器生产代替手工操作,药品由粉剂改进为膏剂,包装由瓷瓶改为软管,这样使用既方便又卫生,药品的疗效得到提高。他还增设了印刷车间,改进药品装潢,把药品说明书由刻版改为石印版,再改为铅印,又将“金羊”商标改为遨游四海的“鲸鱼”,于是到国家卫生部、实业部以与“白敬宇”谐音的“白鲸鱼”为商标进行了注册登记,得到法律的保护。然后向全国的各大经济发达的城市扩展,先后在北京、南京、天津、石家庄、郑州、济南、西安、汉口、长沙等商业繁荣城市设立了白敬宇药行。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已在全国各地发展到二十四分行。随后在京汉、京沪等各铁路沿线以及各地的分行制做大型广告,并利用报纸、橱窗,广为宣传,扇子、草帽也成了宣传工具,每年夏天把 500 个印有“白敬宇眼药”标志的草帽,分发给人力车夫,用来遮阳,又做广告。由于药品质量好、疗效高,也颇得患者的赞誉。所以,在当时白敬宇眼药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药而享誉全国了。

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后,北平、天津、南京、汉口、上海相继沦陷,白氏父子被迫关闭各地的分行。白瑞启让白泽民将药厂迁到重庆,自己携家眷暂避香港。迁至重庆的药厂又遭日寇飞机轰炸,白泽民只好在朋友的帮助下又把药厂迁到市郊歌乐山。稍后,抗日形势已明朗,白瑞启也从香港返回内地重庆,定居在歌乐山。虽然形势严峻,但为了发展祖国的医药事业,白氏父子顽强坚持着克服重重困难把药厂维持了下来。

为了度过艰难的岁月,把药厂发展起来,白泽民思想开拓,敢

于创新,他创立了推销员的销售形式,由推销员把药品带到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后方各省广为推销,并设立代销点,打开销路,并逐步把这种销售形式加以健全,形成制度。随着推销员制度的不断完善,推销员队伍成为白敬宇药行经营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日后白敬宇眼药畅销全国,乃至东南亚各国奠定了基础。父亲看到白泽民既有管理才能,又有对事业的执著精神,便在四十年代时就把白敬宇药厂及各地分行的经营管理大权交给了他,让他正式担任了白敬宇药厂(行)的总经理。

白泽民不仅是一位执著的实业家,也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这是因为他有着一颗爱国之心。青年时代,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就热心公益事业,关心人民疾苦,又因他在大学是学习法律专业的,所以他一向反对独裁政治,向往民主法制,他坚信只有发扬民主,以法治国,才能使国家富强,社会才能安定,人民才有幸福。当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践踏我们的国土,欺凌我们同胞的时候,他义愤填膺,奋起奔走,积极捐款,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在汉口,他与唐柯三、陈敬畲等回族爱国人士组织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并担任理事,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到重庆后,国民党官僚白崇禧、周子时也插手协会,同时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也横加干涉,当局不承认回族的存在,强令把“回民救国会”改为“回教救国会”。白泽民和唐、陈等回族爱国人士一道,一直坚持为争取回族人民合法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而斗争。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白泽民结识了马寅初教授、马宗融教授、白寿彝教授等爱国人士,密切配合社会各界贤达共谋抗日救国大计。当时他邀请同在重庆的郭沫若和老舍先生帮助编写一部表现回族人民抗日救国事迹的剧本,以推动民族团结、共同抗日。最后由老舍先生执笔编写了一部话剧《国家至上》,由白泽民出资排练并在重庆公开演出,在社会上

引起强烈反响。

台儿庄会战前夕,全国人民对抗日将士寄以厚望,白瑞启、白泽民父子令在重庆等后方的白敬宇药厂赶制了三十万只瓜子眼药,捐献给在前线为抗日奋战的爱国将士,表达了他们支援抗战的一份心意。

1940年,马寅初先生在重庆大学发表抗日反蒋演说,因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被捕入狱,马夫人找到既是邻居又是朋友的白氏父子,请求保释马寅初先生出狱。父亲白瑞启对白泽民表示不惜一切代价保释马先生,所需经费白家一力承担。白泽民便不顾风险,不辞辛劳地会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和社会贤达,为营救马先生出狱而四处奔走,最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释放了马寅初先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白泽民以重庆为总行,接收汉口、南京等地的分行,并建立管理处,改进、完善了管理制度。又设立“新式会计”,健全了财务制度。北平、天津、定州的白敬宇药厂和各地的分行迅速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随后,白泽民又以南京为中心向华中、江浙和广州、香港等地拓展,以“白鲸鱼”牌为商标的白敬宇眼药遍及全国各省并远销东南亚各国,曾多次参加国内外的展览会,1947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首次获得国际金奖,为中医中药在国际上赢得了殊荣。此后,国民党的实业部也给“白敬宇眼药”戴上了各种桂冠。白敬宇眼药先后共获得各类奖状、奖章20余种。当时的白敬宇眼药已享誉中外,达到了鼎盛时期,白泽民成为了中外闻名的实业巨子,被誉为中国眼药大王。

新中国诞生时,白泽民正在香港,但他关心祖国的发展。当他看到毛泽东主席关于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时,感到为工商业者指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便毅然决定回祖国内地去。1952年他从香港

回到南京,党和政府欢迎他回来参加祖国的经济建设。他在省、市委统战部的帮助下,认真学习了党的方针政策,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他拥护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积极带头接受公私合营,并多次在南京的中小工商业者会议上发言,谈和共产党合作共事的亲身体会,起到了一个爱国资本家的带头作用,对他的爱国表现,党和政府给他以很高评价,选举他为江苏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市工商联主委以及南京伊斯兰教协会理事。

公私合营后,白泽民任南京第二制药厂副厂长,他十分关心厂里的生产,在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原本全靠从美国进口的冰片断了来源,白泽民决心搞合成冰片,走国产化道路,他聘请高级药师刘文勋、邓庆华等,亲自带他们去广州学习冰片合成技术,并建立了人工合成冰片车间,大量生产冰片,不但解决了生产眼药的原料,还能出口创汇。“鲸鱼”牌冰片质量好、信誉高,被誉为名牌产品,出口到香港和东南亚各国。

白泽民是一位事业心极强的爱国实业家,十年浩劫中,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1972年,他才六十七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他一生中积累了关于工商企业经营管理的丰富经验,对白敬宇药厂的发展壮大耗尽了毕生心血,功不可没,这也是对发展中华民族医药事业的一份贡献。

〔白国华 魏世元〕

赵炳南

赵炳南(1899—1984年),著名中医学家。

1982年7月10日下午,首都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灯火辉煌,由北京市卫生局举办的“庆祝著名回族老中医赵炳南教授行医65周年座谈会”正在进行之中。邓颖超同志派人送来了鲜艳的花篮和热情洋溢的贺信。许多书画家也赠送了祝贺的书画礼品。

赵炳南先生激动地说:“请首长和领导允许我说三句话。第一句话,我不忘本。第二句话,岂能尽遂人愿,但求无愧于心。第三句话,知识不停留,经验不带走。这是我一生的缩影。”他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诺言,奋发工作,直到1984年7月6日心脏停止跳动。

辛酸的童年

赵炳南,幼年名叫德明。祖籍山东德州。1899年9月1日出生于河北省宛平县,后随家迁居北京西郊三里河村。他家境贫寒,全家七口人,全凭父亲给人帮工做糕点、母亲给人干零活勉强维持生活。

赵炳南自幼体弱多病。五岁那年出了天花,高烧不退,家里无钱就医,请来邻居王二妈视诊。王二妈开了个偏方,服后好转,但落下一身小疤,被人们称为“麻孩”。六岁那年,赵炳南又闹了一场红白痢疾;七岁时,赵炳南又害了疟疾,都是央求王二妈开了偏方,慢慢治好的。

连续三年生重病,使赵炳南错过了启蒙就读的机会。但他从与王二妈的治疗接触中,对中医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赵炳南八岁始入家乡三里河村清真寺办的“经学堂”读书。主

要学阿拉伯文、伊斯兰教常识,也练武术,学工艺。学了不到一年,学堂停办,便辍了学。后又到南营房(又称南门)的一所私塾读书,学了半年,又辍了学。十岁时又到西什库的白塔寺学堂读书,学了半年,老师走了,又辍学。十一岁时到月坛东边一个报馆办的小学读书,不久报馆搬走,学校停办,又辍了学。十二岁时进阜成门外大街九天庙小学堂读书,不久,九天庙改为停尸房,又辍了学。十三岁时,三里河清真寺又办起小学堂,学了将近二年,他因家庭经济困难,再度辍学。

就这样,赵炳南从八岁到十三岁,六年中辗转投师六处,饱尝了辍学之苦。这就是他一生中受过的几年“正规”教育。在黑暗的旧社会,穷回回的孩子上学真难呀!

艰苦的学徒生涯

十四岁时,赵炳南经人介绍,到大栅栏的“伯贤药房”跟仇伯贤学徒。一日,伯贤的舅父丁庆三出诊过药房,说他的徒弟陈某不愿学外科,便把赵炳南给对换了一下。从此,赵炳南便到“德善医室”跟老中医丁庆三当了学徒,专习中医外科,达六年之久。

在旧社会,学徒的生涯是非常艰苦的。赵炳南不但要进行医务操作,还得一年到头干家务活,每天要操劳十几个小时,睡眠的时间很少。有一次,由于劳累过度,在熬膏药时睡着了,右手在迷朦中伸进了滚烫的油膏锅里,顿时手上的皮被烫光了,疼得钻心。右手烫伤了,还照样得干活,他就忍疼用左手干活、写字。

艰苦的学徒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没能磨灭赵炳南笃志学医的愿望。每当夜深人静,众人熟睡之时,他就刻苦攻读医书。经过数年勤奋学习,他系统地掌握了中医基本理论。他在学徒期读过的医书有《医宗金鉴·外科心法》、《外科名隐集》、《外科准绳》、《本

草纲目》、《疡医大全》、《濒湖脉学》等。有的已经能够背诵下来,至老不忘。对于中医外科技术,他也掌握得十分熟练。

在他学徒的第四个年头,师傅丁庆三病故了。他同几个师兄弟共同来维持医室的医务。这时,他一面行医,一面继续攻读医书。

1925年,河南省省长的女儿患了老鼠疮(淋巴结核),把赵炳南叫去给治疗。丁家师兄弟想着这是一次美差,一定能捞到一大笔出诊费。不料这个省长是个“铁公鸡”——一毛不拔,赵炳南空手而归。师兄弟硬说赵炳南把出诊费装进了私囊,不容细说,当即把他辞退了。从此,他的生活无着,到处奔走。

独立挂牌行医

1920年,赵炳南参加了当时北洋政府举办的中医考试,虽然取得了中医“医士”执照,但当局只允许在北京郊区行医,不准进城看病。1923年,他又参加了考试,共有二百多名中医人员应试,他是被录取的十三人之一。他被“德善医室”辞退以后,向亲友借款熬药,在西交民巷独立开设医馆,挂牌行医。

赵炳南在行医中,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对病人态度谦和,详询病情,细察脉色,辨证认真,处方周密。他对病人有深切的同情心,对贫困病人更是关怀备至。他的行医准则是“穷汉看病,富汉付钱”。当然,在强梁横行的旧社会,这个原则只能默默执行,不能公布于众。然而,凡到他那里看过病的穷人,心里都十分明白。有一次,一个人力车工人去找赵大夫看病,因为病情严重,必须马上动手术。当赵大夫听说他因生活困难,连饭都没有吃,当即拿钱让他到饭馆饱饱吃了一顿,然后才给作手术。手术后,赵大夫分文不收,反而给了些钱,叮咛他精心疗养。这样的事例很多,赵大夫医

病济贫的美名广为流传。

赵炳南十分关心本民族的医疗卫生事业,创办“普慈施诊所”即是一例。回族信仰伊斯兰教,按照伊斯兰教教规的规定,男孩子要在十二岁以前行“割礼”。过去,割礼一般都在清真寺内进行。由于医疗条件差,又缺少麻药和抗菌素,所以手术后有的孩子伤口感染化脓。为了保护本民族后代健康成长,他于1947年在北平广安门内大街创办了“普慈施诊所”,专为回族子弟做割礼手术。诊所的医疗器械、中西药品及一切费用,均由赵炳南筹备。由于诊所为民治病,又不收费,很受回族群众欢迎。1948年,旧北平市政府批准诊所改为“普慈施诊医院”,赵大夫担任外科主任,还请来了中医师公会内科组长陈申芝任内科主任医师,整个手术的操作程序更规范化了,这样,有效地防止了感染化脓,减轻了孩子们的痛苦,很受回族群众欢迎。每天医院门前门庭若市,多时达五六十人。

赵大夫的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也受到北京同道们的交口称赞,由当时的北京四大名医(汪逢春等)带头,在医院门口挂上了一块金光闪闪的大匾,上题“造福人群”。

刚直不阿 疾恶如仇

赵炳南为人耿直,从不趋炎附势。他行医之后,治好了不少病人,但富人看不起他,管他叫“瞧疙瘩的”。有的人要求他为之一夜之间除却痼疾,也有人想拉他入伙,为之效力。赵炳南固守着一条信念:“岂能尽遂人愿,但求无愧于心。”这是他做人的哲学,也是他对待旧社会挑战的有力回答。

三十年代初,末代皇帝溥仪“退居”天津旭街静园后,曾派老师让赵炳南前去看病。溥仪患的是鼻疖,唇颊部红肿。他既想看病,又摆出一副“尊大”的架势。赵大夫望而生厌。赵大夫用中药提疔

的办法,三天后栓出脓尽;一周后基本痊愈,没留疤痕。后来,赵大夫又给溥仪的荣“皇后”看过一次病。两次接触,溥仪对赵大夫的医术留下很好的印象,提出让赵做他的“御医”。赵大夫听后连忙说:“家有八旬的老母无人侍奉,我这个年龄,只能尽孝,不能尽忠”,拒绝了溥仪的招聘。

1929年,汪精卫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时,竟明令废止中医。当时赵炳南担任北平市中医公会外科委员,他对反动政府的这一决定极其愤慨,当即站出来提出抗议。

在日寇侵占北平期间,赵炳南出于爱国热忱,不愿做亡国奴,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三摔闹钟”即是突出表现。当时日本侵略者规定,在沦陷区内中国人要按日本的时间定时,把时针拨快一个小时。赵炳南听后非常气愤,他想:侵略者来了,人不自由了,难道连钟表也不自由了!难道在中国的国土上,连按中国的时间生活都不能了吗?!他在自己的医馆里,硬顶着不拨时针。后被日本狗腿子发现了,一进医馆,不由分说,便把挂钟摔碎了。但狗腿子一走,赵炳南又买了一个挂钟重新挂上,仍按中国时间拨好。后来又被敌人发现,又摔碎了。敌人走后,他又买了一个新的挂钟挂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回到了北平。一些地痞流氓常来到医馆无理取闹,敲榨勒索,再加上物价飞涨,生活无保障。赵炳南满目凄凉,心灰意冷,他当时虽然未满五十,却感到暮年将至,便拄起拐杖来了。

阳光普照 枯木逢春

1949年10月1日,赵炳南刚刚度过五十岁生日不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赵炳南这棵被旧社会折磨得将要枯萎的

“老树”，得到了充足的阳光和充沛的雨露，重新又焕发了青春，吐绿、开花、结果。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中医方针、政策，祖国宝贵的医药学遗产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人民政府颁发给赵炳南中医师证书，给了他发挥专业特长的机会。赵炳南以自己诊所的药物为军烈属诊疗，受到政府登报表扬。此后不久，他先后被北京市中医第二门诊部、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和平医院和北京医院聘请为中医顾问。他精神焕发，积极帮助筹建中医皮外科诊室。在皮研所，他和西医同道们认真商定了共同搞湿疹、牛皮癣、神经性皮炎等病种的研究方案，并付诸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

1955年，经卫生部部长傅连璋介绍，赵炳南给朱德委员长看病。看病前，周总理亲切地接见了，并和蔼地嘱咐：给首长看要安全有效，中西医结合，积极慎重，与病人商量。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示，给了赵炳南以巨大的力量，使他信心倍增，从此，他拄了多年的拐杖，也就自然而然地扔掉了。

1956年，北京市第一所中医医院建立。赵炳南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医馆中的药物、器械和准备扩建医馆的木料，全部捐献出来，表现出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赤诚之心。为此，他受到了政府的奖励。

参加医院工作后，赵炳南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地进行思想革命，处处以身作则，注意消除长期以来存在的中西医之间、中医之间的门户之见，主动团结同志，为新中国医疗事业的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他还自动地把自己多年来行之有效的验方和盘托出，供同行们借鉴学习。在他的积极帮助下，建立健全了外科室。

随着赵炳南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的提高，他对人民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党和人民给了他应有的荣誉和政治待遇。他先后被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常委、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担任过北京市

中医医院副院长兼外科主任、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北京市中医学会理事长、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北京市第二医学院中医系教授等职务。曾多次见到过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把经验无私地留给后人

赵炳南行医半个多世纪,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理论和经验。他精通中医经典著作,擅长于治疗外科痈疽恶疮、皮肤疮疡、痰核瘰疬、术后瘰管以及全身性感染等急慢性病症。他对于中医皮外科理论及内服外用药的研究,造诣精深,并多有创新。他很注意实际操作,如对熬膏药、摊膏药、搓药捻、上药面等,均掌握得很熟练。到了晚年,仍坚持会诊,从不脱离临床。他常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

他常感慨地说:自己是个普通的回族老中医,来自底层人民。我所知道的一点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也来源于人民,理应把它毫无保留地献给人民。知识不停留,经验不带走(即不带进坟墓)。他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和手稿,都拿出来交给了医院,并把自己的点滴经验经过认真回忆,说出来让助手加以整理。院领导和同志们积极支持赵老的想法,从1971年开始,着手帮助他整理有关资料,编写临床经验集。对于每味药,每个处方和每段论述,他都认真研究,仔细修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也总结失败的教训,实事求是,毫不马虎。经过几年努力,一部30万字的《赵炳南临床经验集》于1975年出版了。书中共收了51个病种,137个病例,并介绍了3种独特疗法和多种行之有效的验方、常用方。该书较系统地反映了赵炳南的实际经验,得到医学界同行的好评,并被评为全国科学大会奖。此外,赵炳南还参与审阅、指导编著了多种皮肤病

和临床外科的手册和书籍。他抓紧有限的时间,整理行医生涯、学术思想、治疗经验、饮食疗法等文字资料 17 篇,约 7 万字,有的在有关杂志上刊登。他还写出湿疹等 10 种皮肤科常见病种的电子计算机中医诊疗程序文字资料约 3 万字录音,整理临床经验磁带 23 盘。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审阅稿件、院内外会诊和一些社会活动。

回顾赵炳南的一生,确实是既平凡又伟大。他人虽已逝去,但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丁国勇〕

四 童 琮^①

童琮(1864—1923年),江苏镇江人。清末甲辰(光绪三十年,1904年)秀才。热心回民教育,在住宅内创办疆园学塾,以教书为业。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镇江穆源学校成立,童琮主持教务,“编纂教科诸书,其经营筹画,卓卓可观”。继而与数同志发起成立“东亚穆民教育总会”,后改名“东亚清真教育总会”,“盖欲为中国全体回教谋教育普及也”。总会于1908年秋在穆源学堂召开第一次大会,到会者甚众,“虽赞助有人,而一书一启,皆亲为之,其苦心劳力,概可想见”。

1908年日本出版的留东清真教育会编《醒回篇》,载有童琮撰《说团》、《原课》两篇文章。在前文中,童琮论结团、回民团结的重要性。说:“今则通国创言结团矣,果实行与否,不敢预知。而吾教人处此竞争时代,岂容默默。况吾教人素有‘天下一家’之谚,若具天然之团体者然。”在后文中,讲以天课用来办教育,说:“古经训言,有念、礼、斋、课、朝五大纲。”“曰课者,即钱课之谓也。凡有资财者,每银百金,应分壹两三钱三分,以惠同教穷民之无告者。推之所入加多,所出者亦按增其数,而无纤毫吝惜之意于其间。古之人以为常,受者、施者,两无德色。而随时施散之数,又不在此例。”“名曰天课,意谓此天然之赋课,如天职之当尽,天秩之当遵者然。”“今日吾教之急务,莫兴学若。而论者每有筹款之苦,遂至因噎而废食,则大可忧也。孰知吾教中于凡百公益,早有至美之法,至公

^① 主要据《醒回篇》上《说团》、《原课》、《东亚清真教育总会之状况》,及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文史委员会提供材料写成。

之理。”童琮以回族中传统的捐纳天课,用于办学,实为可行之法。

《醒回篇》中还有《东亚清真教育总会之状况》一文,述该会情况甚详。表扬童琮,“自食其食,自衣其衣,而奔走呼号,昼夜不息,以经营此会者,夫岂有求于其间哉!为吾教谋进化,图生存,义务所在,不容已也”。号召“同教诸君,闻风兴起,声应乞求,富者出资,穷者出力”,共同为回民教育奋斗。童琮实为近代回民教育先驱,回民社团最早之发起人。

辛亥革命后,童琮创办的疆园学塾改为疆园中英补习班,由其金陵大学毕业的长子任英语教师,入学者增多;童琮执教务的穆源学校,历经沧桑,存留到今日,为回民教育做出贡献。

〔李松茂〕

马六舟^①

马六舟(1862—1917年),字纶三,四川成都人。幼年丧父,与弟叙午由母抚养长大成人。叙午二十岁乡试中举,后人翰林院,又到学部任职,还到英国考察过教育。六舟因帮助母亲料理家务及茶馆生意,三十岁后方中试为拔贡,后与川人程德全相识。德全以知州衔任黑龙江营务处总办,1900年升记名道台,同年沙俄侵入东北,程德全奉命与沙俄办交涉。程知六舟才、胆俱备,电召去齐齐哈尔协其工作。时俄军长驱直入,齐齐哈尔岌岌可危,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殉国,城中大乱。俄军炮口对准城内,准备轰城,六舟与德全出城,立于炮口前,阻挡俄军轰城,使城中百姓免遭屠戮。1903年程德全擢副都统,1905年再升将军。同年日俄战争俄方惨败,中国借此有利时机继续向俄国交涉收回我金矿主权。六舟奉命前去,几经周折,据理力争,收回都鲁河金矿;后又反复交涉,收回观音山金矿,取得维护我国主权的胜利。

马六舟向程德全建议招民垦荒,以实边防患。程以白杨木河城荒地事宜委托,六舟成绩迥异,被奏补木兰知县兼署东兴镇协领。六舟疏浚木兰河,造福民人。民国元年(1912年)奉檄督第三路民团,安靖地方。二年,复署木兰县事。三年,调巴彦县。任职期间,发展农业,办养鹿场,试种水稻;推行新政,提倡放足,禁跳大神。五年(1916年),省政府考核各县成绩,六舟以“明干有为,强毅不挠”上之政府。后以知县上黑龙江省志立传者,仅马六舟一

① 据《黑龙江志稿》卷四九《马六舟传》及《成都马君纶三墓志铭》并马六舟子马汝邻所写材料写成。

人。旋因病卸任赴省。六年(1917年)4月,因公赴巴彦,中途为土匪所劫,带至吉林老山头遇害,“盖任职时治匪最严也”。

马六舟热心民族教育,1907年在齐齐哈尔和其他回族人士兴办清真两级小学,招收回民子弟,以清真屠宰场所收税款作为学校经费。3月1日开学,招收两个班,师资由省府推荐,再由清真寺董事会正式聘请。同年11月23日省府正式委派马六舟为“劝学董”。六舟又将在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儿子汝邾调来任义务校长,充实办学力量。1916—1917年,学校迁至新址,原地成立清真女校,规模不断扩大。1921年六舟次子汝郁从日本留学回国,亦到清真学校任教,增添簿记等实用课程,时六舟已去世。六舟因办学有功,程德全奏请光绪皇帝赐“急公好义”匾额一方,表彰他的功绩。1987年清真学校(改称回民小学)成立八十周年,马六舟子马汝邻应邀前去参加庆祝,并发言。黑龙江回族人民至今仍怀念六舟父子在那里创办回民教育的业绩。

马六舟热心回民公益事业,如公墓、寺政管理等。平日朴素,以粗衣旧服自适,自云不愿作新衣服的奴隶。为官清廉,身后无遗产。

〔李松茂〕

马邻翼

马邻翼(1864—1938年),近代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字振吾,号盛唐,湖南邵阳市人。祖籍江苏泰兴县。始祖马成,元至正时,官枢密院使。明洪武改元,马成挂冠遁至湖南宝庆(今邵阳市)府,爱其山水之胜,遂卜居于省垣之西。马氏一门之中,于明清两朝有贡生、太学生、举人、百户、千户、把总、外委、知县、府学教授、学部总务司员外郎等五十余人^①,为邵阳回族中望族。

马邻翼父亲马希彦,是一位重伦理、讲道德、轻财好义、阿文与汉学俱佳的阿訇。他任教长数十年,把平时所得“乜贴”,几乎全部分给贫困回民,而自己则靠种田过着清贫的生活。马邻翼兄弟四人,他系长子,自幼随父务农、空余时间学习伊斯兰教经典。稍长,入学攻读,自幼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中国伊斯兰教和儒家道德伦理观念的洗礼,对马邻翼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邻翼早年曾多次参加省试,均名落孙山。他更加发奋攻读,才思猛进。后几次应试,连贯金榜。1902年获光绪庚子、辛丑并科举人。正值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际。清政府为讨得帝国主义欢心、缓和国内阶级矛盾,陆续颁布了一些以废八股、停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为内容的新政。马邻翼决意放弃科举,以在籍举人主讲于正经书院,以图通过教育实现其振兴国家和民族的目的。1903年赵尔巽任湖南巡抚时,选全省年在四十以下的文士资送出洋考察,马邻翼入选并担任领班,入日本弘文学院研究教育。回国后于清末担任

^① 《金陵马氏四修族谱》。

过湖南省视学兼全省师范传习所监督,中路师范学校监督,学部普通教育司主事,总务司员外郎等职。民国元年,以教育部参事简放甘肃提学使。其后历任甘肃教育司司长、实业司司长、布政使国税厅筹备处处长、财政厅厅长、甘凉道道尹、教育厅厅长;直隶教育厅厅长兼国务院咨议;教育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先后受聘为两湖巡阅使吴佩孚、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绥远都统马福祥、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的顾问或高等顾问。并任中国回教俱进会参议长、全国善后会议委员、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全国赈灾委员会委员、国难会议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等职。他任职时间长,工作地区和涉及面广,故其一生建树甚多。

马邻翼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赴日本考察回国后任湖南视学期间,在长沙创办了邵阳中学、妙高峰师范。因成绩卓著,于1906年调学部任职。当时正值新旧教育交替之际,革新与守旧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他“目击国步艰难,非革新无以图存,而深感发展教育的重要”^①,克服重重困难,为学部拟定了“刷新文化计划”,并编纂了《学部奏咨辑要》供从事教育者备用。他认为“各省教育进步迟速悬殊,非有比较不足以资鼓励。且东西各国来部探询我国教育状况者,屡无以应”。努力年余,编制了“全国教育统计表,吾国教育之有统计自兹始”^②。由于他对发展我国新式教育做出了贡献,故被称为当时“学部三杰”之一。1919年任直隶(河北)教育厅厅长时,制定完善了学校规章制度,创办贫民免费学校百余所,倡办河北大学,受到各界好评。因其在教育界的威望,先后任中国大学总董、民国大学常务董事、国医学院董事长以及西

① 《纪念先贤马振五先生》,载《回教论坛半月刊》(重庆版)第二卷第二期。

② 《金陵马氏四修族谱·马振五先生七十一生日征文启》。

北公学、成达师范、湖湘学校、北平蒙藏学校的董事、董事长、校长等职。有人称其“平生十九之精力，萃于教人”，“先生之绩，一切职教者之绩”^①，是十分中肯和颇有见地的。

马邻翼为发展回族新式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明末胡登洲创办经堂教育，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国时期，无论就其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已远远不能适应回族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改变家乡教胞读书识字者“百不得一”的落后状况，他将自置田产三分之二以上捐作办学基金，于1906年创办偕进小学，为发展回民教育开创了新路。后又陆续在邵阳创办了清真女学院、马氏励学社、宝庆励学社，并于1932年创办了偕进中学。他在为《偕进学校概览》撰写的序文中，希望该校“继起之人，念缔造之艰难，发恢张之宏愿。远之为民族培复兴之才，近之为地方壮文明之色”^②，爱国爱乡之情，跃然纸上。在学部任职期间，他积极支持王宽于1908年在牛街礼拜寺创办清真两等小学堂，他“经众举为监督”。该校鼎盛时，在花市、教子胡同、三里河、海淀设立四所分校。“督学局以成绩优良，代请崇关在牛羊税项下，月津贴银四十两，以奖励之”^③。民国初年，在甘肃任职期间，他与当地回族各界人士一道成立了以督促回族子女上学为宗旨的兰州劝学所，积极在兰州及甘肃各地筹办清真学校。当1919年离开甘肃时，已基本上改变了清真寺中“悉授阿文，书本是由一块牛肩甲骨制成，熟读后即擦去再写，无法备忘”^④的情况。各地陆续兴办回民学校一百多所，纠正了回民视“洋学堂”为畏途，读书为“反教”的错误观念。早年

① 《金陵马氏四修族谱·马振五先生七秩寿序》。

② 转引马亮生主编《湖南回族》第35页。

③ 《王浩然阿訇传》，载《月华》第七卷第二十四期。

④ 《兰州回民教育》，载《突厥》第六卷第三、四期合刊。

西北地区回族中各类人才大都是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回族新式教育发展缓慢,办学经费匮乏。马邻翼为此奔走呼号数年,“得由国民政府拨华新纺织官股三十万元,为回民教育基金,南北各回民学校多依赖之”^①,为发展回民教育做了件功不可没的好事。

马邻翼为整顿吏治、举办公益事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在任甘肃实业司司长时,整顿了兰州织呢局。任财政厅厅长时,制定了新的解款收款办法,淘汰了旧藩署胥吏,严惩了贪污舞弊的财政厅有关人员。任甘凉道尹时,设鸣冤鼓于大堂,许民众申辩控告,亲自听取诉讼,平反冤狱甚多。奉调离职时,民众为其送万民伞、万民衣,立德政碑,以示崇敬之意。在任实业司司长任内,提倡植树,组织属员于兰州五泉山种树四万余株,以立民范。1924年,家乡遭受特大水灾时,他主动为募捐团解决食宿困难,并联合同僚要求政府发放救灾粮款。1929年又在家乡创办穆民工厂,为回族贫苦群众谋求生活出路。他“一生无苟得之财,亦未尝以浮华浪掷一钱。但遇有利于社会之举,则倾囊弗惜”^②,其轻财好义的品格,令人敬佩。

马邻翼一生爱好志趣广泛,于诗、文、书法无不精通,且著作甚丰。青年时即著有《读史观感录》、《明窗札记》、《舆地形胜略》等。自日本考察归国后,在湖南兴办教育期间,著有《新教育学》一书,是我国最早的教育学专著之一。因为他自幼受严格的伊斯兰文化和儒家传统文化教育,著有《伊斯兰教概论》一书,对伊斯兰教的产生、发展、在中国的传播、“五功”、“五典”、礼制、饮食、习俗,作了简

① 《金陵马氏四修族谱·马振五先生七十一生日征文启》。

② 同上。

明扼要的介绍。他自幼喜爱书法,晚年益笃。他临摹古人碑帖,不拘一朝一家之作。最为得意者为《西楼帖》、《表忠观碑》、《猛龙碑》及《华山碑》等。得其书法者,视为珍品。

马邻翼力主加强民族团结,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精神十分令人敬佩。早在1906年,他在家乡创办偕进学校时,即取“回汉偕进”之意。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主张,他即将自己的字“振吾”改为“振五”,取振兴五族之意。在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兼任北平蒙藏学校校长期间,经常以五族共和教育和勉励学生,加强民族团结。在西北任职期间,对回汉一视同仁,为发展西北各民族教育做了大量工作。他为家乡苏家冲清真寺所撰写的“教思无穷发诗礼未传秘旨;门户虽别与孔周共振伦常”对联,是其增强回汉民族团结思想的具体反映。“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以忧患余生,养痾故都。告诫马氏子孙,当此风云变幻之际,不要误入歧途,做出愧对于祖先、国家、民族、人民之事,字里行间流露出爱国之情。当日伪汉奸鉴于他的社会威望并曾在日本学习过,胁迫他出任北京维持会顾问时,当即被拒绝。事后于门上书写“苟全性命于乱世,坚持气节以终生”对联,以示其决不附敌之决心。深居简出。1938年9月病逝于北平,安葬于阜城门外三里河回民公墓。

〔答振益〕

唐柯三

唐柯三(1882—1950年),民国政治家、教育家。原名唐仰槐,以字行,山东邹县(今邹城市)邢家村人。出生在一个笃信伊斯兰教的仕宦家庭中,祖父唐传猷,清末曾任吏部员外郎,以书法见誉,有《松鹤堂临本》行世。父亲唐承烈,官至陕西按察使,正三品,在清末以政绩显达。唐承烈在四川任官时,曾奉命就四川内河航运事与英国领事谈判,成功地迫使英人就范,表现了不受外侮的民族气节。

受家风影响,唐柯三自幼熟读儒家诗书,宗教观念和民族意识比较浓厚,特别是在他父亲影响下树立了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他毕业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为清附贡生。民国初年他开始信仰中山学说,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先后任甘肃省税务局长、济南交涉署署长、厦门海关监督、济南和泰安道尹,最后任职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

他从民国元年起,创办或参与了多个回族文化教育方面的社团组织,主要有中国回教俱进会、中国回民教育促进会、中国回教青年学会等。除了宣传呼吁外,他还身体力行,创办回民学校或刊物。1912年他在家乡邹县邢村创办了唐氏私立小学;1925年,他在任济南道尹时,与著名阿訇马松亭等人创办了近代回族历史上著名的新式宗教学校——成达师范学校。该校以“三长教育”(即培养教长、校长、会长三长人才)为办学宗旨,培养了大批适应时代要求的有用人才。作为成师的主要创办者之一,唐柯三长期担任成师校长,为改良回族经堂教育、促进回族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达师范1928年因济南惨案而停办,唐柯三亲赴北平

拜会马福祥,在获得马的支持后成师得以在北平复校;1929年他还与马福祥、马邻翼、赵振武等人创办了中国近代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回族刊物《月华》杂志。

抗日战争时期,唐柯三参与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领导工作,成为组织全国回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著名人物。1938年初,筹组中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由郑州迁往武汉。5月该会正式成立,白崇禧为理事长,时子周、唐柯三为副理事长。1938年10月,会址迁往重庆,1939年改会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唐柯三被选为驻会副理事长。他选聘多年从事回民教育、热心族教事业的知识分子艾宜裁、薛文波、王农村、李廷弼、王孟扬为回协各组组长,分管组织、宣传、训练、调查、教育、教务、生产、救济及妇女工作等项事务,马策为总干事,并吸收一些热心教务的回族知识分子进入理事会、监事会,使回协工作得到加强。

1938年2月,北平敌伪组织“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派遣唐易尘等五人前往麦加朝觐;以宣传“华北人民安居乐业,宗教信仰自由”的欺世谎言。唐柯三即联合达浦生、孙绳武、马松亭等速电留埃学生庞士谦、马坚等二十八人前往麦加朝觐,严密监视日伪朝觐团的一言一行,并借机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正义战争。

在唐柯三等的努力下,筹建中的回协1938年3月组派了以王月波为团长的甘宁青救国宣传团,向西北回民宣传抗战和民族团结。1938年1月和1939年9月先后组派以王曾善为团长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和以马天英为团长的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也都得到了唐柯三的积极支持。访问团在国外揭露了日寇侵华的种种暴行,呼吁各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战,赢得了伊斯兰世界的广泛同情。

在唐柯三的支持下,复旦大学回族教授马宗融特请老舍和宋

之的编著《国家至上》四幕话剧,由著名演员张瑞芳、魏鹤龄主演。该剧 1940 年 4 月在重庆公演,收到了化解回汉隔阂、增强民族团结的效果。

在发展回民教育方面,唐柯三一向热心关注。在他的指导下,1939 年 12 月回协制定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教育工作纲要》,其特点是民族性强,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根据《纲要》要求,凡具备条件的回民社区大都设立了回民小学;协助北平西北中学在兰州、成都设立分校,对晋城崇实、邵阳偕进、青海回中、昆明明德、西昌健生及阜阳成达等中学,给予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支持;对于高等教育则提出了筹设回教大学一所的设想,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在唐柯三、马宗融的努力下,在复旦大学农学院垦殖专修科内增招回生班,造就了数十名回族农业技术人才。

1950 年唐柯三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杨广恩〕

时子周^①

时子周(1879—1967年),又名作新。天津人。父名时震一,母刘氏。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十九日。他上有兄、姐各一人,兄年仅十岁夭折。世居城西北角文昌宫西。天津西头一带,是回民聚居之地,大多数回民以经营小本生意为生,但时的父亲却是一读书人,略有薄产,并曾在一家鞋店当记帐先生。时子周的元配夫人穆吉平,也是回民,生有二子四女。穆氏因产后病去世,时子周续娶丁允贞,她是回民名医并曾主编《竹园白话报》的丁子良之女,生四子二女。时子周的亲朋,多系回民中的上层文墨人士。

时子周幼年就学于私塾,清末在保定优级师范学堂毕业。他与天津闻人严范孙翰林为近邻,曾在严氏家塾教物理、算术、几何、代数等,与张伯苓共事。1904年,严氏家塾扩充,改为敬业中学,这就是后来南开中学的前身,时子周也随着张伯苓进入南开任教。积极参加校内及社会上各种活动,也曾活跃于学校庆祝活动的戏剧排演工作。南开新剧团,成立于清末,早期演员就是时子周、马千里、周绍西、王祐辰等,后又有周恩来、马骏和万家宝等。当时曾演过《一念差》、《一元钱》、《仇大娘》、《新少年》、《新村正》等剧。时子周的另一项突出活动,就是组织学生练习演讲。后来南开学校的演说竞赛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由施奎龄及周恩来分任正副会长。时子周善于演讲,口齿清楚,能吸引听众,他除在校内作示范演说外,且常参加学校组织的講演团,到城厢附近和四乡各村鎮,做启发民智的讲演。他所演讲的内容,能深入人心,收到良

^① 原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4期。

好的效果。

1917年4月,时在南开中学任教期间,曾与马千里同去日本,进行参观访问,吸取教学经验。他在教课之余,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更成为很活跃的人物。

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地近京畿,各校师生和革命知识青年,立即热烈响应,组织了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各界联合会和国民大会等一系列爱国团体,分头活动,领导天津各界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运动。时子周以回教团体代表身份参加了天津各界联合会,被推为评议员,又经各界联合会的推举,参加国民大会为委员。在几次游行大会上,他担任讲演,针对当时巴黎和会和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等问题,慷慨陈词,激动人心。后天津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天津市各界联合会组织了“跪哭团”。时子周在这个爱国行动中,积极率领跪哭团团员们,穿戴着白布孝袍、孝帽,每人手里还拿着“哭丧棒”,去到唯利是图、偷卖日本货的奸商门前,如丧考妣地痛哭流涕,进行劝导,直到那个商号把藏匿的日本货拿出来,表示不再售卖为止。这种行动,对当时抵制日货很生效。由于东门里魁发成洋广杂货铺勾引日本人殴打检查日货的学生,酿成一场风潮,1920年1月24日天津各界代表被拘,1月29日省公署辕门前请愿学生被殴及被捕。时子周就是在1月24日被保安队点名捕去的。捕后与周恩来、马骏、马千里等一同被押在天津警察厅两个半月,从4月7日解送天津地方检察厅,又经过三个多月的“侦查”,最后经过“审判”,于7月17日被判以“私擅监禁罪”(指东门里魁发成洋广杂货铺伙友裴潭溪被带到国民大会事)处五等有期徒刑二个月。因其未决期内羁押日数已超过所判的刑期,按照折抵办法,当庭即被释放。这一件“爱国有罪”的公案,就这样马马虎虎地结束了。

时子周在被押天津警察厅期间,曾与一同被捕的难友向杨以德进行过绝食抗议。积极参加难友们共同组织的读书会、演讲会和其他活动。在演讲会上,他连续讲过世界工业革命历史;在文娱活动方面,他能唱京戏,能演新剧,能说相声。虽在缱绻之中,犹能苦中作乐,表现了他的乐观主义精神。时子周在被捕的人士中是教育界年岁较长的一人,他既是难友,又被尊为老师。在被押期间的5月19日这天,是他的四十二岁生日,从早晨一起来,同志们就忙着向他拜寿,下午开了一个茶话会,晚间为他举行庆祝生日会,由难友们演出京剧、话剧、大鼓等节目,大家各展所长,尽情欢聚了一晚。

在五四运动中,南开学校当局及老师、学生彼此之间在政治上产生分歧。学校秉承主管教育当局的意旨,尽力劝阻师生参加罢课游行,并曾开除了一些学生,解聘了几位教师。时子周因参加运动而被捕,也与某些人产生芥蒂,出狱后就不能不离开南开中学。同时离开南开的还有马千里、沈玉书等。

时子周在五四运动中被捕后,镇压学生运动的元凶、警察厅长杨以德就曾对他进行拉拢。在运动平息后,杨以德又以高官厚禄来收买时子周,推荐他当上了天津工巡捐务处处长。时子周并没有个人可靠的“班底”,于是把以前参加过抵制日货的“跪哭团”的几个人全拉进了捐务处。时子周在捐务处工作得很不顺利,既无经验又不善于用人,所以不久即辞职而去。

时子周辞职后,依然故我,仍过着书生的平淡生活。这时他在南开中学的旧同事吴子洲(梦兰)正经营华洋书庄,便约他担任华洋书庄北京分庄的经理。吴子洲不久被津浦铁路局邀往浦口,担任津浦铁路港务处处长。港务处需要一个科长,吴子洲又约时子周南去浦口,担任该职。

不久,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向江浙进逼。当时南京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所割据,处在南京一带的许多北方人,害怕北伐军来了对个人不利,因而纷纷跑回天津。当时时子周与国民党毫无渊源,也跑回天津。一度就任了河东中学的教务主任,兼教英文、公民两门课。时子周在“五四”前曾担任南开中学的教务主任,这时他把南开的办学经验施展到河东中学来,驾轻就熟,发挥所长,很快使河东的声誉为之一振。

北伐军进入直隶省和天津县,曾一度出现国民党新军阀冯玉祥和阎锡山互争这两个地盘的局面,最后经蒋介石决定,直隶与天津为阎锡山唾手而得。1928年6月,直隶省改名河北省,省会设在天津,由阎锡山提请任命商震为河北省主席,南桂馨为天津市长。南到任不久,因贪得无厌,大刮民脂民膏,招致地方人士的不满,旋经李廷玉等士绅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控告,其中时子周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大。阎锡山不得已,把南桂馨撤职,提请任命崔廷献接替。崔廷献极力拉拢地方人士,组织了天津临时市政委员会,由崔自任主席,邀请了王文典、卞白眉、杨西园及时子周等三十余人,为天津临时市政委员会委员。崔廷献又在市属各局中,让出两个局长位置,由天津人充任局长。并决定设立市立师范学校,任命时子周为校长,拨出一笔巨款,在天津河东特别二区三马路河沿(即今河北区进步道西口河沿)筹建校舍,于1930年暑假时落成,即进行招生开学,时子周就任了这个市立师范学校校长,为他后来投靠中国国民党进行各项活动起了极大的方便作用。

1927年3月间,时子周在天津参加了尚处于秘密状态的国民党,但时子周在国民党内的发迹,则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主要是通过张厉生的引线。张厉生原系南开中学生,上学时叫张星舟,河北省乐亭县人。他在南开只上了一年,正赶上赴法勤工俭

学高潮,他就与当时的一批青年周恩来、李福景、刘清扬、赵光宸、张崧年等人,去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张厉生学成毕业回到上海,投奔他在法国结识的邵元冲(当时邵在上海办建国学校)。不久北伐军打下浙江,国民党政府发表邵元冲为杭州市长,邵就将张厉生带去任秘书,后又把张厉生介绍给陈果夫。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为蒋介石,副部长为陈果夫,张经陈派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未几又经陈签请蒋介石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从此,张厉生逐渐成为蒋介石的亲信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张厉生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华北党务特派员身份,长期留居北方。为了在天津安置自己的人,便看中时子周。时是张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老师,张对时极为尊敬,就推荐时子周为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员,彼时邵华、刘不同也全是天津市党部委员。时子周所以能跟陈果夫和陈立夫发生关系,主要是因为他在天津有些声望,是二陈想利用的工具。时子周很快就被吸收参加C.C.的小组织“忠实同志会”,成为国民党在天津的嫡系。当时C.C.有全国性的两个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和“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两个组织在天津的分会,都是由时子周发动组织的,前者网罗了张伯苓、邓庆澜、齐璧亭、张季鸾等人,后者网罗了李书田、魏明初、李咏秋等人。这些组织都设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内。

此外,由C.C.拨给时子周专款,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如:交由苏吉亨组织“绿萼画会”,交由赵光宸组织“天津市经济调查会”,交由施奎龄网罗天津知名的社会上层人物,主要是欧美留学生“群一社”。当时天津还有刘孟扬等组织的“地方协会”,李廷玉等组织的“国学研究社”,也都设在市立师范学校内,时子周均可左右。并通过时的一些曾留学外国的学生施奎龄、赵光宸、刘问凯等组织“中

外联谊会”一类的组织。这些组织都直接间接受时子周的指挥。C.C.在天津的势力,一时形成了一股力量。时子周就是利用这些组织而受到陈果夫、陈立夫和张厉生的称许,给他后来在中国国民党内打下了基础。

在“七七”事变前夕的1935年《何梅协定》以后,因协定中有关于华北各省市的中国国民党党部撤出华北的条款,故此时子周也与其他党部人员撤到南京,住在板桥西村。由于张厉生在陈果夫面前的推荐,所以在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时子周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又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后又补为中央委员。

不久,宁夏省教育厅厅长出缺,又经张厉生的推荐,时子周当了宁夏省教育厅长,并把李荣培、赵光宸等人带去,在教育厅安排了秘书、科长等职。

1938年,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陈诚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又是经张厉生的推荐,将时子周调到湖北,出任湖北省教育厅长。由于当地情况复杂,各方情形也难以应付。到后一年左右,张厉生见到时子周处境困难,他又把时调往重庆,就任陈果夫安排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边疆教育班主任(班务则交由李淑敏等代理),时本人则长期住在重庆市内观音岩附近回教救国协会。该协会理事长是白崇禧,副理事长为时子周。白不经常到会,时则住在会内,处理日常事务,一直到抗战胜利。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4年冬,蒋介石令张厉生拟具战后天津市党政人选。张厉生提出施奎龄为天津市市长,时子周为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和天津市临时参议会议长,蒋介石表示同意。转年8月日本投降,张伯苓向蒋介石推荐张廷谔为天津市市长。蒋介石不能不接受张的推荐,临时改变计划,任命张廷谔为天津市

市长。时子周仍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和天津市临时参议会会议长,施奎龄作为中央政府代表接收天津市。时子周由后方飞到天津后,一直与张廷谔为难,挤他下台。当时天津市党部和天津市临时参议会同天津市政府之间互相倾轧,唇齿相讥,最后迫使张廷谔不得不下台。

时子周究竟是一个书生,缺乏用人之明。他在天津分据两个要津,由于用人不当,首先丢了市党部的职位,由邵华接替了他的主委;在天津市临时参议会方面,当改选为正式天津市参议会时,时子周也随之落选。

时子周是天津土生土长的,很有一部分潜在势力。而施奎龄又是他在南开中学教学时的得意门生,所以他认为施奎龄迟早必出任天津市长,他竭力想把天津人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势力,一方面时利用他和地方上老一辈知名的天津人的旧关系作为依靠;一方面组织“新中国政治学会”,把阎子亨、陈锡三、李邦翰、吴象贤、邓庆澜、夏琴西等,都吸收在内。其后不久,时子周又怕树大招风,以致新中国政治学会这个组织,没有维持多久就涣散了,但仍以时子周为中心形成一个小圈子。时子周的“津人治津”想法,固为津人所拥护,却激起了非天津人的反感,进而结成了反时的力量。这与他最后在天津的失势关系很大。

1948年10月,时子周在天津的两个据点,市党部主委和市参议会会议长两处地盘,先后失掉,所剩的仅是一个光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面临水尽山穷之境,在天津解放前夕的1948年10月,怀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悄然离开天津故土,经长沙、昆明绕道去台湾。由于年事已高,没再担任什么实职,1967年病逝于台北。

[康德寿提供]

五 哈少夫^①

哈少夫(1856—1934年),金石书画收藏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穆斯林知名人士。名磨,字少甫(亦作少夫),以字行,别署观津。江苏南京人。幼习儒籍。因承家教,熟悉金石书画、瓷铜古玩。青年时期,弃儒经商,从事珍宝业,酷爱收藏,勤奋好学。曾走遍燕、粤、湘、鄂、豫、鲁、皖、浙各地,并东渡日本,广交海内外名流,收藏了许多文物珍品。清末,与沪上著名书画家陆廉夫、李平书、钱化佛、吴昌硕、黄宾虹、贺天健、王个簃等发起组织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任副会长。1908年参加豫园放鹤亭苑来山房书画会。1910年同上海的书画家、收藏家发起成立上海书画研究会任协理。1914年发起建立上海振兴珠玉汇市,任总董(即会长)。1915年,其收藏的“忠毅公铁砚”、“东坡公铁如意”分别荣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二等奖章和金质奖。哈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研读过一些伊斯兰教经籍,并热心伊斯兰教公益事业。1900年和1905年,曾两次出资扩建上海福佑路清真寺,为该寺务本堂董事。1909年在上海福佑路清真寺成立的上海清真董事会,哈为创始人之一,任董事会协董(即副会长),并兼任尚贤堂(基督教会学术团体)董事。哈曾在尚贤堂向教外人士演讲过伊斯兰教义,受到教内外人士的重视。为了提高回民的文化素质,1905年由福佑路清真寺哈少夫等人创办的务本科学堂(1905—1909年),于1909年哈发起整治,并集资按照国民教育制度办学方式,把务本科学堂更名为上海清真两等小学堂(1909—1929年)。这是上海回民子弟第一所完全小

^① 本文主要参考书:1992年《上海宗教史》,1997年《上海民族志》。

学。1925年参与哈德成阿訇等发起成立的中国回教学会任干事,并给予经济资助。1929年2月同达浦望阿訇等发起组织中国回教公会及伊斯兰进德会,为发展回民教育,培养回族人才竭尽了全力。为了创办和建设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和敦化小学,哈少夫卖了收藏的珍品和私人房地产,捐作建校工程之用。经他奔走募捐,终于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新校舍,以及供学校日常开支所需的“住院八椽,分为六宅”。为了纪念他的功绩,敦化小学聘请哈为校董会首席校董,并将毗连新校舍的弄堂(胡同、里弄)取名为观津里。在哈少夫等人的倡议下,集资创建了上海日晖港清真别墅(前身为息心亭,1892年改建为清真寺)、真如清真第二别墅(即真如清真寺,建于1926年)、小沙渡清真义冢(1926年建成,占地29.51亩)等。哈少夫一生乐善好施,受到人们的敬重。1933年为北平回教难民救济会捐募巨款。曾历任上海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妇孺救济会、江宁(今南京)水灾义赈会、上海筹募各省水旱赈义会、“一·二八”上海战区难民救济会、东北难民联合会、上海赈济黄河水灾会等慈善组织董事、执行委员、执行审核委员等。

1931年哈为上海广仓学会出版的姬觉弥等根据英、日译本转译的《汉译古兰经》作序,并著有《宝铁砚斋书画》五卷,《丙寅东山游记录》一卷。1932年9、10月间上海回族穆斯林对北新书局和《南华文艺》侮教案,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护教斗争,哈少夫为这场护教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防止偏差,他亲自组织领导群众队伍,这对斗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同时也展示了上海回民自身的力量。1934年哈少夫七十九岁时自书挽联一副,上联:“自壮年往游东海,金石书画,薄负收藏虚名,幸荷士大夫折节下交,道德有人,文章有人,每过从清淡,得助我生平智识。”下联:“惜垂老未朝天方,水旱兵灾,空抱慈祥志愿,端赖诸贤达集资兴学,宗教为

重,蒙养为重,庶维持悠久,更慰予死后心期。”1934年9月26日在沪归真。

〔张志诚〕

伍特公^①

伍特公(1886—1961年),中国穆斯林学者、社会活动家、《古兰经》汉语翻译者。又名石卿,字正钧,曾用名天真、墨者、道隐。江苏南京人。出身于贫寒的回族家庭。幼年就读于私塾。1901年考入上海唯一的一所中国人自办的大学——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该校1896年由盛宣怀(1844—1916年,清末大臣)创建于徐家汇镇北,当时教员、学生中每多热心爱国之士,社会新旧思潮的冲突在校内反映明显。伍在校期间爱读新书,曾读过章太炎(1869—1936年,民主革命宣传家、思想家)著作等,深受民主革新思潮影响。1902年11月因代表学生反对校方禁止学生看新书新报,接受新思想新学说而遭开除。其所在的五班学生不服,学校当局又以五班学生“倡行革命,着全体一律开除”,这引起全校学生公愤,从而引发了“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即全校有6个班约200名学生愤而集体退学。当时以伍特公为代表的145名学生拒不返校,全部转入由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1868—1940年,著名教育家)及章太炎等创办的爱国学社(1902.12—1903.7)学习。1903年因发生“苏报案”(《苏报》创刊于1896年,爱国学社章士钊曾主笔,因宣传革命,抨击时政,于1903年连同爱国学社被清廷查封),爱国学社停办,伍改入李佳白(1857—1927年,基督教牧师,1882年来华传教)办的尚贤堂(1897年成立于北京,1903年迁沪,教会学术团体)学习英语。1905年入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前身)深造,

^① 本文主要参考书:《上海宗教史》,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民族志》,1997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期间广泛研读伊斯兰教经籍著作,因家贫辍学。1907年进入上海《申报》(即《申江新报》简称,1872年创刊,为英人美查所有)任英文译员,从而接触大量外国伊斯兰教学术文化活动的消息、资料 and 论文,并进行整理研究。1909年上海清真董事会在福佑路清真寺成立,它是近代伊斯兰教新型的管理体制——董事会制,伍任董事。由于他干练有为,学识渊博,担任董事会经理学堂董事,参与创办清真两等小学堂(1909—1917年)工作。1911年4月为响应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伍抱着爱国热情,在革命党人底奇峰(回族,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大总统府印铸局局长)指导下,参与发起组建了反清爱国团体——上海清真商团(当时各行各业组成的商团全市有48个之多),团员多以经营珠玉、古玩业为主,包括文教、卫生界在内的回族青年,初期为70人,后扩充到130余人,伍充任副团长(团长沙善余)。清真商团成立后,提出“回民与汉民休戚相关,患难与共”,各民族联合推翻清王朝的主张。即加入了上海商团的联合统一组织——商团公会,并正式投入光复上海及嗣后一系列的有关战斗中。同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团体发动武昌起义后,在同盟会陈其美等人的领导下,伍同沙善余率清真商团投入了11月3日的上海起义,协同友军、友团占领了上海的东城、北城,接着又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上海起义成功后,又随军赴南京,参加光复南京之役。期间,伍还担任了上海北站和南京下关的兵站后勤工作。清真商团历时年余,在光复上海、南京之役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上海的回族人民争得了荣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巩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受到了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嘉奖,并给每个团员颁发了“中华民国光复”奖章,以资纪念。伍、沙等清真商团的团员们在经受了这次民主革命的洗礼,对他们日后弘扬伊斯兰文化事业,显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1912年末伍应聘兼

任路透社上海分社译员,负责将英文电讯稿译成中文,供中文报刊选用。当代报刊上的一些专用名词如“列宁”、“布尔什维克”、“希特勒”、“罗斯福”、“甘地”、“尼赫鲁”等都出于他的译笔。其间曾赴日本,访问了日本各地,并考察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情况。回国后于1925年6月参与哈德成阿匍等回族有识之士发起成立中国回教学会。研究教义,翻译《古兰经》,兴办伊斯兰文化教育等。同年与沙善余主编会刊《中国回教学会月刊》,该刊以“指导中国回教在宗教上的趋向”,从1926年1月至1929年10月共出版月刊12期,季刊1期,是近代上海穆斯林知识分子创办的第一个伊斯兰文化学术刊物,在国内享有声望。其间曾在会刊上连载了哈德成、沙善余、伍特公三位学者合作汉译的《古兰经》一至三卷(当时共译出五卷)。伍还在会刊上发表了《振兴回教之管见》、《宗教顺时维新说》、《宗教人才与译经》、《精神兴教说》、《明道达变说》等多篇伊斯兰学术论文及译述文章。引证《古兰经》、圣训,阐述了“当知一教兴衰,系乎教育。玉在山而草木润,珠生渊而崖不枯,故我同志苟欲求圣教之发达,必自注重教育,造就人才始”。同时提出了宗教要适应时代潮流的观点。“诠释天经之诰诫,当具新时代之眼光”、“勿以宗教为一成不变之物,墨守旧章”、“此即我所谓顺时维新之义也”。1931年为提倡回民教育,嘉惠贫寒子弟,伍参与创办了上海敦化小学,先后任校董、董事长(校长沙善余),并兼任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国文教员。1939年在担任上海《申报》总主笔时,因发表《回教与抗战》等多篇动员穆斯林抗日救国的社评和抨击日本和南京伪政府的文章,受到敌伪通缉。随后隐居,埋头译经。抗战胜利后,一度在上海《正言报》工作。1947年任法新社译员。同时为上海各新闻单位提供国内外英文报刊重要文章的译稿。上海解放后,伍怀着爱国爱教之情,继续投身于民族、伊斯兰文化事业,深得

上海穆斯林的敬重。1953—1961年间,先后任上海市民政局民族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委员、上海市政法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清真寺管理委员会主任、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少数民族学习分会主任等职。专著有《汉译古兰经第一章译解》,全书约10万字,1941年10月共印2000册分送全国各地。由于中国回教学会拒绝向南京伪政权登记,为避免麻烦,假托香港中国回教学会发行,著者用“道隐”之名。该书在译解《古兰经》首章时,多旁引诸儒学说及运用西方哲学思想阐明伊斯兰教的伦理观、道德观和宗教功修等,指出人类生活有三大阶段,即欲物生活阶段、道德生活阶段、灵性生活阶段,提出了伊斯兰教敬主爱人、行善止恶、自爱自重、纯洁灵魂等观点,并作了详尽的论述,有助于人们了解伊斯兰文化的真谛。

伍特公先生1961年在上海逝世。

〔张志诚〕

沙彦楷^①

沙彦楷(1875—1970年),中国现代法学家、社会活动家、穆斯林知名人士。字武曾,号伯躬,晚年更名为睿(慎的古体字)。民盟盟员。1875年7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周铁桥镇。祖籍西北(地区不详),因清政府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祖父燮和携眷迁居内地,落户宜兴,行医为生。沙幼读私塾,勤学好问。父安节,教子严,常亲自陪其讲读至深夜。1900年考取秀才,翌年中举人。1907年入京师法律学堂,研读法学。1910年毕业后纳款候补浙江监使。1911年辛亥革命后,先后任江苏省第一高等审判分庭推事、民事庭长、北京地方审判厅推事,兼署民事庭长。1918年2月调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1919年12月兼任庭长。1920年任国会议员。1923年国会选举大总统时,直系曹锟以五千元一票的高价购买国会议员,世称“贿选总统”。沙为反对曹锟贿选总统,毅然挂冠,取道上海回到家乡,受到周铁镇乡民的盛大欢迎,满街贴着“反对曹锟贿选”、“欢迎沙彦楷胜利归来”等标语。1924年沙到了上海,翌年同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1875—1963年)合作建立上海律师事务所,执行律师业务,以保障人权。期间凭他的社会影响为家乡兴办公立宜兴中学而热心奔走,筹措经费、建筑校舍,组建校董会,任董事。还专程从无锡请来老教育家胡雨人出任校长。1924年夏,宜兴中学开学后,他每年专程由上海赶来参加校董会,研究学校规划,处理校务事宜等。1931年秋,宜兴中学停办,改为省立

^① 本文主要参考书:1981年12月《宜兴文史资料》第一辑“沙彦楷先生传记”;《上海民族志》,1997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农业学校。1936年11月蒋介石政府下令逮捕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位上海各界联合会爱国领袖,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沙以律师身份,不畏强暴,亲赴苏州探监,参加营救工作,要求即日开释,“以慰群情,共赴国难”。抗战军兴,上海沦陷,沙不为日伪高官厚禄所动,决然回乡,著述立说,过着清贫的隐居生活。他七十岁自述诗云:“岁寒共饱冬心菜,何恨何求更愠穷。”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重操旧业。期间同当时在沪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多次会晤,从此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开始参加民社党(即抗战胜利后国社党与民主党合并,宣称为中国民主社会党),因该党投靠国民党政府,故沙另组建民社党革命委员会,任副主席、主席职,后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前身)任中央委员。解放前夕,响应中国共产党筹组人民政协号召,与各爱国民主党派发表共同声明,声讨蒋介石。1949年9月以特邀身份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出席开国大典。1957年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单独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沙积极从事司法与民族、伊斯兰教工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顾问,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全国政协一、二、三、四届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市三、四、五届人民代表,上海市回民文化协进会主任,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主任。1958年以八十四岁高龄亲赴太湖,考察南江入湖故道,并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1959年4月沙将珍藏多年的明代运河全图一卷捐献给国家,图中关于运河水流,以及沿河通航设施等均有详细记载,极有参考价值,受到中央交通部的嘉奖。主要著作有:研究水利的专论《三江四考》、《南江入太湖故道考》;文史研究著作:《陶渊明集注补证》、《洪亮吉传》、《杂忆曹锟贿选》;还有

书法篆刻著述《迟翁论书》10篇、《霜鸣室金石考跋》等。沙擅长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为武进县志的总纂。

1970年,沙彦楷以九十五岁高龄逝世。

〔张志诚〕

傅统先^①

傅统先(1910—1985年),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教育学家、穆斯林学者。穆斯林名麦斯欧德(意为吉庆幸福)。祖籍云南潞江人,生于湖南常德。祖上世代信奉伊斯兰教。小学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初中就读于省立第二中学。自幼家境清苦,初中毕业后,带着母亲节衣缩食而积蓄的50元,只身赴上海投考高中。他以优异成绩进入民立中学高中,时年十五岁。为节省费用,寄居在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内,日间到校上课,早、晚均在清真寺内礼拜,聆听伊玛目(教长)宣讲教义,并经常随哈德成阿訇习读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籍。后转学圣约翰大学(教会学校)附属高中。毕业后直升圣约翰大学,主修哲学,辅修教育学。1929年6月,同回族青年鲁忠辅、陆昌洪一起创办伊斯兰文化社团——上海回教青年研究社(1929—1933年),由哈德成、达浦生、哈少夫为研究社指导员。宗旨是:宣扬宗教,发扬教义,注重青年道德之培养,唤起教友团结精神。入社社员有100多名。主编社刊《回教青年月报》(1932年停刊,共出版12期)。1931年傅时年二十一岁时,就在全国性伊斯兰教刊物《月华》(北平出版)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追求中的真宰》(约四万字),这是中国回族学者首次运用黑格尔哲学思想,探讨伊斯兰教苏非主义之作。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这时在我头脑里印象最深的是回教学者刘介廉的《天方典理》和《天方性理》两书,说明伊斯兰教所信仰的上帝是无形象、无方所、无所

^① 本文主要参考书:1982年《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记丛书)第1辑,傅统先《我的思想发展过程》;1992年《上海宗教史》。

不在、无所不能的。于是我的思想中便种下了泛神论的种子。……我的一篇《追求中的真宰》的文章,说明真宰是在整个世界的一切事物中,在全部自然界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1932年从圣约翰大学哲学系毕业,期间完成了长达20余万字的哲学著作《认识论》一书,引起国内外哲学界的重视,应邀出席了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宣读题为《知识的组织》的论文,阐述了人类的认识活动乃是一种完整的连续发展的过程。嗣后在家养病三年,期间他参加了1932年10月上海穆斯林反对北新书局及《南华文艺》侮教事件的斗争。1933年与鲁忠翔、王义等回民青年创办了上海穆斯林刊物《改造》,以宣传伊斯兰文化。“鉴于中国回教文化低落,学术空气暗淡”,于1934年又同鲁忠翔、马天英、王义等回族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组织伊斯兰文化学术团体——中国回教文化协会,任常务理事(协会总干事为鲁忠翔),并编辑出版《中国回教文化丛书》、举办回民职业补习学校(傅任教务主任)。同时在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授课。1935年夏,在国立暨南大学附设实验学校任副主任。1937年2月应中国文化史丛书之约,致力于《中国回教史》的编写任务。同年7月完稿,书成后“哈德成教长、沙善余先生于盛夏代为审定原稿”,1940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书约10万字,由7章50节组成,体例“按代编制”,从中国伊斯兰教史实际出发,对我国各个时期的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及穆斯林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贡献,均作了详尽的阐述,是一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重要参考书。“七·七”事变后,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其从教的实验学校解体,傅到正风文学院任英文教授。自1938年至1941年间,同时兼任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东吴法学院、圣约翰大学等校教授,讲授哲学、教育学和逻辑学等课程。“当时为生计所迫,整日奔走于各校之间,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宣讲爱国主义,唤

起青年发扬民族主义精神。曾接到日伪特务机关的恐吓信,说我在各校的言论是‘危害党国,小心自己的生命危在旦夕’。”自此以后,辞去各校兼职,迁居于圣约翰大学校园内,一方面担任哲学史、教育原理、教育哲学之类课程,一方面在职进修,专研教育哲学。1942年获圣约翰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被聘为教育系主任兼哲学教授。他在一篇论文中说:“这时我的思想开始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向实用主义和实在主义”。课堂上除讲述应用主义教育思想外“还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并介绍苏联的教育科学”。1948年8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哲学,旁听教育心理学。1949年夏再次获文学硕士学位。之后进研究生院专攻哲学,1950年夏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回国,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2年结业后,赴山东师范学院任教,翌年出任教育系主任,并当选为山东省政协委员、常委。“文化大革命”后期,因病回到上海治病疗养。1979年春出席北京的全国教育规划会议,在成立中国教育学会时被选为常务理事,兼任《教育研究》杂志编辑委员、山东省教育学会名誉主席。1980年8月24日至28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以私人名义出席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教育专家会议,讨论普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在其古稀之年,除带研究生外还受教育部委托编写教育哲学的教科书,“愿为教育科学的理论建设竭尽绵薄”。傅勤于著述,撰写专著、译著共20多部,专著有:《认识论纲要》(1933年)、《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1936年)、《美学纲要》(1939年)、《哲学与人生》(1945年)、《儿童品德教育讲话》(1954年)、《教学方法讲论》(1954年)、《怎样教育子女》(1957年)等。译著有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1937年)、怀特海《生命与自然》、亨利《唯心哲学》(1941年)、杜威《经验与自然》(1960年)、培里《现代哲学倾向》

(1962年)、杜威《自由与文化》(1964年)、《人的问题》(1965年)、《确定性的寻求》(1966年)等。论文近百篇,是一位多产的爱国爱教的中国穆斯林学者。

傅统先先生 1985 年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张志诚〕

六 马观政^①

马观政(1837—1938年),字敏斋。出生在昆明一个回族“书香门第”家庭。是享年一百零一岁的高寿老人。老人远祖是中亚人,元初随赛典赤·赡思丁来华,累世居官。明代在朱元璋军中任职的马协、马铎弟兄即老人先祖。明初论功行赏,马铎分地昆明北郊马村、茨坝一带,马协分地黑龙江(昆明近郊)。马观政自幼饱读儒家经史,青年时准备应试科举,但当时正值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太平天国革命和云南回民反清起义时期,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了这场革命。云南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民大起义失败,清政府对起义的回族人民大屠杀时,马观政在汉族群众的掩护下,侥幸从屠刀下逃亡,他颠沛流离,目睹这场浩劫,痛心疾首,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挥笔撰写了《咸同滇垣十四年大祸记》一稿,记载昆明丙辰之变(1856—1870年)的始末,于1930年在云南《清真铎报》上披露,为后世留下一份极为珍贵的史料。《大祸记》一针见血地揭露清统治者“横生种族之见,大逞杀戮之欲”,集中反映在回、汉人民对安南州(今双柏)石羊厂银矿的争夺上。清官府“不持公平解决”,而是“见临人(汉)势强,则召临人以杀回人,见回人势强,又使回人以杀临人”,其险恶用心在于“暗中挑拨,意在两伤”,“丙辰之变”就是清政府一贯实行这种反动政策的结果。回民遭屠杀向官府痛陈受害惨状,要求伸雪,制止暴行,官府反说“回民聚省,意图报复”,接着“三院司道”密室策划,

^① 本文材料来源:《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云南回族先哲马观政先生”和《云南回族史》。

由云南巡抚舒兴阿与团练大臣黄琮会衔颁布决议,通令“灭回”。飭令各府、厅、州、县对回民“格杀勿论”,快马飞递“滚单”,“横直剿灭八百里”。全省回民惨遭杀戮的惨状一幅幅留于纸上,而将清政府“灭回”官绅永远钉上历史耻辱柱。《大祸记》中还鞭挞了清官吏刽子手岑毓英的卑劣行径。此人阴险狠毒,惯于玩弄两面派手法,在回民起义中他残酷屠杀,而当回军占领昆明,他立即见风转舵,头缠白巾,手捧“天经”(《古兰经》),伪装皈依伊斯兰教,向回军诈降,摇尾乞怜。当时以马荣为首的回军将领,早已洞悉其奸,竭力主张杀此丑类,以安人心。这个跳梁小丑为了活命,甚至拜认马复初为“义父”,以求庇护。同时一手策划,派人劫持马复初,硬推上“护理云贵总督”宝座。曾几何时,狼子野心,其后又罗织“莫须有”罪名,将其“义父”——八十一岁高龄的回族经学大师加以杀害。

马观政不畏权势,为回族人民清理“绝业”。“丙辰之变”,昆明回族几被杀绝,回民房屋田产官方宣布为“逆产”,被没收或为官绅侵吞。事后侥幸逃脱归来的回民满目凄凉,无家可归,而且勉强住下的回族群众迫切需要清真寺进行宗教生活,为子女提供学习伊斯兰经文、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机会。清朝统治者镇压回民起义后,为缓和矛盾而成立了“善后总局”,招抚逃亡者。马观政在马如龙调任“湖南提督”之前,被委派负责清理“绝业”,任务艰巨,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挺身而出,以“苦主”回族受害者遗族身份,罗列省城回族原有房地产清单,向“善后总局”及官绅申请,要求如数发还作为回族公产,以祭祀先灵和教养子遗。老人不辞辛苦,忍辱负重,日夜奔走于昆明县衙门、官绅府、审判厅之间。他常说:“公产的每一块瓦片上都站着一个‘鲁哈’(亡灵),死者长逝,生者任重道远。”在他的努力下终于为昆明回族大众要回数量可观的房地产。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回族群众的迫切要求和老人的支持下,在

废墟上重建了南城清真寺,其后又陆续重建了永宁寺、顺城寺,以及呈贡、晋宁、嵩江、宜良等县清真寺,为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发扬民族文化、培养宗教人才创造了条件。由于老人的倡议,当时还在南城外蜈蚣岭修建“丙辰之变”回族殉难者骨骸的“万人冢”公墓,后又迁葬于西门外麻园,并由回族“社会贤达”——陆军中将署云南盐运使马聪(伯安)撰写“清咸丰丙辰回教殉难先烈瘞骨所”碑文。还经老人倡议,公众赞成,将每年农历四月十七日规定为“亡人节”,是日在各清真寺恭诵《古兰经》,并到麻园“万人冢”扫墓悼念遇难者,还在南城清真寺举行群众集会,老人生前每年照例登台讲演,以亲身所见勉励大众牢记历史教训,强调与汉族人民和睦相处,各行其教,互相尊重。

马观政老人志在振学,鞠躬尽瘁。老人目睹广大回族人民劫难后处于“贫”和“愚”的状态,要振兴民族,治贫必先治愚。在辛亥革命后,云南继北京之后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回族中一些有识之士一致认为:鉴于回族的落后状况,需先从振兴教育入手,提高回族人民文化教育水平。于是在俱进会滇支部成立了“振学社”,马观政担任社长,马凤生任副社长。他们整理和出版了云南先贤马注、马复初、马联元等大量阿拉伯文、汉文译著及其他的著作。1872年清军攻陷大理后大量烧杀,“大元帅杜镌”的“宝命真经”木刻版荡然无存。为了适应全省穆斯林的迫切需要,在马联元的倡导和主持下进行了《古兰经》的木刻版雕刻,雕刻完成后由“振学社”大量印刷,云南木刻版《古兰经》颇具中国阿拉伯文传统书法的特色,至今全部刻版仍保存在昆明南城清真寺内,是中国伊斯兰教珍贵的文化遗产。二是开办学校,最初开办“清真义学”,在回族青少年中扫除文盲,打下普及教育的基础。1920年左右成立振学社高等经书并授学校,除学阿拉伯文经典外,兼习汉语和历

史,以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在中国经堂教育史上是一项重大改革。在滇支部振学社领导下,1926年秋季成立明德小学部,1928年成立中学部,已是新型的“国民小学”性质。同年将“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改为“明德中学阿文专修部”。三是培养人材,在三十年代云南向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选派了马坚、纳忠、张子仁、林仲明以及林兴华、纳训、马兴周等留学生,为云南培养人材,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学术文化交流作出贡献。据纳忠教授回忆:1931年11月,沙儒诚和他们留学生离昆出国时,马观政老人不顾年事已高和家人劝阻,亲往滇越车站送行,一一握手叮咛为圣教珍重,寄以厚望,深深感动每个学子。

顾全大局,消除隐患。数百年来云南穆斯林都是按“格迪目”传统教规行事,虽然在通海、华宁、开远、弥勒一带有“哲赫林耶”的教派,但两派都互相尊重和和睦相处。1928年前后由甘肃学习回云南的少数几位阿訇,在他们任教的地区传播“伊赫瓦尼”教派的观点,引起阿訇间的不和。为了避免造成内部分裂,影响阿訇的团结和正常的宗教活动,马观政老人积极建议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于1928年初召开全省教务会议。两派出席代表一百多人,集中昆明南城清真寺,代表都是全省著名经师和知名人士,在马观政主持下,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精神,各自阐明观点,就某些分歧进行辩论和探讨,最后一致认为双方在基本信仰及实践方面符合《古兰经》和《圣训》原则,只是个别宗教仪式和习俗有不同,应该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各行其是,加强伊斯兰教内部的团结。马观政还委托沙平安哈吉将会议纪要及各派观点译成阿拉伯文,致函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征询意见。当时爱大校长穆罗威耶曾复信说:“你们应当团结一致地把安拉的绳索抓紧,不要分裂,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从此两派阿訇的争议停止,长期和平共处,互不干涉。

马观政老人以民族利益为重,用心良苦,防患于无形,树立解决教派纷争的榜样,供后人借鉴。

马观政老人毕生致力于云南回族公益,争公产不遗余力,公而忘私,不治家产,昆明仅有祖遗平房数间。马如龙深悉老人清贫,曾委以新兴州(玉溪)“厘金总办”,可大饱私囊,老人谢绝不往,甘于淡泊,以一生尽瘁桑梓公益,改善回汉关系,赢得社会普遍赞扬和尊敬。被誉为滇中“八大名士”之一,与袁家谷、赵藩、陈荣昌、李根源等并列,实是云南回族人民的光荣。

[马维良]

马 聪^①

马聪(1886—1961年),字伯安。昆明人。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1961年病逝,享年七十五岁。自幼孤苦,家境贫寒,靠母亲马氏敦厚勤劳,持家严谨,含辛茹苦度日。马聪自幼勤奋好学。青年时考入云南武备学校,毕业后先后在唐继尧、龙云主政时期,历任军政要职,授陆军中将。其间于1915年任团长,1916年至1918年任旅长,1923年至1929年任云南省政府委员兼军政厅长,代理云南督军兼云南盐运使,并出任过第十路军总指挥参谋长,1941年至1944年任云南军区副司令。1947年当选“国大代表”。1949年参加云南和平起义后,曾任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省政协委员、云南省人民代表。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后,云南人民立即发动了辛亥光复起义。马聪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忧国忧民,追求救国济民的真理,深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之大义,毅然投身于辛亥革命斗争中。云南辛亥“重九起义”时,他与唐继尧受命围攻督署,亲率七十四标第一营猛攻总督衙门,为推翻清朝专制统治,为云南光复立下战功。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马聪深受启发。不久革命果实被帝国主义扶持下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恢复帝制,全国愤慨!云南发动了“护国运动”,1915年12月25日在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的推动下首倡义旗,宣布云南独立、拥护共

^① 本文材料来自《云南回族史》;纳忠明、马云达《爱国民主人士马伯安先生》,载《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四)。

和。马聪坚信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积极参加了护国运动。起义前夕,他参加了在五华山将军署礼堂的秘密会议,与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罗佩金等歃血盟誓,共定义举,打响了“护国运动”讨袁的第一枪。护国军入川讨伐袁世凯,他任第一混成旅旅长,率部与北洋军英勇激战,后驻四川宜宾,任自贡警备区卫戍司令。护国告捷,川局平定,返滇后任督军署总参谋长等职。他在《云南护国首义三十周年纪念感言》一文中说:“有辛亥之革命推翻专制,而后有中华民国之诞生,有云南首义拥护共和,而不绝如缕之中华民国寿命幸不中断。由是北伐统一获得成功,进与世界反侵略之民主国家并肩携手将法西斯帝国主义根本摧毁,使近百年来受制屈服于强权下之中国,成为独立自主之国。”可见他时刻都以报效国家、振兴民族为己任,为之奋斗终生。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举国上下奋起抗战,昆明成为坚强的抗日后方。马聪目睹日寇侵略,山河破碎,痛心疾首,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集满腔仇恨于笔端,挥毫写下“还我河山”璀璨夺目的四个大字,巍巍镌刻在昆明市中心的近日楼墙上,它显示着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坚贞不移的民族气节,激励着人们同仇敌忾、驱逐日寇、保卫祖国的决心。西安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不断高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才迫于民意出兵抗日,但是又不全力以赴,内部矛盾重重,互相倾轧,地方势力,各存戒心,以致抗战节节败退,大片河山沦为敌手。马聪目睹现状,感慨激愤不已。在这期间写下了许多痛砭时弊的诗篇。如:“空谈卫国弃边防,御侮谁人死战场。灞上戍军儿戏事,危亡无计系苍桑。”“聚敛术工民以穷,横流溃决遍西东。人心久已无是非,正义何曾有佞忠。”“铸成大错谁尸咎,竖子原来未足谋。太息贾生空陨涕,何如击楫复神州。”“纷纭聚讼袭毛皮,郑王当权事可知。屠狗功名成乱

世,谁从燕市觅奇儿。”从这几首诗中可以看出马聪对蒋介石的所谓抗日愤懑不平、忧国忧民、报国无门的慨叹。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实行一党独裁政治,阴谋策划内战,引起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和反抗。当时誉为“民主堡垒”的昆明,民主运动远空前高涨,素称“护国元老”的马聪走出书斋,勇敢地投入民主运动中。他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为了声援和支持中共争取和平民主的正义主张,他出面邀请在昆的回族民主人士、云南大学回教同学会以及回教协会方面的人士,集中于正义路清真寺并主持召开时事座谈会,当即决定拟就反对内战、争取和平问题发出通电,通电内容在取得中共地下党的同意和支持后,就向全国发表了“云南回族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建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及平等普选”的通电。在这段时间里马聪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与中共地下党领导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杨杰将军、李公朴、闻一多、罗隆基、吴晗、唐用九、杨青田、马曜、张天放等往来结为好友,在家中秘密举行“双周座谈会”。1945年11月25日昆明学生举行时事晚会,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实行民主,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一”学生运动,马聪闻讯义愤填膺。全昆明市人民为“一二·一”殉难四烈士举哀时,马聪亲拟“正义犹存,尽有公论,是非所在谁能掩”、“庸人自扰,竟成惨剧,国事如斯死不瞑”的挽联,并沉痛向烈士致哀、悼念!他参加集会、率先签名抗议反动派罪行。1948年6月17日昆明学生举行“反美扶日”示威大游行,马聪与省参议会王义仁等四位参议员发表声明,支持学生正义行动。1948年7月15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反饥饿、反迫害”示威游行,遭反动军警镇压,昆明各界人士秦光玉、马伯安等二百三十多人上书卢汉和警备司令何绍周,指出“昆明学生反美扶日,要求民主运

动,系激于爱国热忱”,要求当局“对业经被捕学生从速释放”。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妄想作最后挣扎,加紧了对中共地下党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镇压,1949年4月15日云南省参议会邀请在昆“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及各界人士座谈,作为云南回教救国协会领导人的马伯安,代表云南回族及各界绅商发言,坚决反对国民党准备将云南变为最后战场,以免继续涂炭生灵,反对将“五三兵工厂”机器拆卸运往台湾,反对国民党在云南征兵征粮等,为此国民党借“九九整肃”逮捕了马伯安、张天放、杨青田、李群杰等,及部分参议员。特务头子毛人凤、沈醉设法庭亲自审讯,判处马伯安等人死刑,在准备解往重庆执行之际而获营救。马伯安等人在狱中和法庭上慷慨陈词,怒斥敌人的英勇形象,深为人们钦佩。

1949年马伯安积极参加了云南和平起义,作了贡献。全国解放后,他任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他积极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1950年曾率云南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任团长,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在京期间朱德总司令电话邀请马聪到中海寓所,畅叙旧谊。朱总来云南视察,又邀请马聪及在滇的老友故旧欢宴畅谈。

马伯安还是云南现代著名作家和诗人。他一生勤奋自学,即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亦从不懈怠。留下的遗著有《伯安吟草》、《雪泥鸿爪》等。此外,还作过一些序跋碑记,较著名者有《回民万人坑碑记》、《何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始末记序》。其书法刚健有力,功底深厚,诗作工整,格律严谨,内容大多是为时为事而作,风骨凛然,有较浓的政治色彩。伯安先生嗜书成癖,终生藏书甚多,往往不惜巨资,搜集古今典籍。他治学严谨,尤其在治史方面,态度严肃,求实求真,征信可靠,不囿成说,但不固执己见,喜纳众家之长,

在治学方面值得后人学习。

〔马维良〕

白耀明^①

白耀明(1894—1965年),字亮诚,号孟愚,笔名莲文。云南省个旧市沙甸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9月9日,1965年8月6日逝世于泰国密赛,享年七十一岁。白亮诚出身于将门家庭,父亲白金柱为清末名将,官至云南省开化镇总兵,记名提督,封建威将军。兄弟三人,大哥耀龙、二哥耀贤均在清军中任职,白亮诚属三弟。他幼读家塾,学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青年时入云南政法学校学习,接受新式教育,思想开朗,立志改革创新。同时还受伊斯兰文化教育,在清真寺攻读阿拉伯文,研读过王岱舆的《正教真铨》《清真大学》、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及马德新的译著。善诗书、爱书法、喜古乐、好武术、通阿文。一生致力于民族教育,善于把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传统结合,为云南回族教育、回族人才培养和伊斯兰文化振兴,作出重要贡献;为振兴云南经济,开发西双版纳茶叶和实业,作出了卓越的成绩,成为人们敬仰的教育家、实业家。

白亮诚重视国民教育,改革经堂教育。沙甸清朝时有“鱼峰书院”,清末为沙甸学堂,民国初年提倡新学,为了适应潮流,1914年白亮诚把原沙甸学堂改为沙甸小学,并从昆明聘请李伯芳先生到校主持校务,开讲新学。1921年与白亮诚一起筹资扩建新校舍,1923年8月新校舍落成时,改名为“鱼峰小学”,白亮诚任校长,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使学校人才辈出,在数批毕业生中鼓励他们到省城昆明或附近的蒙自、个旧、建水、开远县报考中学和中专,使许

^① 本文材料来自《云南回族史》和《沙甸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书。

多学子进入昆明明德中学和各县中学。马坚教授就是由该校第一批毕业生考取明德中学。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庆祝鱼峰小学成立15周年校庆运动会上,白亮诚为学校题写的两副对联:“三载英雄辈出,十八年纪念重开”,“鱼峰学子进步蒸蒸日上,桑梓人才思想节节更新”就是真实的写照。1943年3月他受家乡父老之托,倡办私立“鱼峰中学”,任学校董事长,从昆明聘请中法大学的夏康农教授任校长,同济大学的曹礼吾教授任教导主任,北大教授郑昕及夫人等十余位教师和西南联大学生若干名到校任教,聘请留埃归国的马坚教授讲授阿拉伯文。学校招收过三届(每届一班)学生。1945年8月抗战胜利,夏康农教授和西南联大学生返回昆明,因师资不足,中学被迫停办。鱼峰中学虽然只办了两年半,但由于聘请了一批知名教授任教,为沙甸培养了一批人才。

为了继承和发扬伊斯兰文化优良传统,白亮诚主张改革传统的经堂教育中只讲阿文,不讲汉文,只重强记硬背,忽视灵活掌握知识,忽视阿语语法、修辞学的弊病。1929年初他在地方上的阿訇和知名人士的支持下,改革经堂教育,在沙甸大清真寺挂牌成立“沙甸中阿学校”,并开办了一个经堂教育改革试验班,以中阿并授培养更多的经书两通人才。他在当年《清真铎报》上撰文《沙甸成立中阿学校宣言》(署名莲文),详细阐述他的改革主张,指出中文与阿文脱节不能并授于学生,是中国伊斯兰文化裹足不前,发展缓慢的弊端,其成立经书并授学校,即在扫除此种障碍。其深远意义是:“经书一贯之后,将圣道中真理奥道,一一译出贡献于吾国人,以变易我国人轻视伊斯兰的心理,并灌输教中精义于吾教友心胸,使教友人人知道尽个人义务责任。”其改革经堂教育具有很强的时代感。为了办好沙甸中阿学校,他出面聘请有真才实学、主张中阿并授的王少美阿訇主持教学并主讲《伟嘎耶》,经书两通的马占魁、

纳廷相、林子和、王真良、林仲书教授国文、古文选和阿文《门特希格》、《古兰经》等课程,使用中阿对照新教材。他把家里的一座水碾房和近百亩的莲花池田(年收入可达七八千元)捐赠给清真寺作为办学经费。1940年又在沙甸创办“养正学校”,实施中阿并授新式教育,学校一年所需经费约合银五千余元,全部由他负责。由于中阿学校办得好,吸引着省内外学生千里迢迢,负笈求学,为宏扬伊斯兰文化培养了一批经书两通人才。白亮诚还在昆明参与了“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的领导工作,与马观政、沙平安等人发起成立了“振学社”,为振兴全省回族教育、研究伊斯兰教义、翻译经典、发行经书等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20年起他们发起开办“高等中阿并授学校”,这是一所包括中小学和阿文专修三个部分的回族学校,即1926年将几个清真寺回民小学合并为“明德小学”,1929年秋从高等中阿并授学校第三班起改为私立明德中学。使私立明德学校成为包括普通中学、小学和阿文专修的学校。三十年代我国先后选派六批回族学生三十三人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云南学生就有十人,其中马坚、林兴华、林兴智、张学仁、林仲明五人 是沙甸人。1929年初“回教俱进会滇支部”成立宣传处,白亮诚任处长,他主持创办了《清真铎报》并带头写稿。马坚、纳忠、白寿彝、马会云、马之驹、沙德珍、纳忠明、纳训等先后担任过该报主编。该报刊行15年共出刊72期,发行2000余份,内容丰富,为宣传抗日战争、伊斯兰文化和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振学社为澄清咸同年回民反清起义真相,发扬革命传统,教育后代,发起了广泛征集云南回民反清起义史料,仅白亮诚就为白寿彝编撰的《回民起义》一二卷提供了《建水回民檄文》、《滇西变乱小史》、《滇垣十四年大祸记》(均为白孟愚抄本),马安礼撰写的《滇南回回总掌教马公墓志》、《杜文秀统属职官题名录》六篇。

开发边疆创办西双版纳茶叶业,又是白亮诚一大贡献。1931年他被省政府派到思茅普洱一带负责盐务和税收工作,深感开发边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的必要,于1935年到车里(景洪)、佛海(勐海)、南峇(勐遮)考察茶、矿、农业生产,1936年至1937年先后到滇西探矿,还到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河南、山东、河北、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23个省市考察。又到日本考察茶叶及农业栽培技术,还到西北各回族聚居省市考察民族风土人情、农业技术。回云南后结合边疆情况进行研究,提出了开发计划,报经云南省财政厅同意,成立“边疆实业公司”和“云南思普企业局”并出任经理(称总办)。1938年在西双版纳的勐海成立“思普茶叶试验场”,从家乡沙甸和滇南回族村招收了数百名青年到企业局工作,他带领这批回族青年在人烟稀少,瘴气毒烈,蟒蛇遍地,猛兽常出的原始森林安营扎寨,开荒种茶,在短短的几年内建成了初具规模,以茶叶为主的综合性企业,有南糯山制茶厂、南峇农场、南糯山农场和佛海总场。为了制好高级茶,从印度购进英国机器,采用梯台地栽茶,实行科学采摘和管理,实行种植、制作、运输、销售一条龙的生产经营体制,仅三年就生产出机制红茶、绿茶畅销国内外。这是云南第一次生产红茶。为了建设农场,把草木丛生、荒芜的土地上开沟引水变成良田,栽种甘蔗、水稻、蔬菜,并采用新式农具和先进技术增加生产。烧砖建盖新式厂房,建立纺织厂生产纱线和粗布,设立职工医院,开辟职工球场、娱乐场等。现代医院还为傣族群众看病。还办了小学校招收培养傣族学生。抗日战争后期日寇侵入缅甸,1943年日军占领我接近缅甸的佛海打洛江南岸的打洛等村寨,企图入侵昆明。为抗击日寇,白亮诚组织了由企业局职工组成的“回民抗日游击队”,配合当地国民党第5军93师抗击日军,几次与该部配合打击了日军的侵扰,为边区抗日作了贡

献。思普企业局 1954 年为人民政府接管,白亮诚出国定居缅甸、泰国从事著述。先后整理出日本、大西北、滇西等考察记,还有伊斯兰方面的《朝觐南针》、《拜功浅识》等著作。

总之,白亮诚一生为振兴民族教育,宏扬伊斯兰文化,振兴云南经济、开发边疆,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深受人们敬仰。

〔马维良〕

沙国珍^①

沙国珍(1884—1970年),字儒诚,别号又新,云南昆明人。幼年受传统伊斯兰家庭环境的熏陶,在家学习阿拉伯文和英文,七岁时攻读古代汉语。1917年毕业于香港圣保罗英语学校;曾先后在云南省立第四师范和普洱中学任英语教员。1928年毕业于埃及开罗美国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29年任私立明德中学校长,同时兼任云南省立第一中学高中部英语课教师。为培养阿拉伯语人才,以适应国家的需要,1931年明德中学由其牵头出面致函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请求接纳中国云南留学生赴埃学习;不久,爱大复函同意选派云南穆斯林有志青年十名入学,从而开辟了中国留学生赴埃及学习的渠道。同年11月,云南回教俱进会派其率马坚、纳忠、张有成、林仲明四人赴埃及学习,成为中国伊斯兰教育史上的大事。

到达埃及后,沙国珍看到凡进入爱资哈尔大学的各国留学生均有自己的学生组织,遂向校方申请成立“中国留学生部”,以团结同学,砥砺前行。此后不久,蒙爱资哈尔大学最高校务会议批准,成立中国留学生部,聘请沙国珍先生为部长。据埃及教育总署致中国回教各团体和学校的有关函文说:“中国云南明德中学指导主任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姆·沙国珍,迭次请求成立中国回教留埃学生部于爱资哈尔大学一事,兹经本署决议,准如所请,于1933年5

^① 本文参考资料: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修订本),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沙非亚《缅怀沙国珍先生》,载《穆斯林青年汇编》,云南省伊斯兰教协会编,1997年油印本。

月1日正式成立。并经决议,聘请台端(国珍)为部长,请即就职,幸勿见延……”。自此,凡中国留学生一律向本部请领津贴,学生部负管理指导中国学生之责任。中国学生部的成立,取得了与其它国家留埃学生的同等待遇,为沟通中埃文化交流、培养中国阿语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先后共选送出四批留埃学生二十余人,学成回国后他们分别从事教学、翻译等工作;几经传习,如今全国通悉阿拉伯语的人才已达两千人,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南洋群岛为中心的海外华侨,在著名爱国人士陈嘉庚倡导下成立“海外华侨救国会”,总会设于新加坡;各国成立有分支会,声援中国抗战,反对日本侵略。埃及华侨和留埃学生积极响应号召,联合成立救国支会,沙国珍当选为会长,组织人力从事宣传活动,进行反对日本侵华暴行的演讲,并撰写文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散布的谎言,由此赢得了阿拉伯国家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1939年1月,沙国珍先生由埃及回国。同年4月到重庆,参加第二期国民政府中央训练团受训一个月,毕业后留校任第三期教官;随后被派往缅甸视察侨务,任“海外视察专员”;在此期间,他进入北腊戍访问民众,宣传抗日,先后到达上、下缅甸的三十多个大中城市,约计两年之久,曾用英语或华语发表许多演说、评论,深受海外华人和缅甸各界人士的赞同及支持,密切了国际间的抗日合作,对于顺利开辟滇缅公路国际运输线的畅通,保持前方抗日物资的补给起了重要促进作用。他将其经历作了详细记录,著有《滇缅视察录》。1944年,滇西大反攻开始,中国政府组成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沙国珍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第六军高参,负责组织“海外战地工作队”,招收通晓缅、泰、印度语的归国回族青年百余人,以

便随军出国任军中译员,为确保反攻的最后胜利做出积极的贡献。

1947年,沙国珍先后在昆明出任中央教育转训班讲师、私立明德中学校长、五华中学高中部英语教师,并兼任元谋县张二村回民中学名誉校长。1948年至1950年,在玉溪县大营创办回民培德女子学校,培养出一批德才兼备的学生,他们中有的至今仍在回民村庄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沙国珍更名沙又新,为政府做了许多工作。1950年开始,他常下到通海、峨山等地清真寺宣讲教义,宣传拥护中国共产党,宣传爱国爱教,做一个虔诚的穆民;曾出席玉溪县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常务委员,并出席过云南省第一届第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之一。1951年7月,他出席玉溪专区第一届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当选为副主席兼秘书长,同年又出席云南省第一届第二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8年昆明市政协通知他参加社会民主人士组学习,后被聘为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特约撰稿员、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

沙国珍一生清廉公正,生活简朴,待人诚恳,业余爱好书法国画,为国家和民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望。

〔马兴东〕

七 马连良

马连良(1901—1966年),字温如,北京人。其父马西园为京剧票友,所开茶馆,实为京剧票房。马连良自小受到京剧熏陶,由于酷爱京剧,马连良于光绪三十四年末(1909年)进入喜连成科班,归入连字科,从此马连良一名伴其终生。

入科后受业于叶春善、肖长华、蔡荣贵等先生。初时学习武生,后改学老生。九岁开始登台,很快便演上主戏。最初宗谭(鑫培)派,演出时常冠以“谭派须生”头衔。后来私淑著名做工老生贾洪林,以其表演潇洒自如,善于塑造个性、抒发情感而有“小洪林”之称。

1917年马连良在富连成完成学业,经其三叔京剧演员马昆山动员,便去福州、上海一试锋芒。一年多实践之后,又返回北京。马连良不以小成自喜,高瞻远瞩,决定二次入科。三年坐科期间,他广泛师承,开拓戏路,又在舞台上扮演多种角色。主角、配角,甚而扮演龙套都刻苦用心,从而艺业大进,已是京城名角之一。1921年年底,马连良再次从富连成出科,从此便在京剧舞台上奉献一生。他不仅把生行艺术推向巅峰,而且作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体系的缔造者之一,成为中国戏曲文化最为杰出的大师和代表。

先到上海,再次叫响。返京之后,已是真正头牌老生。先是和许多名家朱琴心、尚小云等人合作,直到1927年独自挑班。老剧目,他别有生发,新剧目,锐意独创。马连良有了自己的剧目,并在唱、念、作、打诸方面广采博收,又独出机杼,终于有了个人艺术风格。马派艺术在逐渐形成过程中,也逐渐为南北广大观众所认同。

二十年代时,马连良与余叔岩、高庆奎三人被誉称为京剧三大

贤。三十年代以来四大须生,先是余(叔岩)、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后为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与此同时还有南麒、北马之称,专指南方麒麟童(周信芳)、北方马连良。总之马连良自二十年代以来,盛誉不衰,一直成为中国京剧艺术的中流砥柱。

南麒、北马,代表了京剧发展过程中因区域文化背景不同,所形成的南北两大京剧派别。南派以上海为核心,又称海派,它以善于发展为特色,北派以北京为阵地,又称京派,重视继承传统。麒麟童和马连良被视为南派、北派代表人物。二位艺术家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绝无派别之见。先后曾数次合作共同为京剧艺术向前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国京剧史上的重要一章。

马连良二十一岁时,在上海收了未曾拜师的弟子,后来成为表演艺术家的李万春。马连良成名之后,更加对于后学的培养、传道授艺,不遗余力。1938年丁果仙来京演出,这位被誉为“山西梆子须生大王”的女艺术家,技艺超群。马连良非常欣赏丁果仙的演唱艺术,二人相互观摩切磋,甚为相得。马连良毫无保留地传授京剧《四进士》,对于丁果仙的《反徐州》则情有独钟,得到了丁果仙的悉心教授。《反徐州》更名为《串龙珠》后,成了马派名剧之一。马连良此举不仅表明他虚怀若谷,求知若渴的精神。执意移植这出反对元末蒙古族统治者暴政的民族题材戏,也说明了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刻不满。山西梆子《反徐州》的移植与演出,绝非偶然,足以窥见了一向胆小谨慎的马连良其内心深蕴的爱憎仇。从这出戏正式公演的第二天即遭到禁演,可见,马连良的剧目选择并非只是艺术上的追求。

1942年马连良曾赴东北演出。此时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已十余年,并建立了伪满洲国。不少戏班为了谋生都曾去东北(伪

满)地区演出。马连良一方面为了剧团演员生活,一方面为了给奉天(沈阳)回民创建回民中学筹款,便也率团到了伪满,演出了近两个月。由于马连良的艺术地位突出,日伪为此大造声势。马连良成为日伪别有用心政治宣传下的牺牲品。时隔多年,这位正直的艺术家却由于这一不白之冤而遭灭顶之灾,不禁令有良知者扼腕。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说马连良涉嫌汉奸,对他提出起诉。这实是借机勒索,直逼得马连良家财荡尽才算了结这场官司。两年之后马连良只好赶快脱身远离故土,带团去上海谋生。1948年应邀赴香港演出,由于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马连良等滞留于香港,他拒绝赴台,但归国又无门路。1951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于当年9月30日回国。不久返回北京组成马连良京剧团,再次焕发了艺术青春。

命运多舛的马连良,在靠“极左”捞取个人好处的奸小心中,始终是个可以做个人文章的材料。他在为归国志愿军演出中,有人攻击他不演拿手剧目,而且索取报酬。前者纯属捏造,后者实是一个私营剧团团长为了全团上下生计的无奈之举,何况索要金额已是廉而又廉。1953年马连良赴朝慰问演出,暂时停息了这一攻讦。

1955年组成了以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四大主力为核心的北京京剧团,此外尚有许多名角,由马连良任团长。这是中国京剧舞台最佳组合,堪称空前绝后。整理传统戏,新创历史剧,马连良费尽苦心。先后有《赤壁之战》、《赵氏孤儿》等优秀剧目搬上舞台。

1960年马连良接受明史专家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他担任主演。这出戏宣扬正义、贬斥奸邪,弘扬了民族精神。从思想到艺术,《海瑞罢官》都获得了广泛赞誉。

1963年以后“左”的思潮再次涌起,传统戏以其宣扬忠孝节义,并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立传而受到愈来愈多的攻击。马连良积极参加现代戏演出。先后排演了《南方来信》与《年年有余》,马连良只是个配角,但演出十分投入。

大力提倡演现代戏的背后,暗藏杀机。1965年11月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一场高级层面中的政治较量,便从一出戏开始,引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动乱。马连良和周信芳都曾是海瑞的扮演者,他们首先受到了冲击。1966年春天,文化大革命风暴将马连良彻底扫出舞台。1966年6月4日他演出了现代戏《年年有余》。就在他以京剧对新生活的热情颂赞中完成了他五十年的艺术生涯,成为了现实的“罪人”,在团里每日遭到无情迫害。作为北京戏校校长,同样受到红卫兵小将残酷摧残。

在种种非人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中,一代艺术大师,在六十六岁仍是大有可为之年,终于被迫害致死。三个不同历史时期,马连良的不幸遭遇十分相似,只是愈演愈烈。

对马连良盖棺论定,堪称德艺双馨。他热爱京剧艺术,主张先继承后发展积极求索。一生以革新为己任,从演唱、表演到服装、化妆都能出新,又总是在京剧艺术规范之内,做到了限制中实现最大自由。他对京剧艺术的伟大贡献可谓功在千秋。有人著文评论这位“老生泰斗”是:独开妙境饶新变,百炼功纯尚自然。可谓深知马派艺术三昧。

[李鸣春]

侯喜瑞

侯喜瑞(1892—1983年),原籍河北省衡水县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三十年代以来,他与郝寿臣、金少山鼎足而立,被敬称为京剧净行三杰。

清光绪十八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公元1892年2月23日)出生于北京崇文门外手帕胡同,其父侯金贵以为他人雇佣赶大车为生,家境贫寒。不幸五岁丧母,侯喜瑞便以捡拾破烂等,过早地挑起了生活重担。

1902年,荒旱之年,城市贫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朝不保夕。侯氏父子生活无着,难以度日,又加上债主盈门,父亲无奈拜托河北梆子艺人勾顺亮,经他引荐进入了“喜连成”科班。此时“喜连成”尚在筹建阶段,便寄身于“喜连成”社长、著名京剧教育家叶春善家中学艺。

“喜连成”正式创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1912年改名为“富连成”。1948年因财力不足解散,共办七科,以喜、连、富、盛、世、元、韵排名,培养学员近700人。侯喜瑞等便以“喜”字作为第一科学生,正式入社学艺。

侯喜瑞最先从师勾顺亮学习梆子老生,后又拜著名京剧大师肖长华先生,学习京剧丑行。虽只是半年,却以梆子生行、京剧丑行在台上崭露头角。由于演出频繁,变声期间,未能休息调养,嗓子发生了较大变化。半年之后,科里根据他的声音等条件,便归入净行,跟一位名师韩乐卿学习架子花。从此,他便定位于架子花这一行当里,并终于成为架子花脸中佼佼者,创立了侯派艺术,在京剧艺术天地里独树一帜。

侯喜瑞勤奋好学,抱着“宁缺饭缺觉,绝不缺功”的决心精学苦练,深得老师同学们的赞许。三年之后,侯喜瑞十四岁时,成为科班中最有光彩的一位学生,并在社会上也取得了一定声誉。

七年学艺期满,按科班规矩,继续留校深造之外,还要从事职业性演出,为学校创收。这又一个七年是报答学校教养之恩,又称为“谢师”阶段。

七年的“谢师”阶段,侯喜瑞生活有了保障,收入所得足以养家糊口。更多的舞台实践使他的艺业更加精进。他依旧求学若渴,尊师重道,并注意博采众长,开拓戏路。按科班规矩,他兼作教师,对师弟进行传授,这不同于一般演戏,要求他因材施教,须是教学有方。这使侯喜瑞艺术上更加成熟。侯喜瑞台上戏好,台下人缘好,在北京京剧舞台上名声鹊起。许多报刊对他作了宣传报道,甚而为他开辟专栏。

京剧艺术大师、卓越的京剧教育家肖长华先生,一生育才、荐才不遗余力。他慧眼识人,看到侯喜瑞必成大器,亟需名师指点,根据侯喜瑞综合条件,看到侯喜瑞对名净黄润甫情有独钟,便千方百计将侯推荐给黄润甫。黄润甫有较深学问根柢,是清末以来造诣极高的架子花脸。他善于思考,能将读书所得用于揣摩角色、创造角色的表演艺术中。独辟蹊径,创造了黄派艺术。因其精读《三国演义》,对曹操揣摩最深,在宫中多次演出三国戏,被西太后誉为“活曹操”。黄润甫为人严谨,数十年从不传艺于人。在肖先生极力推荐下,侯喜瑞五次拜师未成,黄润甫被侯喜瑞精神所感终于在第六次,才将侯喜瑞收入门下。成为黄氏一生中唯一入室弟子。

侯喜瑞喜拜名师勤问苦学。老师也爱徒如子,将自己的艺术倾囊相授。侯喜瑞终成名净,实乃来自黄派艺术博大精深。后来有人评曰:“黄润甫衣钵,仅侯喜瑞一人深传。”他除了学习继承了

黄派演唱艺术和表演风格,掌握黄派所有剧目,学而能化为人称道外,他尊师重道,更是梨园有口皆碑。侯喜瑞已成剧坛大家,对于黄老依旧执弟子礼,常常服侍左右。师父晚年生活困窘多病,侯喜瑞精心关照如待生父,直到亲自操持丧事,送师父入土,此后又承担起对师母的赡养责任。对师母体贴关怀,至敬至孝,直到终其天年。

侯喜瑞一生演出了三百多个剧目,塑造了一系列舞台形象,不论是主角、配角,都能熠熠生辉,不同凡响。正如他自己所说:“舞台上没有闲人。如果琢磨一下戏情戏理,不管大小什么角色,都有戏演……就是跑龙套也应认真。”

解放以后,侯喜瑞作为一位艺术家,除了演出和授徒之外,不断地整理自己的艺术经验,曾完成了《学戏和演戏》一书。并根据个人创作角色的体会提出了“三懂”、“三和”、“三能”、“三化”的艺术观念。

三懂:懂戏词、懂戏理、懂戏情。三和:精神相和、神气相和、精神与气相合。三能:能演主角、能演配角、能当零碎儿。三化:性格化、感情化、意境化。为戏曲表演艺术理论宝库注入了新意。

侯喜瑞对于回族感情极深,关心回族命运。曾多次参加为回族教育文化振兴及扶贫的义演。对于社会各种公益事业也同样积极参与。是一位品德高尚,热爱母族,热爱祖国的艺术大师。

病危之时,留下遗嘱,完全按照穆斯林丧仪,并向清真寺出散也帖。家属一一遵办。

解放后,侯喜瑞曾担任北京戏曲学校教师,北京市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李鸣春]

雪艳琴

雪艳琴(1906—1986年),本名黄咏霓,北京市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四岁多拜在进步戏曲教育家田际云门下,入专门培养女演员的“玉成班”学艺。由于没有回民伙食,半年后脱离“玉成班”,从师天鹅旦学习梆子旦角,每天由母亲陪同到老师家学艺。

七岁时以金筱仙艺名登台,演出折子戏《捡柴》,获得好评。以后边学戏边参加演出,先后在北京、天津搭过姚佩秋、小香水的梆子班。由于当时京剧和梆子同台演出,雪艳琴留心京剧艺术,倾心于王瑶卿、梅兰芳等大家的艺术才华。

1920年应邀赴山西太原献艺,以唱梆子为主,有时根据需要改唱京剧。有个京剧戏班,班主是个青衣演员名靳国瑞,雪艳拜靳为师,并在戏班中担任头牌。靳国瑞因材施教,鼓励雪艳琴广泛师承,艺业大进,名声大噪于山西、河北。1923年雪艳琴返回北京,此时获得雪艳琴艺名。

先与孟小冬合作演出于城南游艺园。以其扮相、嗓音颇近尚小云,而终得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亲传。尚派风韵及尚派剧目给她的艺术以极大开拓,终生受益。

1927年应上海天蟾舞台高薪邀请,在上海先后与高庆奎、周信芳、谭富英等人合作,成为驰名南北的一位名坤。在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之后,推选出四大坤旦是以雪艳琴为首,余为章遏云、新艳秋、杜丽云。足见雪艳琴所得的艺术成就,已取得社会广泛的认同。

在上海期间应上海天一公司之请,与谭富英合作,拍摄了戏曲艺术片《四郎探母》。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声戏曲片,是戏曲走上银幕的一次有益的探索。三十年代初在北平上映,每日五场,场场客满,有着空前的票房价值。雪艳琴扮演铁镜公主雍容大方,唱念俱佳,与谭富英可谓珠联璧合。随着影片的广泛上映,雪艳琴更是誉满南北。在一次堂会中,梅、尚、程、荀四大名旦联袂演出的全部《红鬃烈马》中,特邀了雪艳琴演出“算粮”一折,她不畏强手,极具功力,获得了内行与观众的赞许。这在坤角中,少有获此机遇与殊荣者,一时传为佳话。

自上海返平后,便息影舞台,精心于绘画艺术,热衷于培养后学。并多次参与为贫寒市民义演活动。后移居于甘肃兰州,执著于伊斯兰功修,远离于演艺事业。

1951年天兰铁路通车,成为西北民众一件特大喜事,人们邀请雪艳琴再次出山,在通车典礼庆祝会上,雪艳琴重返舞台一连演唱了三天。不久,被中国京剧院请回北京,作为一级演员,在解放后的北京京剧舞台上再显身手,演出了许多剧目。

1958年中国京剧院首排京剧《白毛女》,由京剧艺术家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分别扮演杨白劳、黄世仁和喜儿。雪艳琴改变行当担任黄母一角。这是京剧行当的一个突破。雪艳琴从刻画人物出发,超越行当局限,对京剧演出现代戏提出的新课题,作了完满回答。

1958年以后,演出之余在中国戏曲学院担任教授。由于她的德艺双馨,颇受学生欢迎。1960年以后,自动息影舞台,成为中国戏曲学院专职教授。在她门下,造就了不少优秀人才,有许多人成为今日京剧舞台的台柱。1974年退休之后,聘为学院顾问,继续课徒授艺。

雪艳琴戏路极宽,文武兼能。凡属旦行,皆能游刃有余,从端

庄凝重青衣,到俊俏活泼花旦,无论悲剧喜剧都能使角色栩栩如生,获得强烈剧场效果。她在《十三妹》剧中,空手夺刀干净利落,连专工武旦演员都惊叹不已。

她学习了梅兰芳先生的名剧《天女散花》后,在出场时飘带从空而下,而舞蹈动作别有一番创造。舞蹈家赵青演出舞剧《宝莲灯》,她的长绸舞就是从雪艳琴处学来的。

雪艳琴与马连良、侯喜瑞被尊称为回族京剧三杰,皆因为他们技艺超群,又都关爱本民族。她从小恪守伊斯兰教规,饮食绝不马虎。每逢斋月大多斋戒,尽量不登台演唱,每逢主麻日(星期五)也力求戏班不排戏码。

雪艳琴非常热心回族公益事业,凡有回族文化教育募捐以及济贫赈灾等义务演出都积极参加,曾多次为此而和马连良、侯喜瑞等回族艺术家合作过。

中华戏曲学校是继富连成之后的又一培养京剧人才的学府。校长为著名戏剧家焦菊隐。这个学校以德、和、金、玉排行,培养了许多优秀演员,当雪艳琴得知其中有些回民学生因无专门回民灶而饮食极不方便时,便主动请来回族厨师为回族孩子建立了回灶,并承担了全部费用,因而在中华戏曲学校回族学生中,无不称颂她是大善人。

1986年,雪艳琴病逝于北京。她生前与大阿訇马松亭交谊深厚,逝世时马阿訇亲自送行。

雪艳琴作为一代著名京剧艺术家,邹苇澄先生在《戏品》中给予了准确评价:“得(梅)晚华之神彩,含(程)御霜之缠绵,具(尚)小云之清越,兼(荀)留香之绮丽。总四家而擅美,跨南北而孤出。”可谓知人知艺之论。

[李鸣春]

薛恩厚

薛恩厚,生于1915年1月5日,卒于1981年1月10日。本名薛永禄,河北省涿县人。著名戏曲艺术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薛恩厚在山西岚县参加八路军,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120师担任政治指导员、民运股长工作。

1941年在贺龙倡导下,120师成立“战斗平(京)剧社”委派薛恩厚任剧社指导员。战斗平剧社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老艺人排演了《打渔杀家》等二十几出传统戏及一出新编历史戏《嵩山星火》。

1942年战斗平剧社调往延安,与“鲁艺平剧团”合并为“延安平剧研究院”,薛恩厚任剧务主任。他参与了《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的创作与演出。

1947年薛恩厚调往河北石家庄创建“华北平剧研究院”,创作了他第一个剧本《四劝》,先后在七届二中全会和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会上演出,获得了好评。

建国以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国京剧院秘书长、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二团团长。团结戏曲艺术工作者为戏曲改革做出了一定贡献,先后率团赴大西北和朝鲜前线慰问演出。

1953年调至中国评剧院担任领导,他和张玮、胡沙等新文艺艺术家合作,锐意评戏的推陈出新,创造男腔,丰富女腔,开拓武戏,终于使以旦行为主的反映市井生活的一个小剧种成为男生与女旦平分秋色,驾驭古今,文武不挡的大剧种。使小白玉霜、新风霞等名家更加辉煌,并培养出了魏荣元、马泰等一批男的生行、净

行等一辈新人。

由他创作、合作或主持下,评戏一时活跃于北方各地。《爱用辫子的姑娘》、《金沙江畔》、《苦菜花》、《向阳商店》、《夺印》、《秦香莲》、《朱砂痣》等剧目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

1962年调至北京京剧团任领导,团里集中了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赵燕侠、李多奎、马富禄等一代名家,无论传统戏及新编历史戏的演出都达到了至今难以企及的高度。

1964年《芦荡火种》即后来更名的《沙家浜》是京剧革命现代戏的前奏之一,由吴晗编剧、由马连良主演的《海瑞罢官》则是人类一场灾难的前因。这是薛恩厚以及艺术家们所始料不及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薛恩厚重握彩笔写了五六个剧本,其中与刘敏庚合作的《野马》在八十年代的戏曲舞台上,就青年问题提出了十分有益的思考。

薛恩厚个人创作及与人合作的剧本有二十二个,已出版和演出的有十六个。他的剧作总是沿着历史的轨迹,不断提出新问题,并做出肯定的回答;他的剧本强调冲突,注重性格,对于英雄人物、英雄主义给予了热情讴歌。

他的剧作特别注重当代性,固然贴近了现实人生,但也难免出现为尽快反映当代生活的重大问题,而使立意不深,形象单薄,艺术粗糙的毛病暴露出来,这也是解放后三十年文艺创作的通病之一,薛恩厚也未能跳出这一历史误区。

其中有个别剧本如《百丑图》、《为了红》,对被扭曲的历史与人性作了正面肯定的反映,无疑虚耗了作者的创作热情和投入的精力。

薛恩厚从业余爱好京剧,在投身革命之后,终于成为一名优秀的戏曲剧作家和领导者,这经过了他的艰苦努力,也得益于他走进

八 王 苹

王苹(1916—1990年),我国电影界著名女导演、女艺术家。

王苹于1916年8月出生在南京的一个回族家庭里。是兄弟姊妹中最小的一个,原名王光珍。1934年毕业于南京中学高师班。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学校推荐到南京市立兴中门中心小学当班主任。

王苹在中学读书时,由于受新思潮的影响,非常喜欢文艺,被学校剧团吸收为演员。由于父母亲是虔诚的穆斯林,不允许子女参加社会活动,并规定了早出晚归的时间。王苹从1933年开始参加学校的业余剧团,演出一些独幕话剧。当时南京有一个进步的“磨风剧团”,从上海请来“新地剧社”作示范演出。王苹从学校毕业后,把业余时间投入到自己所喜爱的剧团里。1935年元旦,剧团在南京公演易卜生的《娜拉》。王苹扮演主角娜拉。为了不让家庭、学校知道,王光珍把名字改成了王苹。但后来还是被校长发现,气愤地说:“一个‘戏子’岂能为人之师!”便把王苹辞退了。不久,父亲也知道了,他非常生气,便把王苹关起来,不让出门。经过姐姐和哥哥的再三劝说,父亲才同意王苹出去找工作。后经同学介绍,到离京几十里外的江宁县铜山镇小学去教书。

1935年秋天,王苹应太原“西北影业公司”的邀请,去拍一部名叫《无限生涯》的电影。王苹扮演女演员薇薇,从此开始了她长达四十多年的影坛生涯。

1936年春天,“西北影业公司”停业。王苹和丈夫宋之的离开太原,来到了上海。在上海,王苹参加“明星公司”拍电影,又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四十年代剧社”的话剧演出。演过的节目

有《生死恋》、《大雷雨》、《武则天》、《太平天国》、《田野》、《罗密欧与朱里叶》等。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了声讨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剧团赶排了《怒吼吧,中国》和《保卫卢沟桥》等节目,向人民宣传抗日。不久,王苹又参加上海“左联”组织的“救亡演剧队”,从上海出发,先后在南京、武汉、郑州、济南、开封、西安等地演出。后被组织上调往重庆。在重庆,王苹等人组织了“重庆业余剧人协会”,后与“影人剧团”合并,在四川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业余剧人协会”在司徒慧敏和宋之的的带领下,转移到香港,成立了“旅港剧人协会”。王苹与金山、洪深联合演出了《雾重庆》、《北京人》、《马门教授》等剧目。

1942年,王苹等回到重庆,组织了“中国艺术剧社”,先后演出了巴金的《家》,夏衍、于伶、宋之的合作的《国家至上》,郭沫若的《信陵君》,茅盾的《清明前后》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苹回到了上海。她参加了于伶组织的“上海艺术社”,先后参加郭沫若的《孔雀胆》、阳翰笙的《草莽英雄》等戏的演出。

1946年,王苹参加“昆仑影业公司”,先后参拍的电影有《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天堂春梦》、《关不住的春光》、《新闺怨》等。这期间,王苹以演员的身份作掩护,给党作“交通”。后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把她监视起来。1948年11月底,在组织安排下,王苹坐飞机离开上海,到北平后,经由天津进入已经解放了的石家庄。不久,组织上分配王苹到华北大学三部学习和工作。

1949年春天,北平和平解放后,王苹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后又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会后,组织上分配她到东

北电影制片厂,在演员剧团作辅导工作。同年9月,王苹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总政文化部电影处制作科任副科长。

1951年,总政文化部把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教学片拍摄任务交给王苹。这是她第一次担任导演,困难重重。她毫不畏惧,边学边导,出色地完成了拍摄任务,受到刘伯承等领导的表扬。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王苹就积极参加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1953年7月她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54年,王苹调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故事片组。她导演的第一部故事片是《冲破黎明前的黑暗》。1957年导演《柳堡的故事》,1958年导演《永不消逝的电波》,1959年导演《江山多娇》,1960年导演《勐龙沙》,1962年导演《槐树庄》,1963—1964年导演《霓虹灯下的哨兵》,1965年导拍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此时,王苹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王苹的电影生活中断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1973年10月,才给她落实了政策。此时,八一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故事片《闪闪的红星》。厂领导通知她去参加。她说:“工作一定认真去做,但请求不要在银幕上出现我的名字。”厂领导同意了她的意见。这样,王苹从1974年参加了该片的摄制工作,直到影片完成。

1975年,王苹导演了舞台艺术片《红军不怕远征难》。这时,正好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期间,所以片子能够开拍。但是到了后期,又翻了个“过”——批邓。有人指责王苹给邓小平抬轿子。有的同志怕惹事,不敢往下拍了。王苹主动出来承担责任。她说:“整个片子只剩下十几个镜头了,大家鼓个劲。把它拍完。我是导演,如果将来批判,可以批个完整的么!”经过多次做工作,才把这部片子拍完。后来一放映,很受欢迎。

后来,王莘还导演了《我们是八路军》,歌颂了革命传统。

1978年,王莘担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1981年,由于年纪大了,退到二线,负责该厂故事片的审查工作。

1990年12月,王莘同志因病去世。

〔丁国勇〕

张 平

张平,著名电影艺术家,生于1917年11月20日,1986年10月17日逝世。原姓仇,名平,投身革命后改名张平,原籍山东省曲阜人。

幼时家境贫寒,因灾荒举家迁至上海。小学尚未读完,因父亲病故,生活无着而辍学。便到建筑公司当小工,挣得微薪,供养家庭。在这期间因喜爱戏剧,经常参加业余剧社到工厂农村演出,不仅提高了文化素养,也增强了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与理解。

1936年他参加了进步文艺工作者组织的“雷电剧社”演出了《父归》、《猎虎之夜》等剧目,进一步接近了中共组织,开始树立了投身革命文艺工作为革命进行到底的理想与抱负。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参加了由党领导下的上海救亡演剧队五队。深入抗日前线和大后方宣传抗日,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到前线去》等活报剧和话剧。演剧五队从上海出发,经开封到西安。1937年9月,辗转抵达延安。张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演出了《血祭上海》等宣传抗日救国的新戏。

1938年党中央着手筹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张平被调往筹建组。后来担任了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业务科长。并率领剧团离开延安深入敌后进行巡回演出,在太行山根据地获得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

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秧歌剧——中国新歌剧运动蓬勃兴起,大型秧歌剧《周子山》中,张平饰周子山,他的表演才能得到群众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肯定。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平派往东北沈阳,任东北文工团一团副团长。后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任演员。1949年在故事片《光芒万丈》中任主角,从此开始了电影艺术生涯,先后在《无线的战线》、《赵一曼》、《钢铁战士》、《高歌猛进》、《丰收》、《沙家店粮站》中担任重要角色。

1959年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在《风暴》、《粮食》、《北大荒人》、《停战以后》、《汾水长流》、《怒潮》、《小兵张嘎》、《烈火中永生》中担任主要角色。其中《停战以后》他所扮演的中共和谈负责人顾青,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焕发了艺术青春,在《丹心谱》、《黑三角》、《潜网》等一系列影片中担任角色。并于1979年出席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张平在电影银幕上塑造了一系列不同性格不同身份的正面形象,各个角色毫无雷同之弊,且又避免了表现正面人物过于脸谱化,而做到有血有肉。他的表演风格在质朴中追求深沉,表现正面形象注意开掘人物内心世界,做到了情感真挚,富有人情味。

〔刘志梅〕

丁 峤

丁峤(1924—1995年),湖北汉口人,中国电影电视事业家。

从小性格开朗,勤于学习,喜欢表演艺术,经常参与学校各种演出活动。1937年日寇发动侵华战争,丁峤举家迁到上海。在校读书期间接近进步同学,阅读进步书籍,参加各种抗日救国的进步活动,并成为进步同学业余读书会的主席,作为进步同学中的骨干,接触了不少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同志。这一切,对他投身革命,终生从事戏剧、电影工作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在地下党号召下,1940年丁峤投笔从戎,进入苏北解放区,成为新四军一名文化战士。最初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学习。根据他的才干,不久便留校任校文工团戏剧组长。

1942年调至陈毅军长警卫营中担任青年队长。一年后新四军军部文工队建成,丁峤调任为副队长。后来文工队改制为文工团,丁峤任团委委员兼戏剧股长,辗转于敌后,以文艺为武器为抗日战争积极从事宣传鼓动工作。

抗战胜利之后,丁峤担任华东野战军文工团第一团副团长。在繁重的工作中,他刻苦学习文艺理论和表、导演艺术,成为部队文艺工作优秀的管理干部和颇有见地的理论家。经常给文艺战士授课,培养了许多表演、导演、编剧人才。他除了导演了《自由万岁》、《俄罗斯人》、《李闯王》、《白毛女》、《雷雨》等优秀剧目外,还亲自参加一些演出,担任角色。被誉为理论建树与舞台实践双优的好干部。

上海解放后,他投身于地方文艺工作中,团结了许多进步文艺

工作者,为建立党的文艺统一战线,为团结、改造旧文艺工作者,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积极投入,不畏艰辛。

1950年,丁峤调至中央电影局任副导演。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执导了电影《海上风暴》,这第一次电影创作实践,是他从影的开始。

1952年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任新闻摄影总队副队长。第二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成立,任总编辑。后任副厂长兼总编辑。

在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上,丁峤作为第一代的专家与领导者之一,为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他从事新闻纪录电影的二十二年中,深入社会,捕捉一切有着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的镜头,写下了一部有声有像活生生的新中国的初期历史。成为今天我们重温已逝去的历史,寻索新中国初建时的历史足迹的最有说服力的教材与最有价值的资料。

丁峤认为新闻纪录电影是一部形象化的政论,在为大众传播信息,为新中国树立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丁峤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历史责任感投入这一工作之中。他曾深入抗美援朝前线和摄影师一起走进炮火连天的前线,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195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息西藏的叛乱中,他亲率摄影队开赴西藏高原。他克服高原反应,克服生活中种种困难及各种危险,深入藏族社会生活中,完成了大型纪录片《百万农奴站起来》。1962年,在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之时,他又率队赶赴福建前线,在前沿阵地上指挥着拍摄工作。表现了一位新闻战士的高度政治觉悟。

丁峤深入工厂、农村、部队都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把党的关怀与温暖给予一个个普通人。在西藏工作时,更是十分注意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作为一个回族出身的文化干部充分发挥

了自己的天然优势。

丁峤作为一个专家,他行有余力,便从事电影艺术的研究,发表了大量文章。特别对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在理论建树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他担任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以及《电影艺术》等刊物编委等职时,更加注重培养理论人才。

丁峤思想开放,视野开阔。他十分注意国外进步电影事业的发展,并积极开展交流工作,广交朋友。丁峤于1957年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参加了莱比锡电影节活动。1965年应邀赴越南讲学,并曾数次担任国外电影节评选委员。由于他为人诚恳、观察敏锐、艺术判断力极强,在国内外口碑极佳而为国际著名纪录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思所赏识,二人多年相处合作,成为挚友。

十年动乱期间,丁峤遭到了惨重的迫害。以后受命于危难之际,于1974年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领导全面工作。不久围绕电影《海霞》的创作问题,“四人帮”将毒手伸向导演谢铁骊等主创人员。丁峤临危不惧,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十年动乱中,丁峤尽全力保护了许多干部。下属的责任他承担,正职的责任,他作为副职也毫不推诿。在人人自危、寻求自我安全的特殊历史环境中,丁峤表现了正直无私的崇高品质。

粉碎“四人帮”以后,丁峤担任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为电影事业扫除障碍走上正轨积极工作。电影艺术的创作与生产很快得到了复苏。他更用了两年多时间,几乎日以继夜将六百多部被“四人帮”定为毒草的影片,逐个审查。不仅解禁了许多影片,更使这些影片的创作人员得到了重新评价,获得了政治上的再一次解放。

电影是个重灾区。“四人帮”的阴谋文艺理论桎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从体制上到电影美学,他都进行了大量的拨乱反正的工

作。他敢于突破种种禁区,并在题材多样化、风格多样化方面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从而使电影艺术很快走上了健康、有序的发展道路。粉碎“四人帮”以后,电影事业出现的蓬勃发展的势头和丁峤的努力有着密切关系。

他分管电影外事工作,同样成绩突出。曾多次参加各种国际电影交流活动,他的艺术造诣和敏锐思维与口才,赢得了国外电影同行的好评。

1979年10月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在第四届中国电影工作者代表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

1982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和民族文化工作。他有了更多精力投入在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工作中。他敢于排除“左”的干扰,为民族文化的振兴摇旗呐喊。在中国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会和北京穆斯林文化学会的筹建及其一系列工作中发挥中坚作用并担任两会的会长。

他离休以后,担任了电影金鸡奖、飞天奖评选的领导工作。作为表现主旋律的重大题材,他非常关心,担任了电影电视重大题材领导小组负责人。对反映三大战役等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影视作品的创作与拍摄,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指导。

丁峤是回回民族在文化艺术界一位有影响的领导者。晚年十分关心回回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积极参与回族文化活动。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仍然魂系穆斯林文化事业,为回族自身的经济、文化滞后及回族文化人的整体素质而忧心忡忡。

晚年取得经名奈比勒。终年七十一岁。由于某些原因,火化后安葬八宝山烈士公墓。

[李鸣春]

李 超

李超(1916年9月26日—1995年1月21日),河北省迁安县人,经名伊斯玛仪。著名戏剧家。

在乡间读完小学,负笈来到北平,就读于一所回族子弟学校西北公学(后改名为西北中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生性慷慨的李超积极投身民族救亡运动。他和同学一起在校内创立学社、编印刊物,并在牛街地区建立业余剧团,编演爱国剧目。在“一二·九”运动中,他作为骨干,领导学生走上街头,奔走呼号,并和后来的电影皇帝崔嵬等人排演了话剧《阿比西尼亚的母亲》,在北平引起巨大反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战事使热血青年为拯救民族危亡,纷纷走出校园。李超参加南下请愿大军,而后沿江西上,一路宣传抗日,组织救亡。最后在武汉参加了进步的文化组织抗敌演剧队。他在演剧一队担任编剧、导演、演员,还积极参与舞台工作。舞美设计、布景道具制作都能大显身手。全方位的戏剧工作,使他的戏剧才能得到充分锻炼,成为戏剧界难得的一位多面手,这无疑是综合艺术的戏剧所最必需的领导人才。

在抗战期间他写下了数十个剧本,参加了许多剧目的表、导演工作。他常常在敌人炮火下为群众演出,有几次演出撤退时,几乎陷入敌寇包围之中。

李超在抗敌演剧队党的领导下,紧握着戏剧这一特殊武器,表现出了战士的豪情与勇敢。他毫不畏惧日寇的围追,不畏国民党的反动派的迫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动员群众,教育群众,发挥了积极作用。甚而,卧病在医院中仍然魂系抗战,千方百计逃出医

院,坚持在救亡第一线。当时人们称李超为“李救亡”,由此可见一斑。

1948年秋,李超作为一位文化领导人,来到了日夜向往的解放区。在吴玉章同志领导下,他在华北大学组建了华北大学文工团三团。以后担任中央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秘书长等职。繁重行政工作之余,仍不放弃创作及理论研究。创作了多幕剧《吴老的故事》、独幕剧《开会忙》等共十余部。其中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开会忙》是一出讽刺喜剧,它揭露了官僚主义的危害,表现出了剧作家李超深刻的洞察力和超人的胆识。他同时发表了数百篇理论文章,大多有着真知灼见,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李超首当其冲。其实早在1964年李超已经开始了独属于他的“文革”。他组织并主持了1964年“迎春晚会”,这个晚会参加者都是文艺界知名人士,晚会节目轻松、健康,谁知却被两位“左”派作家告了黑状。毛泽东在6月27日发出批示,指出这些协会“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李超陷入重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无怨无悔,绝不攀扯任何人,只是一人承担责任,显示了他光辉的人格。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李超九死一生得到了平反。告黑状者仍然振振有辞,自辩自饰。李超则表现了极大宽容,绝无一句回敬指责之辞,反而劝解抱不平者,给那两位“左”派以种种解脱。

粉碎“四人帮”前后,他先后担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文化部教育局副局长,全部精力仍在戏剧事业中。他努力推动儿童剧的发展,并写下了有关儿童剧的论述多篇。对于广大戏剧工作者,无论是剧团领导,还是编剧、导演、演员、舞美音乐工作者,一律给予扶持与奖掖,为他们的工作成绩欢呼,为他们遇到的困难呐喊。他写

下了大量咏戏诗词,以这特殊的方式,对广大戏剧工作者给予关注和激励。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文化人对于民族戏剧关怀备至。为此由他倡议并创建了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这个学会成立于1984年,成立之始便引起戏剧界极大关注。为了推动民族戏剧的发展,他奔走于民族地区和全国各地,为培植作者,开拓民族戏剧新局面费尽心血。由他倡导下,建立了国家级民族题材戏剧评奖制度,每三年一次,极大地推动了民族戏剧事业的发展。不仅扩大了戏剧题材,培养了大批从事民族戏剧创作人才,而且从戏剧舞台上以艺术的方式增强了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增强了民族间的认同与团结。十几年的努力,民族戏剧已成为中国戏剧艺苑中的一朵奇葩。李超功不可没,他被视为中国民族戏剧的开拓者,受到广泛的尊崇。

李超热爱自己的民族,关心回族的发展。每到一处总要抽出时间造访清真寺,和回族群众交流。他和丁峤一起筹建创立了北京穆斯林文化学会,在穆斯林文化建设与文化交流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李超才华出众,他的书法、绘画自成一家。1993年文化部老干部局为他主办了“李超画展”,名界文化名人云集书画廊前,对李超作品给予了极高评价。

李超一生各类写作约数百万字。除了已经刊梓的《湘桂线上——李超剧作选》、四卷《李超咏戏诗词选》、《抗敌演剧队史》外,其百分九十左右的大量文字虽已部分整理出来,尚无力出版。

〔李鸣春〕

九 王子平

王子平(1881—1973年),为近现代我国著名爱国武术家,伤科名医。河北沧州人,生于武术世家,祖父以“翻杠子”声震遐迩,父亲以“粗胳膊王”名闻乡里。家境贫寒,打渔为生,幼年刻苦学艺,每天二更起床,头顶满天星斗,练到旭日东升,这就是武术界称道的“北斗功”、“露水功”。十六七岁时,已娴熟民间流行的各种拳术和兵器。拿大顶、玩石锁、摔跤、擒拿、梅花桩等无一不练,且均有创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起学习中医数年。

光绪二十六年,时值义和团运动兴起,子平被疑为“拳匪”,避难于济南、青岛、北京等地。他在济南柳园茶园,当众按住了飞快转动的水磨,观看者发出了惊奇的喝彩声。驰名南北的武术大师杨洪修阿訇曾以凌厉的技法击败一些国内外名家而享盛名,他当时在场,当即表示愿意收子平为徒弟。从此子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勤学苦练,尤精于弹腿、查拳、八极拳,膂力尤为过人,有“千斤神力王”的美称。有德国人听到子平能按住迅猛飞转的大磨,不服气,便买来一个特大的石磨盘,摆在青州车站上,要子平举举看,想刁难子平。子平上前问:“举起来怎么办?”德国人说:“举起来你拿走磨盘,举不起来你付磨盘钱。”子平运足力气,把磨盘举过头顶,德国人连称:“神力,神力!”子平扬长而去。

民国八年(1919年),子平在济南表演劈石精彩节目,设在青岛的一所美国学堂的体育教员阿拉曼,径直找到冀德会馆挑战。他不怀好意,当伸手与子平握手时就使出握力,想叫子平的手缩不回去。子平感到腕力逼人,当即使用摔跤功夫,把阿拉曼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他爬了起来,还要比高低,子平使用擒拿手法,又将他

败下了阵。第二天,又来了一个德国大力士柯芝麦,要与子平较量。比武开始,子平连摔了他几个筋斗。柯芝麦被打服了,要向子平学习中国武术,每月以三百元作酬谢,被子平一口回绝了。

以后,子平又击败过日本的柔道家宫本,遭日帝警宪围攻,子平把他们一一掷于楼下,表现了我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精神和魄力。北京政府要通缉子平,他遂离开北京,应邀来上海打擂。

民国十年(1921年),美国人沙利文结伙来上海摆擂台。他联合美国人乔治和德国人彼得,还有英国人丁柯尔。乔治体重295磅,彼得体重305磅。他们自恃阵营坚强,无可匹敌。他们在沙利文主持的万国竞武场,摆下了擂台,在报上公开出示悬赏说,凡能打上他们一拳者赏洋500,如打翻在地,赏洋1000。中国武术界公推王子平前去打擂。双方赛前订立合约。为表示双方的友好和诚意,请比武者当场向观众讲几句话。王子平走上讲台,正要讲话,不料身后窜出一个彪形大汉,向子平突伸冷拳,他闪身躲过,接着又打来第二拳,子平飞起一脚,将那人踢翻在地。子平瞪他一眼说:“这一脚给中华民族扬威!”又上去补了一拳,说:“这一拳教训你们这种混账洋人,不许再欺侮中国人!”当晚,竞武场有人送来一纸条,声明比赛取消,合约作废。子平让来人带口信给沙利文说:“你们不赛,我偏要赛,不见输赢,决不罢休。明天上擂台时,见一个打一个!”沙利文从此不再嚣张了。民国十一年,著名画家齐白石挥笔写下“南山缚猛虎,深潭驱长蛟”的条幅,赠给王子平。子平从此迁居上海行医,曾应中央国术馆聘请,任该馆少林门门长,教授少林、查拳、弹腿、八极拳、劈挂拳。

子平流落风尘,栖身江湖,卖艺行医数十年,备尝辛酸。每当来客以崇敬的心情谈起他当年打擂台的往事,他总是一声长叹。解放后他的武艺和医术受到政府的重视,他先后担任全国武术协

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市伤科协会副主任、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曾带头在武术界发起组织义演,筹款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1959年10月,他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庆典,见到毛泽东主席。1960年他已年届八十高龄,随周恩来总理出访缅甸,担任武术队总教练,在仰光昂山体育场,表演了他那身法灵活、动作连贯、剑法纯青、又跳又转的“青龙剑”,掌声雷动。还在缅甸各地表演了“西域拳”、“锁口枪”。大家说他除了白胡子以外,没有老态,全身充满了活力。他总结几十年来练功行医经验和体会,整理出版了《拳术二十法》、《祛病延年二十势》,还把“舒筋活络药水”和“治伤消瘀片”的秘方献给了国家。子平身怀绝技,名噪武术界,从不夸耀自己,且乐于助人,是德艺双馨的武林人物。1973年,王子平以九十二岁高龄在上海逝世。

1981年12月中旬,上海市武术协会隆重举行了著名武术家王子平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高度赞扬了子平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精湛的技艺,以及对中国武术和医疗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号召大家以王子平先生为榜样,为发展祖国武术事业,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

〔杨怀中〕

马凤图

马凤图(1888—1973年),著名武术家、老中医,字健翊。河北省沧州市(今属孟村回族自治县)。光绪十四年(1888年)生。幼年读过私塾,参加过武童生应试训练,并从祖父马捷元、父亲马化堂、舅父吴懋堂学习劈挂、八极等家传武术。十二岁起师从盐山黄林彪(伟材),系统学习通备拳法器械等,兼学中医,奠定了终生医武相伴的学术路径。宣统元年(1909年)考取北洋师范学院,在校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活动。民国初年,赴东北从事教育工作;又曾赴湘鄂等地工作和游历。1920年携二弟英图和长子广达在河南加入冯玉祥国民军。1926年随冯军刘郁芬部进入西北,先后在宁夏、甘肃、青海担任过县长、处长、专员、厅长、省府委员等职。四十年代初退出政界,曾在大学兼课,后挂牌行医,直至以中医师终老于兰州。解放后担任过西北军政委员、省回民教育促进会主任、省政协委员、省体委委员、省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委员、省武协主席、市中医学会主席等多种社会职务。卒于1973年,享年八十五岁。

马凤图一生经历丰富,学识渊博,对传统文化多有研究。他对陆王之学和清初的颜李之学有浓厚兴趣,四十年代曾在兰州大学开设讲座。由于久居陇右,对西北史地及民族、宗教等问题也很留心,有不少独到见解,三十年代史学家顾颉刚、白寿彝来西北考察时都曾同他交谈。金石碑版和书画鉴赏之学也在他的兴趣之内,其它如诗词、戏曲、古典小说,以及民族教育、世风民俗等都有所关注。但一生寄志最专是武术,其次是中医学和书法,故晚年曾以“三艺老人”自号。自称三艺之中,武艺第一,可以成一家言;医艺

第二,可以疗人疾、为人师;书艺第三,不能成家,也不能为师,但能做到一生临池不辍,从容挥毫。

马凤图一生的武术活动绵延了七十多年,留下丰富的武术遗产。他的武术成就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创设武术机构

清末民初之际,武术社团蜂起,这是近代武术向现代武术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马凤图是这一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1909年(宣统二年),受同盟会“燕支部”之命,他与叶云表等人发起创立“中华武士会”。该会以提倡中华武术,对抗日本“武士道”为宗旨,实际借此联络武林人士,扩大反清力量。参加中华武士会的有太极拳家李瑞东、形意拳家李存义、八极拳家李书文、劈挂拳家肖公甫及天津地方人士高万合等,还有各家的高学弟子如形意郝恩光、李玉琳等,八极张德忠、霍殿阁等,人物极一时之盛。“庚子之乱”后,许多人对武术怀有偏见,武术界自身又门派之见和江湖习气根深蒂固。经马凤图与叶云表等积极奔走,联络各方,终于促成这一当时北方规模最大的民间武术社团的成立,是近代武术史上一件盛事。

1925年,在西北军察哈尔都统署任参议的马凤图,受都统张之江之命,在张家口创立白刃战术研究室,并依托该室成立“新武术研究会”,以室主任兼任会长。当时冯玉祥赴苏联访问,张之江主持西北军,他积极经营张家口,力图创立一块牢固的立足之地。张之江对武术夙有兴趣,对兼资文武的马凤图非常敬重,委派马凤图制定全军统一的劈刺教材,同时延揽武术人材,研究武术改革发展的新思路,力图使研究会成为一个集研究与管理为一体的实体。经马凤图举荐,研究会吸收了包括王子平、马英图、洪礼厚、刘鸿庆等一批武术人材。研究会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在此期间,马凤图结

合劈刺教材的编定,对古典刀剑武艺和明清以来流传有绪的陆合大枪体系,做了一次认真清理,取得多项成果。对不久以后在南京创立中央国术馆的张之江来说,研究会是一个前奏,是认识上和体制上的前期准备,也是人员方面的准备。

1927年中央国术馆成立。身在西北的马凤图没有直接参与这一重要事件,但他一直与张之江等保持联系,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与主张,为张所采纳。同时,他在西北地区积极推动国术馆的创立。1930年5月他与西宁当地武术热心人士发起创立青海省国术馆,由青海军政首脑任馆长,他担任副馆长。这是整个大西北创立最早的省级国术馆。1934年4月,他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创立了甘肃省国术馆,并曾出任副馆长、董事长等职。在他的支持下,甘肃国术馆在经费、设备和教师教材等方面都得到基本保证,先后举办了三期学员班,培养了不少武术人材。

四十年代,马凤图曾在西北师院体育系作武术兼职教授,一面曾创立“华斌体育学社”,主要以大中学生为对象,传授劈挂、八极等拳械技艺,及劈刺、摔跤、拳击等对抗性项目,培养了不少武术人材。解放后马凤图曾长期担任甘肃省武协主席。

第二,倡导和推动武术交流

马凤图武术思想和实践中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倡导武术交流,特别是异地异派之间的交流。他主张在交流中促进交融,从而逐步完成武术门派的分流归类问题。他认为戚继光的武艺成就是南北交流的结果,戚高出时伦的地方,主要在别家都是偏于一隅之学,而戚是融会贯通之学。戚继光促进了交流,也得益于交流,一部《纪效新书》精粹就在这里。所以促进交流,是马凤图一生所汲汲追求的目标。1911年以前,他在家乡沧州已经系统学习了劈挂、八极的拳械内容,起点高,得艺真,可以说荟集两门艺业于一

身,这在当时劈挂、八极已经畛域分明的沧州是不多的。民国初年他带着八极拳家韩会卿和二弟英图到东北,在沈阳结识了郝鸣九、程东阁、胡奉三、杨俊峰等关外武术名家,建立了“换艺”关系。他向郝、程等人学习了翻子、戳脚和螳螂九手等,给郝、程等人教了劈挂、八极和陆合大枪等。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武术大交流,后来在东北出现了“翻子加劈挂,神仙也害怕”的拳谚,而他为之恢宏光大的通备拳也得到了极大丰富。马凤图还曾游历湘、鄂、赣、闽、浙、皖等南方省份,深入考察南方民间武术保存下来的明清短打拳法和死把棍、梭标、铁耙等,曾专门到皖南考察徽派陆合大枪与双手刀法的传存流变情况。

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他所弘扬的通备拳,成了大西北,特别是甘肃、陕西、新疆三省传播最广的武术流派之一。在甘肃,通备拳被称为“马家拳”或“马氏武艺”,解放后,代表甘肃参加全国武术活动的主要是“马家拳”和马门弟子,民间练“马家拳”的成千上万。这样大面积的传播,与他的门人子嗣的共同努力分不开,但创始之功在马凤图。近百年来,在武术跨地域传播与交流上,马凤图的卓越成就成为引人瞩目的武术文化现象。

第三,建构通备武艺体系

清末,潘文学、李云标、黄林彪等武术家在盐山、沧县等地传播以劈挂拳为核心的一系列古典武艺,外称“通臂”而内宗“通备”。清末天津中华武士会成立时,为区别于通背拳和名同实异的通臂拳,经与师友商议,马凤图正式揭出通备名号。自此以后,他与二弟英图、三弟昌图、长子广达以及一大批门人子嗣,在传播通备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一向不为人们熟悉的通备拳卓然崛起,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内容宏富、结构严整的大型武术门派。通备拳由沧、盐一隅之地发展成为一门流布海内外的武坛显学,它的技术系统

与理论系统的最终完成,是马凤图武术事业的主要成就。

他一贯主张保留我国传统的“武艺”这个词,认为以“武术”取代武艺是舍高就低,舍宏深而就浅近。“武道”源于中国,但已被东邻先用。“武艺”出自孔子,“艺”比“术”立意高,义蕴深,而且沿用了数千年,大家耳熟能详,因此没有必要改动。当年他曾向张之江一再表达过这个意见,惜乎未被采纳。于是他一面接受了已被官方确定通用的“武术”,一面习惯于称自己的通备拳为“通备武艺”,近年来,海内外出现了“马氏通备武艺”或“马氏武艺”的提法,其源盖出于此。

他坚持“融通兼备”的武术思想,对通备拳不断加以宏廓熔铸,从理论与技术上形成了“通备武艺体系”。这个体系继承了明清以来的许多古典兵器技法的精粹,融合长拳(不是当代新编“长拳”)与短打两类拳法为一体,以“刚柔相济”为理论核心,创造出一种以“通备劲”为主要特征的“气势雄峻,身法矫健;劲力通透,打手洗练”的武术流派。他努力挖掘和吸收了许多民间古典武艺子遗,使许多面临泯灭的古典武艺得以传存下来。这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深厚的学养,高明的识见,也需要有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因此,可以说他建构通备武艺体系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艰辛科研过程,是一项保护和整理古代武术文化遗产的重要事业,也为建构当代“武学”做出了贡献。

马凤图是一位学者型武术家,他所遵循的,正是我国古代儒学指导下的文武兼通之学,也就是儒学领域里的武学。他认为不能视武术为技艺,它是一门学问,是一门涵容丰富而结构复杂的学问。因此,武术家不能不重视学术素养,不能不借助于古典武艺典籍来探讨武艺嬗变的轨迹,不能不把武术摆在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探索考察。不读书或少读书的拳家,终生苦练总难深入武学堂

奥,于是不得不依托名山宝刹和神秘主义以自重,原因就在于此。但武术又是一门“实学”,不是光靠读书就能掌握的,其精粹非经苦心操练则不能得心应手,而且还要有家学、师承、资质等方面的严格要求。所以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武术家”并不是容易达到的。他经常题写的一句话“不读书万卷,难作通备人”,正集中地表达了他的这一观点。

马凤图以武术为传家之学,要求子弟辈必须学习和继承。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马氏一门成为当代中国最著名的武术家族之一。二弟英图名声最著,与马凤图并称“马氏双雄”。

马英图字健巽,1898年生。自幼酷嗜武术,体魄雄健,勇捷善斗。在父兄指导下系统学习通备武艺,亦曾得到黄林彪先生指点。后拜罗瞳八极拳家张拱辰为师,习陆合大枪及八极内场武艺,成为张氏晚年入室弟子。后又从长兄远游东北及南方各地,专力调研各门各家武艺,积学深广,又善能悟解精要,遂成为一代武术名家。民国十七年从张之江创办中央国术馆,出任科长等职。将通备门劈挂、八极及风磨棍、苗刀等进行调整组编后,纳入国术馆教材系统,使之广为传播。三十年代以后,曾从马凤图在青海、甘肃等地研习武术,协助乃兄整理和传播通备武艺。又在西北军旧部十九军和刘汝明、傅作义等部任武术教官等职。1949年随傅作义部起义,因病退居甘肃泾川县赋闲。1956年去世。

[马明达]

穆成宽

穆成宽(1907—1987年),中国游泳界泰斗。天津北郊穆庄子(今天穆村)人。祖籍浙江钱塘,明初穆重和以漕运为业,投奔燕王为锦衣卫士,落户北运河畔三面临水的穆庄子。村里95%为回民,多以屠宰牛羊为生,有练功习武传统。成宽幼时念过几年私塾,后帮家里做恩义成牛皮店生意,并和小伙伴们在河滩练武,在大运河和大苇坑里游泳。他拜陈国政为师,学了少林十三势,为他和儿女们在泳坛打天下奠定了基础。

成宽从青年时起,就是一位勇士,一位有血性的爱国主义士,他大智若愚,厚朴的土气之中包着超乎常人的机警和智慧。他身体基础好,竞技心理素质强,武术、摔跤、踢毽、举重、滑冰样样皆能,参加自行车比赛,被誉为“飞车猛将”。最突出的还是游泳,他结识了市内青年学生杨学敏,看到许多介绍西方国家游泳运动的图术杂志,了解到现代游泳技术和发展情况,感悟到体育运动有一种更高的精神内涵,包含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

成宽与杨学敏在碧庄子参与组建了虎鲨游泳队,他把少林十三势融入游泳训练。1936年虎鲨队在平、津游泳公开赛中多次夺冠。1939年8月,成宽参加天津万国游泳比赛,得110码仰泳、440码自由泳冠军,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四十年代初,成宽的游泳成绩达到巅峰,称雄华北,誉为“泳坛泰斗”、“水上霸王”,当时天津的《泰晤士报》、《大公报》等都有过报导。《东亚晨报》的标题是“虎鲨队为华人吐气,穆成宽压倒西人”。

成宽是一名优秀游泳运动员,更是一位有战略眼光的优秀教练员。他在虎鲨队基础上重新组建一支更年轻的游泳队——鲟

队,分为两个队,成宽任成年队队长兼教练,长子祥英任学生队队长。成宽出于正义感和民族尊严,把为中华民族争光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对儿女的教育要求;把传统的东方道德与爱国主义融合在一起,对青年进行教育;把自己摸索出的游泳技术和穆家绝技毫无保留地教大家练。他注意练武术软功,注意练腰腿,他做了几个高低不同的跳台,让孩子们往上跳,以后在小腿绑上砂袋跳,连续跳一百次。成宽常说:“要练惊人艺,须下苦功夫。”还说:“游泳对付的是水,使的不是打拳的刚劲,要柔中带刚。”

抗战胜利后,成宽担任天津游泳队教练,不再参加游泳比赛。以祥英为代表的穆家小将崭露头角,开始形成一支颇有实力的游泳群体——穆家军,他们1946年已经名扬平津。

1947年,成宽做牛皮生意,并经营自行车零件和五金器材。中共派人在天津采购药品,成宽向解放区供应了许多交通器材。又因在牛津路为搭救弱女子而痛打了美国兵,惹了祸事,被关进监狱,后被保释出狱。

1950年,天津市长黄敬任命成宽为天津市游泳教练,祥英、祥雄、祥豪为运动员。1952年9月,成宽率天津运动员参加华北区游泳队到广州参加新中国首届全国游泳比赛,祥雄一人独得100米蛙泳、200米蛙泳、3×100米混合接力三项冠军,华北队得团体总分第一。祥英、祥雄、祥豪、祥杰、秀珍都获得国家游泳选手称号,祥雄、祥豪选入国家游泳队。成宽受到天津市体委表彰,荣幸地接受贺龙同志的接见,贺龙说,古有杨家将,今有穆家军啊!不久,成宽当选天津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祥英也选为天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体育界代表。祥雄、祥豪随中国游泳队到匈牙利训练,由著名教练沙鲁西教导,成宽对他进行遥控指导。祥雄成绩提高很快,1955年7月在莫斯科200米蛙泳比赛中战胜世界纪录保

持者苏联的米那施金,夺得冠军,震动世界泳坛。由于我国抵制“两个中国”,祥雄与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无缘,成为遗憾。1958年12月祥雄以1分11秒4的成绩打破米那施金保持的1分11秒5的世界最高纪录。父辈几十年的拼搏,儿辈十几年的苦练,穆家两代人付出巨大艰辛,经历了难以承受的痛苦,终于实现了为国争光,创造世界纪录的宏愿,祥雄在新中国游泳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成为世界公认的“蛙王”。1964年祥雄被派往越南,为提高越南游泳运动员的水平立有功勋。

成宽从五十年代起投入带有战略意义的少年游泳人才培训工作。1956年担任在天津开办的我国第一所少儿游泳业余体校校长,在校内发展到三百余人。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注意滋补学生身体,买些牛骨头给学生熬汤喝,他重视对学生的品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传授自己游泳训练的经验,并引进国外先进经验,创造性地把气功训练和技术训练结合起来。成宽善于向一切人学习,他十分爱才,发现好苗子就尽心培养。

1958年,天津市划归河北省,成宽任天津体育学院运动系主任,运动系水上专业的学生即为河北游泳队的队员,成宽为河北游泳队教练。他治队有方,河北游泳队提高很快,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河北女队战胜了泳坛劲旅广东女队,跃居全国第二,河北男队取得第三名。1960年成宽先后被选为天津市、河北省和全国体育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全国群英会。

1959年,著名电影导演谢添以穆成宽和穆祥雄父子为原型,编导拍摄了我国第一部反映游泳运动员、教练员为国争光的体育故事影片《水上春秋》,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穆家父子成了名噪全国的新闻人物,穆氏“游泳世家”传奇故事传遍海内外。

“文革”中,成宽成了重灾户,被关进牛棚,被打成“反动权威”,

蒙受不白之冤。《水上春秋》成了大毒草。穆家被抄,连成宽的老伴吴静芝头发也被剪光。成宽被批斗、毒打,甚至拿纸糊的猪头扣在头上,五花大绑拉出去游街。祥英编入“保荣高棠二队”,部分失去自由,祥雄关在训练局会议室挨批斗。秀兰、建华、秀珍都遭受浩劫大难。在批斗会上,成宽闹中求静,站在台上闭目养神练站功,在牛棚强制劳动中,他仍不忘中国的游泳事业。

1978年成宽被分配到保定市业余体校当游泳教练,不久任命为河北省游泳馆副馆长兼教练员。他克服种种困难,决心把河北省游泳运动搞上去。他看上了白洋淀,跑遍百里水乡,并在冀中各县寻找游泳苗子。一次在任丘县发现一个身材颇长的小姑娘,调来省游泳队训练,她就是后来多次打破全国和亚洲纪录的夏福杰。

1981年,成宽担任河北省体委副主任,分管河北游泳队。他提出“南有东莞,北有白洋淀”的响亮口号,将白洋淀创建为河北游泳基地。他到处宣传游泳的地位和作用,相继促成安新县25米游泳馆的建成和石家庄、邯郸、邢台、廊坊等地25米游泳馆的建设。他在白洋淀搞起18个游泳训练点,培养出一百多名教练员,四千多孩子参加训练,涌现出一批游泳新秀。1986年第十届亚运会上河北游泳队三人参赛,夺得四枚金牌。

“文革”以来,成宽已十多年没在家里过春节,他说:“游泳训练,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春节也不能停啊!”经过几十年的训练实践,成宽创造了力量、柔韧加气功的训练方法,他总结出的一套训练理论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许多见解成为游泳训练应该遵循的原则。

成宽晚年的苦苦拼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河北游泳队彻底打了翻身仗,全国游泳界给予他很高评价。成宽担任和兼任很多职务,除了前举天津市和河北省的一批职务外,他还是中华全国体育

总会委员,第三、四、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体育组副组长,他还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监察委员。

1987年10月,成宽患脑动脉硬化,脑神经萎缩病倒,12月19日病逝,享年八十岁,安葬在天津北郊区回民公墓。河北省副省长王祖武在悼词中说:“穆成宽同志是一位历经沧桑的爱国民主人士,长期从事体育事业,致力于中国游泳事业的振兴和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为中国游泳事业的发展献出了全部智慧和力量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成宽的子孙共有四十六口人,有的在国内,有的在国外,多数仍在为中国游泳事业继续拼搏着。

〔秦文虎 王振智〕

十 达浦生

达浦生(1874—1965年),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大阿訇、教育家,与哈德成、王静斋、马松亭并称“四大阿訇”。

达浦生名凤轩,以字行,经名奴尔·穆罕默德。江苏六合人。出身于阿訇世家,前六代均为阿訇。七岁入蒙馆习汉字;十岁进六合南寺义学,接受寺院教育。十七岁赴南京常巷清真寺,专攻阿拉伯文、波斯文及伊斯兰教经典、教义。1894年,投学北京牛街礼拜寺著名大阿訇王宽,进一步深造。两年后,穿衣挂幃,正式成为一名阿訇。

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动乱年代。1899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战败,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光绪帝接受维新主张,推行新政。“戊戌变法”虽被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镇压而归失败,却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正是在这种变法图强思潮的影响下,年青的达浦生阿訇立志倡新学,办学堂,改革旧经堂教育,振兴回回民族与伊斯兰教。1895年,返回故里的达浦生阿訇在当地回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下,创办了广益回民小学堂。这是他步入社会所办的第一件公益事业,时年仅二十五岁。

1905年,恩师浩然公赴麦加朝觐,达浦生应邀至京,代掌牛街寺伊玛目之职。1907年,王宽朝觐归来,在牛街寺创建回文师范学堂,委任达浦生为校长。翌年,他又协助恩师创办了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提倡“经书两通”,在学堂增订课程,改良教法,经堂中兼习汉文与科学,大力改革旧经堂教育,为近代中国新式伊斯兰教育局面的形成做出了积极贡献。应该说,在那个时期,达浦生的名字和王宽的名字,与新式伊斯兰教文化教育运动,是紧密联

在一起的。

1912年至1917年,达浦生随甘肃提学使马邻翼赴西北,任甘肃省回民劝学所所长兼省视学。他在任期间,遍访甘、宁、青的数十个县区,大力宣传发展教育的重要意义,不遗余力地倡办回民学校,并亲自创办了兰州南关回民学校。正是在达阿訇的教育影响下,兰州穆斯林移风易俗,陆续创建了尚德、崇德、明德等一批新式回民小学。

1921年至1928年,达浦生受聘于上海协兴公司。该公司是以经营海外贸易为主的民营进出口贸易公司,创办于1914年,创办人为上海商界知名人士、河南籍回族穆斯林马晋卿及刘彬如、杨福洲、哈德成等众多阿訇;旨在筹集兴学资金,振兴上海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以商养文促教。为进一步促进中外穆斯林经济文化交流,在公司资助下,达浦生阿訇于1921年出国。他遍访印度、东南亚、中东各国,边经商筹资,边学习、考察伊斯兰教育,与各地伊斯兰学者讲经论道,学习乌尔都语、英语等。后来,达浦生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写道:“余尝数游埃及、阿拉伯、印度等国,观乎彼邦伊斯兰教之精神,心有感焉。对于吾教真谛,每思有所著述,以为宣道传教之助。”可见这次出国经商和文化教育考察,确实使达浦生眼界大开,心有所感,宣道传教以阐扬伊斯兰教真谛之志更加坚定了。

1928年,达浦生回国任上海福佑路清真寺教长。这一年,中国回教学会兴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由达浦生阿訇出任校长。这是一家具有深远影响的新型伊斯兰学校。它以“养成传道著述,翻译阿、波文书籍,教授阿、波文之人才”为宗旨。许多知名的中外专家、学者、阿訇在校任教:买俊三阿訇讲认主学、修辞学、《古兰经》音韵学;马以愚先生授国文、《孟子》、《通鉴纲目》;沙善余、伍特

公、杨稼山等授英语等课；此外，江南著名汉语文学者金煦生、青年历史学家傅统先、埃及亚历山大大学穆罕默德·卡米莱学士、曾任英国驻上海领馆领事的印度籍埃及文科大学毕业生法都里依俩希先生等，也都先后在该校任教。教学内容方面，学校强调进行中、阿、波、英文的“四文”教育；在传授各种宗教课程的基础上，增设数学、地理、历史、教育学、哲学、体育和科学文化等课程；斋月期间，学生还要到各寺应聘，进行宣教实践活动及上海穆斯林各项社会活动。建校十年间，共招四届学生，每届三年，毕业学生六十余人，其中有两届六名高材生马坚、金志晏、定仲明、胡恩钧、马有连、林兴智等被校方派遣至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成为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 with 宗教学识的中国伊斯兰教界骨干力量的摇篮，其中身为校长的达浦生大阿訇功不可没，名垂青史。他以其革新经堂教育的思想与哈德成等先达一道，将中国新型的伊斯兰教育事业推上了一个新阶段。

1929年6月，上海穆斯林青年知识分子傅统先等人创办上海回教青年研究社，其宗旨是“宣扬宗教，发挥教义，改良恶习，注重青年道德之培养，指导青年人之环境，唤起教友团结精神”。达浦生阿訇热情支持这一新生事物，与哈德成、哈少夫一起担任研究社的指导员。与此同时，他又与伍特公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教公会。这是以培养阿訇、广设学校、创立医院与图书馆等为己任的上海伊斯兰教又一个文化教育团体。它以发扬伊斯兰教正义，振兴穆斯林平民教育，“协助完成（孙中山）先总理已始未竟之功，团结教徒辅助国家”为宗旨，制定了五项工作大纲：（1）造就优良阿訇，以发扬回教正义，砥砺道德；（2）广设学校，以振兴平民教育，启牖民智；（3）兴办职业教育，以厚回民生活；（4）延请名人讲演，以实施公民训练；（5）创设医院、图书馆，以培植教民之身体、心灵。该

会因碍于经济困难、人才缺乏及种种阻力,终未能畅达其志;但作为该会创始人及执行委员之一的达浦生大阿訇爱国爱教爱民族之思想与实践,已深深印在各族穆斯林的心中。

1932年9月、10月,上海先后发生了《南华文艺》与“北新书局”两大侮教案,激起全国各族穆斯林极大义愤,各地回民纷纷组织“护教团”、“后援会”,上海穆斯林更是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护教斗争。有二十多名上海回民甚至洗了大净,怀揣利器,准备与侮教者拼命以求得“舍牺德”(殉教)。达浦生大阿訇与哈少夫等一起,一方面耐心做穆斯林思想工作,不搞极端行动,寻求正当途径,进行合法斗争,避免流血牺牲;另一方面则与伍咏霞、马天英等人,在吴凯声律师陪同下,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10月30日,上海回教礼拜寺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事件真相。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在接见回民代表时明显偏袒肇事者,大谈所谓“言论、出版自由”,其倨傲态度益使回民大众同仇敌忾,决心讨回一个公道的说法。10月31日,达浦生所率上海回民请愿团与北平南下的华北护教团会合,向蒋介石政府联合申述“南华”、“北新”两案情由。迫于形势,为解燃眉之急,11月7日国民党当局举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谈话会,会议决定:颁布明令,称政府爱重回民,维护宗教;令《南华文艺》停刊,惩办作者,查封北新书局等。事实上,这些“明令”并未真正执行:《南华文艺》在又出版了一期后由于其他原因而停办;北新书局则是在因哈少夫请吴律师同租界当局磋商后,被强制执行停业三天,此后更名“百新书局”继续营业;两案肇事作者与书刊发行人均未受到应有的惩处。这一结局充分反映出国民党政府推行大汉族主义、侵害少数民族权益的嘴脸。为此,以哈德成为首的上海回教礼拜寺联合会以总辞职表示严正抗议。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达浦生大阿訇

以满腔的爱国热忱,积极联络回族士绅,筹建了浙江路回教难民所、蒲柏路(今太仓路)回教难民收容所,接济受难教胞千余人。12月29日,达浦生乘船只身出国,赴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伊斯兰国家和印度,进行抗日外交宣传活动。在埃及,他用阿文撰写了《告世界回教同胞书》,揭露六十余年来日寇侵华的一系列罪恶事实,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敌的情况,号召世界各国穆斯林兄弟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引起中东各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在印度,他将该文译成乌尔都文予以发表,并拜会了巴基斯坦之父穆罕默德·真纳,向当地上万名群众先后作了九次演讲,为中国抗战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1938年8月回国后,达浦生受到蒋介石接见。他向蒋提议,希望政府帮助在大后方恢复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迫于形势与达阿訇的崇高声望,蒋介石同意由教育部拨款迁校费用,迁上海伊师至甘肃平凉,并按月由西北行营拨发学校日常开支。于是,上海伊师更校名为“私立平凉陇东师范学校”(1941年又改称“国立陇东师范学校”),达浦生亲任校长;招收西北地区及河南、武汉等地失学回族学生约一百四十余人。

1942年,达浦生辞校长职,赴重庆养病,并在此期间撰专著《伊斯兰六书》,于1945年脱稿。全书约30万字。其卷目为:卷一“伊斯兰教泛论”,共4章10节,论述伊斯兰教认主顺圣的重要性;卷二“伊斯兰教教旨”,共5章24节,阐释伊斯兰教本体论;卷三“伊斯兰教中心”,共3章10节,介绍伊斯兰教关于知、行、诚、信关系的主张;卷四“伊斯兰教天道与人道”,共2章12节,阐述伊斯兰教功修、典礼的要义;卷五“明真辟异”,共6章15节,论述伊斯兰教的基本学理,批驳异端邪说;卷六“宗教与科学”,共5章12节,论宗教与科学相辅为用的思想。其中,前三卷为穷理尽性之学,后

三卷为修齐治平之则。言简意赅,论述谨严、透彻,是一部极富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研究力作,反映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及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教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该书脱稿后,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付梓印行。直至1995年,《中国穆斯林》编辑部主编马忠杰先生决定,于第2期开始连续刊发老这一代表作(改用简化字横排,文内部分语句作了适当的技术处理),以“缅怀这位德高望重、爱国爱教的学者”。1945年,抗战胜利,达浦生先归南京,又返上海。1949年,他以七十五岁高龄迎来了上海的解放与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达浦生大阿訇仿佛又一次焕发了青春。1952年,他作为新中国的代表,远赴赫尔辛基参加维护世界和平大会。接着,他作为我国第一届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团长,率团赴麦加朝觐。这次朝觐因故未果,朝觐团中途返国,但在达浦生及全体团员共同努力下,积极宣传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与民族、宗教政策,扩大了新中国的影响。1953年,他与包尔汉、马坚、庞士谦、张杰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任副主任;同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5年,参与创办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任院长。1956年,以周恩来总理顾问身份随团抵万隆,参加了著名的亚非万隆会议,以亲身体会向世界验证了中国共产党人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真实可信、诚心诚意的,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1954年后,他历任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常委。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大力协助下,他再次率团赴麦加,成功地完成了各项朝觐功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哈吉,受到各族穆斯林的衷心爱戴与尊重。此后十年中,他除具体领导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工作、培养新一代伊斯兰教事业接班人外,还协助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在各种社会活动及对外友好活动

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5年,达浦生大阿訇在北京归真,享年九十一岁。

〔冯今源〕

哈德成

哈德成(1888—1943年),中国现代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大阿訇、教育家,与达浦生、王静斋、马松亭并称“四大阿訇”。

哈德成名国桢,以字行,经名希拉伦丁。祖籍陕西南郑。父希龄先生早遭离乱,只身抵沪,遂家焉。德成幼年时,父亲为上海浙江路清真寺三掌教。见其聪颖,不忍废其学,父亲节衣缩食,要他去读“儒书”;稍长,复亲授以阿拉伯文,使其略具经学根底。十六岁,奉父命赴外投学,先后负笈金陵、京江、河南、陕甘诸地,访名师,习经典,历三年,学业大进。旋因闻父病危,自清化星夜驰归。希龄公临终遗言,嘱德成“敬事真宰,毋堕先业,毋徇流俗”;德成“谨心志之”。父归真后,浙江路清真寺执事见德成品学兼优,聘其继先父职。因月入不足以养家自给,他刻苦学习英文,赖给人打字所得以补生活所需。与此同时,他未曾一日忘习经学,只要有时间,总要手捧一卷经书,边读边记;遇有外来经师、国外同教,他就虚心求教,共相切磋。因此,其学问大进,且能熟练地掌握阿、波、英、乌尔都等几门外语,为日后大展鸿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久,寺中公推德成任副教长。

此时,上海发生了一件“回耶辩教”事件,引起年青的副教长哈德成关注。上海耶稣会印行一本小册子,是英人季理斐1911年所著《回教考略》。它“以耶稣教徒之眼光谈说回教,颇有诋毁之处”。如书中诬回教“附会耶稣”,“无非托古以自立”,信其教者“恃强好斗,战法凶勇”;“其教得一点真理,系自犹太国传来者”;称穆罕默德初受启示时“未敢遽信也,恐是鬼迷其心”;“其所定之例,如一人可娶四妻,而已之阍内则有九妻二妾之多。人有以此诘之者,则诿

为上帝所默许”。^① 上海穆斯林见其“语多诬蔑，群情激愤”。耶稣教士李佳白设立尚贤堂，声言要“协合各教之旨”，其实意在辩教，扬耶抑回。哈德成阿匐乃往尚贤堂访李佳白，“旁征博引，条引书中乖谬诸事”，一一批驳。“佳白无词，卒焚书毁板以谢。于是风波顿息，阿衡之声誉遂远播矣。”^②

1913年，哈德成赴麦加圣地朝觐。面对着亿万穆斯林心中的圣地克尔白，他默默地立下誓言：献身正教，弘扬伊斯兰精神！翌年归国，遂纠合马晋卿、刘彬如等教中同志，共谋裕款储才兴学之计，创办了协兴公司，经营海外贸易，发展穆斯林经济，冀以赢余为兴学之资。不久，受公司委派，哈德成出任驻锡兰、埃及经理。因业务所需，他得以赴中东各国，访硕彦名宿，讲学论道，考察各地的伊斯兰教文化、教育、历史、法学、古兰学等。他曾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一年，向那里的专家教授学习经文典籍，进行伊斯兰学术交流，其学问益加博深。他从国外带回大批伊斯兰教经典文献，后来经印行，在我国各地获广泛传播，推动了国内伊斯兰教文化事业的发展。

1924年，哈德成结束了长达十一年的国外伊斯兰教文化、教育考察，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被聘任作浙江路清真寺教长。满腹经纶的哈德成大阿匐开始一步步实现其振兴伊斯兰教文化的宏伟计划。在每周星期五的主麻日聚礼时，他常常即席以几种不同的语言讲“卧尔兹”，以满足不同国籍穆斯林的需要，深受国内外穆斯林群众的好评。他对《古兰经》经文的娴熟记忆与准确理解，尤令

^① 《中国回教史鉴·序》（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② 白寿彝《哈德成阿衡墓表》，载《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年）》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636页。

人叹服。每逢有人咨询求教,他立刻举出经中某章某节为据,侃侃而谈,无须查书检阅,从而获得“《古兰》活字典”的美誉。他在寺院内开办了阿拉伯文补习学校、《古兰经》补习班,兴办了普通的回民学校,倡办伊斯兰教育基金会,将自己振兴伊斯兰文化教育的思想付诸实践。

1925年,哈德成与上海穆斯林闻人马刚侯、伍特公、马晋卿、沙善余等共同发起创办了中国回教学会,发行《中国回教学会月刊》。这是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做出很大贡献的一个学术文化团体。以马刚侯为干事长(会长)、哈德成为副干事(副会长)的中国回教学会,“硕彦名流,云从雾集”,揭开了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篇章。在学会《月刊》上,不仅逐期连载伍特公、沙善余等合译的《古兰经》前三卷译文,更发表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伊斯兰教学术著作。如:伍特公(天真)的《振兴回教之管见》、《宗教顺时维新说》、《精神兴教说》、《明道达变说》,达浦生的《振兴回教刍议》,王梦扬的《哈德成阿訇讲演录》,一善的《伊斯兰之教诲》,守愚的《伊斯兰与社会主义》、《伊斯兰与基督教之比较观》(译著)、《回回教与摩尼教》,泽农的《伊斯兰之罪恶观》,啸渔的《伊斯兰与欧洲哲学》(译著)、《阿拉伯简史》(译著),尹伯清的《回教与回族辨》等。这些文章鼓吹顺时维新、发展教育,反对泥古守旧,批判蒙昧主义,提倡研究经义,推动《古兰经》汉译事业,阐释教长职责,抨击“以经卖钱”的陋习等,在宣传新思想及伊斯兰文化方面立了汗马功劳。在中国回教学会同仁的共同协助下,哈德成与达浦生等创办了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1928—1938年),达浦生任校长,哈德成任教务主任并担任义务教学工作。在培养新一代伊斯兰教骨干力量方面,该校做出了突出贡献。马坚、胡恩钧、金志晏、定仲明、马有连、林兴智等六位高材生,赴埃深造,即是上海伊

师努力的结果。1939年,在马晋卿先生资助下,哈德成、伍特公、沙善余等发起组织了中国回教学会译经委员会。为译经,哈德成阿訇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据《上海宗教史》记载,1941年10月学会出版了《汉译古兰经第一章译解》一书,全书约10万字,伍特公(道隐)译著。实际上,这是“由哈德成阿訇口译全文,并依据有关《古兰经》本子,对原文逐节、逐字讲解,伍特公笔录,并参照穆罕默德·阿里的英译本,译出初稿,撰写讲解全文,由沙善余校对,反复斟酌,最后复请哈德成阿訇审定。”“1940年学成回国的马坚先生参加了译经工作,在哈德成教长帮助下,经过一年多时间,已译出《古兰经》13卷,迫于当时形势日渐恶化,译经暂停。”^①白寿彝教授也曾指出:“阿衡虽未执笔其间,而字义之斟酌,训释之商定,恒与一再往返,不惮烦劳也。”^②1932年,在反对《南华文艺》、“北新书局”两大侮教案的斗争中,以哈德成为首的中国回教学会、上海回教礼拜寺联合会,领导上海穆斯林同反动当局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民族尊严,受到鲁迅先生的敬重与称赞。

1937年,日寇侵扰上海,流离失所的难民日众。哈德成阿訇以上海租界为屏障,同达浦生等共办难民收容所于清真寺中,数以千计的穆斯林难民因以得济。“自是五年,阿衡日处惊骇浪涛之间,屹然自持,恒相机示教胞以忍辱待时、救国家救民族之道……我教胞之得以巍然独维正气于人间鬼域,是因正教感召之伟大,抑阿衡宣导之力有足多也。”^③

1941年12月以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因哈德

① 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59、517页。

② 《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年)》上册,第637页。

③ 同上。

成声望素孚,敌伪欲利用之。但哈德成置敌人威逼利诱于不顾,为保持民族气节,他别妻离子,化名马国成,乔装作商人,于1942年3月悄然离沪。他历经皖、豫、陕、蜀,辗转数月,抵达重庆。国民党政府委以编译委员会主任之职,意欲拉拢阿匄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服务。但他对那里庸俗的官场作风极为反感,又兼气候不适,不愿久留,决定离开。1943年1月,在欢度“古尔邦”节之后,他取道昆明,直奔云南沙甸,寻其高足马坚(子实),共同从事译经工作。

在沙甸的日子里,哈德成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为译经,一为授课。致力于《古兰经》汉译工作,可以说是他毕生一大心愿。限于条件,虽未亲自实现这一愿望,但他始终不懈地为之努力着。他将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得意弟子马坚身上。这次,他离开重庆到沙甸,就是要与马坚一起实现长期以来埋于心底的这一夙愿。在沙甸,他住在白亮诚先生家中,终日与马坚、马元卿、张子仁等人一起,探讨经文奥义,切磋疑难问题,以马坚的译稿为底本,逐词逐句地推敲译文。他对《古兰》经文的熟练掌握,对经义的深刻把握,令人折服与敬佩。因此,可以说,后来马坚先生汉文《古兰经》译本中,同样也凝聚着哈德成大阿匄的无数心血。

在沙甸,哈德成还参加了当地养正学校的教学工作,为培养伊斯兰教的新一代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沙甸私立养正学校,1940年4月由白亮诚先生独资创建。其建校之意在于改革旧式经堂教育,提倡中阿并授的新型学校教育,以“养育俊秀振兴圣道,正培贤能阐扬主光”为宗旨,以粗通阿拉伯文学、精通阿拉伯语言、能通读伊斯兰教经典、有自学阿文能力和较好的中文基础、毕业后选送埃及留学深造为目的。哈德成阿匄全力支持这一教育事业,欣然应允在养正学校担任《古兰经》诵读课,每周两节。他那纯正清晰的读音,抑扬顿挫的诵读,极富感染力,使受课学生大受其益。与此

同时,他还经常为当地的阿訇乡老们讲解经典、答疑解惑,要学生们列席旁听。他渊博的学识,正直的人品,平易近人的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至今仍令沙甸父老难以忘怀。

哈德成大阿訇一生以振兴伊斯兰教育,弘扬伊斯兰文化,翻译伊斯兰教经典,培育伊斯兰教人才为己任;以“爱国、爱民、爱教”为处事指针;以“静坐当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为严格要求自己的座右铭。虽文字著述不多,但他发表的那几十篇演讲,如《回教与社会之关系》、《回教的要旨与道德》、《就任浙江路清真寺教长宣言》等,以及主编的小丛书《回教初步浅说》等,在社会上都颇有影响。

1943年10月25日,身心交瘁的哈德成大阿訇因病医治无效,弃世归真,年仅五十六岁。白亮诚先生偕沙甸同教将其安葬在鱼峰山麓,使长眠于沙甸的土地上。六个月后,伍特公、沙善余先生以古汉语译《古兰经》脱稿;又四个月,马坚的语体译稿亦成;五十年代,马坚译本前八卷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与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马坚的通译本《古兰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哈德成大阿訇的未竟事业后继有人矣。

[冯今源]

王静斋

王静斋(1879—1949年),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经学家、翻译家、大阿訇,与哈德成、达浦生、马松亭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阿訇”。

静斋名文清,经名叶尔孤白,以字行。清光绪五年(1879年)农历二月初二日诞生在天津清真北大寺附近一阿訇世家。八岁时始学习阿拉伯文,受教于其父兰庭阿訇膝下。后来他在《五十年求学自述》中回忆道:当时自己贪玩,“因此屡受先父痛挞,邻里亦多白眼相加。戚友怂先父迫我改途,先父不可,居恒语余曰:‘汝既知戚友不以尔为可造之材,自当努力上进。异日学成,能集二三子课读,余愿已足,不敢再作非分之奢望也。’云云。余闻而窃自奋曰:异日得志,除弊风,扬真理,愿天下人皆得正道!”

光绪二十年(1894年)起,静斋正式进经堂学习阿拉伯语读本及浅近教法学十余种,间亦涉猎一些波斯语。不久,他又先后投于李长贵、马玉麟、于勉斋、金连荣、刘绪魁、海思福等阿訇门下。其中,于勉斋、海思福二师对其影响最大。于勉斋,讳志诚,山东恩县满庄人,京津地区著名阿訇。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勤于拜功,谈吐儒雅,精于典籍,通晓伊斯兰教教法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国学)亦颇有研究。其学问、品德及宗教操守令静斋敬佩,他对学员既严格要求又耐心教育更使静斋愿意聆其教诲。从1897年至1905年,他先后任教于北京、河北各寺时,均有静斋随往;1905年在安育清真寺,他亲自为静斋“穿衣挂幛”,举行毕业典礼。在河间任教长时,他特别注意对静斋进行汉文化的培养,要静斋到县考考棚的临时市场上购得《五方元音》、《玉堂字汇》各一部,刻苦攻读汉

文。后来,王静斋能成为伊斯兰教经典汉译家,应该说是与于阿匍循循善诱、全面培养、严格要求有直接的关系。海思福(1821—1918年),字全五,沧州孟村丁庄名阿匍海四爷之子,名震华北,享誉阿拉伯世界。品端学粹,貌亦非凡,为华北地区“提倡遵经革俗之第一人”。居恒不好多言,遇事则词锋甚锐。擅长排难解纷,重口德,戒诬蔑。对教中新旧派问题有自己明确看法,说教全凭正当经典,从不逞意气,颠倒黑白,闹无原则纠纷,深受静斋推崇。海老酷爱学习,又因经济力充足,购存“印版西经”(阿拉伯文、波斯文经典)最多,对静斋影响甚巨。1903年至1904年在丁庄寺海老门下求学期间,王静斋茹苦含辛,忍饥耐寒,求学之志弥坚,每晚利用独居寺中之机,闭扉如饥似渴地阅读海老所存经典二百余种,如大部头的《沙米》(五巨册)、《斐特哈盖低勒》(八巨册)等,均一览无遗。这使他受益良多,发现前辈阿匍因袭相传的“错误不少”,为日后倡“遵经革俗”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此外,1914年至1916年,海老还与冠县沙锦章、沧县李正芳阿匍一起,以经堂语气原文直译《古兰经》六巨册。译稿虽因故未刊印发行,但作为教内直接由阿文原典译经的先行者,对静斋日后译经事业也有示范意义,影响不可低估。

王静斋一生以追求学问为最大的乐趣。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终于使他成为中国伊斯兰教一代宗师。他通晓《古兰经》经注学、圣训学、教法学、教义学及伊斯兰教历史,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对古汉语、英语亦有相当造诣。历任河北、北京、辽宁、黑龙江、天津、山东、台北等地十余所清真寺教长,设帐讲学,弟子众多。1922年至1923年,因“耻于应具之知识落后,当为之善功有缺”,为扩充眼界,增广见闻,取长补短,考察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实况,以便日后在华推广新式伊斯兰教教育,有益于国家与教门的进步和

发展,在马君图、马榕轩等人资助下,王静斋偕弟子马宏道从天津出发,经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印度麻达拉司、孟买、苏伊士,抵开罗,考入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在此期间,他抓紧一切时间刻苦学习,每天除在校受课外,还要携带纸笔赴埃及国立图书馆阅书并随时抄录。“于是,千百年来未经前人解开之疑问,得以解决者很多。”1923年秋,与马宏道赴麦加朝觐后,顺便在沙特阿拉伯各地及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安卡拉等地游历,考察伊斯兰世界现状,受到近现代伊斯兰教改良主义思潮一定程度的影响;还搜集和抄录了阿文经典六百余种,为后来从事译经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9月,在弟济民、子宝琮协助下,王静斋创办了《伊光》月刊,自任总经理兼编辑、记者;尹伯清、陈鹭洲、张石麟、王辉庭等先后任编辑、会计、发行等。在《创刊词》中,王静斋写道:“现今的世界,非从前可比,东西洋如同是里外屋,种种的消息时发时至,所以国际间相需互助,各施其发展国权的巧妙手段。独有我国的同人,对于国外本教的消息茫无所知……本报愿作国人的耳目,按期将本教各国的近闻介绍给大家……作各方穆民同胞研讨学问、互换智识的小机关。”社址设于天津清真北大寺。月刊每期4版,1万多字,内容丰富,有经训、教义、教法、教史等译文,也有述评、游记、人物介绍、专访、问题讨论、新闻报道、各地教务活动、答读者问等栏目,全面介绍伊斯兰教历史、文化,介绍中国穆斯林生活,宣传马果园等人“遵经革俗”的宗教主张。大部分文字均系王静斋亲自译写或撰写。创办《伊光》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为此,他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从创刊至1939年2月止,坚持出刊长达十二年之久,月刊印数每期一二千份,读者遍及全国,全部免费赠阅。抗战期间,社址频繁变更,常常是王静斋走到哪里,就把社址设在哪里,把《伊光》出版在哪里,充分体现了静斋阿匍百折不挠、一往

无前的精神。可以说,《伊光》月刊不仅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的宝贵资料,在中国伊斯兰教报刊史上占一极富特色的重要地位;更是全面了解和研究静斋阿訇品德、思想、学问、性格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王静斋阿訇一生清贫,不断追求进步,爱国爱教,刚正不阿。二十世纪初,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国伊斯兰教与回族新文化活动也拉开了序幕。1906年,童琮在镇江创办东亚穆民教育总会。1907年,国内14个省的36名留日回族学生发起组织留东清真教育会;天津回民丁竹园出版《竹园白话报》;北京丁宝臣出版《正宗爱国报》;1908年,留日回族学生出版《醒回篇》。与此同时,1907—1908年,锐意兴办新式回民教育的王宽大阿訇,在北京相继创办了回文师范学堂和京师第一两等小学堂,经学之外兼习汉文与科学知识,成绩斐然。对于这些新鲜事物,青年阿訇王静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订阅《竹园白话报》、《正宗爱国报》、《民兴报》、《大公报》、《法政浅说》等报刊,阅读《饮冰室》、《中国魂》等书籍;主动向耶稣教徒王某学习英语;并于1912年申请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立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支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宏伟大业,参加国家的社会政治运动。他经常为《正宗爱国报》、天津《民兴报》投稿;也曾于1915年一度担任《北京新报》编辑,代张子文阿訇编辑《回教史》、《雷门鼓》两个栏目。在新保安,他曾力倡改革当地回民婚礼旧俗;在大厂,他曾大力宣传伊斯兰教严禁重利盘剥的规定;在安育村,他在正课之外向学员增授《回耶辨真》及汉字读本。三十年代后,他更是“一反往常之从俗敷衍”,立志“摆脱旧束缚,改造新环境”,积极倡行“遵经革俗”。1930年1月,他在《伊光》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提出:“假若《马克思全集》、《列宁丛书》人手一篇,均悉其义,则中国各省绝少任何之反动也。”1937年日本悍然

发动侵华战争。1938年,针对马良筹组伪中华回教公会,王静斋与时子周等在郑州组织成立了中国回教抗日救国协会。在《伊光》上,他发表了大量抗战文章;在所译解的汉文《古兰经》中,他对有助于抗战的经文多加注释并借题发挥,鼓吹抵抗侵略,扶持正义,不怕牺牲,是穆民应有的信仰;要坚信中国人民的“圣战一定获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战终归败北”,“勿信逆徒的蛊惑而变节”,“慎防奸人乘机造谣”。他多次撰文痛斥降敌卖国行为,无情地揭露汉奸的丑恶嘴脸,主张以抗日与否作为分辨良莠善恶与真假学者的标准。他说:“学者一当汉奸,他那人格破产,他那学业亦连带得一文不值了。”

王静斋毕生从事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翻译伊斯兰教经典,成果等身。其学术成果主要可分为三类:(1)各类文章与作品;(2)译著;(3)《古兰经译解》。

王静斋一生撰写了大量文章,其代表作有《五十年求学自述》、《我之译经小史》、《中国近代回教文化史料》、《发扬伊斯兰文化之必要》、《巡礼游记》、《中国回教经堂教育的检讨》、《中国回教掌故》、《喂!果园马老阿衡逝世矣——一代贤豪,生来值得》等。在这些作品中,王静斋以其特有的语言风格,如实地记述了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中国伊斯兰教学术文化资料。

王静斋的译作也很丰富。1914年任山东宋庄清真寺教长时,他以五个月时间翻译了印度名阿匍赖哈麦图拉的《伊祝哈鲁络汗格》,名曰《回耶辨真》,上下两函,共6章13节,北京牛街清真寺书报社出版发行。1928年,出版自己编译的《中亚字典》(俗称“王氏小字典”),“除解释纯粹亚拉伯字句,并考证先达译而欠妥之字句外,更诠释近年列入亚拉伯文中之意、法、波、西、希腊等国译音字

句,以及埃及与叙利亚之土语”,为习学阿拉伯语和汉语提供了方便。1931年、1935年,先后出版《选译详解伟嘎业》第1集、第2集。1936年,在北平西单牌楼回教俱进会总部,组织“中国回教典籍编译社”,开拓《欧母代序文》(回教法学通论),并修润赵明远之母丁蕴辉女士遗稿波斯文的《老欧母代》,均得以刊行问世。同年,又译《回教遗产继承法》、《回教亲属篇》。1947年,以六十八岁之高龄译波斯诗人萨迪的名著《古洛斯坦》为《真境花园》,4月由北京清真书报社出版发行。

王静斋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他的三部《古兰经译解》。1925年,即他朝觐及埃及留学归国后的第二年,便开始着手翻译《古兰经》,历时四个月,译稿全部完成。因自感“译词欠妥”,将译稿束诸高阁,仅从中节选出一本《赫提》刊出,以作投石问路之计。不久,接受北京赵文府先生建议与300元资助,在北京东四清真寺南讲堂再次试译。在侯德山(松泉)等人赞助下,历二十阅月,终于完稿,存于侯氏之手。1932年,这部《古兰经译解》(甲种本)由中国回教俱进会刊印于北平。全书为绿色布面精装16开竖排本,书名为楷体字烫金,译者署名王文清,扉页有许宝蘅篆字题签。卷首有徐世昌、许世英的两篇《序》和侯德山的《弁言》,有译者所写《凡例》10条、《标点用例》14则。正文共594页,总计约30余万字。译解皆用文言,释文简略、扼要,译文准确、易懂。

1937年12月17日开始,着手译经堂语体的《古兰经》。至1938年12月7日,在颠沛流离中完成全经译稿。惜译稿尚未修正,1940年突然被日军飞机炸毁。9月,他移居重庆北碚云龙山庄,重整旗鼓,独居斗室,通宵达旦地译经不止。至1941年3月17日,再次译完全部30卷天经。旋即应邀赴宁夏整理译稿,翌年8月整理完毕,9月—11月石印60部“非定草”,即《古兰经译解》(乙

种本)。线装 10 册 16 开本,行体字誊抄,行款整齐、美观大方。卷首有马鸿逵《序言》、译者《自序》、《译者述》、《古兰天经章目》、《古兰天经“注”“说”提要》及《例言》,附参考书目 8 种。其中《古兰天经“注”“说”提要》共计 600 余条,以精炼的语言揭示各节天经的主旨或内涵,极富特色,充分展示了静斋阿訇对天经的深刻理解,对研究译者的经学思想有极重要的学术价值。译文内容与丙种本相近。

1938 年 12 月 1 日,在乙种本译稿即将完成之际,王静斋即已开始了他的丙种本汉译工作。该译本,他初名之为“白话汉译古兰天经”,用普通白话体裁,并加《哲俩来呢》原注,有时还补以《侯塞呢》、《煮麦利》等经注;详加注释,对每节经文颁降的原委都考证清楚,无一缺漏;有助于抗战的经文,多加注释并借之有所发挥。1945 年夏,王静斋飞抵重庆,以译稿就正于乡友时子周先生。时君熟读穆罕默德·阿力英文译本,对《古兰经》内容颇有心得;同时,更佐以郁思甫·阿力的译本对照。历时不足两个月,凡译稿中未能决定之译句,大多迎刃而解。1946 年 10 月上旬,上海永祥印书馆正式出版印行《古兰经译解》(丙种本)五千部。该译本布面精装 16 开,封面由白崇禧题签。全经有注释 1943 条,另有“略解”、“附说”和眉批,对译文详加注解及发表译者个人看法,是深受国内穆斯林信赖和喜爱的《古兰经》汉译本,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据王静斋在一些文章中透露,自 1937 年春起曾一度着手译丁种本《古兰经》。后因听说唐柯三、孙燕翼、马松亭、王梦扬等共组译经团体,由唐氏充任汉文主稿,遂将这一工作计划搁浅。

1948 年,六十九岁的王静斋出游西南各省,考察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教育及学术研究情况。下半年,应台湾穆斯林邀请,出任台北清真寺阿訇。因不惯于当地生活习惯和各种环境,只呆了几个

月,于翌年春返回大陆。不久,在旅经贵阳时,因积劳成疾,终于一病不起,于5月25日(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归真,享年七十岁。去世后被安葬于贵阳郊外白桦山回民公墓。

〔冯今源〕

马松亭

马松亭(1895—1992年),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大阿訇、社会活动家和回族教育家,与王静斋、哈德成、达浦生齐名,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阿訇”。

马松亭阿訇名寿龄,以字行,经名阿卜杜·拉希姆,北京牛街人。出生于贫苦的穆斯林家庭,幼孤,遂进牛街寺作小“寺师傅”。先后投于达浦生、张子文、王友三等大阿訇门下,并在此期间有幸亲聆土耳其学者阿里雷抓的《古兰经》读法。名师出高徒。经过这几位名师教化,马松亭不仅打下坚实的经学基础,而且受到许多新式伊斯兰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对他教育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首推张子文阿訇。

张子文(1875—1966年),名德纯,以字行,经名艾布·伯克尔,辽宁本溪人。学识渊博,通晓阿拉伯、波斯、俄、德等多种外语,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大阿訇、教育家。马松亭、马善亭、杨明远、李廷相、赵铭周等一批知名阿訇俱曾在其门下习经。马松亭从1908年始,即到北京牛肉湾清真寺跟从张子文阿訇;以后又随他到马甸、花市等寺,前后长达七年之久(1908—1914、1919年)。张子文是改革旧经堂教育制度的先行者,早在1898年就开始了清真寺中阿文兼授教育教学的实践活动。此后,又与王浩然阿訇等共同创办清真教育会,积极倡导清真小学教育、师范教育等伊斯兰教育改革。1912年在花市寺任教长时,他改第五清真小学为“清真文化小学校”,实行培养伊斯兰组织会长、清真寺教长、回民学校校长的“三合一”教育体制。这种教育体制使马松亭大受其益。后来,马松亭将这种体制总结概括为新式经院“三长制”的教育体系,并纳

入自己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此外,张子文在经学教育中,加入汉语文、自然科学等内容及编唱“校歌”的教育活动,对马松亭创办成达师范也应有相当的示范意义。

马松亭是在跟从王友三大阿訇一年后,在花市清真寺由王阿訇为其“穿衣挂幛”的。此后,他依次受聘于北京西单、河北涿鹿、北京花市等地清真寺。1924年,经天津马人圃先生推荐,他应邀赴山东济南穆家车门(西关)清真寺任教长。历史证明,这是马松亭走向辉煌创业至关重要的一步。

济南穆家车门清真寺能成为成达师范的摇篮,绝不是偶然的。这里聚集着一批回族穆斯林的有识之士,更有一大批渴望摆脱回回民族一贫二愚落后面貌和社会地位的穆斯林群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爱国老人马云亭为首的济南穆斯林,成立了“回教后援会”和“十人团”,与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坚决不做亡国奴”的爱国口号。最后,马云亭等壮烈牺牲于反动政府的屠刀之下,而直接镇压与杀害他们的刽子手正是同属回族的济南镇守使马良。爱国志士的鲜血擦亮了济南穆斯林的眼睛,使广大回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认识到要改变回民政治上被统治、经济上受剥削的社会地位,必须促进回汉团结,培植回民的国家意识,民族兴旺则国家强盛,民族衰败则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为此,就应改革旧的经堂教育,提高回民文化,发挥回族固有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一大批适应于时代发展与进步的回民领袖来。基于这种认识,济南当时的回族名士穆华亭先生在自费朝觐麦加归来后,即捐献私宅建成穆家车门清真寺,延聘名经师,改革传统教规教法,并与济南道尹唐柯三、穆斯林闻人法静轩、马绂生等一起筹办新式伊斯兰学校。

这时,风华正茂的马松亭阿訇,有鉴于旧时中国清真寺培养的海里凡只识阿拉伯文、波斯文而不谙国文汉语,只会念经了事而不通一般社会知识和近现代科学文化,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久蓄改革旧经堂教育之志,却在京师苦无施展宏伟抱负之舞台。故收到邀请后立即欣然受聘,赶赴济南穆家车门清真寺,在穆华亭、唐柯三等人大力支持与赞助下,以“成德达才”之意,创建了后来名闻遐迩的成达师范学校,揭开了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教育史上一个新篇章。

马松亭认为,使中国伊斯兰教延续了千余年生命的旧经学教育,是一种“保守式的教育”:“课程方面以文法科居多,对于义理典籍比较少些。至于社会常识、公民常识、自然、史地以及国学各方面,差不多付之阙如。所以这种教育,谈不到什么时代精神、国族意识,无形的与中国社会隔绝,造成独善其身的局面。这种弊端,是很显然的,基于这种认识,更坚定我们创办改良回教师范教育的信念。”^①于是,1925年4月24日,马松亭等人克服了校址狭隘、经费拮据、师资缺乏、学生缺乏、课程难定、职员缺乏等诸多困难,创建了成达师范学校,并于该年8月正式开课。

学校设立董事会,由穆华亭、唐柯三、马松亭、法静轩、朱蕴韬等十二人组成。唐柯三任校长,马松亭任总务主任并兼任阿拉伯文及宗教课程教员。唐柯三时任济南道道尹,故仅是名义上担任校长,实际上的主管人还是马松亭。因经济困难,马松亭不仅主持教长职务及授课,还要担任校工的工作:摇铃、操作;而且还是厨师之一。阿文与宗教课虽一度有王静斋、张鸿韬一起任教,但王静斋

^① 马松亭《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见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下册,第1035—1036页。

仅教了半年即离开济南,张鸿韬是济南清真西寺阿訇,教学任务主要由马松亭承担。

成达以造就健全师资、发扬伊斯兰教文化、恢复回族固有精神、增进回民对于国家的效能为目的,提出:遵照国家教育宗旨,“施行师范教育,以造就健全师资,启发回民智识,阐扬回教文化为宗旨。”马松亭认为,启发回民智识与阐扬伊斯兰文化密不可分。“换言之,阐扬回教文化,即启发回民智识也。况回民在精神上、意识上,很多的地方是由回教文化造成的,这种精神是世界回民能够在急风暴雨中生存的因素。在中国文化失掉重心,而中国人民意识上极散漫,以致沦落到这种地位的今日,回教文化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有相当的需要;所以阐扬回教文化,即中国图强之一道。成校之目的,即在教育兴教,宗教救国。”^① 为此,他提出教长、校长、会长“三长”一体的新型阿訇人才培养计划,要求成师培养出来的人才“至少可以担任下列的三种职务:1. 宗教方面,能担任教长或教师。所谓教长,就是上述的阿衡;教师是普通领导人才,希望能以教长的地位,领导全部的回民。2. 教育方面,能担任普通小学或社会教育行政或教授的职务,利用教育的力量,作基本的领导启迪工作。3. 社会方面,能担任民众组织与社会之团体领导或助成的工作,利用团体的力量,来领导回民的种种社会活动。”^② 也就是说,成达师范培养的人才应是德才兼备的回族中坚和骨干,他们既精通阿拉伯文又通晓国文;既精通伊斯兰教经典教义又了解一般科学文化知识;既能在清真寺内主持和领导宗教活动,又能担任回

① 马松亭《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见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下册,第1038页。

② 同上。

民学校的校长,从事普通的文化教育工作,还能走出清真寺,组织回族文化团体和回族群众从事文化事业与社会活动。

历史已经证明,马松亭大阿訇关于培育回民英才的愿望基本上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成师培养的一大批回族人才,大都成为弘扬伊斯兰文化、回族文化的骨干力量,有的从事翻译工作,有的著书立说,有的任教于高校,有的任职于统战、民族、宗教事务部门或宗教团体,甚至成为外交、外贸工作的人才。如今健在的张秉铎、马金鹏、周仲仁等先生就是他们的优秀代表。

成师的成就与马松亭大阿訇呕心沥血的勤奋工作是分不开的。成师创办不久,即因“五卅”惨案发生而被迫停办。马松亭为此四处奔波,经与多方协商,决定从济南迁校址至北京东四清真寺后院。1929年2月迁校后,吸收了一批北平的学生,学生数由第1期十二个人的一个班增至三个班,易校名为“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延聘国内知名阿訇,如张子文、马自成、庞士谦等,担任教育教学工作,师资力量大增。为利于优秀学员深造,马松亭阿訇1933年、1936年两次风尘仆仆,飞赴埃及,晋谒埃王福德一世及新王法鲁克一世、爱资哈尔大学校长佐瓦希理·木拉威先生等,宣传“发扬回教文化、沟通中西文化”之重要意义,蒙其允准,由埃及公费接受两批中国穆斯林学员至爱大深造,同时聘请两位埃及教授来成达师范讲学。于是,才有了1932年12月韩宏魁、王世明、金殿桂、马金鹏、张秉铎等五位成师毕业生赴埃留学,才有了1938年成师教员庞士谦阿訇所率法鲁克留埃学生团的产生,才有了埃及赛义德·穆罕默德·达理及穆罕默德·伊卜拉欣·福力非乐两位博士的来华授课。抗日战争爆发后,马松亭阿訇率成师学生迁校至广西桂林。不久,成师由民办改为官办,他才从繁重的成师教育教学工作中逐渐解脱出来。如果说,在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成达师范学校

做出了积极的重大的贡献,那么,马松亭大阿訇就是成就这一贡献的第一大功臣。

与成达师范教育同具重要意义的几件大事:一是创办富有时代精神的民族与宗教综合性刊物《月华》;一是成立成达出版部,印行伊斯兰教经书与学术著作,出版《成达文荟》;一是创建福德图书馆,征集中外文图书上万册;一是邀请教外著名学者,如顾颉刚、韩儒林、冯友兰、张星烺等,以及成师学生定期发表专题学术演讲。这几件大事的完成,标志着成达师范学校成为近代回族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校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学学术文化中心。马松亭阿訇的名字与这几件大事的顺利完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马松亭阿訇并没有将精力仅仅局限在创建成师这一个学校上。在发展成师文化教育事业的同时,他还协助创办了北平西北中学、中才小学、新月女子中学等多所回民学校。抗战期间,与顾颉刚、冯友兰等共同倡议发表《72教授抗日宣言》。1943年任重庆十八梯清真寺教长时,创办一所伊斯兰教经学研究班。1945年回北平后,任东四清真寺教长,并在寺内成立北平伊斯兰经学班,在成达出版部基础上创办伊斯兰出版社,恢复《月华》杂志社并复刊,同时增出《月华周报》;与胡适先生联系,保送部分回族学员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阿拉伯语专业。1949年因避战乱而暂居香港。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接受周恩来总理邀请由港返京,先后任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中国回民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7年后,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又遭迫害,但他爱国爱教之志始终不渝。“四人帮”垮台后,马松亭冤案得以平反,他又以饱满乐观的积极态度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89年,《性风俗》一书

出笼后,激起上海及全国各族穆斯林的义愤。年逾九旬的马松老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毅然飞赴上海,亲自做上海穆斯林的思想工作,为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安定,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再立新功。在学术研究方面,限于汉文化水平不高,撰述有限,仅有《古兰经要义》、《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汉译古兰经首章》等几篇作品;此外,民国时期还与老友王梦扬先生合作,在电台发表了《回教与人生》的著名演讲。但这些作品都以其丰富的内涵、深刻的思想、可靠的资料赢得人们的喜爱。

1992年1月16日,备受中国各族穆斯林尊敬与爱戴的马松亭大阿訇在北京归真,享年九十七岁。

[冯今源]

十一 杨敬修

杨敬修(1870—1952年),字仲明,号秀真,以字行。经名萨里哈,世称杨才子。清同治九年(1870年)农历七月生于河北省盐山县东段儿庄。父母早亡,由祖父母抚养成人,在兄弟中排二。大约在杨仲明七八岁时,全家逃荒到百余里外的天津海下新城镇。他少年时就到清真寺作“海里发”,学习阿拉伯文及波斯文,后来又学习汉文。据记载:“幼年从张九阿衡在本乡求学。张因其性情倔强,不欲造就。年长改从‘梆子大爷’,又从李正光。因其具有过分的聪明,人多呼为‘杨才子’。……特别追求汉学,年满三十而读遍各子书。”^①他还向著名阿訇海思福学习过。从他十九岁那年(1888年)用阿文写的诗《偶成》来看,阿文修养已经相当深湛。后来考中了秀才,又考举人,因考卷弄脏而未中。

十九世纪末,中国国势危急,处于生死关头,先进的中国人纷纷喊出救亡图存的口号。《天演论》于1898年4月出版,成为人们用来救亡图存的精神武器,风靡全国。有感于回族的不振,杨仲明于1898年冬写成了《四教要括》一书,时年二十九岁。书于1908年出版,1914年再版。他在《四教要括》的《序》中批评了伊斯兰教“闭关自大,人几不知为何物”;“教育缺乏,素少通人达士”,所以造成了落后局面。在《例言》中又批评本教“不思进步,竟至事事落后。……知己不知人”。有鉴于此,所以杨氏在这部书中用开放的态度介绍了孔、释、耶、穆四教,重在阐扬穆教。书中大量引用西学

^① 王静斋《中国近代回教文化史料》,载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参考资料选编》(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材料,特别是《天演论》。他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改成“教竞人择,适者存留”,以唤起沉睡之回民。这部书使当时的回族人耳目一新。而此书的新的思想方法,即开放的态度,最具时代特色。

1908年他把夫人马氏和儿女接到北京,从此就在北京花市定居下来。北京回民众多,人文荟萃,杨氏认为是从事振兴回族活动的好地方。1909年(宣统元年),他首先写了《创建穆民总教院表》。所谓“穆民总教院”,就是全国性回民组织。在这个文件中,他把创建这个组织的意图、方法、组织、经费等等,作了详尽的说明。这是建立全国性回民组织机构的最早倡议。尽管杨仲明本人未能亲自参与建立这种组织,其后这类组织的建立无疑是深受这个文件的影响。这个文件对当时整个回族的文化复兴起着纲领的作用,所以钱伯泉先生称它为“一份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倡议书”。^①

1909年,他在北京花市清真寺创建了“清真教育会”,王宽等人均参加。他给民政部申请立案的呈文里说:“……回民于中国文绝少问津。故步自封,虽有相当之学堂,而裹足不前;虽有可造之子弟,而甘自暴弃。……使终此否塞,教育何由而推广,民族何由而进化?其关系于宗教者犹轻,关系于国家者乃甚重也。……特设教育会以提倡之、维持之,顺势利导。”^② 该会曾约请不少人演说,宣传普及教育,其中有不少人倾向革命。教育会拟定了章程,简明扼要,对当时各回教团体影响很大。^③ 但这个团体始终没有

① 钱伯泉《〈创建穆民总教院表〉——一份近代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倡议书》,载《回族研究》1998年第1期。

② 原件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朝民政部档案》卷宗535《回民教领等创设清真教育会请立案禀》。

③ 参看张巨龄《中国回教俱进会初创记事》(上),载《回族研究》1997年第4期。

被京师督学局批准,只得解散。^①

为了改革清真寺的教育,1911年杨氏编了《中阿初婚》一书。《中阿初婚》,“为阿拉伯文法汉译之始,故曰初婚。”^②分为字义、字体、字用、菁华录。卷1字义学为杨仲明自著。书中分门别类列举阿文词汇,采取单词短句汉阿对照形式。杨氏在《中阿初婚》的序言中说:“阿文在吾国,依然仅守于中文长绝之教士,业不专精,苟延残喘。”于广增阿訇说:“杨敬修的《中阿初婚》是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史上一部划时代的重要著作。它打破了用经堂语译解阿拉伯语的老传统,使汉语踏入了经堂,为汉阿对译开辟了途径,这是应该在中阿文化交流史册上大书一页的。”^③

杨仲明上述一系列活动都是为了振兴回族。在清末民初他主要是从事教育的普及活动。到民国以后,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翻译《古兰经》上去了。

民国以前,伊斯兰教入华已千有余年,然而《古兰经》却无一全本汉译本。民国以后,南北各地回族人士纷纷从事《古兰经》全本汉译工作。杨仲明早年就有用汉文翻译《古兰经》的愿望,但直到1947年才在马淳夷、马澍沅、安士伟、马松亭等人的帮助下完成译稿并得以出版,定名为《古兰经大义》,共十四万字。其译本字斟句酌,用简洁之古文直译,在字面上、语法规律上,以至于词序排列上尽可能照顾原文。文字典雅凝练,给人以古朴、庄重、严肃之感。

① 关于申请立案的呈文及批示,原件存北京档案馆《北平市教育局·综合类》全宗号4,目录号1,案卷号23。《回民教领杨敬修等关于成立清真教育会及筹款办学的呈文(附清真教育会会规细则)及京师督学局的批示》,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3期)已将这部分档案公布。

② 赵振武《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

③ 于广增《经堂教育基础课的改革》,载《中国穆斯林》1986年第3期。

但译本无注解,难懂,看起来吃力。回族学者林松先生认为这个译本是高档译品。^① 杨仲明的著作和译品都十分讲究文章之美,这在伊斯兰教经师之中,十分突出。马淳夷称他为“有教以来第一文豪”。^②

杨仲明于1952年1月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八十二岁。

杨仲明活动的时间跨度近六十年,其著译有十几种。涉及范围较广,包括宗教理论、阿拉伯语法、宗教教育、《古兰经》汉译。而译文风格独树一帜,尤为仅见。1939年王静斋在《发扬伊斯兰文化之必要》(载《回民言论半月刊》创刊号)一文中说:“至于今代之学者,则当推天津杨敬修(仲明)为第一。”孙绳武认为:“其成就之伟大,介廉公之后一人而已。”^③

[杨大业]

① 林松《字斟句酌推敲细,典雅凝重功力深——读杨敬修(仲明)译本〈古兰经大义〉》,载《阿拉伯世界》1991年第3期。

② 马淳夷《翻译古兰经之理论及实例》,载《月华》三卷九期。

③ 孙绳武《存诚斋随笔(四)清真教育会·醒回篇》,载《回教论丛》第289页。

庞士谦

庞士谦(1902—1958年),字益吾,经名穆罕默德·特瓦杜阿。河南省孟县桑坡村人。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教育家、学者、阿訇。

1902年,庞士谦诞生于桑坡一个虔诚的回族穆斯林家庭。当时的桑坡,是孟县360个村子中唯一的回族聚居村,居民约1200户、1万余人;有清真寺13座,其中男寺7座、女寺6座,各寺均设有私塾式经堂,有海里凡百余人,凡河南省及长江沿岸的回族学子,大多负笈求学于此,接受伊斯兰教经堂教育。这里经堂教育发达,教门兴旺,阿訇辈出,宗教气氛浓郁;但世俗社会教育却不发达,读书人寥寥无几,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不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少。庞士谦的父亲“性喜教门”,立志叫他走“念经为宗教服务”之路。就在士谦四岁四个月零四天的那一日,父亲将他送到清真寺中,开始了他的读经生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学经过程中,他先后师从过丁长升、丁继高、王松岑、买广德、石万聚、杨泰贞、张秉礼、马蓝田、马连三、马自成、虎延璋、安宏宝等阿訇。于此期间,经他一再请求,父亲还曾允许他跟从本村品学兼优的私塾世家姬绍公学习汉语文。这些学习,为他日后走上阿訇之路,从事伊斯兰教文化教育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庞士谦在二十岁结婚后,常常是边工作边学习。二十二岁那年,他在马连三老师门下学习不到几个月,便替老师应聘至郑州清平里清真寺作代理阿訇,向两名海里凡教授《满俩》及法尔西(波斯)文的《法苏里》,边教边学。几年后,他在陇南张家川德盛皮店作皮货生意时,常到张家川城东清真寺安宏宝阿訇处听经,颇有收获。

在庞士谦从学的众多老师中,给他影响最大的可能要数晋城的马自成阿訇了。自成阿訇(1886—1935年)名诚,以字行。父忠朝,原籍陕西大荔,曾参加白彦虎义军抗清斗争;斗争失败后,寓居平凉,后迁洛阳,遂家焉。自成阿訇十岁时丧父,十九岁时始入寺习经,历从陕、豫各地名阿訇。二十五岁时应聘为洛宁长水镇清真寺教长。因痛感旧式经堂教育制度“教授法之不合实用”,甫上任即组织兴办“中阿小学校”,既讲受汉文,又讲授阿拉伯文。数年后,应聘至晋城,更大力提倡教育,创办崇实小学校,组织通俗讲演会,还计划创办刊物。1929年以后,应聘至北平,任教于成达师范学校,从事新式伊斯兰教教育。受马自成老师影响,庞士谦一生也以兴办新式伊斯兰教教育为己任。青年时代,他任教于马自成创办的崇实学校。后来,又协助马君图、马自成在太原开办经汉大学,未果。不久,到郑州,协助刘志三、郑研真等创办了郑州研究社。“研究社的组织,是伊黑瓦尼派新的设施,在内容方面与清真寺没有多大分别,不过顾名思义,这是一个研究教门中问题的机构,不是专供礼拜与吃‘海底业’的地方。”(《埃及九年》第86页)开始时,研究社由庞士谦与刘志三阿訇共同主持,设有一所小学,有妇女讲演会、成人教义研究班。后因经济困难,志三阿訇离开研究社,由庞士谦独力支撑。1930年,应马自成、马松亭之约,执教于北平成达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1937年,留学埃及,入爱资哈尔大学攻读法学,先后任法鲁克学院中国留学生团长、留埃中国学生部长、爱大中国文化讲座讲师、埃及国王东方事务顾问等职。1939年率团从埃及赴麦加朝觐。1947年回国后,与马松亭在北平创办回教经学研究班、月华文化服务社等,出任《月华》与《月华周报》主编,兼任北平师范学院阿拉伯语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北京回民学院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参加发起筹建中国伊斯兰教协

会工作,先后任伊协常委、副主任。他把毕生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中国伊斯兰教新式教育事业之中,桃李满园,受到穆斯林的普遍尊敬与衷心爱戴。

庞士谦阿訇是爱国爱教的典范。1939年2月18日,他收到唐柯三、孙燕翼、达浦生、马松亭来电,要他组织留埃学生朝觐团,赶赴麦加朝觐。在完成朝觐功课的同时,一方面宣传抗日,揭露日寇侵华真相;另一方面监视华北伪政府派遣的所谓“中国回教朝觐团”活动。庞士谦立即召集全体留埃学生讨论,并把各项具体工作分配到人,办妥各项手续,准时开赴圣地麦加。一路上,他组织学生们向同去朝觐的各国穆斯林揭露日本侵华暴行,揭穿日本帝国主义欺骗国际舆论的毒计,表达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赢得各国穆斯林的理解与支持,大家一起为中国抗战作祈祷。在麦加,他组织学生们有理、有利、有节地与敌伪所派“朝觐团”成员作斗争,说服他们均以中国国民政府的国旗为标志,与学生朝觐团一起活动,有效地粉碎了敌人借朝觐之机行日寇侵华政治宣传的阴谋。

在《埃及九年》中,庞士谦阿訇以朴实的语言多处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勾结美国欺压中国人民的罪行,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他借一位侨居新加坡的十九岁华侨之口,明确提出:“美国对于中国是有野心的,将来至少要侵略中国的经济。看现在中国大部分都用的是美国的物品,不如趁早把他们赶出中国。”“中国还谈什么民主,一切都操在国民党手里,一党专政和抗战前一样。抗战八年以来,老百姓的死伤损失不可以数计,完全是为国民党争天下。换句话说,就是为极少数的资本家而消磨国民的生命财力。至今还没有走向民主,由于最近民主同盟的主干李公朴、闻一多之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而更明白。”他热情讴歌“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很

正确的”。“现在我们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起来了……我们国内的少数民族也翻身了,并且也成为中国人民不可分割的一个伟大的力量”。各族兄弟应相互了解彼此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避免“无谓的误会”,加强团结,共建祖国。

庞士谦毕生从事伊斯兰教与阿拉伯语教育教学工作,对于中外伊斯兰教寺院教育的历史沿革、规章制度、教学体系、课程设置等非常熟悉,了如指掌。因此,他对中国伊斯兰教传统寺院教育的弊端,对中国伊斯兰教教育事业的落后状态,有深切的感受。他指出:“在教育方面,我们虽有数千所私塾式的经学校,但不仅是只读些旧东西,而且在教学方面也有许多缺点。新式的学校,就中学而论,不过十余所而已,较诸中国的耶教则相差太远了。他们的信徒全国只有数百万人,但是单就他们所设立的中学而论,就有三百所。”他力倡中国伊斯兰教的建设“应由教育着手”,以启迪穆斯林民智、提高穆斯林整体素质为目的,普及普通教育,开办中学教育和职业学校教育,进而发展大学教育与留学生教育。他大力宣传马自成、马果园等前辈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提倡中阿文并授,改革旧经堂教育,发展适应时代进步的新式教育。他强调“治贫治愚是我们奋斗的两大目标,多提倡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鼓励回民生产”,中国穆斯林才能前途有望。

庞士谦阿訇作为一名教内学者,在从事宗教教育的同时,还致力于伊斯兰教学术研究,对中外伊斯兰教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勤于笔耕,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其作品和译作主要有:《中国与回教》(阿拉伯文、开罗版)、《埃及九年》、《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马自成阿衡传》、《中原回回》、《桑坡惨案》、《和平之使命》、《回教认识的派别》、《脑威四十段圣谕》、《回教法学史》等。他的作品资料性强,保存了中外伊斯兰教历史、

文化、寺院教育、教派、教法、圣训等大量可靠的珍贵资料。迄今为止，庞阿訇的这些作品仍是我国伊斯兰教研究工作者的必读之作。在这些作品中，庞士谦阿訇总是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是非分明，态度明确，绝不遮掩。例如，在论述“回教与科学”的关系时，他写道：

科学的进步一日千里，近些年的成就更大，如潘尼西林与原子能的发明。科学越进步，人类越幸福。不过要把科学用在给人类谋福利上，不要拿它来杀害人类。这次对于日本使用原子弹，在人道上来讲是不应该的。《古兰》云：“你们为主道而杀害那杀害你们的人，但是不可过为，安拉不喜过为的人。”(2:190)

有些人认为宗教是反科学的，也有些宗教人认为科学是反宗教的。但是回教则不然，因为科学是使用理智推测物质的原理与作用，而回教正是鼓励人类使用理智观察万物的。在《古兰》中提到理智的地方有四十九处之多，圣谕中也有很多地方鼓励人类使用理智。教法的每一条例都举出经典的证据和理智的证据。因此中世纪时回教对于科学有很多的贡献，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导源于回教。还有些人认为宗教是不可理解的，那是错误的。今后我们应当利用科学来发挥宗教，利用宗教来提倡科学。《《埃及九年》第88—89页）

应该承认，庞士谦阿訇的这些真知灼见至今仍不失其意义与价值。

极“左”路线使庞士谦阿訇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留给世人的巨大精神财富，使庞士谦的名字永远活在中国各族穆斯林及阿拉伯人民心中。

〔冯今源〕

虎嵩山

虎嵩山(1880—1955年),原名镇林,经名赛尔敦丁。生于光绪六年(1880年),宁夏同心县人。出身宗教世家,父为虎夫耶学派的经师。自幼从父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和虎夫耶门宦的宗教功修。后到海原县拜汪乃比阿訇(临夏东乡唐汪人)为师,学习研究《沙米》、《伊尔沙德》、《米什卡特·麦萨比哈》等典籍教法,历时五年之久。此后他继续博览各种伊斯兰教经典和汉文译著,刻苦钻研,力求达到融汇贯通。他富有独立见解和较深造诣,成为宁夏著名伊斯兰青年学者,应聘在同心等县清真寺任阿訇。

民国初年伊赫瓦尼传到了宁夏地区。最初是吴忠郭士高阿訇传播的。郭士高是马果园的学生,曾跟随马果园在西宁念经,后来在马果园授意下到宁夏传播伊赫瓦尼“凭经立教”、“遵经革俗”的教旨。在传教初期由于受到格迪目和各门宦的强烈反对,伊赫瓦尼没有获得较大发展。后来虎嵩山脱离了虎夫耶门宦,改遵了伊赫瓦尼教义学说,并和汪乃比等人在吴忠、同心、固原等地宣传伊赫瓦尼。由于他们在教学和宣传中主张既学阿文又学汉文,并提倡用汉文解释和宣传伊斯兰教义,尽量避免与其他各派各门宦发生冲突,同时还得到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支持,于是伊赫瓦尼才得到较大发展,虎嵩山也就成了宁夏伊赫瓦尼派的中心人物。

1924年虎嵩山赴麦加朝觐,第二年回国后即任湖南常德县应聘为开学阿訇。1927年回同心提倡回民新式教育,主张学经兼学汉文,改革清真寺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积极推动回民教育的发展。

1937年在宁夏吴忠创办中阿讲习所,自任所长,后改名为吴忠中阿师范学校,任副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提出“国家兴亡,穆民有责”,既爱教又爱国,积极发动穆斯林参加抗日活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曾担任中国回民文化协进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政协委员、宁夏西海固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他主张穆斯林内部要消除教派门宦分歧,各行其是,团结一致,共同建设新中国。1955年病逝。编撰有:《伊斯兰三字课本》、《波文文源》、《月论释难》、《拜功之理》、《阿文教科》等。

〔马 通〕

马良骏

马良骏(1870—1957年),字善堂,经名穆罕默德·郁素夫,俗称小马阿訇。生于同治九年(1870年),甘肃清水县张家川上达乡上磨村(今属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通汉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为西北伊斯兰教著名伊玛目、学者、社会活动家。

马良骏自幼勤奋好学,立志深造。他曾徒步千里,出游河湟、长安、平凉、固原以及云南等地,访师求学,先后得到陕西禹月明阿訇、平凉老兰阿訇(兰秀斋阿訇之父)、云南马仁山阿訇(普洱马老爷)等著名经师的教诲,为通晓阿、波文奠定了基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马明月阿訇推荐首任静宁清真大寺教长,继而任华平十二堡清真大寺教长,1913年后相继任新疆哈密陕西清真大寺、王爷台清真大寺及伊犁清真大寺等处教长,期间著书立说,培养学生,成果丰硕。1938年以来,先后在乌鲁木齐宽巷清真寺、东方清真寺、青海清真寺、固原清真寺、吐鲁番清真寺和陕西清真寺主持教务,讲授经典,整顿教风,纠正粗俗异说。从此,声名远扬,成为西北伊斯兰教著名经师。

马良骏奉行陕西学派的宗旨,倡兴经堂教育,重视培养经学人才。他治学严谨,尊守虔诚,在教学中主张阿、波文并重,阿、汉文兼学,运用深入浅出的方法,达到对教义、教法和教史的明彻贯通。他讲解认主学、修辞学,不仅表达准确,而且诠释清楚。他在宣教宏道、传经授业的四十年中,培养出品学兼优的弟子数百人。

马良骏阿訇一生致力于伊斯兰教学术研究,著作颇多。他撰写、择编和辑录成书的达十多种二十多部,其中有《凯俩目哈什那》、《信仰学疑难注解》、《塔勒克》(历史)、《迈孜拜图》(奥义集)、

《大台里赫素》(教典要义大全)、《小台里赫素》(简明教典要义)、《绥热甫嘎代》(宗教诗词集锦)、《阿汉合璧天文地理志》、《阿汉合璧穆罕默德诗集》、《清真要志》、《考证回教历史》、《伊斯兰教简史》等。他的这些著作作为我国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3月马良骏阿訇被新疆主席盛世才非法囚禁达四年之久。1944年盛世才下台,吴忠信继任新疆主席后始获释。他被捕时临危不惧,视死如归,每日在狱中仍坚持五次礼拜,并继续从事研究、翻译和著述。

马良骏生平不积聚钱财,所得收入都用于接济穷人。他不分民族,不论男女,凡上门讨要者,都施散给“乜贴”。在伊犁、乌鲁木齐的三十多年中,每逢主麻日,给二百多人每人散饼一个,从未间断过;还曾给几个无力陪嫁的穷女子置备了嫁妆,像亲生女儿一样陪送出嫁。他的学生拜荣寿阿訇被盛世才杀害后,他包养其妻儿老小多年。但他办善事行施舍,从不对人夸耀。他生活艰苦朴素,从不治买家产,他在哪里开学,就住在哪个寺内。有个叫张农官者,出于敬慕愿将其一院地方给马阿訇,作价四百元,只收一百元,其余作为印书赠款。马良骏婉言谢绝,并说:“我是办教者,不是为后代子孙的坐享清福着想。天下无住宅的人很多,何止我一人。”他临终告诫后人说:“凡吾子孙,善体吾意,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唯小善必获大报,唯小恶必遭大歼。吾一生不治产,不蓄财,唯遗经术耳。经书要读,不要陈设,读会了就是宝贝。治产蓄财的只是傻瓜。穆圣云:‘但蓄私财乃错误之开端。’要和睦亲友,不要修造坟墓,不可立碑,在坟上不要修房架屋,要与普通坟墓一样,以防止流为异端,遗祸于后人,为害不浅。”

马良骏阿訇一生追求和平,反对战争。马良骏在和平解放新

疆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以新疆监察使身份和包尔汉主席秘密商讨了和平解放新疆问题。当时和平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是骑五军军长马呈祥,他不听陶峙岳、包尔汉的劝告,既不愿参加起义,又不愿离开新疆出走。在关键时刻,马良骏不计安危,于1949年9月20日劝说骑五军军长马呈祥离开新疆,但马呈祥仍坚持要打。马良骏对马呈祥说:“同解放军对抗无疑是以卵击石,自讨苦吃。”并以圣训告诫马呈祥说:“你不能伤害新疆的一草一木,使新疆各族人民遭祸殃。”马呈祥则说:“就是走,不打一枪,两手空空的怎么走哩?”马良骏说:“军长若要出走,包主席愿提供路费,送黄金几百两作赠礼;我可动员迪化二十三坊的教民欢送您。”马呈祥思考后,即站起来对马良骏阿訇说:“老人家,我遵你的口唤吧!”次日,省政府派人给马呈祥送去黄金500两,马良骏也动员二十三坊教民送了礼物。9月23日马呈祥、罗恕人等交出兵权,带着家属离开了迪化。9月25日陶峙岳、包尔汉分别代表国民党部队和新疆省政府通电起义,宣布和平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马良骏阿訇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代表新疆回族穆斯林表示热烈祝贺,《人民日报》于10月22日刊登了马良骏的电文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给马良骏阿訇的复电。他在历次重大政治活动中都积极宣传党的政策,鼓励穆斯林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如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和维族阿訇加利牙孜共同倡议,发动维、回穆斯林捐献“伊斯兰”号飞机,为支援抗美援朝做出了积极贡献。

他重视民族团结,经常讲:不论回汉或其他民族,都是“呼达”的“板得”(奴仆)。1953年有一个从河南省来乌鲁木齐寻找丈夫的汉族妇女,由于找不到丈夫,怀抱两岁的孩子沿街乞讨。一天,这个妇女来到陕西大寺门前放声大哭。马良骏将这个妇女叫进清真寺,让其吃住在清真寺,并叫人找到了他的丈夫;临走时还给她

做了衣服,给了钱,让其丈夫领走。1984年那个妇女和长大了的儿子专程到陕西大寺感谢马阿訇。当她得知马良骏已归真后,非常伤感,她对马阿訇的女儿马惠英说:“你父亲是我母子的恩人,我感恩不尽。”诸如此类不分回汉、一视同仁的感人事迹还有许多,因此马良骏大阿訇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马良骏于1957年7月14日归真。归真后,中央及地方政府以及有关群众团体和个人都送了挽帐,王恩茂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参加了安葬仪式。7月17日,全疆各回族清真寺和众多的穆斯林约数万人参加葬礼;乌鲁木齐市戒严两小时,出动汽车、摩托车数百辆,从乌鲁木齐至黑山头长达十公里的公路上,人如潮海,络绎不绝。在一片哀悼声中,马良骏大阿訇的遗体被安葬于昌吉262墓地。

〔马 通〕